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

林梅村著

文物出版社

201008337

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

林梅村　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　蔡　敏
封面设计　张希广

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

林梅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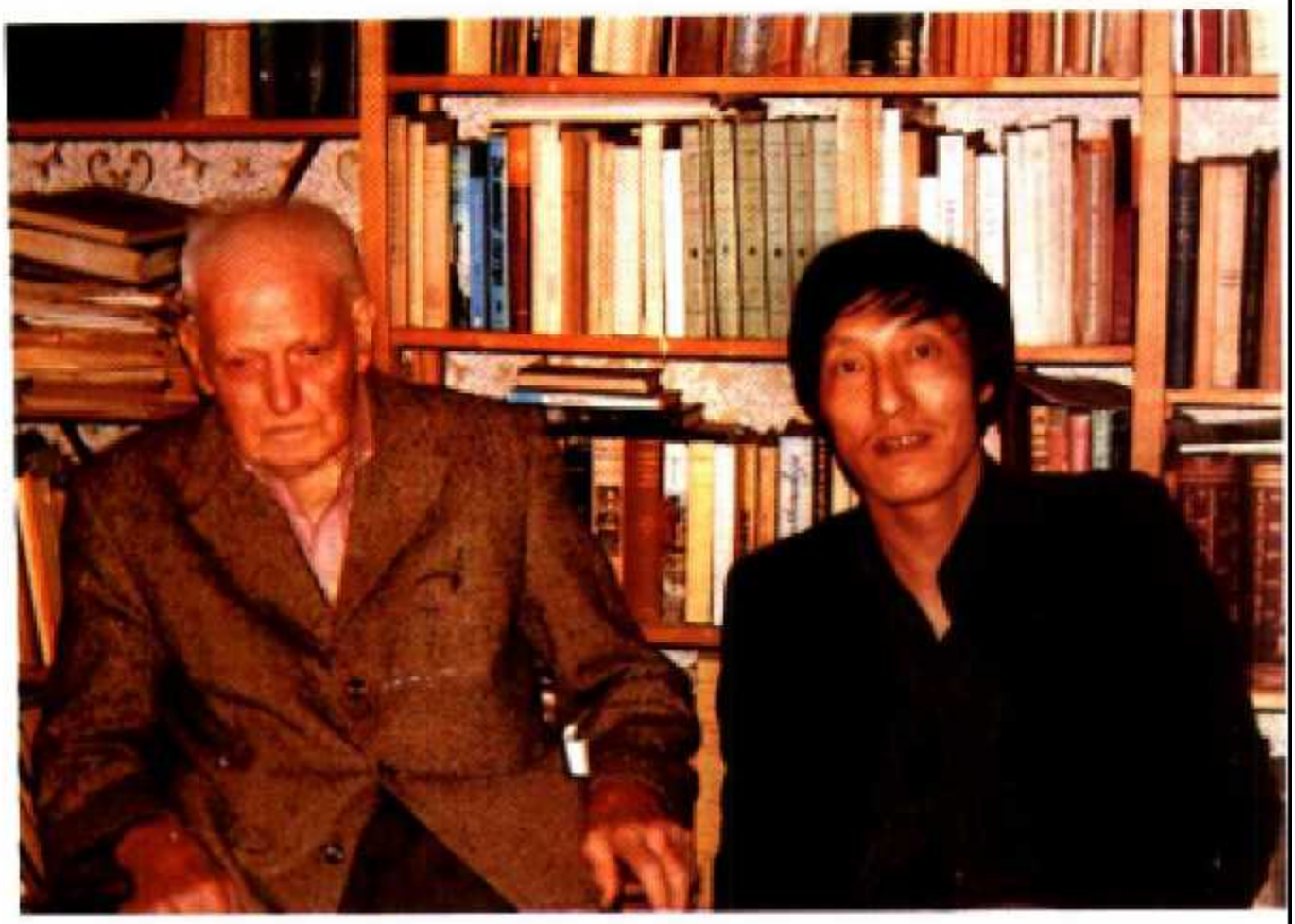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美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开　印张：15　插页：4
1998年5月第一版　1998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0987－2/K·420　定价：70元



1. 欧洲语言学大师贝利爵士与作者在书房合影

2. 新疆天山东部阿拉沟战国时期木椁墓出土狮纹金箔饰件

3. 乌鲁木齐阿拉沟出土战国—汉初青铜火祆教祭坛

4. 洛阳汉魏故城出土刻有佉卢文的东汉井阑残石

5. 尼雅出土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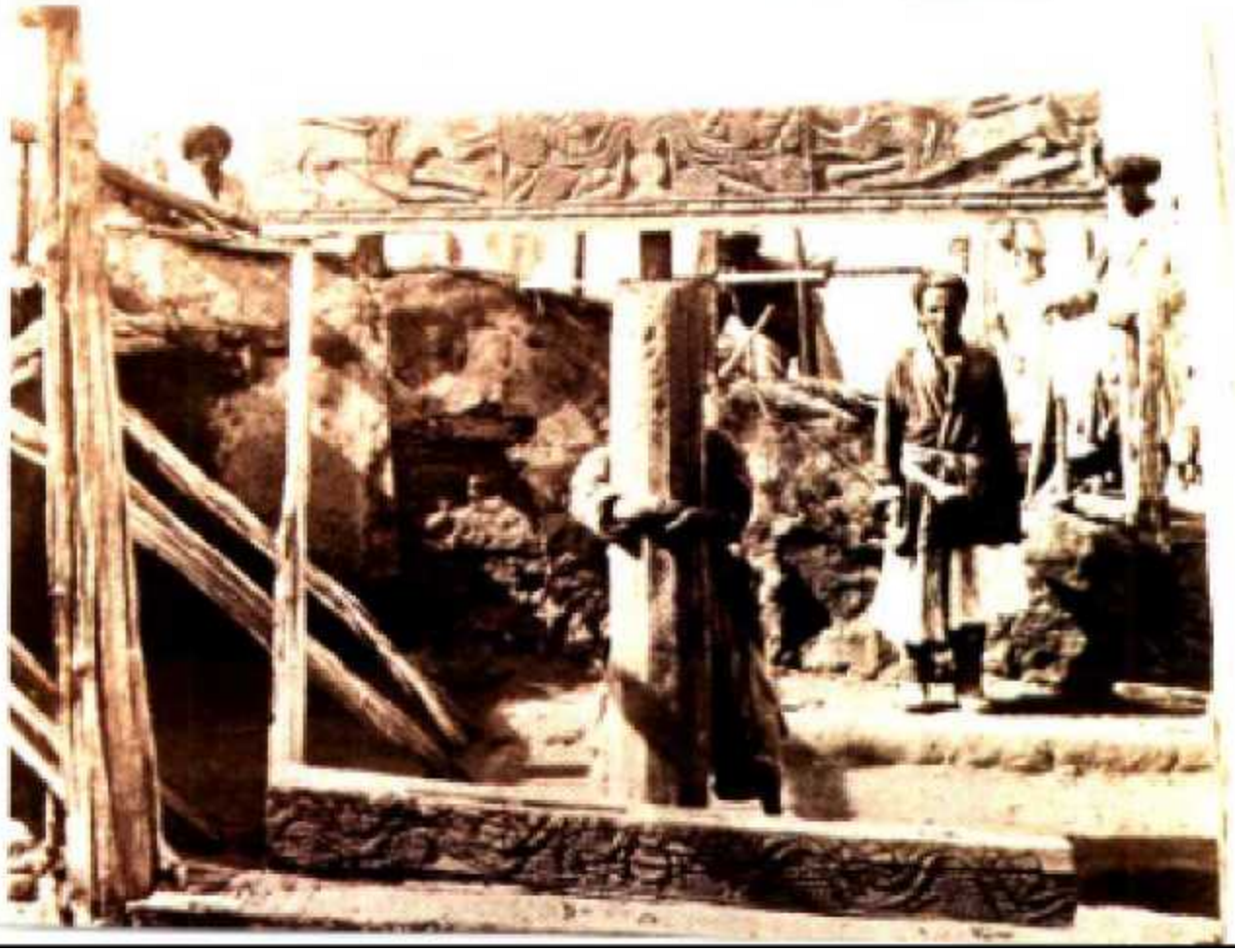
6. 大英图书馆藏佉卢文犍陀罗语(解脱戒本)

7. 唐代神山堡遗址

8. 新疆巴楚托古孜沙来汉唐古城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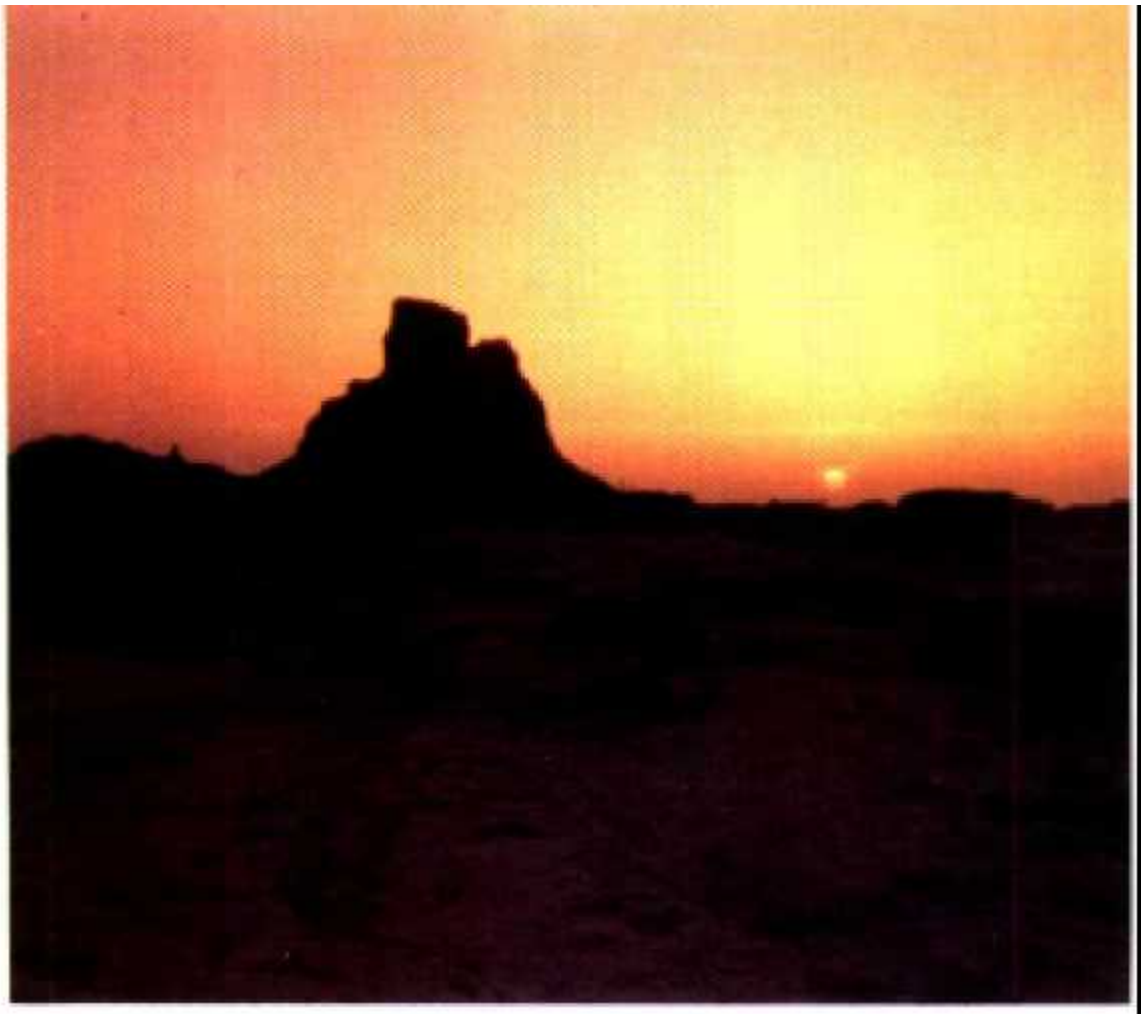
9. 鸟瞰尼雅遗址

10. 斯坦因发掘尼雅现场



11. 大英博物馆楼兰尼雅文物展柜

12. 新疆巴楚图木舒克出土 5—6 世纪木雕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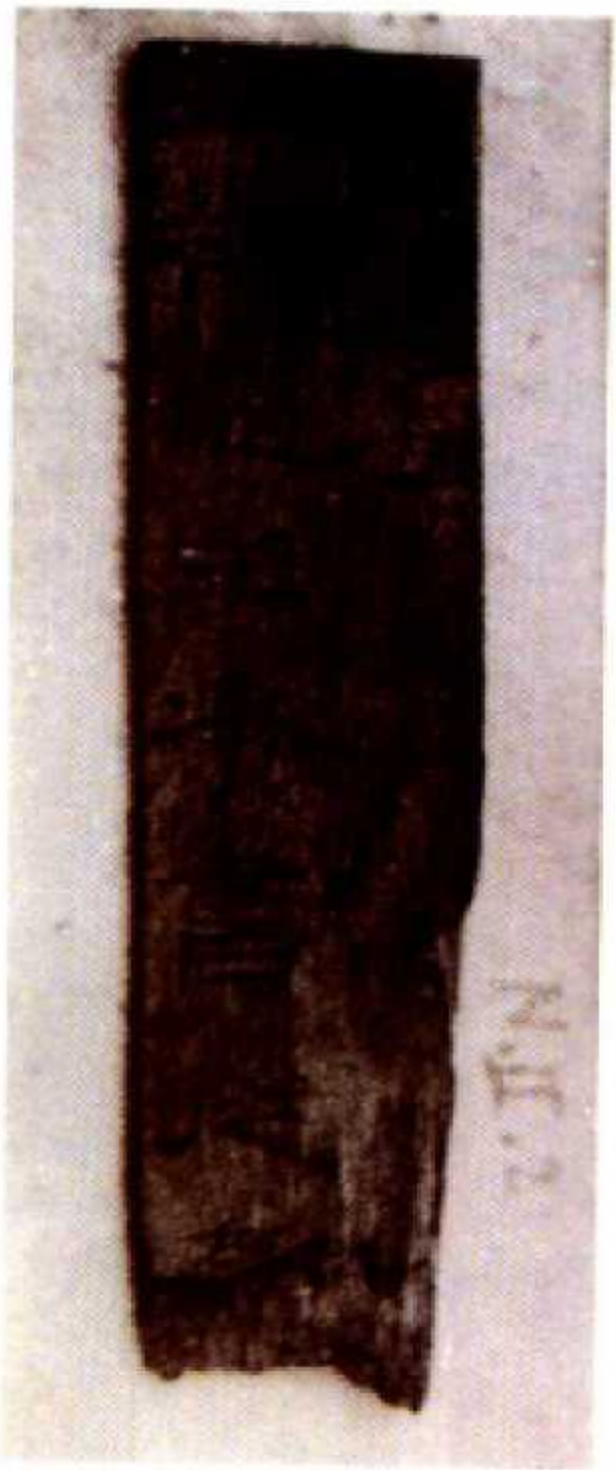
13. 夕阳下的楼兰佛塔

14. 新疆若羌县北部沙漠中的麦德克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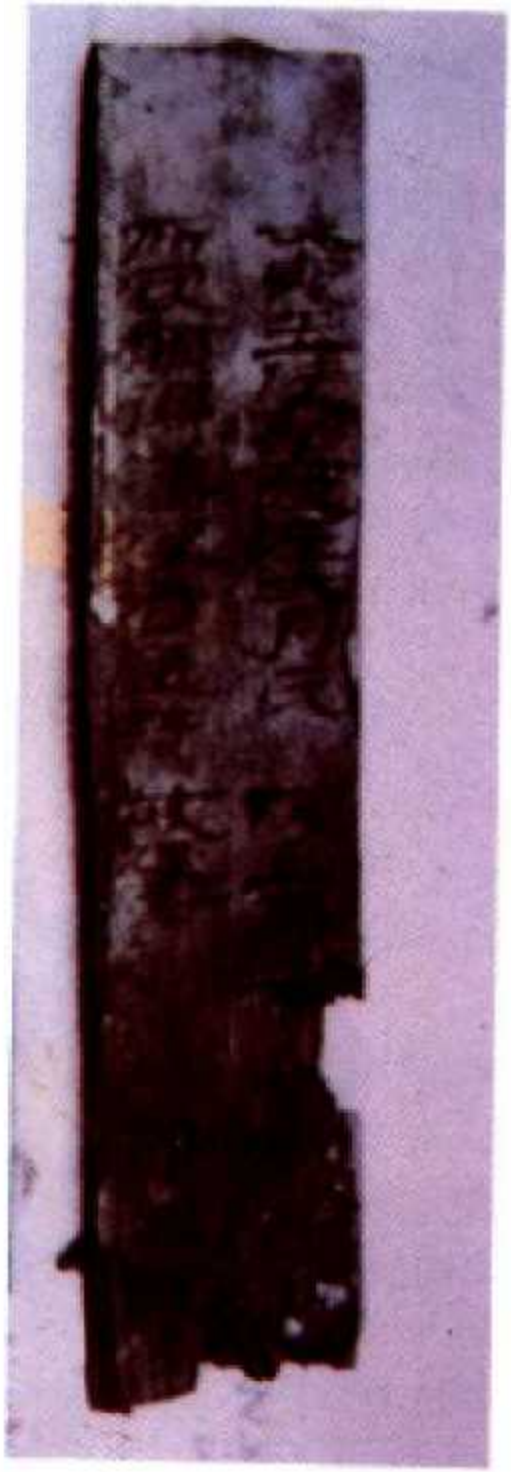
15. 楼兰 LE 汉代古城

16. 新疆孔雀河畔的墨山古城

17. 鄯善河(车尔臣河)流域



18. 大英图书馆藏尼雅出土记有“汉精绝王”的汉简



19. 大英图书馆藏尼雅出土有关大月氏使者的汉简

20. 新疆且末县城附近扎洪鲁克古墓出土距今约4000年的毛织物

21. 吐鲁番鄯善县春秋战国墓出土实施胸外科手术的干尸

22. 哈拉和卓古城摩尼教寺院出土 8—9 世纪摩尼粟特文经卷插图

23. 宋代日月瓶

自　序

1982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西部寻访古迹，经常孤身一人在荒漠中独行。原以为这项研究大概是世界上最寂寞的学科，绝没有想到它在最近十年发展成当今世界人文科学的一门显学。从欧洲、北美到日本和韩国，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西部古文明。1988年我到日本大阪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的一个丝绸之路研讨会时，与会正式代表也就一二十人；而1996年到美国费城出席中亚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古民族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与会者竟有世界各地考古、艺术、民族、语言、纺织、历史、人类学、冶金技术、医学、遗传学乃至分子生物学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原以为与会的外国朋友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考古新发现不一定了解。殊不知，他们知道的比我们还要多。有些重要材料，我是从他们演示的幻灯片上才第一次见到。另一个深刻印象是，西域研究正在逐渐摆脱传统汉学研究模式，考古学和语言学已经开始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93年应美国国家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协会之邀，作者到美国东方学的一个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专门从事丝绸之路最古老的语言——犍陀罗语研究，深得Richard Salomon教授的热心指导和帮助。为将欧美学者对西域研究的重要成果带回国内，我几乎罄已所有，购买图书和复印资料，并通过欧美馆际借书，从德国、法国和英国调阅了大批资料。有关西域古代语言

DQ82/10

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一年完成的，主要学术成果收在本书第二编。

归国不久，即蒙恩师季羡林和宿白两教授推荐，回到阔别13年的母校北京大学，在考古学系执教东西交通考古学。新工作要求我不能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还要研究许多以前从未涉及的问题，以使学生获得系统的知识。这是我近年不断开辟新课题的动因。这些研究得到北大师友以及我的学生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主要成果集中在本书第一编。

新闻界的朋友对西域的热情远在我们之上。承蒙他们盛情邀请，先后和中央电视台（1995年）及北京电视台（1995—1996年）合作拍摄西域文明题材的电视专题片。航空考古是一项早已在欧美考古界实施的技术，德国尤为发达，但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在新闻界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实现了驾直升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的梦想，其间调查了沙漠腹地许多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本书一些章节的写作基于那次航空考古所获资料。

如所周知，本世纪初欧美和日本探险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发现了许多古代城市，所出文物随即大批流散海外。西方和日本学者研究这些文物有近水楼台之便，卓有成就，国人对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颇有不可超越之感。1995年夏我终于得到一个机会，赴斯德哥尔摩和伦敦调查流散欧洲的塔克拉玛干古物，拜访了神交多年的欧洲语言学大师Harold Bailey爵士（参见彩版1）。此次欧洲之行收获甚丰。在瑞典民族学博物馆H. Wahlquist博士帮助下，查阅了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楼兰发掘的全部古物和文书写卷。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Anne Farrer博士和大英图书馆东方与印度写本和印本部负责人Frances Wood博士帮助下，较为全面地调查了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的新疆古物收集品，特别是在大英图书馆见到了斯坦因第4次中亚考察在尼雅拍摄的从未发表的文物照片。这批文物在斯坦因

出境时被扣在新疆喀什，至今下落不明。这批新疆古物中有一枚出自尼雅的汉简明确提到“汉精绝王”，这使以前学界对尼雅遗址即汉代精绝的推测首次被当地出土古文字资料证实。本书的某些章节就是讨论这些流散欧洲而从未发表过的文物。

如果说本书对当今西域研究有所贡献，首先要归功于前面提到的老师和朋友。这里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北京电视台杜培华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镰先生、新疆文物考古所所长王炳华先生、新疆博物馆前任馆长李遇春和沙比提先生、新疆喀什文管所的维族朋友阿力甫先生、新疆大学阿尔泰学研究所所长牛汝极教授、中国钱币协会秘书长姚朔民先生、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S. Rosén 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L. von. Falkenhausen 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Victor H. Mair 教授、英国伊朗学家 N. Sims-Williams 博士、德国伊朗学家 W. Sundermann 博士、大英博物馆钱币部主任 J. Cribb 先生在各自领域提供的帮助。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文物出版社社长杨瑾女士、友人黄文昆先生和蔡敏先生。我目前已出版的四部学术著作中的三部是这家出版社出版的，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本书不可能如此顺利与读者见面。谨志于此。

1996 年 12 月 30 日序于北京海淀寓所

目　　录

自　序……（1）

第一编　中原与西域诸文明的最初接触

一　帝辛甲骨所见殷宫秘史……（3）
二　商周青铜剑渊源考……（39）
三　祁连与昆仑……（64）
四　吐火罗人与龙部落……（70）
五　狮子与狻猊……（87）
六　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96）
七　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102）

第二编　西域胡语新论

一　古代大夏所出丘就却时代犍陀罗语三藏写卷
　　及其相关问题……（115）
二　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所出呹哒钱币考……（131）
三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犍陀罗语《解脱戒本》残卷……（142）
四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佉卢文《法集要颂经》残片……（151）
五　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157）
六　尼雅新发现的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考……（178）
七　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198）

第三编　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记

一　汉唐和田河的古代交通……（211）
二　疏勒佛教考古概述……（227）
三　汉代精绝国与尼雅遗址……（244）
四　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256）
五　敦煌写本钢和泰藏卷所述帕德克城考……（265）
六　楼兰国始都考……（279）
七　楼兰鄯善王朝的最后居地……（290）

第四编　从洛阳到印度及罗马之路

一　中国与罗马的海上交通……（307）
二　麻沸散与汉代方术之外来因素……（322）
三　法藏部在中国……（343）
四　从突骑施钱看唐代汉文化的西传……（365）
五　日月光金与回鹘摩尼教……（381）
六　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393）
七　《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420）

缩略语表……（443）
英文目录……（446）

插图目录

1. 小臣墙刻辞拓片（据胡厚宣等编：《甲骨文合集》第12卷，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2年，36481正） …（5）
2. 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古代宗教裸体舞蹈岩画（局部，据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图3） ……（30）
3. 青铜剑及管銎战斧之东渐 ……（46—47）
4. 东汉建和元年《武绥宗使石工造碑》有关狮子的碑文局部（据《考古与文物》1986年3期第89页图四） ……（93）
5. 新疆和田山普拉于阗战国—汉初古墓出土斯基泰风格的鹿纹毛织物（据《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第35和37页） ……（105）
6. 中亚七河流域出土7—8世纪火祆教徒盛骨瓮（After G. Pugachenkova and A. Khakimov,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lishers, 1988, Pl. 128） ……（107）
7. 古代大夏遗址新出丘就却时代犍陀罗语三藏写经残片（After J. Darnton: "Fragile Scrolls Cast New Light on Early Buddhism," *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July 7, 1996, International） ……（115）
8. 伽腻色迦时代（约100—123年）大夏钱币上的佛像（After E. Errington and J. Cribb, *The Crossroads of Asia*, London: 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199） ……（121）
9. 丘就却时代（约1世纪初）大夏佛寺遗址所出纯金舍利盒上的一组佛像（After E. Errington and J. Cribb,

The Crossroads of Asia, London: 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191) …… (121)
10. 呹哒钱币大夏文摹本（据《考古》1966 年第 5 期图版陆:3 呹哒钱币照片）…… (135)
11. 长安出土鹿纹十二瓣银碗（据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年，第 41 页，图版 111）…… (159)
12. 长安出土鹿纹十二瓣银碗铭文摹文 …… (160)
13. 焉耆出土粟特银碗口沿下铭文摹文（何德修供稿）…… (161)
14. 焉耆出土波斯银碗圈足铭文拓片（何德修供稿）…… (164)
15. 大同出土大夏八曲银洗铭文摹文（熊存瑞供稿）…… (165)
16. 甘肃靖远出土大夏银盘及其摹文（据《文物》1989 年第 5 期第 2 页插图）…… (168)
17. 固原出土中古波斯文印章线图（据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插图 107 放大）…… (200)
18. 艾米塔什博物馆藏萨珊波斯虎纹银盘（After A. U.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VII, London, 1938 (repr. 1967), Pl. 204) …… (203)
19. 洛阳出土狮纹银碗，瑞典卡尔·肯佩收集品（After B. I. Marshak, *Sogdiiskoe Serebro*, *gdavnaya redakniya v voctochnoi literature'*, Moskva, 1971, T. 16) …… (204)
20. 卡马河流域苏德亚卡尔村出土狮纹银杯（After B.I. Marshak, *Sogdiiskoe Serebro*, *gdavnaya redakniya v voctochnoi literature'*, Moskva, 1971, T. 21) …… (205)
21. 且末古城出土佉卢文法律文书残牍(张朋川供稿) …… (298)
22. 庞培城出土公元 1 世纪印度象牙雕刻（After M.

Wheeler,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London, 1954, Pl. XIX) …… (313)
23. 山东临淄齐王墓和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汉代罗马方物——列瓣纹银盒（据孙机：《中国圣火》，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图一）…… (318)
24. 新疆和田牛角山出土公元2世纪末犍陀罗语《法句经》首页（After J.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riental Series*, vol. 7, 1962, Pl. I）…… (346)
25.《沐园泉拓》刊两枚突骑施钱及其铭文摹文 …… (367)
26. 上海博物馆藏唐代回鹘摩尼教钱币日月光金拓片（据陈源等：《隋唐五代十国货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图版2280）…… (382)
27. 湖北英山摩尼教墓碑（据《出版科学》1994年第1期第40页图版）…… (395)
28. 西藏吉隆阿瓦呷英山口的唐显庆三年摩崖石刻《大唐天竺使出铭》局部照片（据《考古》1994年第7期图版捌3—4图）…… (427)

地图目录

1. 商末周初西土方国分布示意图 …… (卷首)
2. 大月氏西迁前西域古民族分布示意图 …… (78—79)
3. 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考察队行程路线图 …… (212)
4. 王玄策西使印度路线示意图 …… (卷末)

彩版目录

1. 欧洲语言学大师贝利爵士与作者在书房合影
2. 新疆天山东部阿拉沟战国时期木椁墓出土狮纹金箔饰件（据《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图版 117）

3. 乌鲁木齐阿拉沟出土战国—汉初青铜火祆教祭坛（据《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图版 118）

4. 洛阳汉魏故城出土刻有佉卢文的东汉井阑残石（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供稿）

5. 尼雅出土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王炳华供稿）

6. 大英图书馆藏佉卢文健陀罗语《解脱戒本》（大英图书馆供稿）

7. 唐代神山堡遗址（林梅村摄影）

8. 新疆巴楚托古孜沙来汉唐古城遗址（林梅村摄影）

9. 鸟瞰尼雅遗址（林梅村摄影）

10. 斯坦因发掘尼雅现场（After M.A. Stein, *Ancient Khotan*, vol. 3, Oxford, 1907）

11. 大英博物馆楼兰尼雅文物展柜（林梅村摄影）

12. 新疆巴楚图木舒克出土 5—6 世纪木雕佛像，巴楚文物管理所藏品（祁晓山供稿）

13. 夕阳下的楼兰佛塔（林梅村摄影）

14. 新疆若羌县北部沙漠中的麦德克古城（杨毛然供稿）

15. 楼兰 LE 汉代古城（林梅村摄影）

16. 新疆孔雀河畔的墨山古城（林梅村摄影）

17. 鄯善河（车尔臣河）流域（林梅村摄影）

18. 大英图书馆藏尼雅出土的记有“汉精绝王”的汉简（大英图书馆供稿）

19. 大英图书馆藏尼雅出土的有关大月氏使者的汉简（大英图书馆供稿）

20. 新疆且末县城附近扎洪鲁克古墓出土距今约 4 千年的毛织物，且末文管所藏品（林梅村摄影）

21. 吐鲁番鄯善县春秋战国墓出土实施胸外科手术的干尸（王炳华供稿）

22. 哈拉和卓古城摩尼教寺院出土 8—9 世纪摩尼粟特文经卷插图（MIK.III.6396），（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品，after A.v. Le Coq, *Die Manichäischen Miniaturen*,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Bd. II, Berlin, 1923）

23. 宋代日月瓶（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供稿）

第 一 编

中原与西域诸文明的最初接触

一　帝辛甲骨所见殷宫秘史

一代宗师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1]将殷墟卜辞与《史记·殷本纪》相对照，首次证明司马迁所撰殷史是根据殷人典册。他在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期间创立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有力地冲击了晚清以来兴起的疑古之风。

殷墟卜辞主要记录殷代帝王的宗教活动，几乎不涉及史书所述殷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大多于“史”无补。王氏考订殷王世系之后，殷墟不断有卜辞出土，但研究者难得有王国维那样的机会，从中找到能以卜辞证史的重要资料。然而这样一个机会终于在1930年再次出现，董作宾首次向学界报道了殷墟发现的一个刻在牛肋骨上的长篇记事刻辞，今称“小臣墙刻辞”。[2]

小臣墙刻辞最初属于省吾藏品,[3]后来转让给清华大学，现为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借展。[4]1955年胡厚宣的《甲骨续存》下册收入这个刻辞的拓片并作释文。胡先生在书序中评述说：“其时代当属于帝乙帝辛，在十几万片甲骨文字之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殷末战争史料，即在周金文中，亦唯有小盂鼎铭可以仿佛似之。”[5]1956年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发表了这个刻辞的照片。[6]尽管早在1930年小臣墙刻辞就为学界所知，但它讲述的历史却迄今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最近因为收集殷代战车史料，我们注意到小臣墙刻辞，发现其内容不仅可以和《史记·殷本纪》所

述殷末历史相印证，而且能和殷墟及周原帝辛甲骨建立联系。撰写此文，求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小臣墙刻辞释文及其解说

小臣墙刻辞上端残缺，所以有学者推测："此为残骨，原骨殆有二十厘米长，五厘米宽，现仅残存三分之一，有文五行五十六字，记战争俘获之事。"或者认为："据估计全文长150—200字，今残存58字"。[7]然而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块骨版似乎仅上端略有残缺，其内容似表明这篇刻辞不会有那么多字。如果合文以单字计数，小臣墙刻辞共6行，满行11字。第1行开头残破，残破处能容3字。第5行内容表明这篇刻辞原来应有6行，但第6行现无字，估计结束语写在第6行开头能容3字的残破处。第1行和第6行的阙文相加凡6字，加上现存52字，这篇刻辞实际上只有58字。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人典册主要指殷朝皇家档案。殷朝大事和帝王言行均由史官现场记录，就是《礼记·玉藻》所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用笏在朝上记言、记事，下朝后将笏上所记文字过录到简牍上，归入皇家档案。由于殷朝史官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所以殷人典册难以保存至今。武王伐纣时殷朝档案（包括前代档案夏朝典册）和殷人宗彝器（包括前代镇国之宝夏鼎）均落入周人之手。周初分封时殷都所获古代典册都分给了鲁国。[8]山东半岛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中心，当与这些古代典册在齐鲁地区辗转传抄有关。

周人似乎对殷人的宗教档案没什么兴趣，所以殷墟发现的殷人典册只有甲骨卜辞。小臣墙刻辞可谓劫后之余，这样的长篇历史记事颂辞居然在殷墟保存下来实属偶然。它记录的历史事件大

概和某个卜辞内容相关，故被殷朝祝卜根据史官的记录抄刻到甲骨上，因而使这段重要的殷末史料随殷朝宗教档案保存下来。[9]

插图 1　小臣墙刻辞拓片

我们的释文根据《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著录的小臣墙刻辞拓片（参见插图 1）。[10]在胡厚宣《甲骨续存》释文基础上，综采诸家意见，我们对小臣墙刻辞的读法重新分析于下：

第 1 行：这行开头所残三字估计是刻辞的纪时，但没有任何线索能确定它们是记年、记月或记日，只能补入古文常见的引导时间的词“隹（唯）”字，其余两字只得缺释。这行的“从伐”一词当读“纵伐”。据李零对这个古代军事术语的研究，纵伐意为跟踪追击敌人。[11]这行和第 5 行“美”字（以前未隶定）的释文采纳了姚孝遂等人的建议。[12]研究者对这行倒数第 2 字读法不一，有旨、危、古三个建议。它由人（在上）和口（在下）两部分构成，许慎讲过这个字，据说是省略了声旁“辛”的信字。《说文·言部》：“信，诚也。从人言。㐰，古文信省。”1973 年陕西蓝田出土㝬叔鼎上也有这个字，尚志儒等正确地将其释作

“信”字。[13]那么这个有争议的甲骨文应隶定为“信”。信从“辛”得声，这个表示方国名称的“信”与“辛”是通假字，当指殷代方国中的辛国，也就是文献所谓“有莘氏”。

第2行：这行第5字旧释“而”，其实是“内”字。内即芮的本字，指文王受命元年断虞、芮之讼的芮国。金文芮国之名仍写作“内”，例如春秋内（芮）伯壶铭的“内”。其后一字旧释“千”。甲骨文千、人字形相仿，不过从小臣墙缴获战利品数量看，这场战争规模不大，姚孝遂等人将该字释“人”似乎更合理。[14]这行第10字和第5行同一字旧释“𨸏”，但原文实为“㟁”和“母”的合文。㟁也是殷代方国名称，也就是周原甲骨（H31：2）“唯内（芮）、鸡（奚）子来降”中奚子所在方国。[15]古文“女”或写作“母”。所以这个合文当释“㟁（奚）女”。

第3行：这行第1字（或释“丙”）和第4行第1字疑是数目字合文，可惜两处合文上半部分均残缺。从下半部分均为“六”字判断，这两个字可能都是“六十”的合文。这行的“唬”字旧释“盾”，但这个字和“柙”字读音相近，疑为甲胄之甲。据李零研究，甲骨文有时把甲胄的“甲”写作“𩰫”，指关押老虎的笼子，和古文中押人的牢笼“柙”字通假。[16]小臣墙刻辞用“唬”表示“柙”（即甲）或与此有关。

第4行：这行的“又”字和有、宥、侑等许多字通假。从上下文看，这里的“又”应是“侑”的通假字。董作宾将这行第3—4字连读，释作“白麟”。[17]他对第4字的隶定不能算错，这个字是个合文，胡厚宣释“文鹿”更确切。文鹿即纹鹿，指梅花鹿，文献或称“麟”。古代西北游牧人或以鹿为骑乘，故有“文马”之称。[18]这种被驯化为坐骑的鹿就是《史记·周本纪》所谓“骊戎之文马”。《国语·周语上》记载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所谓白鹿或指白马，所以这两个字不能读成白麟。古文伯、白通假，姚孝遂等人将这行下文的白字读作“伯”[19]是

正确的。这个释读给我们以启示。既然下文白是“伯”的通假字，前文的白也应释作“伯”，也即殷人对周边城邦或部落酋长的称谓。舍此，则不能通读这篇刻辞。

第4行第3字是隹、中两字的合文。殷周文字大量使用合文，读法一般从右至左。周初利簋铭中表示“武王”的合文就是左边为“王”，右边为“武”。这篇刻辞中大乙、祖丁和祖乙等合文的读法都是从右至左。古文隹和唯、帷、惟通假，从上下文看，这个合文中的“隹”字是“帷”的通假字，当读“帷中”。第四节将详细讨论这个字。

第5行倒数第3字旧释“甘”，但无论从字形还是从内容看，姚孝遂等人将该字释“曰”[20]是正确的。

据以上讨论，我们将小臣墙刻辞读作（方括号表示补字，圆括号表示前一字的释文）：

1. [隹（唯）□□，] 小臣墙从（纵）伐。禽（擒）：信（辛）美
2. 人廿又四，内（芮）人五百七十，溪（奚）女百
3. 六十，车二丙（辆）；唬（柙）百八十三，函五十，矢
4. 六十。又（侑）白（伯）文鹿于大（天）乙。用隹（帷）中，白（伯）㝵（服）
5. 溪（奚）女于祖乙，用美于祖丁。隹曰：“京！易（赐）
6. [女（汝）□冑。”]

这篇刻辞大意说：时唯……小臣墙跟踪追击，讨伐敌人。所获战利品计有：辛国美人24名，芮国人570名，奚国女子160名，车2辆，甲衣83副，箭囊50个，箭头60枚。殷王与众方伯刑杀纹鹿以祭天乙宗庙，在先王成汤面前共饮鹿血酒，歃血为盟。用帷中曲伴奏，众方伯或由奚国女子服侍，行御祭于祖乙宗

庙；或由辛国美人服侍，行御祭于祖丁宗庙。殷臣堡传旨曰："京人！殷王赏赐你们……头盔。"

甲骨学研究者都认为小臣墙刻辞应属殷墟甲骨分期的第5期帝乙帝辛时代。史载这个时期殷朝几度对西土用兵，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据昆夷，城朔方"；帝辛"四年，大蒐于黎"；"九年，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21]但文献没有关于殷王伐辛、芮、奚三国的任何记载。唯有《史记·周本纪》提到闳夭之徒四处征伐，求美人和珍奇怪物献纣王以解救西伯昌。文中说：

> "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弓矢斧钺。"

如果把司马迁讲述的这段殷史和小臣墙刻辞相比较不难发现，两者讲述的实为同一历史事件。刻辞的辛美人就是司马迁的"有莘氏美女"，刻辞的文鹿指司马迁的"骊戎之文马"。司马迁的"有熊九驷"是指九驾四马驱动的战车，刻辞的"车二辆"或在其中。刻辞最后称参加祭典的方伯为京人，这正是殷人对周人的称谓之一。周国地近戎狄，故周人有刑马歃血之"胡俗"。[22]殷王在宗庙与京方伯歃血为盟自然事出有因。究其背景，正是司马迁讲述的纣王得美人而赦西伯。

这段殷史见于许多文献，择要摘录于下：其一，《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其二，《逸周书·程典》："维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馀，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其三，《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23]

《礼记·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郑笺："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由于殷人称州长为伯，所以小臣墙刻辞称周国六州的州长为伯；从《程典》看，周人称州长为侯，而不是牧。纣王得美人赦西伯，事在纣王二十九年；赐西伯"弓矢斧钺"命其征伐，事在纣王三十三年。因此小臣墙刻辞中纣王给京方伯的赏赐不会是"弓矢斧钺"。周原卜辞（H11：174）提到："贞：王其师，用胄，唯乎胄，乎拜受，西不妥王。"据徐中舒考证，"此言文王在师中举行再旂大典，乎用殷王所颁赐之胄，而不再用西土原有的大旂"。[24]如果此说成立，纣王赦西伯昌时给周国六州方伯的赏赐可能是"胄"，也就是头盔。纣王所赐头盔数字不详，姑且将小臣墙刻辞第6行复原为"女（汝）□胄"。

如果小臣墙刻辞的京方伯指周人，小臣墙似为闳夭之徒一成员。关于闳夭之徒，《尚书·君奭》记载："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史记·周本纪》又载："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盖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论语·微子》说："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伯夷、叔齐是归降周人的燕京之戎，辛甲大夫是降周的殷臣，其余则是周国畿内姬姓族长或六州同姓或异姓方伯。小臣墙的"墙"是私名，由于史籍失载，我们还看不出小臣墙究竟是追随文王的上述名士显贵中的哪一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永山研究，殷王身边的小臣中有一类是殷国周边方国酋长之子，类似于汉唐宫廷中的外国质子侍中。《帝王世纪》记载："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25]故知文王之子也曾为质于殷宫，充任纣王的马车夫。[26]据《史记·管蔡世家》，伯邑是武王

兄长，被纣王残杀食肉，所以小臣墙不会是伯邑，但小臣墙有可能是为质于殷宫的周六州方伯之子。殷墟卜辞还有几处提到小臣墙。例如："小臣墙又来告"（《合集》27886）；"重小臣墙令，乎从（纵），王受（授）又（有）弓令"（《萃》1161）。看来周人用兵西土曾通过小臣墙请示过纣王，并得到纣王的箭令。

《今本竹书纪年》将纣王赦西伯系于帝辛二十九年，将武王克商系于帝辛五十二年。[29]学界对武王克商之年无定说，目前主要有公元前1028或前1066年两说。[30]根据这两个定年，小臣墙刻辞可能刻于公元前1051或前1089年。今详考小臣墙刻辞所述历史人物与事件于下。

二、京方伯与殷代周人之称谓

殷王称参加先王祭典的方伯为京人，一语道破天机，为我们研究小臣墙刻辞产生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第一条重要线索。关于古代君臣之间的称谓，《礼记·玉藻》曰："诸侯之于天子，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边邑，曰某屏之臣某。"《礼记·曲礼》又曰："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国曰某人。"既然殷王称参加祭典的众方伯为京人，他们应是来自京地的方伯。

如所周知，京是周人祖先公刘在豳国营建的都邑，金文和文献有时称此地为"京师"。《诗经·大雅·公刘》记曰：

>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岗，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夹其皇涧，遡其过涧。"

京师其名亦见厉王年间所铸多友鼎。其铭曰："严（玁）狁放（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武公命多友衔（率）广公车，羞追于京师。癸未，戎伐筍，衣孚（俘），多友西追。甲申之脣（晨），博于龢……或博

于龚。”正如李学勤指出的，多友鼎铭的京师就是周人祖先公刘所建豳国京邑。他还推测“京师正和彬县东北泾水东岸一带的地望相符”。[29]这个基于考古发现得到的新认识订正了近人钱穆等将豳地置于山西汾河[30]之误。汉唐文献多次提到豳地在今陕西彬县和旬邑县之间，但这毕竟只是汉唐流行的一种传说，我们在先秦文献和金文中找不到什么根据支持其说。

多友鼎铭的重要价值在于披露了京师以西地区许多金文地名，因而为研究豳国地望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据多友鼎铭的记述，猃狁从西方向京师发动进攻，兵临“王”地。武公派多友在京师集结军队。这时猃狁攻陷“筍”地，俘虏了当地一些居民。多友从京师向西进兵，迎击筍地来犯的猃狁。周师与猃狁先“博于郛”，然后周师继续西追，又与猃狁“博于龚”。正如李学勤指出的，京师就是豳国都城京邑，龚地则指《诗经·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的“共”，其地或在泾州共池附近。据宁夏史地研究者近年调查资料，泾州共池即今宁夏固原县城北2.5公里龙泉池，今称“北海子”。[31]那么京师与龚池间自东而西五个金文地名是京师、王、郛、筍、龚，讨论于下：

1986年甘肃崇信县汭水北岸于家湾村发现商末周初墓葬群。其中3号墓所出青铜戈上铸有铭文“黄”字。[32]王、黄两音相近，多友鼎铭“告追于王”的“王”似指铸造此戈的黄国。据《史记·秦本纪》，秦人“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文末又引“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黄氏”。所以黄国很可能是随中潏保西垂的嬴姓黄氏部落。于家湾所在汭水流域是文王受命元年断虞、芮之讼的芮国所在地（详下节），那么黄国应是芮国附近另一方国。于家湾3号墓的墓主人为女性，这件铸有黄字的兵器可能是女方从黄国带来的陪嫁，或其他什么原因从黄国流入芮国的。芮水在甘肃泾川县

注入泾水，黄国或许在泾川县汭、泾合流之地以东某地。

多友西追猃狁“博于鄀”的“鄀”位于王（黄）国以西某地，显然与陕西武功县的漆水无关。多友鼎铭的“鄀”字从“阜”，是个山名。鄀、鸡读音相近，这座位于甘肃泾川县以西的鄀山疑即先秦名山鸡山。《山海经·南山经》曰：“又东五百里，曰鸡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曰：“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史记正义》按：“原州平高县西百里亦有笄头山，在京西北八百里，黄帝鸡山之所。”《汉书·地理志》载：“泾阳，开（笄）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东南至阳陵入渭，过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那么古史传说中的鸡山就是秦汉的鸡（笄）头山。据宁夏史地研究者近年调查资料，古鸡山应是宁夏泾源县六盘山一支脉，因山峰形似鸡冠，故名鸡山。[59]如果多友鼎铭的“王”地在今甘肃泾川县，其西偏北正是宁夏泾源县的鸡山，所以多友与猃狁博战的鄀山必指鸡山无疑。

多友在鄀山击败猃狁，救出猃狁在筍地劫掠的俘虏，可推知筍地当在王地和鸡山之间，也就是今天宁夏泾源县与甘肃平凉之间某地，不会是以前认为的在今陕西旬邑县。从多友西追猃狁路线看，京师与黄国（今甘肃泾川县）相邻。黄、皇两音亦相近，疑指一地，大概就是《大雅·公刘》“于豳斯馆……夹其皇涧，遡其过涧”的皇涧所在地。《汉书·地理志》记安定郡有“阴槃、安武，莽曰安桓”。桓、黄两音相近，而阴槃的“槃”实为“豳”的遗音。故疑黄国在汉代安桓县，而豳国在汉代安桓县附近的阴槃县。

《元和郡县图志》泾州记载：“潘原县，中，东至州一百里。本汉阴槃县，属安定郡，在今邠州宜禄县西二十三里阴槃故城是也。地有阴槃驿。”同书邠州宜禄县又载：“阴槃城在县西北二十五里……长武城在县西五十里，隋开皇中筑在泾河南岸。”据此，

汉代阴槃就是唐代潘原，其地在唐代宜禄县西北11.5或12.5公里处。隋唐长武县在今陕西长武县附近，而克博钟铭又载："王亲令克遹泾东，至于京师。"[34]以上材料不断提醒我们注意，豳国及其都邑京师就在今陕西长武县与甘肃宁县交界的泾水东岸一带。考古工作者曾在长武县冉店乡碾子坡和下孟村调查发掘，据说发现了相当于周人居豳时代的遗物。[35]70年代长武县丁家乡刘主河村发现过一组青铜器，其中有带"天"字铭文的铜簋、方鼎和环首刀各一件。[36]据邹衡分析，这组铜器的年代约为西周初期。[37]这个年代非常接近文王时代。凡此都为寻找京邑故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有商一代昆夷、犬戎几度逐鹿京师，甚至岐山周原，豳地不独为周人所有。因而有必要将周戎双方对豳地的争夺梳理清楚。《左传·昭公九年》引周景王之言："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后稷时代周人地盘没有景王说的那么大。《后汉书·西羌传》说，夏末"畎夷入居邠（豳）、岐之间"，殷墟卜辞提到："丙戌卜，贞：令犬延于京"（《合集》4630）；"贞：勿令犬延于京"（《合集》40075）。犬延就是夏末占据豳、岐之地的畎夷，或称犬戎。这时后稷恐怕只有漆水骀国（今陕西武功县）[38]一席之地。

后稷曾孙公刘始居豳地，并营建都城京邑。豳国在文献中称作"豳"或"邠"，但殷墟卜辞似乎不称豳国为"豳"，总是根据豳国都邑之名称其为"京"。

殷墟卜辞提到京地有泉水，"于京其奠泉若"（《合集》32010）；"己巳贞：泉若其奠京"（《屯南》1111）。[39]这和《公刘》所说"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岗，乃觐于京"的京邑地望相符。殷墟卜辞提到"京受黍年"（《合集》9980）；"王令裒田于京，于龙裒田"（《合集》33209）。据张政烺考证，甲骨文的裒田就是垦田开荒。[40]龙、陇音相同，这条刻辞的龙或指京地附近陇

山地区另一个农垦区。看来京师到陇山一带曾是殷朝西土重要的农垦区。殷王还派豳国附近方国帮助京人“裒田”。其中有芮、庸、毕，讨论于下：

其一，“癸丑卜，王令内（芮）田于京”（《屯南》232）。内即芮的本字，指芮国，在今甘肃崇信县汭水流域。

其二，“癸卯卜，宁贞：令墉系在京奠。/……勿［令墉系］在京奠”（《合集》6）。《尚书·牧誓》记周之西土八国中有庸国。这条卜辞所记在京地举行祭典的墉人似来自庸国。

其三，“癸卯［卜］：宁贞：毕裒田于京”（《合集》9473）；“□卯贞：王令毕田于京”（《合集》33220）。《逸周书·史记解》云：“昔有毕程氏，损禄增爵，群臣貌匿，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卜辞的毕似指文献的毕程氏。《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毕国，在长安县西北”。

武丁卜辞提到周或周方。例如：“令多子族从（或暨）犬侯璞周载王事”（《合集》6812和6874）。这里提到的古周国疑为夏末商初“居邠（豳）、岐之间”的畎夷的一支，似与姬周无关。《竹书纪年》记载，殷王武乙“元年壬寅，王即位，居殷。邠迁于岐周”；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41]《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注：“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换言之，周人祖先自京迁周后才有“周人”之称。[42]而公刘迁豳至武乙年间周人只称京人。

文献记载周人祖先自京迁周的原因是“薰育戎狄攻之”[43]。周人祖先迁周的同时，豳国复为犬戎占据并以此为基地多次侵扰岐周。这在殷墟卜辞中也有反映。例如：“串弗灾周？十二月”（《合集》6825）；“丁巳［卜］，贞：贯其灾雀（雍）……五月”（《合集》6791）；“庚子卜，［贞］：贯弗［灾］雀（雍）”（《合集》6972）。正如陈梦家所考，“《尔雅·释诂》贯、串并训习，所以串可能是《诗·皇矣》‘串夷载路’之串夷。”[44]串（贯）夷在文献中

或称“混夷”、“昆夷”，都是犬戎的别称。雍指《禹贡》的九州之一雍州，在今陕甘宁交界地带。

此后犬戎占据豳地达30余年（武乙元年至三十五年）。武乙末文丁初，周王季发动收复西土失地的战争。《周易·未济》九四记载：“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45]《今本竹书纪年》详述此事：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文丁“二年，周公季历伐燕京之戎，败绩”；“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殷牧师”。[46]武乙三十五年（即文丁元年）至文丁四年，恰为三年。所以《周易·未济》说“震，用伐鬼方，三年”，当指周王季历讨伐鬼方、燕京之戎和余无之戎，下文“有赏于大国”则指周王季受到大国殷朝的赏赐。

据以上调查，豳地本为犬戎居地。周人祖先公刘迁豳约在商代初年。公刘第五代孙高圉被殷王封为邠侯。殷墟卜辞根据豳国都邑名称其为京地。卜辞记载殷王不断派京地周边方国帮助京人垦田。殷王武乙元年犬戎南侵，京人被迫自京迁周，始有周人之称。此后30年豳地一直为犬戎占据。武乙末文丁初周王季历对鬼方等游牧部落发动长达三年的战争，这才收复包括豳地在内的西土失地。目前甲骨学家一致认为小臣墙刻辞的年代在帝乙帝辛年间，这时豳地京邑已在周人控制之下，因此小臣墙刻辞所说京人不会指一度占据京邑的犬戎。

自京人迁都岐周后，殷人对周人实际上有两种称谓：其一，根据他们的旧都京邑之名，称其为京人；其二，根据他们的新都周原之名，称其为周人。这两个称谓在周人文学作品中亦同时并存。例如：《诗经·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又如：《诗经·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将于京。”《诗经·国风·下泉》：“念彼周、京。”《诗经·大雅·思齐》：“思媚周姜，京室之妇。”这四首诗中的“周”指周人新都岐周，“京”

则指周人故都京邑。《诗经·大雅·下武》又曰："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周昭王年间所铸作册令方尊铭曰："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唐兰注曰："京宫者，太王、王季、文、武、成王之宫也。"因而推定"周之旧名为京"。[47]既然文王时代京邑未废，仍有宫殿在此，小臣墙刻辞所记京方伯必指周方伯无疑。

三、周戎之战的古战场

小臣墙刻辞所记周戎之战的古战场在何地？这是揭开小臣墙刻辞所述历史之谜又一个关键问题。小臣墙所掠战俘来自辛、芮、奚三国。如果能确定三国所在地，则不难找到周戎交战的古战场。

周戎之战的第一个战役在芮国。据周原甲骨（H31：2）记载，文王时代"唯内（旧释"衣"）、鸡（奚）子来降"。[48]内子即芮子，来自小臣墙刻辞提到的内（芮）国。1984年陕西武功县苏坊乡任北村西周晚期墓葬所出内（芮）叔压父簋似属文王年间降周的芮子后裔。[49]史载文王受命元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犬戎，三年伐密须。那么芮子降周似在小臣墙伐芮（帝辛29年）至文王受命元年（帝辛33年）之间。

关于芮国的地望，《左传·昭公九年》孔颖达疏曰："芮，冯翔临晋县芮乡是也。"但无论文献还是金文都表明，芮国不会在陕西凤（冯）翔县。《周礼·夏官·职方氏》曰："正西曰雍州……其川泾、汭。"郑笺："汭，在豳地。"《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汧县记载："汧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东入泾。《诗》芮陇，雍州川也。"汉代汧县即今陕西陇县，芮水即流经甘肃崇信的汭水。汭水东北流，注入泾水，泾水东流，流经豳国所在地长武县。所以郑玄说"汭"在豳地。史载文王受命元年断虞、芮之

讼，虞国必与芮国相邻。虞字古文或作“吴”，也即金文的“夨”。[50]据卢连成等人调查，夨国铜器出自汧水流域陇县、千阳和宝鸡一带，虞国当在这一范围内。而金文夨国东南为修鱼国[51]所在地，这样芮国只能在虞国西境今陕西陇县西北，这和文献说芮水及芮国在今甘肃东境汭水流域完全一致。那么周戎之战第一个战役的古战场就在今甘肃东境汭水流域。

周戎战争的第二个战役在奚国。陕西宝鸡益门村墓地4号墓出有奚国铜器奚父乙壶，[52]此人大概是周原甲骨（H31：2）所说文王年间与芮子结伴降周的奚子的后裔。殷墟卜辞多次提到奚国和邻邦服方。例如：“癸丑卜，亘贞：王从奚伐𠬝（服）方”（《合集》811）；“癸丑卜，亘贞：王从（纵）奚伐𠬝（服）[方]”（《合集》6477）。武丁卜辞还提到王妃妇好率领殷师讨伐𠬝（服）方（《合集》6479和6480）。[53]

卜辞的服方在厉王十七年所铸询簋铭中称“服夷”。服夷就是汉代的抚夷。其地当在《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抚夷县，王莽时抚夷改称“抚宁”。古音l/n不分，所以抚宁就是居延汉简提到的安定郡的平林。据居延汉简，平林在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南80里以及泾阳县（今甘肃平凉西北）北60里。[54]据此，汉代抚宁或平林在今宁夏泾源县北瓦亭乡。此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代雄关萧关亦在此地。

70年代甘肃灵台白草坡曾发现西周初年䢅伯墓。[55]小臣墙刻辞提到的奚女当来自䢅伯所统部落。不过周初䢅伯墓所在地灵台并非殷代奚国所在地。灵台白草坡1号墓出有“泾伯作宝尊彝”青铜礼器。简报释泾伯为“潶伯”有误，其名当从李学勤释“泾伯”。[56]灵台白草坡在泾水流域，应是泾国所在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丰镐，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所以灵台白草坡的䢅伯可能是武王年间才从奚国迁到泾水流域的。此前奚人在何处游牧呢？小臣

墙刻辞中“溪”的偏旁从阜，故溪国当得名于溪山。前引周原甲骨称奚子为“鸡子”，以此推测溪山当指先秦名山鸡山，也就是多友鼎提到的“鄠山”。据前文讨论，鸡山是宁夏泾源县六盘山一支脉。那么殷墟卜辞“王从（纵）奚伐𠬝（服）方”的作战路线是：殷师跟踪追击敌军至奚国所在地鸡山（今宁夏泾源县北），然后北伐服方（今宁夏泾源县北瓦亭）。由此可见，周戎战争第二个古战场在今宁夏泾源县六盘山支脉鸡山附近。

周戎之战的第三个战役在辛国，《史记·周本纪》称其为“有莘氏”。据《诗经》和《楚辞》记载，殷代有两个莘国，一在今山东曹县北，成汤之妃即娶自山东的有莘之家；另一莘国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文王之妃则娶自陕西莘国。小臣墙刻辞提到的莘国与这两个莘国均无关。小臣墙伐奚在今宁夏泾源县鸡山，伐芮在今甘肃崇信县汭水流域。由此推测，小臣墙讨伐的辛国必距奚、芮两国不远。殷墟卜辞有“信（旧释“旨”）获羌”（《合集》39492），此信国当即辛国。这表明殷之西土还有一个与西羌为邻的莘国。

地处西方的这个辛国大概是文献所谓“高辛氏”。《左传·昭公元年》引郑子产的话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古唐国在今山西太原附近。邹衡最近对太原考古文化作了如下分析，他说：“1949 年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在太原市附近作过不少考古调查或发掘，至今没有找到大片西周遗址，虽偶亦发现相当于西周时期的瓦片，但其作风与西周晋物迥异，显然属于其他文化系统。据此可以推测当时居住在太原地区的人们，甚至可能不属于中原的华民。”[57]邹先生此前曾把分布于晋西北非华夏系统的文化定名为“光社文化”。[58]

山西石楼褚家峪晚商时期光社文化墓葬中发现过一件带铭文的有銎戈，其上有个不识之字。[59]李学勤介绍说，“这个字见于殷墟甲骨，怎么念，大家可以研究。它既有时代性，又有历史意义。这种戈在殷墟出土过，一件出于西北冈1001大墓殉葬坑6，一件出于小屯E16坑，同时又出于西北冈1004大墓。1001大墓很多人认为是武丁的墓”。[60]如果将这个字和修鱼国墓地所出铜器铭文的辛字相比较，仅缺辛字上面的一点。[61]这种缺笔字亦见于中原铸造的青铜器铭文。那么这件铜戈上的不识之字可能是高辛氏的“辛”字。单凭一件铜戈自然难以确定光社文化就是高辛氏考古文化，但它无疑有助于说明高辛氏部落曾在石楼至太原一带活动。

《国语·晋语》说：“实沈之墟，晋人是居。”实沈就是高辛氏第二个分支实沉氏。这个记载提醒我们注意，殷商时代活动于石楼至太原一带的游牧人应是实沉氏部落。不过它在周初分封以前就从山西太原迁走了。文献对高辛氏迁徙的下一个地点亦有所述。《管子·小匡》记齐师“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枕”。齐师渡黄河后所至“石枕”就是实沉。由此推测，早在周初分封前实沉氏就从晋西北迁到了鄂尔多斯以西某地。

既然殷墟卜辞提到辛国与西羌为邻，它可能是郑子产所说高辛氏另一支系阏伯氏。《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有文马，缟身朱鬣。”郭璞注：“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62]犬封即犬方，就是文献所谓犬戎。尽管上述记载颇具神话色彩，但高辛氏与犬戎相互通婚，辛国出美女大概都是史实。那么地处西方的辛国不仅和西羌为邻，亦与犬戎为邻。《绎史》卷10引《六韬》载：“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与散宜生

以金千镒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马。”《淮南子·道应篇》亦载：“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物，得驺虞、鸡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贝百朋，玄豹黄罴，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献于纣。”据此，小臣墙刻辞“车二辆”或指散宜生在犬戎寻得的这两辆名曰“驺虞”和“鸡斯”的车舆。

文献将高辛氏的历史一直追溯到传说时代，《潜夫论·五德志》记载：“后嚳帝喾，代颛顼氏，其相戴干，其号高辛。”《史记·五帝本纪》曰：“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于颛顼为族子。”《史记集解》曰：“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史记索隐》引宋衷曰“：高辛，地名。”尽管注家一再强调高辛为地名，但《山海经》等先秦古地志从未明确提到有“高辛”这样一个地名。近来研究小臣墙刻辞才醒悟，注家说高辛是地名，显然指汉代安定郡的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县）。高平县的“高”典出《小雅·六月》所说猃狁“侵镐及方，至于泾阳”之“镐”，肇源于高辛国之“高”。唐兰先生曾指出，《六月》“侵镐及方”的“方”就是周人故土豳国之“豳”，[63]只是未考豳地于今何地。据前文讨论，古豳国在汉代安定郡阴槃县，今陕西长武县附近。豳地因在岐周之北，故《诗经》有时称其为“朔方”。

高平县是汉代安定郡的郡治，与朝那县为邻。《汉书·地理志》安定郡记载：“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史记·封禅书》亦载：“湫渊，祠朝那。”端旬即高辛氏祖先颛顼，端旬祠实乃高辛国宗庙，那么高辛国就在汉代湫渊附近。《水经注》卷3高平川水记：“水发源县（今宁夏固原）西南二十六里湫渊。渊在四山中。湫水北流，西北出长城北，与次水合。”据此，湫渊在今宁夏固原县开城乡南清水河上游源头。另据宁夏史地研究者近年调查资料，清水河源头在宁夏固原西南13公里，此地有一湖泊名曰“西海子”。[64]辛国及其宗庙或在此西

海子附近。

湫渊祠有胡巫祝，疑为犬戎宗庙。《穆天子传》卷1称犬戎为“犬戎胡”；周原甲骨（H11：232）的“其于伐獸（胡）侯”指文王受命二年伐犬戎，亦称犬戎为胡。高辛和犬戎相互通婚，属于同一部落联盟。文献之所以很少提到高辛国，大概将其包括在频频出现的犬戎中了。所以端旬和湫渊两祠也可能是高辛和犬戎共同的宗庙。

1979年宁夏固原县东南25公里古城乡（今属彭阳县）黑土梁发现一个汉初铜鼎，鼎身刻有三段铭文：“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今二斗一升，乌氏。/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报道者推测，此鼎为汉高祖五年标准量器，“原置于朝那使用，后移于乌氏”。[65]然而近年新发现的居延汉简记载，汉代乌氏县在今甘肃崇信县汭水流域，[66]《元和郡县图志》卷3原州亦载：“百泉县，上，西至州九十里。本汉朝县地，故城在今县理西四十五里。”百泉县在今甘肃镇原县，原州州治在今宁夏固原县。所以古城乡所出汉鼎显然原来置乌氏县，后来才移到朝那作为标准量器使用。此鼎发现地点古城乡无疑即鼎铭提到的朝那县所在地。

其实先秦文献也透露过犬戎居朝那。《穆天子传》卷1记载：“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當水之阳。”据现代地图，宁夏彭阳县境内有一自西东流的河水，属泾水上游一支流，可称泾水。朝那故地古城乡位于此水北岸，《诗经·小雅·六月》所说猃狁“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的“泾阳”似指此地。《穆天子传》说犬戎胡所居“當水”显然因与“嘗水”字形相近而讹。嘗水之“嘗”即“朝那”的合音。所以殷周之际犬戎活动中心就在汉代朝那，今宁夏彭阳县古城乡。

据以上调查，殷末这场周戎之战爆发于陕甘宁交界地带（参见地图1，卷首），周师可能先在旧都京师集结的军队，然后攻

打甘肃东境汭水流域的芮国，接着进兵宁夏泾原县鸡山附近的奚国，最后用兵宁夏固原县开城乡西海子附近的高辛国。殷末这场周戎之战规模不大，周、芮之战斩获稍多，送到殷都大邑商的芮国战俘共有570人。不过这个战俘数字和康王二十五年小盂鼎铭所记周人对鬼方用兵“获馘四千八百又十二馘，孚（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周师与奚、辛两国之战规模更小，仅获124名女俘。凡此表明，周人这次用兵西方的目的不是征服，而在于劫掠美女及其珍奇方物作为觐献纣王的贡品，以解救囚禁在羑里的西伯昌。

四、殷代之飨礼

三代礼仪种类繁多，涉及吉、凶、宾、军、嘉五类，或称“五礼”。《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飨、燕分别指殷代飨礼和周代燕礼，就是皇家外交酒会。这类酒会源于古代祭祖活动，故在宗庙举行。后世文献所谓“侑享”、“侑飨”和“侑食”等都从这类以祭祖为名的酒会发展而来。燕礼在《仪礼》一书中仍有完备的记载。飨礼或称“食礼”，尽管它在《诗经》、《周礼》、《左传》和《礼记》中经常提到，但实施细节久已失传。

小臣墙刻辞的重要价值在于对久已失传的殷代飨礼作了现场实录。我们对殷王这次祭祖活动属于飨礼的认识首先来自对“又”字的认识。古文又、侑两字通假。《诗经·小雅·楚茨》曰：“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毛传》：“侑，劝也。”这里的“劝”指劝酒。所以小臣墙刻辞所述实际是殷王以祭祖为名举行的一次皇家外交酒会。

如果把小臣墙刻辞所见殷代飨礼和周代燕礼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周代的皇家酒会几乎完全模仿殷王室酒会。《仪礼·燕礼》

曰："燕朝服于寝，其牲，狗也。享于门外东方。若与四方之宾燕，则公迎之于大门内……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遂合乡乐，若舞则勺……有房中之乐。"今依内容先后，讨论飨礼和燕礼异同于下：

关于举行燕礼的地点，《仪礼·燕礼》又载："膳宰具官选于寝东。"郑玄注："寝，路寝。"路寝即正寝。《尔雅·释宫》曰："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可知路寝就是祖先宗庙。小臣墙刻辞所记殷王以祭祖为名的皇家酒会正是在殷先王三个宗庙联合举行的。

燕礼一般以三牲（羊、牛和豕）为杀牲对象。《诗经·小雅·楚茨》记燕礼用牲对象有牛和羊。殷墟卜辞曾见"侑于祖乙十羌有五"（《续》1. 12. 8）；"侑于祖乙十白豚"（《前》7. 29. 2），用牲对象分别为15头羊和10头白猪。小臣墙刻辞所述天乙宗庙用牲对象非同寻常，乃奇兽文鹿。祭祀方式大概是殷王与京方伯共饮鹿血酒，在天乙庙面对殷朝开国皇帝成汤，歃血为盟。《诗经·大雅·皇矣》的"是类是祃"即指此类宗教仪式。《汉书·匈奴传》记载："（韩）昌、（张）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歃血为盟。"由此可见，刑马祭天的宗教本非中原习俗，周人地近戎狄因而有此胡俗。

《仪礼·燕礼》记载："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遂合乡乐，若舞则勺。"这说明燕礼有乐歌和勺舞助兴。周人祭祖的乐歌很多，《诗经·小雅·楚茨》就是周人行燕礼用的一首乐歌。据王国维考证，勺舞和象舞属于小型舞蹈，使用的乐器为管笙之类，与使用钟磬的大型舞蹈大武和大夏不同。[67]殷代飨礼也应有舞蹈和音乐，小臣墙刻辞言简意赅，未提此事。不过殷墟卜辞保存了零星记录。例如："……信（辛）伯美于之及［伐］望"（《合集》28091）；"徲取美御事于之及伐望，王受又（有）。惟

用，大吉”（《合集》28099正）。第二条卜辞大意说：是否请辛国美人来宫中表演“伐”舞？纣王能享受这个福份吗？神启示说：尽情享受，万事大吉。

学界对殷墟卜辞的“伐”字颇多争议。1932年吴其昌撰《殷代人祭考》，他援引三条殷人祭祀材料均以“伐人”和“卯牢”对举，而卯牢意为杀牲。所以他认为：“则伐人之为杀人，意义了然矣。”此后凡带有“伐”字的殷墟卜辞常被引作殷代奴隶社会人牲的证据。殷代确有人殉或人牲并为殷墟考古发掘出来的祭祀坑所证明。但是殷墟卜辞所述“伐人”或“伐羌”规模之大，往往多达三五百人。中国至殷代已经有近千年的文明史，仍然进行如此落后的血腥屠杀是难以想象的。因此许多研究者不赞同将殷墟卜辞的“伐”一概解释为人殉或人牲。

日本甲骨学家岛邦男将卜辞的伐字解释为执戈舞蹈，指文献所说“武舞”或“干舞”等宗教舞蹈。[68]《礼记·乐记》曰：“夹振之而驷伐。”注云：“一击一刺为伐。”《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大乐之野，夏后氏于此舞，九伐。”凡此表明，卜辞的“伐”实乃古代乐舞名称。《礼记·乐记》说：“钟磬竽瑟以合之，干戚旄尾以舞之，此可以祭先王之庙也。”这条记载恰可为殷先王宗庙举行的“伐”舞作注。

三代宫廷的宗教舞蹈都是男性舞蹈。殷墟卜辞所见舞蹈者往往是“伐”、“羌”（《合集》313）或“仆”（《前》7. 9. 2和《京》1255），伐、羌和仆三字均从“人”，也即男人。这个现象说明古代舞蹈表演者皆为男性。古代中原女子不能登大雅之堂。三代宫廷召开各种酒会，举办各类宗教庆典从不用女乐助兴。近年陕西宝鸡殷周修鱼国墓地发掘出一个女乐铜像，[69]修鱼国用女乐显然受胡俗影响。纣王可能是将女乐引入中原宫廷的第一位帝王。帝辛卜辞曰：“丙……苜用臤（指女奴）无（舞）于父乙”（《合集》795）。父乙即纣王之父帝乙宗庙。纣王对宫廷乐舞的这

项“改革”遭到举国上下强烈反对，并随殷朝灭亡而禁断。女乐再次进入中国宫廷时已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交，[70]而中原考古资料中出现女乐场面的文物最早在战国时期。[71]

据《仪礼·燕礼》记载，燕礼最后以“房中之乐”结束，小臣墙刻辞记飨礼则以“用帷中，伯服隊女于祖乙，用美于祖丁”结束。《周礼·天官·幕人》曰：“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郑玄注：“帷、幕皆以布为之。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帷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曰：“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显然“帷中”本指殷王后宫。而小臣墙刻辞的“帷中”似指一种乐曲，相当于《仪礼·燕礼》的“房中之乐”[72]。《仪礼·燕礼》对什么是房中乐略有所述。文中说：“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郑玄注：“周南、召南，国风篇也。王后、国君、夫人房中之乐也。”由此可知，房中之乐就是收入《诗经·国风》中的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和采蘋等六首诗歌。审其内容，无一例外全采自民间情歌。小臣墙刻辞的帷中曲大概是对后宫演唱的乡间情歌的泛称，不一定是曲名。

殷末帝宫演奏的帷中曲究竟指什么乐曲呢？《逸周书·泰誓》记载：“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说妇人。”殷人先祖之乐就是成汤的大臣伊尹所作《大濩》[73]，淫声似指小臣墙刻辞提到的帷中曲。《史记·殷本纪》称之为“新淫声”。文中说：“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靡靡大概是师涓所作“新淫声”的曲名。既然是新淫声，殷末后宫流行的此类乐曲当不只一首，可能在纣王以前就流行于殷都后宫。靡靡之音似乎没有随殷朝灭亡而销声匿迹，一直在世上流行。战国末年韩非子也听过靡靡之音。他评价说：“此师延（涓）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先闻者，其国必削。”[74]靡靡之音竟被一代哲人评

述为亡国之乐。

殷代飨礼如何结束，文献失载。小臣墙刻辞对这个宗教仪式的结束方式作了现场实录。其辞曰："伯服㵒女于祖乙，用美于祖丁。"这个礼仪应即卜辞中所称"御祭"。御祭是殷墟卜辞常见的一种宗教仪式，一般在先王或先妣宗庙举行。1974年胡厚宣撰文罗列殷墟卜辞中御祭对象，计有母（女）、妾、羌、姬、婢等。总之，御祭对象均为女性。[75]随后姚孝遂撰文讨论殷墟卜辞俘虏名称羌、大、亘、夷等凡30种。他以为"所有这些俘虏都曾当作祭祀的牺牲而加以杀戮过，无一例外"。[76]殷墟发现的人牲祭祀坑足以证明殷代曾用俘虏作人牲，但殷王所行御祭是否"无一例外"都是血腥屠杀？恐怕未必都如此。应该注意到，殷王御祭的对象有时是王妃。武丁卜辞："己卯卜，㱿贞：御妇好于父乙，篮羊牛豕，册十牢。贞：勿册"（《乙》1033）；"……贞：御子央豕于娥"（《合集》3006）。妇好是武丁时代的名妃，子央豕则为子姓女子，可见殷王室有同姓相婚的陋习。[77]这两个御祭实例都以王妃为对象，可见将御祭一概解释为人牲显然不行。

由于不能解释对王妃所行御祭，有学者认为，王妃之御祭或指"攘疾之祭"或"祈祭"。但小臣墙刻辞明载"伯服㵒女于祖乙，用美于祖丁"。《荀子·礼论》曰："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之。"杨倞注："御，进用也。"因此，御妇、服㵒和用美无疑具有同样的含义。殷王和周方伯自然不会在先王宗庙中为刚刚掠夺来的女俘求神祛病。御祭究竟指什么，需要重新研究。

古代战争处置俘虏最原始的方式是"男为人臣，女为人妾"[78]，中外皆如此。从小臣墙刻辞看，殷王这次祭祖活动，先饮鹿血酒，接着演奏帷中曲，然后由异族女俘服侍行御祭。所以殷代飨礼最后结束仪式显然就是古代战争处理女俘的那种最原始的方式。古文"㱿"是报、服两字的本字。《说文》报字："报，服罪也。"但这仅是"报"字的一层含义，它的另一层含义见于

许多文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臧。"刘孝标《辩命论》李善注引《小雅》曰："上淫曰烝，下淫曰报。"《新唐书·突厥传上》载："帝女之号，与胡温并御；烝母报子，从其污俗。"殷墟卜辞："戊辰卜：又（侑）𠬝（服）匕己一女，匕庚一女"（《粹》720）；又有："侑𠬝（服）女一于母丙"（《丙》512）。这两条卜辞显然指殷王强暴女奴以祭祀先妣宗庙的宗教仪式。正因为如此，殷墟卜辞中"𠬝"字作名词时或指殷王的性奴隶女奴。[78]

自古无帝不荒淫，殷王后宫的夜生活不可能在殷墟卜辞中丝毫没有反映。若把殷墟卜辞的御祭都解释为人牲，将使殷代战争如何处置女俘以及殷王后宫的夜生活永远隐秘在历史迷雾之中。本文无意说殷代御祭全是描写殷王后宫的夜生活，但殷墟卜辞御祭辞例中确有用杀殉或祈神祛病所不能解释的辞例，它们应是殷代强暴女俘或女奴以祭祀祖先宗庙的原始宗教仪式。

飨礼的御祭仪式不见于燕礼。据《仪礼·燕礼》，周代燕礼最后仅以演奏轻音乐"房中之乐"结束。这个变化或说明社会在进步，殷代帝王以强暴女奴祭祖的陋习大概在周代被革除。

五、西域胡风初染中原及其帝宫

殷臣师涓曾为纣王编排过一套舞蹈，名曰"北里之舞"。据《史记·殷本记》介绍，纣王荒淫无度，"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80]如果这就是北里之舞，它实际是一种裸体舞蹈。殷墟卜辞透露，此类裸体舞蹈可能由男女奴隶来表演。例如："贞：今庚辰夕用𩰫（献）小臣卅，小妾卅于帝。九月"（《合集》629）；"癸酉卜，贞：多妣𩰫（献）小臣卅，小妾卅于帝"（《合集》630）。小臣指男仆，小妾指女奴。中国传统观念是男女授受不亲，殷王这项活动同时使用男仆和女奴

各30人，疑与司马迁所说“男女裸，相逐其间”的北里之舞有关。

中国乃礼仪之邦，纣王年间突然出现于殿宫的男女相逐的裸体舞蹈似非中原固有文化。北周宫廷曾流行一种裸体舞蹈。《周书·宣帝纪》记载：“甲子，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乐。”关于胡人乞寒，《唐会要》卷30《论乐》引张说疏云：“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褒比优。恐非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道。愿择言，特罢此戏。”由此可知，胡人乞寒是西域胡人的一种裸体宗教舞蹈。据《旧唐书·康国传》，这种裸体舞蹈盛行于中亚粟特。粟特人“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向达起初怀疑泼胡乞寒戏是唐代从中亚粟特传入长安城的。[80]后经韩儒林指出，早在北周胡人乞寒已经传入中原，今天流行于我国傣族地区的泼水节亦源于泼胡乞寒。他还认为这种裸体舞蹈的起源地亦不在粟特，而在波斯。[81]法国伊朗学家华尔（C. Huart）曾详考这种宗教舞蹈之来龙去脉。他在《古代波斯及伊朗文明》（1925年）一书中这样写道：“俾路斯在位25年，他的统治是很不幸的。为了战胜长期干旱之后的饥馑，下令向外国购买食物，减轻赋税，强迫富户分其储粮给予贫民。所谓泼水节即为纪念甘雨解除了灾难性的干旱而创立的。”他还写道：“巴赫曼的第三日，在伊斯法罕庆祝泼水节（波斯文ab-riz）。在别的城市，开始落雨之日，庆祝这个节日……人们把这个节日的起源归诸库萨和一世的祖父俾路斯。他在位时大旱无雨，波斯遭受干旱的苦难。国王免除国人多年赋税，打开国家粮仓，卖掉祆神庙的财产筹措银钱。最后亲到法尔斯的阿达尔忽拉山顶，祈祷神祇结束这场灾难。他的祈祷被神接受了。他刚刚到达这个地区的旷野，天际升起乌云，倾盆大雨下起来了。为了感谢神恩，俾路斯在这个地方建起一个村庄，名其

村曰 Kām Pērōz，意即‘俾路斯的愿望’。由于狂喜，人们用水互相泼洒，这个高兴的轻率活动成了泼水节节日具有特征的仪式。”[82]既然向祆神祈雨的泼水节具有宗教意义，胡人乞寒应为祆教舞蹈。这种祆教舞蹈显然源于年代更早的原始印欧人的宗教舞蹈。殷末帝官突然流行的这种裸体舞蹈和波斯祆教舞蹈自然不会有什么联系，但它有可能与古代印欧人用于祈雨的原始宗教舞蹈有关。近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深山一处崖壁上发现表现裸体舞蹈的大幅古代岩画。有学者将其解释为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宗教仪式。但我们怀疑这个古代宗教仪式或许和古代印欧人祈雨的宗教活动有关。[83]其中一幅岩画上有祭祀双马神的图案，类似的双马神见于商代铜器铭文。双马神是雅利安人崇祀的重要神祇，可见胡人宗教可能在商代已传入中原（参见插图2）。[84]

除北里之舞外，先秦时期还有一种西域胡舞流行中原，名曰“株离之舞”。注家曾提到朝那其名或读“株那”。古汉语往往不分 l/n。疑“株离之舞”实乃“朝那之舞”。《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曰：“舞以大夏。”何休注：“东夷之舞曰株离。”《白虎通·礼乐》曰：“东夷之舞曰朝离。”《周礼·春官·鞮鞻氏》郑玄注则说：“西方之舞曰株离。”《新唐书·西域传》挹怛条：“大夏即吐火罗也。”王国维据此推断先秦文献的大夏就是隋唐文献的吐火罗。[85]既然如此，株离之舞应如郑玄所说乃西域胡舞，而“朝那”一词可能来自吐火罗语。

我们知道，吐火罗语楼兰方言称“犬”为 śvana。这个词源于古代印欧语的 k'uō（狗），相当于赫梯语的[LU] kuwas（犬族人）[86]以及吐火罗语 A 方言的 ku/ kom（狗）或 B 方言的 ku/ kwem（狗）。[87]朝那大概是吐火罗语楼兰方言 śvana（<śuna，犬）的汉语音译。先秦文献或谓犬戎为昆夷、串夷、混夷。犬戎的这些异名可能是吐火罗语 A 方言 kom（狗）和 B 方言 kwem（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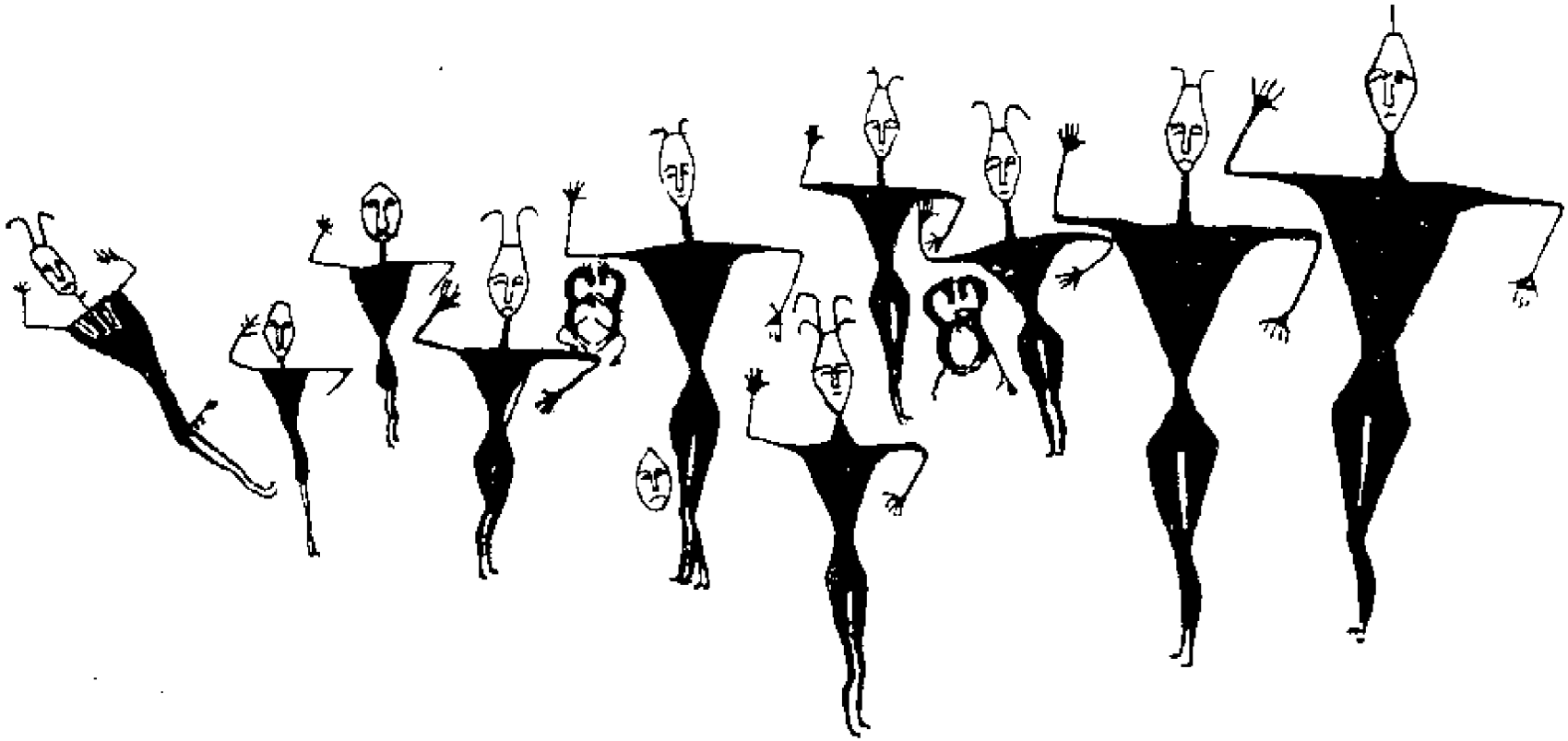


插图 2　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古代宗教裸体舞蹈岩画

的汉语音译。除朝那外，犬戎居地附近还有两个吐火罗语地名。

其一，《后汉书·地理志》安定郡记载："朝那、乌枝，有瓦亭，出薄落谷。"薄落谷即今宁夏清水河发源地。"薄落"似来自吐火罗人对"水"的称谓，相当于吐火罗语A方言的wär（水）或B方言的war（水）。[88]

其二，《逸周书·史记解》记载："昔者义渠氏有两子，异母皆重，君疾，大臣分党而争，义渠以亡。"《今本竹书纪年》又载，武乙"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据《汉书·地理志》，义渠在北地郡，今宁夏北部。而义渠这个名字疑来自吐火罗语B方言的yäkwe（=A方言的yuk，马）。[89]殷墟卜辞记西方诸部落有"马方"，这个部落大概就是文献中的所谓"义渠"。

凡此表明，朝那所在地宁夏固原及其附近地区曾是先秦时期吐火罗人的一个活动中心，株离之舞实乃西域胡舞。

卢连成最近提醒我们注意：中国"北方系青铜兵器中带有管銎的斧、戚和管銎啄戈受到伊朗高原流行的管銎啄影响而形成的，在伊朗高原的卢里斯坦、尼哈温德，这种管銎啄约在公元前2300—前2100年已普遍流行。北方系青铜短剑和周初流行的柳叶形青铜剑，可能受到西亚杰姆代特－奈斯文化以及后来苏美尔－阿卡德时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并经伊朗高原传播到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青铜短剑在杰姆代特－奈斯文化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前2900年，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短兵器"。[90]《诗经·商颂·殷武》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莫敢不来享，曰商是常。"古代氐、羌广布于甘肃、青海及宁夏部分地区。这个地区近年不断出土具有西亚青铜文化特征的管銎兵器。既然成汤时代（约公元前16世纪）殷之西土已达氐羌地区，那么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最初接触应该就在这个地区。

研究者早就注意到，甲骨文"巫"字与西亚太阳崇拜符号

Swastik 完全一样，所以有学者推测中国古代巫教和西亚古代宗教必有某种联系。美国汉学家梅维恒甚至认为殷代宗教人士的名称“巫”可能就来自古代伊朗的麻葛师（Magus）的名称。[91]前文的讨论表明，先秦时期中原流行的西域舞蹈“株离之舞”得名于“朝那”。据《汉书·地理志》，朝那湫渊祠有“胡巫祝”。如果这些胡巫祝真和西亚宗教人士麻葛师有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可能早在先秦时期业已开始。

70 年代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武丁妃子妇好墓出土古玉 700 多件。据鉴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产自新疆昆仑山的籽玉。此前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早期（约公元前 1700—前 1600 年）墓葬内多次发现早商流行的白玉璧和白玉环。[92]70 年代新疆哈密盆地曾发现与殷墟妇好墓所出形制完全相同的龙首刀，[93]同样的龙首刀亦在山西保德晚商墓葬出土。[94]如果将这些古玉和龙首刀的出土地点连成一线不难发现，东起殷都大邑商，西至欧亚草原，确实有一条非常古老的中西交通孔道。而山西北部至宁夏一带的犬戎、义渠等吐火罗人部落充当了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纣王年间西域胡俗因何初染中原及其帝宫的历史背景由此而明矣。

1961 年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李济在给美国《柯里尔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古代中国文明”中评述说：正如考古资料所揭示的，中国在公元前两千纪不仅完成了华北的统一，还吸收了华南和西伯利亚乃至遥远的西亚文化因素，河南“安阳成了一个国际性文化中心，成了青铜时代东方的一个极具特色的世界性城市。”[95]本文对小臣墙刻辞的研究充分证明，中国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最初接触早在遥远的青铜时代业已开始。

注　释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附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重印本，第 409－

450 页。

② 董作宾：《获“白麟”解》，《安阳田野发掘报告》第 2 册，1930 年，第 287－335 页。

③ 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卷下，1940 年。

④ 承蒙甲骨学家张永山先生告知上述情况，谨致谢忱。

⑤ 胡厚宣：《甲骨续存》下册，群联出版社，1955 年，第 915 号。

⑥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年，图版拾陆，附图 133。

⑦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95 页；罗琨：《商代人祭及相关问题》，收入胡厚宣等编：《甲骨探史录》，北京：三联书店，1982 年，第 188 页。

⑧ 参见《左传·定公四年》。

⑨ 据《礼记·玉藻》记载：“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杀六分而去一。”据殷墟出土古尺，殷代每寸 1.58 厘米，那么殷代笏的标准尺寸是：长 41 厘米，宽 4.74 厘米。小臣墙刻辞应是从史官的笏上过录下来的。

⑩ 胡厚宣等编：《甲骨文合集》第 1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2 年，编号 36481 号正。这篇刻辞的背面为甲子表（编号 36481 反），可能是习刻，与正面内容无关。

⑪ 李零：《“车马”与“大车”（㝬师同鼎）》，《考古与文物》1992 年第 2 期第 72－74 和第 106 页。

⑫ 姚孝遂等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26 页。

⑬ 尚志儒等：《陕西蓝田县出土㝬叔鼎》，《文物》1976 年第 1 期第 94 页。

⑭ 同⑫

⑮ 这个刻辞中的“内”字笔划不清，或释“衣”（王宇信：《西周甲骨论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231 页）。据小臣墙刻辞，㠱国的邻国为内（芮）国，可证周原甲骨这个不清楚的“衣”字当为“内”字。芮子即芮国贵族。

⑯ 李零：《古文字杂识（两篇）》，《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70－271 页。

⑰ 同②。

⑱ 据俄国学者切博克萨罗夫和切博克萨罗娃研究，“在亚洲北部各民族中由于

养马业的影响产生了养鹿业……原始森林养鹿业主要用于运输目的”。说见切博克萨罗夫和切博克萨罗娃著、赵俊智和金天明译：《民族·种族·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239－240页。

⑲ 同⑫

⑳ 同⑫

㉑ 方诗铭、王修龄辑：《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30－231页。

㉒ 《诗经·大雅·皇矣》所谓“是禜是祃”就是指周人刑马祭天的宗教活动。

㉓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方诗铭、王修龄辑：《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231页。

㉔ 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年。

㉕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

㉖ 张永山：《殷契小臣辩正》，收入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周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9页。

㉗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231－233页。

㉘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所附“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所附“历史纪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㉙ 李学勤：《论多友鼎的时代及意义》，原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26－133页。

㉚ 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第1955－1981页。

㉛ 鲁人勇等：《宁夏历史地理考》，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

㉜ 甘肃文物工作队：《甘肃崇信于家湾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第1－7页。

㉝ 鲁人勇等：《宁夏历史地理考》，第356－357页。

㉞ 录文据李学勤：《论多友鼎的时代及意义》，原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32页。

㉟ 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胡谦盈：《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6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23－142页。

㊱ 田学祥、张振华：《陕西长武县文化大革命以来出土的几件西周铜器》，《文物》1975年第5期。

㊲ 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38－339页。

㊳ 《左传·昭公九年》杜预注："骀在武功"。

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㊵ 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㊶ 方诗铭、王修龄辑：《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227页。

㊷ 殷墟卜辞的"周"、"周方"和"周侯"等，参见《合集》946、6130、6812、6824、6825、6874、8457、8472、20508、22294。但有些属于殷王武丁时期，可能指岐山周原的某个古部落，不一定是姬周。

㊸ 参见《史记·周本纪》和《竹书纪年》。

㊹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㊺ 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收入《观堂集林》卷13，中华书局，1961年重印版，第584页）将此事与《周易·既济》九三所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相联系显然有误。方诗铭和王修龄业已指出其误，说见其：《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33－34页。

㊻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方诗铭和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228页。

㊼ 唐兰：《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文考释》，原载《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4年第4卷第1期；收入《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第6－24页。

㊽ 王宇信：《西周甲骨论探》，第231－232页。

㊾ 卢连成：《陕西武功县出土楚簋诸器》，《考古》1981年第2期第130页。尚志儒已注意到，内叔压父簋铭的"内"即芮国之芮。说见《西周金文中的㝬国》，收入王宗维、周伟洲编：《马长寿纪年文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3－214页。

㊿ 最早注意到金文矢字即文献吴字的是张政烺先生，说见《散盘考释》，《人文杂志》1958年第2－4期。

51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虢国墓地》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18－419页。据虢国墓地所出铜器铭文，虢国之"虢"系鲁、鱼两字的合

文，当读“修鱼”。《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修鱼氏”等。秦人祖先中潏被殷王从山东半岛费国派到西方，“在西戎，保西垂”。所以陕西宝鸡修鱼国墓地的嬴姓氏族可能是随中潏到西方的一支嬴姓部落。

㊷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強国墓地》上册，第151页。

㊸ 殷墟卜辞中的𠬝（服）方还见《合集》6475和6473。

㊹ 何双全：《两汉时期西北邮政蠡测》，《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第86页。

㊺ 初仕宾：《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第106－115页。

㊻ 李学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6期；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第31页。

㊼ 邹衡：《晋始封地考略》，收入吴荣增编：《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

㊽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71－278页。

㊾ 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㊿ 李学勤：《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山西文物》1982年第1期；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58页。

(51)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強国墓地》下册，第60页。

(52) 袁柯：《山海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7－310页。

(53) 同(47)。

(54) 同(31)。

(55) 韩孔乐、武殿卿：《宁夏固原发现汉初铜鼎》，《文物》1982年第12期第35页。

(56) 同(54)。

(57) 王国维：《说勺舞和象舞》，收入《观堂集林附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58) 島邦男：《人牲説検討》，《殷墟卜辭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75年。

(59)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強国墓地》下册，彩版二三·1。

(60) 据《左传·昭公二十年》，春秋晚期齐国已有“撞钟舞女”，《论语·微子》说齐君还把女乐送给鲁国君主。《左传·襄公十一年》说，郑国也曾献女乐于晋。《史记·秦本纪》记内史廖向秦穆公献计“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

戎王得女乐而丧志，秦穆公得霸西戎。

⑪ 王恩田：《辉县赵固刻纹鉴图说》，《文物集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60－170页。

⑫ 房中乐亦见《汉书·礼乐志》。其文曰："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

⑬ 据《吕氏春秋·古乐》，"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濩》"。伊尹之作《大濩》或简称《濩》。

⑭ 参见《韩非子·十过》。

⑮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文物》1974年第8期。

⑯ 姚孝遂：《商代的俘虏》，《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7页。

⑰ 古代中国意识到"同姓相婚，其生不繁"的严重性似在春秋时代，参见《左传·昭公十五年》。

⑱ 《左传·僖公十七年》。

⑲ 关于𡚬字用作名词时指女奴，参见罗琨：《商代人祭及相关问题》，收入胡厚宣主编：《甲骨探史录》，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49－151页。

⑳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㉑ 韩儒林：《泼寒胡戏与泼水节的起源》，《向达先生纪年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0－103页。

㉒ 译文见韩儒林前揭文，第100－103页。

㉓ 古代中国曾将少女沉河而祈雨。即所谓"河伯娶妇"。殷墟卜辞对此亦有所载。例如："丁巳卜：其燎于污牢，沈（沉）𢀛"（《后》上．24．1）；"丁巳卜，其燎于河牢，沈璧"（《殷墟书契后编》上23．4）。这种祈雨方式和古代印欧人以裸体舞蹈来祈雨不尽相同。

㉔ 关于康家石门子古代岩画，参见王炳华：《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初探》，收入《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2－411页；商代铜器上的双马神图案见容庚：《金文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844页。新疆大学苏北海最先注意到康家石门子双马神岩画可与商代铜铭中的双马神比较，说见《新疆岩画》，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559页。

㉕ 王国维：《西胡考下》，《观堂集林附别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重印本，第613－614页。

⑧⑥ H.C. Melchert, "PIE 'dog' in Hittite?," *MSS*, 50, 1989, 100, n. 5.

⑧⑦ JR. Don Ringe, *On the Chronology of Sound Changes in Tocharian*, vol. 1,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6, 63－64.

⑧⑧ W. Krause a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II,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Verlarg, 1964, 141.

⑧⑨ W. Krause a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II,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Verlarg, 1964, 224.

⑨⓪ 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收入上官鸿南、米士光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9页。

⑨① Victor H. M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s, and English Magician," *Early China*, 15, 1990, 28－47.

⑨② 吉谢列夫著、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⑨③ 新疆考古研究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59。

⑨④ 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第63页及图版陆。

⑨⑤ Li Chi, "Ancient Chinese Civiliazition," *Collier's Encyclopedia*, New York; Macmillan Educational Company, 1961.

二　商周青铜剑渊源考

正如现代考古学研究所揭示的，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但中国从未脱离世界其他五大文明而孤立发展。中国考古新发现以及中亚古代语言研究的最新进展为我们探讨商周青铜短剑渊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大量证据表明，商末周初突然出现于中原的青铜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古代东方各国对“剑”的称谓还为研究汉藏、阿尔泰和印欧三大语系之间诸语言的接触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本文拟分五节讨论这些问题。

一、中原佩剑肇源于周文化

殷人是否用剑，文献失载。周人用剑见于《周礼·考工记》。文中说：“桃氏为剑，腊广二寸有半寸，两从半之。”又说：“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周礼》成书较晚，西汉古文学家刘歆（？—23年）整理《周礼》之前未见此书，亦不见先秦文献引用此书。尽管《周礼》可能保存了更古时期的史料，但文献明载吴越之剑却在春秋之际。清儒喜论“桃氏为剑”，而现代学者罕以《考工记》作为周人佩剑的证据。[1]

战国末赵国史书《世本》提到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关于兵器类，《世本·作篇》说：“夷牟作矢”；“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扬作甲，扬作矛；逢蒙作射”等。文中唯独

没说剑是何人发明。[2]《列子·汤问》曰："西戎献锟铻剑，火浣布。其剑长尺有咫，练钢赤刃，用之切玉如泥。"况且周代舆服制度不包括佩剑。[3]可见佩剑之俗原本不属于华夏文化。

文献明确记载中国士大夫佩剑在春秋时期。季札挂剑的故事即生动的一例。《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由于剑是标志季札士大夫身份之物，所以他出使中原前不便把剑随意送人。这个故事说明季札出使中原时代（前544年）佩剑已成为中国士大夫的重要舆服之一。《晏子春秋》卷5载：崔杼刺杀齐庄公（前547年），然后以武力威胁诸将军、大夫在大宫盟誓。他说："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颈，剑承其心"，并以"曲刃钩之，直兵推之"。这大概是文献关于剑术的最早描述。尽管秦汉时期佩剑才正式成为士大夫舆服之一，寻其渊源，当萌芽于春秋。

战国时期中原低级官吏开始佩剑并影响到平民百姓。《史记·秦本纪》记载："简公六年（前409年），令吏初带剑。"同书《秦始皇本纪》附《秦纪》又载："简公从晋来……其七年（前408年），百姓初带剑。"秦制：吏为县令（长）以下低级官吏；百姓则是普通平民。[4]由此可知，公元前5世纪末秦国百姓已经人皆佩剑。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下胡服令，内容是"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胡服骑射是中原古代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改革。除骑射外，佩剑历来被儒者视为胡俗。《梦溪笔谈·故事一》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可知流括时代佩剑仍被视为胡俗。佩剑之风流行三晋（赵、魏、韩）大概在公元前4世纪末。除《史记·赵世家》说赵人佩剑外，《荀子·议兵篇》还提到："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

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箙）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鞙（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由此可知，荀子时代（前313－前238年）佩剑在魏国已推广到普通士卒。

萌芽于春秋的剑术在战国得到发展。《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记载，卫人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又说：“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汉书·艺文志》记兵技巧凡十三家，其中有剑术书，名曰“剑道三十八篇”。此书大概是中原士大夫谈兵论剑的最早的著作，可惜未能流传下来。《吕氏春秋》原有“剑伎”篇，今佚。《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引《吕氏春秋·剑伎》曰：“持短入长，攸忽纵横之术也。”《淮南子·修务训》也有类似的记载。看来剑术在春秋战国之际业已形成。尽管世界其他古文明，如埃及、波斯和希腊，也有佩剑之风。希腊人还把持剑格斗发展成竞技体育，直接影响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但是将剑的使用技巧发展成一门艺术——剑道或剑术（Art of Sword），似乎唯中国文明独有。

古代中国流行相术并有《相马经》、《相犬经》等相术书流传于世。有趣的是，中原人相犬、相马之余还相剑。传世之作似以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年代最早。近年居延边塞出土汉简中发现有《相宝剑刀》（拟名）一书，说明西汉就有相剑书。[5]《周礼·考工记》、《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书常引用相剑的专业术语，估计相剑之类的作品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

甲骨金文为研究中国青铜剑的来源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殷墟甲骨和商代青铜器未见“剑”字或与之相关的字。1981年陕西出土西周青铜器中有一条和剑相关的重要史料，即扶风下务子村西周晚期窖穴出土的师同鼎。此鼎铭文明确提到“剑”字，因而为研究周代青铜剑提供了重要的古文字学依据。[6]师同鼎记夷、厉王之际（约前9世纪中）爆发的一场周戎战争，周人缴获戎人青铜器100多件。[7]今录鼎铭于下：

"𢦏畀其井（形），师同从（纵），折首执讯。捋车马五乘，大车廿，羊百挈，用造王羞于黾。捋戎金胄卅，戎鼎廿，铺（镈）五十，剑廿，用铸兹尊鼎，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鼎铭大意为："（敌酋）𢦏畀一出现，师氏同就跟踪追击。一部分戎敌被斩首，另一部分被俘获。缴获马车5辆，牛车20辆及羊肉100捆，并在黾地献给周王作为御膳。他还缴获戎人的铜头盔30个，戎人的铜鼎20个，铜镈50个，青铜短剑20把，并把它们用来铸造这套列鼎。让子子孙孙永远珍惜地使用。"[8]

师同鼎披露了周戎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许多重要信息。我们感兴趣的自然是师同鼎的"剑"字。首先，这是目前所知古文字中最早的"剑"字；其二，师同鼎明确记载剑是周初戎人重要军事装备。再次提醒我们注意中原士大夫佩剑之风来自胡俗；其三，鼎铭说："……剑廿，用铸兹尊鼎"。师同毁戎剑的原因颇费解。这个现象或表明周人造剑术可能超过了戎人。所以师同才会把缴获戎人的20把宝剑全部销毁，用来铸造青铜礼器。

"剑"字在东周金文中大量出现。计有：少虞剑（赵国）、旂钟剑（魏国）、郾（燕）王职剑、甫王剑、鹏公剑（秦国）、戊（越）王剑、越王勾践剑、吴季子之子剑、攻敔（吴）王光剑、蔡侯产剑、余（徐）王剑、除（徐）王义楚之子剑铭等，不胜枚举。[9]此外东周剑铭往往提到"自作（剑）"。例如：1973年湖北江陵藤店1号墓出土越王州句剑有铭曰："越王州句自作剑。"[10]由此可见春秋时期赵、魏、燕、甫、秦、越、吴、蔡、徐诸国分别发展了各自的铸剑金属手工业。

考古资料表明，春秋中期长江流域的造剑术甚至超过中原。1996年初中国企业家出巨资购回流入香港文物市场的国宝"戊王者旨於賜"剑。此剑堪称春秋时期江南青铜剑的代表之作。剑格双面所刻文字为双钩鸟虫书，大量使用通假字。其中，"戊王"

即越王；“者旨於賜”，《竹书纪年》作“鹿郢”，乃越王勾践之子（前464—前459年）。司马迁用中原音将其名记作“鼠与”。[11]尽管此剑长眠地下2450年，但至今寒光逼人。诚如《庄子·刻意篇》所说“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

先秦文献和春秋各地金文的“剑”字与师同鼎的“剑”字的写法一脉相承。从剑演变来的兵器亦以“剑”的近音定名。例如：文献将剑式矛头的短矛称为“铤”，并将剑式矛头的长矛称为“鋋”。[12]凡此表明，中原佩剑肇源于周文化。

二、中国佩剑之俗起于西北游牧人

虽然中原佩剑始于周人，但中国率先佩剑者并非周人。考古资料表明中国西北游牧人佩剑不迟于商代。最早探讨商代青铜短剑问题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他在1945年撰文《殷代若干武器和工具考》，著录了两把据说出自河南安阳的商代鹿首短剑（参见插图3标本25）。[13]然而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安阳及其周边地区正式考古调查和田野发掘中从未发掘出任何商代青铜剑，所以高本汉著录的这两把商代青铜短剑的真伪曾受到质疑。[14]

60年代以来内蒙古鄂尔多斯以及中国北方农牧交界地带陕西绥德县，山西保德、石楼、柳林三县，河北青龙县、张家口市和北京市等地的商代遗存中相继发现许多早商至周初的青铜剑，若加上传世品，目前已经积累了30多个标本，特别是新疆阿尔泰山区及内蒙古朱开沟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为研究中国最初流行的青铜短剑的年代与类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商代青铜剑的断代基于考古发掘资料中几组青铜礼器与青铜短剑的共存关系。这些和青铜剑共存的青铜礼器可与殷墟发掘品中同类器物进行比较，所以根据已知的青铜礼器的年代可以推知

青铜剑的年代。张长寿对这几组含短剑的商代青铜器群的年代作过分期研究。他的结论是：石楼后兰家沟和藁城台西村墓葬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盘庚—武丁，公元前1300—前1180年），石楼桃花庄墓葬年代属于殷墟第二期（祖庚—康丁，公元前1179—前1130年），绥德焉头村和保德林遮峪墓葬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武乙—帝辛，公元前1129—前1027年）。[15]目前所见30多个殷商短剑标本可分为匕式剑、翼格剑和曲茎剑三大系列。

第一系列为匕式剑，不下10个标本（参见插图3标本33、34）。剑端圆钝无锋，宜割不宜刺。这种形式的短剑以前常被定名为“匕”或“刀”，疑不确。游牧人用剑主要不是防身，而是用作割取肉食的餐具。剑传入中原后，特别是剑身加长后，它才发展为一种兵器。此外，剑与刀的区别在于刀是单刃，剑是双刃，所以这种双刃类似匕首的东西应属于剑类，姑且定名为匕式剑。这类剑始见于相当殷墟文化第一期的墓葬，如石楼后兰家沟和藁城台西村；晚至周初。分布范围：北至鄂尔多斯瓷亥树湾，所出龙首匕式剑的类型和藁城台西村殷墟文化一期墓葬所出匕式剑雷同；东至辽宁辽阳，所出人头首匕式剑和甘肃齐家坪的一件造型完全相同；西至甘肃齐家坪和秦安；南至河北藁城、陕西绥德、清涧、山西石楼。秦安所出鹿首匕式剑的年代稍晚。[16]

第二系列为翼格剑，最先在鄂尔多斯流行，最早的一例出自朱开沟晚期第5段文化层。简报根据共存的早商铜戈将其年代断为早商时期（参见插图3标本13）。[17]商末周初翼格剑在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相当流行，如北京延庆和河北北部等地（参见插图3标本40—43）。

第三系列为曲茎剑，主要流行于晚商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较多地见于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墓葬，如山西保德林遮峪等地的发掘品。曲茎、环首、兽首或铃首是此类剑的最大特征

(参见插图 3 标本 25、27、29 和 30)。分布范围：北至蒙古国南戈壁省伯颜塔拉乡，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赤塔和布利亚特托克利湖畔；东至北京昌平；西至陕西北部黄河两岸，南至河北北部。蒙古和南西伯利亚的曲茎剑年代约在周初，剑茎稍直，一字格消失，代之以舌状格。[18]

目前所见商代青铜剑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商王朝统治中心地区罕见。70 年代殷墟妇好墓发掘出鄂尔多斯文化的典型器物—龙首曲茎折背刀（参见插图 3 标本 26）。[19]所以长期从事鄂尔多斯青铜器研究的田广金认为，“有人（指高本汉）说在殷墟也发现过曲柄短剑，这不是没有可能的”。[20]据报道，1982 年山东沂水一个晚商灰坑内出土了两把柳叶剑，一把完整，另一把残存剑锋，系当地老乡平地时发现。灰坑内所出铜器和陶器均为晚商遗存。但从形制看，这两把剑均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柱脊剑，显然不是商器。[21]总之，剑在殷商文化中心地区罕见，这与殷墟甲骨以及商代铜器铭文不见“剑”字是一致的。

商代北方草原流行的三个系列的青铜剑目前还缺乏深入的考古类型学研究。从它们的基本形态均呈柳叶形看，应有共同的渊源，即从柳叶剑发展而来。据台湾学者杜正胜调查，山西吉县上东村、石楼曹家垣和南西伯利亚 Ujunjul 商代墓葬中曲茎剑往往和管銎战斧共存。[22]欧亚草原游牧人青铜兵器中和管銎战斧配合使用的正是柳叶剑。朱开沟的发掘品证明，柳叶剑至迟在早商就传入鄂尔多斯草原。另一方面，商代北方三个系列的青铜剑都有形态相应的青铜刀。这表明商代北方游牧人并没有简单地接受柳叶剑，而是参照本地刀的形式对柳叶剑加以改造，发展出翼格、匕式和曲茎三个系列的短剑。

三、从管銎战斧看周人柳叶剑的渊源

中原造剑始于周初，有些剑铸有铭文。例如：西周东都成周

附近（今洛阳东郊）所出丰伯剑。丰伯系周初分封的姬姓丰国（今陕西长安县沣河以西）国君，所以此剑必为周人自铸剑。自60年代中科院考古所在西安张家坡发掘出周初柳叶剑以来，中原和周边地区墓葬中已出土富有周文化特征的青铜剑10余把，若加上传世品和近年盗掘品，至少积累了近30个标本。

这些周初青铜剑标本大致为曲茎剑、凹格剑和柳叶剑三个系列。曲茎剑是商代北方草原流行的青铜短剑，周初已十分罕见。凹格剑有铃首、环首和蕈首（蘑菇状）三大类，蕈首盛行于南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参见插图3标本44—46）。论者或以为中国的蕈首凹格剑从南西伯利亚传入。不过近年考古发现表明此类剑可能是从商代鄂尔多斯流行的翼格剑发展而来，至周初其翼格趋于平直，向一字形变化。另一显著变化是剑身与剑茎之间开始内凹，形成所谓“凹格剑”（参见插图3标本40—43）。此外，商代北方地区流行的匕式剑在周初濒临绝迹。

周人最早铸造的短剑是柳叶剑，也即西方考古学家所谓Bi-point type sword。尽管它和商代北方系统的三种青铜短剑属于同一剑系，但周人的柳叶剑似乎不是从上述三种剑发展来的。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北方系青铜短剑和周初流行的柳叶形青铜剑，可能受到西亚杰姆代特·奈斯文化以及后来苏美尔－阿卡德时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并经伊朗高原传播到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青铜短剑在杰姆代特·奈斯文化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前3100年至前2900年，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短兵器”。[23]

早在1961年苏联考古学家契列诺娃就曾提出，商周青铜兵器中的管銎斧和管銎戈源于近东。[24]此类兵器西北地区近年又有不少新发现。经我国考古学家验证，它们确实和近东古兵器有联系。长期从事北方系统青铜器发掘与研究的乌恩分析说：“据目前的发现，公元前第3千年至第2千年前半叶在近东已有管銎斧。年代早于我国北方的管銎斧。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近东管銎

斧的形制与我国北方的标本非常相像，如石楼曹家垣斧和伊朗尼哈温德斧，均有很长的管銎。这种长管銎斧在安阳殷墟和岐山王家嘴各出过一件。但长管銎斧在卡拉苏克文化和塔加尔文化却未见到。”他还分析说：“管銎戈和斧一样，最早出现于近东，后为我国北方的青铜文化所借鉴，并同短剑、管銎斧一样，经蒙古和外贝加尔传入米奴辛斯克盆地。”[26]为便于讨论和今后的研究，我们把反映柳叶剑和管銎战斧的东渐的资料制图于此（参见插图3）。[27]

尽管柳叶剑最早产生于近东杰姆代特·奈斯文化（约公元前3100－前2900年），但它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却和古代印欧人文化密切相关。目前学界已经确认南俄草原的斯鲁巴那亚文化（Srubnaya Culture）和中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属于古代印欧人文化。前者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西部，后者则在这片草原东部。这两个文化内涵其实很相近，当源于同一个原始文化。关于印欧人原始故乡问题，学术界已经争论了一个多世纪，堪称“世纪之谜”。英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伦夫鲁爵士认为在安纳托里亚，英国考古界新星马劳瑞博士主张在里海东南岸，俄国考古学家库兹米娜则力主在南俄草原。近年三人各有关于印欧人起源问题的学术专著出版。[27]1996年4月美国费城召开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古民族国际学术讨论会，古代印欧人起源问题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28]就目前资料而言，印欧人起源于中亚草原的可能性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和中亚语言资料的支持。

80年代美国与土库曼斯坦的考古工作者对马尔吉那青铜文化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据^{14}C年代测定，马尔吉那青铜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100—前1900年左右。管銎青铜斧、柳叶剑和素面圆铜镜等是这个文化的典型器物（参见插图3标本1—4）。[29]前两种兵器后来为广布欧亚大陆的印欧语系游牧人普遍使

用，所以马尔吉那青铜文化可能是最早的古代印欧文化之一。马尔吉那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见于伊朗尼哈温德及伊朗查伽罗斯山区卢里斯坦青铜器群（参见插图3标本5—10）。例如两者都含有管銎战斧和柳叶剑等。从卢里斯坦青铜器装饰动物纹并含大量车马器判断，这个文化的创造者应是游牧人。卢里斯坦青铜器群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500年，有些铜器和阿卡德王朝的器物有共存关系，年代当更早。[30]这段时间正处于雅利安人大迁徙时代。因此有学者推测卢里斯坦青铜文化属于来自南俄草原的古代印欧人，可能是早期进入伊朗高原的米底人或波斯人创造的。[31]尽管近东和中亚青铜文化的关系尚待深入研究，但目前的考古资料可以说明柳叶剑起源于近东，它在欧亚大陆的使用和传播与古代印欧语系游牧人密切相关。

60年代以来和古代东伊朗人密切相关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迹遗物不断在新疆发现。1976年新疆鄯善县阿尔尕生发现了一个含柳叶剑（编号76GLA：13）的青铜器窖藏。这组铜器属于典型的安德罗诺沃式铜器，年代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60年代初新疆阿勒泰的克尔克齐发现了早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奥库涅夫文化（约公元前2000—前1800年）墓地，所出随葬品亦含柳叶剑。[32]近年新疆阿勒泰地区还征集到一把青铜柳叶剑，“全长22、茎长14.2、最宽处3.9厘米，把长7.8厘米。整个器形细长，轻薄，塔城市出土，现藏塔城市区文管所”（参见插图3标本11）。[33]塔城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区，这把剑的形制和安式柳叶剑的形制雷同（参见插图3标本14—16），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至前1300年间。就目前所知，安德罗诺沃文化向东最远已达天山东麓。据南京大学水涛分析，新疆哈密盆地雅林辨“墓地遗存中的部分彩陶是以各种松针纹为构图母题，这样的纹样及其风格无疑是中亚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固有传统”。[34]人类学资料也表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代印欧人的分布已抵达新疆东部的

罗布泊和哈密盆地。[55]

公元前13世纪鄂尔多斯文化（西方学者或称“卡拉苏克文化”）的兴起，遏制了古代印欧人向东发展的步伐。70年代哈密盆地发现鄂尔多斯式龙首刀。这无疑说明鄂尔多斯文化的势力非常强大，向西可达天山东部。[56]古代印欧人向东发展的势头遭到扼止后，转而向南方发展。据报道，成都十二桥遗址近年发现了两把晚商时期的柳叶剑，属于这个时期的广汉三星堆祭祀坑还出有模仿柳叶剑的玉剑（参见插图3标本23—24）。[57]这说明古代巴蜀很早就和西域有文化交流。可惜目前所见资料太少，尚不足以详述柳叶剑从中亚向巴蜀传播的具体过程。

如所周知，西亚和中亚青铜文化的柳叶剑是一种和管銎战斧配合使用的短兵器，甘肃灵台百草坡、陕西宝鸡强国墓地和北京昌平白浮等周初墓葬所出柳叶剑亦与管銎战斧共存。这些古墓既随葬青铜礼器，亦随葬富于西域文化特征的异形兵器，当是华化戎人墓葬。柳叶剑很可能是以这些华化戎人为媒介间接传入中原的。《尚书·牧誓》和《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时曾联合西土八国军队。《史记·匈奴列传》又载：“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於丰镐，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由此可知，武王克商后西土戎人大批入居中原。甘肃灵台百草坡、陕西宝鸡强国墓地含柳叶剑和管銎战斧的墓葬正是这些入居泾洛之间的戎人墓葬。因此柳叶剑最初传入中原当与西土八国人士入居中原相关。

柳叶剑传入中原后，经西周工匠改造，极富周文化特征。例如：剑身装饰周人青铜礼器上特有的夔龙纹，并装配工艺极其精美的铜剑鞘。这种剑在灵台白草坡、宝鸡强国墓地、北京昌平琉璃河屡有发现，堪称周初中原青铜剑的代表作。周、戎用剑目的不同。戎人以剑为餐具，周人以剑防身或借以表明士大夫身份。所以周人逐渐将剑身加长，这个变化从西周中期中原出现的新剑

种——柱脊剑以及后来吴越流行的青铜剑实物标本可以清楚地看到。

三、从语言学证据看青铜剑之渊源

周人论剑还有两条重要史料，其一见《逸周书·克殷解》。由于《逸周书》对剑别有他称，不是后人熟知的“剑”字，这条有助于探讨中国青铜剑来源问题的重要史料尚未得到海内外古代兵器史家的充分讨论。《逸周书·克殷解》记牧野之战说，武王率周师攻入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武王“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悬）诸太白。折绝其首，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悬）诸小白”。晋孔晁注曰：“轻吕，剑名。”下注曰：“轻吕，《史》作‘轻剑’。”[38]《史》指《史记·周本纪》。司马迁记周师攻入朝歌后，武王“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击以轻剑，斩以玄钺，县（悬）其头小白之旗”。

轻吕，《史记》作“轻剑”，故知该词是周人对剑的别称。40年代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曾注意到“轻吕”应是北方游牧人对“剑”的称谓，匈奴语作“径路”。[39]我国语言学家张永言近年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撰文讨论汉语“轻吕”与匈奴语“径路”的关系。[40]匈奴语“径路”见于《汉书·匈奴传》。传文说：“（韩）昌、（张）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诸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东汉应劭注释说：“径路，匈奴宝刀也。”如果轻吕真是径路，那么应劭注不够确切，它应是匈奴人对剑的称谓。

《史记》、《汉书》记录了个别匈奴语词汇，据考证，多数词

汇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有关。例如：匈奴人称“天”为“撑梨”，相当于突厥语 tängri（天）；匈奴人称公主为“居次”，相当于突厥语 kys（女孩）。诚然匈奴语中可能会有伊朗语和吐火罗语借词。例如：德国吐火罗语专家温特发现古代突厥人对“太阳”的称谓就和吐火罗语一致。[41]不过那是匈奴人与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进行文化交流的产物。匈奴人本族语无疑是阿尔泰语系的某种语言。

关于匈奴语“径路”的词源，德国东方学家夏德早年曾撰文讨论，他怀疑该词来自突厥语 qingrāk（大刀），[42]日本东方学家白鸟库吉从之。[43]据英国语言学家贝利研究，夏德引用的这个突厥语词的正确转写应为 qïngïraq，本义为 knife（刀）而不是 sword（剑）。[44]

最近我们终于查到，古代突厥语表示“剑”另有一词，见于唐开元二十年（732 年）所立突厥鲁尼文碑铭《阙特勤碑》。此碑北面第 5 行碑文曰：“阙特勤王子……在对打中用径路（qïlïč-la-di）砍倒了第七个人。”[45]碑文所谓“径路”，美国突厥学家特肯译作 sword（剑），德国突厥学家葛马丽译作 schwert（剑）。这个词和夏德所引突厥语表示“刀”的词 qingrāk 明显有别。[46]据调查，中国西北某些现代突厥语中仍保存了古突厥语“径路”的读音，如裕固语的 gələş（剑）。[47]而“大刀”一词在维吾尔语和乌孜别克语中作qilitʃ，哈萨克语作 qələʃ，柯尔克孜语和塔塔尔语作 qələtʃ，撒拉语作 qəliʃ、裕固语作 qələş。[48]现代突厥语表示“剑”或“大刀”的词无疑有一共同的词源。据我们分析，这个词就是《阙特勤碑》所谓 qïlïč 以及《汉书·匈奴传》的“径路”（汉语上古音读作 kieŋ-lak）。

剑无疑是游牧人发明的。游牧人用剑不单为防身，同时还作为吃饭的餐具。它和游牧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中原农业定居民族以五谷杂粮为食并不十分需要剑一类的东西。所以中原佩剑之

风显然受西北游牧人的影响。

如果周人对剑的古称“轻吕”源于匈奴语，它应来自古代突厥碑铭中的 qilič。不过周人对剑的称谓似乎另有来源。张华《博物志》引《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列子·汤问篇》亦载：“西戎献锟铻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练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昆吾疑即古代印欧语*kuwo（犬）的汉语音译，相当于赫梯语的LUkuwas（犬族人）、吐火罗语 A 方言的 ku/kom（狗）或 B 方言的 ku/kwem（狗）。[49]既然如此，周人对剑的称谓“轻吕”似来自吐火罗语 kare（剑）。周人称剑为“轻吕”而不是带入声尾音 k 的“径路”有助于证明这一点。

我们还注意到匈奴“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的习俗和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前 484—前 430/420）笔下古波斯人的祭祀风俗极其相似。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希波战争史》（VII. 54）写道：古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的第三代君主大流士（Darius，前522—前 485）去世，波斯王位由太子薛西斯一世（Xerxes I，前 486—前 465）继承。为报复波斯人在马拉松之役的失败，公元前 480 年薛西斯远征希腊。波斯大军在渡海到欧洲之前举行了一个仪式。希罗多德介绍说：

> “在那一整天里，他们都在为渡过去而作准备。而在第二天，他们就一面在桥上点起各种各样的香并在桥面的路上撒了桃金娘的枝子，这样地等候太阳的升起。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薛西斯就用黄金盏向海中行灌奠之礼并向太阳祷告说，在他到达欧洲的极远的边界之前，不要叫他遭受任何意外致使他无法完成征服欧洲的事业。祷告之后，他便把这只黄金盏投入海列斯彭特，和它同时投入的还有一个黄金的混酒钵和他们称之为‘阿齐纳锟斯’的波斯剑。”

所谓“阿齐纳锟斯”，希腊文原文作 α'κινα'κης。这是个古波

斯语（或称希腊－波斯语/ Graeco-Persian）词汇，读作 a-keenakais，相当于中古波斯语的 cyl'n/čelān（剑）。[50]这个词和匈奴语“径路”发音如此接近，不能不使人怀疑两者有一共同的词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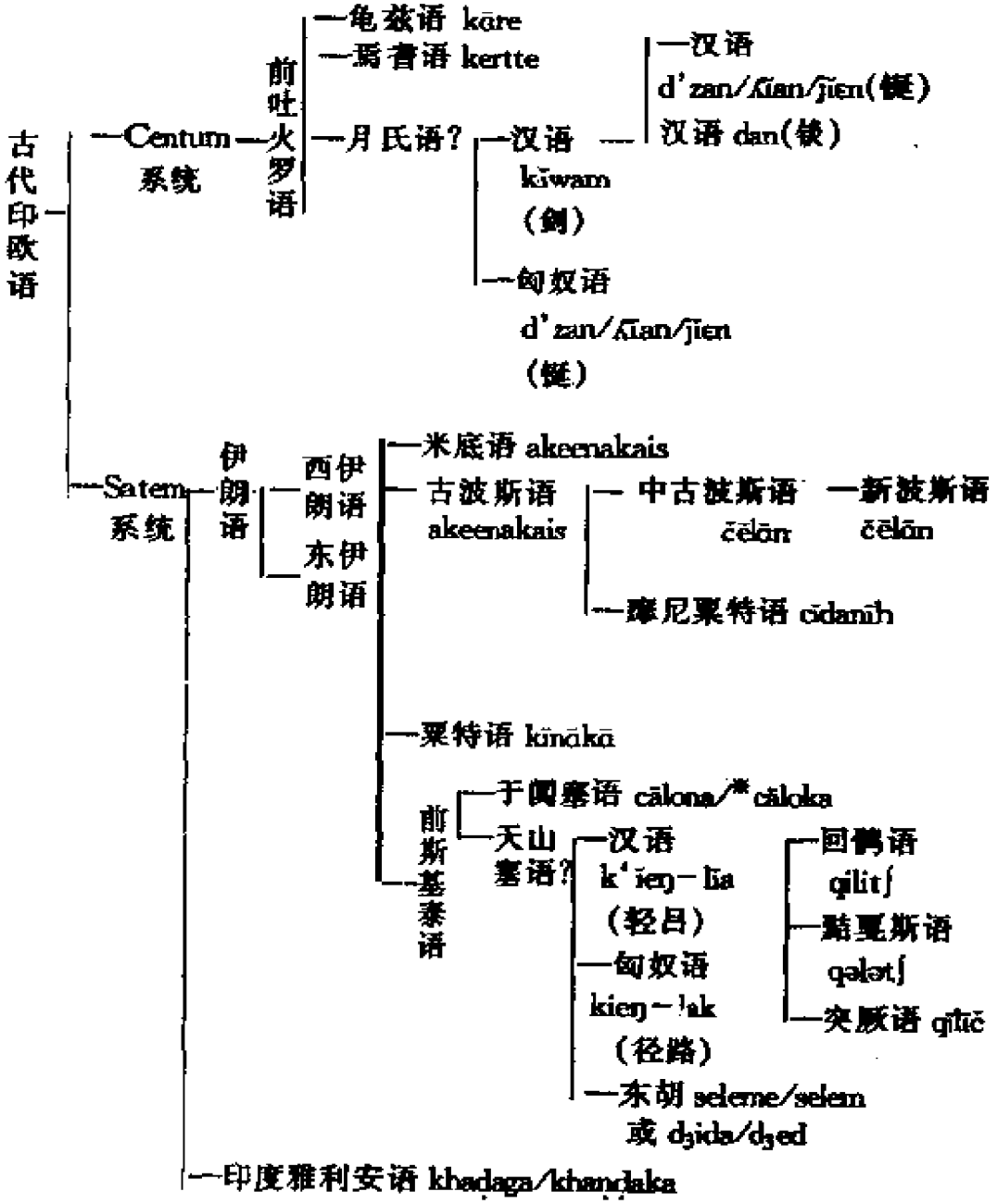
令人吃惊的还有这种波斯古剑的形制。《希波战争史》的英译者胡德（C. Hude）在这段文字下注中解释“阿齐纳铠斯”说：“一普司（pous）左右的短剑。”古波斯度量衡单位：1 普司＝30 厘米。[51]那么古波斯人使用的这种剑不仅名称和匈奴语“径路”读音接近，而且剑的尺寸也和商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青铜短剑的尺寸几乎一样。

诚然剑名雷同，剑形相似远不足以证明古波斯阿齐纳铠斯剑、匈奴宝剑“径路”以及周武王所持“轻吕”之间的传承关系。不过我们又从《史记·匈奴列传》查到，除径路外，匈奴人还把剑称作“鋋”。司马迁记匈奴人武器曰：“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史记·匈奴列传》集解引韦昭曰：“鋋，形似矛，铁柄。”为什么匈奴人有时称剑为“径路”，有时又称作“鋋”呢？这里或许有我们目前尚不知道的原因。为能深入了解三者间的关系，我们对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对“剑”的称谓作了初步调查。调查结果如表所示（参见古代东西方诸语言对“剑”的称谓一览表）。

如表所示，古代东方诸语言的“剑”字无疑都源于古代印欧语，而在印欧语中又清晰地显示出东西两个系统——印欧语西支 Centum 系统和印欧语东支 Satem 系统。据我们分析，一览表所列东西方 19 种语言或方言中剑字之间的关系当如下图（参见古代东方诸语言中“剑”字生成转换关系图）所示：

古代东西方诸语言对"剑"的称谓一览表[2]

编号	诸语言名称	诸语言英文名称	发　音	本　字	含　义
1	希腊-波斯语	Graeco-Persian	akeenakais	α'κιια'κης	剑/sword
2	祆教波斯语	Zoroastrian Persian	čēlān	inčyl'n-kl	剑/sword
3	婆罗钵语	Pahlavī	čēlān	cyl'n	剑/dagger/sword
4	中古波斯语	Middle Persian	čēlān	cyl'n	剑/dagger/sword
5	新波斯语	New Persian	čēlān	cyl'n	剑/dagger/sword
6	摩尼教粟特语	Sogdian Manichaen	cīdanīh	čyδnyh	剑/sword
7	粟特语	Sogdian	kīnākā	kyn'k	剑/ sword
8	梵语	Sanskrit	khadga/ khaṅdaka	khadga/ khaṅdaka	剑/sword 剑/sword
9	于阗塞语(斯基泰语)	Khotanese Saka (Scythian)	cālona/calona	in cālonyau	剑/sword
10	龟兹语	Tokharian A	kāre	kāre	剑/sword
11	焉耆语	Tokharian B	kertte	kertte	剑/sword
12	匈奴语	the Hun Language	kieŋ-lak	径路	剑/sword
13	匈奴语	the Hun Language	ʎian/ jien	铤	剑/sword
14	古代突厥语	Old Turkic	qilič	qilič	剑/sword
15	维吾尔语(回鹘)	Uighurian	qilitʃ	qilitʃ	大刀/ broadsword
16	柯尔克孜语(黠嘎斯)	Kirkhasian	qələtʃ	qələtʃ	大刀/broadsword
17	蒙古语(东胡)	Mongolian	dɜida/ dɜed	dɜida/ dɜed	短剑/sword
18	蒙古语(东胡)	Mongolian	seleme/selem	seleme/selem	长剑/ sword
19	汉语(商)	Archaic Chinese (Shang)	k'ieŋ-lia	轻吕	剑/sword
20	汉语(周)	Archaic Chinese (Zhou)	kīwam	剑	剑/sword
21	汉语(周)	Archaic Chinese (Zhou)	d'zan	铤	铤/short spear
22	汉语(周)	Archaic Chinese (Zhou)	dan	镡	镡/long spear



古代东方诸语言中“剑”字生成转换关系图

我们的研究表明，丝绸之路上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字无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欧语。古代印欧人最初是游牧人，他们曾在欧亚草原放牧并附带从事一些农耕生产。据考古资料，欧亚草原西部的斯鲁巴那亚文化和欧亚草原东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十分相近，源于更早时期的印欧人文化。公元前1500年前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部落不断分化，并向四方迁

徙，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南下两河流域的米底人、波斯人和帕提亚人被称为“西伊朗人”，继续在欧亚草原游牧的金麦里人、斯基泰人、塞人、中亚两河流域的大夏人、粟特人等被称为“东伊朗人”，远徙南亚次大陆的一支被称为“印度雅利安人”。[53]中亚语言资料表明，新疆天山北麓的古代游牧人和塔里木盆地西南的于阗人和疏勒人亦属“东伊朗人”。

天山以南的龟兹人、焉耆人、高昌人、楼兰人和天山北麓的月氏人亦属古代印欧人。中亚语言研究表明他们比东伊朗人到达中国西部要早，学界称之为“吐火罗人”。尽管吐火罗人地处印欧语系东支 Satem 语组分布区内，但吐火罗语却和印欧语系西支 Centum 语组的语言，和凯尔特语、意大利语颇为一致。据我们分析，汉语“剑”字很可能来自吐火罗语月氏方言，匈奴人对剑的别称“铤”亦然。

早在先秦时期吐火罗人就出现于中国北方，先秦文献作“禺知”或“禺氏”，秦汉文献作“月氏”或“月支”。吐火罗人活动范围相当大，从塔里木盆地直至鄂尔多斯草原。此前我们在一篇论文中曾考证汉语“祁连”和“昆仑”同出一源，也即月氏人对其王庭所在地南部山脉的称谓。这个地名大概是目前所知汉文材料中最早的印欧语借词。[54]中亚语言资料现在又向我们透露，汉语“剑”以及匈奴语的“铤”亦来自吐火罗语。

匈奴语的“径路”是个以 k 收尾的词，这与东伊朗语，如于阗语塞语 cälona/*cäloka，至为接近。中亚语言资料亦表明东伊朗语很早就借入汉语。例如：先秦文献对狮子的称谓“狻猊”盖源于古代东伊朗语，相当于阗塞语的 sarana-（狮子）。[55]近年在天山东麓、宁夏固原和内蒙古鄂尔多斯战国时期的古墓或遗址所出塑造狮子形象的青铜或黄金艺术品应即先秦文献所谓“狻猊”。狮子这种西亚动物形象在中国出现显然与伊朗语系游牧人入华有关。一般认为，广布中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创造者属于东

伊朗人，公元前12世纪至前8世纪末希腊和近东古代碑铭称其为“金麦里人”，尔后称“斯基泰人”或“塞人”。那么希罗多德关于斯基泰人用剑的记载（IV. 70）值得注意。他说：

> “斯基泰人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同别人举行誓约的。他们把酒倾倒在一个陶制的大碗里面，然后用锥子或小刀在缔结誓约的人们的身上刺一下或是割一下，把流出的血混到里面，然后他们把刀、箭、斧、枪浸到里面。在这样做了之后，缔结誓约的人们自身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当中最受尊重的人们便在一些庄严的乞求之后饮这里面的血酒。”[56]

希罗多德明确提到斯基泰人佩剑，那么斯基泰人歃血盟誓时也可用剑。这和希罗多德时代的波斯人以及后世匈奴人的歃血盟誓如出一辙。因此匈奴“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的习俗可能来自斯基泰人或更早时期的金麦里人。《汉书·匈奴传》记录的“径路”来自前斯基泰语是完全可能的。可惜金麦里人或斯基泰人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古代东伊朗人对“剑”的称谓，我们只能通过于阗塞语的 cälona（剑）来揣摩。我们之所以认为匈奴语“径路”来自东伊朗语，还考虑到以下材料反映的史实。

汉唐文献对来华经商或定居的印欧人称为“胡人”，如波斯人称作“波斯胡”，粟特人称作“粟特胡”。这些称谓显然本自先秦以来中原人对古代印欧人的传统称谓。战国末年成书的《穆天子传》提到中国西北有“犬戎胡”。周原甲骨有铭曰“其于伐獸（胡）侯”（H11：232），内容可与《史记·周本纪》周文王受命二年即“伐犬戎”相印证。[57]这说明文王时代胡人已达周之西土。春秋时期西北诸戎又深入中原。《左传·襄公十四年》记戎人之言：“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本文对剑词源的考证有助于说明《左传》的“诸戎”当包括印欧语系游牧人。

本文从考古和语言两个方面对中亚东部古代印欧人的行迹进

行了追踪。我们的初步结论是：青铜剑在商代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和巴蜀地区以及在周代传入中原应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

注 释

① 我们只查到周纬先生以此作为周人用剑之证，说见其《中国兵器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10－111页。

② 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59和362页。

③ 李零：《侠与武士遗风》，《读书》1993年第1期第19－20页。

④ 李零：《今注今译<秦本纪>》，收入《今注今译<史记>》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152页。

⑤ 李零：《中国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78－81页。

⑥ 陕西周原扶风文管所：《周原发现师同鼎》，《文物》1982年第12期第43－46页。

⑦ 李学勤认为此鼎系师同列鼎之一，所刻铭文仅是一篇完整铭文的后半部分，其前铭文当铸于师同列鼎另一个鼎上，但其前列鼎没有发现。说见李学勤：《师同鼎初探》，《文物》1983年第6期第58－61页。这个说法有道理，因为从戎人墩获来的100多件青铜器不可能只铸一鼎。

⑧ 李零：《“车马”与“大车”（跋师同鼎）》，《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第72－74和106页；李零：《古文字杂识（五则）》，《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7－274页。

⑨ 容庚：《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1－292页，第0698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1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9、95、107、135、147和169页。这些材料承蒙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帮助鉴别时代和国别，谨致谢忱。

⑩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

⑪ 曹锦炎等：《浙江省博物馆新入藏越王者旨於赐剑笔谈》，《文物》1996年第4期第4－12页。

⑫ 《方言》卷9：“锬谓之铍。”西周晚期开始流行的一种短剑式矛头往往有铭文，自称“铍”。《说文解字》：“锬，长矛也，从金，炎声。”故知锬是一种

矛头类似短剑的长矛。《汉书·匈奴传》谓匈奴人短兵为“铤”。颜师古《汉书》注曰：“铤，铁把短矛也。”故疑铤为矛头似短剑的短矛。这两种兵器产生年代略晚于剑。它们在形式上和短剑几乎完全一样，故在考古报告中常被研究者误作剑。如前引《殷周金文集成》第18卷第88页11577号著录了一把大攻尹剑，其铭曰：“大攻尹铤”。这两种兵器和剑唯一的区别是带銎，而剑一般没有銎。此外“铤”和“铗”的读音与“剑”相近，故疑它们是从短剑演变而来。此注所引文献为友人李零帮助查阅，谨致谢忱。

⑬ B. Karlgren, “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 *BMFEA*, 17, 1945, Pl.XXXII, 182－183.

⑭ 林寿晋：《论周代铜剑的渊源》，《文物》1963年第11期第50页。

⑮ 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第290－291页。

⑯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北方民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⑰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第325和328页，图二九和图版捌：3－8。

⑱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北方民族》，第10页。

⑲ 类型相似的一把鹿首刀曾在新疆哈密花园乡出土，参见穆舜英等：《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59及第3页图版说明。此页图版还有一把剑的局部照片，但无文字说明，不知是否和此刀同时发现。

⑳ 田广金和郭素新：《鄂尔多斯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0页。

㉑ 马玺伦、孔凡刚：《山东沂水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9年第11期第95－96页。

㉒ 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1993年，第326－328页。

㉓ 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收入上官鸿南、米士光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9页。

㉔ N.L. Chienova, *Proiskhozhdenie i rannyaya istoriya plemen tagarskoi kul' tury*, Moskva, 1967.（契列诺娃：《塔加尔文化部落的起源与早期历史》，莫

斯科，1967年）

㉕ 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第144和146页。

㉖ 标本1－4参见F. Hiebert and D. Killick, "Metallurgy of Bronze Age Margiana," *Information Bulletin*, Issue 19, Nauka, 1993, 186－204；标本5－7参见J. Hawkes, *The Atlas of Early Man*, 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1977, 125；标本8－9参见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第144页图六；标本11－12参见李肖、党彤：《新疆准葛尔盆地周缘地区出土铜器初探》，《内陆アジア史研究》1992年第7－8合刊第55页图版11和第65页图版019；标本13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第325和328页及图二九和图版捌；标本14－18参见蒙盖特著、潘孟陶等译：《苏联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1963年，第116页；标本19－20参见弗兰采夫主编、文运等译：《世界通史》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91页；标本21－22见O. Janse, "New Light on the Indo-Iranian or Western Asiatic Relations between 1700－1200B. C," *Artibus Asiae* 23, 1963, 312－332, figs. 23－24；标本23－24参见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研究》，《考古》1996年第9期第77页图一；标本25参见B. Karlgren, "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 *BMFEA*, 17, 1945, Pl.XXXII; 182－183；标本2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图版拾伍、1；标本27－28参见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图一、三；标本29－32参见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第136页图一和139页图三；标本35－37参见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第115页图十三；标本38－39参见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15页图九二；标本40－43参见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第252－253页图8－9及图版叁；标本44－46参见林寿晋：《论周代铜剑的渊源》，《文物》1963年第11期第53页图二；标本47－48参见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第144页图六。

㉗ C.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

gi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repr. in 1990); J. P. Mallory,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 Language, Archaeology and Myth*, New York, 1989 (repr. in 1992); 库兹米娜著作用俄文写作，题为《印度雅利安人来自何方》（莫斯科，1994 年），我还没见到原书，书评见 I.M. Diakonoff, "Two Recent Studies of Indo-Iranian Origins," *JAOS*, 115.3, 1995, 473－477。

㉘ 会议综述见徐文堪：《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民族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西域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77－85 页；康捷：《中亚东部青铜和铁器时代的居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费城举行》，《考古》1996 年第 12 期第 88－89 页。

㉙ F. Hiebert and D. Killick, "Metallurgy of Bronze Age Margiana," *Information Bulletin*, Issue 19, 1993, 186－204.

㉚ J. Hawkes, *The Atlas of Early Man*, 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1977, 125; A. U.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VII, London, 1938 (repr. 1967).

㉛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 5，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532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294 页。

㉜ 王博：《新疆近十年发现的一些铜器》，《新疆文物》1987 年第 1 期第 45－47 页；易漫白：《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第 26 页。该报告介绍古墓随葬品说："铜镞，四件，都是石棺墓出土，有三棱或扁平棱形等式，后一种较大而又薄如铜片，极为罕见，可能不是镞。"报告未附所述文物的图版，从文字描述看，这个"扁平棱形"、"较大而又薄如铜片"的物品很可能是柳叶剑残片。据吉谢列夫介绍，"在好几处安德罗诺墓葬中都有破碎的的锈铜片出土。可能其中会有'安德罗诺沃木椁墓'类型的树叶形薄短剑（特点是剑身近铤处较窄）而不曾认出，目前仅在阿尔泰以西的阿德罗诺沃墓葬中发现过这样完整的短剑。"参见吉谢列夫著、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 年，第 39 页。吉谢列夫所谓"安德罗诺沃木椁墓"类型文化的早期阶段现被划归奥库涅夫文化。克尔克齐的柳叶剑与奥库涅夫文化柳叶剑的形制基本相同。此外，以克尔木齐 M16 为代表的克尔木齐早期文化陶器群和墓葬形制均属于奥库涅夫文化。

㉝ 李肖、党彤：《新疆准葛尔盆地周缘地区出土銅器初探》，《内陸アジア史研究》1992年第7－8合并號第45頁及図版019。

㉞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68－469页。

㉟ 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第361－384页；《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份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第371－390页。

㊱ 穆舜英等：《新疆古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图版59及第3页文字说明。

㊲ 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研究》，《考古》1996年第9期第74－80页。

㊳ 《逸周书》卷4，乾隆丙午抱经堂本，第2－4页。关于武王克商之年，学界无定说。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册所附"大事年表"定为公元前1028年；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册所附"历史纪年表"定为公元前1066年。

㊴ 江上波夫：《徑路和師比》，《ユウラッ北方文化の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1948年。

㊵ 张永言：《径路与乌育》，《语言研究》，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3年。

㊶ W. Winter, 'Tocharians and Turks,' *Aspects of Altaic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PIAC held at Indiana University*, June 4－9, 1962 (UAS 23), Bloomington, 1963, 239－251.

㊷ F. Hirth, *Ahnentafe Attiaàs*, 223.

㊸ 白鸟库吉撰、何健民译：《匈奴民族考》，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收入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3页。白氏此文原题《匈奴起源考》，刊于 *Journal Asitique* 202, Paris, 1923；后更名《蒙古民族起源考》，复载于《史学杂志》1923年第18期。

㊹ H.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ol. V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9.

㊺ 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u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aic Series, vol. 69, Bloomington, 1968, 270.

㊻ 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s, 1974, 357.

㊼ 陈宗振等：《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

85 页，第 571 号。

㊽ 陈宗振等，前揭书，第 402－403 页，第 3560 号。

㊾ H.C. Melchert, "PIE 'dog' in Hittite?," *MSS* 50, 1989, 100, n. 5; JR. Don Ringe, *On the Chronology of Sound Changes in Tocharian*, vol. 1,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6, 63－64.

㊿ D.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2.

(51) Herodoti, *Historiae*, 2 vols., trans. by C. Hude, Oxford, 1926; 汉译本见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490 页和第 681 页"主要度量衡单位折算表"。本文引用时改动了几处汉译名，使之规范化。例如：王译波斯度量衡单位 pous 为"尺"，本文引用时改用其音译"普司"。因为译作"尺"容易引起误解。

(52) 第 2－5 号见 D.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2; 第 8 号参见《梵和》第 403 页；第 14 号参见 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u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aic Series, vol. 69, Bloomington, 1968, 270; 第 15－16 号参见陈宗振等：《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第 85 页，第 571 号；第 12—13、19—22 号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276 页。表中的阿尔泰语系诸语言读音材料承蒙新疆大学牛汝极和蒙语专家道布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53) I.M. Diakonoff, "The Median and Achaemenian Period," in I. Gershevitch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1－43.

(54) 林梅村：《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113－116 页；收入本书第一编。

(55) 林梅村：《狮子与狻猊》，见本书第一编。

(56) Herodoti，前揭书，第 292 页。

(57) 尚志儒：《西周金文中的㝬国》，收入王宗维、周伟洲编：《马长寿纪念文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13 页。

三　祁连与昆仑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这段关于月氏早期历史的记录出自博望侯张骞的报告，他于西汉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出访定居大夏的大月氏，回长安后向汉武帝讲述了上述历史事件。这些来自敦煌的月氏人在古希腊著作中被称为 To'kharoi，在古印度梵语文献中称为 Tukhāra，也即当代研究者所谓"吐火罗人"[1]。

正如考古发现和语言学研究所揭示的，吐火罗人的语言大概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它和公元前1900—前1450年间流行于小亚的一种印欧语系古语赫梯语（Hittite）的关系非常密切，如两者都用/r/作为中间语态的后缀，这一点和意大利－凯尔特语的语言特征十分类似。[2]印欧语系诸语言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这些特征可将它们归类为东、西两大语组。研究者惊奇地发现，吐火罗语虽然发现于东部语组 Satem 语分布区，但其语言特征却属于西部语组 Centem 语区。换言之，它和分布于东方的印欧语，如梵语、伊朗语等关系疏远，而和西方的印欧语，如德语、斯拉夫语，特别是意大利语极为接近。[3]吐火罗语的这些特点使其拥有"欧洲甲骨文"之称。

目前发现的中亚古文字写卷中已经分辨出吐火罗语的三种方言：1. 龟兹方言（或称吐火罗语 B）见于新疆库车龟兹遗址出土的 8—9 世纪婆罗谜文写卷、题记和文书；2. 焉耆方言（或称吐火罗语 A）见于新疆焉耆和吐鲁番一带古代遗址出土的 8—9 世纪婆罗谜文写卷和题记；3. 楼兰方言，未见完整的文献，但大量词汇保存在新疆楼兰和尼雅一带古代遗址出土的 3—4 世纪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中。[4]月氏人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文字材料，但许多月氏语词汇为中国史家记录，保存在汉文史籍中。这方面的研究长期为人们所忽略，但近年海内外学者开始重视汉文史籍中的月氏语材料，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讨论“祁连”和“昆仑”这两个与月氏语相关的词，以期推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

“祁连”一词历来被认为是匈奴语词，最近出版的《汉语大词典》仍沿用这个传统的说法。[5]其说本自唐代颜师古《汉书·霍去病传》祁连山注。文中说：“祁连山即天山，匈奴呼‘天’为祁连。”这个说法无疑是错误的。《汉书·匈奴传》明确记载：“匈奴谓天为‘撑犁’。”研究者早已正确指出，匈奴系突厥语系民族，所谓“撑犁”即表示“天”的突厥语词 tängrim（腾格里）。[6]显然，匈奴人称敦煌南山为“祁连山”并非本族语，而是根据当地居民对该山的称谓。敦煌是月氏人的故乡，那么，这个词应在月氏语，也即吐火罗语中寻找其源。

英国汉学家蒲立本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将“祁连山”的古音拟作 *gii-lien，并说：“真不可思议，已知的吐火罗语词中竟然没有表示‘天’的词，因此我没法提出该词的吐火罗语词源。大家应该注意到这个难点，即其汉语形式以浊音/g/起首，而已知的吐火罗语诸方言就没有这种词。但我们不能确定月氏方言一定也是这样。”[7]由于在已知的吐火罗语词汇中找不到表示“天”的词，美国汉学家梅维恒则另辟蹊径，他在其他印欧语词中寻找

音近的词，结果发现拉丁语的 caelum（天空，天堂）和汉语“祁连”音相近意相同，所以，他相信“祁连”应译自和拉丁语 caelum 同源的某个吐火罗语词。[8]

梅维恒的发现非常重要，正是这个发现帮助我们找到“祁连”一词的真正词源。我们知道，拉丁语的/c/相当于吐火罗语的/k/，例如：拉丁语的 centum（百）相当于吐火罗语 A 的 känt（百）和吐火罗语 B 的 kante（百）。因此，这个吐火罗语词应写得象 * kaelum。另一方面，我们从汉文史籍中还知道，吐火罗人称“天山”为“祁罗漫山”、“初罗漫山”或“折罗漫山”等，如《旧唐书·地理志》伊吾条云：“天山在州北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名析罗漫山。”[9]初罗漫之“初”当系“祁”字之误；折罗漫之折当系“析”字之误。上述材料不断提醒我们，这些译名无疑来自吐火罗语 A 的 klyom，在吐火罗语 B 中同一词写作 klyomo。该词在吐火罗语佛经译本中往往用来对译梵语的 ārya（神圣的、高贵的）。[10]这个问题我们从该吐火罗语词的词形变化可以看得更清楚：[11]

	1. 吐火罗语 A: klyom		2. 吐火罗语 B: klyomo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单数体格	klyom	klyomim	klyomo	klyomña
业格	klyomänt	klyominam	klyomom（-mont）	klyomñai
属格	klyomäntäp	klyomine	klyomopi（-montse）	
呼格			klyomai	
复数体格	klyomäs	klyominañ	klyomoñ	klyomñana
业格	klyomäñcäs	klyominäs	klyomom	klyomñana
属格	klyomäñcäśśc		klyomomts	
语干	klyomänt	klyomim	klyomont	klyomña
衍生的形容词	klyomso	(ñom) klum		
抽象名词		klyomne		

在吐火罗语中表示“山”的词是吐火罗语 A 的ṣul 和吐火罗语 B 的ṣale，这是个阳性名词。[12]因此，“祁连”一词似应译自吐火罗语阳性形容词体格单数 klom 和 klyomo 的早期形式 * kilyom-(o)，意为“圣天”。吐火罗语 klyom 和 klyomo 都是 8—9 世纪的形式，其早期形式应拟作 * kilyom（o），因为早期吐火罗语的/i/在晚期吐火罗语中往往失落。例如：早期吐火罗语楼兰方言的 kitsaits（长老）变成吐火罗语 B 的 ktsaitsaññe（老的），楼兰方言 tipara（高的）变成吐火罗语 A 的 tpar（高的）。[13]耐人寻味的是它的唐代译名“祁罗漫”和“析罗漫”。它们似乎译自该吐火罗语阳性形容词的语干形式 klyomänt 或 klyomom/klyomont＜早期的 * kilyomänt。

另一方面，“祁连”仅是该吐火罗语词的汉代译名，不见于先秦文献。有证据表明，商周以来月氏一直是西北地区最强大的游牧部落之一，并和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频繁往来。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很可能就是月氏人从新疆昆仑山贩至中原的。所以，《管子》屡次介绍说玉产自月氏附近的山，如《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地数篇》曰：“夫玉起于牛氏之边山”；《轻重乙篇》曰：“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正如王国维指出的，所谓“禺氏”和“牛氏”当即月氏，[14]而月氏附近这座山当即祁连山。《史记·赵世家》有一封苏厉替齐国写给赵惠文王的书信（约前 283 年）。信中说，假如秦国出兵逾勾注山，切断恒山一线，则“昆山之玉”不复为赵王所有。由此可知，祁连山在先秦时代称为“昆山”。昆山即昆仑山，在先秦文献中被视为产玉之地。那么，昆仑应是吐火罗语 * kilyom（o）一词最早的汉语译名。在古汉语中常不分/l/和/n/，即章太炎所谓“古音娘日二纽归泥”。[15]大概受 * kilyom（o）中/l/的影响，该词第一个音节 ki-被读成 kil-/kin-，所以译成了“昆”。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昆仑”大概是汉语词汇中最早的印欧语借词。

敦煌地处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交界，历来是东西方文化交织荟萃之地。它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做出过许多重要的贡献，祁连与昆仑词源的研究为说明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此文为1996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的中亚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古民族国际学术讨论会大会发言，又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英文稿见 *Lin Meicun*，"*Qilian Kunlun* * – *The Earliest Tokharian Loan-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in V.H. Mair* (*ed*), *The Bronze Age end Early Iron Age People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University of Pennsyiyania*, 1997。

注 释

① H.W. Bailey, "Ttaugara," *BSOS*, VIII, 1936, 883–921.

② H. Pedersen, "Hittite and Tocharian," *Language* 9, 1933, 13–34.

③ A. Meillet, "Le Tokharien," *Indogermanisches Jahrbuch* I, 1914, 1–19; D. Q. Adams,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AOS*, 104, 1984, 395—402.

④ E. Sieg, W. Siegling and W. Schulze, *Tocharisches Grammatik*,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31; T. Burrow, "Tokharian Elements in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RAS*, 1935, 667–675.

⑤ 罗竹风等编：《汉语大词典》卷七，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830页。

⑥ P. Pelliot, "Tängrim > Tarim," *TP*, 1944, 165–185.

⑦ E.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RAS*, 1966, 20–21.

⑧ V.H. Mair,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Place-Name 'Dunhuang'," 见李铎等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卷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2页。

⑨ 岑仲勉先生在史籍中共查到该词的六种写法，详见其《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7页。

⑩ E. Sieg und W. Siegling, *Tocharische Sparchreste*, *Sprache B*, Heft 1,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49, 118.

⑪ W. Krause u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I,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Verlarg, 1960, 153; idem, II, 99, 100 und 190.

⑫ 同上书，II，第150页；T. Burrow, "Tokharian Elements in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RAS*, 1935, 667－675。

⑬ 同⑫

⑭ 王国维：《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观堂集林附别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56－1157页。

⑮ 章太炎：《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历代汉语音韵学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5－185页。

四　吐火罗人与龙部落

公元前176年匈奴在蒙古草原突然崛起，击败昔日西域霸主大月氏人，迫使其西迁中亚。[1]为了寻找共讨匈奴的一个同盟军，汉武帝派使者张骞出访大月氏国。当这位汉使历尽艰辛终于在中亚大夏找到大月氏国时，月氏王已在中亚安居乐业，不愿回东方与匈奴搏战。张骞此行未能如愿以偿，但是他从中亚带回了许多前人所未知的西域地理和历史知识。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即取材于张骞的西域见闻录。张骞关于大月氏早期历史的介绍对本题非常重要。据司马迁的记录，择要摘录于下：

>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过宛（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费尔干纳），西击大夏（今阿富汗西北马扎里沙里夫）而臣之，遂都妫水（中亚阿姆河）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今甘肃西北），号小月氏。"[2]

张骞报告中的祁连、敦煌究竟在何处？这是寻找大月氏故乡的关键。汉代河西走廊西部有个敦煌郡。据陈梦家考证，元封四或五年（前107或前106年）汉朝才在敦煌设立郡县。[3]而张骞向汉武帝汇报西域风土人俗，事在元朔元年（前128年）。也就是说，张骞时代敦煌郡尚不存在。张骞从大月氏听到的"敦煌"究竟指什么地方实际上是个未知数。目前某些大月氏研究者，首先认定张骞报告中的"敦煌"就是汉代敦煌郡的"敦煌"，然后

求大月氏故乡。这个思路实际是以未知求未知。我们之所以至今不明大月氏西迁前究竟在何处游牧，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亚古代语言的最新研究揭示出，大月氏是讲吐火罗语的游牧人。根据这个重要线索，我们破译了大月氏故乡的一个地名，结果发现张骞说的“祁连山”根本不在汉代敦煌郡的“祁连山”（今甘肃酒泉祁连山），而在西域胡人所谓“析罗漫山”（今新疆东部巴里坤山）。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大月氏人的来龙去脉作了进一步调查，又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新发现。撰写此文，求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大月氏故乡的“祁连山”

中亚古代语言资料证明大月氏人讲吐火罗语，那么能被证明属于吐火罗语的地理名称才是大月氏人真正的故乡。我们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论证了张骞所说“祁连山”实际是西域胡人所谓“析罗漫山”。这个地名源于前吐火罗语（Proto-Tokharian）词汇，相当于吐火罗语 A 方言的 klomänt 和 B 方言的 klomon。在吐火罗语佛典中它与梵语佛教写本的 āryana（雅利安的、高贵的）对译，引申为“圣天”。那么天山是这个吐火罗语地名的汉语意译，祁连或析罗漫则是同一吐火罗语地名的汉语音译。[④]

大月氏西迁后，月氏故地被匈奴人占据，但仍有月氏残部留居中国西部，史称“小月氏”。因此小月氏活动地域对验证张骞报告中祁连山的地望至关重要。关于汉初小月氏牧地，《汉书·霍去病传》记载：

> “元狩二年（前 121 年）……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骑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票（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鲜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益封去病五千四百

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长……”⑤

居延系汉代名泽，《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据考古调查，居延泽就是今天内蒙古西部额济那河终点湖嘎顺诺尔，路博德所筑边塞当在此湖附近。⑥那么霍去病对匈奴作战的路线是：首先经过嘎顺诺尔湖，再到小月氏牧地，然后到祁连山。由此可见，大月氏故乡的祁连山必不是甘肃酒泉附近的祁连山，而指新疆天山东部某山脉。《旧唐书·地理志》伊吾条记载，“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名析罗漫山”。如前所述，汉代祁连山就是胡人所谓“析罗漫山”。伊吾州（今新疆哈密）北山正在居延之西。析罗漫山无疑即小月氏牧地附近的那座祁连山，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就在此地。

天山山脉自西而东横亘，将西域划分出南北两个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天山以南是戈壁沙漠，天山、昆仑山雪水形成的河流在戈壁沙漠中冲击出许多绿洲，新疆古代农人就在这些沙漠绿洲上开辟家园；天山以北则是草原地带，历来是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乐土。以前许多学者，包括我本人都试图在天山南麓或河西走廊寻找大月氏故乡，现在看来这个研究方向纯属南辕北辙。大月氏是游牧人，游牧人的故乡不可能在天山以南农耕地带。我们必须迷途知返，在天山以北草原地带寻找大月氏故乡。

关于唐代析罗漫山的地望，清同治年间在哈密发现的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碑提供了翔实的考古学证据。碑文说：

> “（姜行本）以贞观十四年（640年）五月十日，师次伊吾时（析）罗漫山，北登罴绀所，未盈旬月，尅成奇功。伐木则山林殚尽；叱诧（咤）则川谷荡薄。衝梯蹙□，百□冰碎；机桧一发，千石云飞……［贞］观十四年岁次庚子六月卯朔廿五日辛卯立。瓜州司法参军河内司马……”

姜行本碑原在新疆巴里坤伊吾军马场山北松树塘，和东汉任

尚碑以及裴岑纪功碑等同在一地。清同治年间哈密办事大臣文麟将其移入天山关帝庙，清末又迁至乌鲁木齐，现藏新疆博物馆。据敦煌唐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时罗漫山县北四十里，按《西域传》即天山也。绵亘数千里。其上有汉将窦固破呼衍王刻石纪念之碑。姜行本磨去旧文更刻新文，以赞唐德”。[7]据马雍1980年实地考察，姜行本在伊吾一共刻了两块碑。世人所传《姜行本碑》拓片乃姜行本于贞观十四年新刻；另一碑至今仍在巴里坤山南纵深峡谷焕彩沟一摩崖上，此地南距哈密绿洲约60公里。敦煌文献所说姜行本磨去汉碑而刻新碑即指此摩崖石刻。[8]既然唐代析罗漫山就是今天巴里坤山，大月氏故乡的祁连山必为今天新疆哈密以北60公里的巴里坤山。

既然巴里坤草原是大月氏故乡，这里的吐火罗语地名不可能只有“祁连”孤立的一个。就此问题我们作了进一步调查，结果在巴里坤地区的古地名中又发现两个吐火罗语地名。

其一，“巴里坤”一词本身就是吐火罗语词汇。《汉书·西域传》称巴里坤为“蒲类海”。据冯承均考订，现代地名“巴里坤”来自突厥语barkul。后一音节kul系突厥语，意为“湖泊”；[9]前一音节bar则相当于汉代文献的“蒲类”。从语音分析，这个地名源于吐火罗人对“水”的称谓，相当于吐火罗语A方言的wär（水）或B方言的war（水），引申为“湖”或“海”。[10]那么汉语地名“蒲类”当是吐火罗语东部方言wär（水、湖）的汉语音译。

其二，月氏人以擅长养马而驰名中外。公元3世纪粟特人康泰所撰《外国传》介绍说：“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也。”[11]哈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部地区著名的养马场，今天巴里坤草原仍有一个著名的养马场——伊吾军马场。从语音分析，哈密的古称“伊吾”实际就是吐火罗人对“马”的称谓，相当于吐火罗语B方言的yäkwe（马）[12]。那么哈

密的古称伊吾应是吐火罗语 yäkwe（马）的汉语音译。

天山东部吐火罗语古地名不断提醒我们注意，大月氏人的故乡就在新疆东部天山的巴里坤草原。

二、焉居与秦海

《穆天子传》是一部记录先秦西域地理的战国文献。该书卷1记载："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隧。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正如王国维所考，先秦文献的"禺知"就是后世文献的月氏，[13]但焉居于今何地史无明载。不过汉代文献提到祁连山附近还有一山，名曰"焉支山"，或写作"燕支山"。这个地名显然就是《穆天子传》所谓"焉居"。《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对燕支山作了如下记载：

> "（焉支）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祁连，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14]

《十道志》所引匈奴诗与此略有不同。其诗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祁连山，使我嫁妇无颜色。"[15]从不同版本的文献所记匈奴古诗的异文可知，燕支山就是焉支山。匈奴古诗将祁连、焉支两山加以区别，说明它们是天山东端两座不同的山脉。据现代地形图，巴里坤山以东天山东端还有一座高山，今称"哈尔里克山"[16]。这个地名来自突厥语，意为"黑山"。史载大月氏西迁后，讲突厥语的匈奴人才进入这个地区。突厥人对此山的称谓应来自更早时期的吐火罗语地名。吐火罗东部方言中表示"黑色"的词写作 arkent（= B 方言 erkent）[17]。显然，焉支山的"焉支"就是吐火罗语 arkent（黑色）一词的汉语音译。《穆天子传》的"焉居"亦源于此。那么《穆天子传》的"焉居

禺知之平”或指天山东端哈尔里克山以北“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的草原地带。

《穆天子传》成书年代约在魏襄王在位年间（前318—前296），由此推知，公元前3世纪月氏人已经以巴里坤山和哈尔里克山为中心，驰骋中亚草原了。大月氏西迁后，匈奴人进驻月氏牧地。霍去病和班勇先后与匈奴作战，将其驱逐出焉支山（哈尔里克山）和祁连山（巴里坤山），所以匈奴有失焉支、祁连两山之哀歌。[18]

按游牧人的习惯，他们要随季节变化而转换草场。所以月氏王必有南北两个王庭，北庭设在夏季牧场，南庭在冬季牧场。相对而言，巴里坤草原算是南方，似为月氏王南庭所在地。月氏王还应该有个北庭。月氏、乌孙西迁后，匈奴呼衍王进驻月氏故地。《后汉书·西域传》记东汉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张当上书曰：“北虏呼衍王常辗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并为抄寇。”大概因为呼衍王的南庭在蒲类海，北庭在秦海，所以张当说“呼衍王常辗转蒲类、秦海之间”。月氏王的南北两庭亦应如此。

《后汉书·班勇传》又载，顺帝永建元年（126年），班勇发诸国兵击败呼衍王，“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据马雍考证，枯梧河指今阿尔泰山南麓乌伦古河，秦海则指乌伦古河的终点湖布伦托海。[19]据现代地图，布伦托海南面还有一湖，今称“吉力湖”[20]。古汉语l和n不分，吉力可读“吉那”，而秦海之“秦”显然就是“吉那”之合音。于阗塞语地志钢和泰藏卷记天山以北某地有一名曰tsīrākyepä的古城。这个词的前一成分tsīrākyi相当于吐火罗语B方言的kerc(c)iyi（宫殿），后一成分apä相当于吐火罗语B方言的āpa（河），可引申为“海”[21]。那么秦海之“秦”实为月氏人对其王庭的称谓，月氏王的北庭在今阿勒泰的吉力湖由此而明矣。

三、大月氏如何从敦煌溃逃西方

本文开篇介绍张骞时代敦煌郡尚未设立，那么张骞报告中的“敦煌”想必是先秦文献中某个和“敦煌”读音相近的地名，所以被司马迁后来用汉代敦煌郡的“敦煌”来替代。先秦文献中唯有西域古地名“敦薨”与“敦煌”的发音最为接近。据《山海经·北山经》记载：“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樱栖，其下多芘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研究者或将敦薨山与甘肃西部的祁连山相联系，以为敦薨水相当于甘肃西部的党河，泑泽指罗布泊。这个说法基于历史上党河向西流入罗布泊的一个假说。事实并非如此。党河下游今称“疏勒河”，疏勒河向西流入新疆东端的榆树泉盆地形成终点湖。几万年以前疏勒河的这个终点湖或许曾与罗布泊连为一体，但历史时期此湖始终未与罗布泊连为一泽。[22]所以泑泽不可能指罗布泊。另一方面，乌孙、月氏都是骑马民族，他们的故乡必然在天山以北草原地带，不太可能在河西走廊或罗布荒原这样不适合养马的戈壁荒漠地带。

据汉代文献，天山北麓还有一个和敦煌发音相近的地名。《汉书·西域传》记载：“单桓国，王治单桓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胜兵四十五人。”《汉书·霍去病传》又载：“票（骠）骑将军涉钩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鲜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那么霍去病的作战路线是：首先攻陷祁连山，然后在单桓擒获匈奴单于“单桓王”，在酋涂擒获匈奴单于“酋涂王”。张骞原始报告中的“敦煌”和《山海经》的“敦薨”显然指《汉书·西域传》提到的这个“单桓”。

单桓国距离大月氏故乡祁连山不远，这个距离我们可以从

《汉书·西域传》对山北六国的记载推算出来。其文曰“蒲类国，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又说“单桓国，王治单桓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据此单桓在蒲类国以西五百一十里（8870－8360），前文已论证祁连山在蒲类国，相当于今天的巴里坤草原。那么单桓国当在今天新疆昌吉自治州境内。

张骞听到的大月氏故地名称“祁连”是个山名，那么大月氏故地的“敦煌”也应是山名。此山无疑即《山海经》所谓“敦薨之山”，单桓国亦应得名于此山。据《汉书·西域传》，单桓国位于祁连山所在地蒲类国以西五百一十里。据此推算，敦薨山必指天山东部最高峰博格达山。

敦薨山在月氏故土，应该是个吐火罗语地名。由粟特古书信可知胡人称“敦煌”为 δrw'n。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这个地名与“吐鲁番”一词实为同源词。[23]而“吐鲁番”一词在塞语地志钢和泰藏卷中写作 tturpamnä，在突厥语中写作 turpan[24]。根据以上几条线索，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敦煌”一词实乃前吐火罗语“高”字的音译，相当于吐火罗语 A 方言的 täprone（高）和 B 方言的 täprauñe（高）以及楼兰方言 diparona（高），[25]指高山而言。据《后汉书·西域传》，单桓东南 670 里有“孤胡国，王治柳谷，去长安八千二百里”。故先秦文献的敦薨之水或许指汉代柳谷。唐人称柳谷为“白水涧”，也就是今天吐鲁番的白杨沟。那么敦薨之水的终点湖泑泽应是白水涧的终点湖，今吐鲁番艾丁湖。[26]

我们的上述推论还可从文献对乌孙故地的记载得以验证。《太平御览》卷 165 引《十道志》曰：“庭州，前汉乌孙旧地，东与匈奴接，历代为胡虏所居。”[27]庭州正在今昌吉自治州，庭州治所就是吉木萨尔县城以北 10 公里的护堡子古城。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匈奴攻杀昆莫之父，及昆莫壮，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那么护堡子古城始建于汉初，“西

城”或为乌孙之王庭。突厥、回鹘从漠北迁入天山后亦在昌吉州营建王庭，故唐人称此地为“庭州”。凡此表明，月氏、乌孙故乡的“敦煌”就是《山海经》的“敦薨山”以及《汉书·西域传》所记山北六国中的“单桓”，其故地在今新疆昌吉州博格达山以北草原地带。[28]

据《史记·匈奴列传》，西汉文帝即位四年（前176年），收到匈奴冒顿单于的一封信。信中说：“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与夷灭月氏，尽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信文内容指匈奴老上单于（前174－前160年）向西域霸主月氏人发动战争，斩获月氏王首级，将其驱赶到西方，匈奴人从此称霸西域。楼兰在罗布泊地区，呼揭在阿尔泰山南麓，这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文献语焉不详的是月氏和乌孙在何处驻牧。本文的研究表明，右贤王西求月氏在祁连山（巴里坤山）、焉支山（哈尔里克山）、敦薨山（博格达山）东部、金微山（阿尔泰山）南麓秦海（吉力湖）之间广大草原地带；定乌孙在敦薨山西部以北草原地带（参见地图2）。

冒顿所谓“夷灭月氏”应指匈奴人斩获月氏王首级，将其头骨制成酒器一事。因为公元前176年爆发的匈、月战争中月氏人并没有被匈奴人彻底消灭。除“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外，月氏大部人马向西落荒而逃，途中洗劫了博格达山西部草原地带的乌孙部落。此役月氏人杀死了乌孙王难兜靡，月氏、乌孙两国由此结仇。洗劫乌孙以后，大月氏人继续向西溃逃，击败在伊犁河、楚河流域驻牧的塞人，并将塞人牧场据为己有。大月氏人在塞地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公元前130年，难兜靡之子猎骄靡为报杀父之仇向大月氏发动战争。在匈奴人的支持下乌孙击败大月氏人，将其从伊犁河、楚河驱赶到妫水（阿姆河）北岸。[29]不久大月氏人从妫水南下，入主大夏，建立大月氏国。从大月氏

迁徙的时间表看，张骞访问的大月氏国似在妫水北岸。据《汉书·西域传》，当时“大月氏国……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这个数字已是大月氏兵败乌孙后的人口数字。公元前176年从中国天山东部西迁中亚的大月氏人口绝不止这个数字。据《汉书·西域传》，“乌孙国……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月氏原有兵力显然不少乌孙这19万兵力。由于乌孙借助了匈奴的兵力才使乌、月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因而击溃月氏军队。以此推算，月氏原来的总兵力至少20万，估计月氏人口数字亦不少于乌孙的人口数63万。那么西迁中亚的大月氏人总数约80万人左右。

四、龙部落之谜

月氏人系“龙部落”的传说屡见于文献。敦煌写本《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记载：“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焉耆的吐火罗王族以龙为姓氏，于阗文和藏文文献亦称留居中国西部的小月氏为“龙家”。

研究者早就注意到吐火罗人对神的称谓与众不同。古代印欧语的神字梵文写作 deva（神），粟特文写作 βγ（神），而神字在吐火罗人A方言中却写作 ñäkte，在B方言中写作 ñkät；形容词形式是A方言的 ñäkci（神的）或B方言的 ñäkc(i)，ye（神的）。吐火罗人对神的称谓与其他印欧人对神的称谓没有任何词源关系。所以研究者至今不知吐火罗语的神字究竟指什么。我们最近无意中发现，吐火罗人所谓的神其实是龙。龙字在吐火罗语B方言中写作 nāge/ nāg（龙），在A方言中写作 nāke/nāk（龙），在楼兰方言中写作 nāga（龙）。[30]这些词形清楚地表明，吐火罗语神、龙两字为同源词。另一方面，月氏的族名“月”在汉语上古音中读作 ŋiwǎtzī。这个读音正相当于吐火罗语的 ñäkte/ñäkci

（神）或 nāge/ nāg（龙）。因此月氏很可能得名于该部落的图腾龙神。

月氏等西北游牧人对龙神的崇祀见于许多文献。《淮南子·要略》曰："操舍开塞，各有龙忌。"高诱注："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天地、鬼神"。《史记索隐》引崔浩注："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由此可知，"请龙"是胡人的宗教活动，举行这个宗教仪式的地点在笼城。

龙非世间所有，胡人崇祀的龙神究竟指什么值得深究。《周礼·夏官·瘦人》记载："乃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及执驹散马耳。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骒，六尺以上为马。"《论衡·龙虚篇》曰："世俗画龙之象（像），马首蛇尾。由是言之，马、蛇之类也。"《礼记·月令》又载："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路，驾苍龙。"[31]"八尺以上"大概指马背至地表的高度。《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战国时的一尺相当于 23.1 厘米，八尺则是 1.85 米。这种 1.85 米以上的高头大马显然不是矮小的蒙古马，必指来自中亚的高头大马。

《诗经·大雅·皇矣》提到周人有"是禋是祃"之俗，《皇矣》的"是祃"与《周礼·夏官·瘦人》所言"乃祭马祖"当指某种和马有关的宗教仪式。《汉书·匈奴传》记载："（韩）昌、（张）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诸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匈奴人举行的这种刑马祭天的宗教仪式疑即胡人所谓"请龙"。文献屡屡提到周人祭马的宗教活动大概类似于胡人这种刑马祭天的宗教活动。周人地近戎狄，因而有此胡俗。

值得注意的是，吐蕃人称马为"hrang"，这个读音十分接近汉语的"龙"。据李方桂 1940 年调查，台语中地支借词"午"读作 ngagx，所以瑞典汉学家包拟古将汉字"午"的原始汉藏古音

拟定为 nga/ngu[32]，古汉语不分 l/n，可知古文常用来表示马的地支“午”的读音亦接近汉语“龙”的读音。凡此表明，龙乃原始汉藏语对马的称谓。中原新石器遗址中普遍不见家马骨骼出土。[33]八尺以上的高头大马可能是月氏人最先驯养出来的，所以这个民族有“龙部落”之称。那么原始汉藏语“龙”的读音完全可能借自吐火罗语 nāge（龙）或 ñākte（神），实为月氏人对马或神的称谓。大月氏西迁不单是民族的迁移，还带走了“豢龙术”。由于龙在中原销声匿迹，中原人士不知龙为何物，于是将古史传说中的龙神化为神灵。直到汉武帝伐大宛，汉朝远征军从中亚带回汗血马，中原人士才终于再次见到龙。汉武帝称其为“天马”而不是龙，这表明汉代人已不清楚这些高头大马其实就是古史传说中的龙。

《诗经·商颂·殷武》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莫敢不来享，曰商是常。”由此可知，商朝的西土在其开国之初已达河西走廊氐、羌地区。《周易·既济》九三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事为近年考古发现证实。殷墟妇好墓所出玉戈刻有“卢方皆人戈五”（标本 580）六字，故知此戈为卢方贡物。[34]正如日本甲骨学家岛邦男所考，殷墟卜辞的卢方应在殷之西土。[35]《国语·周语中》记戎狄氏族曰：“卢由荆妫。”韦昭注：“卢，妫姓之国。”由此可知，卢方与鬼方同族，姓妫姓，那么向高宗妃子妇好纳贡的卢方就是高宗所伐鬼方。

随武王伐纣的西土八国中有泸国，殷墟卜辞的“方”指殷朝周边的城邦国家或游牧部落。所以泸国就是武丁时期的卢方。武王克商得胜后，周公向西土八国酋长论功行赏，他在《尚书·立政》中将八国酋长统称为“夷、微、卢蒸”。孔颖达疏：“蒸训众也。”孔疏未尽其义。实际上“蒸”是中原人对胡人的称谓。这个称谓在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写作“真”。秦律把中原的华夏族人士称为“夏”，非华夏人则称“真”。秦律还严格规定：

如果真、夏通婚，只有当母亲是华夏人，后代才能叫“夏子”；否则，其后代只能叫“真”。[38]卢方为妫姓，其酋长被周公称作“蒸”，所以卢方必为胡人部落。既然如此，卢方应该是汉代的卢水胡。据周一良和唐长孺考证，卢水胡是大月氏西迁后留居中国西部的残部“小月氏”。[39]由此可知，殷代卢方实为吐火罗系统的月氏人。[40]那么向殷王之妃妇好纳贡的卢方驻牧何处值得深究。

《尚书·牧誓》孔传注西土八国曰：“卢、彭在西北。”殷末周国西北相当于汉代安定郡和北地郡。据《汉书·地理志》，安定郡三水县有“属国都尉”。属国就是汉朝为少数族设立的区县。《后汉书·卢芳传》记载：“卢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卢芳姓卢，应是卢水胡人士。故知汉代三水县所立属国是为当地卢水胡设立的属国。汉代三水县的卢水胡与殷代卢方、周初的卢国显然一脉相承，《水经注》卷2记载：“三水县故城，本属国都尉治……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安定郡治高平，即今宁夏固原。其西340里即今宁夏三水县。据调查，汉代三水县故址就在宁夏同心县下马关乡北红城水古城。[41]那么高宗所伐鬼方以及向高宗妃子妇好纳贡的卢方或在今宁夏三水县。如果我们的推测不误，武丁时期月氏人向东已达宁夏同心县下马关乡一带。

吐火罗人在宁夏的活动亦见于其他文献。例如：《逸周书·史记解》记载：“昔者义渠氏有两子，异母皆重，君疾，大臣分党而争，义渠以亡。”《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殷王武乙“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前659－前620）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这三条文献提到的义渠疑为吐火罗人。据前文讨论，哈密的古称“伊吾”源出吐火罗人对“马”的称谓 yäkwe。而义渠的读音和吐火罗人对马的称谓 yäkwe 几乎完全相同，两者必有联系。殷墟卜辞多次提到殷之西土有马方，大概就是指出没于泾、漆以北草原地带的义渠。[42]

《汉书·地理志》北地郡载："泥阳，莽曰泥阴。郁郅，泥水出北蛮夷中。有牧师苑官。莽曰功著。义渠道，莽曰义沟。"汉代的道也是为少数族设立的区县。北地郡的泥水即今甘肃庆阳的马莲河流域。北地郡西北即卢方居地宁夏同心县。那么义渠和卢方的相邻，它们或许是从同一吐火罗部落分化出来的，汉代分属三水县属国都尉和北地郡的义渠道。

卢方或卢水胡没有随月氏主要部落西迁，或表明他们不属于月氏王族。月氏王族应是龙族，可能就是殷墟卜辞多次提到的"龙方"。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一件屈体龙玉雕，为研究公元前13世纪中国龙的形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果把它和妇好墓所出龙首曲茎刀（或称鹿首刀）相比较，不难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41]这两件以龙为题材的文物或为月氏人贡物。70年代新疆哈密盆地发现了和殷墟妇好墓所出形制完全相同的一把龙首刀，[42]发现地点十分接近月氏王族活动中心巴里坤草原。这个发现提醒我们注意，殷墟妇好墓的龙首刀可能来自哈密附近的龙部落。

以上四节是我们最近对月氏历史地理与文化所作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本文提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仍不令人满意，但我们还是想提出来，供海内外研究者讨论，以期在不远的将来彻底揭开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龙部落之谜。

原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

注　释

① 关于大月氏西迁的时间，一般根据西汉前元四年匈奴单于冒顿写给文帝的书信断在公元前176或177年。此信见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

② 《史记·大宛列传》所引。

③ 陈梦家：《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0页。

④ 林梅村：《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13－116页；又见

本书第一编。

⑤ 《汉书·雷去病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480－2481页。

⑥ 陈梦家：《汉居延考》，《汉简赘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1－225页。

⑦ 羽田亨：《唐光啟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上册，1957年。

⑧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2－23页。

⑨ 冯承均：《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页。

⑩ W. Krause a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II,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Verlarg, 1964.

⑪ 《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引。

⑫ W. Krause a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II,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Verlarg, 1964, 224.

⑬ 王国维：《鬼方昆夷严狁考》，收入《观堂集林》卷13。

⑭ 《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09页。

⑮ 沈德潜（选）：《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标本点，1963年，第98页。

⑯ 这是个突厥语地名，意为“黑山”。显然是中亚突厥化之后新起的名字。

⑰ W. Krause a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II,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Verlarg, 1964, 79.

⑱ 美国伊朗学家劳费尔将焉支山的“焉支”与汉语“胭脂”相联系（见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2页），实属望文生义。

⑲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第19－21页。

⑳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8年，第151页。

㉑ W. Krause a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II,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Verlarg, 1964, 186.

㉒ 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10页。

㉓ V.H. Mair,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Place-Name ‘Dunhuang’,” 收入李铮等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01－954页；J. Harmatta, “Origin of

the Name Tun-huang," in A. Cadonna (ed.),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Orientalia Venetiana IV, Firenze: Leo S. Olschki Editore, 1992, 15－20.

㉔ H.W. Bailey, "Ttaugara," *BSOS*. VIII, 1936, 885－888.

㉕ W. Krause a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II,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Verlarg, 1964, 104; A. M. Boyer et al., *Kharosthi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II, Oxford, 1929. 据比利时学者伊色贝尔博士考证，吐火罗语名词后缀-one/-auñe来自东伊朗语，如粟特语的-īnō，于阗塞语的-uña-，说见 L. Jsebert, *De indo-iraanse bestanddelen in de Tocharische woordenschat*, *Leuven*, 1980, v－vi.

㉖ 关于白杨沟和艾丁湖的地理情况，参见王炳华：《吐鲁番的古代文明》，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9－215和第216－226页。

㉗ 《旧唐书·地理志》与《通典》卷174庭州目所记略同，不俱引。

㉘ 关于乌孙西迁前的牧地，学界尚无统一意见。关于乌孙故地在北庭问题，孟凡人所论最详，说见《北庭史地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

㉙ 参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两书的《匈奴传》等。

㉚ W. Krause a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ybuch*, *Band* II, Heildelberg, 1964, 194 und 203.

㉛ 阮元等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861和1363页。

㉜ 包拟古著、潘悟云和冯蒸译：《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其中藏语对"马"的称谓见第27页，原始汉藏语的地支"午"的读音见第83页。

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94－196页。

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31和135页。

㉟ 島邦男：《殷の方國》，《殷墟卜辭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75年。

㊱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5页，第176－178页；李零：《西周金文中的职官系统》，收入吴荣增编：《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6年，第211页。

㊲ 关于卢水胡即小月氏，参见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55页；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403－414页。

㊳ 关于月氏人即吐火罗人，参见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10页。

㊴ 鲁人勇等：《宁夏历史地理考》，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31页。

㊵ W. Krause a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ybuch*, Band II, Heildelberg, 1964, 224.

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第71页。类似龙首刀亦在山西保德晚商墓葬出土（参见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第63页及图版陆），或表明这种刀的传播路线是从哈密，经过晋北，传入殷都大邑商。

㊷ 新疆考古研究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59。

五　狮子与狻猊

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示吉祥的瑞兽。贞观年间，唐太宗讨平西突厥，在中亚广设羁縻州，大唐帝国的版图直抵波斯境域。于是康国、米国、吐火罗国、波斯、大食、拂林等西域诸国纷纷向唐朝称臣纳贡，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献狮。此后，狮子成了中国文人墨客和艺术家极力讴歌的对象，如唐太宗曾命虞世南作《狮子赋》，李白留下“黄金狮子乘高座”的诗句，唐宫廷画家阎立本创作了“西旅贡狮图”和“职贡狮子图”两幅名画。[1]后来，狮子又从中国宫廷走向民间，产生了“狮子舞”等，至今仍是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然而，中国历史上并不产狮子，这种猛兽产于非洲和西亚。狮子之所以能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归功于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狮子，猫科大型动物。俗呼之‘百兽之王’，从古就是人们熟知的野兽之一。从前分布在非洲、欧洲和亚洲，但现在仅生存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狮子肌肉发达，体强，身长，腿短，头大。个头大的雄狮连尾全长约 3 米，肩高约 1 米，体重约 230 公斤。雌狮较小。狮毛短，浅黄色至深褐色，尾尖有一丛毛，颜色深于其余部分。鬃毛为雄狮特有……”[2]如今狮子在亚洲已濒临绝迹。这里说狮子生活在亚洲，当指狮子过去生活于南亚和西亚，即古代西域地区。

古代中国对狮子有多种称谓，这为我们研究这种猛兽入华途

径提供了重要线索。在中国史籍中，狮子始见先秦文献，但当时不叫狮子，而称“狻猊”。《穆天子传》卷1说：“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此书出自战国墓汲冢，所以，战国时代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已经知道狮子。《穆天子传》这段文字有阙文。从上下文看，原文大概是说，著名的野兽用四足可奔跑千里。狻猊奔跑……里，野马奔跑五百里。《太平御览》卷889兽部引《穆天子传》说：“狻猊日走五百里。”这段引文对《穆天子传》阙文作了补充，不知有何根据。另一部先秦文献《尔雅》对狮子作了进一步的描述。该书《释兽》说：“狻麑如虦猫，食虎豹。”虦猫即虎，就是说，狮子样子长得像虎，但能吃掉老虎和豹子。关于狮子的产地，先秦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穆天子传》讲的是周穆王西游的故事，似乎有助于说明狮子来自西域。

研究先秦时期狮子入华途径的另一条线索是“狻猊”一词的词源。据刘正琰等人研究：“狻麑，狮子。又作‘狻猊、夔麑、尊耳、组麑’。源梵 siṃha，一说粟特 šrγw，šarγs，一说巴比仑 UR。”[3]美国汉学家谢弗讨论了“狻猊”一词的古音。他说：“这个词的读音相当于 * suangi，这是在公元前由印度传到中国的一个词。”他还在注中进一步解释：“这个词在古汉语中的发音为 * suân-ngiei，上古汉语的发音是 * swân-ngieg。”[4]这些解释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如所周知，梵文 siṃha 随佛教传入中国，在汉译佛经中译作“师子”或“狮子”，从未见到哪部佛经把该词译成“狻猊”。粟特语的 šrγw 很好地解释了狻猊之“狻”，但不能解释狻猊之“猊”。至于巴比仑的 UR，这个楔形文字显然与汉语“狻猊”风马牛不相及。或以为狻猊来自波斯语 šēr。[5]可是，这个词属于9世纪以后新波斯语词汇。其说亦不足取。那么狻猊究竟从何种语言进入汉语词汇的呢？我们认为该词应来自塞语。

所谓“塞语”，或称“斯基泰语”，系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

朗语组中的一种古老的方言。它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使用的语言。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对这个民族有颇为丰富的描述。据考古调查，斯基泰人创造了广布欧亚草原的“库尔干（Kurgan）文化”。所谓“库尔干”是俄语中波斯语借词，意为“古坟”。创造库尔干文化的人是半游牧民族，有比较先进的的武器，采用竖穴式墓坑，饲养马匹，较早使用战车，也有农耕，社会组织采用父系制。这种文化的分布从黑海地区到北高加索，直至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一般认为，库尔干文化的创造者就是古希腊作家提到的“斯基泰人”。70年代金布塔斯提出原始印欧文化起源于库尔干的理论。[6]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库尔干文化是最早的印欧人文化之一。

在中国史籍中，斯基泰人被称作“塞人”，始见于《汉书·西域传》。不过，先秦时期塞人大概已经入居天山南北的伊犁河、喀什噶尔河、和田河及克里雅河流域。有人认为，天山东部的古代游牧民族乌孙当属于塞人的一支，那么先秦时期斯基泰人在东方的分布很可能已达哈密盆地。[7]

虽然塞人广布欧亚草原，但只有塔里木盆地于阗（新疆和田河流域）和疏勒（新疆喀什噶尔河流域）两地的塞人留下了文字资料。据英国语言学家贝利研究，于阗塞人称狮子为 sarau。该词的形容词形式作 sarvanai；抽象名词作 sarauna。[8]所以，我们认为汉语“狻猊”大概来自塞语表示狮子的词 sarvanai（形容词）或 sarauna（抽象名词）。

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与古代于阗塞人的经济文化联系早在商周时代业已开始。1973年安阳殷墟发现的商王武丁的妃子妇好墓出有产自昆仑山的于阗玉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史实。[9]遗憾的是，于阗考古尚未全面展开，目前尚未在新疆和田发现带有狮子图案的先秦文物。不过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墓地以及天山东部的塞人墓地相继发现带有狮子图案的先秦文物。1983

年在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畔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一个“高足承兽方盘”，盘上的对兽表现的正是狮子形象。类似的方盘还见于中亚七河流域发现的塞人墓地。因此，研究者推测这是一批先秦时期的塞人文物。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这件表现狮子的艺术品大概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狮子形象。[10]1975—1976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东口发掘了四座竖穴木椁墓，这些古墓都是用石块和卵石垒砌，属于欧亚草原广为分布的所谓“库尔干文化”。由此可知，塞人文化在先秦时期已经分布到天山东部。值得注意的是，阿拉沟战国墓也发现了一件带有对狮的“高足承兽方盘”，与之共出的还有狮子纹金箔饰件（参见彩版2）。据^{14}C年代测定，其年代约在距今2345—2040年。[11]此外，俄罗斯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发现的战国时期塞王墓中有许多狮子纹饰。和这些狮子图案共出于巴泽雷克古墓的还有许多中国文物，如四山纹铜镜、丝绸和漆器等，可见先秦时期中原与塞人经济文化交流之一斑。[12]这些证据无疑有助于我们提出的“狻猊”一词源于塞语的推论。

“狻猊”一词在汉唐文献中仍然使用，但一般用于诗歌或见于辞书。例如：张衡《西京赋》：“掳狒猬，批窫狻。”许慎《说文解字》曰：“麑，狻麑，兽也。”又曰：“狻，狻麑，如虦猫，食虎豹。从犬，夋声，见《尔雅》。”

西汉初年，中国对狮子有了新的称谓“师子”。该词首见于《汉书·西域传》。文中说：“乌弋山离国，王［治乌弋山离城］，去长安万二千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扶拔之讹）、师子、犀牛。……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

得安息。”所谓“师子”即现代汉语的“狮子”。不过，西汉文献中“狮子”一词也有现代这种写法，如荀悦《汉纪·武帝纪》卷3云：“乌弋国去长安万五千里，出狮子、犀牛。”不过，狮子在西汉时期尚不多见。《三辅黄图·宫》记汉长安城奇华宫附近兽圈内有师子、大鸟，即来自西域的狮子和鸵鸟。80年代初，汉元帝渭陵寝殿遗址内出土了玉狮子、玉辟邪等一批玉雕（《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1976年苏州虎丘出土有河平元年（前28年）铭文的辟邪形铜座。或以为其上有一带翼狮子。[13]

关于“狮子”或“师子”的词源，刘正琰等人解释说：“源东伊兰 šē，šī。一说来自伊兰，一说来自波斯 šēr（shír），一说来自粟特 *šrγw，šarγe，一说即‘狻猊’，来自梵文 siṃha。一说即‘酋耳’，来自巴比仑 UR。”[14]其中来自梵文的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但从汉梵对“狮子”这个词读音的差异看，汉语“狮子”一词似乎不是直接来自梵语 siṃha。

1933年，德国梵学家吕德斯发表过一篇重要论文。他发现汉语“狮子”一词应来自吐火罗语。吐火罗语有甲乙两种方言，或称A方言及B方言。在A方言里狮子被称作 śisäk，相当于B方言的 ṣecake。吐火罗语A方言表示狮子的词和汉语表示狮子的词在发音上极其相近，所以，吕德斯怀疑汉语“狮子”很可能来自吐火罗语A方言 śisäk，而后者来自梵语 siṃha。[15]这个说法现为学术界普遍采纳。[16]

吕德斯的建议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汉书·西域传》中的“师子”是汉朝使者在乌弋山离或毗邻地区听到的并记录下来的。这个地区怎么会流行吐火罗语A方言的呢？有证据表明，从中国“敦煌”西迁大夏的大月氏人是讲吐火罗语的。我们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论证了月氏人原始故乡祁连山脉的名称“祁连”即吐火罗语表示“圣天”的词，相当于A方言的 klyom 和B方言的 klyomo，从而进一步证明月氏语实际是一种吐火罗语方

言。[17]月氏人家乡“敦煌”在吐火罗语A方言流行的吐鲁番盆地之东，所以月氏语应该接近吐火罗语东部方言A方言。那么“狮子”一词很可能是借自吐火罗语月氏方言中某个表示狮子的词。

东汉以后文献有关狮子的材料日益丰富。许慎《说文解字》说：“虓，一曰师子。”《后汉书·西域传》说：“前汉使者皆自乌弋以还，罕有至条支者也。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齎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又曰：“条支国……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条支指叙利亚，安息指伊朗高原，大秦指罗马帝国，包括其在北非的东方行省埃及。

公元87年西域使臣开始向中国皇帝进贡活狮子。《后汉书·章帝纪》记章和元年（87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国……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鸟。”又载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疏勒王）臣磐复献师子、犎牛”。

《东观汉记》对狮子作了非常具体的描述。其文曰：“阳嘉中，疏勒国献师子、犎牛。师子形似虎，正黄，有髯彤，尾端茸毛大如斗。”

据文献记载，东汉年间中原开始流行狮子石雕艺术。《水经注》卷20坂水条引《续述征记》曰：“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东乡浮图也。坂水迳其南，汉熹平（172—178年）君所立，因葬之第，刻石树碑以进厥德，隧前有师子、天鹿，累博作百达柱八所，荒芜颓毁，凋落殆尽矣。”文中所谓“师子”当即狮子，这是传世文献记录的最早的狮子石雕。这座石狮子立于佛

寺前，那么狮子石雕大概是随佛教东传而进入中原的。[18]这门艺术进入中原后更多地被用于墓前镇墓。山东嘉祥县东南武氏祠石阙前发现了年代更早的一对石狮，左右对立，长约四尺六寸。石阙前有《武绥宗使石工造碑》（参见插图 4）。其铭曰："建和元年（147 年），大岁在丁亥，三月庚戌，四日癸丑，孝子武使公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陛子，直四万……"[19]碑中所谓"陛子"即狮子。东汉时期和狮子有关的文物也大批被发现。新疆尼雅东汉墓曾出土带有狮子图案的棉布残片，汉代画像石中有许多狮子题材，如四川新都王稚子二阙的画像石中就有狮子和大象。

插图 4　东汉建和元年《武绥宗使石工造碑》

有关狮子的碑文（局部）

魏晋时期中国学者开始知道，狮子就是先秦文献所说的"狻

猊”。郭璞注《穆天子传》曰：“狻猊，师子，亦食虎豹。”郭璞注《尔雅·释兽》曰：“（狻猊）即师子也，出西域。”狮子还在这个时期从中国传入了日本。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镜铭曰：“新作明竟，幽律三刚，配德君子，清而且明，铜出徐州，师出洛阳，雕文刻镂，皆作文章，左龙右虎，师子有名，服者大吉，长宜子孙。”[20]

从以上讨论中不难看到，中国文明是在和外来文明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汉语外来语“狮子”和“狻猊”的词源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注 释

① 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92－195页。

②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7，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42页。

③ 刘正琰等：《汉语外来词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329页。

④ 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⑤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50页。

⑥ M. Gimbutas, “The Beginning of the Bronze Age in Europe and the Indo-Europeans: 3500－2500 BC,” *JIES* 1, 1973, 163－214; “The Kurgan Wave 2 (c. 3400－3200 BC) into Europe and the Following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JIES*, 8, 1980, 273－315.

⑦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69页。

⑧ H.W.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421.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19页。

⑩ 穆舜英和王明哲：《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页。

⑪ 王炳华：《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第18－

22 页；这两件文物的彩色图版见穆舜英和王明哲：《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图版第 117 和 118 号。

⑫ 蒙盖特著、潘孟陶等译：《苏联考古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1963 年，第 138－147 页。

⑬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68 页。

⑭ 刘正琰等：《汉语外来词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年，第 315 页。

⑮ H. Lüders, "Zur Geschichte des Ostasiatischen Tierkreises," *SBAW*, 1933, 998－1022, see also *Philologica Indica*,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40, 727－751.

⑯ 关于吐火罗语"狮子"一词的讨论见 E.C. Polome, "Some Comments on the Etymology of Vedic siṃhah 'lion'," *Hanjamana*, ed. by Subhadra Kumar Sen, Calcutta, 1989, 24－25; D.Q. Adams: "Tocharian A *śisäk*, B *ṣecake*, and the Proto Indo-European Word for 'lion'," *Zeitschrift fu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97, 1984.

⑰ 林梅村：《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113－116 页，又见本书第一编第 3 章。

⑱ 新疆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年，图版三五。

⑲ 录文见阎文儒：《关中汉唐陵墓石刻题材及其风格》，《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 3 期第 95 页。

⑳ 录文见孔祥星和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132 页。

六　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

天禄、辟邪是中国古代艺术中颇为流行的两种灵兽。东汉年间，天禄、辟邪形象的石雕开始流行于中原。它们一般刻有双翼，而且成对出现，作为宫廷建筑物装饰或立于墓前镇墓。“天禄”和“辟邪”两词均系古汉语固有词汇，前者语出《尚书·大禹谟》“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后者语出《急就章》“射魅辟邪除群凶”。然而这两只灵兽的艺术形象却具有显著的西域文化艺术特征，其动物原形也都是根据西域动物塑造出来的。这就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文化艺术交流提供了实例，可惜未见有人详考其事。故撰此文，试述其来龙去脉，容有不当，还望博雅者见谅。

天禄，又称“天鹿”，其艺术原形来自西域动物“扶拔”。这种动物始见于《汉书·西域传》，但误称为“桃拔”。文中说：“乌弋山离国，王［治乌弋山离城］，去长安万二千里。不属都护……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这段文字中“王”字之后明显有脱文。西域诸国或以都城之名作为国名。例如：《汉书·西域传》记载：“疏勒国，王治疏勒城”；

"精绝国，王治精绝城"；"且末国，王治且末城"。以此推之，乌弋山离国的首都当称"乌弋山离城"。研究者已正确指出，"乌弋山离"应当译自古希腊语 Alexandria（亚力山大），所以，乌弋山离城应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雄主亚力山大远征中亚时建造的一座希腊移民城市。

据文献记载，东方各地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有70多座，目前考古发现的亚历山大城已达40多座。希腊移民在这个时期大批移居中亚和北印度。据法国考古团60年代的调查发掘，亚洲最东部的亚力山大城一直建到了阿富汗的东北边境昆都士城东北的阿伊哈奴姆。此后，中亚新统治者的希腊文化艺术逐渐与大夏等地传统的波斯文化艺术相融合，形成所谓"大夏希腊化艺术"。亚力山大在东方建造的希腊移民城镇均被称为"亚力山大城"。乌弋山离城是哪座亚力山大城呢？《后汉书·西域传》又载，乌弋山离，"一名排特"。据此，英国希腊史和中亚史家塔恩认为，建于排特的这座亚力山大城当即希腊罗马地理学家所说中亚古城 Prophthasia，故址在今阿富汗西境法拉。[1]其说现已为学界普遍接受。[2]乌弋山离是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南道的终点，汉使稀至。所以这里及以西地区在当时中原人心目中变得非常神秘，其动物亦被神化为灵兽。

《汉书·西域传》所谓"桃拔"显然系"扶拔"之讹误。因为文献提到西域使者所献珍禽异兽仅有"扶拔"，而无"桃拔"。《后汉书·章帝纪》记章和元年（87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扶拔或称"符拔"。《后汉书·西域传》又载："安息国……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关于符拔是否有角，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孟康之说与范晔的说法不同。孟康说："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据中国历史博物馆孙机考证，孟康关于符拔有角之说是正确的。汉代铜镜或铸有带角的灵兽，并有题铭称其

为“天禄”。不过，据汉镜题铭，双角者当为天禄，独角者才是辟邪。[3]既然符拔是生长于中亚希腊化王国的某种动物，那么它的名称或源于古希腊语。据法国汉学家沙畹考证，符拔一词译自古希腊文 boubalis，即“叉角羚”。[4]他对“符拔”的词源考证和汉代考古资料以天禄为双角兽不谋而合。

叉角羚（antelope）和羚羊一样属于偶蹄目牛科动物。虽然两者都是羚羊，但叉角羚和我们熟悉的蒙古草原上的羚羊（gazelle）不一样。叉角羚多分布于非洲和欧亚大陆，其中非洲巨大的角斑羚肩高 1.75 米。雄兽都具有独特的向后弯曲的角，雌兽仅少部分有角。[5]天禄形象的塑造大概就仿自这类西域叉角羚。

如果天禄的原形是西域叉角羚，那么，独角兽辟邪的原形则可能来自另一种西域动物。前引《汉书·西域传》提到和符拔共同生活于乌弋山离国的西域动物还有犀牛。所以，辟邪的动物原形或许是西域犀牛。犀牛属于奇蹄目犀科有蹄兽类动物，栖身于非洲东南和亚洲热带地区。犀牛吻生有一或两个角，现代苏门达腊犀体长 2.5 米，肩高 1.5 米，而现代印度巨犀长达 4.3 米，肩高 2 米。[6]古代中国本来有犀牛。例如：《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国语·楚语》说：“巴浦之犀、犀、兕、象，其可尽呼。”《山海经》共 11 处提到“犀”，并说其“状如牛而黑”。近年河北平山县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错金银青铜犀牛。[7]但是汉代文献似乎很少提到当时中原有犀牛，而外国使臣常把犀牛作为珍品进贡中国皇帝。《汉书·平帝纪》记载：“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东观汉记》又载：“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献白雉、白犀。”黄支乃印度南部建志补罗，[8]日南在今越南。这个现象似乎表明大概到汉代犀牛已经在中原绝迹。[9]另一方面，天禄辟邪石雕往往做成带翼兽的形象，这是典型的西域艺术风格。上世纪末在大夏故地发现的公元前 5 至前 2

世纪阿姆河宝藏中屡屡见到装饰带翼兽的文物。据考证，这些翼兽表现的是火祆教神祇，其产生和琐罗亚斯特教流行大夏有关。[10]我们怀疑这种带翼犀牛，和天禄一样，其原形亦模仿西域动物。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以前中国已开始用石犀牛镇妖辟邪。《太平御览》卷890引《蜀王本纪》曰："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牛五枚。二枚在府中，一在市南下，二在渊中，以压水精，因曰石犀里也。"李冰系战国晚期秦国人，可知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已开始用犀牛石像作为辟邪的灵兽。李冰制作的这五个石犀牛目前尚未发现，不知是否为本地犀牛。不过，战国文献似乎已经不太清楚犀牛为何物。《尔雅·释兽》说："犀，似豕。"就是说犀牛长得像猪。这个解释显然风马牛不相及，或表明当时犀牛已经濒临绝迹。如果李冰时代犀牛已在中国绝迹，那么，这五个石犀牛形象很可能也来自西域。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归来向汉武帝汇报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见《史记·大宛列传》）由此可知，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大夏和蜀已经有了民间贸易往来。既然四川的蜀布贩运到身毒后，可转运到大夏，那么，大夏琐罗亚斯特艺术随两地贸易传入巴蜀则是完全可能的。以犀牛为灵兽辟邪的传统一直沿袭到东汉。1952年在徐州茅村发现的汉墓前室门额刻有左青龙、右白虎和独角犀。[11]此独角犀似即辟邪。

用天禄镇宅、镇墓较辟邪晚。《后汉书·张让传》记载：张让令人修缮洛阳宫室，"又铸天禄、瑕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同书《灵帝纪》亦载此事。文中说：中平三年（186年）春，"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瑕蟆"。李贤注曰："天禄，兽也……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

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据此，即天禄、辟邪并兽名也。汉有天禄阁，亦因兽以立名”。天禄阁是汉高祖创建的皇家图书馆。其曾孙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原人才从张骞及其副使的报告中得知天禄的艺术原形扶拔为何物。天禄阁大概根据所谓“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取名，不一定得名于灵兽天禄。宋欧阳修《集古录》卷3《后汉天禄辟邪字》对宗资石兽亦有记载。文中说：“右汉天禄辟邪四字，在宗资墓前石兽膊上……墓前有两石兽，刻其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此外，赵明诚《金石录》卷15记录了另一对汉代天禄辟邪石雕。其文云：“汉州辅墓石膊字，其一辟邪……其一乃天禄字，差大，皆完好可喜。”宗资和州辅均为东汉桓帝时人，可知天禄、辟邪艺术形象在中原兴起始于东汉桓、灵之际。

天禄辟邪在汉末兴起于中原和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据《出三藏记集》，东汉灵帝年间曾有数百中亚大月氏移民归籍洛阳。其前，大月氏高僧支娄迦谶和安息王子安世高曾于桓帝年间来洛阳传教。这些西域人涌入洛阳对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宗教及日常生活影响至巨。《续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天禄、辟邪就是在这样一股胡化热潮中流行于中原的。除天禄、辟邪外，汉末传入中原的西域动物还有狮子。山东嘉祥东南武氏祠石阙前有石狮子一对，左右对立，长约四尺六寸。其石阙刻铭曰：章和元年“孙宗作陟（狮）子”。而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建于四川雅安县高颐墓前的石狮带有双翼，它和中亚希腊化艺术的联系更显而易见。[12]

三国以后，人们似乎对天禄、辟邪的来源已不太清楚。如孟康误称双角兽为辟邪，独角兽为天禄，范晔不知天禄有角；还有人认为有角兽总称麒麟，无角兽统称辟邪。不过南朝帝陵前所立灵兽之题名还是正确地称双角兽为天禄，只是把独角兽称为麒

麟。直到明清时期，三品官墓碑的碑额仍刻有天禄、辟邪，可见它们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之大。

原载《学术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注 释

① W.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1951, 14 and 347.

② A.F.P. Hulsewé and M. A. N. Lo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 C.* – *A. D.* 23, Leiden: E. J. Brill, 1979, 112;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69页。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第13－14页。该书将乌弋山离置于阿富汗东部坎大哈，不确。

③ 参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20页。

④ E. Chavannes, *Six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l'Asie Centrale d'apres les estampages de M. Ch. – E. Bonin*,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2, 232.

⑤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5，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41页。

⑥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8，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476页。

⑦ 沈竹等编：《中国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71。

⑧ 耿引曾：《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页。

⑨ 汉代及后来文献常提到，士兵用犀甲。犀牛系珍稀动物，此犀甲乃沿用古代对皮革所制甲衣的统称，未必是犀牛皮所制。

⑩ O.M. Dalton,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 3rd edition, 1963; R. D. Barnett, "The Art of Bacuria and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 *Iranica Antiqua*, vol. VII-I, Leiden: E. J. Brill, 1968, 34－132.

⑪ 参见俞伟超：《战国秦汉考古》下，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1973年，第31页。

⑫ 参见俞伟超：《战国秦汉考古》下，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1973年，第41页；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50页；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页。

七　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

70年代以来，火祆教入华问题成为西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先后参加讨论的学者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柳存仁（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1978年）、日本学者福井文雅（1980年）、中山大学的蔡鸿生（1983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的王素（1985、1986和1988年）、武汉大学的陈国灿（1988年）、中山大学的林悟殊（1987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钱伯泉（1990年）、新疆师范大学的孟宪实（1991年）、中山大学的姜伯勤（1993年）、北京大学的林梅村（1993年）、兰州大学的高永久（1995年）和北京大学的荣新江（1996年）。[①]火祆教研究之所以成为西域研究的新潮流归功于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其中一批高昌国时期火祆教史料证明了唐长孺50年代提出的论点，即祆教入华始于十六国时期，[②]而不是陈垣先生早年提出的北魏时期。遗憾的是，目前这项研究主要限于历史学家，一直未引起考古学界同仁的充分重视。本文将缀集所见，为研究者提供一些考古方面的材料，以期推动中国火祆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塞人与火祆教在天山南北的初传

火祆教是世界五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由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人琐罗亚斯特（Zarathustra，前628—前551年）在

波斯帝国东部创立。火祆教奉《阿维斯塔》为经典，基本教义是善恶二元论，或称“马兹达教（Mazdaism）”、“琐罗亚斯特教（Zoroastrianism）”。“琐罗亚斯特”一词在汉文著述中首见北宋姚宽的《西溪丛语》，译作“苏鲁支”。因为琐罗亚斯特教崇拜火神，东罗马人称其为“拜火教”；中国史籍称之为“火祆教”。[3]

琐罗亚斯特为传播祆教浪迹天涯，最后在大夏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在大夏王维斯塔的倡导下，大夏臣民率先皈依祆教，遂使这一宗教得以推广。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39—前331年）及后来的萨珊波斯（224—651年）随后亦奉祆教为国教。关于祆教在中亚粟特的传播，《隋书·康国传》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助祭。”至于祆教何时传入粟特，史无明载，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部粟特语祆教残经（Or. 8212/84）证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中亚时，粟特人已经信奉祆教。据英国伊朗学家基舍维茨考证，这部祆经残卷用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的粟特语写成。其年代甚至早于敦煌汉长城遗址发现的粟特文古书信（约3—4世纪），是现存最早的粟特语文献。[4]

火祆教传入粟特的同时又向北传入中亚七河流域的塞人部落。七河地区塞人古墓所出表现祆教祭坛的青铜器披露了这一史迹。[5]有证据表明，火祆教最初很可能是由塞人传入中国西部地区的。1976—1978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天山东部阿拉沟发现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木椁墓。墓中出土了来自中原的漆器和丝织品。从漆器图案看，这批古墓的年代约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可惜丝织品已经腐朽，但在一块15厘米见方的泥版上还留有清晰的棱格纹丝织物的印迹。发掘者推测阿拉沟这批墓葬的墓主人和塞人关系密切，因为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高足承兽方盘，“同类

文物在苏联中亚地区曾出土多件，细部特征有差异，但基本风格是一致的，被认为是拜火教的宗教祭祀台，是塞克文化中典型文物”。[6]不知为什么，火祆教初传中国的这个考古学证据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孤证，以为尚不能和火祆教传入中国相联系。[7]据我所知，新疆所出表现火祆教祭坛的青铜器并非仅此一例。1983年，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畔曾出土一批窖藏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器和阿拉沟塞人古墓所出青铜拜火教祭坛完全相同（参见彩版3），[8]塞人将火祆教传入中国的史实再次为考古材料证明。

所谓“塞人”即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笔下的 Saka（塞卡）或 Scythian（斯基泰）。据德国语言学家吕德斯研究，塞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他们使用的语言属于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9]这支讲塞语的雅利安游牧民后来分化，入居塔里木盆地的塞人逐渐走向定居并产生出若干支系。中国史籍只把天山北麓保持游牧传统的雅利安人称为“塞人”，[10]而把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定居、讲塞语的雅利安人按其分布地域分别称为于阗人、莎车人、扜弥人、疏勒人以及汉盘陀人等。[11]

80年代新疆洛普县山普拉塞人墓地的发现证实了吕德斯提出的于阗人即塞人的假说。[12]山普拉墓地出土了大量动物和植物纹毛织品残片，如“驼纹”、“鹿纹”、“植物变形纹”和“山形纹”图案的毛织物，它们表现了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气息。战国至西汉初，塔里木盆地先后在月氏和匈奴人统治之下，以至很难确定这批具有北方草原风格的毛织物的文化属性。山普拉墓地所出青地鹿纹毛织物既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乌拉匈奴墓，又见于新疆且末扎洪鲁克古墓。[13]这三个地方出土的动物纹织物显然有一共同的文化渊源，即北方草原古老的斯基泰艺术，尤其是“鹿纹”（参见插图5）使人联想到斯基泰人创作的鹿石上的鹿纹图案，山普拉1号和16号墓旁还发现了殉马坑。凡此表明，游牧仍在当时于阗塞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14]

插图 5：新疆和田山普拉于阗战国－汉初古墓
出土斯基泰风格的鹿纹毛织物

既然于阗人是信仰火祆教的塞人的后裔，那么，《后汉书·班超传》有关于阗古代宗教的记录值得注意。据该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 年）顷，于阗国“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骍马，急求以祠我”。佛门戒律之一乃“不杀伐”，可知当时于阗人信仰的这种杀马祭巫的宗教必不是佛教。东汉年间于阗塞人崇祀的巫教究竟是什么宗教呢？英国伊朗学家贝利教授和现在哈佛大学执教的丹麦语言学家施海夫教授的一系列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原来于阗人信仰佛教之前崇祀的巫教即火祆教，所以于阗人用祆教词汇来翻译印度梵语佛典。于阗塞语文书中表示“太阳”的词 urmaysde 即祆教主神 ahura mazdā（阿胡拉·马兹达）；于阗佛经中用来翻译印度女神 śrī（吉祥天女）及梵语佛经的 mahādevī（大天女）的词 śśandrāmatā 源于《阿维斯塔》神祇 spanta ārmaitiš。于阗人还用《阿维斯塔》中的世界最高峰 harā 或 haraiti 等翻译梵语佛典中的 sumeru（须弥山）。[15]所以，于阗人在信仰佛教之前所崇祀的巫教必为火祆教。

喀什噶尔河流域的塞人王国——疏勒国亦奉火祆。《新唐书·西域传》载：“疏勒国……俗事祠祆神，有胡书文字。”有证据表明，疏勒人奉火祆并不始于唐代。挪威语言学家柯诺早就注意到，塞语表示“神”的词 gyasta（于阗语）和 jezda（疏勒语）词源相同，来自波斯祆教古经《阿维斯塔》的 yazata（天神）。[16]那

么，公元4世纪疏勒塞语文书中疏勒王不悉（Wāsudewā）的头衔之一 Jezdapurā 的实际含义应是“胡天之子”。[17]

二、哌哒和突厥与火祆教在天山北麓的传播

公元5世纪中叶，原居蒙古草原的突厥系统游牧部族哌哒人先后入主粟特和大夏。哌哒不久即为中亚先进文化所同化。《梁书·诸夷传》曰：“滑国（即哌哒）……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而后食。”中亚出土的哌哒王头罗曼银币正面图案是一骑士，背面则是拜火祭坛。他在印度旁遮普和萨特雷季与耶母那河之间发行的小铜币的款式均为太阳图案。这位哌哒王还给其子取了一个颇具祆教色彩的名字 Mihirakula（太阳之花）。可见哌哒在5—6世纪已经入乡随俗，笃信火祆教。[18]

哌哒入主中亚后入乡随俗，亦采用火葬。据俄国突厥学家巴托尔德研究，中亚和波斯两地火祆教的一个显著不同点表现在葬式上：波斯盛行天葬（陈尸野外供猛兽或鹰鹫啄食）；中亚则流行火葬（用盛骨瓮收埋骨灰）。这种盛骨瓮多数陶质，少数为石膏制成。内装死者骨灰，外饰图案或浮雕。盛骨瓮大概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贵霜时代尤为盛行，其种类样式繁多。巴托尔德认为这种礼俗的形成是伊朗东部两种葬式天葬与火葬合流的结果。[19]中亚出土盛骨瓮的型制表明，突厥人入主中亚后火祆教盛骨瓮发生一引人注目的变化，出现了帐篷式的盛骨瓮。瓮壁装饰牧人毡帐上的花纹，上方镂空，象征帐幕的木架。原来反映中亚火祆教的特色的盛骨瓮又增添了草原游牧人色彩。[20]中亚楚河流域曾出土一个7—8世纪盛骨瓮，现藏伏龙芝吉尔吉斯历史博物馆，堪称突厥统治中亚时期盛骨瓮的代表作（参见插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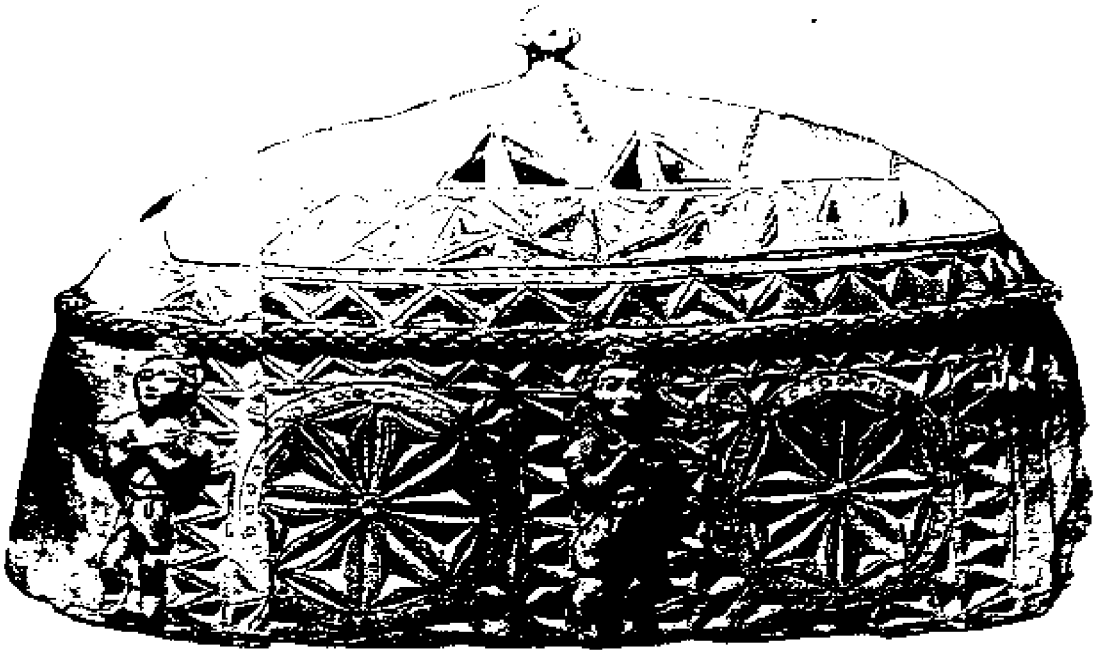


插图 6：中亚七河流域出土 7－8 世纪火祆教徒盛骨瓮

1959 年我国境内伊犁河流域出土了一个外壁装饰忍冬花纹的陶瓮，可惜发现时瓮盖已经佚失，年代被断为唐代，发现者称之为“雕花陶盆”。[21]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告诉我，伊犁出土的这个盛骨瓮的外壁纹饰表明，其年代大概在 5 世纪左右，不是唐代。比较七河流域发现的火祆教徒盛骨瓮，不难看出伊犁出土的这个佚失其盖的陶瓮实际上就是中亚火祆教徒使用的那种盛骨瓮。

新疆博物馆展厅内还陈列了一个类似的盛骨瓮，瓮身及瓮盖均保存完好，沙比提先生告诉我这个盛骨瓮是库车出土的。他还提到吐鲁番地区也发现过这种盛骨瓮。无论如何，新疆发现的这些盛骨瓮为研究公元 5 世纪火祆教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流行提供了翔实的证据。

三、公元 3 世纪火祆教徒在丝绸之路南道的行踪

尽管天山南北的塞人早在先秦时期就信奉火祆教，但是将火

祆教传入中原的却是粟特人。据《晋书·石季龙载记下》，火祆教乃十六国后赵（319—350年）之国教。为镇压冉闵的反叛，“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以欲诛闵等。”[22]后赵三千胡羯士卒所拜胡天即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后赵统治者石勒、石季龙皆为中亚粟特石国人后裔。羯即柘羯，或译柘枝，也即粟特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石干）的不同汉译。[23]所以石勒、石虎及后赵的三千胡羯族士兵都是中亚石国来华的粟特人后裔。前文介绍，火祆教是粟特国教。东晋永和年间（349—350年），冉闵与后赵驻守襄国的石祗争战不休。其间，冉闵滥杀胡羯20余万人，“于时高鼻多须有滥死者半”。[24]以此推测，后赵信仰火祆教的羯胡族人至少20余万。

荣新江引证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中关于粟特火祆教徒的记载，推测火祆教传入中国约在西晋永嘉五年及其后几年间（311—313年）。[25]这个材料并非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祆教史料。前文介绍，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部粟特语祆教残经（Or. 8212/84）用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的粟特语写成。其年代早于敦煌汉长城遗址发现的粟特文古书信。当然这部古老的粟特文祆教经卷可能是较晚时期才带到敦煌的。然而，新疆出土佉卢文书却实实在在地记录了曹魏年间一批中亚火祆教徒在丝绸之路南道的活动。这件文书采用于阗王山习（Vij'ida Siṃhä）纪年。据我们考证，其年代不晚于公元230年。[26]该文书记录了三位火祆教徒：一位来自大夏南部的那揭罗曷（Nagaragä），今阿富汗南部贾拉拉巴德[27]，名曰Khvarnarse（纳尔色的太阳）。据英国语言学家巴罗考证，其名来自《阿维斯塔》的 xᵛarənah（xᵛarənarša）；[28]另一位来自粟特，名曰Nani Vandhagä，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布腊夫指出的，其名即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提到的粟特人名Nani Vandak，意为“娜尼娅女神之仆”。[29]所谓Nani即火祆教崇祀的女神Nania（娜尼娅）。[30]此外，该文书还记录了一位国籍不明的祆教

徒，名曰 Spaniyakä，其名来自《阿维斯塔》的 spanyah，意为“神圣的”。这个名字相当于中古波斯语 Spēnāk，故英国语言学家托马斯和巴罗疑此人或为伊朗人。[91]这三位据祆教经典《阿维斯塔》取名的西域胡商无疑都是火祆教徒，因而披露了公元 3 世纪丝绸之路南道火祆教徒的行踪。

日本伊朗学家吉田丰最近从敦煌出土第五封粟特古书信中检出火祆教教长 s'rtp'w 一词。[92]这个祆教词汇旧译“萨宝”，本意为“商队首领”。在汉文史籍中“萨宝”都是用来表示祆教首领。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因在安迪尔遗址发现的佉卢文文书（665 号）提到 sokhalig'a sartha（粟特商队）。其中 sartha 即粟特语“萨宝”中的 s'rt（商队）。[93]虽然这件文书没有直接提到这支粟特商队的首领萨宝，但这支商队无疑是由萨宝统领的。如果粟特文古书信的年代真是公元 4 世纪初，那么这条记录公元 3 世纪丝绸之路火祆教流行情况的佉卢文材料也比粟特文古书信早。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前文列举了许多“早于”粟特文古书信的火祆教入华史料，但我们认为这批出自敦煌汉长城遗址的古书信实际上写于公元 3 世纪初，而非时下某些学者认为的公元 4 世纪初。那么佉卢文书记录的火祆教史料的年代和粟特古书信的年代基本相仿，我们甚至怀疑尼雅佉卢文书记录的火祆教徒 Nani Vandhagä 和粟特古书信记录的 Nani Vandak 极可能是同一人。[94]

据《汉书·西域传》，早在西汉成帝年间（前 32—前 7 年），粟特商队已在中亚撒马尔干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频繁从事商业活动。文中说：“（康居）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皆苦之。”康居即汉代对粟特人的称谓。既然火祆教为粟特国教，这些来华的粟特商队中自然不乏火祆教徒，那么中原人最早接触火祆教或在西汉年间，从西域商胡那里首先得知。只是火祆教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原的直接证据还有待于今后的发现与研究。我们相信，随着中国考

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火祆教入华年代问题将会日趋明朗。

原载《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

注 释

① Liu Ts'un-yan, "Traces of Zoroastrian and Manichaean Activities in pre-Tang China,"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Leiden: E. J. Brill, 1976, 3－25；参见林悟殊译文《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痕迹》，《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饶宗颐：《穆护歌考》，《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年纪念文集》，香港，1978年；福井文雅：《柳存仁<唐以前のゾロアスタ一教の活動の形迹>についの方法論》，《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学論集》，東京，1980年，第771－785頁；蔡鸿生：《论突厥事火》，《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5－149页；王素：《魏晋南北朝火祆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1985年，第226－227页；《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68－177页以及《也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8年第8期第110－118页；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206－209页；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89－97页；钱伯泉：《从把部文书看高昌麴氏王朝时期的祆教及粟特九姓胡人》，《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第93－101页；孟宪实：《麴氏高昌把部班祭请神及其祭祀制度初探》，《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第74－79页；林梅村：《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40－142页；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第1－18页；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5－353页。

②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416－417页。

③ G. Gnoli, *Zoroaster's Time and Homeland*, Naples, 1980；黄心川：《琐罗亚斯特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382页。

④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IIJ*, 1976, 46－48 and its appendix by I. Gershevitch in *IIJ*, 1976, 75－82.

⑤ A. H. 贝尔什塔姆：《谢米列契和天山历史文化的基本阶段》，《苏联考古

学》1949年第11期（陈世良译文载《新疆文物》1992年译文专刊）。

⑥ 王炳华：《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第21页，图版捌6；穆舜英、王明哲和王炳华：《建国三十年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页及图版43。

⑦ 高永久：《西域祆教考述》，《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第81页；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4页。

⑧ 穆舜英和王明哲：《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页及图版118。

⑨ H. Lüders, "Die Sakas und die 'nordarische Sprache'," *SPAW*, 23, 1913, 406－427.

⑩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⑪ 塞人在中国史料中出现的时间很晚，张骞通西域之后才有所记载，始见《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

⑫ H. Lüders，前揭文，第406－427页.

⑬ 这个材料为维吾尔族学者多鲁坤·阿白尔在且末扎洪鲁克墓地采集。1996年4月笔者赴美国费城出席中亚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木乃伊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美国著名古代纺织学家E. J. W. Barber博士用幻灯演示了这件珍贵的文物。这位美国学者把这件鹿纹纺织残片的年代定为距今4000年似有疑问。与山普拉和诺颜乌拉的同类文物比较，疑其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

⑭ 王博等：《洛浦县山普拉墓地》，《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1－18页。

⑮ H. W. Bailey, "Saka Śs'andrāmata," *Festechrifter für Wilhelm Eilers, ein Dokument der internationalen Forschung zum* 27, 1967, 136－143; P.O. Skjaervø, "Khotan: An Early Centre of Buddhism in Chinese Turkestan," A paper submit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 Los Angeles, 1993, 3.

⑯ S. Konow, "The Oldest Dialect of Khotanese Saka," *Norsk Tidsskrift for Sprogvidenskap*, Bind XIV, Oslo, 1947, 160 and 183.

⑰ 这件疏勒塞语文书的年代及汉译见林梅村：《疏勒语考》，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⑱ 余太山：《嚈达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3－

145 页。

⑲ V.V. Barthold, "A Short History of Turkestan," *Four Studies on the Central Asia*, Leiden, 1962, 9—10.

⑳ G. Pugachenkova and A. Khakimov,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lishers, 1988, Pl. 128.

㉑ 新疆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年，图版 169。

㉒ 并见《太平御览》卷 120 引《十六国春秋·后赵录》。

㉓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第 65 页。

㉔ 《晋书·石季龙载记》和《资治通鉴》卷 97。

㉕ 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 3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35－353 页。

㉖ 林梅村：《佉卢文书及汉佉二体钱所述于阗大王考》，收入《西域文明—考古、语言、民族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

㉗ F.W. Thomas, "Some Notes on Central Asian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BSOAS*, XI, 1946, 524；关于那揭罗曷的方位考证，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20－221 页。

㉘ T. Burrow, "Iranian Words in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SOS*, VII, 1934, 515.

㉙ J. Brough, "Comments of Third 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SOAS*, XXVIII－3, 1965.

㉚ G. Azarpay, *Sogdian Painting*,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126－134.

㉛ F.W. Thomas, "Some Notes on Central Asian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BSOAS*, XI, 1946, 524; T. Burrow, "Iranian Words in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SOS*, VII, 1934, 515.

㉜ 吉田豊：《ソグド語雑録》，《オリエント》第 31 卷第 2 号，1989 年，第 168－171 页。

㉝ A.M. Boyer, E.J. Rapson and E. Senart,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I, Oxford, 1927, 250.

㉞ 林梅村：《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第 87－99 页。

第　二　编

西域胡语新论

一　古代大夏所出丘就却时代犍陀罗语三藏写卷及其相关问题

1996年7月7日《纽约时报》国际版用几乎整版篇幅报道了一则令世界人文科学界震惊的消息。阿富汗东境一座大夏佛教遗址所出藏经罐内发现了13捆写在桦树皮上的古代写卷，现已流入欧洲，入藏大英图书馆。据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教授邵瑞祺（Richard Salomon）鉴定，它们是用佉卢文犍陀罗语书写的佛教三藏，目前已经鉴定出20多种不同内容的文献。抄写年代约在中亚贵霜帝国建立之初（1—2世纪），相当于我国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它们是世界范围内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佛经（参见插图7）。[1]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学术界的原始佛教语言问题、佛教初传中国问题、犍陀罗艺术起源等问题都将因这个重要发现而取得重大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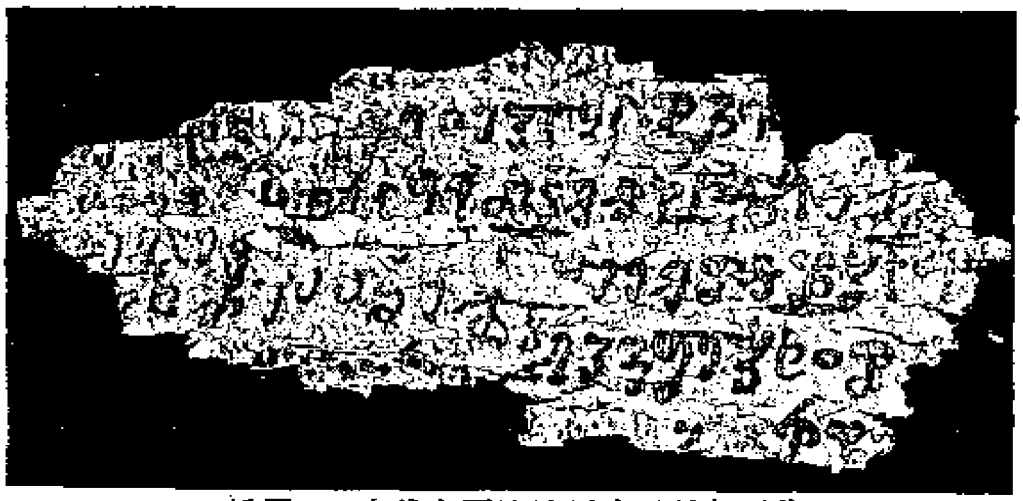


插图7　古代大夏遗址新出丘就却时代

犍陀罗语三藏写经残片

佉卢文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西北方言。公元前3世纪起源于犍陀罗，故名“犍陀罗语”，其后传入大夏和我国塔里木盆地诸国。公元5世纪后，这种文字在世界任何地方不复使用，成为一种死文字。这种文字是保留印欧语系古代语言最早的材料之一，素有“欧洲甲骨文”之称。目前欧美仅有两三位学者能解读这种文字，英国本有两位学者（即牛津大学梵学教授T. Burrow和剑桥大学梵学教授J. Brough）能读这种文字，但80年代两人相继去世，所以英方只得请美国专家帮助解读这批文书。美国派出的专家组由邵瑞祺教授和同属华盛顿大学、专攻佛典的女梵学家考克斯（C. Cox）组成。西雅图一家报纸还报道说，这项研究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投入巨资支持美国学者从事这批中亚死文字写卷的解读工作。[2]1995年夏出访英伦期间，我有幸在剑桥大学教授贝利（H.W. Bailey）爵士家中见到这批犍陀罗语三藏的照片。此前华盛顿大学和大英图书馆曾签署协议，联合出版新发现的大夏犍陀罗语三藏。所以我们只能就美国专家组发表过的材料介绍一下这批大夏佛典的简况及其相关问题。

这批犍陀罗语三藏的断代有两个重要依据：首先，其中一个残卷的经序（colophon）提到丘就却时代犍陀罗一位州长的名字吉霍尼迦（Jihonika，10—30年）。[3]其二，这批佛经出自一组陶罐，藏经罐上的佉卢文铭文提到另外两位历史人物。据贵霜碑铭，他们也是丘就却时代的人物。

这位贵霜州长的名字亦见于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J.H. Marshall）在咀叉始罗的斯尔加普（Sirkap）地方发现的一个银壶上的佉卢文题铭。斯尔加普是个著名的贵霜考古圣地，曾出土丘就却钱币2500枚。咀叉始罗银壶题铭意为：“时唯印度－大夏纪元第191年（旧称“古塞克纪元”191年，公元36年），伟大

的国王之弟摩尼怙罗之子、楚剎州州长。"[4]

吉霍尼迦的名字屡见于贵霜佉卢文和希腊文双语钱币，希腊文作 Zeionises。就年代而论，这位贵霜州长可能是丘就却某个兄弟的儿子。中亚古钱学家一般将丘就却的年代定在公元 30—75 年左右。[5]《后汉书·西域传》记"丘就却八十余死"，他的一生大致是在公元前 10 年至公元 75 年左右渡过的。他和汉成帝时大夏末代君主阴末赴（Hermaeus，约前 32—前 7 年）以及印度河西部小安息王朝的冈底菲斯（Gondophares，约 26—45 年）为同时代人。据贵霜碑铭，丘就却之后继贵霜王位的是 Soter Meges，此人不见于历史文献，故被称为"无名王"。在他之后继贵霜王位的是阎膏珍（Vima Kadphises）。不过大英博物馆钱币部主任克力勃（J. Cribb）先生告诉我，他最近发现一些证据，说明无名王 Soter Meges 实即阎膏珍本人。[6]因此《后汉书·西域传》关于阎膏珍是丘就却之子的记载是正确的。

丘就却和阎膏珍名字的共同成分是 Kadphises，这是希腊文的拼法，佉卢文作 kataphaśa。贵霜大月氏人是从敦煌迁到大夏的。近年中亚语言的最新研究表明，大月氏人、楼兰人和龟兹人属于同一民族，即所谓"吐火罗人"。许多楼兰人与贵霜王同姓，即姓 Kolp'isa，至少 22 件楼兰尼雅佉卢文书提到这个姓氏，由此可证，贵霜王族大月氏人必为吐火罗人。

至于楚剎这个地名，据挪威语言学家柯诺考证，其地约在《大唐西域记》卷 2 所云犍陀罗地区的布色羯罗伐底城（Puṣkalāvatī）。

大夏犍陀罗语三藏发现之前，人们研究丘就却时代的大夏佛教史基于以下 3 种材料：

第一种是汉文史料的有关记载：鱼豢《魏略·西戎传》云："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 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

门、伯闻、疏问、白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也。”[9]所谓大月氏王即贵霜王。《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喀布尔）。又灭泐达（斯瓦特）、罽宾（犍陀罗），悉有其国……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以时间而论，《魏略·西戎传》提到的这位汉哀帝年间的大月氏王可能就是贵霜碑铭所述贵霜帝国的建立者 Kusula Kadphises，相当于《后汉书·西域传》的“丘就却”。

第二种是贵霜佉卢文碑铭：1979 年阿富汗西北席巴尔甘发现的大月氏王陵，使我们对大月氏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位大月氏王和他的妻妾六座墓共出土纯金艺术品 2 万件。其中第 2、3 和 6 号墓发现了西汉宣帝（前 73—前 49 年）至平帝年间（1—5 年）的昭明镜，6 号墓出土一枚安息王弗罗特四世（前 38—前 32 年）银币改制的早期贵霜钱币，3 号墓出土一枚罗马皇帝提毕利奥（16—21 年）发行的金币。4 号墓为男性，其余都是女性。所以 4 号墓应是大月氏王陵，其余应是其姊妹或妻妾。月氏王的下葬年代可能在公元前 1 世纪末，他的妻妾大概于公元 1 世纪初下葬的。以时间而论，此王应是丘就却之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座墓出土了一枚刻有佉卢文的金币，证明公元前后大月氏人已经开始使用佉卢文，但是随葬品中没有发现和佛教有关的文物。[10]

大月氏人信仰佛教始于丘就却，他发行的铜币上有这样一圈佉卢文 Khuṣanasa yau'asa kuyula kaphsasa sacha-dharma-ṭhidasa，[11]意为“贵霜翕侯丘就却、公正执法者之（钱货）”。论者或以为丘就却这些头衔中的“法”即指佛法。1980 年犍陀罗乌苌国某佛塔故址出土的乌苌王色那瓦尔摩（Senavarma）纪元 14 年金卷。其中第 8—9 行记有：maharaja rayatiraya kuyula kataphs'a-putra sodaṣkano devaputra/sadha'aṇaka'ena'suhasomena'aṣmaṇa-karena

sa-yuga-sa-vala-vahaṇata guśurakehi sturakehi ca puyita. 意为“伟大的国王、众王之王丘就却之子萨达色迦诺（Sodaṣkaṇo）天子、皇族保护人苏诃索摩（Suhasoma）、丘氏（Guśula）贵族以及具有权威和军队的斯氏贵族均受供养”。这个金卷每行 100 个字母，共 14 行，是研究犍陀罗语的重要材料。由于这个金卷按乌苌王纪年，所以无法知道它的确切年代。伦敦大学毕瓦尔教授在《剑桥伊朗史》中将其年代定在公元 1 世纪初叶。[12]这个说法有道理，因为它的语言文字和新发现的大夏犍陀罗语写经完全一致。金卷内容是犍陀罗地区的乌苌国国王为修建一座舍利塔下达的敕谕。金卷使用了大量的犍陀罗语佛教术语，如 thuva（= Skt. śthūpa，佛塔）、sagha（= Skt. saṃgha，僧团）、bhagavate（= Skt. bhagavant，佛世尊）、śarira（= Skt. śarīra，佛骨，舍利）、dhama-（= Skt. dharma，佛法）、kalpa（= skt. kalpa，劫）、savudha-（= Skt. saṃbuddha，等正觉；其中 vudha，汉译“浮屠”）、ṇivaṇa（= Skt. nirvāṇa，涅槃）、tadagada（= Skt. tathāgata，上座）、arahato（= Skt. arhant，阿罗汉）、yakṣa（= Skt. yakṣa，药叉），śakamuṇi（= Ski. śākyamuṇi），释迦牟尼）、matraya-（读作 metreya-= Skt. maitreya，弥勒）、gadharva-（= Skt. gandharva，乾达婆、乐神）、devaṇidra-（= Skt. devānāṃ indra，因陀罗）及 brama-/bama-（= Skt. brahman，梵天）等。[13]《大唐西域记》卷 3 称乌苌国为“乌仗那”，并说该国都城“瞢揭厘城南四百余里至醯罗（hidda）山……是如来在昔为闻半颂之法，于此舍命焉”。《洛阳伽蓝记》卷 5 记乌苌国“去王城东南，山行八日，［至］如来苦行投身饿虎之处，高山峻峭，危柚如云……山有收骨寺，三百余僧”。故疑此金卷出自乌苌国这座收骨寺。瞢揭厘城孔宁汉和斯坦因认为即 Mangalor，但据意大利东方学家图齐领导的中亚考古团 60 年代的调查，该城应在斯瓦特河流域杜赛里（Dosirri）北边的商业中心 Mingora，即 Man-

galor 西南约 5 英里处。[14]那么，醯罗山收骨寺应在 Mingora 南 400 里处。

第三种是丘就却时期的佛像：丘就却发行的钱币上有一个有疑问的佛像。据巴基斯坦真纳大学达尼（A.H. Dani）教授介绍："在他（指丘就却）的钱币上发现有希腊神祇赫尔克列斯（Herakles）和宙斯以及公牛和双峰骆驼的图像。还有一尊被认为是佛陀的坐像。如果这个坐像真是佛陀，他信奉的就是佛教，那么我们就能完全理解'公正的执法者'这个称号的意义了。"[15]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最早的佛像属于贵霜王伽腻色迦一世时期（Kaniṣka I，约 100—123 年），其一，贵霜伽腻色迦王发行的金币（参见插图 8）。金币正面是伽腻色迦王立像，背面既有立佛，也有坐佛，并有大夏文 Sakamano（释迦牟尼）或 Boddo（佛陀）。其中一枚出自阿富汗的阿亨波什，立佛，身后有头光和背光，大夏文为 Boddo（佛陀）。[16]其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个伽腻色迦时期的铜香盒（编号 OA1880－270，参见插图 9）：这件文物是 1908 年英国考古学家斯普纳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 Shah-ji-ki-Dheri 佛寺遗址发掘出来的，年代被断在公元 2 世纪。[17]据法国学者福斯曼研究，其上铭文读作：acaryana sarvasti-vadina pratigrahe/// [sam……mahara] jasa kani[ṣka] kaniṣka-pure nag'are ayam gaṃdha-karaṃḍe/deya-dharme/sarva-satvana hita-suhartha-bhavatu/maha-senasa saṃgha-rakṣadasa aṃgis' ala-ṇava-karmi'ana [kani] ṣkasa vihare "在收容说一切有部法师之际，时唯伟大的国王伽腻色迦……年，在伽腻色迦普尔城，这个香盒是个神圣的贡物，为保佑一切生灵繁荣和幸福。此贡物属于（伽腻）色迦寺院负责火堂的仆僧摩诃色那和僧护。"[18]一般认为，这个佛寺遗址可能就是《大唐西域记》卷 2 记载的犍陀罗都城布路沙布逻城东南八九里的伽腻色迦王伽蓝。《洛阳伽蓝记》卷 5 引《宋云行记》称其为"雀厘大寺"。

插图 8　伽腻色迦时代（约 100－123 年）大夏钱币上的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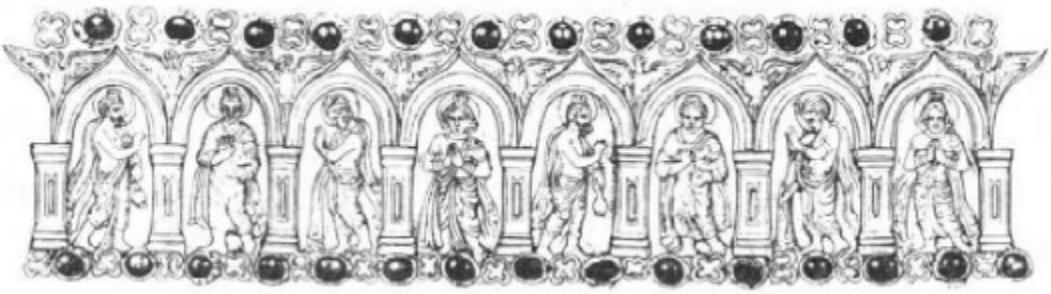


插图 9　丘就却时代（约 1 世纪初）大夏佛寺遗址
所出纯金舍利盒上的一组佛像

大英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件丘就却时代和佛像有关的文物，目前学界大多认为其年代应在公元 1 世纪早期或中期。这是一个外壁带人物浮雕的镶嵌红宝石的纯金舍利盒（编号 OA1900.2-9.1）。19 世纪中叶，英国考古学家马松在大夏毗摩兰（今阿富汗东境贾拉拉巴德城附近的村庄）2 号佛塔的圆顶内发现。这个金舍利盒出自一个带有两处佉卢文的带盖陶瓮，瓮内藏有焚烧过

的珍珠、蓝宝石串珠和水晶等。瓮中央即这个纯金舍利盒，发现时就没有盒盖。盒内装有四枚塞王阿泽斯钱币，铭文是：maharajasa rajatirajasa dhramikasa ayasa“伟大的国王、众王之王、奉法者阿泽斯（ayasa）之（钱货）”。中亚古钱学家现已确认中亚塞种王朝有两位阿泽斯王。阿泽斯一世大概于公元前57年即位。阿泽斯二世于公元1年即位。以前研究者，如比利时学者拉摩特，都是根据这个材料大谈中亚塞人与佛教的关系。但是近年研究者多认为这座佛塔应是丘就却时期的，因为这个佛塔不是孤立的，它和附近四个佛塔是一组建筑。兴衰时间大致相同。据马松和水野清一调查，这组佛塔内发掘出的钱币有阿泽斯钱、冈底菲斯钱、丘就却钱和无名王 Soter Megas 钱。如果无名王 Soter Megas 即阎膏珍。那么这组佛塔可能毁于阎膏珍时期。这个金盒不可能没盖，所以它不是为这次下葬特制的，而是传世品。目前学界大多认为，这个金盒大概制作于公元60年以前，也就是丘就却时期。金盒上共有八尊龛像，学界对这八个人物有不同解释。一种意见认为：中心人物是两个释迦牟尼立像，每一个佛像的右边是梵天，左边是因陀罗。同样一件文物流入美国，现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19]第三种材料对我们研究新发现的大夏三藏十分重要，因为这些桦树皮写卷相传出自阿富汗东境某遗址，很可能就在贾拉拉巴德附近。有人认为佛像传入中国始于东汉晚期（即2世纪下半叶）。四川乐山东汉崖墓石刻坐像、四川什邡东汉画像砖及青铜摇钱树上的人物像均被视为佛像，[20]但学界对此尚有不同意见。

关于丘就却时代贵霜人是否信仰佛教的问题，学界以前曾有争议，现在大夏遗址新出土的犍陀罗语三藏首次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直接证据。19世纪中叶阿富汗曾出土过写在桦树皮上的佉卢文佛经，但都是仅有零星字母的碎片。[21]佉卢文桦树皮写经唯一完整的标本是上世纪末杜特雷依·德兰斯率领的法国考察队

在新疆和田牛角山发现的犍陀罗语《法句经》。该写卷用-s̱a来表示梵语单数属格语尾-sya。[22]这个现象始见贵霜王胡毗色迦时期瓦达克瓮铭（伽腻色迦纪元第51年，179年），[23]后来在公元3世纪楼兰尼雅佉卢文书中普遍应用。所以这个写本的年代应在公元2世纪末。

美国专家组谨慎地将新发现的大夏犍陀罗语三藏的年代定在公元1—2世纪。但是新发现的这批犍陀罗语三藏不用-s̱a/来表示梵语单数属格语尾-sya。此外，《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那件犍陀罗语写经多处用/ṇa/来表示/na/。这是贵霜碑铭的显著特点，和田出土公元2世纪的佉卢文《法句经》中没有这个现象。邵瑞祺教授还注意到，这批大夏三藏中一个残卷的行间插注说该写卷在“下葬”前被重新抄录过。所以新发现的这批大夏犍陀罗语佛典无疑比新疆和田所出犍陀罗语《法句经》的年代早，至迟写于公元1世纪初。

这批佛经的书写材料都是桦树皮，故被《纽约时报》记者称为Fragile Scrolls（极易破碎的写卷）。这种极易破碎的写卷能保存两千年，简直是个奇迹。美国专家组目前已经从中鉴定出20余种三藏残篇，它们从仅有几个字母到数百行不等。其中经藏有《犀角经》（Khaḍga-sūtra），以前仅见过巴利文本；《集众经》（Saṃgīti-sutra），带有一个以前不知道的经注以及各种《譬喻经》（Apadāna / Skt. Avadāna）；律藏不详；论藏有《阿毗达磨论》（Abhidharma）等。

一般认为，经藏的最初形式是达摩（dharma 法），由佛陀遗教片断集成。佛陀说教的总汇称为 dharma-paryāya（法门）。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法敕记录的七种法门即研究原始佛典的重要材料。尔后，佛说又按照内容的不同和编集形式归类为九分教或十二部经。九分教由契经、应颂、记说、偈颂、自说、如是语、本生、方广和未曾有法组成。九分教加上因缘、譬喻和论议即所谓

“十二部经”。更为完善的经藏形式，如我们现在见到的佛教典籍，有北传佛教四阿含加上杂藏或南传佛教五尼柯耶。北传四阿含包括《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分别相当于南传五尼柯耶中《长部经典》、《中部经典》、《相应部经典》、《增支部经典》。而北传杂藏相当于南传《小部经典》。关于法的说明和解释都被纳入经藏，如《十上经》（Dasuttara Suttanta）和大夏新发现的《集众经》就是最早出现的对法进行说明和解释的著作。这些经藏是以三界、四念处、五蕴等法数来分类的，名叫 Mātṛkā（论母）。随着佛教的发展，又形成独立解说经藏的文献，即 Abhidharma（阿毗达磨）。大夏新发现的这批犍陀罗语三藏中就有《阿毗达磨论藏》。论藏的形式在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和分别说部经典里比较明显。据说，分别说部七论中的《论事》的原形是由目犍连子帝须组织阿罗汉编纂的。[29]

为使大家能更深入地了解这批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经。我们读一下《纽约时报》发表的这个残片。据目前国际通行的转写体系，这个残片读作：

1. /// ..... a ..... ///
2. /// (va) bhaṣaka aṇsata ○ aka x x x ///
3. /// -u-a abasaṃ prasadi oca s'ruta baṇati x ma x x x x ///
4. /// ña ma ṇa bu (or su) gha iṣu ○ aba ..... adehi a ///
5. /// ..... (ka) ṣu ○ prasa abadhasa va sarva aruma mara ka pra (sa) ///

第 2 行第 2 字 bhaṣaka 相当于梵语 bhāṣaka（言）。其后一字 aṇasata 相当于梵语 anāsita（服从）。所以这行的第一字……va 可能是 bhagava，相当于梵语的 bhagavat（薄伽梵，佛世尊）。这段残文大概是说：要听从佛世尊的话。

第 3 行的 abasaṃ 可能相当于梵语的 ābhāsa（光明），词尾

-a ṃ大概是业格单数语尾。其后 prasadi 相当于梵语 prasādya（旧译“净信”）。这行第 3 字 oca 可读作 vaca，相当于梵语 vacas（说，忠告）。其后 ś ruta 是个过去分词，和梵文的词形完全一样，意为“所闻”。这行第 5 字 baṇati 显然相当于梵文的 bhaṇati（朗诵）。这句话大意说：他听了光明、净信之言，然后进行朗诵。

第 4 行的 iṣu 可能相当于梵文的 ṛṣva（庄严的）。这行最后一字 adehi 是个犍陀罗语常用的副词，意为“从那里”。

第 5 行的 prasa 可能相当于梵语 prāsa（刀枪）。其后一字 abadhasa 的语尾是单数属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sa 表示梵文的-sya（＝巴利文-ssa），而不用犍陀罗语《法句经》的-ṣa。该字可能相当于梵文 ābādha（危险）。其后的 va 相当于梵文的不变词 vā（或）。下面的 sarva 和梵文词形相同，意为“一切”。第 5 字 aruma，读作 arupa，相当于梵文的 arūpa（丑恶的）。第 6 字 maraka 大概相当于梵文的 māraka（害人者）。

据美国专家组研究，大夏藏经罐上的题铭还涉及到这批犍陀罗语三藏的部派问题。众所周知，小乘佛教有五个部派最为著名，即法藏部、大众部、化地部、饮光部和说一切有部。其中三个部派见于犍陀罗语碑铭。它们是：1. 说一切有部，见 kurram 舍利石函铭刻；[35] 2. 饮光部，见 Bedadi 勺铭和 Palata Dheri 瓶铭；[36] 3. 法藏部，见 Jamalgarhi 铭刻。[37]从新疆尼雅所出佛经抄本可知，法藏部和说一切有部均有犍陀罗语三藏传世。例如：犍陀罗语《解脱戒本》残卷（第 510 号）为法藏部传本；犍陀罗语《法集要颂》（第 204 号）为说一切有部传本。[38]而新疆和田出土犍陀罗语《法句经》亦为法藏部传本。由于大夏藏经罐的题铭提到说一切有部，所以邵瑞祺教授初步认为这批犍陀罗语三藏可能属于说一切有部教派某寺院的图书馆。如果此说成立，也有助于推断这批大夏犍陀罗语三藏写于公元 1 世纪初。因为伽腻色迦时

期说一切有部学派开始改用梵语作为其经堂用语。当时说一切有部派有四大论师：马鸣（As'vaghoṣa）、世友（Vasumitra）、法救（Dharmtrāta）和觉天（Buddhadeva），他们都用梵文编写有部派经典。有部派的《法集要颂经》即法救用梵文撰集的。本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发现过写在棕榈叶上的佛教梵文剧本（编号 MIK.III.26）。据吕德斯（H. Lüders）考证，此为伽腻色迦时代大诗人马鸣的作品《舍利弗戏折》（s'āriputraprakara ṇa），约写于 2 世纪。[2]以这个材料为基础他和法国学者列维（S. Lévi）提出了原始佛教语言问题。总之，公元 2 世纪说一切有部的经典应是婆罗谜文梵语，因此大夏犍陀罗语三藏至少应是公元 1 世纪的作品。

据欧洲梵学家吕德斯、列维和我国梵学家季羡林研究，最早的佛教经堂用语是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东部俗语（Prakrit），其中摩揭陀语（Māgadhī）或半摩揭陀语（Ardha-Māgadhī）很可能是原始佛教用语。[3]随着佛教的传播，原始佛典又被译成小乘教各部派所用各种印度俗语，如巴利语、犍陀罗语等。当佛教上升为统治阶级信奉的宗教后，佛教徒开始摈弃俗语，采用贵族语言梵语。特别是 4 世纪后，全印度出现广泛使用梵语的浪潮，人们把梵语视为学术语言及通用语以取代原来印度各地使用的俗语。所以流传下来的佛经原本大多是梵语写的，很少有俗语佛典能保存至今。大夏新发现的犍陀罗语三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佛典，那么它们对研究原始佛教语言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大夏新发现的犍陀罗语三藏对于研究中国早期佛教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对古代中国乃至整个古代东方的意识形态影响至巨。中国境内发现的和佛教有关的最早的文物有两件重要标本。其一是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的佉卢文井阑残石（参见彩版 4）。另一个是最近中日联合考察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雅遗址发现的鄯善王

童格罗迦纪年文书（参见彩版 5）。这两件文物都是东汉末年佛教和犍陀罗语在我国传播的重要考古学证据。研究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早期佛教术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从梵语翻译。下面五个例子相当说明问题：

	梵语	犍陀罗语	汉语音译	意译
1.	dharmagupta	dharma'ute	昙无德	法藏
2.	bodhi	bosa	菩萨	觉
3.	vihāra	piyara	毗耶罗	寺院
4.	śramaṇa	ṣamaṇa	桑门/沙门	僧人
5.	buddha	vudha	浮屠	佛陀

第三栏的昙无德、菩萨、毗耶罗、沙门和浮屠显然来自犍陀罗语。除佛教术语外，东汉年间大月氏高僧支谶等人翻译的 90 部“汉经”中也有一些可能译自犍陀罗语。新发现的大夏三藏已经鉴定出 20 多种内容不同的佛经，这批材料出版后或许能最终揭开这个谜。

本文排印后，又见到邵瑞祺教授发表的这批写经的调查简报，简报刊布了更多的材料。参见《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ADS，117－2，1997)。

注 释

① J. Darnton, “Fragile Scrolls Cast New Light on Early Buddhism,” *New York Times*, July 7, 1996. 本文所引 Richard Salomon 之说均据此文，恕不一一出注。

② 北大中文系李零教授的夫人 1996 年 5 月份从西雅图打来长途电话告知这个消息。

③ E. Errington and J. Cribb, *The Crossroads of Asia*, Cambridge: 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83.

④ 丘就却时代贵霜碑铭使用三种纪年方法。其一为大夏纪年，又称“印度大夏纪年”或“古塞克纪年”，其元年为公元前155年；其二为阿泽斯纪年，或称“维克拉摩纪年”，其元年始于公元前57年；其三为西部州长纪年，或称“塞克纪年”，其元年始于公元78年。本碑铭使用大夏纪年，第191年当为公元36年。参见A. D. Bivar, "History of Eastern Iran," in E. Yarsha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1, Cambridge, 1983, 220－224.

⑤ E. Errington and J. Cribb, 前揭书，第66页。

⑥ J. Cribb, "The 'Heraus' Coins: Their Attribution to the Kushan king Kujula Kadphises, c. AD 30－80," in M. Price et al. (ed.), *Eassays in Honour of Robert Carson and Kenneth Jenkins*, London: SPINK, 1993, 107－134 and Pl. XXIII－XXVI.

⑦ A. M. Boyer et al.,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9, 340 (nos. 8, 15, 20, 29, 53, 96, 107, 110, 130, 159, 210, 214, 314, 315, 341, 356, 360, 392, 415, 560, 573 and 575).

⑧ S. Konow,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s*,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I, pt. 1,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n Central Publication Branch, 1929, 81－83;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252页。

⑨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关于这段史料的讨论，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36页。

⑩ V.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New York/ Leningrad, 1985, 131; 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67－276页。

⑪ P. Gardner, *The Coins of the Greek and Scythic Kings of Bactria and Indi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1886, 123 (repr. Chicago: Argonaut, 1966).

⑫ A. D. Bivar, 前揭书，第222页。

⑬ H. W. Bailey, "A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 of Sevarma King of Oḍi," *JRAS*, 1980, 21－29.

⑭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3，第273页；D. Faccena，Mingora，"Site of Butkara I." *Report on the Campaigns*，1956－1958 *in Swat*（*Pakistan*），Roma，1962，3－19；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IsMEO），Pakistan，Swat，1956－1981，Documentary Exhibition：Rome，1982.

⑮ 达尼著、四川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巴基斯坦简史》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9页。

⑯ E. Errington and J. Cribb，前揭书，第199页；Katsumi Tanabe（田边胜美），"Iconographical and Typ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Gandharan Fake Bodhisattva Image Exhibited by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and Nara National Museum," *Orient*，XXIV，1988，107，Pl. V. a－c.

⑰ D.B. Spooner，"Excavations at Shah-ji-ki-Dheri," *ASIAR*，1908－1909，49－53；E. Errington and J. Cribb，前揭书，第193－197。

⑱ G. Fussman，"Numismatic and epigraphic evidence for the chronology of early Gandharan art," in M. Yaldiz（ed.），*Investigatin Indian Art*，Berlin，1986，78.

⑲ C. Masson，"Memoir on the topes and sepulchral monuments of Afghanistan," in H. H. Wilson，*Ariana Antiqua*，London，1840，71（repr. Delhi，1971）；S. Mizumo，*Basual and Jalabad－Kabul*，Kyoto，1971，116；E. Errington and J. Cribb，前揭书，第189－197页。

⑳ 贺云翔等：《佛教初传南方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1－3和8。

㉑ H.H. Wilson，*Arian Antiqua*，London，1840，52－53；Pl. III. fig. 11（repr. Delhi，1971）.

㉒ J. Brough，*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London Oriental Series，vol. 7，London，1962. 可惜Brough把这个卷子的ṣa都转写为sa，未加区别。从该书所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知道犍陀罗语《法句经》使用ṣa表示单数属格语尾。

㉓ 关于伽腻色迦纪年的绝对年代问题学界尚有争议，目前学界大都采用伦敦大学教授Bivar的断代，将其元年定在公元128年。参见A. D. Bivar，"History of Eastern Iran"，in E. Yarshat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 3－1，Cambridge，1983，226.

㉔ 佐佐木教悟等著、杨曾文等译：《印度佛教史概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5－48页。

㉕ S. Konow，前揭书，第 154 页。

㉖ S. Konow，前揭书，第 88，89 和 122 页。

㉗ H. Lüders, *AO*. XVIII, p. 17; H. W. Bailey, *BSOAS*, XI, 1946. 林梅村：《犍陀罗语〈法句经〉部派问题》，《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414 页。

㉘ Lin Meicun, "Kharosṭhī Bibliography: The Collections from China (1897－1993)," *CAJ*, 40－2, 1996, 188－220.

㉙ H. Lüders, *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 Berlin, 1911; "Das Śāriputraprakaraṇa, ein Drama des Aśvaghoṣa," *SPAW*, 1911, 388－411.

㉚ 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二　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所出哌哒钱币考

1964年12月间，河北文物工作队在定县城内华塔故址塔基内发掘出一个北魏时期的舍利石函，内藏金银器、铜器、琉璃器、珠玉、五铢钱和波斯银币等。本文讨论的哌哒钱即在该石函中发现的，编号7:3。上世纪末叶以来，这种钱币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等地的古代遗址中屡有发现，但在我国这还是头一次发现。此外，中亚地区发现的哌哒钱大部分是采集品，而我国发现的这枚有明确的埋藏时间，这对研究哌哒钱的年代无疑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然而，限于当时对这种钱币的认识水平，研究者未能释出钱铭。此后，尽管人们在论文和著作中不断提到它，但迄今未见有人解读上面那行“天书”般的文字或阐述它产生的历史背景。60年代以来，中亚考古新发现，尤其是中亚死文字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研究哌哒语言文字及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本文将在上述发现与研究基础上试解这枚哌哒钱币铭文，容有不当，敬请研究者斧正。

一、发现与研究

我们今天能知道定县出土北魏石函中藏有哌哒钱归功于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当时，北魏石函的发现者委托他研究石函内发现的萨珊银币。夏鼐的研究报告刊于1966年《考古》第

5 期。关于这枚哌哒钱，他这样写道：

> “这一批银币中，特别可注意的是标本‘7:3’。这枚是耶斯提泽德二世的银币，但是正面联珠纹圆框以外的边缘上右边有一个 S 形的符号，下边有一行铭文。这一行印压的铭文和正面中央部分的花纹比较起来，压痕较深入，轮廓也较清楚，显然是后来打印上去的。这一行铭文的文字也不是波斯婆罗钵文，而是哌哒文。”

他在这批钱币尺寸、重量、铭文统计表及文中还介绍说，这枚哌哒钱重 4 克，最大直径 3.07 厘米。正面婆罗钵铭文为：（右）KDI IeZDKRTI；（左）MLKAN MLKA，译为“主上、耶斯提泽德、万王之王”。背面婆罗钵铭文为：（右）IeZDKR，译为“耶斯提泽”，但左面铭文不清楚。至于正面框外边缘上的“哌哒文”，他根据法国学者摩根（J.de Morgan）《古代东方钱币手册》的字母表转写为 Č? HUNAMZ，同时声明他转写的“音值并不可靠，至于它的字义，当然更无法通晓”。最后，他还根据摩根的钱币手册及英国学者倭尔克（J. Walker）的《阿拉伯—萨珊式古币目录》介绍说：

> “哌哒国自铸的银币，也是摹仿波斯萨珊朝的银币，但是王像不同，铭文采用本国文字，也有采用婆罗钵字或印度婆罗谜字的。这种银币发现不多。另一种是波斯的铸币上打上了哌哒文字的戳记，表示可以在他们的国境内流通作为法币。我们这一枚便是属于这一种的。这种文字，在阿拉伯时代，哌哒的旧境内仍有使用。”

就当时学界对哌哒钱币的研究水平而言，夏先生的研究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他的上述结论大都是正确的，但有两点不足。其一，波斯和哌哒银币都不是铸造的，而是压模打制的。其二，哌哒钱铭中那种“谜”一般的文字实际上并非“哌哒文”。

二、“哌哒文”之谜

关于哌哒人使用文字的情况，汉文史籍有明确的记载。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引《宋云行记》曰：

> “至嚈哒（即哌哒）国……乡土不识文字，礼教俱阙。阴阳运转，莫知其度，年无盈闰，月无大小，周十二月为一岁。”

《梁书·西北诸戎传》亦曰：

> “滑国（即哌哒）……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

宋云访哌哒，事在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年），而《梁书》所述是梁武帝天监十五年至普通七年（516—526年）哌哒人的风土人情。既然如此，这枚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埋藏的哌哒钱上的铭文自然不是“哌哒文”。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文字呢？

1960年，英国著名语言学家亨宁（W.B. Henning）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题为《大夏碑铭考》，终于揭开了其中的秘密。他根据法国考古团1957年5月在阿富汗Surkh-Kotal发现的这种文字刻写碑铭首次正确论证了“哌哒文”的真正属性。他指出，这是一种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其语言的特点，一方面介乎现代伊朗语方言普什图语和伊德迦·孟吉语，另一方面接近中古伊朗语方言中的粟特语、花剌子模语和帕提亚语。早在哌哒人主中亚之前数百年已为大夏人使用，哌哒亡国后，它仍在当地广为流行，直至9世纪该地区全面伊斯兰化后绝迹。鉴于这种文字比较集中地发现于大夏（Bactria）故地，所以亨宁建议将其语言命名为“大夏语（Bactrian）”。[1]亨宁的建议即刻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尽管个别人怀疑它也可能是“真吐火

罗语”。

中亚碑铭的研究证实《梁书》有关哌哒文字情况的介绍是正确的。他们自己没有文字，“使旁国胡为胡书”。这里的“胡”当指哌哒在中亚的统治中心大夏，“胡书”则指大夏文。

哌哒钱币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关注。除前文提到的摩根和倭尔克外，早期致力于这项研究的还有法国的吉尔什曼（R. Ghirshman）、德国的容克（H. Junker）、英国的孔宁汉（A. Cunningham）和日本的榎一雄。尽管上述学者的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他们为这项研究收集大批标本，积累了许多资料，功不可没。而亨宁的研究终于为正确解读这种中亚死文字指明了方向。同时，60年代以来，中亚考古资料迅速积累。新发现许多哌哒钱币，大大便利了后来的工作。欧洲当代语言学界的精英积极投入到解读大夏碑铭的热潮之中。其中致力于哌哒钱铭解读的学者有德国的洪巴赫（H. Humbach）、奥地利的戈培尔（R. Göbl）、俄国的李夫什茨（V.A. Livšic）和德国的达瓦利（G. D. Davary）。我们对哌哒钱币能有今天这样深入的了解，归功于上述学者的不懈努力。

三、哌哒钱铭文字解读

语音分析表明，大夏文共有23个字母。这和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大夏文的记载不太一致。该书卷1记大夏文曰：

> “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率利。”

据达瓦利分析，所谓“字源二十五言”大概包括了两个音值为ksi和psi的复合辅音字母。玄奘对大夏文的其他描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如大夏文碑刻和写卷的书写法即从左向右，横书。只是有些大夏文的钱币铭文比较特殊，读法从右至左。这大概是受萨珊

波斯银币中婆罗钵钱铭的影响。

我国发现的这枚哌哒钱的大夏文和多数大夏文写法一样，从左至右。据《考古》1966年第5期图版陆提供的实物照片（参见插图10），这行大夏文的拉丁字转写应是 alxano šaō。铭文含义讨论于下。

alxano　　šaō

插图10　哌哒钱币大夏文摹本

钱铭后一字 šaō，意为“国王、君主”，在大夏碑铭中的规范写法是 šao，但同时也拼作 šaoo 或 šauo 等。该字相当于突厥粟特语碑铭中的 xyšwn'k（国王），摩尼教粟特文献中的 xšywny（国王），以及基督教粟特文献中的 xšwny（国王）。[2]不过，这个大夏词更接近于阗语的 ṣṣau，在于阗文献中常用作王公贵族的头衔。[3]大夏语、粟特语和于阗语同属于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所以，这些字义相同、字形相近的词应有共同的起源。在另一些大夏钱铭中，该字或拼写作 šaui 及 šauio，相当于波斯语 šāhi（国王）。有趣的是，该字亦为中国史家所注意。《旧唐书·罽宾传》载：

>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其王乌散特勤洒以年老，上表请以子拂菻罽婆嗣位。许之，仍降使册命。”

唐代僧人悟空在他的中亚游记中亦提到，犍陀罗有“特勤洒寺，突厥王子造也”。事实上，乌散特勤洒并非突厥人，而是哌哒亡国后仍滞留中亚的哌哒部落酋长。我们从哌哒钱铭可知，这位哌哒酋长的胡语名称即哌哒钱铭中的“tagino（特勤）uorsono（乌散）šauo（洒）”，意为“特勤、东方之王”[4]。所以，我们这枚哌哒钱币中的 šaō 当即《旧唐书·罽宾传》和《悟空入竺记》所载

哌哒官号“洒”。顺便说一下，这位酋长之子拂菻罽婆名字中的“拂菻”不是通常所说唐人对东罗马的称谓，而是大夏语 fromo，或作 foromo，意为“国王”。

这行钱铭的前一字 alxano 在大夏文中有许多不同拼法，但规范的拼法是 alxanno。从上下文看，这个字可能是哌哒人的族名。由于该字不属于大夏文表达的那种东伊朗语方言，而是哌哒本族语词汇，故颇难解读。

起初，法国学者吉尔什曼释该字为 hpta，认为即哌哒族名 hephthalitai。[5]但是，德国学者洪巴赫和奥地利学者戈培尔后来分别认出该字的音值实际为 alxanno。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字当即古代印度人对哌哒的称谓 hala-hūṇa 或 hūra-hūṇa（哈喇·匈奴）。[6] 1982 年，德国学者达瓦利终于令人信服地考证出，该字的正确读法应是 alxanno。他引证 11 世纪印度史家迦尔汉的罽宾史《王河》（Rājataraṅgiṇī）中的有关记载，指出哌哒人的这个族名当即《王河》记载的所谓 alakhāna。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枚大夏文婆罗谜文双语哌哒钱币中大夏文的 alxanno 对译梵语的 rājālakhāna（= rāja al akhāna）。所以，哌哒人的这个族名肯定读作 alxanno。大概由于这个字的语言系属不明，达瓦利未能进一步解读它的字源。[7]

据《魏书·哌哒传》，“哌哒国，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4 世纪中叶以后，哌哒人才越过阿尔泰山，西迁中亚。因此，哌哒人和那些起源于我国北方草原的高车、铁勒、柔然、突厥及回鹘人一样，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在萨珊波斯的婆罗钵语国史《帝王纪》（Khundhyānāmah）中，哌哒最初被称为“突厥”，其王则称“可汗”。[8]《洛阳伽蓝记》卷 5 引《宋云行记》载，哌哒派驻犍陀罗地区的首领为“敕勤”，也即突厥语官号“特勤”。哌哒钱铭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钱铭所记哌哒官号有 kagano（可汗）、tagino（特勤）、zaboxo（叶护）、tadono（吐

屯）和 tarxano（达干）等。《新唐书·突厥传》载：

> “突厥……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子弟曰特勒（勤之误），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曰颉利发，曰达干。”

由此可见，哌哒人讲的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中的某种方言。所以，《魏书·哌哒传》说，其“风俗与突厥略同……其语与蠕蠕（即柔然）、高车及诸胡不同”。哌哒语和诸胡语言的不同，是语系不同，它和高车及柔然语的不同，当是方言的差别。

既然如此，哌哒钱铭中的这个非大夏语词或许属于突厥语。其中字尾-nno（<-na）系东伊朗语构成族名或地名的后缀。例如：于阗语“焉耆”拼作 argīna，“龟兹”拼作 kucīna。那么，alxanno 的字干是 alxa-。我们怀疑这个字相当于回鹘语 ulux（土地、王国）及突厥语 el（土地、王国），[9]本意为“王国”，但在钱铭中表示哌哒汗国之名。所以，该字可考虑译为“阿尔汗国”。

据以上讨论，北魏石函内藏哌哒钱币的铭文系大夏文，全文可译为“阿尔汗国之王”。其中“阿尔汗”一词系突厥语哌哒方言，当是哌哒人对本国的自称。

据戈培尔研究，早期哌哒钱币大都是在萨珊德拉克麦银币上打印哌哒戳记及大夏铭文。最早的一枚系萨珊王沙普尔二世（309—379 年）银币[10]。但这枚有哌哒戳记和大夏铭文的沙普尔二世银币不会是沙普尔二世在位时打印的，应是 5 世纪 30 年代末哌哒人主大夏之后打印的。哌哒早期钱币还包括阿富汗哈达（Hadda）发现的几枚打印有哌哒戳记和大夏铭文的罗马金币，分别属于罗马皇帝西奥多斯、马尔申和利奥时期（457—474 年）。[11]北魏石函中的哌哒钱打印在萨珊王耶斯提泽德二世（438—457 年）银币上。[12]这枚货币流入中国或与哌哒使者于北魏太安二年（456 年）十一月出访平城（山西大同）有关。那么，此钱打制于 456 年之前，也即哌哒人在大夏立国后不久打制的，

是目前所知哌哒钱币中最早的标本之一。

四、哌哒族名问题

哌哒钱铭的解读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哌哒人称自己的国家为“阿尔汗国”，那么，为什么南北朝人称其为“哌哒”、“滑”，而印度、粟特、于阗和西方诸国称之为 Huns（匈奴）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争议很大，这里只能作一些初步的考察。分述于下：

1. 哌哒：其名首先为北朝拓拔魏史官所用，见于《魏书》。刘璠《梁典》（《文献通考》卷15挹怛条引）载：“滑国王姓哌哒，后裔以姓为国号，转讹又谓之挹怛焉。”刘璠所说哌哒王姓即《梁书·西北诸戎传》及《梁职贡图》题记所说“厌带夷栗陁”。其名不见哌哒钱铭，在东罗马史料中拼作 Ephthalitai 或 Hephthalitai，在突厥可汗致东罗马皇帝的书信中作 Abdelai，在吐蕃文献中作 Abdel。东罗马史家忒俄法涅斯（Theophanes）记萨珊王卑路斯时代（459—484年）的哌哒王名叫 Ephthalanus，并在这个名字下面注曰：“该族实得名于此王”。据此，哌哒得名于卑路斯时代哌哒王之名。但是从萨珊波斯国史《帝王纪》可知，卑路斯时代的哌哒王名曰 Khushnawaz，也即《魏书·粟特传》所记哌哒王“忽倪”[13]。我国发现的这枚哌哒钱即忽倪在位时打制的。所以，中国史料的记载是正确的，厌带夷栗陁肯定是哌哒王的姓氏，不是名字。这就像于阗王姓“尉迟”，疏勒王姓“裴”、龟兹王姓“白”，哌哒之名实为王族姓氏，不是国名。

2. 滑：其名最先为南朝梁国史官所用，见《梁书》。《通典·边防典》九滑国条记载：“滑国，车师之别种也……至后魏时谓之滑匡。”这个名字的含义，研究者有许多推测，余太山《哌哒史研究》中有很好的综述，[14]不赘述。这里只谈谈我们的不同看

法。“滑”字在古汉语中是个以 t 收尾的入声字。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拟作 γuăt/γwaet[15]。这就是后魏人又称“滑”为“滑匾”的原因。在哌哒钱铭中有一个与其音相近的字。兹将有关钱铭录于下：

(1) sri bago azobadigo sandano bago xoadēo（吉祥天、千夫长、月天 xoadēo）

(2) pido i xoadēo fromano（主上 xoadēo 君王）

(3) fromo kesaro bago xoadēo（君王、凯撒、天神 xoadēo）[16]

显然，其中 xoadēo 就是汉文史籍所谓“滑”。这是个大夏语词，意为“主人，国王”，在中古伊朗语其他方言中有相应的词。例如：中古波斯语 hwt′y（神）、摩尼教中古波斯语 xwd′y（主人）、摩尼教粟特语 xwt′w 等。[17]该词后来还借入突厥语，也即所谓“和卓”。由此可知，“滑”并非哌哒真实的国名，仅是哌哒王的称号之一。

3. 匈奴：东罗马、印度、粟特和于阗人或称哌哒为匈奴。《魏书·粟特传》载：“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忽倪已三世矣。”前文已介绍。忽倪即哌哒王 Khushnawaz。由此可知，粟特人称哌哒为匈奴。于阗史诗《赞巴斯塔》（Zambasta·15·9）有诗曰：huna cimgga supiya kye nä hvatäna-ksiru bajottōndä，意为“入侵过于阗国土的匈奴人、汉人和苏毗人”。[18]《赞巴斯塔》成书年代不早于 4 世纪，所以，书中所说匈奴人必指 5—6 世纪统治于阗的哌哒人。印度和东罗马史料则称哌哒为“白匈奴”，梵语作 śita-hūna。尽管上述材料言之凿凿，但仅凭这些还很难断定哌哒即匈奴。相反，《汉书·匈奴传》所述匈奴职官和哌哒的职官完全不同。例如：匈奴王称“单于”，而哌哒王称“可汗”，匈奴的藩王称“谷蠡”，哌哒的藩王称“叶护”或“特勤”。两者很难联系起来。众所周知，粟特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贾，足迹遍布世界。哌哒西迁中亚后

第一个征服的就是粟特。因此，印度、东罗马和于阗人最初显然是通过粟特商人了解到有哌哒这么个民族。粟特人对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往往不加区分，一律称为“匈奴”。例如：中亚穆格山发现的8世纪粟特文书信称突厥人为 xwn（匈奴）[19]。所以，我们不能盲从粟特人的说法，把哌哒和突厥都视为匈奴。

综合全文的讨论，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北魏石函所藏哌哒钱的铭文系大夏文，意为“阿尔汗国之王”。它是哌哒钱币中最早的标本之一，打制于哌哒王忽倪统治时期。

（2）“阿尔汗”一词是突厥语词，本义为“土地、王国”，应为哌哒人对自己王国的一种称谓。这表明，哌哒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中某种方言。

（3）东西方史料所载厌带夷栗陁、滑和匈奴都不是哌哒人对自己王国的称谓。其中，厌带夷栗陁是哌哒王族姓氏，滑是哌哒王的大夏语王号，而匈奴是粟特人对包括哌哒人在内的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一个泛称。

原载《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

注　释

① W.B. Henning, “The Bactrian Inscription”, *BSOAS*, XXIII, 1960, 47－55.

② S.G. Kljaštornyj and V.A. Livšic, “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 *AOASH*, Tome XXVI-1, 1972, 85; C.D. Davary, *Bactrisch, ein Wörterbuch*, Heidelberg, 1982, 274－276.

③ H.W.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1979, 412－413.

④ G.D. Davary, 前揭书，第289页。

⑤ R. Ghirshman, *Les Chionites-Hephthalites*, Le Caire, 1948, 10.

⑥ H. Humbach, *Baktrische Sprachdenkmäler I*, 1966, 54; R. Göbl,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chen Hu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I, Wiesbaden, 1967, 54 und 56.

⑦ G. D. Davary，前揭书，第289页。

⑧ 此书早佚，但费尔道西（934－1020年）和泰伯里（838－923年）的著作所述萨珊波斯史取材于此书。本文据费尔道西《列王咏》的有关记载。参阅 Firdausī, *Shāhnama*, trans. by E. Warner, vol. VII, London, 1915, 164－165.

⑨ N. Sims-Williams et J. Hamilton, *Documents turc-sogdiens du IX-X siècle de Touen-houang*, London, 1990, 82；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1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7页。

⑩ 参见⑥所引 R. Göbl 书卷1第54页。

⑪ F.R. Allchin and N. Hammend (ed.), *The Archaeology of Afghanistan*, London/New York/San Francisco: Academic Press, 1978, 251.

⑫ 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银币》，《考古》1966年第5期第267－270页。

⑬ 白鳥庫吉：《粟特国考》，《西域史研究》下，昭和19，第157－165頁。

⑭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第10－11页。

⑮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⑯⑰ G.D. Davary，前揭书，第291－292页。

⑱ H.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ol. VII, Cambridge, 1985, 25.

⑲ 马小鹤：《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中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90年，第116－117页。该文引李夫什茨的转写将匈奴拼作 γwn，误。正确的读法应是 xwn。参见 N. Sims-Williams, "Remarks on the Sogdian letters γ and x," in: W. Sundermann, *Mitteliranische manichäische Texte kirchengeschichtlichen Inhalts*, Berlin: Akademe Verlag, 1981, 194－198.

三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犍陀罗语《解脱戒本》残卷

解脱戒，或译“波罗提木叉”、“禁戒”，是一部规定佛教信徒行为和日常生活的佛教律部文献，梵语作 Prātimokṣa，巴利语作 Pātimokkha，在犍陀罗语中则称为 Pratimokha。

这部佛教律书收录了许多诗颂，历来被认为是释迦牟尼本人及其同时代弟子创作的。据欧洲梵学家吕德斯、列维和我国梵学家季羡林研究，最早的佛教经堂用语是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东部俗语，其中摩揭陀语或半摩揭陀语很可能是原始佛教用语。[1]后来，随着佛教的传播，原始佛典又被译成小乘教各部派所用各种印度俗语，如巴利语、犍陀罗语等。当佛教上升为统治阶级信奉的宗教后，佛教徒开始摈弃俗语，采用贵族语言梵语。同时，也由于 4 世纪后，全印度出现广泛使用梵语的浪潮，人们把梵语视为学术语言及通用语以取代原来印度各地使用的俗语。所以，流传下来的佛经原本大多是梵语的，很少有俗语佛经能保存至今。就目前所知，仅有三四部印度俗语佛经原本保存下来，它们都是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即新疆和田发现的佉卢文犍陀罗语《法句经》、新疆尼雅发现的佉卢文犍陀罗语《法集要颂》、西藏那果尔(Ngor) 寺发现的孟加拉文俗语《法句经》以及本文将要讨论的佉卢文犍陀罗语《解脱戒本》残卷。[2]它们对研究早期佛教的语言和思想无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犍陀罗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西北方言，通常用佉卢文书

写。据考古发现，主要有三类收集品．1．在古代犍陀罗发现的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碑铭；2．中亚各地发现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贵霜碑铭；3．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出土的公元3—4世纪的佛教和世俗文书。犍陀罗语《解脱戒本》属第3类收集品，它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5—1906年）在尼雅古城发现的，在他这此考察报告《西域》中将其编为510号佉卢文书。[3]

1927年，拉普逊等欧洲语言学家在《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书集》一书卷2中刊布了这件犍陀罗语文献，但他们未能鉴定出它属于佛教文献中的哪一篇，只在巴利语《法句经》中找到5句类似的诗颂。[4]这项工作相当难，因为佛教文献浩如烟海，确认一件佛经残片，如同大海捞针。英国著名梵学家巴罗也未能发现它到底是哪部佛经的，所以他的《中国突厥斯坦所出佉卢文书译文集》中根本没有收录这件文书。60年代初，德国梵学家伯恩哈德终于发现这个佛教残文书应是小乘佛教法藏部的《解脱戒本》残卷。[5]不幸的是，他未能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即于1970年在尼泊尔遇难身亡。伯恩哈德的鉴定为学界普遍接受，但至今无人利用这项成果，详细考订这个重要的佛教写本，尽管它被屡屡用来和梵语、俗语、巴利语和吐火罗语本同类诗颂进行比较。本文将提供这件佛教文献新的校订本并讨论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这件文书的照片发表在前文提到的拉普逊等人著作第2卷图版7，该书只印出这件文书正面，其背面从未发表过。除拉普逊等人（BRS）外，英国梵学家布腊夫（JB）、德国吐火罗语专家施密特（KTS）和伯恩哈德（FB）校定过该文书中的若干词句。[6]我们的校订主要依据拉普逊等人刊布的照片和1995年夏我在大英图书馆拍摄的正面照片（参见彩版6），由于照片中的某些部分模糊不清，背面根本没照片，这些地方只能遵从原校定者

的读法，在其几种交替读法中选择我的读法。[ ] 表示字迹漫漶，( ) 表示附加或复原，标点/、//和 | （原文书换行）是为便于和其他版本比较附加的；转写方法遵照拉普逊的体系，但/cha/应按英国语言学家贝利的意见读作/kṣa/。[7]下面是全文的拉丁字转写和校勘：

§1 kṣaṃti paramo tavo dilikṣa nirvanaṃ paramo vataṃti budha /

na ya parva' ida['e] parogāti śramaṃno ho' ati paropimtsāṃmanā // 1

§2 śikhi /

cakṣuva viśamaṃ tritvā vijamāna parakrama'o ta [va] /

paṃdito jivalog[e] tu pāpāni parivraciya // 2

§3 anovati aṃño namadi aṃnovagati pratimokhe sa[vaṃ] ra /

madraṃñayi'a, e bhutasya paṃda stanasaṃno /

ajacide ayu'e ta budhana śaśana // 3

§4 arhaṃte kakrots[a]ṃti yacanaya /

[yatha] [avi] bhravaṃro puspu varnagaṃdha ahedi['a]

paredi rasaṃ ātaya ema grame muni ca|re /

na paleṣu vilomaya na pareṣu kritaṃkrita /

atvano saṃekṣi['a] samani vi[ṣa]mani i // 4

§5 budhasya konagamunisya/

ajacetaṣa a[pra]mājag a muṃnina munina pradeśa śikṣatu /

śivaṃ bhavaṃti datino vapa(saṃ) [tisa] saṃta saṃtima [leya] // 4 1

§6 sarvisya papasya akriśa(ti) śasilasya vasaṃpata (naṃ) /

(sva) citaparyavatana eṣa budhana śasaṃna // 4 1 1

§7 ..... ya budha jina.....

§8 ..... jivalo (sic.) tu papana pariva /

校勘记：1.1 BRS čhamti. 1.3 BRS tato. 1.11 BRS parva i [ch.t.]. 1.14 BRS bodhi. 2.2 BRS cačhuna. 2.3 BRS visamamam. 2.6 BRS parakrama.. 2.7 BRS [ta v.]. 2.9 BRS jivalahgá. 2.11 BRS pāpāna. 2.12 parivarjiya. 3.2 BRS samno. 3.3 BRS na ma ... di. 3.7 BRS madramñayita. 3.10 BRS stanasamna m. 3.11 BRS adijide. 3.12 BRS ayu. 3.13 BRS eta. 4.1 BRS prahamse or brahamse. 4.2 BRS na kro s[e]mti and KTS kros[e]mti. 4.3 BRS ya ca na ya. 4.4 BRS śo rtha. 4.5 BRS u ru. 4.6 BRS bhrahamro or bhravaro. 4.9 BRS ahe[tha].. 4.10 BRS pajeti or pa [le]ti. 4.17 BRS ka. 4.24 BRS amečhita, JB śammiks['a], FB amečhita 4.25 BRS ta ma na, JB amani, FB tamana. 4.26 BRS cita ma ni, JB vi[sa]-mani, FB citamani. 4.28 BRS hu, JB [ca]. 5.3 BRS a va ja tusa, FB avajetusa. 5.4 BRS a [śra]majag'a, KS asramajag'a. 5.12 BRS d[e]ti bha, FB d[a]tina. 5.13 BRS vapa[.ya] ta. 5.15 BRS samtima-[le ti]. 6.3 BRS a kriśa ri, FB akriśari. 6.4 BRS śaś ilasya, FB śailasya. 6.5 BRS vasampata sa-. 6.6 BRS ka cita paryavatana, FB [sa]kacita – paryavatana, KTS svacita-paryavatana.

全文汉译如下：

§1（毗婆尸）：

"忍是最高的苦行，最好的忍是涅槃；"诸佛说："出家人绝不伤害他人，沙门远离杀界。"

§2 尸弃：

"就像明眼人脱离危险到达智慧的彼岸一样，智者能避免人世上任何罪恶。"

§3（毗叶罗）：

"不诋毁别人，尊敬别人，不嫉妒别人，按照解脱戒守戒如下：饮食要知道节制，住房和座位要选隐蔽之处，专心致志达到脱凡超俗的心境。这是诸佛的教诲。"

§4 阿罗汉、苦行者和导师拘楼孙：

"就象蜜蜂采蜜，从花上飞过，不伤害花香花色。所以，圣贤路过乡村时，既不挑剔别人，也不管别人做什么不做什么，他只应注意自己的行为正确与否。"

§5 佛陀拘那含牟尼：

"对于圣贤来说，他不沉迷于超凡脱俗，而是遵循圣人的旨意。所以，救世主们总是幸福的，有德的人能入静，然后进入涅槃境界。"

§6（迦叶）：

"别犯任何罪恶，要严格守戒，净化心灵。这是诸佛的教诲。"

§7……佛陀、耆那、（释迦牟尼）：

"……"

§8……在人世上，他能避免罪恶……

据《长阿含经》卷1，释迦牟尼之前有六佛，他们是毗婆尸、尸弃、毗舍婆（或译毗叶罗）、拘楼孙、拘那含（或译羯那迦）和迦叶，加上释迦牟尼，通称"过去七佛"。我们文书中的诗颂即过去七佛的语录，只是释迦牟尼说的那段话已漫漶不清。正如伯恩哈德正确指出的，"尼雅所出佉卢文书510号残卷系《解脱戒本》法藏部本的最后几颂"。法藏部《解脱戒本》现存两种版本，混和梵语本和汉译本。前者仅存一些残片，没有我们文书这部分内容，只有后者完好地保存了这部分内容，见《四分比丘戒本》和《四分比丘尼戒本》。

《四分比丘戒本》亦称《四分僧戒本》或《昙无德戒本》，是鸠摩罗什的老师佛陀耶舍于后秦弘始十年至十五年间（408—413

年）译出的；[8]《四分比丘尼戒本》又称《尼波罗提木叉戒本》，是佛陀耶舍与竺佛念于后秦弘始七年（405年）合译的。[9]为便于讨论，兹将两个译本的有关内容分节抄录于下：

《尼波罗提木叉戒本》	《四分比丘戒本》
§1 毗婆尸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六百二十万比丘前后围绕说是戒经： “忍辱第一道，涅槃佛称最；出家恼他人，不名为沙门。”	§1“忍辱第一道，涅槃佛称最；出家恼他人，不名为沙门。” 此是毗婆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戒经。
§2 式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八十万比丘前后围绕说是戒经： “譬如明眼人，能避险恶道；世有聪明人，能远离诸恶。”	§2“譬如明眼人，能避险恶道；世有聪明人，能远离诸恶。” 此是尸弃、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戒经。
§3 随叶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十万比丘前后围绕说是戒经： “不恼不说过，如戒所说行；饭食知节量，常乐在闲处；心净乐精进，是名诸佛教。”	§3“不谤亦不嫉，当奉行于戒；饭食知止足，常乐在空闲；心定乐精进，是名诸佛教。” 此是毗叶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戒经。
§4 拘楼孙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四万比丘前后围绕说是戒经： “譬如蜂采花，不坏色与香，但取其味去；比丘入	§4“譬如蜂采花，不坏色与香，但取其味去；比丘入聚然，不违戾他事；不观作不作，但自观身行，若正若不正。”

聚然，不破坏他事；不观作不作，但自观身行，谛视善不善。”	此是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戒经。
§5 拘那含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四万比丘前后围绕说是戒经： “欲得好心莫放逸，圣人善法当勤学；若有知寂一心人，乃能无复忧愁患。”	§5“心莫作放逸，圣法当勤学；如是无忧愁，心定入涅槃。” 此是拘那含牟尼、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戒经。
§6 迦叶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二万比丘前后围绕说是戒经： “一切恶莫作，当具足善法；自净其志意，是则诸佛教。”	§6“一切恶莫作，当奉行诸善；自净其志意，是则诸佛教。” 此是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戒经。
§7 释迦牟尼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千二百五十未曾有僧前后围绕说是戒经： （下略）	§7（此行略） 此是释迦牟尼、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十二年中为无事僧说是戒经。

通过上述版本比较，不难发现犍陀罗语《解脱戒本》在内容和词句方面接近《四分比丘戒本》。例如：两者均称第五佛为“拘那含牟尼”，而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汉译本中该词作“羯诺迦”；又如：两者均称第四佛为拘楼孙，而在梵本《说一切有部戒经》中该词作 Krakucchando（旧译迦罗迦孙陀）。[10]更值得注意的是“毗叶罗”一词，这是一个典型的犍陀罗语词，译自犍陀罗语 viyari（见犍陀罗语《法句经》），相当于梵语 vihāra/viharin（旧译毗诃罗），因为在犍陀罗语中梵语的/h/通常写作

/y/，如我们文书中的 ya 相当于梵语的 hi（表示强调的副词）。[11]在梵本《说一切有部戒经》中“毗叶罗”称为 vis'vabhur（旧译毗舍浮），这样我们就可以确认《四分比丘戒本》应译自犍陀罗语。如所周知，小乘教各部派的经堂用语是不同的。至于各部派佛教使用什么语言，文献语焉不详，而上述证据无疑有助于说明小乘教法藏部的经堂用语应是犍陀罗语。

从上述比较还可以知道这件犍陀罗语《解脱戒本》残卷仅是抄写佛经的一个练习。佛名前的一些称号都忽略未抄，有些佛名根本没有抄，§8 这段文字是重抄 §5 最后部分。尽管如此，这件佛律原本的发现仍不失为当代佛教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它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佛教律部文献真迹。东晋法显“慨律藏残……至天竺寻求戒律”，就是为了寻找《解脱戒本》这类佛教文献的胡语原本。

法藏部是最早传入我国的小乘佛教之一，起初称“昙无德”。早在曹魏正元元年（254 年），安息僧人昙无谛就在洛阳译出了法藏部著作《昙无德羯磨》1 卷。本世纪初在新疆和田发现的犍陀罗语《法句经》和新疆尼雅发现的这部犍陀罗语《解脱戒本》亦为法藏部传本。德国著名梵学家瓦尔特施密特从勒柯克吐鲁番收集品中鉴定出一些混合梵语写的法藏部文献《解脱戒本》和《大涅槃经》残片。[12]在同一收集品中还发现过法藏部《解脱戒本》的汉译本。[13]凡此表明，公元 3 至 5 世纪小乘教法藏部在犍陀罗与洛阳之间的丝绸之路，特别是在其南道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原载《西域研究》1995 年第 4 期。

注　释

① H. Lüders, *Bruchstu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 I, Berlin, 1911, 40; S. Lévi, "Observations sur une langue precanonique du bouddhisme," *JA*, 1912, 491—

514；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② J.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1962; M. Cone, "Patna Dharmapada,"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vol. XIII, Oxford, 1989, 101－217.

③ M.A. Stein, *Serindia*, vol. I, Oxford, 1921, 257.

④ A.M. Boyer, E.J. Rapson and E. Senart,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 Oxford, 1927, 184－185.

⑤ F. Bernhard, "Gāndhārī and the Buddhist Mission in Central Asia," *in*: *Anjali*, *Felicitation Volume Presented to O.H. de Alwis Wijesekera*, ed. By J. Tilakasiri, Peradeniya, 1970, 55－62.

⑥ BRS见注（4），JB见注（2），FB见注（5），KTS见K. T. Schmidt, *Der Schlußteil des Prātimokṣasūtra der Sarvāstivādins*,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XIII,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89, 38－52.

⑦ H. W. Bailey, "Gāndhārī," *BSOS*, XI, 1946, 764－797.

⑧ 《大正藏》卷22，第1429－1430号。

⑨ 《大正藏》卷22，第1431号。

⑩ M.L. Finot, "Le Prātimokṣasūtra des Sarvāstivādins Texte Sanskrit," JA, 1913, 538－543.

⑪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s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37, 28.

⑫ E. Waldschmidt, "Central Asian Sūtra Fragm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Agamas," in: H. Berchet (ed.), *The Language of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ditio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1980, 162－169.

⑬ Chung Se Kim: "Ein chinesisches Fragment des Pratimokṣa aus Turfan," *AM* II, 1952, 597.

四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佉卢文《法集要颂经》残片

佉卢文本是拼写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罗语的一种文字，但是新疆所出公元3—6世纪佉卢文书表明，这种文字还用来拼写梵语，甚至吐火罗语。本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勒柯克在库车苏巴什古城发现的一些寺院题记即用佉卢文拼写吐火罗语，[1]而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一些佉卢文佛经则用佉卢文拼写佛教梵语。[2]本文将要讨论的佉卢文《法集要颂经》残片采用了梵语才有的连声规则，经文中还出现犍陀罗语所没有的长元音符号。尽管它的基本语言结构是犍陀罗语，但明显受到佛教梵语影响。

《法集要颂经》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教派对《法句经》的称谓。这是一部以偈颂（gātha）形式汇集的佛陀语录，它在佛教典集中的地位相当于儒家经典《论语》，因而被视为最基本的佛教入门书。汉末移居中国的大月氏高僧支谦曾这样评述《法句经》。他说：

> “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叙。此乃始进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藏也。可以启蒙、辩惑、诱人自立。学之功微，而所包者广，实可谓妙要者哉。”

正因为如此，《法句经》成为最早传入中国的佛典之一，东汉年间传入中国。汉末支谦翻译《法句经》时中国已有数部《法句经》译本流行于世。吕澂认为东汉译经《四十二章经》很可能不是《阿含经》的经抄，而是小乘佛教某个部派的《法句经》

译本。[3]

《法句经》一直受到中国佛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不断有新译本问世。敦煌藏经洞亦收藏了许多《法句经》或《法集要颂经》汉译本。除汉文译本外，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新疆和田、库车、吐鲁番和尼雅等地的古代遗址和敦煌藏经洞也发现了大批胡语《法句经》写本残卷。计有：粟特语、于阗语、吐火罗语、犍陀罗语、吐蕃语等译本。其中佉卢文犍陀罗语《法句经》抄本的年代最早，大约抄于公元2世纪末。[4]但是这部出自和田的犍陀罗语《法句经》是个残本，没有和我们讨论的这部《法集要颂经》相应的部分。支谦译《法句经》融合了几种传本的《法句经》，其中可能包括犍陀罗语《法句经》。相应的文字是："睡眠解寤，宜欢喜思。听我所说，撰记佛言。所行非常，谓兴衰法。夫生辄死，此灭为乐，譬如陶家。"本文将要讨论的佉卢文佛教梵语《法集要颂》残片的内容与其略有不同。

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书中有许多佛经残片，我们讨论的这件残片被编为204号。这段经文抄在一件鄯善王元孟纪元7年（约334年）的世俗文书的边缘。[5]文书的校订者波叶尔等人和英译者巴罗均未能考证出这段佛经属于哪部佛典。[6]1965年汉堡大学梵文教授伯恩哈特校勘梵文本《法集要颂经》时发现佉卢文204号文书所抄佛经实际上是《法集要颂经》的诗颂，相当于梵文本《法集要颂经》第一品《有为品》开头几句。由于伯恩哈特不是佉卢文方面的专家，所以他基本照录波叶尔等人的转写，没有根据他的发现重新校订这段佛教梵语经文。[7]波叶尔等人对这段佛经残文的拉丁字转写如下：

sidhya me vi (or sti) na mi tu [śi] ro k[ṛ]tva sampr[e]ṣitva mānasa śrunota me pra[ś]i ch'e mi a t. — budhabhaṣita eva vukta bhagavata vi pra mu e

斯坦因没有发表204号文书佛经部分的照片，目前我们只能

根据波叶尔等人的转写、参照他们在这件文书的校勘记中提供的一些选择读法，以及梵本《法集要颂经》的相应部分，对这件文书佛经部分进行校勘。伯恩哈特校勘的说一切有部梵本《法集要颂经·有为品》（anityavarg，udānavarga）相关文字的拉丁字转写如下：

1. siddhaṃ
2. stīnamiddhaṃ vinodyeha
3. sampraharṣya ca mānasaṃ/
4. śṛṇutemaṃ pravakṣāmi
5. udānaṃ jinabhāṣitaṃ// 1
6. evaṃ uktaṃ bhagavatā
7. sarvābhijñena tāyinā/

《法集要颂经》现存最早的汉译本是公元399年姚秦僧伽跋澄和竺佛念所译《出曜经》，[8]而宋僧天息灾于公元985年所译《法集要颂经》可与伯恩哈特校订的梵文本对勘。天息灾将这段经文译作：

1. 能觉悟烦恼，宜发喜欢心；
2. 今听我所集，佛所宣《法颂》；
3. 如是佛世尊，一切智中师，慈悲为有情，广说真实语。[9]

比较前引梵文本和佉卢文本《法集要颂经》，可知两者内容大致相同，但修辞不尽相同，依次讨论于下：

第1字 sidhya me 显然读作 sidhamme = sidhammi，和梵本 siddhaṃ 对勘。该词意为“获得最高果位的人，旧译‘先见者，预言者’”[10]。不同的是，在梵文本中该词的语法形式是单数业格，而佉卢文本采用单数依格。

第2字 vi na mi tu 显然读作 stinamitu，相当于梵本 stīnamiddhaṃ。在佉卢文佛经中，语尾-u 往往相当于梵本-aṃ[11]。这件佉卢文佛经提供了又一例证。

第3字 [śi] ro k[r]tva 大概读作 [vi]nod[i]tva，相当于梵本 vinodya（= vi + nud，“消除”）[12]。但佉卢文写本没有和梵文本 iha（在此）对应的词。若有相应的字，当写作 iśa（在此）。

第4—5字 sampr[e]ṣitva mānas[u]和梵本 sampraharṣya ca mānasam 对勘。但是佉卢文本中没有与梵文本 ca（和）对应的词。此外，犍陀罗语没有长元音，而这件文书中的 mānas[u]显然受梵语影响。

第6字 śrunota me 大概读作 śrunot[e]me，相当于梵本 śṛṇutemam。犍陀罗语语法规则没有连声，这里的 śrunot[e]me 无疑采用了梵语的连声规则，即 śrunota“听者” + ime“这些”。

第7字 pra[ś]i ch'e mi 显然要读作 pra[va]kṣami，相当于梵本 pravakṣāmi（我向……宣讲）。

第8字 a t. -或读 ut[āne]“无问自说的颂词”，相当于梵本 udānam，即这部佉卢文《法集要颂经》的经名，僧伽跋澄译作《出曜》，天息灾译作《法颂》。

第9字 budhabhasita（佛陀之言）和梵本略有不同，梵本为 jinabhāṣitam（耆那之言）。

第10—11字 eva vukta 和梵本 evam uktam（如是说）基本相同。

第12字 bhagavata vi 似应读作 bhagavataya，和梵本 bhagavatā（世尊）对勘。

第13字 pra mu e 无疑读作 pramu'e，相当于梵语 pramukha（最初的），但梵文本中没有相应的词；而梵本中一些佛陀名号亦不见佉卢文本。

据以上讨论，这件佉卢文《法集要颂经》残文的拉丁字转写如下：

1. sidhamme

2. stinamitu [vi]nod[i]tva saṃpr[e]ṣitva mānasa/

3. śrunot[e]me pra[va]kṣāmi ut[āna] budhabhaṣita//

4. eva vukta bhagavataya pramu'e

据以上转写，这段佛经意为：

1. [请听] 我这个已获得最高果位的人说！

2. 从疲倦的睡眠中醒来后，令人满心欢喜，

3. 我要向这些听众宣讲佛的语录《法集要颂》。

4. 世尊最初是这样说的：

《法句经》或《法集要颂经》的成书颇为复杂，实际由佛门徒弟子所编，但不像《论语》那样有较为统一的传本。因为佛去世后，佛教分裂出许多部派，它们使用的经堂用语是不同的，编撰的佛典亦有部派之别。故《法句经》在形成之初就有许多不同传本，如犍陀罗语《法句经》属于小乘佛教法藏部编撰的《法句经》，而《法集要颂经》属于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法句经》。《大毗婆沙论》卷1记载：

> "佛去世后，大德法救展转随闻，随顺纂集，制立品名，谓集无常颂为无常品，乃至梵志颂为梵志品。"

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经堂用语为梵语，故法救所集《法集要颂经》为佛教梵语本。[13]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犍陀罗地区说一切有部亦用犍陀罗语传教，例如：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发现的俱兰（Kurram）舍利石函铭刻即说一切有部的僧人刻写的犍陀罗语铭刻。[14]如果这个推测不误，佉卢文《法集要颂》当是说一切有部僧人为在犍陀罗地区传教而采纳的佉卢文本。

注 释

① 见 Lin Meicun, "A Formal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from Subashi"，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328－347页。

② A. M. Boyer et al., *Kharosṭhi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I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7, 295.

③ 吕澂：《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76－282页。

④ J. Brough, *The Ga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1962；林梅村：《犍陀罗语<法句经>的部派问题》，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⑤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vol. II, Oxford, 1907, Pl. CI. 关于尼雅佉卢文书的年代讨论，参见林梅村：《佉卢文时代的鄯善王世系》，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

⑥ A. M. Boyer et al.,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7, 79; 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0, 37.

⑦ F. Bernhard, *Udānavarga*, Band I,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X,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 – Hist. Klasse, No. 54, dritte Folge, 1965, 95.

⑧ 僧伽破澄和竺佛念译：《出曜经》，《大正新修大正藏》本缘部IV，第212号。

⑨ 天息灾译：《法集要颂经》，《大正新修大正藏》本缘部IV，第213号。

⑩ 《梵和》第1469页。

⑪ 季羡林：《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6－96页。

⑫ 《梵和》第711页。

⑬ Akira Yuyama, "Bu-ston on the Languages Used by Indian Buddhists at the Schismatic Period," *The Language of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dition*, ed. by H. Berch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0, 175－181.

⑭ S. Konow,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s*, Calcutta, 1929, 155.

五　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

中国古代金银器的研究历来受到海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瑞典学者俞博（1957年）、苏联学者马尔沙克（1971年）、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孙培良（1977年）、日本学者桑山正进（1977和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1978年和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段鹏琦（1980年）、英国学者罗森（1982年）、美国西密西根大学熊存瑞（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1984年）、陕西考古研究所陆九皋和韩伟（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雍（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宿白（1986年和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卢兆荫（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焯（1987年）、陕西考古研究所韩伟（1989年）、甘肃省博物馆初仕宾（1990年）、广州中山大学姜伯勤（1991年）、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美术博物馆石渡美江（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齐东方（1992年）、法国学者史蒂文森（199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孙机（1993年和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超（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1996年）先后进行过有益的探讨。[1]我们今天能对中国古代金银器有如此丰富的知识首先应感谢他们的研究。

古代中国本不以金银为容器，王公贵族后来用金银作器明显受北方游牧民族或西方文化影响，中国境内出土的金银器有些原

本就是外来之物。因而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标本。中亚、西亚诸国和欧亚草原游牧人很早就开始在金银器制作工艺方面进行技术交流。单凭器物类型或纹饰，有时难以确定其文化属性。所以那些带有铭文，尤其是带有胡语铭文 的金银器标本显得弥足珍贵。本文将讨论中国境内出土的五件带有粟特、中古波斯或大夏铭文的银器，希望这项研究能有助于推动中国古代金银器研究的深入。

标本 1　长安出土鹿纹十二瓣银碗

这个带粟特铭文的银碗是 1963 年春在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的，同出的还有 14 件唐代银器。据调查，这批银器的发现地点在唐长安城范围内，位于唐兴庆宫遗址正南 1.5 公里左右，在唐长安城春明门与延庆门之间。[②]现在这批唐代银器分藏中国历史博物馆（8 件）、故宫博物院（3 件）和西安市文管会（4 件），我们讨论的这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号 Y1930。

据发掘简报介绍，这个银碗为“圈足、圆口、腹部十二曲，高 4、口径 14.7、底径 4.8 厘米。碗底正中有阴雕长角鹿的图案，鹿高 6.7 厘米”，但原报告未提到其上有铭文。韩伟最先注意到这件银器口沿下有一行铭文。他在讨论唐代金银器的书中对这件银器的铭文做了摹文（参见插图 11）。[③]这个银碗，特别是碗心的鹿纹图案和马尔沙克刊布的 OS136 号粟特银碗基本相同，后者带有一粟特王族族徽符号，类似的符号亦见粟特王发行的钱币，所以马尔沙克推测这种银盘的流行年代当在 7—8 世纪。[④]

1991 年 8 月间，我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再次核对了铭文，重新做了摹文并拍摄了铭文照片（参见插图 12）。[⑤]从文字体系看，这件银器上的铭文属于阿拉美文字母体系，波斯、粟特和花拉子模等民族都使用这个体系的文字。由于我国没有学者能释读这类文字，所以我把这个铭文的摹文和照片寄给了英国语言学家西姆

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博士，请他帮助释读。他很快回信告诉我，这行铭文是粟特文，读作 Zrwmβntk（祖尔万神之奴仆）。但他怀疑这行铭文的第一个字母或许读 δ 或 n，即采用古粟特语或 z 的交替读法。[6]

祖尔万神，波斯语作 Zurvān。[7]这位神灵本是古代波斯万神庙中崇祀的主神之一，后来成为琐罗亚斯特教的崇祀的重要神祇。因为琐罗亚斯特教崇拜火神，我国史籍称其为火祆教。萨珊波斯时期，特别是波斯王沙普尔一世在位时（242—272 年），祖尔万神受到一批西亚火祆教徒的特别推崇，形成所谓 Zurvanism（祖尔万教派），以至被视为琐罗亚斯特教正统教派的异端。[8]英国语言学家亨宁研究粟特宗教文献时发现祖尔万教曾在中亚粟特传播。[9]海德堡大学教授耶特马尔（K. Jettmar）领导的德国考察队近年所做考古调查证实了这一点。该考察队在印度河上游丝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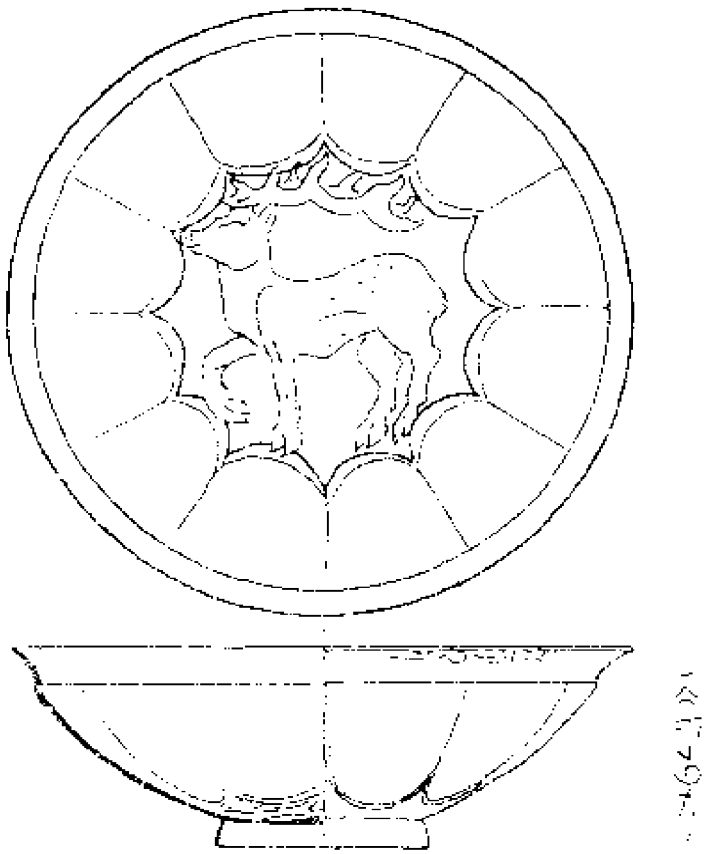


插图 11　长安出土鹿纹十二瓣银碗

古道旁的摩崖上发现粟特商人刻写的粟特文祖尔万神的名字Zrwm。[10]既然我们讨论的这件银器上的粟特铭文意为“祖尔万神之奴仆”，作器者一定是位火祆教祖尔万教派的粟特教徒，那么这件银器的发现地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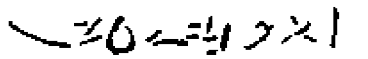


插图 12　鹿纹十二瓣银碗铭文摹文

据唐宋文献记载，唐长安城内有祆祠四所。宋敏求《长安志》卷 9 提到唐长安城“靖恭坊街南之西”有祆祠一所。这个记载为 80 年代初的考古发现证实。1980 年西安东郊西北发现了一座在长安为质的波斯王孙墓葬。墓中所出《大唐故陇西郡李公墓志》记墓主人曰：“公讳素，字文贞，西国波斯人也。……公本国王之甥也……天宝中衔自君命，来通国好，承我帝泽纳充质子……拜银清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特赐姓李，封陇西郡，因以得姓也。……元和十二年（817 年）岁次十二月十日终于静恭里也。”[11]波斯王以火祆教为国教，李素既然为波斯王甥，当是火祆教徒。隋唐所谓“里”或称“坊”。[12]因此李素卒地“静恭里”显然就是唐长安城内设有祆祠的“靖恭坊”。由此可证唐长安城靖恭坊确有火祆祠堂。据考古调查，靖恭坊即兴庆宫正南第三坊，位于春明门与延兴门之间。[13]因此我们讨论的这件火祆教徒所用银器或许出自唐长安城靖恭坊那座祆祠遗址。如果这个推测成立，则为我们寻找唐长安城内祆祠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

标本 2　焉耆出土粟特银碗

这个粟特银碗是 1990 年在新疆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出土的。当地村民在这里烧砖取土时无意中挖出 6 件银器，其中两件带有铭文。另外一件带铭文的银器即本文标本三（详下）。1991 年我到新疆进行考古调查时，巴州文管所何德修所长向我介绍了上述

情况，后来又请该文管所副所长覃大海作了铭文的摹文寄到北京，委托我解读这些铭文。铭文刻写在银碗的口沿下（参见插图13）。

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根据我转给他的这个银碗的摹文，鉴定这行铭文是粟特文，读作 ZNH ZY y'mk Zkwy txs'ycyh γ'δp' nynyh xr'ryh Zkwyh δrsm'tyh xypδ 30 s n'krtk，意为"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达尔斯玛特神，银重 30 斯塔特（staters）"。他解释说，铭文中的 txs'ycyh 源于粟特神祇 txs'yc（得悉神）之名，但采用阴性语尾，他分析这里或用作女性的人名。δrsm'tyh 则源于另一位粟特神祇 δrsm't（达尔斯玛特神）之名，也采用阴性语尾。后者还以粟特人名 δrsm'tβntk（达尔斯玛特神之奴仆）的形式出现在印度河上游丝绸古道摩崖石刻中。[14]只是他一时不能确定 γ'δp' nynyh 和 xr'ryh 的确切含义。[15]亨宁《粟特神祇考》提到一位粟特神祇，名曰 xärənah。[16]其名和这个银碗上的神名 xr'ryh 相近，不知是否为同一神。这三位神祇的名字都采用阴性词尾，或表明他们是三位女神。如此之多的神灵出现在这行铭文中，使人怀疑这个银碗或为宗教祭器。

插图 13　焉耆出土粟特银碗口沿下铭文摹本

需要讨论的还有这件银器采用的度量衡。古希腊标准（Attic standard）度量衡是：1斯塔特＝4德拉克麦（drachma），每德拉克麦重3.411克。[17]古代中亚也采用希腊度量衡体系，但中亚出土文物的实测数据表明，中亚度量衡和希腊略有不同。据美国梵学家邵瑞祺（R. Salomon）近年研究，中亚流行的希腊度量衡是：1斯塔特＝15.08克；1德拉克麦＝3.77克。[18]我曾在巴州文管所见到这件粟特银碗，基本无锈。何德修用天平测得其重量约为534.5克。那么作器者采用的度量衡是：1斯塔特＝17.81克；1德拉克麦＝4.454克（534.5÷30×4）。这个重量既超出了古希腊标准度量衡，也超出了中亚流行的希腊度量衡。不过近年发现粟特人采用的希腊度量衡的比值较高。例如乌兹别克斯坦达利维尔津·塔佩遗址出土的带佉卢文度量衡单位的金条和银器表明粟特人采用的度量衡是：1斯塔特＝17.08至17.89克，也即每德拉克麦重4.27至4.47克。[19]那么焉耆出土的这个粟特银碗采用的度量衡仍在粟特流行的度量衡每德拉克麦重4.27至4.47克的范围之内。

关于银器上提到的粟特神祇，《新唐书·西域传》记载："西曹者，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览，治瑟底痕城。东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国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汉时天子所赐。"亨宁曾在《粟特神祇考》一文中指出，粟特神祇txs'yc（读作taxsīč）就是《新唐书·西域传》所谓"得悉神"。[20]如所周知，粟特人以火祆为国教，得悉神当是粟特火祆教神祇。因此这件提到得悉神的粟特银器可能是粟特火祆教徒的祭器。《北史·西域传》记载，焉耆"俗事天神"。[21]尽管文献一再提到焉耆历史上曾流行火祆教，但这里从未发现过和火祆教有关的遗址或文物。焉耆发现的这件粟特银器首次提供了火祆教流行于焉耆的考古学证据。

火祆教传入焉耆显然与粟特人在西域的活动有关。《旧唐书·西突厥传》载："统叶护可汗（619—630年在位），勇而有谋，

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税。”西突厥派往西域诸国的吐屯大都是粟特人，例如唐初在鄯善建立移民点的康艳典就是西突厥派往西域的一位粟特吐屯。[22]彼得格勒收藏的一件新疆出土粟特残文书还记录了下嫁焉耆王的一位西突厥公主——焉耆可敦（'rkc'nch x't'wnh）。[23]这个材料披露出粟特人不仅在焉耆替西突厥监督税务，而且对焉耆王室都有影响，并代为书信。既然有这样一个背景，那么火祆教之所以被粟特人传入焉耆就不难理解了。

标本 3　焉耆出土波斯银碗

这个波斯银碗是和标本 2 一起发现的。巴州文管所工作人员为它清洗除锈时发现碗上有铭文。据巴州文管所副所长覃大海来信介绍，这个银碗口径 20.5 厘米，通高 7.4 厘米，圈足高 2 厘米。除锈后，器重 826.4 克（另一次测重是 830.35 克）。[24]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根据我转给他的何德修的拓片（参见插图 14）和摹文，鉴定这件银器上的铭文为一组中古波斯文数字，但读法不易确定。从银器重量看，他的第一种读法可能是正确的，圈足上的铭文读作 d 100 20 20 10 2，意为“152 德拉克麦”。[25]以此推算，作器者采用的度量衡是每德拉克麦重 5.43 克（826.4÷152）。这个数字大大超出了印度和波斯采用的希腊度量衡每德拉克麦重 3.264 克。[26]这件银碗的碗底尚有一个中古波斯文数字 20。如果这个数字是补充圈足上的数字，这件银器上的铭文意为“器重 172 德拉克麦”。那么作器者采用的度量衡是每德拉克麦重约 4.80 克（826.4÷172）。这个重量仍然超出了印度和波斯采用的度量衡每德拉克麦重 3.264 克，但和粟特流行的希腊度量衡每德拉克麦重 4.27 至 4.47 克相近。另一可能性是，这行铭文是说这

件银器价值152或172德拉克麦。我们的后一推测似乎可能性更大。

插图14　焉耆出土波斯银碗圈足铭文拓片

这件银器曾于1992年送到日本参加楼兰王国文物展，它的一组彩色照片刊于朝日新闻社编写的新疆文物展览目录。日本朋友在该书介绍说，据林梅村鉴定，这件银器圈足上的文字为粟特文云云。[27]显然他们把这件银器铭文和未参展的标本2的铭文混淆了。事实上，银器铭文的鉴定者为英国语言学家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而碗上文字为中古波斯文。中古波斯文，属于中古时期波斯南部方言。西亚和中亚火祆教和摩尼教经典即用这种文字书写。[28]

标本4　大同出土大夏八曲银洗

这件大夏八曲银洗是70年代在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平城遗址一个窖藏出土的，“高4.5、口径9.6、足径5.4厘米……洗心在椭圆形环内锤出二海兽”。与其共同出土的还有鎏金高浮雕人物纹高足鎏金铜杯、镶嵌高足鎏金铜杯、线雕人物纹高足银杯（高足佚失）、锤雕缠枝葡萄纹高足鎏金铜杯各1件。[29]据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分析，这批颇具西方艺术特色的银器和鎏金铜器当来自西亚、中亚，埋葬时间约在5世纪末6世纪初。[30]这件银洗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八曲造型，艾米尔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萨珊波斯的八曲银盘的造型和它很相似，但两者圈足、口沿和壁面纹饰均不

同。所以夏鼐先生认为这个窖藏中的“三件鎏金高足铜杯和一件部分鎏金银碗，也是输入的西亚或中亚的产品，带有强烈的希腊化的风格，但不是萨珊式的”。[31]80年代末大同出土文物送到日本参加丝绸之路文物展，日本学者对这批文物的产地持不同意见，并在展览说明中提出它们是公元386—500年间东罗马艺术品。[32]

由于没有除锈，大家起初不知道这件银洗上有文字。1993年我在美国访问时承蒙北大同学熊存瑞邀请，到他任教的西密西根大学访问。他找出当年在大同实习时从一个北魏银盘上摹写的胡书文字请我帮助释读。这件银盘用锤錾技法在盘心打制出海兽纹，盘形呈八曲状，文字写在银盘口沿下，这正是70年代初在大同出土的那件八曲银洗。[33]

银洗上所书文字并非我所通晓的印度雅利安语系统的文字。我起初怀疑是粟特或婆罗钵文，故写信向德国伊朗学家松德曼（W. Sundermann）博士请教。他很快回信告诉我这行铭文是大夏文（参见插图15）。他读出这行铭文的最后四个字母是xobo（拥有），其前铭文读作xoŝo或xaŝo。所以他怀疑该词可能是这件银器所有者的名字。大概由于铭文开头部分摹写得不够规范，他不能释读这部分铭文。[34]我立即找朋友向大同有关部门要铭文照片，可惜迄今没有答复。所以关于这个铭文目前只能提供上述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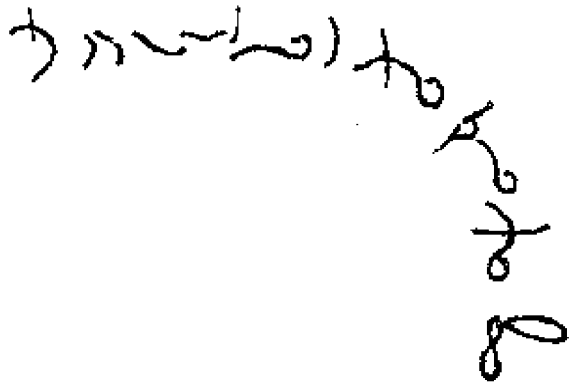


插图15　大同出土大夏八曲银洗铭文摹文

这件文物的重要价值在于首次向我们披露了公元5—6世纪，大夏银器的形制。如所周知，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雄主亚力山大远征中亚和北印度将希腊文化带入大夏，此后希腊移民成为大夏的统治者。据苏联、法国和美国考古团在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发掘，大夏的城市、建筑和文物都带有浓郁的希腊文化色彩。大夏遗址不仅有希腊神庙，还出土了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手稿。[36]公元5世纪30年代哌哒击败贵霜残部，入主大夏。[37]然而哌哒人很快被大夏当地的先进文化所同化。他们放弃游牧生活，走向定居，放弃传统萨满教改奉大夏流行的火祆教即突出的两例。我们注意到，和这件大夏银洗同出的缠枝葡萄纹高足鎏金铜杯"外壁饰浮雕缠枝葡萄和裸体儿童形象"。[37]所谓"裸体儿童"应是希腊神话中的厄洛斯，也即罗马爱神丘比特的艺术形象。1979年阿富汗西北发现的大月氏王陵中的黄金艺术品中罗马爱神丘比特的形象就是一个裸体小男孩。[38]类似的丘比特像还见于大夏出土的一个用锤錾技法制作的银碗残片。[39]公元517—552年间，北魏僧人宋云和惠生曾访问哌哒，据他们介绍，"十月之初，至哌哒国……四夷之中，最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道，煞生血食，器用七宝"。[40]七宝系佛教名词，《法华经》以金、银、琉璃、砗磲、码瑙（玛瑙）、真珠和玫瑰为七宝。其他佛经有不同说法，但都以金银为七宝之首。[41]由此可知入主中亚的哌哒人使用金银器。目前所知哌哒统治时期的大夏金银器甚少，或许混同于波斯或粟特银器，而山西大同发现的这件银器以及出于同一窖藏的其他几件明显带有希腊艺术风格的银器和鎏金铜器为我们研究这个时期大夏金银器的形制提供了重要标本。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奈良正仓院南仓收藏的一件鎏金八曲铜盘和大同所出八曲银盘的形制非常接近，只是没有盘心的图案，[42]估计是这类银盘的仿制品。倭国与北魏的交往文献失载，但是考古资料有所反映。据北京大学苏哲考证，1985年日本奈良县藤之木古坟出

土的鎏金马具即肇源于北魏工艺技术。正仓院珍藏的八曲鎏金铜盘则为我们研究北魏艺术之东渐提供了新的例证。

据《北史·西域传》记载，哌哒鼎盛时期“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与蠕蠕婚姻。自太安（455—459年）以后，每遣使贡献……永熙（532—533年）以后，朝献遂绝。”[44]1964年河北定县塔基所出北魏舍利石函中曾发现过一枚刻有大夏文的哌哒钱币。[45]这枚哌哒钱币和大同出土这批大夏文物当与公元459—533年间哌哒和北魏频繁交往有关。

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已经注意到内蒙古呼和浩特西郊一座北魏墓出土的高足银杯和大同出土的高浮雕人物纹高足银杯类似。[46]这两件高足银器可能都属于哌哒统治时期的大夏艺术品。它们有一共同特点，即普遍采用高足。这个风格似乎受到哌哒艺术影响。哌哒本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或以为系匈奴人的一支，西方史料称其为“白匈奴”。哌哒人原来使用的金属容器大概是匈奴流行的那种高足的铜镀。[47]大同和呼和浩特出土的这些高足银器和高足鎏金铜器的制作似乎都受这种高足铜镀器型的影响。如果这个推测不误，哌哒统治大夏后不仅入乡随俗，接受了当地文化，而且对当地希腊化大夏文化也产生了影响。法国学者格鲁赛早年推测大夏希腊化艺术毁于哌哒人之手。[48]大同出土的这批哌哒统治时期的大夏艺术品证明这个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

标本5　甘肃靖远出土大夏鎏金银盘

这件鎏金银盘是1988年秋在甘肃兰州东北靖远县北滩乡一所农舍房基下出土的。甘肃省博物馆初仕宾先生曾撰文讨论。银盘呈圆形，鎏金；直径31厘米、高4.4厘米，重3180克；有一矮圈足焊接于盘底并在圈足上用虚点鎏金写出一行文字。他绘制了此银盘线图并做了铭文摹文（参见插图16），并推测此盘为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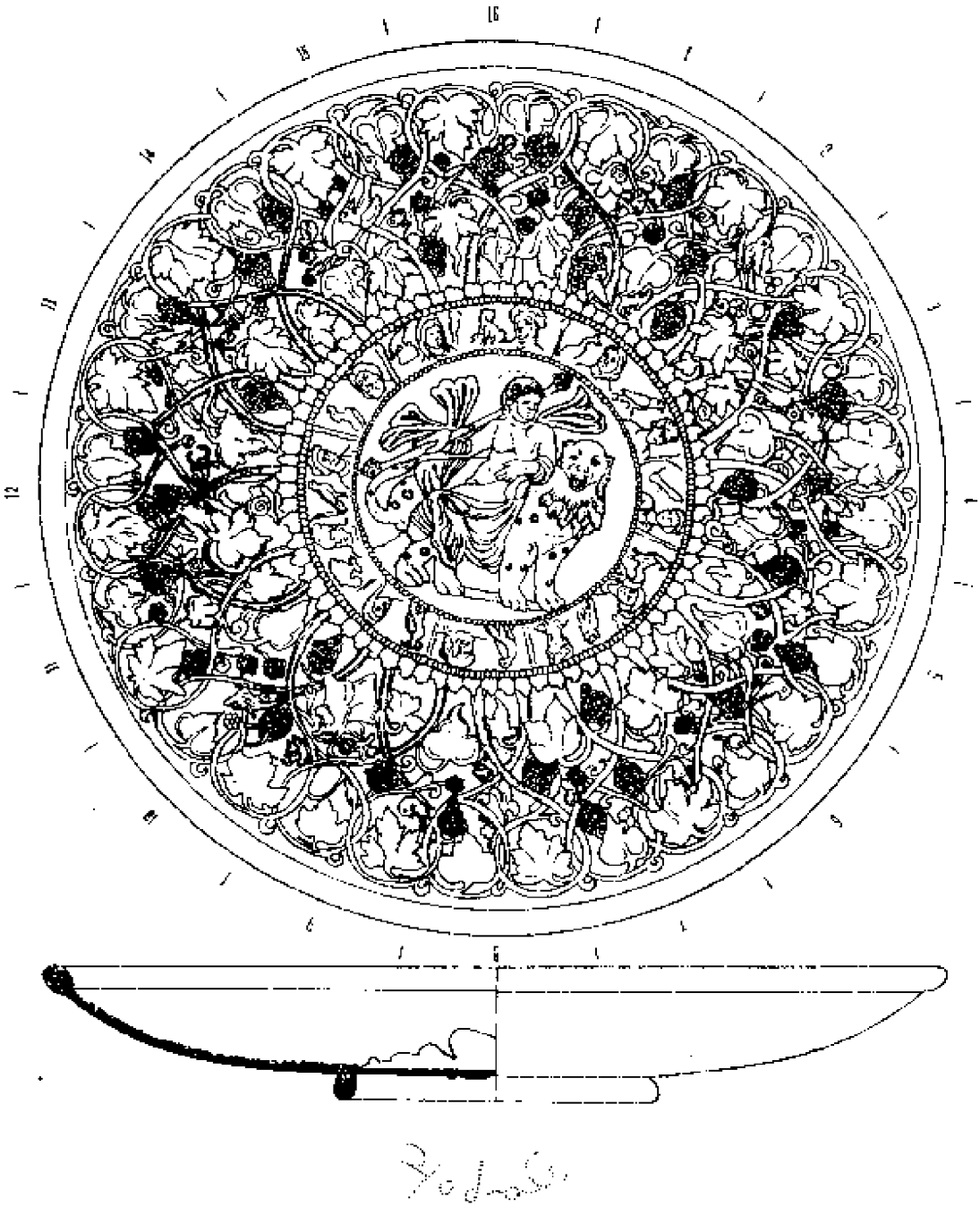


插图 16　甘肃靖远出土大夏银盘及其摹文

罗马艺术品。

这件银盘的鎏金技法以及银盘内壁主体花纹缠枝葡萄纹和大同出土北魏葡萄纹鎏金铜器相似，故两者当属同一时代。初先生还正确考证出盘心周围的十二个人物当即希腊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即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凡六男六女，或称“宙斯十二神”。但他不能解释盘心神像究竟是谁，并推测说，“盘心神像，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腊神话中别的人物”。

据介绍，银盘“内层直径 9.5 厘米，为一凸起的圆形银片……薄片经模压（或从反面锤打）呈高浮雕纹样。主体是一青年男神，面部漫漶，卷发，下颏无须，上身全裸，小腹及脐部以下掩裹大巾，巾角反绕双肘，飘拂体侧，肩扛两端装饰花蕾的‘权杖’，倚坐一雄师之背，神态优雅。狮颈部鬣毛丛生，肢体饰圆斑纹”。[49]正如石渡美江和史蒂文森指出的，银盘上的这位“青年男神”无疑即罗马神祇巴卡斯（Bacchus），[50]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在古希腊宗教中，他是丰收与植物的自然神，特别以酒和狂欢之神著称。相传他首创用葡萄酿酒，并把种植葡萄和采集蜂蜜的方法传播各地。甘肃靖远出土的鎏金银盘内壁主体图案正是表现狄俄尼索斯的缠枝葡萄纹。《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狄俄尼索斯神像特征时说，“他的个人表征是一个常春藤的花环，图尔索斯杖（杖端有松果形物）和一种叫坎撒洛斯的双柄大酒杯。在早期艺术中，他被描绘成一个蓄须男子，但后来他变成一个有女性味道的青年男子”。[51]古希腊建有许多狄俄尼索斯神庙。希腊早期戏剧源出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仪式，仪式为野蛮狂热的纵欲，以男性生殖器为崇拜目标，参加者多为女子。[52]当今欧美流行的所谓“狂欢节”盖源于此。在公元前 310

年希腊的佩拉遗址发现过一个用马赛克（Mosaic）拼成的狄俄尼索斯神像，图案是一个全裸的青年，手持杖端有松果形物的手杖，倚坐在一头花豹上。[53]其形象和甘肃靖远出土的银盘上的狄俄尼索斯神像基本相同。据实物照片，初先生所说“肢体饰圆斑纹”的狮子，很可能是一头颈佩花环的花豹。

据《魏书·本纪》记载，“普岚（即东罗马）”曾三次派使团访问北魏，可知北魏和东罗马确实有过交往。据摹文，这件鎏金银盘口沿下所书文字和大同出土大夏八曲银盘上的文字是一样的，实系大夏文。石渡美江已经注意到这件银盘的铭文是大夏文，但是他把这行铭文倒过来读，以为是个人名并推测说：这件银盘的年代在公元2—3世纪，原产地在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西亚，然后出口到大夏；公元3—4世纪被刻上大夏文，最后在公元4—5世纪传入中国甘肃。[54]石渡美江对这行大夏铭文的解读似有误。如果我们按照原报告的摹文正读，问题就不会有那么复杂。

据我们初步研究，这行大夏铭文当读作 stadēr 400 90，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55]

大夏语属于东伊朗方言，采用草体希腊文作为书面语言。“斯塔特”是大夏语中希腊语借词，本义为“金币”，或用来表示度量衡单位。[56]据阿富汗西北席巴尔甘发现的公元1世纪左右大月氏王墓所出大夏金银器铭文，大夏人采用的希腊度量衡是1斯塔特 = 15.56—15.64克。[57]如果这行铭文说的是器物重量，那么大夏文斯塔特后面的数字应是203（3180÷15.64）。据初先生的摹文，这段铭文中“斯塔特”后面的两个数字很清楚，应是表示数目字400的大夏字母 u 和表示数目字90的大夏字母 q，也即490。那么这段铭文只能解释成这件鎏金银盘的价格。以此推算，这件鎏金银盘价格中的203金币当是材料费，余下的287金币大概是加工银盘的工艺费。

早在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就被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立为官方宗教，公元340年阿瑟内希厄斯把隐士的修道生活引进西方，标志着一种以强烈的禁欲主义运动来反对西方腐朽生活的开始。[58]因此放纵无度的狄俄尼索斯崇拜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罗马帝国晚期和东罗马时代受到严令禁止。这个时期罗马人或罗马统治下的北非似乎不会制作以狄俄尼索斯神为主题的艺术品。更说明问题的是这件鎏金银盘写有大夏文，所以我们相信甘肃靖远出土的这件颇具希腊罗马风格的艺术品当属大夏银器。目前大夏本土发现的金银器有两批重要收集品。

其一，阿姆河宝藏：1877年在阿富汗北境阿姆河南岸昆都士附近发现的，几乎全是金器，只有少数银器、印章以及数以千计的古代钱币。据这批宝藏的整理者英国考古学家道尔顿（O. M. Dalton）统计，共有180件器物和1300枚古代钱币。容器类有金瓶、金盘、金碗等；雕像类有银制的人像、金制的人头、马、鹿、鱼、鹅像和四马齐驱的双人战车模型等；带浮雕的金牌饰和金纽扣种类繁多，其中锤锲打制的武士像和有翼狮子金牌有40多个。此外还有两件精致的手镯，一件两端装饰兽头，另一件两端为羚羊角状装饰有翼狮身鹰首。这些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极其复杂，既反映了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化传统，也有后来兴起的大夏希腊化文化因素以及中亚草原斯基泰艺术的特点。[59]

其二，大夏黄金宝藏：1979年由苏联和阿富汗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大夏古都（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之西70公里处发掘出埋藏数万黄金制品的大月氏王陵。此地位于阿富汗北境席巴尔甘东北5公里一个名叫“黄金之丘”的地方。古墓建在一个公元前1000年大夏史前神殿遗址之上，共有六座排列有序的墓葬，墓中随葬了成千上万件古代罗马、安息、印度、斯基泰和西汉艺术品。其中黄金制品多达2万件，可谓尽收天下宝物。大夏黄金宝藏中容器不多，计有花边口沿素面银钵、带盖圆

形银盒、素面银钵、素面鼓腹大银盆、素面青铜钵、32 曲金盘、提梁叶纹金桶、素面小金罐、鎏金葡萄纹银桶等。[60]

阿姆河宝藏的年代为公元前 5—前 2 世纪，当时大夏艺术主要受古波斯文化影响；大夏黄金宝藏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1 至公元 1 世纪，亚力山大带来的希腊文化这时已被大夏人普遍接受，成为大夏的主体文化；而甘肃靖远发现的这件大夏银盘和大同出土的大夏银器以及鎏金铜器表明，公元 5 世纪末至 6 世纪初希腊文化仍为大夏主体文化，但有些金银器的造型受到大夏新一代统治者呼哧游牧文化的影响。

原载《文物》1997 年第 7 期。

注 释

① Bo Gyllensvärd, "T'ang Gold and Silver," *BMFEA*, 1957; B. I. Marshak, *Sogdiiskie Serebro, gdavnaya redakniya v vostochnoi literature'*, Moskva, 1971; 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 年第 9 期；桑山正進：《一九五六年以来出土の唐代金銀器とその編年》，《史林》1977 年第 60 卷第 5 號第 73－84 頁；《唐代金銀器始源》，《ミュージアム》第 337 號，1979 年；夏鼐：《近年出土的中国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 年第 2 期；《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萨珊银盘考》，《文物》1983 年第 8 期；段鹏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小议》，《考古》1980 年第 6 期；J. Rawson, *The Ornament on Chinese Silver of the Tang Dynasty* (*AD* 618－906), British Museum, 1982; 熊存瑞：《唐代金银容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2 年；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银盘》，《文物》1983 年第 8 期；杨泓：《与中外交通有关的遗物的发现的研究》，收入《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陆九皋和韩伟：《唐代金银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宿白：《中国古代金银器和玻璃器》，《中国文物报》1992 年 4 月 26 日和 5 月 3 日连载（此文日文版收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编：《中国の金銀かラス展——正仓院の故郷》，日本 NHK 大阪放送局，1992 年）；

卢兆荫：《试论唐代的金花银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第一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吴焯：《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考》，《文物》1987年第5期；韩伟：《海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初仕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燧溪考古新发现》，收入《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石渡美江：《甘肃省靖遠出土鎏金銀盤の図像と年代》，《古代東方博物館》第13卷，1992年；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伊斯兰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史蒂文森（Michele Pirazzoli T'serstevens）：《外部世界文化对中国的贡献——交流与融合》，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3年；孙机：《论近年内蒙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文物》1993年第8期；《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赵超：《略论唐代金银器研究中的分期问题》，《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1994年；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

② 刘炎和何质夫：《西安市东南郊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年第6期第30－32页。

③ 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18页、第41页线图和第30页注（78）。

④ B.I. Marshak, *Sogdiiskoe Serebro, gdavnaya redakniya v voctochnoi literature*, Moskva, 1971, 136.

⑤ 这项调查得到历史博物馆保管部门的祁玉宽和吕长生先生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⑥ 此据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1992年1月15日给笔者的信。这里我们应再次感谢这位英国语言学家的热情帮助。

⑦ P. Gignoux, *Noms Propres Sassanides en Moyen-Perse Épigraphique*, *Faszikel* 2, Wien, 1986, nr. 1089.

⑧ G. Gnoli, *Zoroaster's Time and Homeland*, Naples, 1980, 211, 212 and 214.

⑨ W. B. Henning, "A Sogdian God," *BSOAS*, XXVIII. 2, 1965, 252－253.

⑩ O. von Hinüber, "Zu einigen iranischen Namen und Titeln aus Brāhmī-Inscriften am oberen Indus," *Studia grammatica iranica.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Munich, 1986, 147－162; N. 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II, 1992, 83.

⑪ 陈国英：《西安东郊三座唐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第25－31页。

⑫ 徐松《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记洛阳里坊曰："凡坊一百十三，市三。隋曰里一百三，市三。唐改曰坊。"但碑志和出土文书中唐代的坊有时也称"里"。

⑬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497页，唐长安城复原图。

⑭ N. 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II, 1992, 50.

⑮ 此据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1991年5月24日给笔者的信。这里我们应再次感谢这位英国语言学家的帮助。

⑯ W. B. Henning, "A Sogdian God," *BSOAS*, XXVIII. 2, 1965, 252－253.

⑰ 谢大任等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79页。

⑱ R. Salomon, "A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 on a Silver Goblet,"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s. 4, 1990, 152.

⑲ G. A. Pugachenkova, "Discovery of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 on the Gold Objects of the Dalverzin Hoard," *VDI*, 1, 1976, 64－71; M. I. Vorob' eyeva-Desiatiovskaia,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s on Gold Objects from Dalverzin Tepe," *VDI*, 1, 1976, 72－79; B. N. Mukherjee, "A Note on Some Kharo sṭhī Inscription," *JIAS*, 23, 1981, 163－164; R. Salomon, 前揭文，第152－153页。本文采用的数据根据R. Salomon的解读。

⑳ W. B. Henning, "A Sogdian God," *BSOAS*, XXVIII. 2, 1965, 252－253.

㉑ 这条记载并见《魏书·西域传》和《周书·异域传》。

㉒ 敦煌唐写本《沙州图经》，录文見池田温：《沙州圖經略考》，《榎博士還暦東洋史論丛》，東京：山川出版社1974年，第31－102頁。

㉓ 松崎光久：《隋末唐初焉耆王統考》，《内陸アジア史研究》第5號，1989年，第31－43頁。

㉔ 此据覃大海给笔者的信。这个银碗已经发表，参見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画局

東京企画第一部编：《楼蘭王國と悠久の美女》，東京：朝日新聞社，1988年，第328號。

㉕ 此据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1992年1月15日给笔者的信。这里我们应再次感谢这位英国语言学家的帮助。

㉖ 印度和波斯人采用的希腊度量衡见夏鼐：《“和阗马钱”考》，《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第60－63页。

㉗ 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画局東京企画第一部编：《楼蘭王國と悠久の美女》，東京：朝日新聞社，1988年，第328號。这件银器的文字解说见该书第176页。日本朋友使用这个材料根本没有经过我们。如果他们能简单地写信到北京征求一下意见，或找日本伊朗学家伊藤义教或吉田丰博士问一下，不至出此错误。

㉘ 林梅村：《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语言概述》，《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44－146页；林梅村：《固原粟特墓出土中古波斯文印章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第50－54页。

㉙ 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0年，152页图版及文字说明第15页。这个发现的最初报道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山西省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文物》1972年第1期。

㉚ 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79页。

㉛ A.U.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VII, London, 1938 (repr. 1967), Pl. 221. A－B；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第113页。

㉜ 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编：《絲綢之路大文明展·佛教芸術之路》，奈良，1988年，No. 88－91。

㉝ 关于这批大夏文物的发现时间报道不一致，一说1971年；另一说1970年，不知孰是。陶正刚和柴泽俊：《建国以来山西省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62页；中国文物交流服务中心编：《中国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115文字说明。

㉞ 据W. Sundermann博士1994年11月25日给笔者的信。

㉟ D. Schlumberger, "La Prospection Archeologique de Bactres (Printemps 1947) Rapprot Sommaire," *Syria*, XXVI, Paris, 1949, 173 – 190; Rodney S. Young, "The South Wall of Balkh-Bactr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59 – 4, 1955, 267 – 276; B. J. Staviskij, "The Capitals of Ancient Bactria," *EW*, 23, 3 – 4, 1973, 265 – 277.

㊱ 嚈哒统治中亚的年代一般认为在5世纪30年代至6世纪70年代，参见余太山：《嚈哒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74和163页。

㊲ 中国文物交流服务中心编：《中国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115号文字说明。

㊳ V.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New York / Leningrad, 1985, pl. 87.

㊴ E. Errington and J. Cribb, *The Crossroads of Asia*, London: The Ancient Indian and Iran Trust, 1992, 21, pl. 98.

㊵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所引。

㊶ 任继愈等编：《宗教词典》，北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㊷ 西川杏太郎编：《昭和六十三年第十四回正倉院展》，奈良国立博物館，1988年，第94 – 95页，图59。

㊸ 苏哲：《日本藤之木古坟出土马具纹饰初探》，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81 – 415页。

㊹ 北魏与嚈哒交往的详情，参见余太山：《嚈哒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122 – 124页。

㊺ 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石函中波斯萨朝银币》，《考古》1966年第5期第269 – 270页；林梅村：《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所藏嚈哒钱币考》，《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第3 – 8页。

㊻ 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79页。呼和浩特北魏墓共出高足银杯两件，照片见盖山林和陆思贤：《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年第3期第183页图四。

㊼ 关于欧亚草原游牧人使用的高足铜镬，参见 M. Érdy, "Hun and Xiong-nu Type Cauldron Finds Throughout Eurasia," *Eurasian Studies Yearbook, Continuation of / Fortsetzung der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 Ural-Altaic Yearbook* 67, Berlin \ Bloomington \ London \ Paris \ Toronto, 1995, 1 – 94.

㊽ R. Grousset 著、常任侠译：《印度的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49－60 页。

㊾ 初仕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89 年第 5 期第 1－9 页。

㊿ 石渡美江：《甘肃靖远出土鎏金銀盤の図像と年代》，《古代東方博物館》，第 13 卷，1992 年；史蒂文森（Michele Pirazzoli T'serstevens）：《外部世界文化对中国的贡献——交流与融合》，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3 年。

51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2 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年，第 550 页。

52 任继愈等编：《宗教词典》，北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第 527 页。

53 R.L. Fox, *The Search for Alexander*, Boston/Toronto: Tittle, Bronwnand Company, 1980, plate facing p. 60.

54 前揭文，第 157－158 页。

55 本文采用的大夏文及其数目字转写体系采用目前学界通行的转写标准，参见 G. Djelani Davary, *Baktrisch, Ein Wörterbuch auf Grund der Inschriften, Handschriftewn, Münzen und Siegelsteine*, Heidelberg, 1982, 51－52.

56 F. W. Thomas, "Drachme and Stater in Khotan," *JRAS*, 1924, 671－672; H. W. Bailey, "Indo-Iranica," *BSOS*, XII, 1949, 128－129.

57 V.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New York, 1985, 241, 251, nos. 3. 41 and 4. 31；林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及其对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义》，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267－276 页。我写此文时没有注意到这件大夏银盘上有铭文，误以为是粟特银盘，敬请研究者引用时以本文为准。

58 威廉·兰格主编、刘绪贻等译：《世界史编年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50－293 页。

59 O. M. Dalton,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 3rd edition, 1963; R. D. Barnett, "The Art of Bactria and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 *Iranica Antiqua*, vol. VII-1, Leiden: E. J. Brill, 1968, 34－132.

60 V.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New York / Leningrad, 1985.

六　尼雅新发现的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考

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出土佉卢文书的年代学研究是中亚考古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历来为海内外研究者所关注。本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尼雅发现佉卢文书后，这些文书的年代问题就提出来了。斯坦因收集品共提到五位鄯善王。因为抄写文书的书吏世代相袭，所以剑桥大学拉普逊教授根据佉卢文书中几组书吏的祖、父、子关系建立起佉卢文时代鄯善诸王嗣位的先后顺序，即白毗耶、陀阇伽、安归伽、摩习梨和伐斯摩那。[1]奇怪的是，这些鄯善王不见于汉文史料，所以他们在位的绝对年代一直是个谜。

牛津大学巴罗教授最先注意到陀阇伽纪年文书的语言明显比其他文书年代早。后来英国语言学家布腊夫据此提出陀阇伽在鄯善王年表中的位置应排在白毗耶之前。他还发现安归伽在位第17年开始使用的官号 jitumgha 来自尼雅出土西晋泰始年间木简记录的鄯善王称号“侍中”。[2]布腊夫的考证终于使佉卢文书年代学研究出现转机。此后布腊夫本人以及精通汉文史料的日本学者榎一雄和长泽和俊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该称号出现的时间，[3]以确立佉卢文时代鄯善诸王的绝对年代。

70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介入此项研究，首先取得重大突破的是中国史学家马雍，他发现拉普逊的鄯善王年表中最后一位国王伐斯摩那应即《晋书·张骏传》提到的鄯善王元孟。此前人

们只能认识佉卢文书的相对年代，马雍的发现为研究这些文书的绝对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4]

80年代末，佉卢文书年代学研究再次取得重大进展，一位以前不知道的鄯善王疏梨阇纪年文书在尼雅出土。据我们研究，这位鄯善王在元孟之后嗣位（约336—359年），那么疏梨阇文书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晚的佉卢文纪年文书。[5]关于佉卢文何时传入塔里木盆地，1991年我们在《佉卢文时代鄯善王朝的世系研究》一文中推论这个时间当在东汉末年，并首次提出斯坦因收集品549号文书记录的国王童格罗伽应是目前所知佉卢文书中最早的鄯善王。[6]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孟凡人发表《楼兰尼雅简牍年代学研究》一书，对我们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童格罗伽不是鄯善王，而是一位精绝王。[7]精绝王之说最早为英国语言学家托马斯提出，[8]我们曾在1991年的论文中予以辩驳。大概由于我们立论的理由不够充分，所以有人仍坚持托马斯的这个说法。然而就在这本书发表的同一年，尼雅考古取得重大发现，一支中日联合考察队在尼雅N.XXXⅦ遗址发掘出大批佉卢文书。[9]1996年7月间，主持这项发掘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将新发现的佉卢文书的照片带到北京，委托我们做解读工作。我们发现其中编号为95025的文书的语言与众不同，其特征接近公元2世纪中亚贵霜碑铭的语言，于是首先着手解读这件语言特征颇为古老的文书。令人振奋的是，这件文书竟然是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为使学界及时了解尼雅考古新发现与研究的最新进展，现将这件文书解读于下，求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拉丁字转写与汉文释文

这件文书采用封检形式，由底牍和封牍两块木牍组成。文书

从底牍正面开始写，若写不下，则继续写在封牍背面。我们讨论的仅是写在底牍正面上的文字，它显然没有写完，因为契约文书有一定的行文格式，用一些套话结束并有书吏署名。这些结束语及书吏署名应写在这件文书的封牍背面。可惜我们在新疆文物考古所提供的上百件照片中没找到这件封牍，只能介绍底牍部分所述内容。我们对佉卢文的拉丁字转写采用拉普逊转写体系，但个别字母的音值根据巴罗和贝利等人后来的研究作了订正，特别是ch'a更正为ksa；ng'a更正为tg'a。[10]这件文书的边缘和行间个别字残损或漫漶。圆括号中的字表示原文字迹漫漶；方括号中的字表示原文残损，根据相关材料复原。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的照片（参见彩版5），这件文书读作：

1. sam (20 10 4)[1] 2 [ma]s[e] 4 sast[e]hi 4 3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2. maha[m]tasa jeyamtasa dharmi'asa mahanu'ava raj'a tomgraka devaputrasa

3. asti ksunammi peta avanammi kilme raksana ka'uno'asa bhiti bhradu

4. atg'iya nama te buma vikridati tasuca cateyasa putra cato'asa

5. [tu]mase buma misiye milimiye 1 bhij'apayati amña bahi

6. misiyade [bu]ma ks[e]tra bhij'apayati khi 4 1 esa buma ka'(u)[no]'

7. asa atg'eya[sa ca v]ikrida krida cato'asa niyida muli (sa) -[dera]

8. hāv'amanag'a k[o]j'ama ka j'a bavamnag'a hasta 10 2 tatra sa(ksi) [hu'am]ti

9. tasuca cateyasa kitsatsa piteyasa s [othamga]

///.....[2]

10. śadavida tsaǵa

[1] 括号中的字原文字迹不清，或读 vatsara'e。

[2] 约 9－10 个字母残缺。

其汉文译文为：

1. 时唯 36 年 4 月 7 日，伟大的国王、众王之王、

2. 太上、胜利者、具法有道者、威德宏大的国王、童格罗伽天子

3. 在位之际，毗陀镇税区保护人迦乌诺亚有一仲弟，

4. 名曰阿特耆耶。他将一些土地卖给祭司左特耶之子左多亚。

5. 一块是大田野中的可耕地，能播种 1 弥里码种子。另一块是郊外

6. 的可耕地，能播种 5 硒种子。其中一块地属迦乌诺亚和

7. 阿特耆耶共有。他们将其卖出，被左多亚买下，出价（金币?）……

8. 布、毛织地毯及麻布祚。现［有见］证人出面作保：

9. 祭司左特耶、长老贝特耶、税（务官）……

10. 百户长查伽

二、文字考释

这是一份有关精绝州毗陀镇土地买卖的契约文书，写于鄯善王童格罗伽在位第 36 年。这份契约共买卖了两块田地。卖主为阿特耆耶和迦乌诺亚，均被祭司的儿子左多亚买下。祭司左特耶、长老贝特耶、佚名的税务官和百户长查伽等人出面为这桩买卖作保。如今尼雅已是满目黄沙，但鄯善王童格罗伽时代，这里显然有大片可耕地。50 年代尼雅遗址附近出土过东汉印章“司禾府印”。凡此表明，今天远离绿洲 100 多公里的尼雅遗址历史

上曾遍布沃野良田。

这件文书的古老首先体现在文书纪年上。它使用和公元2世纪中亚贵霜碑铭几乎相同的语句。例如：1. 阿富汗某地出土伽腻色迦纪元18年碑铭：sam 10 4 4 masye arthamisiya sastehi 10 is[e] ksunammi－“时唯18年arthamisiya月10日”；2. 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出土伽腻色迦纪元28年碑铭：sambatsára'e athavims' atihi 20 4 4 masye apela'e sastehi das'ahi 10 is'[e] ksunammi－“时唯二十八（28）年Apela'e月十(10）日”；3. 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出土伽腻色迦纪元51年Wardak瓮铭：sam 20 20 10 1 masy [e] arthamisiya sastehi 10 4 1－“时唯51年arthamisiya月15日”。[11]童格罗伽纪年文书用贵霜碑铭的sastehi（日）取代犍陀罗语的divase（日）。sastehi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文书中很少使用，仅见陀阇伽纪年（422号）和白毗耶纪年（656号）两件文书。而陀阇伽和白毗耶是拉普逊年表中最早的两位鄯善王。

其二，该文书表示“国王”的词写作raj'a，这是贵霜碑铭的特点，而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中这个词大都写作raya，唯一的例外是陀阇伽纪年文书。正由于陀阇伽纪年文书与贵霜碑铭的语言接近，在童格罗伽纪年文书发现之前，曾被视为佉卢文纪年文书中最早的标本。[12]

其三，文书中表示毛毯的词与众不同，写作k[o]j'ama，但在其他文书中这个词一般写作koj'ava。而新疆和田出土公元2世纪犍陀罗语《法句经》中常见va相当于ma的例子。

其四，度量衡单位milimiye（弥里码）也有早期特点，因为在陀阇伽纪年文书中这个词就写作milimi，后世鄯善王纪年文书一般写作milima。

第1行的sam系犍陀罗语samvatsara'e（年）的缩写，这个缩写词普遍应用于贵霜碑铭，但在塔里木盆地出土文书中极少采用，仅见于斯坦因收集品中236号文书。这件童格罗伽文书的年

数字迹不十分清楚，如果我们的第二种读法是正确的，这个年数当是第2年，其前文字读作 sam(vatsara) 'e，相当于前引第二个贵霜碑铭中的 sambats'ara'e（在……年），只是它在塔里木盆地出土佉卢文中通常写作 samvatsare。从残留字迹看，我们的第一种读法可能性更大。

第1—2行国王名前一连串称号和陀阇伽纪年文书所记国王称号及其用字如出一辙，陀阇伽纪年文书（422号）写作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mah[amtasa jeyatasa dharmi'a]sa mahanu'ava raj'a tajaka devaputrasa，即"伟大的国王、众王之王、太上、胜利者、执法者、威德宏大的国王、陀阇伽天子"。这些称号几乎是从中亚塞种、贵霜碑铭逐字抄下来的。例如：

1）中亚出土塞王阿泽斯钱币铭文：maharajasa mahamtasa dharmikasa rajadirajasa ayasa"伟大的国王、太上、具法有道者、众王之王阿泽斯"。[13]

2）巴基斯坦白沙瓦与咀叉始罗之间出土的贵霜碑铭：maharajasa rajatirajasa devaputrasa [ka] i [sa] rasa vajheskaputrasa kaniskasa－"伟大的国王、众王之王、天子、凯撒、婆湿色伽之子伽腻色迦"。[14]

3）楼兰LA遗址采集贵霜王阎膏珍钱币铭文：maharajasa rajadirajasa sarvaloga－īsvarasa mahīsvarasa v'ima kathpisasa tradata－"伟大的国王、众王之王、全世界之主、大自在天、阎膏珍救世主"。[15]

其中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源于古波斯王称号，伊朗发现的贝希斯顿碑铭记波斯王大流士的称号有"伟大的国王、众王之王"。maha[m]ta 相当于梵语 mahānt（伟大的，大觉）[16]；jeyamta 即梵语 jayanta（胜利者）的犍陀罗语形式[17]；dharmi'a 相当梵语 dharmika（具法有道者）[18]；mahanu'ava 则相当梵语 mahānubhāva（威德宏大的）[19]。都善王最后一个称号 devaputra 源于汉语"天

子”，早在贵霜王伽腻色迦时期这个称号已被借入犍陀罗语。值得注意的是，鄯善王安归伽在位第17年开始使用的称号“侍中”在这位鄯善王的众多称号中没有出现。

第2行国王的名字非常清楚，写作 tomgraka。其名又见鄯善王安归伽时期一件文书中某个地名 tomgraka maharayasa av'ana“童格罗伽大王镇”（斯编549号）。这个地名中 maharaya（大王）一词已经暗示出童格罗伽不可能是精绝王。因为这是个犍陀罗语词，它的出现必然在佉卢文传入塔里木盆地之后。楼兰和尼雅出土的佉卢文书表明，鄯善王国的土著居民楼兰人、精绝人和且末人的本族语言是吐火罗语，英国语言学家巴罗将其命名为 Krorainic（楼兰语）。[21]佉卢文书记录的语言——犍陀罗语对精绝人来说是外来语，正像现代印度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一样。另一方面，尼雅出土的汉简证明，汉代精绝国的书面语言是汉文，精绝太子、王后和王公贵族甚至用汉文相互问候。[22]即便在佉卢文取代汉文成为精绝人的书面语言之后，汉文化仍对精绝人有巨大影响，例如：我们讨论的这件文书的形式即源于汉代的封检。如果童格罗伽真是精绝王，这个地名就会使用吐火罗语或汉语，而不是犍陀罗语。现在这些分析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童格罗伽纪年文书的发现已使童格罗伽系鄯善王的假说成为定论。

文书第3—9行是这件文书的正文。从内容看，它是一份土地买卖契约，可惜这份契约的封牍佚失，无法知道其全部内容。为便于今后的研究，下面依次讨论底牍中出现的词汇。

第3行的 peta av'ana：此系鄯善国精绝州下属一个行政单位，为和文书中高一级的行政单位 raya（州）相区别，姑且译为“毗陀镇”。精绝州由若干“镇”组成。据目前调查，尼雅遗址宽约5公里，长约25公里。[23]精绝州大致在这样一个范围，那么毗陀镇的规模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村落大小。

第3行的 kilme raksana：前一词属于楼兰土著语言，相当于

吐火罗语 A 的 kälyme（地区）[23]。鄯善王国往往以 kilme 为单位征税，所以我们将其译为“税区”。其后一词系梵语 raksāṇa（保护）的犍陀罗语形式[24]。这两个字也可能是复合词，意为“税区保护人”。那么它可能是鄯善职官，但在以前发现的文书中从未出现过。其后一字 ka'uno'a 系人名，又见下文第 6—7 行的残字。这个名字以前未出现过，似乎属于楼兰语人名。如果真是这样，其名相当于吐火罗语 B 的 kaum（日、太阳），复数形式作 kauñi。[25]

第 3 行最后两个字 bhiti bhradu：前一字系犍陀罗语词汇，并见斯坦因收集品第 78、120、123、348 号文书。据石泰因（O. Stein）考证，该词相当于梵语序数词 dvitīya（第二、同伴）[26]。其后一词即梵语 bhrātṛ（兄弟）的犍陀罗语形式。[27]那么 bhiti 在文书中的含义显然是“第二”，则 bhiti bhradu 意为“仲弟”。在斯坦因收集品第 419 号文书中 bhiti 曾用来表示“次子”。

第 4 行 tasuca：此为鄯善职官名称。其后一词 cateya 当是这位官吏的名字。鄯善职官 tasuca 的词源尚不清楚，在某些文书中担任此职官的官吏负责宗教事务（157 号），所以我们译作“祭司”。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以前，楼兰人崇祀哲蒂莎女神（catisa deviya' e），这位女神的名字屡见佉卢文书（46、290、334、474 和 496 号文书）。斯坦因发现的佉卢文书多次提到女巫师（khakhorna striya）。据巴罗分析，佉卢文书中 khakhorna（巫师）一词源于波斯古经《阿维斯塔》的 kaxvarda，相当于亚美尼亚语 kaxard（巫师）[28]。可惜材料太少，我们尚不清楚鄯善古代巫教与波斯火祆教的关系。

第 4 行 te：“这些”，即犍陀罗语指示代词 ta（这个）的复数业格。[29]

第 4 行 vikridati：犍陀罗语动词 vikri（卖）的现在时第三人称，字根同梵语 vikrī。这个动词的反义词即第 7 行出现的 krida，

该动词字根 kri 同梵语 krī（买）。

第 5 行 [tu]mase burna misiye：由于第一字的头一字母残损，我们对这个字的释读没有太大把握。它可能相当于阗塞语 ttumäsä（大田野），[33]故本文复原作 [tu]mase。第二个字佉卢文书常见，即梵语 bhuma（土地）的犍陀罗语形式。第三字屡见于佉卢文书，但词源不明。据托马斯研究，其含义大概是“已经开垦的”，和佉卢文书中频频出现的另一字 akri（未开垦的）相对而言。[34]检验该词在文书中的使用情况，其说可信。

第 5 行 milimiye：此系希腊度量衡单位，希腊文作 medimous（弥里码）。它和本文书第 6 行的 khi（即希腊文 chous“硒”）及第 7 行的 muli（印度和中亚的度量衡单位，详下）有交换关系，即：1 弥里码＝1 目厘＝20 硒。[35]

第 5 行 bhij'apayati：这是个犍陀罗语词，相当于梵语 bhīja-paryāpti，在佉卢文书中表示“播种量”。鄯善人计量土地往往不是根据面积，而是根据这样一个播种量。

第 5 行 aṃña bahi：前一字系犍陀罗语，同梵语不定代词 anya（另一个）[36]。其后一字 bahi 亦为犍陀罗语词，同梵语 bahis（外面）[37]，在本文书中该词似乎用来表示“郊外”。

第 6 行 ks[e]tra：该词并见斯坦因收集品第 160 和 255 号文书，但写作 ksitra。该词同梵语 kṣetra（土地、领地）。[38]

第 6 行 esa：犍陀罗语指示代词，同梵语指示代词 etad（这个）的阳性单数体格 esaḥ。[39]

第 7 行这段话可比较斯坦因收集品的 419 号文书。其文云：bhuma misiyaṃmi piṃda 4 1 vikrida anaṃdasa krida tita muli su-v'a ma sadera 1.....“他们共将五块可耕地卖出，由阿难陀买下，出价金币一枚……”我们文书中残缺的用来交换土地的第一项物品的第一个字母似为/sa/，所以我们将其复原为 sadera（金币）。该词在斯坦因收集品中凡五见（43、324、419、431 和 702 号），

除 702 号文书外，均注明系黄金（su v'arna）所制。据斯坦因收集品第 419 号文书，一枚金币等于 10 目厘（muli），也即 10 弥里码（milima）。虽然贵霜王朝也模仿罗马帝国制造发行过金币，但公元 3—4 世纪丝绸之路流通的金币为罗马金币，鄯善人对金币的称谓源于希腊拉丁语的 stater（金币），[37]所以鄯善王国流通的这种金币当为罗马金币。斯坦因在丝绸之路南道和田发现过公元 4—6 世纪的罗马金币，其中有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us II，337—340 年）、君士坦茨（Constanas，337—350 年）、狄奥多西（Theodosius，379—395 年）和查士丁尼（Justinus，518—527 年）金币。[38]佉卢文书的有关记录大概是丝绸之路南道流行罗马金币的最早证据。

第 7 行 niyida：此系犍陀罗语动词，屡见佉卢文书。据巴罗分析，该词相当于梵语 neyati，系动词 ni-"拿"的被动语态[39]，那么其含义应为"支付"。

第 7 行的 muli 系印度和中亚的度量衡单位，相当于佛教梵语 mūlya"价格"，或音译"目厘、穆立"，有时作为货币单位。[40]这个度量衡单位曾在西域诸国普遍使用，于阗塞语作 mūlā / mūrā，疏勒塞语作 mura[41]。据敦煌研究院的杨富学考证，今天维吾尔人对钱币的称谓 pul（普尔）肇源于佉卢文的 muli，相当于突厥语 puli。[42]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佉卢文书的语言在塔里木盆地影响直至今天。

第 8 行 hāv'amanag'a k(o)j'ama'a：后一字佉卢文书常见，一般写作 koj'ava，相当巴利语的 kojava（地毯）。犍陀罗语有时不分/m/和/v/，例如：149 号文书的 cimara = cīvara（袍子），和田出土犍陀罗语《法句经》的 nama = nāva。[43]故此处的 ko j'ama 无疑即其他文书中的 koj'ava。[44]

第 8 行 kaja havaṃnag'a hasta10 4：第一字亦见斯坦因收集品第 583 号文书，但被读作 kaj'aha vaṃnag'a。正如德国梵学家吕

德斯建议的，havaṃnag'a 即佉卢文书常见的 thavaṃnag'a。这是个伊朗语借词，相当于阗塞语 thauna（布、丝绸），可比较新波斯语 tafnah（塔夫绸）[67]。吕德斯怀疑 havaṃnag'a 字首/ha/可能是书吏误写，但两件文书都采用这样的写法一定另有原因。我们知道，塞语/ha/与/sa/有时不分，而犍陀罗语中常见/sa/与/tha/交替。那么 thavaṃnag'a 写作 thavaṃnag'a 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吕德斯的 kaṭa 显然读作 kaj'a。该词在其他文书中或作 kaya（第 534 号），相当于婆罗钵语 giyāh（草）和于阗塞语 kaṃha（大麻）。那么犍陀罗 kaj'ahavaṃnag'a 意为“麻布”，例如：佉卢文书的 taha 即相当于梵语的 tath（如此）[68]。我们文书中的这块绸布以 hasta 为计算单位，该词同梵语 hasta（手掌），故本文根据汉语习惯译作“拃”。

佉卢文契约一般都有若干官吏充当见证人，并在契约中签名作保，所以本文书第 8 行末尾这段残文显然要复原为 tatra sa[ksi hu'aṃ]ti。比较尼雅新发现的疏梨闍纪年文书第 8 行 tatra saksi hu' ati almy'akama bhuya saksi jelaka kamana s'rikali palas'a“现有见证人出面作保。除阿罗迦外，尚有见证人迟罗迦摩那和吉时护”[69]。类似的句子还见斯坦因收集品第 760 号文书第 2—3 行 tatra saksi jaṃna upasena ko[peṃna] yipg'o' asa“现有见证人出面作保：乌帕色那、柯般那和夷波戈亚”。只是 760 号文书这段话省略了动词 hu' amti（他们是），这个动词和 tatra（这里）配合，表示“现有……”。这段残文中的 sa(ksi) 相当于梵语 sāksin（证人、目击者）。

第 9 行 kitsatsa：此为楼兰语职官或荣誉称号，其他文书中一般写作 kitsa'itsa，系楼兰语词汇，相当于吐火罗语 B 的 ktsaitsaññe（年龄）。不过，佉卢文书中这个词意为“长老”[70]。其后一词 piteya 当是这位长老的名字。

第 9 行的s[othaṃga .....] 仅存第一个字母。由于第 8—

9行的内容都是官名加人名的证人清单，这个残字应为某个鄯善职官，而鄯善职官中唯有sothamga（税务官）以字母/s/开头，所以我们将它复原为sothamga。据巴罗考证，sothamga系楼兰语职官，相当于吐火罗语sostatänkäñ（征税者）[51]。

第9行 śadavida：此系鄯善职官名称。它的前一成份相当于梵语 śata（百），所以我们译作“百户长”[52]。其后一词 tsagʹa 当是这位百户长的名字。《汉书·西域传》传末记西域职官云：“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其中“百长”疑即我们文书中的百户长。

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的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问世拨开了笼罩在佉卢文时代鄯善王世系早期历史上的迷雾。如果把佉卢文书记录的七位鄯善王在位的最大年数相加（36+3+8+38+30+11+5），长达131年。据《晋书·张骏传》，鄯善王元孟曾于公元335年向前凉张骏献楼兰女。那么鄯善王童格罗伽在位年代可达公元210年（335－131+5+1），也就是汉献帝建安十五年。这就有力地证明佉卢文传人塔里木盆地的时间必在东汉末年。那么它具体在什么时间呢？

《魏略·西戎传》记载：“南道西行，且志（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后汉书·西域传》亦载：“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然而，鄯善何时兼并南道诸国，史无明载。这个时间疑在东汉官兵退出西域之后。据东汉《曹全碑》，东汉官兵最后一次维护西域纲纪事在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凉州刺史于是年发焉耆、龟兹和车师前后部兵，讨伐疏勒发生的篡位事件[53]。其后疏勒又接连发生宫廷政变，并发生于阗王安国入侵扜弥，杀死扜弥王的严重事件，但朝廷均无力禁止[54]。显然塔里木盆地诸国的兼并战争发生在公元170年后不久。鄯善兼并精绝大概就在这个时期。

由于东汉官兵退出西域，塔里木盆地诸国于汉末一度出现政

治空间。关于这个时期的西域政治史，学界争议较大，核心问题即贵霜王朝是否统治过塔里木盆地。西方学者主张塔里木盆地曾沦为贵霜帝国的殖民地；中国学者大都不同意这种看法。由于文献不足，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争议至今。不过近年一些新的研究表明，东汉官兵退出西域后，贵霜王朝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塔里木盆地诸国。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顺帝永建二年（127年），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我们最近指出，臣磐和臣勋之"臣"当即中古印度伊朗语的 amatya / āmācā（大臣），疏勒王后来一直沿用此称号，《隋书·西域传》作"阿弥厥"，《新唐书·西域传》作"阿摩支"[59]。《后汉书·西域传》提到臣磐曾"徙于月氏"，或许就是在贵霜作质子，不久"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拥立其为疏勒王。这大概就是臣磐和臣勋为什么以"阿摩支"为号的原因。这个称号表明疏勒王曾向贵霜称臣纳质，暗示了贵霜帝国在塔里木盆地西部的扩张。于阗王公贵族后来也以"阿摩支"为王号，似说明东汉官兵退出西域后，贵霜势力进一步渗透到于阗。贵霜控制塔里木盆地诸国大概仿效汉朝经营西域的办法，以夷治夷，通过扶植西域诸王室来实施间接统治。《大唐西域记》卷1记迦毕试有中国质子伽蓝，并说："闻诸先志曰：昔健驮逻国迦腻色伽王威被邻国，化恰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古代中国以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为黄河之源，所谓"河西蕃维"显然指和田河流域的于阗及其以西莎车、疏勒等国。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10《僧伽罗刹经序》载："僧伽罗刹者，须赖国人也……游教诸邦，至犍陀越，士瓶陀罽贰王，师焉。"我们在近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须赖国或即疏勒之异译。罽贰王即贵霜王伽腻色迦[60]。僧伽罗刹起初可能是作为质子来到贵霜帝国的，或许就是在迦毕试的质子伽蓝中修成正果，成为一代佛学大师。《大唐西域记》

卷4又载北印度有至那仆底国，“昔伽腻色迦王之御宇，声震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伽即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由此可见，塔里木盆地西部诸国慑于贵霜的压力曾经“畏威送质”，但仅此而已，并未沦为贵霜的殖民地。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当时东汉王朝对西域诸国已经失去控制，但贵霜王仍把西域诸国质子视为“中国质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称迦毕试的质子伽蓝为“沙落迦寺”。其名来自粟特语 srγ，本义为“洛阳”，古代西方称中国为 seres（塞里斯），即源于粟特人对东汉首都洛阳城的称谓。北印度设有质子伽蓝的至那仆底国，乃“质子所居，因为国号”。其名来自梵语 cīnabhukti（中国领地）。[57]贵霜王如此礼遇他们视为中国臣民的西域质子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出于在塔里木盆地扶植亲贵霜势力的考虑；另一方面显然也有对中国有朝一日重返西域的恐惧。

鄯善王童格罗伽没有“阿摩支”称号，但这似乎并不能说明贵霜在塔里木盆地的势力未达鄯善。两汉经营西域时塔里木盆地诸国曾以汉字为其书面语言，东汉势力退出西域后，鄯善改用佉卢文为其书面语言。这个变化表明鄯善可能也是向贵霜“畏威送质”的“河西蕃维”之一，故采用贵霜官方文字佉卢文作为书面语言。楼兰尼雅出土魏晋简牍屡次提到鄯善国有大月氏士兵[58]。他们原来或许属于贵霜驻鄯善的海外兵团。贵霜覆灭后，无家可归，滞留鄯善。《隋书·经籍志叙》云：“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但是若无政治和军事势力作后盾，佛法及中亚文字未必能如此顺利传入塔里木盆地。伊斯兰教传入和田时，其信徒与和田本地佛教徒就经过长达25年的“圣战”。可见宗教与文化的变迁往往伴随着残酷的战争。另一方面，已知七位鄯善王在位最大年数仅是目前出土文书的记录，随着新文书的不断出土，他们实际在位的最大年数之和必将突破公元210年的上限。

总之，佉卢文传入塔里木盆地的时间无疑在东汉灵献年间（约170—210年）。

南朝宋国大诗人谢灵运（385—433年）已经知道西域文字中有佉卢文，他在《十四音训叙》中介绍说："胡字谓之佉楼书，佉楼书者，是佉楼仙人抄梵文以倍要用。"[59]论者以为此系中国文献对佉卢文的最早记录[60]。其实不然。西晋永嘉二年（308年）竺法护译《普曜经》（Lalitavistara）。《普曜经》罗列梵书以下64胡书，其中所谓"佉留书"即指佉卢文[61]。竺法护，或称"竺昙摩罗刹"，据《高僧传》卷1本传，他于"晋武（265—290年）之世……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训诂，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法护所学西域三十六书自然包括他所谓"佉留书"。中国文献提到佉卢文大概以此为最早。法护乃世居敦煌的贵霜大月支人。既然是"世居敦煌"，他祖父一代就已经定居敦煌了。我们曾推测其祖父或为汉灵帝年间流亡敦煌的贵霜难民[62]。佉卢文为贵霜王朝官方文字之一。法护通晓佉卢文大概有家学渊源。如果这个推测不误，它将有助于说明佉卢文传入中国的时间在汉灵帝年间。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境内发现东汉佉卢文并非第一次，和田出土犍陀罗语《法句经》[63]，和田和楼兰出土贵霜钱币，和田出土汉佉二体钱[64]，洛阳佉卢文碑铭和楼兰佉卢文织锦，可能还包括敦煌汉长城出土佉卢文书信（708号），均为东汉遗存[65]。1993年在美国访问时，美国梵学家Richard Salomon教授给我看了一件出自新疆库车的佉卢文佛经残片，其年代与和田出土公元2世纪犍陀罗语《法句经》同样古老。这个佉卢文佛经残片属于伯希和收集品，可能出自苏巴什古城。我们当初之所以把上述佉卢文材料统统归为东汉文物，主要考虑到它们的语言特征和公元2世纪中亚贵霜碑铭的语言接近。陀阇伽纪年文书就是用这样一

种犍陀罗语书写的。如今见到的童格罗伽纪年文书也是用这样的犍陀罗语书写的。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亚死语言研究和其他科学一样是有规律可寻的。只要严肃、认真地寻找这些规律，完全可以从目前掌握的已知条件求解未知的问题。

我们相信，随着尼雅考古的深入和新出土佉卢文书的进一步解读，我们将进入西域研究的一个新时代。

此文为1996年乌鲁木齐召开的“世纪之交古典文学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收入《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注 释

① E. J. Rapson, "Kings and Regnal Years," in pp. 323-328, A. M. Boyer et al.,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II, Oxford, 1929.

② J. Brough, "Comments of Third 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SOAS*, XXVIII-3, 1965, 582-612；最近看到黄振华先生撰文将jiṭuṃgha释为“胜者”，不同意布腊夫将该词与汉语“待中”联系，说见其《佉卢文贵霜王号研究》，收入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5页。然而佉卢文表示“胜利者”另有一词，写作jeyaṃta。黄说不足取。

③ K. Enoki, "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Loulan and the Date of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 22, 1963; J. Brough, "Supplementary Note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BSOAS*, XXXIII-1, 1970; 長沢和俊：《再びカロシュティへ文書の年代について》，《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第22輯，1976年。

④ 马雍：《新疆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9-111页。

⑤ 林梅村：《新疆尼雅发现的佉卢文契约》，《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⑥ 由于童格罗伽仅见鄯善国某个地名，没有出现在纪年文书中，故拉普逊未

将这位国王列入鄯善诸王年表。参见林梅村：《佉卢文时代鄯善王朝的世系研究》，《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

⑦ 孟凡人：《楼兰尼雅简牍年代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384页。

⑧ F. W. Thomas, "Some Notes on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AO*, *XIII*－1, 1934.

⑨ 我被告知，这批文书是在斯坦因编号的N. XXXVII号遗址三组房屋遗址中发掘出来的。

⑩ T. Burrow, "Further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SOS*. IX, 1937; H. W. Bailey, "Gāndhārī," *BSOAS*, XI, 1946, 770.

⑪ S. Konow,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Aśoka Inscription*,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Central Publication Branch, 1929, 152, 158 and 170; 关于这些碑铭的年代讨论，参见 A. D. Bivar, "The Kushān Empire," in: E. Yarshater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III－1, Cambridge, 1983.

⑫ 林梅村：《佉卢文时代鄯善王朝的世系研究》，《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

⑬ P. Gardner, *The Coins of the Greek and Scythic Kings of Bactria and India*, Chicago: Argonaut, INC., Publishers, 1879, 90, No. 190.

⑭ S. Konow，前揭书，第141和165页。

⑮ 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调查与试掘》，《文物》1988年第7期第22页图版91，此文正确地将这枚钱币鉴定为贵霜钱币，但不知何王发行。后经日本考古学家小谷仲男指出，此为贵霜王阎膏珍晚期钱币。说见 Nakao Odani, "Some Remarks on the Kushan Coins found in the Chinese Western Regions," 收入《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第383页。但他误将阎膏珍的名字 v'ima 读作 hima，今订正。

⑯ 荻原雲來等：《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1011页。

⑰ 荻原雲來等，前揭书，第493页。

⑱ 荻原雲來等，前揭书，第638页。

⑲ 荻原雲來等，前揭书，第1015页。

⑳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s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㉑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8页；王国维最先注意到这批文书为汉简，说见其《流沙坠简序》，收入《观堂集林》卷17。

㉒ 于志勇：《1995年尼雅考古新发现》，《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第115页。

㉓ T. Burrow, "Tocharian Elements in the Kharos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RAS*, 1935, 674.

㉔ 荻原雲來等，前揭书，第1105页。

㉕ W. Krause u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Band II*, Heidelberg: Carl Winter·Universitäts-verlag, 1960, 187.

㉖ O. Stein, "Numberals in the Niya Inscriptions," *BSOS*, VIII, 1936, 775.

㉗ 荻原雲來等：前揭书，第981页。

㉘ 参见T. Burrow，前揭书，第86页。

㉙ 参见T. Burrow，前揭书，第34页。

㉚ H. W.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ese Sa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31.

㉛ F. W. Thomas, "Some Notes on the Kharos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AO*, XII, 1934, 39.

㉜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7页。

㉝ M. M. 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reprinted in 1979, 45.

㉞ 参见T. Burrow，前揭书，§91。

㉟ 荻原雲來等：前揭书，第399页。

㊱ 参见T. Burrow，前揭书，§81。

㊲ F. W. Thomas, "Drakhme and Stater in Khotan," *JRAS*, 1924, 671－672; F. W. Thomas, "Stater and Drakhme in Old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s," *AO*, VI, 1928, 255－256; H. W. Bailey, "Indo-Iranica," *BSOAS*, XII, 1949, 128－129.

㊳ 此据宿白教授的统计，参见《三国—宋元考古》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4年，第136页。

㊴ 参见 T. Burrow，前揭书，§94。

㊵ 参见 T. Burrow，前揭书，第 111－112 页。

㊶ 参见 H. W. Bailey，前揭书，第 336－337 页；S. Konow，"The Oldest Dialect of Khotanese Saka，" *NTS*. XIV，Oslo，1947，187.

㊷ 杨富学：《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之货币》，《甘肃金融》1995 年增刊二第 39－40 页。

㊸ H. W. Bailey，*Dictionary of Khotanese Sak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249.

㊹ 参见 T. Burrow，前揭书，第 21 页；J. Brough，*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88.

㊺ 参见 T. Burrow，前揭书，第 84 页。

㊻ 林梅村：《新疆和田出土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跋》，《考古学报》1993 年第 1 期；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

㊼ H. Lüders，"Textilien im Alten Turkistan，" *APAW*，Phil－Hist. Klasse，Nr. 3，Berlin，1936，21.

㊽ A. M. Boyer et al.，*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III，Oxford，1929，348.

㊾ 林梅村：《新疆尼雅发现的佉卢文契约》，《考古学报》1989 年第 1 期；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

㊿ 参见 T. Burrow，前揭书，第 ix 页。

(51) 参见 T. Burrow，前揭书，第 128 页。

(52) 参见 T. Burrow，前揭书，第 124－125 页。

(53) 马雍：《东汉＜鄯全碑＞中的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西域史地文物丛考》，1990 年，第 41－45 页。

(54) 余太山：《西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00 页。

(55) 林梅村：《疏勒语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 年第 4 期第 55－64 页；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

(56) 林梅村：《疏勒佛教考古概述》，《新疆文物》1992 年第 2 期第 35 页。收入本书第三编第二章。

(57)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40－142 及 366 页。

58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39、293、434号等。

59 《高僧传》卷7《慧睿传》说谢灵运好佛理，“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谢灵运所著《十四音训叙》，其书早佚。日本僧人安然《悉昙藏》卷1引慧均《大乘四论玄义记记》抄录了谢氏《十四音训叙》中这段文字。

60 王邦维：《谢灵运<十四音训叙>辑考》，《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1－282页。

61 饶宗颐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个材料，说见《中国典籍有关梵书与佉留书起源的记载》，收入《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9－381页；原载 *Annals of the Bhandan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vol. XIV, Poona, 1964。

62 林梅村：《贵霜大月支人流寓中国考》，《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

63 J.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88.

64 林梅村：《佉卢文及汉佉二体钱所述于阗大王考》，《文物》1987年第2期；林梅村：《再论汉佉二体钱》，《中国钱币》1988年第1期。穆舜英和王明哲：《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188。

65 S. Konow, “Note o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ilk-Strip No. 34; 365,” in F.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Stockholm, 1939; J. Brough, “A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from China,” *BSOAS*, XXIV, 1961; 林梅村：《楼兰新发现的东汉佉卢文考释》，《文物》1988年第8期；《洛阳出土佉卢文井阑题记——兼论东汉洛阳的僧团与佛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后两篇论文均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

七　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

1981年宁夏固原发现一处隋唐墓地，经发掘得知这是一处中亚粟特侨民墓地。固原于唐代属原州，一度改称平凉郡。中国史籍将中亚不同城邦来华定居的粟特侨民分别冠以汉姓，如撒马尔干来华为“康”姓，布哈拉来的为“安”姓等，凡九城九姓，统称“昭武九姓”。尽管文献屡次提到原州有九姓胡为隋朝和唐廷牧马，但在固原发现昭武九姓墓地这还是第一次。固原粟特墓地发掘报告最近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本文讨论的中古波斯文宝石就是在这个墓地出土的。

据发掘报告，这枚印章出自唐咸亨元年（670年）十一月粟特胡史诃耽与其汉族妻子张氏合葬墓。尽管此墓早年被盗，但墓中仍发掘出1件黄金饰物、1枚东罗马金币、7件鎏金铜器、4面铜镜和若干玻璃器等以及1枚带有胡书文字的宝石印章。报告介绍说：“蓝色圆形宝石印章，一枚。圆形，一面光洁，边凸起。另一面刻有纹饰，为一卧狮。其面部清晰，鬃毛直竖。身后立三棵树状物，顶似花蕾。上有一周铭文，铭文属中古波斯帕勒维（Pahlavi）铭文系统。直径1.6、厚0.5厘米。”此外报告还发表了这个印章的照片和线图。[2]

1991年12月固原博物馆罗丰曾寄给我一张这个宝石印章的黑白照片并要求进行文字鉴定，但信中没说明这是个印章，我也疏忽了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没能读出铭文内容。现在从报告得知

此为印章，即所刻文字均为反字，因而很快将其解读。不过从其文字看，这个宝石印章所刻铭文并不是婆罗钵文，而是中古波斯文。

目前学界将古代和中世纪波斯人的书面文字分为王朝阿拉美文、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和婆罗钵文。虽然这四种文字均从阿拉美文演变而来，并且都用来拼写伊朗古语，但是它们有时代、方言以及字母等方面的差异。例如：帕提亚语属于伊朗西北方言，中古波斯语则为伊朗南部方言。[3]我国境内仅在新疆和敦煌藏经洞发现过中古波斯文写卷或碑铭。本世纪初德国考察队曾在吐鲁番发现过一批中古波斯文摩尼教经书残卷，80 年代初德国伊朗学家松德曼博士将其整理出版。[4]1990 年新疆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发现一批银器，其中一件银碗的圈足上也刻有中古波斯文。1992 年这件波斯银碗送到日本参加楼兰王国文物展，它的一组彩色照片刊于朝日新闻社编写的新疆文物展览目录。该书介绍说，据林梅村鉴定，这件银器圈足上的文字为粟特文云云。[5]日本朋友使用这个材料没有经过我们，显然他们把这件银器的铭文和与其共同出土的另一件没有参展的银碗上的粟特铭文混淆了。事实上赴日参展的这件银碗上的文字是中古波斯文。鉴定者是英国语言学家西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博士，我在给这个银碗的收藏单位的信中讲得很清楚，不能张冠李戴。借此机会向学界说明。宁夏固原新出土的这个中古波斯文印章的重要价值首先在其发现地点，这是目前所知东传最远的中古波斯文。

中古波斯文的书写方式从右向左横读。这个铭文显然要从狮子头右边字母 a 起读（参见插图 17），据现行中古波斯文转写体系，[6]这圈铭文应转写为：'z'tyh 'b'tyh š'tyh，读作 āzādīh ābādīh šādīh，意为“自由、繁荣、幸福”。这三个词都是以-yh／īh收尾的中古波斯语阴性名词，分述于下：

插图 17　固原出土中古波斯文印章线图

第一个词 'z'tyh / āzādih "自由，高贵"，该词在中古波斯文中一般拼作 ''z'dyh，但在婆罗钵文中拼作 'c'tyh[7]。从报告的彩版和线图看，这个词的第二个字母肯定是 z，其后无疑是字母 a 或读 ā，但报告的线图未能将字母 z 后面的字母 a 摹写清楚。从该词用 z 不用 c 可证宝石印章上的铭文系中古波斯文，不是报告推测的婆罗钵文。这个词源出古代伊朗阿维斯塔语的 āzāta "高贵，自由"，相当于阗塞语的 āysāta[8]以及敦煌出土粟特古书信的 's't / āsāt，意为"贵族，自由民"。[9]在印度河上游丝绸古道旁发现的粟特摩崖石刻铭文中该词写作 'zt'yk "高贵"[10]。英国语言学家巴罗还注意到，这个伊朗语词曾被借入楼兰尼雅出土佉卢文书，写作 ajhate "高贵"。[11]

第二个词读作 'b'tyh / ābādih "繁荣，兴旺"，无论是报告的线图还是它的照片都清楚地表明它采用中古波斯文的拼法，而在婆罗钵文中该词写作 'p'tyh / āpādih[12]。这个词帮助我们进一步确认宝石印章上的铭文应为中古波斯文。这词源于阿维斯塔语

的 āwāda“优雅”，在古代伊朗语中意为“受保护的”[13]，但在中古波斯文里其确切含义是“繁荣，兴旺”[14]。

第三个词读作 š' tyh / šādih“幸福，快乐”，这个词的拼写倒是和婆罗钵文一致，在标准的中古波斯文铭文中该词应写作 š'tyh[15]。然而考虑到这个印章上第一个中古波斯语词用 ' z' tyh 表示 ' ' z' dyh，即用 t 替代 d，所以第三个词仍应视为中古波斯语词汇。这个词源于阿维斯塔语 šyāto“愉快”，相当于粟特语 š't“愉快”。据巴罗考证，这个伊朗语词经过粟特语借入楼兰尼雅出土佉卢文书，写作 ṣada“高兴”[16]。

固原发掘报告已经注意到这枚印章具有宗教意义。印章图案中雄狮守护的那颗树应是西亚宗教中的生命树，但火祆教和摩尼教均崇祀生命树，故报告未能确认这枚印章究竟属于何种宗教。我们认为这枚印章当属火祆教遗物。

据墓志，墓主人史诃耽乃世居原州的粟特侨民，其祖先本为中亚昭武九姓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南 75 公里处）国君。[17]自先祖史妙尼入仕北魏后，这家粟特侨民世宦北魏、北周、隋和李唐四朝。先祖史妙尼、曾祖史波波匿、祖父史认愁（又名史多思）均担任火祆教的宗教首领“萨宝”。正如前人指出并被近年新的研究所证实的，汉语外来语借词“萨宝”出自粟特语 s' rtp' w（商队首领）[18]。火祆教为粟特国教，粟特商队显然政教合一，其商队首领同时也是商队的祆教教长，故“萨宝”一词被中国古籍解释为祆官。固原发掘报告引龚方震之说，以为萨宝源于叙利亚语 sabā（长者），又说“萨宝总管一切胡教”，均不妥。

首先，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曾详细论述过商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19]季先生注意到的这个现象同样适用于其他宗教。因为宗教组织不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要生存就得依附于商人。粟特乃商业民族，其祆教组织依附于商贾，同时粟特商贾靠祆教维系其商团组织是自然而然的事。《法显传》曾提到“萨宝”一词，

不过写作“萨薄”。这说明“萨宝”这个词至迟在东晋义熙十二年（415年）以前已经借入汉语。尽管法显未明说“萨薄”属于何种宗教，但晚些时候的文献说萨宝为祆官显然沿袭了前代的说法。敦煌所出公元3—4世纪粟特古书信第五封信中有“萨宝”一词，可惜刊布者起初未能辨认，日本伊朗学家吉田丰博士近年终于将其释出[20]。由此可证火祆教以及“萨宝”一词早在汉晋时期就流行于撒马尔干与洛阳之间的丝绸之路。[21]凡此表明，汉语外来词“萨宝”的词源必为粟特语。

第二，这枚宝石印章的主人的父亲名曰史射勿，字槃陀。正如报告推测的，这个粟特人的名与字显然要连读，日本汉学家池田温曾从敦煌文书中检出敦煌粟特胡有一位称“安射勿槃陀”[22]；中山大学姜伯勤从吐鲁番文书查出来华粟特人有曰“射蜜畔陀”。[23]其胡语原名大概要复原作Zrwmβntk（祖尔万神之奴仆），这个粟特语人名亦见长安出土的一个粟特银盘。[24]

祖尔万神（Zurvān）是司掌时间和命运之神。萨珊波斯时期，特别是波斯王沙普尔一世在位时（242—272年），祖尔万神受到一批西亚火祆教徒的特别推崇，形成所谓Zurvanism（祖尔万教派），被视火祆教正统教派的异端[25]。如果我们对射勿槃陀胡语原名的复原不误，这个名字表明侨居原州的这家粟特人当是火祆教祖尔万教派的信徒，那么这枚印章上的铭文“自由、繁荣、幸福”大概是火祆教祖尔万教派的某种说教。

据琐罗亚斯特的的创世说，世界历史的进程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二个时期，泥土塑造的“原人”伽玉玛特受到安格拉·曼纽和僚神的攻击死去，但其种子被保存下来。40年后，从这颗种子衍生出人类最早的一对伴侣，这对伴侣像大黄树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这就是人类的始祖。[26]固原宝石印章上狮神守护生命树的图案似与火祆教这个创世说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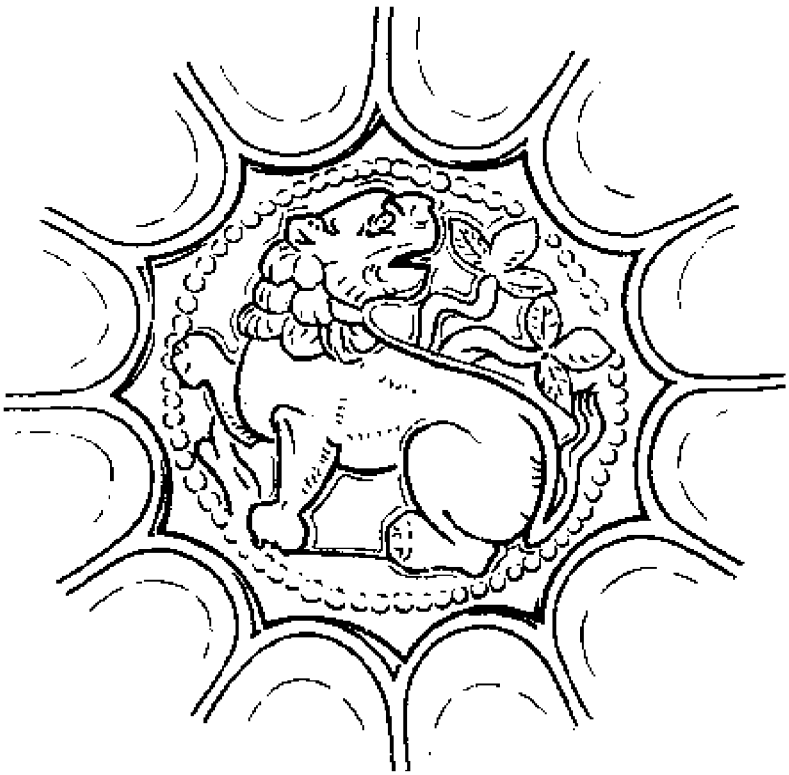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印章所刻图案是公元7—8世纪金银器

常见图案，因而对金银器的年代学和文化内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标本。就我所知，至少有三件西亚或中亚银器采用和这枚印章几乎完全相同或类似的图案。

标本1，虎纹鎏金银盘（参见插图18），直径约22.8厘米，彼得格勒艾米塔什博物馆藏品。美国学者波普将其归类为萨珊波斯艺术品，年代当在7世纪中叶之前。[27]

插图18　艾米塔什博物馆藏萨珊波斯虎纹银盘

标本2，洛阳出土十二曲银碗（参见插图19），属于瑞典卡尔·肯佩收集品。据苏联学者马尔沙克研究，其类型和金银器粟特流派B2系列十分接近，年代约在7世纪。[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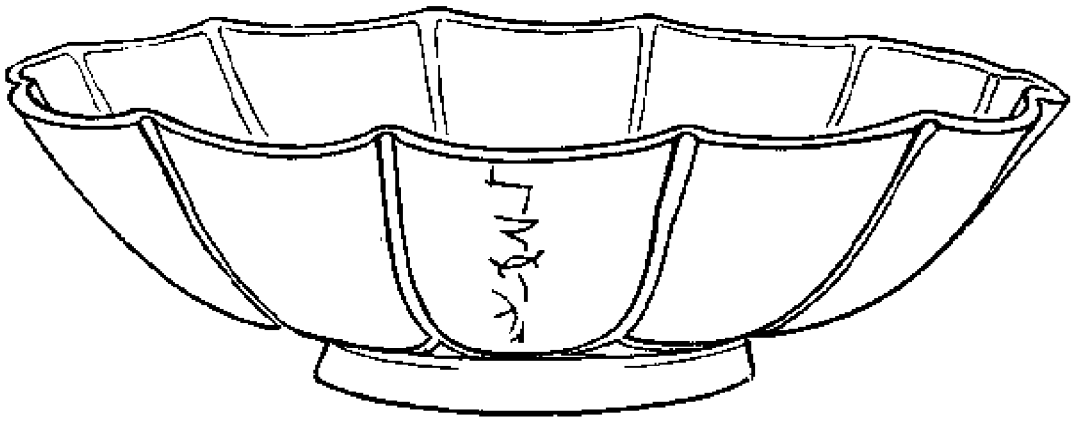


插图 19　洛阳出土狮纹银碗，瑞典卡尔·肯佩收集品

标本3，乌兹别克斯坦卡马河流域苏德亚卡尔村出土狮纹八曲银杯（参见插图20），年代约在8世纪，亦被马尔沙克归入金银器粟特流派B2系列。[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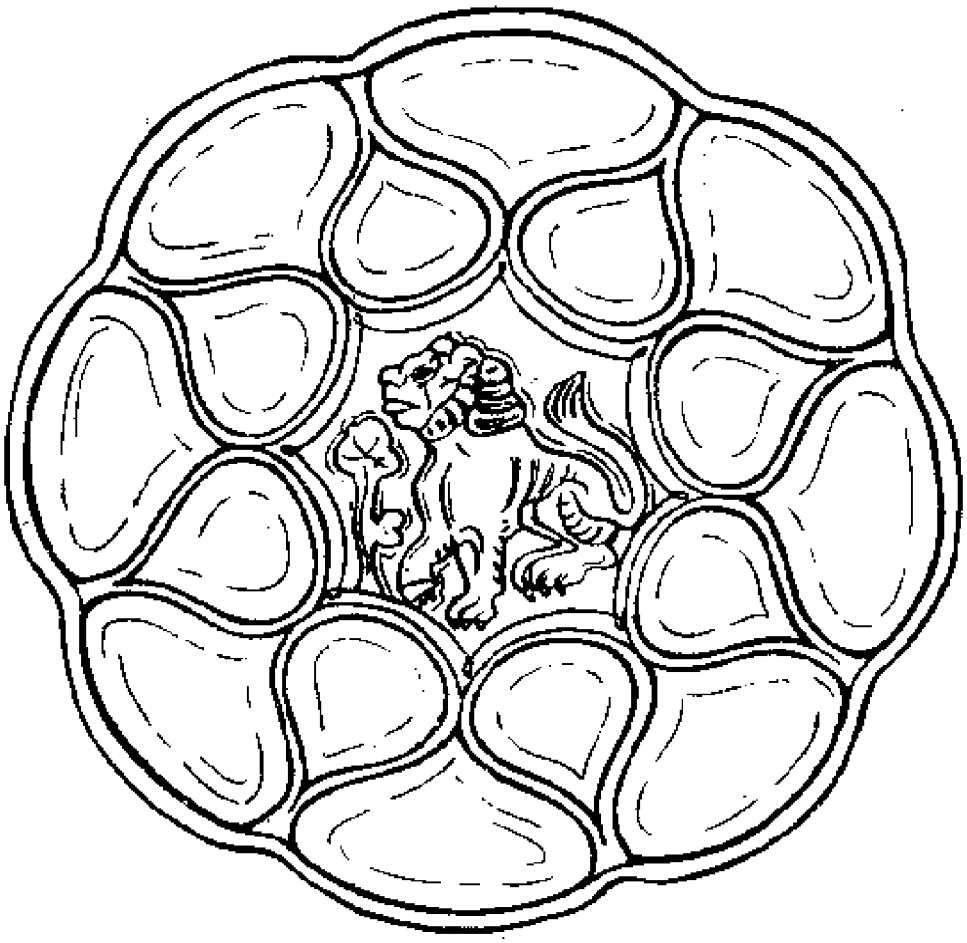


插图20　卡马河流域苏德亚卡尔村出土狮纹银杯

这类金银器的艺术源流以前不十分清楚。尽管标本1年代最早，但生命树的守护神不是狮子，而是老虎。马尔沙克将标本2和3归入粟特艺术品的主要根据是：这两件银器上的狮纹不是萨珊式的，而和片治肯特遗址所出木雕上的坐狮以及其他粟特器物上的狮纹十分类似。马尔沙克将这两件银器定为粟特艺术品或许是对的，但限于资料，他未能阐明其艺术渊源。固原新发现的这枚带有类似狮纹图案的宝石印章揭示出这两件银器的艺术主题当来自萨珊波斯艺术。这枚印章无疑是在波斯南部制作的，因为中

古波斯语属于伊朗南部方言。虽然印章的年代和标本2处于同一时代——公元7世纪，但狮神守护生命树这一主题显然源于萨珊波斯艺术。因为神兽守护生命树这一主题最早出现在萨珊波斯火祆教艺术中，例如标本1虎神守护生命树鎏金银盘。

从时间上看，波斯火祆教艺术的东渐似与萨珊波斯王朝亡国有直接关系。这枚宝石印章的主人史诃耽与其妻合葬年代（670年）正在萨珊波斯亡国（671年）前夕。洛阳出土的狮神守护生命树银盘的年代亦在7世纪，而粟特本土发现的同类银盘则在8世纪。由此可见，波斯火祆教艺术于7—8世纪东传粟特和中国不是偶然的，当与波斯火祆教徒流亡东方有关。

总之，固原发现的这枚中古波斯文宝石印章应为火祆教文物，这个发现不仅为我们了解火祆教在华传播提供极其重要的考古学证据，还为研究唐代金银器图案的艺术源流提供了重要的标本。

原载《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注　释

①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② 罗丰，前揭书，第55－62、240－247页和彩色图版一八、黑白图版四九和插图一〇七。

③ R. Schmidt (ed.), *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 Wiesbaden: Dr. Ludwig Reichert Verlag, 1989.

④ W. Sundermann, *Mitteliranische manichäische Texte kirchengeschichtlichen Inhalt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81.

⑤ 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画局东京企画第一部编：《楼蘭王国と悠久の美女》，東京：朝日新聞社，1988年，第328号。这件银器的文字解说见该书第176页。日本朋友使用这个材料没有经过我们。如果他们能简单地写信到北京征求一下意见，或找日本伊朗学家伊藤义教或吉田丰博士问一问，不至出此错误。

⑥ D. 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xi－xvi.

⑦ D. N. MacKenzie，前揭书，第15页。

⑧ F. de Blois, " 'Freeman' and 'Nobles' in Iranian and Semitic Languages," *JRAS*, 1, 1985, 5－15.

⑨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Letters", *BSOAS*, XII, 1948, 604 and 606 note 9.

⑩ N. 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I, London, 1989, nos. 164－165.

⑪ T. Burrow, "Iranian Words in the Kharos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SOS*, VII, 1934, 509.

⑫ D. N. MacKenzie，前揭书，第1页。

⑬ H. S. Nyberg, *A Manual of Pahlav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4, 25.

⑭ D. N. MacKenzie，前揭书，第1页。

⑮ D. N. MacKenzie，前揭书，第78页。

⑯ T. Burrow，前揭文，第514页。

⑰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8页注(一)。

⑱ A. E. Dien, "The Sa-pao Problem Re-examined," *JAOS*, 83. 3, 1962, 335－346.

⑲ 季羡林：《商人与佛教》，《季羡林学术著作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416－538页。

⑳ 吉田豊：《ソゲド語雜録》，《オリエント》第31卷第2號，1989年，第168－171頁。

㉑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研究，参见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5－353页。

㉒ 池田温：《8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聚落》，《ユーラッア文化研究》1965年第1期第49－92頁。

㉓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77页。

㉔ 此据英国语言学家N. Sims-Williams解读，私人通信。

㉕ 祖尔万派或译"佐尔文派"，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9，北京/上

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09页；"G. Gnoli, *Zoroaster's Time and Homeland*, Naples, 1980, 211, 212 and 214。

㉖ 黄心川：《琐罗亚斯特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1988年，第384页。

㉗ A. U.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VII, London, 1938 (repr. 1967), pl. 204.

㉘ B. I. Marshak, *Sogdiiskoe Serebro, gdavnaya redakniya v vostochnoi literature'*, Moskva, 1971, 137, 156, fig. T16.

㉙ B. I. Marshak，前揭书，第137和156页插图T. 21。

第　三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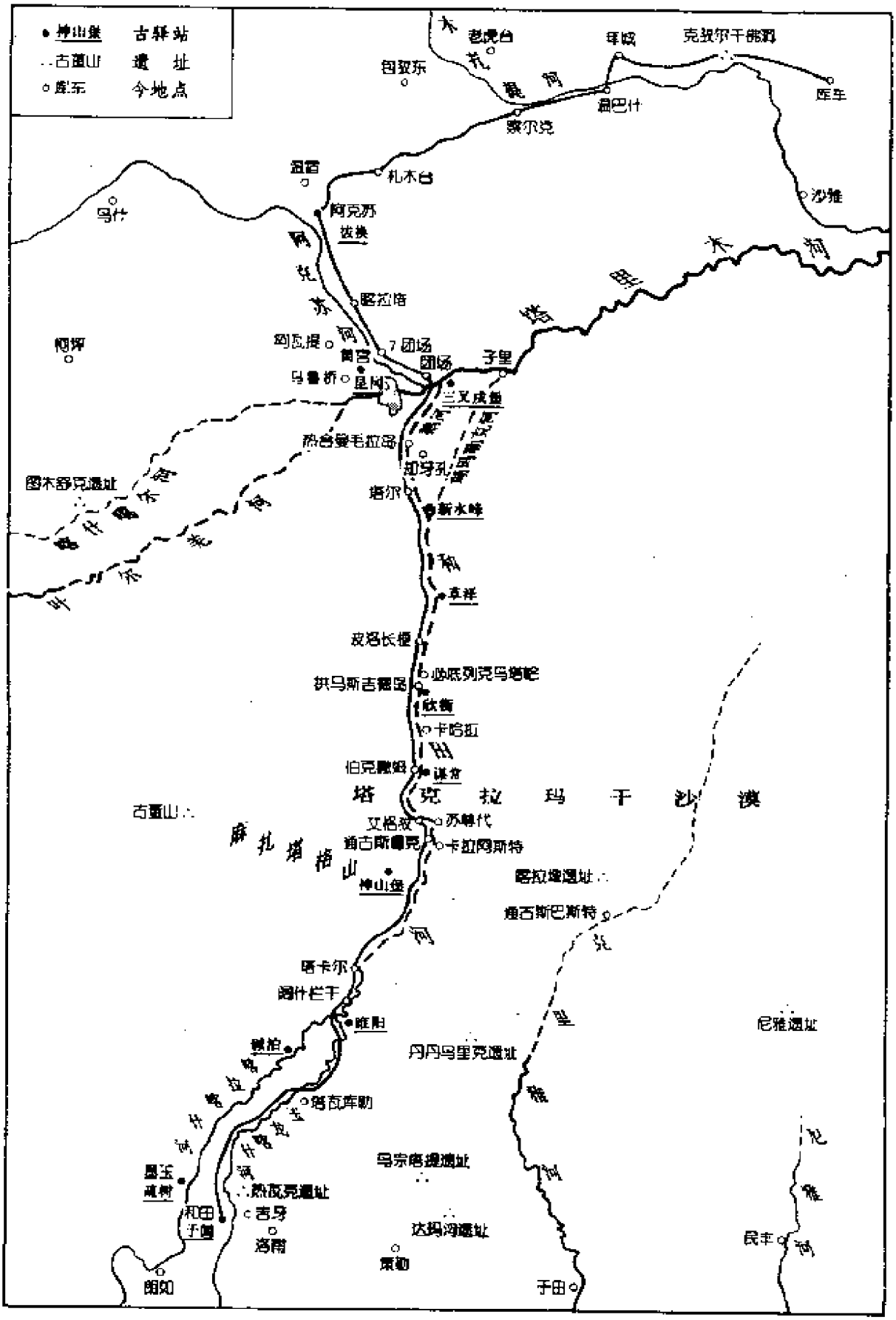
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记

一　汉唐和田河的古代交通

1992年10月2日至29日，作为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考察队的中方专家，我们和来自6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一起进行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地理探险（地图3）。其中收获最大、感触最深的无疑是和田河的五日旅程。我们几次陷入困境，甚至绝境。经一位塔克拉玛干的牧驼人热情相救，终于闯出大漠。以前我们只是从书本上了解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古今交通，这次实地考察和田河，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汉唐以来和田河沿岸的古今交通的认识。撰写此文，献给曾经或者将要到塔克拉玛干进行科学探险的中外学人。

一、阿克苏至和田河之路

阿克苏，汉代称“姑墨”，唐代称“拔换”，是我们踏上征程后的第3个营地。考察队于10月8日晨从乌鲁木齐出发，乘九辆越野吉普和一部沙漠车沿古代丝绸之路北道，途经达坂城、托克逊、库米什、和硕、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克孜尔千佛洞、拜城、温巴什千佛洞、察尔克、喀拉玉尔衮、札木台，一路风尘，抵达阿克苏市。因沿路考察古迹，停留较多，10月10日才到阿克苏，夜宿友谊宾馆。因为我们常在新疆各地考察，所以被安排在1号车为大家带路，但从阿克苏市，沿和田河穿沙漠到



地图 3　20 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考察队行程路线图

和田市这段路只有考察队另一成员张平数年前随新疆科学院沙漠土壤研究所考察队走过一次。他直言相告，当年随车而行，现在对这条路实无太深的印象。所以我们只得按图索骥，完成考察计划。据新疆测绘局编制的50万分之一新疆地图，从阿克苏到和田两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440公里，但这条路需沿蜿蜒曲折的和田河而行，实际路程大约要走520公里左右。因此，我们的探险队计划用5天时间完成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考察。我们带足了5天的食品和水以及据说足够从阿克苏，经和田、民丰、若羌，沿古代丝绸之路南道返回库尔勒的汽油，于10月11日晨离开阿克苏，踏上通往和田河的征程。

历史上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曾有几条发源于昆仑山的季节河可在洪水期贯穿南北注入塔里木河或深入沙漠腹地，例如：且末县的且末河、民丰县的尼雅河、于田县的克里雅河等。由于气候变化，昆仑山的雪线升高，植被逐年减少，这些发源于昆仑山的河流水量减少，导至下游绿洲的死亡。克里雅河下游的扜弥，尼雅河下游的精绝以及且末河下游的且末等古代绿洲王国就是因此而衰亡的。目前只有和田河能在洪水期穿过沙漠，与南下的阿克苏河及西来的叶尔羌河汇流形成塔里木河。和田河上游有东西两源，西源称喀拉喀什河（意为“墨玉河”），发源于喀拉昆仑山脉的喀拉塔格山北麓，年径流量达21.9亿立方米；东源称玉龙喀什河（意为“白玉河”），发源于昆仑山脉慕士塔格山南麓，年径流量22.9亿立方米。两河在墨玉县吐孜鲁克奥塔克乡的库西拉希（今阔什栏干）汇入主流和田河。和田河源流相加，全长563.5公里，年径流量达44.8亿立方米，最后在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博斯坦乡老甘草场东北（今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16团4营2连驻地附近）注入塔里木河。[1]和田河虽有泉水47处，但水源主要靠山间冰雪消融供给。洪水期和枯水期的径流量悬殊较大。每年6—8月玉龙喀什河流量占全年流量的80.6%，喀拉喀

什河则为73.4%。10月初，和田河进入枯水期，10月中旬河床基本被晒干，河床上可以通车行人，所以，我们的考察时间选在10月中旬。

历史上和田河路曾是塔里木盆地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汉书·西域传》记载："姑墨国，王治南城……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太平寰宇记》卷156安西大都护府云："正西至拔换五百六十里。又从拔换正南渡思浑河，又东南至昆冈，三叉等守戍，一十五日程至于阗大城，约千余里。"敦煌北宋写本《西天路境》则说："又西三日行入割鹿国，又西南十日至于阗国。"汉代姑墨南城、唐代拔换城和宋代割鹿（即葛逻禄）国同在一地，学界似无争议，但此地于今何处，则众说不一。据1989年新疆文物普查最新资料，唐代拔换城即今温宿县札木台乡喀什艾日克村东约1公里的一座古城，汉代姑墨南城亦在此地，而姑墨北城似在黄文弼1928年在木扎提河北岸柯尔塘村调查的喀拉玛克沁（蒙古）城，今称破城子。[2]这座古城在拜城县老虎台乡提卫特村之西。由此城沿木扎提河北行，越天山达坂木扎尔特山口，再沿特克斯河上游支流西北行，经昭苏县西境夏台古城，可达伊犁河流域。这条路曾是汉唐以来沟通天山南北的重要孔道，清代仍通行。[3]由此路西南行，经温宿县包孜东、老札木台、札木台、克孜勒、古拉瓦提、喀拉塔，至阿克苏河南岸阿瓦提县唐木托拉克乡仓大队，是为汉唐古道。据1989年新疆文物普查，温宿县札木台乡喀什艾日克古城之南约22公里有一古城，今属阿瓦提县克孜勒乡乌克铁热克村。该城约在村东0.5公里。乌克铁热克古城南偏西41公里处又有一古城，今属阿瓦提县喀拉塔乡仓大队。此城约在仓大队东南，阿克苏河北岸。

阿克苏河，唐代称思浑河，通往和田河的古渡口约在仓大队古城之北下霍巴斯喀克村一带的渡口。据前引《太平寰宇记》，从拔换至和田河之路是"从拔换正南渡思浑河，东南经昆冈、三

叉等守戍”，而喀什艾日克古城恰恰在下霍巴斯喀克村古渡口正北。所以有理由认为，此城当即唐代拔换城。三叉戍堡顾名思义当在阿克苏、和田和叶尔羌三河交汇处。其地约在今农一师16团4营2连驻地附近，清代地图称此地为“子里”或“紫里”④。

据前引唐代文献，从思浑河到三叉戍堡须经昆冈，新疆测绘局50万分之一地图于上述两地间标有一地名，曰“黄宫”，其名显然就是唐代文献的“昆冈”。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昆冈似在今阿克苏河下霍巴斯喀克村附近渡口东南约24公里阿瓦提县乌鲁桥乡黄宫村附近。

限于时间，考察队不可能对上述古迹做详细调查，我们的考察路线是：从阿克苏出发，沿阿克苏河东岸，南经温宿县依干其、托普鲁克、拜什吐格曼、浑巴什、喀拉塔5个乡，再经农一师7团场和16团场至阿克苏河夹河子渡口渡阿克苏河，继续南行，渡叶尔羌河下游水库东面水渠到达新甘草场（今农一师16团4营营部）午餐，然后驱车西南行至阿瓦提县乌鲁桥乡博斯坦村（原阿克苏县牧场）。这里已是绿洲边缘，其南尚有一段草湖地带，尔后则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我们这天的目的地是和田河末流16团老甘草场。当地人称这段和田河为“噶兹达里亚（鹅河）”。在博斯坦村一位维族向导的带领下，我们终于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鹅河西岸。这时河水已退，但河床尚未干透。我们在靠近河岸较干的河床上安营扎寨。10月中旬的塔里木盆地昼夜温差很大，白天最高气温达摄氏20—22度，夜晚最低气温降至摄氏0—1度。我们架起篝火迎接和田河考察的第一夜。和田河两岸是茂密的原始胡杨林，常有羚羊、野猪、野兔、麋鹿出没。据说，这片森林还有野狼，所以我们派人守夜，维持篝火。于是，八位队员轮流担当这一夜的“骑士”。

二、寻找和田河古河道

10月11日晨，当我们醒来时，气温降至摄氏0度左右，帐篷四壁挂满水蒸汽形成的水珠。一顿简单的早餐后，全队驱车出发。应该说，和田河的考察从今天才算真正开始。我们没有雇用当地向导，因为我们手中有各种现代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和田河沿途道路情况，我们对未来的考察充满了信心。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自信竟然导致考察队在后来三天的旅途中根本不知道经过了什么地方，在何处扎营。直到抵达麻扎塔格山后，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考察队是如何走过前三天的旅程的。

10月10日晚，我们曾从鹅河派两辆车到前面探路，结果其中一辆车在距鹅河营地之南25公里处遇险，陷入沼泽。幸亏遇险地点距新疆地球物理探测队209支队驻地不远，他们步行到该地求救，物探队派车将这辆车救出沼泽。当时和田河床尚未干透，河床中心还是一片泽国，靠近岸边的河床勉强可以通行，但稍有压力就向上冒水。一辆车勉强可以通过，第二辆车通过时必然陷入泥潭，而全队有大小十辆车，大家都为如何执行考察计划而忧心重重。有人建议打破编队，一字排开，如同汽车拉力赛一样冲行。于是全队司机各显其能，争先恐后地前冲。不料一辆车启动后不久，车后门就被高低不平的河床震断门锁，装在车后的行李辎重纷纷落入车下。实践证明，这个方法显然行不通，所以我们还是决定编队而行。在我们之前已有几辆车通过河床，留下车辙，我们的车队就沿这些车辙小心翼翼地前行。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科学考察始于19世纪末。1885年5月间英属印度政府在孟买的民政官凯里和他的突厥语翻译达格列什从和田出发，沿和田河北上，至于里，由此转东，沿塔里木河，经库车、库尔勒到焉耆。他们大概是来和田河考察的第一批欧洲

人。[5]同年9月5日至10月16日，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也沿和田河顺流而下，至子里后北上阿克苏。[6]其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使和田河成为世界著名的探险圣地。1895年4月10日至6月21日，斯文赫定为了验证普尔热瓦尔斯基地图上标出的和田河西岸麻扎塔格山和巴楚县喀什噶尔河南岸的麻扎塔格山是否为同一山系，从麦盖提县莱利克东入沙漠，九死一生，纵穿塔克拉玛干西部沙漠，得救于和田河。一般认为，赫定遇救的地点就在洛甫县卡哈拉(Korla) 北和田河岸一水池。赫定由此顺和田河而下，北至阿克苏。[7]1903年1月2日至25日，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的崛贤雄与渡边哲信亦从和田到阿克苏，沿途考察了和田河。[8]

以上考察均属地理探险性质，1908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拉开了和田河考古的序幕。他于是年4—5月间从和田，经麻扎塔格到阿克苏。在麻扎塔格发掘了唐代寺院、戍堡和烽燧。1913年10月25日至11月间，斯坦因又从巴楚县图木舒克，沿路考察至麻扎塔格，旨在勘测两者的距离，然后逆河而上到和田。[9]

接踵而来的是德国考古学家特林克勒（T. Trinkle，或译椿克尔），他曾从和田到麻扎塔格考察。[10]翌年4月11日至29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队员黄文弼从库车一路考察到和田河末流子里，又南下麻扎塔格。他在玉龙喀什河某地向东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策勒县北35公里处的羊达胡都克村。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考察和田河。[11]1930年4—5月至1931年初，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方队员安博特和诺林从阿克苏至和田，他们此行详细勘测了和田河，历时约一年。[12]

上述探险和考察者中以斯坦因和安博特所绘和田河地图最为详细。[13]据他们的实测地图，和田河末流在距塔里木河约60公里处牙洛梧司孔分叉，一条东北流向塔里木河，称“瑚玛喇克河(沙河)”或“子里河”，斯坦因做过勘测；另一条西北流，折而

东北汇入叶尔羌河，称“鹅河”，安博特对其做过测量。为便于今后的考察与研究，兹将清代和阗州总图和洛甫县图所列子里至麻扎塔格地名与斯氏和安氏地图所列地名比较如下：[14]

清代地图	安博特地图	斯坦因地图
瑚玛喇克（沙河）		Kumulak
子里（或作紫里）		Zil
却牙克		Kiak
牙洛悟司孔	Yalghuz-qum	Yalghuz-kum
波洛长梗	Bora-chushkan	Bora-chushkan
必底列克乌塔哈		Bedelik-utak
卡哈拉	Korla	Korla-ayaki
卡拉阿斯特	Kallaste	Kallaste
麻扎塔哈（即麻扎塔格）	Mazar-tagh	Mazar-tagh

据《新疆乡土志》所附清代和阗州总图，和田河西岸属于和阗州，波洛长梗以北和田河东岸属于阗县，波洛长梗以南和田河东岸属洛甫县。现代行政区划与清代相比，有很大变动。波洛长梗以北和田河两岸今属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乌鲁桥乡；波洛长梗以南和田河两岸今属和田地区墨玉县吐孜鲁克奥塔克乡；波洛长梗以南和田河东岸仍归和田地区洛甫县。而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之间及玉龙喀什河东岸部分地区划归和田地区和田县。[15]

10月11日晨，我们的考察队从鹅河出发，经牙洛悟司孔、波洛长梗、必底列克乌塔哈，行程约125公里。当日晚7时在必底列克乌塔哈附近和田河西岸一水池旁扎营。但当时我们并不真正清楚这天如何走过这些地方。早上9时许，考察队离开鹅河老甘草场，南行30公里后到达新疆地球物理勘探队209支队驻地附近。据安博特地图，这个物探队驻扎在和田河下游“热合曼毛拉岛”上。他们的一位沙漠车司机告诉我们，和田河水才退了10天，上游河床仍十分泥泞，物探队两辆车全陷在沼泽里了，

他正准备去营救。

我们继续驱车南行，大约走了10公里左右，遇见一队牧羊人，于是停车问路。原来，他们是贩羊的维族商民，在巴音布鲁克藏民手中买了廉价的羊群正准备赶羊到和田出售。据介绍，我们问路的地方名叫“塔尔”，安博特地图上有此地名，写作Tarr，意为“狭地”。我们本想请他们当中一位带路，他们有太多的羊群要关照，抽不出人为我们带路。不过他们介绍了上游的路况，并说和田河上游河床现在仍有水，汽车不能通行，所以去麻扎塔格必须在“伯格撒姆”附近上岸，那里有政府修的汽车路。然而这个忠告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潜在的危机正在等待着我们。

中午2点，我们停车午餐。停车地点的河西岸有一西北流向的枯河床，而安博特地图上塔尔以南5公里河西岸标出一条叫Ouruq darya的河道，所以我们把这两条河联系起来。但瑞方队员不这样认为，他们推测当时我们大概在安博特地图上Ortang-aral附近。由于有争议，此后的旅途中大家更加积极地观测河流的走向及两岸的地貌以确定我们考察的具体路程。

行车约1小时后（4点左右），河床突然开阔，河东岸似有一河口。我们想，这大概是安博特地图上的牙洛悟司孔附近一个叫“河口”的地方，也即清代地图上“子里河”或称“瑚玛喇克河”河口。而瑞方队员认为，按里程推算，“河口”早已经过，这片开阔地可能是河湾或岛屿，未必是古河道。于是我们派两辆车专门前去考察，双方确认这里确实是一条古河道的河口。离开这个河口南行30多公里，又见到另一处开阔的河床。当时我们相信，这里可能是安博特地图上的Tallak tumushuk，后来才知道，清代地图称此地以北地区为“波洛长梗”。由于天色将晚，我们未能前去考察，驱车追赶大队。又南行13公里，约7点左右来到考察队营地。这天的营地设在河西岸一水池旁，前方河心

可见一孤岛，当时我们以为，这里是安博特地图上的 Jigdalik aral 岛，其实应是该图上“拱马斯吉德岛”，清代地图称此岛东岸为“必底列克乌塔哈”。从波洛长梗往南，我们已进入和田境内，河西岸属墨玉县，河东岸属洛甫县。我们这天晚上的宿营地，安博特称之为 Gung Masjid，斯坦因称之为 Gunging-Masjidi，安博特的 252 号营地即设在我们营地北面 6 公里处。

三、斯文赫定的“天赐水池”

1895 年 4 月斯文赫定从麦盖提县莱利克村出发，进行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理探险，结果他用 20 余天的时间，行程 300 多公里，以两人丧生，7 头骆驼及全部物资被沙漠吞噬的代价，穿过这片沙漠，得救于和田河干河床畔一个泉水池，赫定将其称为 Khoda-verdi-kol（天赐水池）。

赫定从沙漠中死里逃生，抵达和田河时已无任何科学仪器，身体极其虚弱，不太可能记住这个水池的确切所在。斯坦因将这处泉水池标在清代卡哈拉（Korla ayaki）庄北面和田河东岸一个有泉水的地方。安博特从之，并得到赫定的认可。但日本中亚探险史专家金子民雄不这样认为。他以为，该水池现在很难确认，据赫定的回忆录，这个水池似乎在河西岸某个泉水处，不太可能在河东岸。金子民雄先生是我们考察队的成员之一，所以赫定的探险故事和他“天赐水池”的位置成为 10 月 12 日晚考察队员的热门话题。由于当时未能确定这天晚上宿营地的具体位置，我们曾猜测斯坦因判定的那个赫定水池在营地之南 55 公里处。其实，它就在我们 2 号营地之南 12 公里处。据 1907 年洛甫人胡清源所著《洛甫县乡土志》，“（洛甫）县分三明（缅语千数曰明）……塔瓦克明一庄内分四小庄，亦和阗州拔隶，在玉河东之下游，四面沙碛，北道通［温］宿境，无道路，且乏水草”。又说，“塔瓦

克明一庄内分四小庄，小渠二道，注波拉庄、卡哈峡庄、玉隆哈什庄、阿多巴什庄”。清宣统元年新疆全省舆地图的洛甫县图上，卡哈峡庄或作“卡哈拉庄”，约在麻扎塔格之北和田河东岸。

10月13日晨，我们驱车经过卡哈拉、阿克提坎和伯克撒姆，中午在苏尊代附近一个水池旁午餐。安博特称此地为Suzunde。瑞方队员发现这个水池和安博特考察报告中所谓“赫定水池”的相片非常相象，因而怀疑这个水池就是赫定的“天赐水池”。但据安博特地图，赫定水池之北有一个很大的岛屿，这个地貌特点是苏尊代这处水池所没有的。考察队从这里南行7公里左右，来到一座河心岛，有人正在那里放羊，于是我们前去向牧羊人问路。殊不知，那是一片沼泽地，考察队的几辆车相继陷入泥潭。更惊人的是，这里的牧羊人告诉我们，这个岛名叫“卡拉阿斯特”，我们很快从地图上查出该岛就是斯坦因和安博特所谓Kallaste岛，其位置远在赫定水池之南约50公里。而苏尊代水池距此地仅有7公里，它不可能是斯坦因和安博特所谓赫定水池。从这时起，我们才开始认清前两天考察的真正旅程。

考察队把遇险的几辆车救出沼泽后又继续南行，不久，后面的车追上来告诉我们，沙漠车不慎陷入卡拉阿斯特岛南面的沼泽地，我们只得返回搭救沙漠车。此后的路越来越难走，除河床很陷外，又遇到严重沙漠化的路段，我们的车又几次陷入沙漠之中。经过数公里艰难的沙漠之路，我们遇到一位塔克拉玛干的牧驼人。他说，这里叫“格勒姆亚依迪”，就是安博特地图上的Gilam-jajde。牧陀人名叫赛福鼎，他介绍说，下面的路汽车无法通行，去麻扎塔格的路应走和田河西岸，我们已经错过了上岸的路口。这条路长年不用，上岸的路口已被灌木封住，很难找到。这时夜幕即将降临，我们只得在格勒姆亚依迪附近一个水池旁扎营，其地距安博特255号营地不远。塔克拉玛干腹地人迹罕至，塔克拉玛干人对我们这些外来客非常友好、热情。赛福鼎看到我

们身陷困境，主动提出第二天帮我们寻找上岸的路口。这样一来，他就得放弃看管他的驼群。塔克拉玛干人的无私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心。

四、神山行

第二天清晨，在塔克拉玛干牧驼人的带领下，我们又沿昨天来的路返回，寻找上岸路口。途经卡拉阿斯特和苏尊代，最后终于在艾格孜找到这个路口。这里的地貌特征十分突出，和田河在此呈S形转弯。赛福鼎称艾格孜之北和田河西岸这片沙漠为“伯克撒姆”，就是斯坦因的 Boksam 和安博特的 Boqsam。我们在塔尔遇到的维族商民提到过伯克撒姆附近有一条汽车路，无疑即艾格孜这条路。

艾格孜至麻扎塔格西岸沿途地名见于近年出版的《墨玉县地名图志》，为便于今后的考察和研究，和斯坦因、安博特地图所列地名对照如下：

地名图志	安博特地图	斯坦因地图
艾格孜	Aghiz-ortang	Eghiz
苏尊代	Suzunde	Suzundlik
卡拉阿斯特	Kallaste	Kallaste
格勒姆亚依迪	Gilam-jajde	Otro-gilam
麻扎塔格	Mazar-tagh	Mazar-tagh

从艾格孜路口南行约10公里，遇到一条深约两米的大沟，我们只得绕过沟，据斯坦因和安博特地图，此地名叫 Tunguzluk（有野猪之地）。由此南行大约17公里来到格勒姆亚依迪。塔克拉玛干人赛福鼎在此和我们分手，寻找他的驼群去了。我们又驱车南行9公里，抵达麻扎塔格。从艾格孜到麻扎塔格这条汽车路是在原始胡杨林中开出的一条战备公路，因为长年无人行走，路

面上长出许多灌木，非常难走。尤其是这条路的路口已被树木封住，若不是赛福鼎带路，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条路。

当日下午4时42分，我们第一批抵达麻扎塔格的队员登上了山顶。这天的行程约86公里，夜宿山脚下的灌木林中。这天夜里，考察队的一位中方队员向西走了一夜，考察麻扎塔格山西部，次日清晨才回来并声称，他在麻扎塔格山西面峭崖上发现了佛塔和石窟寺。于是考察队决定前往核实，最后终于找到他说的地方。其实，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石窟寺，而是一条冲沟，沟壁上有若干石洞，3×2平方米左右，沟口排列着4个类似佛塔的风化石柱，远处观望确实很象一处石窟寺。据新疆测绘局50万分之一地图，麻扎塔格山之西有一山曰古董山，这里是中外探险家从未涉足的一处古代遗址，可惜我们没时间去那里考察了。

据中外学者反复调查，麻扎塔格山的古迹集中在这座山的东端，最醒目的建筑是唐代古戍堡，和田老达玛沟遗址出土的唐代文书（Hedin 24）称此城堡为“神山堡”（参见彩版7）。据新近发表的德藏《唐于阗诸馆人马给粮历》，神山及以北地区有神山四馆，自南而北为：神山、谋常、欣衡、草泽。[16]其中，谋常疑即前文提到的伯克撒姆，斯坦因的Boksam和安博特的Boqsam。其地约在麻扎塔格以北45公里处。欣衡之名已不见于现代地图，不过伯克撒姆之北约45公里的突厥语地名“必底列克乌塔哈”，意为“有苜蓿的驿站”，欣衡馆驿似在此地。必底列克乌塔哈之北80公里处有一古代烽燧，安博特地图称之为Yangi-darya tura，意为“新水烽”。而神山至谋常以及谋常至欣衡都是40多公里。那么草泽馆似在新水烽和欣衡所在地必底列克乌塔哈之间。和田河在必底列克之北40余公里的地方分叉，斯坦因称此地为Tallak Tumushuk（河口），唐代草泽馆极可能设在这一地区。其北40公里为新水烽，又北50余公里则为三叉戍堡，和田河下游唐代馆驿的分布大致如此。

五、夜闯玉龙喀什河

10月14日下午2点，我们才结束麻扎塔格山的考察，踏上通往和田市的征程。这两地的直线距离约180公里，由于要沿河曲折而行，至少要走200公里左右。南行约43公里遇打柴人，才知道到了安博特的Takhar，从此南行约3公里至墨玉与和田两道叉路口。我们本该在这个叉路口走喀拉喀什河畔新近修建的公路。但向导只走过玉龙喀什河这条路，在他的引导下，我们走上向导熟悉，但极其难行的河滩路。不久，我们开始渡河，从地图上看，似即安博特的Boghaz，由此进入和田县境内。玉龙喀什河之路不仅随河流蜿蜒曲折，而且要反复渡过河床，以至考察队的瑞典朋友问我，这里共有几条河。我苦笑着向他解释，这里只有一条河，但要从河床上反复穿行，我们交谈时已经穿行了7次。此刻夜幕降临，路更难走了，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有些地方实际是向相反方向，即从南向北而行。我们一度认为当时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在下车搭救陷入沙漠的汽车时，我的一只手被沼泽中的毒蚊子叮了一个大包，足有鸡蛋大小。这个鬼地方是绝对不能作为夜宿的营地。终于我们看到了远处一点星光，走近一看是个自然村。村民告诉我们，这个村子叫阿吉亚村，距和田约120公里。从地图上看，这里距麻扎塔格、和田与墨玉的三叉路口不到50公里，我们竟走了近3个小时，可见此路之艰难。离开阿吉亚后，经塔和库尔、亚曼别克农场、亚勒古孜吉格农场和一个建设兵团的团场，次日清晨才终于抵达和田市，夜宿和田宾馆。在和田河考察的5日旅程中最后一天的考察是最艰难的。

唐人贾耽《皇华四达记》记载，神山与于阗之间有睢阳、咸泊和疏树等四馆。其中咸泊似在墨玉县的吐孜鲁克·奥塔克，据新近出版的《墨玉县地名图志》，其名意为“盐碱滩上的驿站”。

如果真是这样，唐代神山至于阗之路应取道喀拉喀什河西岸。那么，睢阳大概在麻扎塔格与吐孜鲁克之间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交汇处。此地为兵家必争之地，清代设有栏干，称“阔什拉什”，唐代睢阳或在此地附近。和田与吐孜鲁克·奥塔克之间最大的绿洲是墨玉绿洲，唐代疏树馆很可能就在今墨玉县城附近。十分可惜，我们这次考察没有走喀拉喀什河畔这条汉唐古道。不知这些唐代馆驿是否安在，于今何处？

这次和田河考察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凭吊于阗国古都约特干遗址。该遗址位于和田市西约10公里，文化层被掩埋在地下3—6米的洪积层下，面积约10平方公里。1866年阿古柏伪政权的和田地方长官尼牙孜派人在约特干挖水渠时发现了这个遗址。由于遗址内发现了金牛、金猴和金叶等黄金制品，故当地盗宝人不断在这里“淘金”，使遗址遭到极大破坏。1890年杜特雷依·德兰斯率法国考察队到约特干进行考古发掘时，这里已被“淘金者”不停地挖掘了24年。据斯坦因调查，该遗址的年代大约在汉代至两宋时期。法国考察队的东方学家格瑞纳第一个意识到该遗址即古代于阗首都。[17]这个假说得到斯坦因的支持，并为学界广泛采纳。[18]约特干遗址现已开辟为农田，农田水渠渠壁上仍可见各类古代陶片，我们考察队的成员张平还在一水渠内发现一枚唐代开元通宝。

原载《文物天地》1995年第2—3期，题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但和田河探险史和引述的古籍被删改，本文全部补入。

注　释

① 关于和田河流量的数据，参见殷晴：《和田水系变动和绿洲兴衰的历史考察》，《和田绿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6页。

② 本文所引阿克苏地区考古材料均据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8年；新疆文物考古所1989年文物普查资料，后者蒙参加1989年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的张平先生见告，谨至谢忱。

③ 李之勤：《论1882年的<中俄伊犁界约>》，《中国边疆史论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02页。

④ 参见《新疆乡土志》所附温宿府图。

⑤ Jack A. Dabbs,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 The Hague, 1963.

⑥ 尼·费·杜勃罗夫著，吉林大学外语系译：《普尔热瓦尔斯基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49－418页。

⑦ S.A. Hedin, *My Life as an Explorer*, New York, 1925. 斯坦因将赫定遇救的水池标在和田河东岸Korla之北，此地即清代洛甫县北塔瓦克明庄之一卡哈拉庄。安博特地图也有此地名，但标在河西岸，指更为广阔的地区。

⑧ 参见《西域文化研究》第2集，京都：法藏馆，1959年，第429－430页。

⑨ M.A. Stein, *Serindia*, Oxford, 1921, 12－91.

⑩ G. Gropp, *Archa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 Bremen: Verlag Friedrich Rover, 1974.

⑪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0－51页。

⑫ N. Ambolt, *Karawan*, Stockholm, 1935.

⑬ M.A. Stein, *Maps of Portions of Chinese Turkistan and Kansu*, 1906－1908 and 1913－1915; N. Ambolt and E. Norin: *Memoir on Maps*, Stockholm, 1967.

⑭ 关于清代地图，参见《新疆乡土志》，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9年重印本。

⑮ 据新疆测绘局50万分之一地图。

⑯ 荣新江：《于阗在唐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西域研究》1992年第3期第59页。

⑰ J. L. Dutreuil de Rhins,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 3 vols, Paris, 1897—1898.

⑱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3 vols, Oxford, 1907；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10页。

二　疏勒佛教考古概述

喀什噶尔古称“疏勒”。公元2世纪末，疏勒人曾建立了一个城邦国家，它以喀什噶尔河中下流的疏勒城（今巴楚西）为统治中心，同时领有叶尔羌河流域的莎车（或称乌铩，今莎车）、斫句迦（汉代称西夜，今叶城北部）及竭盘陀（或称竭叉，今塔什库尔干）三个附庸国。其疆域大致在今新疆喀什地区及克孜勒苏自治州。7世纪初，疏勒国都西迁迦师城（今喀什市一带）。所以隋唐文献改称疏勒国为佉沙国。

疏勒是我国最早信仰佛教的地区之一。佛教史上贵霜王朝君主伽膩色迦的王师僧伽罗刹就是疏勒人。4世纪末，龟兹名僧鸠摩罗什曾旅居疏勒研究佛学。唐代佛教百科全书《一切经音义》的著者慧琳也是疏勒人。慧琳俗姓裴氏，因此他可能还是疏勒裴氏王室成员。从2世纪末佛教入华到8世纪末疏勒亡国凡600年，其间疏勒一直信奉佛教。撰写此文，旨在总结一个世纪来国内外有关疏勒佛教问题的研究成果，以期推动疏勒古代文明研究的深入。

有关疏勒佛教的最早记录见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10《僧伽罗刹经序》。文中说：

> “僧伽罗刹者，须赖国人也……出家学道，游教诸邦，至犍陀越，士瓠陀罽贰王，师焉。”

所谓须赖即疏勒之异译，犍陀越即犍陀罗，罽贰王即贵霜王

伽腻色迦。[1]如果僧伽罗刹是在故乡“出家学道”的，那么这段文字应说明早在伽腻色迦时代（约130—153年）佛教业已传入疏勒。[2]道安（314—385年）《释氏西域记》记载：

> “疏勒国有佛浴床，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于宫中供养。”

此外，《法显传》、《宋云行记》、《出三藏记集》卷15《智猛传》、《梁高僧传》卷2《佛陀耶舍传》和《鸠摩罗什传》都较为详实地著录了疏勒佛教及其艺术。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12详细介绍了这里的佛教盛况。他提到疏勒国竭盘陀地区有伽蓝十余所，乌铩地区有伽蓝十余所，斫句迦地区有伽蓝数十所，而王国的统治中心佉沙地区伽蓝数目多达数百所。

公元9世纪末，喀喇汗王朝建立之初，汗朝的臣民也信仰佛教，但是第三代君主沙土克·博格拉汗于10世纪初改奉伊斯兰教，随即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和中亚七河地区发动“圣战”。[3]由于伊斯兰教教义禁止偶像崇拜，疏勒的佛殿宝刹在这场宗教战争中被摧毁殆尽。这里长达数百年历史的佛教文明，近乎被人淡忘。

直到19世纪初叶，清人编纂新疆史志时开始注意到疏勒境内的佛教遗存。徐松（1781—1848年）在其名著《西域水道记》中提到莎车附近的古迹巴依都埃土墩，他怀疑这是西辽时建造的佛寺。清嘉庆九年（1804年）喀什参赞大臣和宁撰《回疆通志》及清末新疆布政使王树枏主持编修的《新疆访古录》引《槐西杂志》均提到喀什西北有三个雕塑石像的佛教洞窟。

最早报道佛教等古代疏勒文化的西方人是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洛夫斯基。他在新疆任职期间到处搜集古物。1892年或早些时候收购到大批西域古文字写的佛经残卷。据说出自喀什附近的古遗址。为此，他踏察了喀什城郊的摩尔佛塔和上阿图什的三仙洞石窟寺遗址，并在《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论丛》卷7撰文《喀什附近的佛教遗物》，报道了他收集的佛教艺术品及佛经

残卷。他推测这些古代写本大概是用疏勒文书写的。[4]1896年他又在该杂志卷9撰文《喀什古迹考》，介绍了哈诺依古城及其他喀什古遗址。[5]经俄国著名梵学家奥登堡鉴定，彼得洛夫斯基在喀什收购的古代写本分别用佉卢文和婆罗谜文两种文字写成。佉卢文写本是一部印度西北方言（今称犍陀罗语）写的《法句经》残卷[6]，婆罗谜文写本中的一部分实为梵语《大孔雀明王经》。[7]另一部分婆罗谜写本后来被鉴定为梵语《妙法莲花经》[8]。虽然这些写本是彼氏在喀什收购的，但出土地点不一定在喀什。佉卢文《法句经》残卷的另外几页后来为法国杜特雷依德兰斯考察队在和田购得，可知它应出自和田。梵本《妙法莲花经》亦非喀什古物，因为后来发现该写本写有一则于阗文经序，可见它实际出土地点也在和田。此外，彼得洛夫斯基这两篇文章都在俄国杂志用俄文发表，鲜为外界所知，就连斯坦因当时都没有注意到。

1900年5月，斯坦因沿着玄奘西行印度的路线来新疆考古，7月29日抵达喀什。他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古调查。

首先，他调查了喀什城西北约1.6公里的库尔干提姆（城墩）遗址。该遗址位于图门河北岸，与英国驻喀什领事馆所在地齐尼瓦克隔河相望。据斯坦因调查，这是一处寺院遗址，面积约39×48米。遗址东北角有一座佛塔，用土坯砖（45.7×45.7×12.7厘米）砌成，已严重毁坏。其结构与巴基斯坦旁遮普西北的摩尼克耶罗佛塔相似，塔身为圆形，方形底座，底座共三级，全高约4.5米。遗址内遍布陶片和钱币，其一为宋代钱币，表明其年代在喀喇汗朝建立之前。寺院附近还发现一片水利灌溉系统遗址。类似的寺院建筑在喀什至安迪尔佛教遗存中到处可见。

随后，斯坦因来到喀什城南约3.2公里克孜尔河古河床北岸克孜尔特波（红丘）遗址。调查证实这里也是一座寺院遗址，建筑材料和结构与库尔干提姆相同。该佛寺建在一个东西长39米，

南北长 32.4 米，高 8.1 米的土台之上。佛塔的基座原来可能也是方形的，用土坯砖（43.18×43.18×7.6 厘米）砌成。该土丘之西 15 米处还有一处遗址，当地人称为“柯齐特波”（小丘），土丘呈圆形，直径 37 米，高 3.6 米，现被利用来作穆斯林墓地，但从布局看，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和克孜尔特波遗址有关的寺院所在地。

然后，斯坦因转到喀什老城东北 32 公里处哈诺依（汗庭）古城。他在该城东北约 6.4 公里柯克沙勒塔提附近又发现一座佛教遗址，当地人称“托帕提姆”（沙墩）。该遗址现存两个主要遗迹。其一为佛塔，用土坯筑成，圆形塔身、方形基座，高约 8.4 米，周长 9.6 米，现已坍塌成一圆形土丘。其二为殿堂，位于佛塔之西，长 78 米，宽 51 米，高约 2.4—3 米，和佛塔相距 13.5 米。

最后，斯坦因在托帕提姆西北偏北 6.4 公里处又找到一处佛教寺院遗址，当地人称之为“摩尔提姆”。该寺院坐落在一个 45.72× 152.4 米的土台之上。东南部为一佛塔，用土坯砖（43.18×43.18×8.9 厘米）砌成，阶梯式方形塔基，共 4 级，其上为两级圆塔，顶部为圆形。尽管塔顶已经部分坍塌，残高仍达 11.58 米。类似的佛塔斯坦因在和田热瓦克和民丰的安迪尔多次发现。此塔西北 61 米处有一较大的寺院建筑，土坯筑成，面积约 25.8×21.3 米，高约 10 米。在这处佛教建筑与佛塔之间，斯坦因还发现 3 处房址，编号 C、D 和 E，可知这里原是一个寺院建筑群。

斯坦因在上述五座遗址中均未见重要遗物。他主要依据建筑结构推测它们全都是佛教遗存并在他的考古报告中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田、安迪尔及吐鲁番的同类建筑作了比较。[9]

1904 年 6 月，斯坦因重访喀什噶尔。这次他重点考察了喀什西北 3.2 公里上阿图什绿洲的可汗宁沙尔（汗城）佛寺遗址和

三仙洞石窟寺。可汗宁沙尔遗址位于阿图什河左岸，其中有一座高达9.6米的佛塔，用土坯砖（38.1×30.48×10.16厘米）砌成。塔基呈方形，由于坍塌过甚，现已很难判断原来共有多少层。该塔西北有两组小建筑物。这两组建筑墙厚7.6至12.7厘米，亦为土坯筑成，土坯尺寸与佛塔土坯完全一样，所以，它们应为同组建筑。其一和佛塔相距151米，现已残败不全，保存较好的一段围墙残高7.5米。其二与佛塔相距50米，该遗存东西各带有一5.4米见方的小塔。

随后，斯坦因来到可汗宁沙尔遗址西北约1.6公里的三仙洞石窟寺考察。在他之前，彼得洛夫斯基及德国考古队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都曾来此调查并作了报道，所以斯坦因在报告中没有介绍这座石窟寺的详情。[10]据调查，三仙洞位于喀什北约18公里的伯什克里木河南岸三四十米高的峭壁间。现存3个石窟，东西排列，窟口原有木结构的殿前建筑，今已荡然无存，三个窟门东西全长10.65米。中间窟后室凿有一释迦牟尼石胎坐像，残高1.2米。东西两窟后室无石像，但各有一石台，高0.3米。三窟前室券顶和后室东西侧壁原来都绘有壁画，现在唯有东窟壁画略有保存。[11]

斯坦因还在阿图什河终点处巴昌阿格拉发现一处唐代寺院遗址，当地人称之为“都尔都尔阿护尔”。现存遗迹主要为一佛塔，土坯（15×12×3英寸）砌成，塔基4.2米见方，残高2.1米。出土遗物不多，但采集到一件木雕佛教艺术品。[12]

1906年8月，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来新疆考察古迹。他调查了喀什附近的三仙洞石窟寺和摩尔佛塔，但和斯坦因一样没有发现重要遗物。不过，伯希和在喀什城东2公里库西特古尔曼发现一处佛寺遗址。该寺院亦由佛塔和殿堂组成，伯希和在此意外发现一块写有婆罗谜文的木牍文书（编号P.001）。这是当时喀什附近唯一一件经考古发掘发现的古代文书。[13]

《大唐西域记》卷12介绍："佉沙国……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既然如此，喀什一带绝不止上述8处寺院。

1989年夏，我与国家文物局和新疆文化厅的同志一起考察吐鲁番至喀什丝绸之路沿线古遗址。据喀什文管所所长买买提·祖龙先生介绍，1985年在疏附县乌帕尔乡修建马哈木德·喀什噶里麻扎时曾发现一批古代贝叶经残片。经我们鉴定，这是一些用婆罗谜文书写的贝叶经，可惜出土时没有及时处理，贝叶与土块完全板结在一起，很难进一步研究。我们随即踏察了贝叶的出土地点艾斯海提毛拉山的佛教遗址，见到大片佛寺遗址，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喀什附近以前发现的几处佛教遗址。这里地面上遍布唐代或更早时期的陶片，遗址破坏程度极其严重。据1985年出版的《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刊布的照片，艾斯海提毛拉山遗址所出贝叶经系梵语佛经残片。同书刊布的带有波斯人头像的陶片一展疏勒佛教艺术之神韵。[13]显然，这是疏勒王国重要的佛教圣地之一。彼得洛夫斯基收购的部分梵文写本很可能就出自这座遗址。

喀什噶尔河流域佛教遗存中最重要的发现在巴楚东北托古孜沙来古城及图木舒克遗址。巴楚一带的古迹久为人知，清末宋伯鲁《新疆建置志》曰：

> "（巴楚）今城东北一百五十里图木舒克九台北山有废城，樵者于土中掘得开元钱，因呼为唐王城。"

类似的记载还见另一部清末新疆地志《巴楚州乡土志》。然而，用科学发掘全面揭开这里古文明之谜的第一个人应该是伯希和。

巴楚东北的古代遗址集中分布于图木舒克、托古孜沙来和拉尔塔格三山脚下，古代丝绸之路即从此三山之间穿过。托古孜沙

来山南麓几十米高的峭崖上有一座规模极其宏大的古城（参见彩版8），扼守丝绸之路，路南图木舒克山脚下遍布古代寺院。伯希和主要发掘了托古孜沙来古城西边峭崖下的寺院群，编号A至N。

1906年10月29日至12月25日，伯希和雇用当地村民30多人在这里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发掘，搜集各类古物400多件，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彩色塑像、高浮雕壁面装饰和一批精美壁画，同时发现的还有数十件婆罗谜文和汉文残文书以及五铢钱、开元通宝和北宋崇宁重宝。据伯希和及其弟子研究，托古孜沙来寺院群的年代可分为三个阶段，以A号遗址为中心的是4—5世纪，以B号遗址为中心的是6—7世纪，以D号遗址为中心的是8—9世纪。A号遗址发现了数枚汉代五铢钱和许多犍陀罗式的雕像。[15]该遗址发现的婆罗谜文《羯磨诵念经》的语言是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和疏勒邻邦于阗语十分接近。挪威语言学家柯若和英国伊朗语专家贝利称之为“塞语”。[16]另一位英国语言学家恩默瑞克认为这是当地土著语言并将其命名为Tumshuqese（图木舒克语）。[17]我们最近提出，这种流行于喀什噶尔河流域的古代语言实际是古代疏勒的语言。[18]B和D号遗址的年代不易确定，出土的雕像带有早期犍陀罗艺术风格（参见彩版12），但有些地点发现了唐代钱币，表明该遗址延用了较长的时间。D号遗址附近出有阿拉伯文和回鹘文残片，所以有可能延续到10世纪喀喇汗王朝建立之初。[19]伯希和在B号和D号遗址之间某个灰坑还发现了一张佉卢文残纸。如所周知，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流行的年代是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所以，法国学者韩百诗推测托古孜沙来寺院大概是在一个古老的寺院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1908年和1913年，斯坦因两次到图木舒克考察。第一次未做深入的发掘工作，只是顺便勘测了图木舒克、托古孜沙来及穷

梯木等唐代馆驿遗址的相对位置。斯坦因此行的最大收获是收购到6件拉尔塔格寺院遗址出土的佛教艺术品，这意味着疏勒境内又一个寺院遗址被发现。[26]1913年，斯坦因专程考察了图木舒克山西北27.2公里处拉尔塔格遗址。他在此发掘了5座相邻的房址。其中3号房址最大，面积约22.8×15米，东北角有一塔基，面积约10.8×6米。2号房址在3号房址之西，面积约14.4×7.8米，它与5号房址相邻，很可能是同组建筑。3号房址之南27米处为5号房址，面积约15.9×6.9米，斯坦因估计这是一座僧房。2号遗址西北27米处为4号房址，面积仅有5号房址的一半。拉尔塔格遗址出土的20余件文物主要是佛像残块及青铜装饰品，与图木舒克寺院发现物十分相似，所以，斯坦因将该遗址断为唐代。他还根据法国汉学家沙畹《西突厥史料》辑录的唐代文献在考古报告《亚洲腹地》中提出托古孜沙来古城即《旧唐书·高仙芝传》所云“握瑟德城”[27]。

接踵而来的是勒柯克率领的德国第四次中亚考古队。1913年，勒柯克来巴楚大肆发掘，他工作的重点是托古孜沙来古城南面图木舒克山脚下的寺院遗址，共发掘出三组建筑群。第一组中部是一座圆形佛塔，基座呈正方形，西部由几个圣殿组成，出土的雕塑都是犍陀罗式的，东部建筑年代较晚，一部分大概延续到回鹘时期。在图木舒克寺院群的南端有一座古老的寺院，发掘前地表遗迹几乎荡然无存，勒柯克在此发掘出佛塔塔基、寺院殿堂墙基及大批犍陀罗艺术风格的雕像、泥塑和壁画。同时还发现十几件婆罗谜文文书及丝织品。韩百诗后来研究，这座寺院和伯希和在托古孜沙来发掘的A号寺院遗址可能是巴楚北部最古老的建筑。据挪威语言学家柯若解读，勒柯克发现的婆罗谜文书大部分是契约文书。[28]其中2号文书称此地为Wanaci，我们认为这个地名当即《汉书·西域传》所说疏勒东境重镇“盘橐城”。图木舒克出土的婆罗谜文书中还有不少梵语写经，据瓦尔特施密特和伯

恩哈特等德国语言学家鉴定，其中有《长阿含经》及《法集要颂》的残页。[23]

大约在伯希和及勒柯克来巴楚发掘前后，一些不知名的当地寻宝人也在寻找图木舒克古物。1960年，贝利发表《塞语文书》第1卷，书中刊布了三件他鉴定出来的图木舒克土著语言写的文书。按其编号，一件属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霍恩勒（A. F. Hoernle）藏品”。这是本世纪初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G. Macartney）在新疆收购，转交英国梵学家霍恩勒研究，后又移交该图书馆收藏的。据贝利考证，这件文书的内容勘同西部吐火罗语（龟兹语）《阿兰若尼本生经》。[24]

黄文弼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新疆考古，1928年8月行至巴楚。他在图木舒克山寺院遗址附近发掘了三处房址及一座僧人墓葬。墓中出有彩绘陶罐，丝织舍利袋及两张婆罗谜文纸文书。据刊布的文书照片，这是两张西部吐火罗语写的籍帐文书。他还在房址中挖出6件泥塑佛像和一包汉文龟兹文双语钱币。[25]这是我国学者首次发掘图木舒克遗址。

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与新疆分院及新疆文化厅联合调查组发掘了托古孜沙来古城内的几处寺院遗址。他们在一处北朝时期的寺院内发现大批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泥塑佛像，数十件婆罗谜文木简残纸以及陶器、丝织品、五铢钱、汉龟双语钱及五铢钱钱范。在另一处唐代寺院遗址内清理出许多汉文残文书、婆罗谜文书。汉文文书内容有借贷、买卖契约、公私信函。文中提到“将军”、“守捉”、“叶护”、“副使”等职官名称。在一处北宋时期的灰坑内见到大批阿拉伯文、回鹘文书及残纸。同时出有陶器、木器及宋代钱币。[26]值得注意的是托古孜沙来古城内的遗址中还发现一件佉卢文木牍。这是继伯希和在托古孜沙来古城之西寺院遗址发现佉卢文残纸之后的第2件佉卢文书。[27]佉卢文书的发现证明喀什噶尔河流域也是犍陀罗语流行地区之一，这一带的

佛教遗存和塔里木盆地东部米兰佛教遗址一样，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

疏勒王国主要流行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同时亦有大乘学。后者的流行范围在疏勒王国东南叶尔羌河流域。大概因为此地毗邻大乘教盛行的于阗，其佛教受于阗影响。鸠摩罗什在疏勒留学期间曾向莎车王子参军之弟须利耶苏摩学习《阿耨达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大乘经典，完成了从小乘学到大乘学的理论转变。遗憾的是，尽管斯坦因和黄文弼多次来此地寻访古迹，但没有发现一处佛教遗存，徐松《西域水道记》所记“古浮屠”巴依都埃土墩是否为佛教遗存也有待调查落实。然而，黄文弼在莎车东北叶城地区发现了佛教寺院遗址。

1929年7至8月间，黄文弼结束莎车的考察进入叶城地区。他在叶城县城南偏东约50公里乌夏巴什乡特司村不尔项地方发现佛教摩崖石刻及石窟寺。据调查，石刻在乌鲁克吾斯塘河西岸白色崖壁之上，以红线条组成梯级形，高约5米，有被破坏、铲刮痕迹。东壁残存三尊石刻坐佛像。由此西行百余步，摩崖最高处有类似飞天的石刻。从不尔项东行三里，有一石窟寺，可容百人，壁画今已不存，仅见石刻残迹。

黄文弼在叶城北部山区的另一重要发现是棋盘千佛洞。这座千佛洞位于叶城县城西南115公里棋盘乡西约12公里棋盘河西岸峭壁间。现存十个洞窟，黄文弼勘查了其中8个，仅发现若干壁画残片。据后来调查，这些石窟全是单窟，仅有一室，呈方形或长方形。最大的洞窟面积4.4×3.9米，最小的仅2平方米。窟内四壁平整，高3至3.5米。顶部分拱顶和覆斗状两种。最高石窟内残存部分壁画，依稀可见佛像后的背光和山、树景物。[8]

正如黄文弼所推测，不尔项和棋盘两地当属汉代西夜、子合及魏晋隋唐文献的朱俱波、悉居半或斫句迦境域。棋盘这个地名当即朱俱波或悉居半之异称。这里本来有一个独立的小王国，汉

末以来一直是疏勒的属国，所以不尔项和棋盘石窟寺亦为疏勒佛教遗存。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2记斫句迦国："山阜连属，砾石弥漫，临带两河……伽蓝数十，毁坏已多，僧徒百余人，习学大乘教。"所谓两河当指叶城北面的提孜那甫河和叶尔羌河上游。棋盘河正在此两河之间。据玄奘的记述，这里的石窟寺为大乘寺，唐代寺院已经开始毁坏。

除莎车和斫句迦外，疏勒还有一个重要的附庸国称为"竭叉"、"汉盘陀"或"竭盘陀"。其领地大致在帕米尔东部，尤其是塔什库尔干地区。东晋法显（342—423年）西行曾访问过此地。《法显传》载：竭叉国"其地山寒，不生余谷，唯熟麦耳。众僧受岁已，其晨辄霜。故其王每赞众僧，令麦熟然后受岁。其国中有佛唾壶，以石作，色似佛钵。又有佛一齿，国人为佛齿起塔。有千余僧，尽小乘学"。《大唐西域记》卷12又载："朅盘陀国周二千余里，……背徙多河（叶尔羌河上游塔什库尔干河）……山岭连属，川原隘狭……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从上述记载看，东晋至唐代竭盘陀佛教由盛及衰，唐玄奘访问此地时仅存十余所寺院。1913年4月，斯坦因在塔什库尔干考察时发现了其中一所。他在塔什库尔干河东岸托格伦夏绿洲一个叫江格尔贡巴兹的地方发现一条古代灌溉渠。这条渠的两岸分布着古代房址、墓葬。值得注意的是水渠的东岸有两座佛塔。第一座已完全坍塌，呈土丘状，直径约21米，高9米。此塔结构与喀什附近的库尔干提姆佛塔类型相似。此塔之北18米处还有一小塔，紧靠水渠，土坯建造，也已坍塌，残高2.4米，塔基面积约4.5×3米。这座佛塔的西北偏北144米处有一长方形房址，面积57.9×24.9米。三个墙角有塔形的角楼，直径3米左右。斯坦因虽然未在此进行深入发掘，但从现存遗迹不难看到这些遗迹无疑是古代佛教寺院之类的建筑。[29]

塔什库尔干地区保存下来的佛教遗迹遗物似乎不多，难道疏

勒西境竭盘陀的寺院真的毁坏殆尽了吗？《洛阳伽蓝记》卷5引《宋云行记》的有关记载值得注意，文中说：

> “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界。西行六日登葱岭山，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处甚寒，冬夏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自发葱岭，步步渐高……汉盘陀国正在山顶。”

毒龙池显然就是《大唐西域记》卷12婆谜罗川条所述葱岭之巅的“大龙池”，今帕米尔萨里库尔湖。不可依山当指阿尔楚尔山，葱岭山即瓦罕岭。那么，钵盂当即Wakhan（瓦罕）之古译。后一音节可比较Khotan古译于阗，Khema古译扜弥。所以，钵盂城应是塔什库尔干之西瓦罕走廊中某个古城。古代疏勒西南境汉盘陀包括了瓦罕走廊。1904年，斯坦因在瓦罕走廊坎色尔发现一古城堡，据他观察，其建造方法和建筑结构与塔里木盆地及敦煌见到的古堡相似。他怀疑这是吐蕃人或高仙芝西征时修建的城堡，其实很可能就是汉盘陀城寨钵盂城。斯坦因在坎色尔城堡附近还发现了佛教遗址，称之为“卡尔万巴拉斯佛塔”。该遗址位于小帕米尔伯寨古姆巴兹附近。法显、宋云和玄奘访问过的汉盘陀寺院或许应在这一带。据斯坦因勘察，这座佛塔3米见方，凡三层，每层1米左右。类似的佛塔还见于兴都库什山以南洪扎谷地的陀勒佛塔。在卡尔万巴拉斯地方还有一处佛寺遗址，其结构为典型的犍陀罗式寺院。斯坦因怀疑它是《旧唐书·西域传》所记高仙芝攻伐小勃律时经过的“赤佛堂”。[31]这座寺院很可能也是汉盘陀佛寺之一。

综上所述，古代疏勒王国境内目前共发现佛教遗址19座，其中半数集中分布在疏勒西境喀什和阿图什附近。它们是：1. 库尔干提姆遗址，2. 克孜尔特波遗址，3. 柯齐特波遗址，4. 托帕提姆遗址，5. 摩尔提姆遗址，6. 可汗宁沙尔遗址，7. 三仙洞石窟寺，8. 都尔都尔阿护尔遗址，9. 库西特古尔曼遗址，10. 艾

斯海提毛拉山遗址。另外四座分布在疏勒东境巴楚一带：1. 图木舒克寺院群，2. 托古孜沙来城西寺院群，3. 托古孜沙来城内寺院群，4. 拉尔塔格寺院遗址。还有三座分布在疏勒东北境莎车、叶城一带：1. 巴依都埃土墩，2. 不尔项石窟寺及摩崖石刻，3. 棋盘河石窟寺。其余两座分布在疏勒西北境塔什库尔干与瓦罕：1. 江格尔贡巴兹寺院遗址，2. 卡尔万巴拉斯寺院遗址。

关于这些遗址的年代，学界颇有争议，法国学者韩百诗认为巴楚一带的寺院遗址至多可以追溯到4世纪末，德国学者勒柯克则认为有些遗址可能属于汉代遗存，即公元2世纪。从图木舒克遗址屡屡发现佉卢文书看，该遗址确实是塔里木盆地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有可能早到公元3世纪。但目前尚没有能说明疏勒境内公元2世纪佛教遗存的确证。由于托古孜沙来寺院群发现了阿拉伯文书、喀喇汗朝文书及北宋钱币，说明疏勒佛教源远流长，直迄北宋年间喀喇汗王朝建立之初。

魏晋—隋唐文献均称疏勒人主要信奉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疏勒境内发现的疏勒语《羯磨诵念经》、《阿兰若尼本生经》及梵语《长阿含经》、《法集要颂》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在佛教传承关系上，疏勒佛教与犍陀罗及塔里木盆地北部龟兹佛教的关系及其密切。不过，疏勒人并不排斥大乘佛教，在王国东北境叶尔羌河流域莎车、叶城地区盛行大乘教，大概是受邻邦于阗佛教的影响。同时，疏勒还流行佛教的密宗教派。彼得洛夫斯基在喀什附近收购的梵语《大孔雀明王经》残卷就是密宗教派经典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还证实疏勒佛教艺术明显受希腊化大夏艺术、犍陀罗艺术及汉文化影响。

总之，疏勒佛教遗存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古代疏勒的社会画卷。疏勒佛教文明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将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充分认识。

本文发表（原载《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不久，又见到新疆文物普查队公布的他们1990年8月在喀什地区所做文物调查资料。其中三个佛教遗址是以前不知道的。其一，汉盘陀古城佛寺遗址：该寺院位于塔什库尔干石头城东面，寺院残存墙壁周长长约18米，宽4米，内有四五间佛堂或僧房。房屋用土坯建筑，土坯尺寸38×26×8厘米。寺院墙壁仍残剩部分佛教壁画，墙上抹有三层草泥，两层有壁画。可知其历经两个时代，寺院西北角的房屋墙上依稀可见一佛像壁画；在有壁画的房内西墙上有一土洞，洞壁有草泥抹平痕迹。从房屋西北角残墙上可看出此寺院建筑为穹庐顶，用较大的土坯收顶，土坯尺寸？×32×11厘米（见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喀什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第27—28页）。1991年我曾在参加这次文物普查的喀什文管所维族朋友阿力甫的陪同下到该寺院实地调查，但由于他们尚未发表这次普查资料，故不便在我的论文中介绍这个寺院。今材料已经发表，为使读者了解疏勒佛教考古的最新发现，特补充于此。其二，明尧勒佛寺遗址：该寺院位于疏附县木什乡西北11.6公里。寺院位于一小土丘上，地基约14×10米；只有佛塔尚存，可看出两层塔基。寺院东面有一古河道，其他三面现已开辟为农田（前揭文，第16页）。其三，喀勒乎其佛寺遗址：该寺院位于伽师县喀勒乎其农场场部北约6公里，地处喀勒乎其比纳木戈壁边缘。该寺院仅存一佛塔，塔基为正方形，底面积7.3×7.3米，残高5米，有三层台阶，每层高1—1.2米，塔身呈圆柱形，顶残（前揭文，第26页）。此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队近年在喀什三仙洞附近还发现了一个以前不知道的佛教寺院，但目前只报道了消息，尚未公布资料（马世长：《三仙洞年代别议》，《中国考古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9页）。

注 释

① 前秦僧伽跋澄译《僧伽罗刹所集经》之经序亦录有这段文字，本文所引“土甄陀罽宾王”据此改为“土甄陀罽贰王”。

② 关于伽腻色伽的年代，见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747页。

③ O. Pritsak, "Von den Karluk Zu den Karachaniden", *ZDMG*, Band. 101, 1951, 270－300.

④ N. F. Petrovskii, "Buddhiiskii pamytnik bliz Kašgara", *ZVORAO*, VII, 1892, 298－301.

⑤ N. F. Petrovskii, "Zamyetki o drevnostyakh Kašgara", *ZVORAO*, IX, 1896, 147－154.

⑥ S. F. Ol'denburg, "Predvaritel'naia zamětka o buddiskoi rukopisi napisan-naoi Pis'menami Kharosthī", St. Petersburg, 1897; also see *New Indian Antiquary*, 1946, 183－186.

⑦ 烈维著，冯承均译：《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⑧ Lokesh Chandra (ed.), *Saddharmapundarikasūtra*, with a foreword by H. Bechert,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ture, New Delhi, 1976.

⑨ M. A. Stein, "The ancient remains of Kashgar and the oases of Yarkand and Kargalik," *Ancient Khotan*, vol. I, Oxford, 1907, 73－93.

⑩ M. A. Stein, "About Kashgar and Yarkand," *Serindia*, vol. I, Oxford, 1921, 80－85.

⑪ 李遇春：《新疆三仙洞的开窟时代和壁画内容初探》，《文物》1982年第4期第13－17页。

⑫ M. A. Stein, "From Kashgar to the Khotan River", *Innermost Asia*, vol. I, Oxford, 1928, 68－69.

⑬ P. Pelliot, "Notes sur l' Asie Centrale, Troisgrott es et ruine de Tegurman an Nord de Kachgar," *BEFEO*, 1906, 255－296.

⑭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249。

⑮ 伯希和生前未能完成他在图木舒克考古的正式考古报告。他的学生韩百诗主持整理他的遗著。图木舒克的报告见 L. Hambis, Tourmchouq, I-II, Paris,

1961-1964。

⑯ S. Konow, "Ein neuer Saka-Dialekt", *SPAW*, Phil-hist. Klasse, xx, 1935, 772－823; H. W. Bailey, "Language of the Saka",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4, *Iranistik l*, Leiden, 1958, 131－154.

⑰ R. E. Emmerick, *The Tumshuqese Karmavācanā Text*, Mainz, 1985.

⑱ 梅邨：《疏勒考古九十年》，《文物天地》1989年第1－2期连载。

⑲ 韩百诗整理伯希和在图木舒克发现的文物时，许多文书都找不到了，所以他在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些阿拉伯文和回鹘文书。最近我在1982年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提供给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卷中找到了这批材料。按编号它们应是图木舒克发现的阿拉伯文和回鹘文残纸，但仍有不少伯希和提到过的文书下落不明。

⑳ M. A. Stein, "Desert sites north of Tumshuk and Maral-Bashi," *Serindia*, vol. 3, Oxford, 1921, 1306－1316.

㉑ M. A. Stein, "Old remains and routes beyond Maral-Bashi,"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 74－81.

㉒ A. von. Le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Leipzig, 1928, 27－33; A. von. Le Coq und E. Waldschmidt, *Die Buddistische Spatantike in Mittelasien*, 7 Vols., Berlin, 1922－1933.

㉓ E. Waldschmidt, *Handschriften zu fünf Sūtras des Dirghāgama*, Faksimilewiedergaben von Sanskrithandschriten, Band I, The Hague: Moutonand Co, 1963; Fr. Bernhard, Udānavarga, Band I, Göttingen, 1965, 72－73.

㉔ H. W. Bailey, *Saka Documnets Text Volume*, London, 1968, 44－51.

㉕ 黄文弼：《喀什噶尔河畔之古址》，《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8－61页。

㉖ 莫明华：《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80－181页。

㉗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㉘ 黄文弼：《皮山及叶城山中之古址》，《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5－58页。

㉙ M. A. Stein, "In the valley of Tash-Kuarghan," *Innermost Asia*, vol. I, Oxford, 1928, 57－65.

③ M. A. Stein, "Historical Sites in Wakhan," *Serindia*, vol. I, Oxford, 1921, 69 – 72.

三　汉代精绝国与尼雅遗址

19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到中国西部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行地理探险，不料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发现许多古代城市。消息传出后，举世震惊。于是，欧美各国和日本纷纷派探险队到中国西部沙漠考古，其考察活动历时半个世纪之久，逐步揭开了这里古文明之谜。[1]原来这些沙漠古城就是汉代文献所说西域三十六国的某些城邦的废墟。这些沙漠绿洲王国的兴衰史对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变迁都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因而引起中外学人的普遍兴趣。本文将要讨论的即塔克拉玛干最为著名的沙埋古城之一——尼雅遗址（参见彩版9）。

尼雅遗址，或称“尼雅古城”，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1年1月首先发现的。因为这座古代废墟位于新疆民丰县北境古代尼雅河尾闾地带，故被发现者命名为“尼雅遗址”。此后，尼雅成了斯坦因每次中亚考察的必经之地。他一生共4次来此发掘，逐步揭开了尼雅遗址的全貌（参见彩版10）。[2]

尼雅遗址废弃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水源断绝。发源于昆仑山的尼雅河原来流量很大，历史时期一直可以流到尼雅遗址。这里的古代居民即生活在尼雅河冲击而成的大片绿洲上。如今这里已是茫茫沙海，远离现代绿洲达140公里。尼雅遗址主要由佛教寺院、官署、住宅群、种植园、冶铁作坊等古代建筑组成。这些建筑物的布局相当分散，星罗棋布，分布于古代尼雅河终点处的沙

丘、沙岭间。遗址范围南北约22.5公里（14英里），东西最宽处达6.4公里（4英里）。[3]遗址中心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佛塔，标志着佛教在这里的特殊地位。据全球卫星定位仪（GPS）测定的最新数据，这座佛塔约在北纬37°58′34.5″，东经82°43′14.5″。[4]尼雅遗址内的建筑物装饰和家具纹样明显受犍陀罗佛教艺术影响（参见彩版11），这和遗址内发现了700多件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尼雅遗址中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文木简、残纸，其中一件记有晋泰始五年年号（280年），斯坦因把尼雅遗址的年代定在公元3世纪就是根据这个材料。

尽管目前没有在尼雅遗址发现城墙遗迹，但该遗址规模宏大，无疑是某个古代城市所在地，所以又被称为“尼雅古城”。它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录的哪座城市呢？目前公布的尼雅出土汉文资料没有给我们任何启示。因此，这个问题要从研究现代地名尼雅入手。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尼雅河得名于唐玄奘从西域回国途中访问过的一个城镇——尼壤城。[5]据《大唐西域记》卷12，尼壤城是唐代于阗国东境关防城镇。这座城镇历史悠久，公元3世纪的尼雅佉卢文书已经提到尼壤，称其为nina或nana。[6]这个地名相当于古代于阗语文献中地名niña[7]。玄奘所谓“尼壤”显然根据于阗语，大概来自该于阗语地名的形容词或专有名词形式niñana；而现代地名“尼雅”则出自该于阗语地名的名词形式niña（读作ninya）。古汉语往往不分l、r和n，如玄奘把于阗语niñana读若nirang，所以译作“尼壤”。同理，niña在古汉语中可以读作liña，和汉语“兰”字发音相近。据《新唐书·地理志》，于阗毗沙都督府下辖十州，其东境系兰城州，或称“兰城镇”、“兰城守捉”。所谓“兰城”显然就是《大唐西域记》所说尼壤城。[8]

虽然“尼雅”一名得自尼壤城或兰城，但是尼雅古城显然和唐代于阗国东境这座城镇无关。因为，尼雅出土文物不晚于公元

4世纪末，玄奘访问尼壤城的时间是公元644年，此时尼雅古城早已化作一片废墟。不过，据尼雅出土637号佉卢文书记载，尼壤城附近还有一个地方，叫做caḋ'ota（凯度多）[9]。这是一个大行政区，频频出现于尼雅佉卢文书，表示尼雅古城所属地方的州府名称。这个地名在发音上和汉语“精绝”相近，所以，斯坦因推测caḋ'ota就是汉文史籍所谓“精绝”。

精绝系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文中说：“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陂陁，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据《后汉书·西域传》，精绝乃丝绸之路南道一个重要的城邦国家，地处东西交通孔道。文中说：“自鄯善逾葱岭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又说：“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东汉末年，鄯善人征服丝绸之路南道楼兰、且末、小宛、精绝和戎卢等国，建立了西起尼雅河，东至敦煌的鄯善王国。此后，精绝成为鄯善统治下的一个州，最后随鄯善国的灭亡于公元5世纪销声匿迹。[10]据斯坦因考古报告，尼雅所出文物大多属于公元3—4世纪，联系佉卢文书称这里为caḋ'ota raya（凯度多州），那么，我们把尼雅遗址比定为鄯善国西境精绝州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是，鄯善国的精绝州是否建于汉代精绝国故址之上？

目前发表的尼雅考古资料中仅有一组木简和与其共出的零星文物可以确定属于汉代。据斯坦因的考古报告，这些木简出自一个装满古代废弃物的木箱内，木箱埋在一所驼马房内的垃圾堆下。除汉简外，斯坦因还在木箱内清理出丝、毛、麻等织物残片，绣花皮革片、漆器残片、木制器具等遗物。那么，这所编为N.XIV.iii号遗址的驼马房以及房屋中所出木箱内的文物可能都

是汉代遗存。不过，木箱外面的垃圾堆厚达2米，或表明这所房子曾长期使用，其使用年代也许要延续到汉代之后鄯善国统治时期。

虽然尼雅发现的汉简为数不多，但是相当重要。其内容表明它们是精绝王室的遗物。择要抄录于下："臣承德叩头谨以玫瑰再拜致问大王"（719号）；"王母谨以琅玕致问王"（720号）；"休乌宋耶谨以琅玕致问小大子九健持"（722号）；"大子美夫人叩头谨以琅玕致问夫人春君"（718号）。[11]显然，这些汉简记录的是精绝王公贵族相互送礼问候的贺词。所谓"大王"和"王"当指精绝国王；"王母"即精绝王太后；"小大子"和"大子"即精绝太子；"大子美夫人"指太子之妃。那么，"夫人春君"大概是精绝王的嫔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汉简是作为垃圾丢弃在垃圾箱内的。因此，我们应该排除这只木箱是从较远的地方搬来埋到这所驼马房垃圾堆下的可能性。那么，精绝国的王宫应该就在尼雅N.XIV.iii号遗址附近。以此推之，尼雅古城应即精绝国首都精绝城所在地。

斯坦因公布的尼雅汉简均无纪年。研究者目前只能凭借书法风格做一些判断，一般认为它们系东汉墨迹。东汉年间，一些侨居西域的中原人士曾在西域诸国为官，如《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拘弥王成国的主簿秦牧和新疆拜城东汉刻石"刘平国作关亭诵"文中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12]尼雅719号汉简中精绝王的臣下承德大概也是这样一位中原人士。尼雅这批汉简或许就是此人书写的。50年代，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尼雅遗址附近发掘出一座东汉合葬墓，并在该遗址收集到一枚刻有"司禾府印"的东汉印章。[13]这些材料有助于说明尼雅遗址的年代可以上溯到东汉。尽管近年有些研究者认为尼雅东汉合葬墓和司禾府印章的时代不是东汉，而是魏晋时期，[14]但大家对尼雅汉简属于汉代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东汉精绝城似可根据这组汉简落实在尼雅

古城。

然而，《汉书·西域传》介绍的是西汉精绝国的情况。人们不禁要问，西汉时期的精绝城是否也建在尼雅遗址所在地呢？由于目前发表的尼雅考古资料无从证明，这个问题至今仍是精绝考古的疑案之一。

80年代起，中国石油部门开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大规模石油勘探，于是不时有沙漠腹地发现古城的消息传出。1986年，我曾到塔里木盆地南缘进行考古调查，在尼雅遗址东面考察安迪尔古城时与几位石油勘探队员不期而遇。据说，他们在尼雅之西以及安迪尔至且末之间的沙漠中遇见过许多古城或遍布陶片的遗址。他们还介绍说，尼雅遗址以北沙漠深处也有人类活动遗迹，他们曾在那里发现过陶片和古城遗址。限于条件，我无法对他们说的沙漠深处的古代遗迹进行核实，所以对上述传闻只能将信将疑。不过，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物探局9403A支队队长冯志文介绍的一座古城却十分属实。1989年，他率领勘探队在克里雅河流域大河沿以北80公里处向东进行石油勘探，勘探到尼雅遗址以北沙漠时意外发现一座古城，古城地表遍布陶片。他们用推土机在古城边随便挖了一下，结果挖出许多文物。其中有玉石球、玉石珠、青铜刀和陶器残片等。事后，他派专车将这批文物送到乌鲁木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3]1990年夏，我在该研究所访问时，王炳华所长请我看过这批文物。由于学界对塔克拉玛干早期文化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我们尚不能对这批文物进行深入的年代学研究。考虑到这批文物系青铜时代的产物，所以该古城早于尼雅遗址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鉴于尼雅河在历史时期不断从北向南退缩，所以，我曾怀疑冯志文新发现的这个早于尼雅遗址的古城或许就是西汉精绝城。然而，最近我在大英图书馆工作时见到的尼雅考古新资料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

1995年夏，我在伦敦访问期间专门调查了大英图书馆所藏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尼雅发掘的古代写卷。这项调查得到该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弗朗西斯伍德博士的热情支持。她不仅为我们查找已经发表的斯坦因考古资料提供方便，还把最近刚从图书馆仓库找出来从未发表过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收集的古代手稿及其他档案材料提供给我们研究。[16]其中，斯坦因在尼雅新发现的一批汉简尤为引人注目。

1931 年 2 月，斯坦因最后一次到尼雅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工作持续了两周。[17]他在以前发现汉简的 N.XIV.iii 号遗址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另一处早期遗址，编号 N.XIV.ü，并在这里发掘出一批汉代文物。据我们研究，其中一枚简牍可能是大月氏使臣写给汉宣帝的一份上书的手稿。我们已就此问题另拟专文作了初步考证，[18]兹不赘述。这枚西汉简牍可证尼雅遗址的下限可以早至西汉精绝国时代。此外，西汉精绝地处东西交通孔道。冯志文发现的古城位置偏北，不在汉代丝绸之路重要交通线上。所以，西汉精绝国无疑就在尼雅遗址所在地。更为重要的是，斯坦因这次尼雅考察在 N.II 号遗址附近又新发现了一处汉代遗址，从中掘获记有地名“精绝”的汉简。据斯坦因拍摄的照片（参见彩版 18），此简读作：

1./……［其前字迹不清］（二年）［以下残缺］……

2./漢精絶王承書從（事）［以下残缺］……

熟悉汉简的研究者不难看出，这是汉代官府上行或下行公文书中所谓“下行文书”，即上级官吏写给下级官吏的命令。这类文书都具有某种固定的公文程式。[19]例如：居延汉简第 10·29 号记有“闰月丁巳，张掖肩水城都尉以近次兼行都尉事下候城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守卒史义”；居延汉简第 10·31 号记有“元康五年二月癸丑朔癸亥，御史大夫吉下丞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20]敦煌汉简 第 57 号记有“四月庚子，丞吉下中二、中二千郡大守、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

诏书]"；敦煌汉简第217号记有"三月辛未，敦煌太守常乐、长史布（驰）、丞（贤下）伊循城部都尉临部官，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到言"。[21]

因此，我们似可对尼雅这枚残简作部分复原，读作"……（二年）……［下］漢精絶王，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大意是说，某年某月某日，负责西域事务的某官吏向臣属于汉朝的精绝国王下达命令，必须遵照命令行事。执行命令的人要像对待皇帝的诏书一样对待这道命令。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这枚汉简的年代。此简第一行开头似有年号，可惜这行字仅存左边半个字，且照片模糊，第3和第4字似为"二年"的残文，其余不堪卒读。和这枚汉简共出尼雅N.II号遗址的其他简牍均无纪年，我们只得从其他方面作一些推断。既然此简称精绝王为"汉精绝王"，那么，它应写于精绝并入西汉版图之后。《汉书·郑吉传》记载，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郑）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莫府即西汉设在中亚的最高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学界一般都是根据这条记载将西域三十六国正式并入西汉版图的年代定在公元前60年。[22]

然而，"汉之号令班西域"并非从郑吉开始。敦煌汉简391号记曰："出粟一斗二升，以食使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八月癸卯。"[23]续相如其人见《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表中说："承父侯续相如，以使西域，发外王子弟，诛斩扶乐王首，虏二千五百人。侯，千百五十户，太始三年五月封。"续相如于汉武帝太始三年封侯，他出使西域的时间当在太始二年或早些时候。[24]莎车和精绝都位于丝绸之路南道，而精绝又在莎车与敦煌之间，那么，续相如从敦煌出使莎车必然要经过精绝。前引汉功臣表说，续相如在出使莎车，讨伐扶乐王时曾"发外王子

弟”，其中应当包括精绝王子弟。那么，上述材料说明早在汉武帝太始二年（前103年），汉之号令已经通行精绝。

此外，汉使冯奉世于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送大宛国客人回国亦取道丝绸之路南道，途经精绝和莎车等地。《汉书·西域传》记载：“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万年，并杀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候冯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冯奉世为攻打莎车而调集的西域诸国兵显然包括精绝士兵。这段史实再次说明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前，汉之号令已经通行精绝。

这枚尼雅汉简的形制及内容表明，它与汉代边塞遗址发现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以及罗布淖尔汉简是一类东西。它的出现当与西汉将吏在西域屯田戍边密切相关。据文献记载，汉代西域屯田主要在丝绸之路北道车师（今新疆吐鲁番）以及楼兰至姑墨（今新疆罗布泊至阿克苏）一线。楼兰与姑墨之间还建有边塞烽燧。如果在这些地方发现和汉代屯戍活动有关的简牍，则事在情理之中。例如：黄文弼在楼兰城东北土垠遗址发现的罗布淖尔汉简，其历史背景容易被理解。但是，远离汉代屯戍遗址的精绝为什么会出土和汉代西域屯田活动有关的简牍呢？我们注意到，汉宣帝年间西域都护在精绝之西的莎车开辟屯田之事。《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正由于莎车屯田的开辟，过往于丝绸之路南道的西汉将吏与日俱增，因而加强了莎车以东于阗、拘弥、精绝等南道诸国和戍边中原将吏的联系。《汉书·西域传》记录的精绝国职官表中有“译长”，可见当时精绝与外界交往，特别是与西汉使者和戍边将吏交往之频繁。近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精绝与莎车之间和田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地发掘出带有汉字的西汉封检很可能属于西汉屯田莎车的产物。[20]另一方面，《汉书·西域传》形容精绝国自然环境说，其“地陂陁”，不适合大规模屯田活动，文献也

没有记载汉代中原吏卒曾在精绝屯田，而尼雅遗址却发现了带有“司禾府印”字样的汉印。因此，我们怀疑这枚汉印或许是负责莎车屯田事务的汉吏丢失在尼雅遗址的，未必是精绝当地古物。

据以上讨论，尼雅汉简提到的“汉”有可能是西汉，但此简文字采用颇为工整的汉隶，字体风格全无篆书的痕迹，不似汉初武帝年间的简牍，无论如何也是西汉中期以后的隶书。如果是这样，那么，此简可能是西域都护设立前夕冯奉世为讨伐莎车向精绝王下达的征兵令；或者是西域都护设立后西域都护、莎车屯田校尉或其他负责西域事务的中原官吏向精绝王下达的命令。

西汉末，王莽篡夺刘氏政权，到处施行所谓“托古改制”。他对西汉赐予周边少数族首领的封号亦大加改动。《汉书·王莽传》记载：“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此事为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的汉简证实。这里所出王莽年间的汉简称焉耆王为“焉耆侯”，称卑陆王为“卑陆侯”。[28]但是，尼雅汉简仍称精绝首领为“精绝王”，可知它不是王莽时期的汉简。

尽管我们十分倾向于把此简年代断在西汉，但从书法判断，此简所用隶书一直沿用到东汉。在没有得到更为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们还不能排除它是东汉遗物的可能性。为此，有必要在此清理一下东汉年间的精绝史。

东汉初年，莎车称雄中亚，和匈奴争夺西域。塔里木盆地，甚至帕米尔以西的大宛国都在莎车势力范围内。《后汉书·西域传》说，东汉建武年间莎车至为强大，西域“五十五国皆属焉”。那么，这个时期精绝当在莎车统治之下。后来，西域诸国不堪莎车压迫，希望东汉派都护维持西域纲纪。据《后汉书·武帝纪》，建武二十一年（45年）“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由于汉光武帝不肯派都护，西域诸国仍处于莎车与匈

奴的争夺之中，这种局面直到汉明帝时才有所改观。永平十六年(73年)，于阗灭莎车，称霸塔里木盆地，“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后汉书·西域传》）。于是，精绝又落入于阗统治之下。

精绝重新归汉大概始于永平十七年（74年），是年东汉于车师重设西域都护。班超经营西域时又将都护治所迁往龟兹及疏勒。其后不久，东汉废都护职。至安帝时，改置西域长史。这个时期，精绝先后在西域都护和西域长史统辖之下。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于阗王安国攻杀拘弥王，汉朝立即派西域长史和戊校尉各发兵讨伐，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此后，西域与中原虽然还有一些联系，但汉朝再也无力控制西域。因此，《后汉书·西域传》叙述西域史绝笔于汉灵帝熹平四年。

据以上讨论，尼雅汉简如果写于东汉，那么，其年代应在东汉重设西域都护至东汉将吏撤出西域这段时间，也就是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至汉灵帝熹平四年之间（74—175年）。

无论如何，斯坦因在尼雅新发现的这批简牍为我们研究汉代精绝国与尼雅遗址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资料。它们首次以出土文字资料将尼雅遗址的年代从公元3世纪至少提前到公元前1世纪，并明确告诉我们汉代精绝国首都——精绝城就在尼雅遗址下层文化堆积之中。这为我们今后进一步寻找汉代精绝城指明了方向。

原载《文物》1996年第12期。

注 释

① J.A. Dabbs,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 The Hague: Mouton & Co., 1963.

② M.A.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Serind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Innermost A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以上是斯坦因前三次中亚考察的正式报告。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详见注⑰。

③ 据近年调查，尼雅遗址的范围或许要比斯坦因介绍的面积大，东西宽约10多公里。说见李吟屏：《尼雅遗址古建筑初探》，《和田师专》1983年刊；盛春寿：《民丰县尼雅遗址考察记实》，《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第49－54和第74页。

④ 小島康譽等：《日中共同ニヤ遺迹學術調查1994年度計畫書》，中國新疆ニヤ遺迹學術研究機構，1994年，第10页。1994年新疆军区陆航处陈国平用GPS对尼雅佛塔经纬度测定的数据和小島康譽所测数据相同。

⑤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0页。

⑥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637页。

⑦ H.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ol. I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149.

⑧ 林梅村：《新疆和田出土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第101页。

⑨ 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1940, 132.

⑩ 据《南齐书·茹茹虏传》，南齐使者江景玄于5世纪末出使高车，途经鄯善等地。是时，"鄯善为丁灵所破，人民散尽"。

⑪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8页。

⑫ 马雍：《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集释考订》，《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40页。

⑬ 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收入韩翔等编：《尼雅考古资料》，乌鲁木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年，第6－9页。

⑭ 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5－527页；平一：《"司禾府印"小考》，《新疆文物》1990年第2期第111－112页。

⑮ 1994年，我在且末以北120公里处寻找且末古城得到这个支队的大力帮助，承蒙队长冯志文告知上述情况，一并在此感谢。

⑯ 这批古代手稿主要是1930年12月至1931年5月间，斯坦因在新疆和田达

玛沟遗址发现的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书和汉简。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详见 J. Mirsky, *Sir Aurel Stein—Archaeological Explor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张力和于江:《斯坦因四次入新简述》,《新疆文物》1992 年第 4 期第 113－114 页。

⑰ J. Mirsky, *Sir Aurel Stein—Archaeological Explorer*, chap.26,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77; 张力和于江:《斯坦因四次入新简述》,《新疆文物》1992 年第 4 期第 113－114 页。

⑱ 林梅村:《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和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九州》第一册,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年;收入本书第三编第 4 章。

⑲ 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04 及 275－284 页。

⑳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16－17 页。

㉑ 林梅村和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37 和 45 页。由于这枚汉简没有发表照片,括号中的字本书未能录出。吴礽骧先生根据见到此简照片的日本学者大庭修先生的释文作了补充,见所著《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84 页。但他将简文"……循城"释作"守候城",显然有误。该城之名似为伊循城,其名见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发现的汉简及《汉书·西域传》。

㉒ 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第 98 页。

㉓ 林梅村和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56 页。

㉔ 关于此简年代的讨论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5 页。

㉕ 王博等:《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9 年第 2 期第 18－19 页。该报告称之为"木匣",不确,当为封检。

㉖ 吴礽骧:《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39 页。

四　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诏出使迁居中亚大夏的大月氏，开辟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因而被史家司马迁誉为“张骞凿空”。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往返大月氏的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①]进一步引起中外学人对研究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视。由于文献语焉不详，张骞出使西域后大月氏与西汉有过什么交往，颇让研究者感到困惑。[②]近年西域考古的最新发现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史料。

80年代末，敦煌市博物馆文物普查队在敦煌至安西公路甜水井东南山脚下发现一处前人没有调查过的汉代边塞要所——悬泉置遗址，从中采集到一组西汉简牍。其中编为DQ. C:39号的汉简记有“大朋＝禹属一，食西域大月氏副使者”。显然，这是一件汉代边塞戍卒向外国使臣提供食物的供食文书。和这枚汉简共出于DQ. C号遗址的记年简的年代范围约在汉宣帝元康三年（DQ. C:3和6）至汉成帝永始四年（DQ. C:5），[③]可知这枚向大月氏副使供食的汉简有可能早到西汉宣、成年间。

关于这个时期大月氏使者朝汉之事史无明载。不过，《汉书·冯奉世传》的有关记载值得注意。文中说，“先是时，汉数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称，或贪汙，为外国所苦。是时乌孙大有击匈奴之功，而西域诸国新辑，汉方善遇，欲以安之，选可使外国者。前将军增举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修（循）城，

都尉宋将言与旁国共攻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使者奚充国。”冯奉世所送外国使节乃“大宛诸国客”，其中似应包括大宛邻国大夏、康居或大月氏国使者。据《汉书·西域传》，冯奉世送大宛客回国事在宣帝元康元年。这个年代和我们讨论的向大月氏副使供食的汉简年代相近，那么，这件供食文书可能写于元康元年，而冯奉世所送“大宛诸国客”中亦可能包括这件供食文书提到的大月氏副使。当然，单凭这点材料似乎还不足以说明这位大月氏副使是否为冯奉世所送大宛诸国客之一。不过，最近我在斯坦因发掘的尼雅汉简中又意外发现一个能说明该问题的新材料。

1995年夏，我在伦敦访问期间调查了大英图书馆所藏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发掘的古代写卷。这项调查得到该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弗朗西斯伍德博士的热情支持。她不仅为我们查找已经发表的斯坦因考古资料提供方便，还把最近刚从图书馆仓库找出来从未发表过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收集的古代手稿提供给我们研究。[4]其中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发掘的一批汉代简牍尤为引人注目。

尼雅遗址被认为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精绝国故址。但目前刊布的尼雅考古资料绝大多数属于公元3—4世纪，精绝国早于汉末被鄯善国兼并。[5]所以目前所知尼雅文物大都属于鄯善国遗存，不是精绝国文物。斯坦因第四次尼雅考古发现的汉简则不然，它们是有确凿证据的汉代文物。这就为我们确认尼雅遗址系精绝国故址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精绝国故址位于新疆民丰县北境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遗址主要由佛塔、寺院、房址和种植园组成，星罗棋布，坐落在沙丘与沙岭间，其范围达十余公里。《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阨陿，西通拘弥

四百六十里。”由此可知，当年这个地方曾是一个拥有将近四千人口的绿洲王国。如今尼雅遗址及周围地区已变成茫茫沙海，南距现代绿洲民丰县城约140公里。[6]换言之，汉代至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已无情地向南推移了大约140公里。

关于汉代丝绸之路，《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精绝国正在南山（昆仑山）之北，位于丝绸之路南道，其南戎卢国“辟南不当道”，那么，精绝国正处于汉代东西往来的主要交通线上。因此，这里发现的每件文物都对研究丝绸之路考古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变迁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在尼雅发现的一枚汉简，它再次提到大月氏使者朝汉之事。为便于讨论，兹将这枚编号为N.XIV.ü.1的尼雅汉简抄录于下。据斯坦因拍摄的照片（参见彩版19）[7]，这枚汉简读作：

1. 大宛王使羡左大月氏（使）上所［以下字迹漫患］……/
2. 所寇，頞（愿）得漢使者，（進奉），故及言［以下字迹漫患］……

尼雅汉简第一行“大月氏使”的“使”写得不太清楚，字形又似“安”字。如果读“安”，这个字或为大月氏使者的名字。下面的残文“上所……”似应复原为“上所书”。那么，这段文字意为大宛国王的使者羡协助大月氏使者上书汉王朝。至于这份上书是写给西汉王朝还是东汉王朝，我们认为应是写给前者。在简牍资料中，西汉简牍称迁居中亚的月氏人为“大月氏”，如前引悬泉置遗址所出西汉简牍即称从中亚来华的大月氏外交使节为“西域大月氏副使”；东汉及以后的简牍改称大月氏为“大月支”或“月支国”，同时以国为氏，在大月氏人名前冠以“支”姓。

例如：敦煌所出东汉简牍中有“［月支国］人支诚”[8]。尼雅魏晋简牍中有“月支国胡支柱”[9]。《高僧传初集》记东汉来华的大月氏僧人为“支某某”，如支娄迦谶、支曜及支谦等。《后汉书·董卓传》李贤注引《献帝纪》有“支胡赤儿”。

我们认为此简属于西汉还考虑到两汉时期大月氏的实际国情。《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翕侯。后百余岁，贵霜翕侯邱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濞达、罽宾，悉有其国。邱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贵霜王。汉本其号，言大月氏云”。也就是说，东汉时期，大月氏已在中亚和印度建立起庞大的帝国，自号贵霜王朝。这个时期的大月氏王不太可能向东汉称臣纳贡，即便派使者也不会在给东汉的上书中自称“大月氏”。所以，尼雅汉简的内容表明它不太可能是东汉简。[10]这个问题我们从下文的讨论中可以进一步看到。

尼雅汉简第二行“所寇”和第一行末尾相接，可惜后者残缺。大月氏使者为何人所寇，不得而知。《汉书·西域传》记载，丝绸之路北道上的“疏勒国……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可知丝绸之路北道亦通大宛和大月氏。和南道相比，从北道到长安是一条近路。但是尼雅汉简所记大宛和大月氏使者舍近求远，选择了丝绸之路南道，这无疑是为了躲避北方匈奴人的寇扰。为同西汉争夺西域，匈奴人拦劫出使西汉的大月氏使者由来已久。《汉书·李广利传》所载武帝诏书曰：“匈奴为害久矣，今虽徙幕北，与旁国谋共要绝大月氏使，遮杀中郎将江、故雁门守攘。”这种局面直到汉宣帝年间才略有改观。《汉书·西域传》记载：“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骑，所以然者，以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据《汉书·宣帝纪》，呼韩邪单于朝汉之事发生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那么，自武帝太始年间至宣帝甘露年间，大月氏对西汉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一直受到匈奴人的威胁。所以，尼雅汉简“……所寇”残句中后一部分似可复原作“……为匈奴所寇”。

尼雅汉简第二行下文为“愿得汉使者，　（进奉），故及言……”。其中“愿”字为汉代异体字。[11]“进奉”一词的“进”隐约可见，“奉”字不清楚，据文义补入。后面“故及言”一句中“言”字迹模糊，其后似有一“曰”字。那么，这句话或为“故及书曰”。

据以上讨论，尼雅汉简第二行大概是说大月氏使者东来途中遭到匈奴人寇扰，此次出使是想邀请汉朝使者到大月氏，并愿意向汉王朝奉献方物。

前引《汉书·西域传》说，汉宣帝年间，西域形势发生变化。甘露三年，匈奴王呼韩邪朝汉，帕米尔以西大月氏诸国随后“咸尊汉”。其实，此前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已明显衰落。宣帝元康元年，“（冯）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他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12]此前大宛诸国使者纷纷出使西汉亦表明匈奴这时已不能左右西域诸国的外交活动。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尼雅汉简所记大宛和大月氏使者朝汉和《汉书·冯奉世传》所载元康元年冯奉世送西域诸国使者回国之事联系起来。

首先，冯奉世所送西域客人乃“大宛诸国客”，这与尼雅汉简所述大宛与大月氏使者结伴出使汉朝正相符合。

其二，冯奉世送西域客人回国取道丝绸之路南道，途经伊循、莎车。而尼雅汉简出土地点——精绝正位于伊循和莎车之间东西交通线上。《汉书·西域传》记载：“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万年，并杀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候冯奉世使送大宛

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冯奉世为攻打莎车而调集的西域诸国兵当然包括精绝士兵，他和西域客人西行之路必然经过精绝。那么这件记有大宛和大月氏使节东来的汉简发现于精绝故址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敦煌边塞遗址新发现的西汉宣、成年间的简牍恰恰记录了大月氏副使在这个时期出使西汉。上述事件集中发生在宣帝元康年间大概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显然有助于说明冯奉世所送大宛诸国客中当有大月氏使者。

第四，尼雅汉简提到大宛和大月氏“愿得汉使者，进奉”。《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汉书·西域传》记述这段历史说：“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黎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这就清楚地表明西汉王朝最初在西域设立的最高行政长官为“使者”，其下有校尉、司马、都尉等职官。[13]同书又载，神爵二年（前60年），守护鄯善以西丝绸之路南道的使者郑吉联合龟兹、渠黎等国兵马击败吐鲁番盆地的车师，降服塔里木盆地的匈奴首领日逐王，威震西域。于是，汉宣帝把车师以西丝绸之路北道也交给使者郑吉管理，在乌垒设西域都护府，封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骑都尉”，简称“西域都护”。此后，西域都护成为西汉治理西域的最高行政长官。帕米尔以西的大宛国亦在西域都护统辖之下。尼雅汉简说大宛和大月氏“愿得汉使者，进奉”而不是“愿得汉都护，进奉”正反映了西域都护建立前西汉经营西域的情况。所以尼雅这枚汉简当写于汉宣帝神爵二年之前。此前西汉与大宛和大月氏之间最重要的交往莫过于《汉书·冯奉世传》记录的宣帝元康元年这次西汉和大宛诸国之间的外交活动。

所以我们认为尼雅汉简应为大宛使者协助大月氏使者写给汉宣帝的一份上书的手稿，写作年代大致在西汉元康元年（前65

年）或其前地节四年（前66年）。

西域都护建立后，大月氏、大夏和罽宾等帕米尔以西及以南诸国不在其统辖范围内。不过，西汉通过另一方式羁縻这些西域远国，即派使者进驻。《汉书·西域传》记载："大夏本无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也就是说，西汉年间，大夏和大月氏曾有汉使者常驻。我们讨论的这枚尼雅汉简有助于证明《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大夏和大月氏"共禀汉使者"的说法是可信的。它还告诉我们，西汉使者是应大月氏等国之邀进驻这些国家的。

关于西汉进驻西域诸远国的使者所率使团之规模，《汉书·西域传》记帕米尔以南罽宾国时略有所述。文中说："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后军候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以下七十余人，遣使上书谢罪。孝元帝以绝远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从这段记载看，进驻罽宾的西汉使团有使者赵德及副使七十余人，规模相当庞大。大月氏为西域大国，进驻该国的西汉使团人数自然不会比驻罽宾的使团人数少。有记载表明，大月氏和西汉的往来一直维持到汉哀帝年间。《魏略·西戎传》记载："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其人也。"《辩证论》对此有不同记载，其文云："秦景至月氏国，其王令太子授《浮屠经》。"习经人物景卢作秦景，授经地点也不同。[14]也可能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事件。无论如何，这些记载表明西汉与大月氏的交往一直保持到西汉末年。

西域考古遗存中属于西汉时期的文字资料极为罕见。目前我们仅知道黄文弼曾在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发现过数十枚西汉简牍，[15]近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和田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地发掘出带

有汉字的西汉封检。[16]此外斯坦因曾在尼雅 N.XIV.iii 号遗址还发现过一组汉简，不过这组汉简的年代不易确定，或以为属于东汉时期。[17]本文讨论的这枚出自尼雅 N.XIV.ii 号遗址的汉简应属于西汉时期，因而为研究西汉时期西域考古增添了新史料。

原载《九州》第一册，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7 年。

注 释

① F.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d. 1, Berlin, 1877, 454.

② A.F.P. Hulsewé and M.A.N. Lo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C.-A.D.23*, *Leiden*, 1979；余太山近年亦对西汉与大月氏的交往作过一番认真细致地研究。参见所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③ 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35－139 页和第 398－399 页。

④ 这批古代手稿主要是 1930 年 12 月至 1931 年 5 月间，斯坦因在新疆和田达玛沟遗址发现的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书和汉简。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详见 J. Mirsky, *Sir Aurel Stein—Archaeological Explor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77；张力和于江：《斯坦因四次入新简述》，《新疆文物》1992 年第 4 期第 113－114 页。

⑤ 参见《后汉书·西域传序》及《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⑥ 盛春寿：《民丰县尼雅遗址考察记实》，《新疆文物》1989 年第 2 期第 49 页。

⑦ 斯坦因第四次考察所获文物被扣在喀什，他仅拍摄了所获古代写卷的照片并带回英国。由于扣在喀什的文物至今下落不明，所以斯坦因的照片是目前研究这批文物的唯一资料。

⑧ 参见注③第 149 页。此简和东汉元嘉二年纪年简共出，知其为东汉简牍。

⑨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86 页。

⑩ 《后汉书·班超传》载建初三年班超上书称月氏“愿归附”。《后汉书·班固传》载建初八年班固上书曰：“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后汉书·章帝纪》记章和元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据同书《班超传》，月氏此次遣使奉献的目的是“求汉公主”，被班超拒绝，还其使。《后汉书·班超传》还

提到，班超于永元二年击败月氏副王谢后，“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但是，月氏之岁奉贡献未见于本纪，大概仅是上贡给西域都护班超。凡此均与尼雅汉简反映的史实相径庭。

⑪ 参见秦公辑：《碑别字新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38页。该字释读蒙友人李零见告，谨致谢忱。

⑫ 参见《汉书·冯奉世传》。

⑬ 《汉书·西域传》载：“元康中，护都善以西使者郑吉遣三校尉屯田车师。”可知使者为当时西域最高行政长官，其下有校尉。同传又载，西汉元凤四年，西汉在伊循设司马，更置都尉。又知使者之下还有司马和都尉。

⑭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36页。

⑮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北平：1948年。

⑯ 王博等：《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第18－19页。该报告称之为“木匣”，不确，当为封检。

⑰ 参见注⑨第4和第88页。

五　敦煌写本钢和泰藏卷所述帕德克城考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敦煌以西丝绸之路南道，《汉书·西域传》说："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后汉书·西域传》对敦煌与莎车之间丝绸之路沿线城邦的分布又作了补充。文中说："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同传又载，东汉末年这条丝路沿线的沙漠绿洲王国"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悉有其地"。鄯善统一南道诸国之后定都扜泥城，并在丝绸之路沿线兴建了许多城市，见诸史籍的有：精绝城、尼壤城、觀货逻城、且末城、怯台城、弩支城、伊循城、楼兰城、注宾城。楼兰尼雅出土汉文文书还提到两座不见史乘的鄯善古城元城（第687号）和海头（第623、624和626号）。[1]上述古城有些并见楼兰尼雅出土佉卢文书。不过，后者进一步提供了一些不见史乘的鄯善城镇，如菩提城、毗陀城及累弥那城。[2]

除了汉文史籍和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外，鄯善境内古城分布情况还见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件于阗语文献。这件文书于1927年落入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钢和泰之手，故名"钢和泰藏卷"。这

个敦煌卷子用三种文字写成，正面是汉文佛经，背面写有于阗文73行、藏文44行。经挪威语言学家柯诺和英国藏学家托马斯解读，人们才知道其背面的内容是于阗使臣出访敦煌时给国内写的报告。该文书于阗文部分多处添改并赋诗和记帐，可见它只是于阗使臣向于阗王上书的底稿。[3]

据英国汉学家蒲立本考证，这件文书写于于阗王李圣天（尉迟生）同庆十四年，相当于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年）。[4]其中于阗文报告第7—31行的内容为塔里木盆地南部、河西走廊、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东部地区古城和古民族名录。这部分内容颇难读懂，因为地名和族名各有其源，于阗文仅记其音，若不能释出字源或确定相应的其他语言名称，则茫然不知所云。为此，欧洲的伊朗学、汉学、藏学、突厥学专家纷纷参加讨论，尤以英国学者贝利、托马斯、亨宁，法国学者哈密顿和伯希和贡献最大。我国学者岑仲勉和黄盛璋也曾撰文讨论，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我们感兴趣的是该文书记录的鄯善境内的城镇。为便于讨论，兹将有关鄯善地理部分翻译于下：

> “时唯狮子王尉迟生十四年仲春月十二日，此报告根据诸使臣在沙州城所获实情，由尼泊尔人坚松、吐蕃人沙侯萨利达特、于阗人沙侯善度、南山人沙侯苏农和所有下述诸城的知情者提供：媲摩城、查尔克城、帕德克城、怯台城（下注：大龙城、小龙城和弩支城三城）、炎摩多城、楼兰城、寿昌城、沙州城……”[5]

这段文字提到的媲摩城属于阗城镇，而寿昌和沙州两城则在敦煌地区，那么，两者之间的古城均为鄯善境内城镇。其中，楼兰城指罗布泊西岸楼兰古城。炎摩多城即且末城，在今且末县北境。弩支城，唐代文献又称“新城”，即今若羌县西80公里处的瓦什峡古城。大小龙城就是唐代文献所谓大、小鄯善以及汉代文献的扜泥城和伊循城。前者即今若羌县城附近的且尔乞都克古

城，后者即若羌县东北70公里处的米兰古城。[6]怯台城见米兰戍堡所出唐代吐蕃简牍，古藏文作 ka-dag，《元史·宪帝纪》译为“怯台”。查尔克的原文作 tsadika，读若 carika，所以法国突厥学家哈密顿把它和若羌绿洲的突厥语名称 carklik（查尔克里克，意为 cark 之地）相联系。[7]唯独帕德克城不见于其他文献。

二、帕德克城寻踪

丝绸之路南道的许多古城现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吞没，远离现代绿洲100多公里，如新疆和田的喀拉墩古城、民丰县的尼雅古城。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由流动沙丘组成，有时某些古城因沙丘移动暴露地表，有时却被流动沙丘全部覆盖，杳无踪影。上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策勒县以北沙漠腹地发现的丹丹乌里克古城并写入考察报告，后来斯坦因和特林克勒都曾来此城考察。但奇怪的是，现在人们怎么也找不到这座古城了，大概就是因为沙丘移动的原因。此外，玄奘西天取经归来，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人迹罕至的沙漠深处曾遇见许多古城，如覩货逻故城、且末城。大概由于沙丘移动，这两个古城被沙漠重新覆盖，以致近现代考古学家从未发现过这两座古城。另一方面，沙丘移动往往又使沙漠古城暴露地表。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麦德克附近一座沙漠古城于1906年被风吹开，结果被附近放牧的维族乡民发现。这时，斯坦因正在若羌县沙漠地区考古，他闻讯赶到麦德克进行调查并在考古报告中对这座古城作了报道。

由于水源断绝，麦德克附近的居民后来举家迁往若羌等地，于是麦德克附近那座沙漠古城更加鲜为人知。近年发表的新疆考古调查最新报告中没有提到麦德克古城，而1990年出版的《若羌县地名志》甚至没有提到麦德克这个地名。[8]看来，麦德克古

城又逐渐被人们重新遗忘。不过，麦德克古城最近被人们再次发现。这次发现归功于两位艺术家的一次沙漠探险。

1993年夏，北京电视台为拍摄一部介绍楼兰古文明之谜的电视片派人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做拍片前的准备工作。他们在一位名叫阿拉穆勒的罗布老人带领下深入沙漠腹地，来到若羌县北境阿拉干东南沙漠深处一座古城，阿拉穆勒称它为“麦德克古城”。据这位罗布老人说，此城早年被俄国人挖过，拉走了几车古物。此后，除当地乡民外，再无外人来过。据两位艺术家观察，麦德克城大部分已被流沙掩埋，地表不见任何古代遗物，他们仅在城内找到一个船桨和带有榫卯结构的木建筑构件，拍了一些照片（参见彩版14）。回北京后，他们找我询问前人对这座沙漠古城进行调查的情况。[9]我多次深入沙漠腹地寻找古城，但从未注意到若羌县北境这座古城。新疆考古工作者1993年公布的若羌地区文物普查最新资料也未提到该古城。[10]后来我才终于在斯坦因的考古报告《亚洲腹地》一条脚注查到有关麦德克古迹的线索。

斯坦因称此城为“Merdek Ruin（麦德克废墟）”。从地理位置看，它应是鄯善国境内的一座城镇。但“麦德克”一名既不见汉文史籍，也不见楼兰尼雅所出佉卢文书。所以，我一时无法确定它究竟是鄯善国哪座城镇。久思不解，这才想起敦煌于阗文写本“钢和泰藏卷”记录了许多鄯善古城，结果在这个写本中找到了麦德克城的下落。原来，麦德克城应是这份于阗使臣报告中提到的帕德克城。

帕德克，于阗文书写作padaka。早年英国藏学家托马斯曾怀疑此城在于阗境内潘拉克河流域，也即斯坦因考古报告《古代和田》提到的和田策勒县某地poñak，研究者多从之。[11]其实，这个说法不足信。我们知道，于阗文书中相当于poñak的地名写作phamña，吐蕃文作bho-za，在和田策勒县达玛沟遗址出土的汉文

于阗文双语文书（Hedin 16）中对译汉文地名是“潘野”。[12]既然于阗人称 poñak 为“潘野”，那么于阗使臣报告中的帕德克城就不太可能指潘野城。钢和泰藏卷所述塔克拉玛干古城基本上自西而东。那么，于阗国之西的帕德克城显然是鄯善境内一座城镇。

我们知道，鄯善许多古城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例如：楼兰得名于古楼兰语 krora'ina，且末一词来自古楼兰语的 calmadana，尼雅这个名字译自古楼兰语 nina（= 于阗文 niña，读作 ninya）。[13]所以 merdek（麦德克）一词显然也有其古老的渊源。

从佉卢文书可以知道，楼兰语的/ḍa/相当于/rda/，在楼兰尼雅佉卢文书中经常见到两者相互交替。所以，于阗人把 merdek 的/rde/读成/ḍe/。从钢和泰藏卷又知道，于阗人还把楼兰语的/ma/读成/pa/或/ba/，所以，楼兰语 calmadana（且末）在这份于阗文写卷中拼作 tsabada（炎摩多）。由此可见，现代罗布人对麦德克城的称谓 merdek 与于阗文献中鄯善古城 paḍaka 实际上一脉相承，而两城地理位置又大致在同一地方，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因此，我们认为于阗文书中的帕德克城应即鄯善国的麦德克城。

三、麦德克古城的发现与研究

麦德克古城位于新疆若羌县北部阿拉干以东沙漠。据全球卫星定位仪（GPS）测定数据，该古城经纬度为东经 88°28′27.9″，北纬 40°03′33.3″，与罗布泊西岸的 LA 和 LK 遗址遥遥相望。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许多古城一样，麦德克城位于一条古代河流的尾闾处，这条古河应是孔雀河北入沙漠的一个支流。

斯坦因最先向学术界报道了麦德克古迹。他在 1928 年出版的第三次中亚考古报告《亚洲腹地》的一条脚注中这样写道：“1906 年，我第一次来此地探险。其后，1914 年 1 月又在若羌得

到一个含糊的情报。据说，罗布地区的觅宝人发现了一个叫做“麦德克城”的遗址。该遗址位于塔里木河下游某处，有人从中发掘出古物并卖给了橘瑞超先生。从他们对遗物的描述可知此地尚有建筑物。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进入罗布沙漠之前未能对这个尚未搞清楚的城址进行调查。”[14]斯坦因在此前发表的考古报告还提到，他1906年曾到麦德克一带考察并在附近沙漠踏查了一座古城。所以，斯坦因在这次考古报告《西域》附录的中亚考古地图上标上了麦德克古城。据他调查，麦德克城之西有一条古河自西而来，此城附近还分布着若干沟渠。[15]他认为这条古河应是孔雀河一条支流的终点，但是当地维族乡民或以为此河是车尔臣河末端。

麦德克古迹曾引起德国东方学家赫尔曼的注意，他在1931年出版的《楼兰》一书中讨论了麦德克古城的地理沿革。他认为，斯坦因发现的麦德克古城当即郦道元《水经注》所说楼兰国的注宾城。在讨论塔里木盆地南河的地理位置时，他这样写道：“南河在阿拉于南与车尔臣河会合为注宾河，附近麦德克遗址即注宾城”。[16]

1939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队员伯格曼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他在楼兰等地的考古报告《新疆考古研究》。[17]书中介绍了他于1928年在孔雀河一条未名支流的沿岸的考古工作，他不仅在此地发掘了多处古代墓地，还在此河末流北距孔雀河主河道100公里左右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烽燧遗址。他将孔雀河这条未名支流命名为“小河”。从伯格曼绘制的地图看，所谓“小河”流经斯坦因考古图上麦德克遗址西边那条古河的上游。

小河流域的古代遗存源远流长。伯格曼发掘的小河流域5号墓地年代最早。该墓地的葬具系牛皮包裹棺木制成，所出随葬品全是木器、石器、毛织物和少量铜器，不见丝绸和陶器。随葬品的组合与新疆考古工作者1979年在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发掘

的古墓基本相同，特别是那些小木雕像和古墓沟所出木雕极其类似。[18]因此，小河5号墓地应和古墓沟墓地的年代大致相同，距今3800年左右。伯格曼还在小河流域发现了汉代以后的古墓。例如：10号墓地出有丝绸残片及衣服，其中有幅宽达60.5厘米的丝绸衣服，而楼兰汉晋墓所出丝绸仅宽50厘米。所以，他认为10号墓地的年代约在楼兰末期或唐代早期（约公元4世纪至公元7世纪）。

值得注意的是，伯格曼在5号墓地所在沙丘顶上发现墓周围埋藏着数十支木桨，他称其为“桨型牌”。杜堵华和杨毛然在麦德克古城也发现了木桨，和伯格曼报告中所谓“桨形牌”相似。麦德克城的木桨大概是塔克拉玛干的觅宝人从小河5号墓地带到这座古城的。这表明小河5号墓地与麦德克古城相距不远。所以，斯坦因的判断大概是对的，麦德克遗址西边的那条古河是孔雀河支流，不是车尔臣河。

麦德克古城发现于1906年，其后不久日本京都本愿寺大谷光瑞两次派橘瑞超到楼兰地区考察。第一次考察（1908—1909年），橘氏主要在罗布泊西岸调查发掘楼兰LA和LK古城，并在若羌以北沙漠和尼雅沙漠遗址做过调查。他此行的最大收获是收集了大批魏晋至前凉时期的汉文和佉卢文书，著名的“李柏文书”就是这次发现的。第二次考察（1910—1912年），橘氏重访罗布泊西岸，在楼兰发掘古城，剥取米兰壁画；调查车尔臣河流域古迹之后，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渡塔里木河到轮台。[19]

橘瑞超所获楼兰文物全被运回京都大谷别墅二乐庄。后因理财不善，大谷将其别墅二乐庄出售给久原房之助，同时变卖了一些中亚古物。其中一部分后来转让给日本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借以充实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包括从米兰佛教遗址剥取的壁画残片和小河流域古墓所出毡帽、小蓝子和皮水袋。[20]伯格曼根据汉城国立博物馆出版的中亚古物目录所

附图版辨认出橘瑞超所获楼兰古物中有小河流域古墓所出文物。这位瑞典考古学家还听他的维族向导说，橘瑞超于 1910--1911 年间曾在若羌地区考察。不过，橘瑞超所获楼兰文物大都不是发掘品，而是从塔克拉玛干觅宝人手中收购的。此外，大谷考察队的成员是一些没有受过基本科学训练的僧人，他们的考察日记仅有一些旅程记录，所获文物没有具体的出土地点。所以，我们很难确定橘瑞超是否到麦德克附近小河流域考察过。

30 年代，到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古调查的还有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队员黄文弼和陈宗器。从他们发表的考古报告看，这两位中国学者没到麦德克考察过。不过，黄文弼在一篇讨论塔里木盆地古河道的论文中引用斯坦因的材料，怀疑麦德克古城（他称为“默得克沁”）可能是喀拉库顺旧城。[21]

据以上调查，目前只有塔克拉玛干沙漠觅宝人和斯坦因来过麦德克古城，伯格曼曾在该城以北小河流域调查发掘过古墓。此后，再无人问津麦德克。

据斯坦因的报告，麦德克古城平面呈圆形，直径 40 米左右，城墙高约 6—7 米，但大部分被流沙掩埋，暴露于地表的城墙约有 4—5 米高。他在城内发现木结构建筑，地表可见陶片和铜渣。城墙用夯土夹柴草版筑，反映了楼兰本地居民的建筑风格。这和罗布泊西岸 LA、LE 和 LK 等具有浓郁中原建筑风格的方形古城形成鲜明对照。[22]

关于麦德克城的年代，斯坦因曾在麦德克附近采集到王莽时期的钱币，说明麦德克远在西汉业已开发。此外，鄯善国西境安迪尔河流域发现过类似的圆形古城。尼雅遗址所出 3 世纪左右的汉文文书中有这样一条记录：“去三月一日，骑马旨元城收责；期行当还，不克期日，私行无过［所］”。[23]“元城”顾名思义即圆城，当指尼雅遗址附近某座圆形古城，大概就是指尼雅遗址之西带有环形城墙的安迪尔古城。此外，若羌河下游西岸的汉唐古

城孔奥可汗城也呈圆形。从此城建筑遗址采集的标本的碳 14 年代测定为距今 1915±75 年，相当于东汉年间。[29]麦德克城的年代和鄯善境内这两座圆城的年代应大致相当，可能始建于东汉魏晋时期。《沙州图经》等唐代地理文书详尽地记录了鄯善故地古城分布，但没有提到麦德克城，或表明此城在唐以前业已废弃。虽然敦煌于阗文写本钢和泰藏卷提到麦德克城，但这和该写本提到楼兰城一样，显然是作为古迹记述的。

四、帕德克城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的南北通道

汉文史籍对东西走向的丝绸之路记载较详，但对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之间南北走向的通道往往疏于记载。最近，我们根据实地考察资料对沿和田河穿越塔克拉玛干西部沙漠的丝绸之路南北通道作了初步调查。[30]麦德克古城的发现再次为我们提供机会讨论塔克拉玛干东部沙漠丝绸之路的南北通道。

《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 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这里所说从鄯善国都扜泥城，途经山国到西域都护或车师之路，实际就是穿越塔克拉玛干东部沙漠的南北通道。欲知这条路的走向，首先要确定扜泥城的位置。

关于扜泥城的位置，学术界颇有争议，有楼兰城和鄯善城之争。从前引《汉书·西域传》看，楼兰城之说显然不能成立。因为，车师在今吐鲁番盆地。从罗布泊西岸楼兰城北越库鲁克塔格到吐鲁番的里程不足千里，根本不可能长达 1890 里。此外，鄯善国都扜泥城在文献中或称"鄯善城"，《水经注》作"禅善"。那么，此城当在鄯善河流域。虽然，"鄯善"一名未见目前发现的佉卢文书，但是见于米兰古城出土吐蕃简牍，写作 čerčen。这个地名显然就是今天塔里木盆地东南作为河流名称的"车尔臣"

及汉文史籍所谓“都善”。[26]换言之，车尔臣河实际上就是汉魏之都善河。都善国当得名于此河。

那么，都善国都扜泥城是车尔臣河流域哪座古城呢？1983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黄文弼的遗著《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此书是黄文弼50年代在塔里木盆地考古的正式研究报告。据该书介绍，1958年黄文弼在若羌县城南偏西6公里一个戈壁滩上发掘了一座古城遗址，今称“且尔乞都克古城”。1914年，斯坦因曾来此城调查，他称之为“奥托古什古城”，但没做发掘工作。[27]据黄文弼调查，这座古城呈长方形，有两重城墙；内城用土坯建造，周长约220米，墙宽1.6—2米；外城则用卵石垒砌，周长约720米，墙宽1.5米。城内外有住宅、佛塔和寺院遗迹，遗址中发现了泥塑佛像、壁画和公元4世纪左右的笈多体梵文贝叶经。不过，该古城沿用时间较长，内外两城墙和城内建筑用不同方法修筑，反映出它们建于不同时期；土坯建筑属于早期，卵石建筑属于晚期。晚期建筑基址用石块砌筑并以卵石为城墙是该古城的显著特点之一。它也是塔里木盆地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用石料修筑的古城。[28]所以，黄文弼推测，且尔乞都克古城大概就是隋唐年间塔里木盆地的著名城市“石城镇”。[29]

石城镇的发现相当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找到了石城镇也就等于找到了扜泥城。关于石城镇的历史沿革，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写本《沙州伊州地志》这样说：“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楼兰国。《汉书·西域传》云，地沙［卤］，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杀其王立其弟（弟），更名都善国。隋置都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碛。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30]康艳典是来自中亚撒马尔干的粟特移民首领。粟特人，中国史籍称为“昭武九姓”，有安、康、米、曹、穆、石、何、史、竺和火寻等九姓。

十六国时期的石勒、石虎，唐朝的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粟特人。公元7世纪中叶，中亚在西突厥统治之下，康艳典来塔里木盆地是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委派。《旧唐书·西突厥传》记载："统叶护可汗（619—630年在位），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之千泉。其西域诸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康艳典显然是西突厥派到塔里木盆地的吐屯之一。

石城镇的发现在楼兰鄯善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发现第一次为人们寻找真正的鄯善国都指明了方向。因为，据唐代文献记载，鄯善城就在石城镇附近。敦煌写本《沙州伊州地志》说："鄯善城，周回一千六百步。汉鄯善城，见毁坏，在石城镇二十步。"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敦煌写卷《沙州图经》和《寿昌县地境》。这批敦煌写卷以《沙州图经》的年代最早，约写于公元676—695年，其余两个写本关于石城镇的记载抄自《沙州图经》。[91]据此，黄文弼在且尔乞都克石城内发现的早期建筑遗迹应即鄯善国都扜泥城的遗存。

据前引《汉书·西域传》，从扜泥城北行到都护治所，或到车师都要经过山国。山国在文献中或称"墨山国"，其都城当在《水经注》所说"墨山城"。有证据表明，墨山城就是楼兰之西孔雀河北岸的营盘古城，或称"因半古城"。该城位于今新疆尉犁县农二师35团甘草场西偏北2公里孔雀河北岸。楼兰发现的魏晋文书称之为"山城"。[92]据考古调查，此城年代当在东汉至魏晋年间。《汉书·西域传》记山国的位置"东南与鄯善、且末接"，但未言其国有城，仅说山国王所在地"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以此推之，墨山城大概建于西汉以后。而营盘古城的位置和年代均与之相当。所以，我们认为，营盘古城当即楼兰汉文文书所谓"山城"以及《水经注》所说"墨山城"。

这条从鄯善都城，经墨山城到丝绸之路北道的通道在东晋时期一度成为当时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法显传》记东晋法显西行印度曾取道鄯善。文中说，从敦煌西“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地崎岖薄瘠”。法显所至鄯善国当即其国都所在地扜泥城。他由扜泥城“复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国。”焉夷国即《汉书·西域传》的焉耆国。从鄯善到焉耆必然经过帕德克城。可惜《法显传》言辞简略，只记录了从鄯善到焉耆需十五日，未提及沿途所经城镇。从楼兰出土文书看，除帕德克城外，这段路上至少还有山城（第2号），苻犁城（第482号）。[⑧]古汉语或读“尉”为“苻”，如于阗王室姓氏“尉迟”，在文献中或作“伏阑”。那么，苻犁城当即《汉书·西域传》的“尉犁城”。

据以上讨论，从鄯善到焉耆之路途经帕德克城、墨山城和尉犁城。由于这条丝绸古道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古代旅行者必然择水而行。那么，他们出鄯善绿洲后，可能要选择帕德克城北面小河流域，沿此河北行到墨山城；再从墨山城沿孔雀河西行到尉犁；然后北行到焉耆。按现代地理描述，就是从若羌绿洲出发，经麦德克北面小河流域到营盘，再从营盘沿孔雀河到尉犁绿洲，然后北行到焉耆。帕德克城的发现与研究为我们了解这条丝绸古道走向提供了翔实的考古学依据。

原载《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

注　释

①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86页。

②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636－637页。

③ F.W. Thomas and S. Konow, "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huang," *Oslo Etnografiske Museums Skrifter*, III, Publication of the Indian Institute, I－3, Oslo, 1929, 122－160.

④ E. G. Pulleyblank, "The Date of the Stael-Holstein Roll," *AM*, IV－1, 1954,

90－97.

⑤ 文书的拉丁转写据 H.W. Bailey, "The Staël-Hölstein Miscellany", *AM*, II－1, 1951, 1－45。

⑥ 林梅村：《1992 年秋米兰荒漠访古记——兼论汉代伊循城遗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 年第 3 期第 12－18 页。

⑦ J. 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ölstein," *TP*, 46.1－2, 1958, 118－119.

⑧ 参见林国英等编：《若羌县地名图志》，若羌县地名委员会编，1990 年。

⑨ 这两位艺术家是北京电视台编导杜培华和职业画家杨毛然。本文所引麦德克古城的最新调查都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特在此表示感谢。

⑩ 巴州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 年第 1 期第 1－94 页。

⑪ F.W. Thomas, *ZDMG*, xci, 14; J. 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ölstein," *TP*, 1958, 120. For poñak, see M.A.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458 and 464.

⑫ 林梅村：《新疆和田出土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考古学报》1993 年第 1 期第 97 页。

⑬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第 636－637 页。

⑭ M.A. Stein,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 787.

⑮ M.A. Stein, *Serindia*, Oxford, 1921, Map of Portions of Chinese Turkistan and Kansu No. 56.

⑯ A. Herrmann, *Loulan, China, Indien und Rom im Lichte der Ausgrabungen am Lobnor*, Leipzig, 1931.

⑰ F.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 Stockholm, 1939.

⑱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第 1 期第 168 页。

⑲ 橘瑞超：《中亜探険》，東京：中央公論社，1989 年版，第 241－272 頁。

⑳ 林梅村：《日本大谷考察队在新疆的考察》，《文物天地》1988 年第 4 期第 36－37 页；小田义久：《谈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文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5 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619－646 页；荣新江：《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及研究状况》，《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

通讯》1991年第2期第2-3页。

㉑ 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页。

㉒ M.A. Stein, *Serindia*, Oxford, 1921;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 787.

㉓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86页。

㉔ 黄小江：《若羌县文物调查简况》，《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22页。

㉕ 林梅村：《穿越塔克拉玛干》，《文物天地》1995年第2－3期连载，第20－23页和第21－23和33页；收入本书第三编。

㉖ J. 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TP*, 1958, 121.

㉗ M.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5 vols., Oxford: the Claredon Press, 1921.

㉘ 据近年调查，若羌地区还有一些石砌建筑，但规模很小，属于成堡一类，似不能归入城类。参见张平：《若羌县"石头城"勘查记》，《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第20页。

㉙ 黄文弼：《新疆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48－49页；又见《若羌考古调查》，《黄文弼历史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91－293页。

㉚ 录文见羽田亨：《沙州伊州地志》，《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上册，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7年；译文见万斯年：《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唐代文献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4－75页。

㉛ 池田温：《沙州圖經略考》，《榎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4年，第39－46頁。

㉜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㉝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第28和70页。

六　楼兰国始都考

在丝绸之路探险和考古发现史上，深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下的楼兰王国历来是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如果从1900年10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闯入罗布泊西岸一座风沙半没的楼兰古城算起，楼兰考古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本世纪初叶，欧美和日本考察队以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罗布荒漠进行的一系列地理探险和科学考察使楼兰一举成为世界上最为著名的考古圣地之一。70年代末以来，以中国科学家为主体的楼兰地区科学考察又将楼兰考古与研究日益推向深入。尽管楼兰考古已经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但仍有一些重大问题迄今不能解决。楼兰国都城问题即当今楼兰考古最大的疑案之一。

1994年夏北京大学考古系委托我协助北京电视台《寻找楼兰王国》摄制组拍摄一部揭示楼兰古文明之谜的电视片。在撰写该电视片脚本时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解决西汉楼兰都城问题的重要线索。汉代文献的有关记载和考古资料相互印证，使我们确信，《史记》和《汉书》提到的楼兰都城不是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的那座古城（斯编LA），而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罗布泊北岸发现的另一座古城（斯编LE）。撰写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元前2世纪，楼兰之名始见于历史文献。最早提到楼兰的是匈奴王冒顿单于在西汉前元四年（前176年）写给汉文帝的一封信，这封信被司马迁抄入《史记·匈奴列传》。信中提到，当时匈奴军队击败一度称雄中国北方草原的月氏人，“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楼兰地当东西交通孔道，所以西方史料中也对楼兰有所记载。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马林诺斯的《地理学导论》和托勒密的《地理志》称楼兰为Khauranai，我们在近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指出，其名当来自丝绸之路上粟特商人对楼兰的称谓krwr'n，见于楼兰LL遗址所出粟特语文书。[1]楼兰和尼雅遗址所出佉卢文书中常见的krora'ina（克罗拉伊那）一词，前引粟特人对楼兰的称谓以及汉文史籍所谓“楼兰”均为佉卢文书中“克罗拉伊那”一词的音译。该词显然属于楼兰土著居民所说吐火罗语方言，它的确切涵义目前尚不可知。

匈奴王的信只提到楼兰的名字，该王国的具体位置是汉朝使者张骞最先介绍的。正如清华大学王国维教授指出的，西汉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分途点不在敦煌的玉门关，而在罗布泊地区的楼兰。[2]那么张骞出使西域必然要经过楼兰，他对楼兰的记录应是相当可信的。这个记录被司马迁和班固分别抄入《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廓，临盐泽。”《汉书·西域传》则说：“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曾减。”又说：“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在塔里木盆地这样的干旱地区，水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楼兰这一人类聚落的兴衰显然与蒲昌海及

葱岭河息息相关。汉代文献称帕米尔高原为“葱岭”，所以又把发源于帕米尔的塔里木河称为“葱岭河”。汉代塔里木河与孔雀河相通，其终点形成罗布泊。所以，盐泽或蒲昌海显然指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那么，人们应该在罗布泊沿岸寻找西汉楼兰国的踪迹。

汉代文献记载，楼兰起初定都罗布泊沿岸的楼兰城，故称楼兰国。西汉元凤四年（前 77 年）迁都鄯善河（今若羌县车尔臣河）流域的扜泥城，楼兰国因此更名为鄯善国。据考古调查，罗布泊沿岸众多古代遗址中 LA 古城沿用时间较长，规模最大（参见彩版 13）。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以及新疆考古所考察队都在这个古城内发现了写有楼兰字样的汉文木简残纸，所以许多研究者相信这座位于罗布泊西岸的古城就是楼兰王国的都城。特别是东京大学教授榎一雄根据佉卢文书的记载提出楼兰国都扜泥城即楼兰 LA 遗址后，使楼兰国都即 LA 古城之说在学界产生极大影响。[3]然而，王国维早就对此说提出疑问。他注意到 LA 古城出土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信稿中有这样一句话：“月二日来到此”，句中的“此”被圈去改为“海头”。所以王国维认为，LA 古城前凉称海头，不是文献记载的楼兰城。[4]50 年代末，日本学者森鹿三根据橘瑞超出示的一张李柏文书出土地点的照片提出这批文书实际出土于 LK 古城。[5]于是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李柏文书出土地点之争的学术论战。1988 年，另一位日本学者片山章雄重新调查了橘瑞超当年考察楼兰的档案，确认李柏文书实际出自 LA 古城。[6]李柏文书出土地点之争似乎可以由此宣告结束，但王国维对 LA 古城是否为楼兰城的置疑又尖锐地摆到人们面前。LA 古城内建筑遗址的^{14}C 年代测定表明，其年代不早于东汉，而这里出土的汉文纪年文书最早属于曹魏时期。[7]换言之，西汉年间 LA 古城根本不存在。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孟凡人在近年出版的《楼兰新史》中提出新说，认为 LA 古城既不是

楼兰国首都，也不是该王国更名为鄯善之后的首都。楼兰国从来没有在罗布泊沿岸定都，西汉元凤四年前后楼兰国首都始终在鄯善河流域的扜泥城。[8]

目前学术界对楼兰国首都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形成三种不同意见，而争论的焦点在西汉楼兰都城的位置以及楼兰国是否迁都。尽管上述三派学者的研究都未能解决西汉楼兰王究竟定都何处，但他们广事收集史料，并从各自不同角度深入而细致地讨论楼兰都城问题，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二、汉代丝绸之路与楼兰国都城的位置

罗布泊地区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楼兰本来是一个随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东西方的科学考察队在孔雀河主河道北岸的古墓沟、孔雀河支流铁板河和小河流域发现的距今3800年左右的楼兰人墓地反映了浓郁的游牧人文化特征，而罗布泊与孔雀河之间发现的数以百计的细石器地点也说明楼兰人本是游牧人。《汉书·西域传》记载，直到西汉年间，楼兰人仍是“民随畜牧逐水草”。然而，就在这时，楼兰人开始向城市文明发展。《史记·大宛列传》说：“楼兰、姑师邑有城廓，临盐泽。”《汉书·西域传》则说：“汉使多言其国（指楼兰）有城邑。”这表明，当时楼兰人正处于放弃游牧生活走向城市文明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域外文明，特别是中原地区汉文明传入楼兰，加速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众所周知，城市是人类从游牧走向农耕定居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千百年来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楼兰人建造城邑应是的楼兰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楼兰下层百姓大概无缘享受城市文明，这座楼兰最早的城邑显然是当时楼兰王公贵族所居之地。那么汉代文献屡次提到的这座临近罗布泊的楼兰城无疑即楼

兰都城，楼兰国即得名于此城之名。

我们还应注意的是汉代文献所述楼兰城的地理位置。《史记·大宛列传》说："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汉书·西域传》记载："楼兰国最在东陲，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两书提到的楼兰当指楼兰政治中心楼兰城而言。这就告诉我们，楼兰城位于西汉时期东西交通的要道上。

罗布泊地区的汉代丝绸之路基本上沿孔雀河北岸而行。《魏略·西戎传》记楼兰等地丝绸之路走向说：

> "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旨龟兹，至葱岭，为中道。"

斯坦因、陈宗器和黄文弼等人的实地考察表明，敦煌以西的丝绸之路是沿汉长城西行，玉门关以西的长城烽燧线止于榆树泉盆地东侧。陈宗器认为榆树泉当即《魏略》所云"都护井"。[9]此后的丝绸古道是沿疏勒河下游西行，直到此河终点处。疏勒河下游终点之西是库姆沙漠，古代丝绸之路是沿这片沙漠北缘而行。库姆沙漠北界在穷塔格，这是个突厥语地名，意为"沙山"。《魏略》所说"三陇沙北头"当指此地。陈宗器曾在穷塔格西边不远处发现古代建筑遗址，黄文弼认为这个遗址大概就是《魏略》提到的"居卢仓"。[10]库姆沙漠往西则进入罗布泊东部的雅丹地区，其北缘有一处泉水，今称"陷车泉"。其西又有一泉，今称"甜水井"。[11]这两处泉水位于库姆沙漠之西，《魏略》所说"沙西井"当即其一。据陈宗器和新疆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察队实地调查，从这两处有泉水的地方到罗布泊北岸要经过一片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80公里的盐碱化雅丹地带，其风蚀土墩蜿蜒如蛟龙起伏，灰白色的盐碱块则成龙鳞状。所以，凡到楼兰考察过的人都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丝绸之路楼兰道上著名的"白龙堆"。[12]

据《汉书·食货志》，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

通无阻，汉武帝动用60万士卒在中国西部地区修筑汉长城。天汉元年（前100年），汉长城烽燧线从敦煌，经楼兰一直修筑到轮台。《史记·大宛列传》说："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所谓"亭"就是汉长城烽燧。

在敦煌以西地区汉长城烽燧考古方面首先取得重大发现的是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1930年他从吐鲁番越库鲁克塔格山来到罗布泊地区。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1921年塔里木河突然改道，向东流入干枯了一千多年的孔雀河，最后注入罗布泊。黄文弼到楼兰考察时孔雀河的流量很大，以至他无法渡河到罗布泊西岸的LA古城考察。但他在孔雀河下游铁板河尾闾地带取得意外收获，发现一座西汉屯垦戍边遗址，他称之为土垠遗址。遗址内出土西汉木简、铜器、铁器、漆器和丝麻残片等数百件文物。[13]这些西汉文物的发现充分证明西汉的丝绸之路是从罗布泊北岸经过。在此前后东西方考察队在孔雀河沿岸相继发现了一条汉代烽燧线，这条烽燧线主要沿孔雀河北岸而行，一直分布到新疆轮台县境。既然汉代文献说楼兰城当"空道"，那么我们应该在这条汉代烽燧线附近寻找楼兰城的踪迹。

三、楼兰始都罗布泊北岸LE古城

汉代文献说，楼兰城不仅地当东西交通孔道，而且"近汉，当白龙堆"。前文已经讨论，白龙堆即罗布泊东北盐碱化的雅丹地区；"近汉"一词以前颇难理解，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的发现提醒我们，这句话意思是说楼兰城距西汉军队设在罗布泊的军事中心不远。这个中心似即罗布泊北岸的土垠遗址。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域都护下设左右司马，即土垠所出汉简八提到的"左右部司马"。西域都护的治所在今轮台县的乌垒，左右司马分

守乌垒东西两翼。土垠遗址疑即西域都护下辖两司马的治所之一。这里所出汉简三提到右部司马所辖右部后曲侯丞为乌孙所杀，或表明右部司马居乌垒之西，地近伊犁河流域的乌孙，那么西域都护的左部司马应居乌垒之东，很可能就在土垠遗址。黄文弼也注意到西汉楼兰都城应距土垠遗址不远。他在讨论楼兰都城问题的一篇论文中说："我推测古楼兰之扜泥城，必距我在1930年发现之古烽燧亭遗址不远，或在其西，是固待于后来者之探寻者也。"[14]黄文弼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只是此城名曰楼兰城，不叫扜泥城。

斯坦因在土垠遗址西南不远处曾发现过一座古城，编号LE古城。此城位于孔雀河下游支流铁板河末流河网地带，地处罗布泊北岸之西，西南距楼兰LA古城约24公里。[15]1980年新疆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察队也曾到此调查，称之为"方城"，他们以为是居卢仓遗址。[16]实际上这座距西汉烽燧线不远的LE古城就是人们一直寻找的楼兰国最早的都城楼兰城（参见彩版15）。据斯坦因调查，LE古城呈方形，面积约122×137米，四面环水。在罗布泊西沿岸古城中，其规模仅次于楼兰LA古城。此城城墙收分明显，底基宽约3.66米，顶宽1.68米，残高3米多；夯土版筑，间以柴草。斯坦因认为，LE城的建造方式类似敦煌汉长城。此城南城墙中部有一城门，宽约3米；北城墙也有一门，和南城门相对，门宽略小于3米。距西城墙约7.32米处有一大型土坯建筑，面积约21.3×10.7米。斯坦因在北城门内发掘出西晋泰始年间的6件汉文木简残纸以及铜镞和五铢钱等。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证明，佛教在东汉末传入塔里木盆地，但是，LE古城不见任何与佛教有关的建筑，说明它的兴建必在东汉之前。1980年新疆考古所楼兰考察队的调查也证实，这座古城的建造方式类似敦煌汉长城。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座具有汉代建筑风格，地近东西交通孔道的楼兰古城就是西汉元凤四年以前的楼

兰国都城。城内大型土坯建筑或即楼兰王宫殿所在。斯坦因曾在LE古城东北一个高冈上发现一处楼兰古代墓地，编号LF。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个墓地发现了一件十分精致的玉斧（LF.025），共出的还有许多小件铜器。[17]或以为这件精美的玉斧非楼兰王室莫属。凡此表明，孔雀河下游入海处以LE为中心的遗址群应是楼兰最早的政治中心。

由于西汉元凤四年楼兰王迁都鄯善河流域的扜泥城，所以楼兰国最早的都城LE城后来没有继续发展。《水经·河水注》记载，东汉年间，中原戍边将士曾在孔雀河下游筑大坝，引水屯田。文中说：

> "敦煌索励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励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名，古今一也。励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吹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咸服外国。"

长期以来，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堪称楼兰考古最大的奥谜之一。LE古城性质的确定有助于最终揭开了这个谜。文中提到的王尊和王霸都是东汉光武帝时的人物，《后汉书》有传。故索励横断注宾河之事显然发生在东汉。据《后汉书·班勇传》，元初六年（119年）班勇曾建议"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史称"楼兰之屯"。索励或为派到楼兰的部将之一。那么注宾河必指孔雀河。正由于东汉屯田吏卒在孔雀河下游筑坝，导致LE古城水源断绝。LE古城大概就在此后不久废弃。LE城的废弃和LA古城的兴起是联系在一起的。据新疆考古所楼兰考察队1980年调查，LA古城周围遍布古河

道，城内有人工引水渠，城郊有屯田遗迹，而城内建筑最早在东汉年间。所以索励屯田及所建白屋很可能就在LA古城所在地。不过索励时代这个地方大概只有白屋，还未及建城。LA古城是东汉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这里出土的汉文文书的年代最早属于曹魏时期。《魏略·西戎传》记载："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文中所说"故楼兰"显然指楼兰LE古城。《魏略》约成书于公元239—265年，记事止于魏明帝年间（227—239年）。由此可知，LE古城在公元3世纪中叶以前肯定已经废弃。至于城内所出西晋泰始年间汉文木简残纸，其内容全都是书信。[18]这些信完全可能是西晋信使途经此地遗弃在废城内的，并不能证明西晋时期LE古城仍在使用。

尽管LE古城在东汉之后废弃，但文献仍称此城为楼兰城。《水经·河水注》曰："河水又东迳墨山国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河水又东，经注滨城南，又东迳楼兰城南而东注。"这条流经三座古城的河水当指孔雀河。据考古调查，孔雀河沿岸自西而东排列着三座古城。墨山城当即LA古城之西孔雀河北岸的营盘古城（参见彩版16）。[19]斯文赫定曾对LA城外南部进行过水准测量，发现这一带的地势很低。因此，他认为这里古代应有河流从LA城南流过，东注罗布泊。[20]那么《水经注》的注滨城或即LA古城。正如王国维所说，此城前凉称海头，不是文献所说楼兰城。从《水经注》所述孔雀河三城的排列位置看，楼兰城显然指LE古城。

此文原载《文物》1995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订正了若干错误。据《汉书·傅介子传》记载，西汉昭帝元凤四年，楼兰王安归勾结匈奴，屡次劫杀过往楼兰的西汉官吏以及大宛和安息等国的使者。为此大将军霍光派傅介子前往西域刺杀楼兰王，以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傅介子和几个随从

到楼兰后，先设下计谋将楼兰王灌醉，又趁其不备，在酒席之间刺杀了楼兰王。于是，“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悬之北阙，以直报怨，不烦师众”。此事又见《汉书·昭帝纪》。书中说，元凤四年四月，平乐监傅介子使节诛斩楼兰王安归，悬北阙”。据本文所考，傅介子杀楼兰王当发生于LE古城，所谓“北阙”就是北城城门，所以我们起初怀疑“北阙”或指LE城北城门，说见《文物》1995年第6期。《文物》1996年8月刊黄盛璋文，该文引居延汉简指出“北阙”指长安城北门，甚是。不过他坚持楼兰LA城为鄯善首都扜泥城之说，则不可取。

注　释

① 林梅村：《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第80页；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附别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62－863页。

③ K. Enoki, "Yiui-ch'eng and the site of Lou-lan," *UAJb*, xxxiii, Heft 1－2, Wiesbaden, 1961, 5265; "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Lou-lan and the Date of Kharosthī Inscription," *Memo. Rese. Dep. of the Toyo-Bunko*, No. 22, 1963, 125－171.

④ 参见王国维：《流沙坠简》（1914年影印本，1934年重印校正本）序言部分。

⑤ 森鹿三：《李柏文書の出土地》，《龍谷史壇》第45號，1959年。

⑥ 片山章雄：《李柏文書の出土地》，《中国古代的法和社會：栗原益男古稀紀念論集》，汲古書院，1988年。

⑦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05页。

⑧ 孟凡人：《楼兰新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168－232页。

⑨ 陈宗器：《罗布泊与罗布荒原》，《地理学报》1936年第3卷第1期第3页。

⑩ 黄文弼：《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86页。

⑪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考察队：《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⑫ 参见⑨及穆舜英：《神秘的古城楼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8－73页。

⑬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

⑭ 参见⑩第323页。

⑮ M. A. Stein, *Serindia*, Oxford, 1921;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 该遗址的综述见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8－19页。

⑯ 参见⑪所引书第86－87页。

⑰ M. A. Stein,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 266.

⑱ LE古城北门附近灰堆内出土汉文木简3支，纸文书3件，其内容均为书信，见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第608－616号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9－80页。

⑲ 营盘古城或称"因半古城"，在今新疆尉犁县农二师35团甘草场西偏北2公里孔雀河北岸。据王博等人最近调查，此城年代当在东汉至晋，参见《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第48－49页。墨山国，《汉书·西域传》简称"山国"，其位置"东南与鄯善、且末接"。《汉书》未言其国有城，仅说山国王所在地"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故墨山城当建于西汉之后。营盘古城的位置和年代与之相当，当即《水经注》所说"墨山城"。

⑳ S. A. Hedin, *Scientific Result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vol. II, Stockholm, 1905.

七　楼兰鄯善王朝的最后居地

尽管近一个世纪来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然而汉唐文献提到的许多著名古城至今尚未发现，它们仍然沉睡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下。《魏书·西域传》提到的且末城即其中之一。据汉唐文献，且末古城大致在今新疆且末县境内，考古发现表明，且末至少在3000年前已有人类活动。[1]且末县城西南6公里扎洪鲁克墓地所出古代毛织物织有精美的卷云纹（参见彩版20），活泼的大角羊群，表明先秦时期且末已有颇为发达的毛纺业。[2]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已知道西北有个以毛纺业著称的古部落，名曰“渠叟”、“巨叟”或“渠搜”。[3]关于这个古部落的位置，《尚书·禹贡》曰：“治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孔传》注曰：“治皮，毛布。有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属，皆就次序。”正如马雍指出的，渠搜其名源于中古印度雅利安语 kos'ava（毛织物），屡见于楼兰尼雅出土佉卢文书，汉文史籍译作“氍毹”。[4]且末很早就出现城市文明，是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大约公元5世纪左右随鄯善王国的灭亡而消失。唐代玄奘从印度归国途中曾凭吊荒芜多年的且末故城，他在《大唐西域记》卷12称之为“折摩驮那城”，本注曰：“沮末”。折摩驮那译自佉卢文 calmadana，也即汉魏文献所谓“且末”，南北朝文献的“左末”。且末城在敦煌五代于阗语写本钢和泰藏卷中写作 tsabada，故南北朝文献译作“炎摩多”[5]。楼兰尼

雅出土佉卢文书屡次提到且末，它是鄯善国最为富足的城镇之一，或以为鄯善王室的粮仓就在且末。

一、汉魏且末城的兴亡

且末系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早在公元前2世纪且末已有城市文明。最早提到且末城的是《汉书·西域传》。其文云：

> "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里，户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胜兵三百二十人。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诸果。西通精绝二千里。"

从目前所知塔里木盆地古城分布情况看，精绝无疑即今民丰县北部沙漠腹地的尼雅遗址；[6]西域都护治所约在今轮台县策大雅乡。[7]至于小宛的位置，《汉书·西域传》云：

> "小宛国，王治扜零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户五百五十，口千五十，胜兵二百人。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东与若羌接，辟南不当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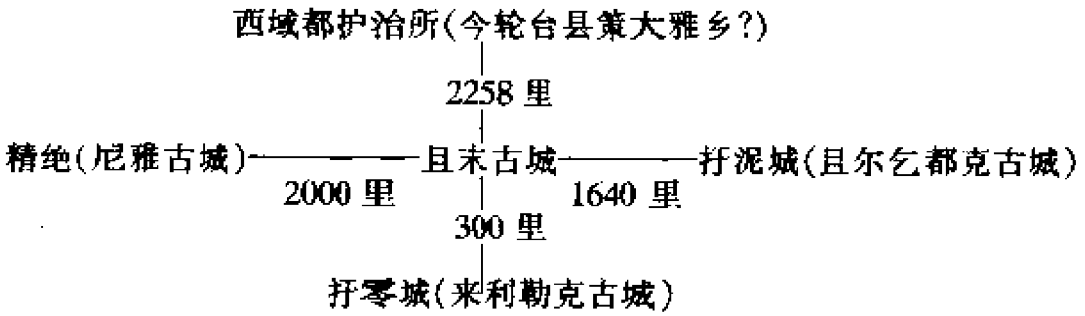
小宛之南不复有城，那么小宛之扜零城显然即今且末县城西南约6公里来利勒克古城。据考古调查，此城年代约在两汉至南北朝时期。[8]虽然来利勒克古城靠近现代交通线，但考虑到汉代东西交通孔道大致在远离现代绿洲100公里左右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丹丹乌里克与尼雅一线，那么来利勒克古城的位置于汉代显然属"辟南不当道"之地。《汉书·西域传》记载，且末"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同书又载小宛比且末至都护治所多300里(2558－2258)。故"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是按日行百里计算的。以此推之，汉代且末城当在来利勒克古城以北约150公里左右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汉书·西域传》说，且末西通精绝二千里，而不是西北通或西南通精绝。这表明且末城必在远离现代绿洲的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东汉末年，且末被定都鄯善城（或称“扜泥城”）的楼兰人兼并，此后且末一直是楼兰鄯善王朝治下的一个州县，佉卢文书作 calmadana raya（且末州）。鄯善其名未见目前发现的佉卢文书，但正如英国藏学家托马斯指出的，鄯善显然就是米兰古城出土吐蕃简牍提到的古地名 čerčen，这个古地名无疑即今天作为河流名称的“车尔臣”。[9]那么鄯善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今车尔臣流域。北魏神龟元年（518 年），宋云和慧生等人到西域取经。他们从洛阳出发，经青海吐谷浑部落，来到鄯善。此鄯善当指鄯善都城扜泥城，佉卢文书作 khuv'ani。[10]据黄文弼调查，扜泥城即今若羌县城南偏东 9 公里的且尔乞都克古城，唐代之石城镇。[11]《洛阳伽蓝记》卷 5 记载，宋云等人离开鄯善城之后的行程是：

> “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时所作。”

左末城就是汉代文献所谓且末城。据此记录，且末居民以农业和种植业为生，城中有佛教寺院。而其位置当在今若羌县城且尔乞都克古城之西约 820 公里处。那么汉魏文献所述且末城的相对位置于下：



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使鄯善国富甲天下，但我们至今没有在鄯善境内发现鄯善王室遗物。这是为什么呢？显然，鄯善国之重宝全被鄯善王带到我们至今没有找到的且末城。《魏书·西域传》记

载：

“且末国，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442年），鄯善王比龙避沮渠安周之难，率国人之半奔且末。后，役属鄯善。”

这个历史事件见于南北朝许多文献。如《魏书·沮渠传》记载：

“无讳遂谋度流沙，遣安周西击鄯善。鄯善王恐惧，欲降，会魏使者劝令拒守。安周遂与连战，不能克，退保东城。三年（442年）春，鄯善王比龙西奔且末，其世子乃从安周，鄯善大乱。”

这里提到的鄯善即指且尔乞都克古城，东城大概指若羌县之东的伊循城，今称“米兰古城”。《周书·异域志》又载：

“鄯善，古楼兰国也。东去长安五千里。所治城方一里……魏太武时（424—451年），为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

另据《宋书·大沮渠传》，随鄯善王比龙亡命且末的国民约有四千余家。由上述文献可知，且末城是楼兰鄯善王朝的最后居地，鄯善的国宝大概都被带往且末。

鄯善王比龙到且末时这里已经严重沙漠化。《周书·异域志》形容当时且末的自然景观说：

“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欲至，唯老驼知之，即鸣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速，期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

玄奘从印度返回长安途中曾凭吊且末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这样写道：

“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城郭岂然，人烟断绝。复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所谓纳缚波即马可波罗之罗布城，指若羌县瓦什峡古城。[12]

且末城消失的时间史无明载。敦煌唐写本《沙州伊州地志》云："播仙镇，故且末国也。《汉书·西域传》云：'去上都六千八百廿里'。隋置且末郡，上元三年（676年），改为播仙镇……涅（沮之误）末河源从南山大谷口出其源，去镇城五百里，经且末城下过，因以为名。以前城镇并陷吐蕃。"[13]唐代播仙镇亦沙化严重，敦煌唐写本《沙州图经》记载："从蒲桃城西北去播仙镇四百余里，并碛，路不通。"据考古调查，唐代丝绸之路南道约在今且末县城之北塔他让乡及阔什隆特玛乡车尔臣河北岸一线，这些地方现在亦处于沙漠边缘或沦为沙漠。本世纪初斯文赫定、斯坦因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伯格曼都在这一带发现过古代烽燧遗址。近年巴州文管所在其中一烽燧内发现一件唐代吐蕃文纸本文书，故知这条烽燧线的年代为唐代。[14]

既然玄奘访问时且末城已荒废，那么唐代播仙镇和汉魏且末城显然不在同一地点。敦煌于阗写本钢和泰残卷也提到"播仙镇"，写作 parrūm，相当于粟特语 pr'wn（城邦）。这个名称或与粟特人在且末建立移民点有关。[15]据考古调查，且末地区唐代烽燧线上规模最大的古城即车尔臣老城，此城位于阔什隆特玛乡吐盖苏勒克村向阳大队东南约2.5公里处，故又称"吐盖苏勒克古城"。文革期间，该古城出土过元代文书，知其沿用到马可波罗时代。[16]唐以后再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且末，似说明汉魏且末城已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消失了一千多年。

二、且末古城调查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热潮，人们开始寻找汉唐文献屡屡提到的且末城。1893年杜特雷依·德兰斯率领的法国中亚探险队率先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寻找且末故地。

他们在且末县城西南车尔臣河西岸发现一片古代遗址，当地人称之为“阔纳协海尔（老城）”。随队考察的法国东方学家格瑞那疑此城即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访问过的车尔臣城。他们在且末县城之北塔他让乡附近找到古河道及古代遗址，并推测这里可能是汉代且末故地。[17]然而塔他让附近仅有一些唐代烽燧和若干面积不大的住宅遗址，地理位置也与汉唐文献所述且末城不符。

1899—1901年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他在现代且末绿洲南缘塔他让西北11英里东经85°55′，北纬38°33′的地方发现古代烽火台，并由此向北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然而未能在沙漠中发现任何古城遗址。[18]

接踵而来的是斯坦因，这位英国考古学家于1906—1908年间调查了车尔臣河流域（参见彩版17）的古代遗址，但未能取得新的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因在车尔臣河主流之西发现一条由南至北而流的古河支流，当地人称之为“阿亚克塔尔河”。他在这条河的东岸发现大批古代遗址，但未能深入以北沙漠调查这条河下游的情况。[19]

1910—1912年间，大谷光瑞考察队的橘瑞超再次从现代且末绿洲由南至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寻找且末古城，仍然一无所获。[20]

70年代伊始，塔克拉玛干沙埋古城的研究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央及新疆地方学者组建的塔克拉玛干综合考察队和文物普查队多次到且末考察古代文化遗存，但未取得突破性进展。1989年秋新疆文物考古所组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考察队考古组重访斯文赫定在塔他让附近发现的烽火台，并从当地居民那里听到且末以北大沙漠深处埋藏有古代城市的传闻。据说，“在中下游段的车尔臣河塔他让一带，还有一处烽火台遗址，一处居住遗址，以及在塔他让乡政府驻地以北数十公里处位于大沙漠中的一处古城遗址，即所谓‘塔他让古城’”。他们还听说，且末县

城以北约90公里处的大沙漠中还有一座遗址。但他们未能深入沙漠进行实地调查。[21]1993年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公布的车尔臣河流域最新考古调查资料也未提到汉魏且末城的踪迹。[22]

另一方面，60年代新疆测绘局的地理勘测资料表明，历史上车尔臣河在今塔他让附近分叉，一支转弯，从西向东流，即今车尔臣河下游；另一支从南向北流，纵深沙漠100多公里，但这条南北流向的支流早在古代就已经干枯。[23]这条古河有可能就是斯坦因首先注意到的车尔臣河支流阿亚克塔尔河。我们怀疑此古河就是汉魏时期的且末河。《水经·河水注》记载：

> "《释氏西域记》曰：……其水北流，迳且末南山，又北迳且末城西，国治且末城，西通精绝二千里，东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种五谷，其俗略与汉同。又曰：且末河东北流迳且末北；又流而左会南河，会流东逝，通为注滨河。"

以前研究者一直未能真正理解这条文献所云。且末河古河道的发现告诉我们，这段话意思是说：且末河的一条支流东北流，流经汉魏且末城北面，另一支流向左（即向东）流，和南河（即今车尔臣河）汇流，形成鄯善河。鄯善，《水经注》或作"禅善"，米兰出土古藏文简牍作 čerčen。车尔臣河之名"车尔臣"显然沿袭了这条河的古称"鄯善"。

前引新疆地理勘测资料还表明，古代且末河的流向是从西南向东北流，在它的下游东南岸有一古城遗址。这个古城的地理位置约在东经85°38′5″，北纬39°4′40″，海拔1178米左右。这个地方靠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心地区，距现代绿洲边缘上塔他让村约66公里。古且末河从该古城西北流过，这和文献所说"且末河东北流迳且末北"完全相符。如果这个材料属实，这座古城当即人们寻访已久的且末古城。

为了寻找这座古城，1994年秋我和北京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乘直升机，乘沙漠车和骑骆驼在且末以北沙漠腹地工作了3个

星期。首先，我们对那些且末县城以北沙漠腹地有古城的传闻作了彻底调查，结果发现这些传闻并不真实。一些声称去过且末沙漠古城的当地居民矢口否认以前的说法，因为他们不能为我们带路寻找这些古城。更令人震惊的是，60 年代版《新疆分省地图》所标且末古城也是假的，我们在这幅地图所标古城经纬度（东经 85°38′5″；北纬 39°4′40″）方圆 15 公里范围内没发现任何古迹。然而我们见到这一地区确实有大片沙漠绿洲，上有飞鸟，下有各种沙生植物和小动物，水位也较浅。我们还乘直升机对且末至尼雅之间现代交通线以北 100 公里左右作低空飞行，见到这一线并不都是沙漠，有大面积的沙漠绿洲，尤其是且末县城至喀拉米兰河以北汉代交通线上，绿洲连绵。

且末城究竟在何处？其实早在 70 年代已取得实质性进展。1978 年，马雍参加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河西走廊沙漠考察时，听到考察队成员谈起前几年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考察发现的一座沙漠古城。这座古城保存完好，并有数以百计的佉卢文木牍暴露地表。当时因不知其重要价值，未予采集，仅检回十多件作为木材标本，后复散失，下落不明，但有两小块残牍送给了甘肃博物馆。[24]新疆文物考古所所长王炳华对此事作了进一步调查。他最近告诉我，这支沙漠考察队的负责人即中国沙漠专家朱震达。据朱先生介绍，这座沙漠古城位于且末县以北沙漠腹地，他们的考察队对古城的位置作过详细记录，这份资料现存兰州中国沙漠土壤研究所朱震达沙漠考察档案中。[25]朱震达先生在且末以北沙漠腹地发现的那座古城将为我们寻找且末城带来新的希望。

三、且末沙埋古城出土佉卢木牍考释

1989 年笔者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沙漠队赴西北考察丝绸之路，行至兰州和甘肃省博物馆张朋川相遇。据他介绍，甘肃博

物馆里确实收藏了兰州沙漠土壤研究所转交的2块佉卢文木牍，他委托我解读其上文字。回京不久，我即收到张先生的来信，他还随信寄来2套佉卢文照片（参见插图21）。我立即作了解读工作，并将其中一套照片标明文字正反，作拉丁字转写及汉译，一并寄还甘肃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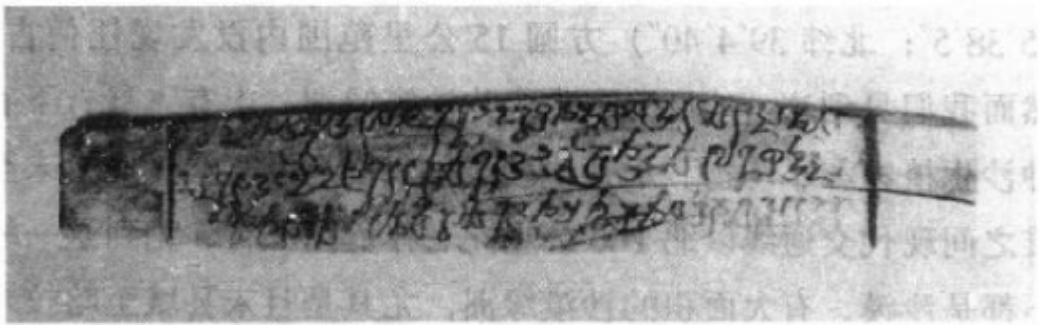


插图21　且末古城出土佉卢文法律文书残牍

（Q.70s.1，甘肃省博物馆藏品）

为便于学界了解这项研究的最新进展，兹将这项研究介绍于下。由于经手人不在，张先生未能告知这两件文书的尺寸和博物馆编号。姑且以文物编号惯例将这两件文书按照发现时间和地点编为Q.70s.1及Q.70s.2。其中Q表示发现地点且末古城，70s表示发现时间70年代。这两件木牍的拉丁字转写如下：

Q.70s.1

1. naditivaṣa paride nīc(e) ya kid'aṃti ajuvada'e istriyana cojhbo khinicaṣa kuma-

2. raṣa ceṣa eśvari syaṃti bhaṃtho tavaṃna'e vikranana'e prahuḍ'a deyaṃna'e ṣuha

3. karamena vari bhaveyaṃti istri jatisa eśitu vidhi n(i) dati yena kriti

Q.70s.2

1. ..... ma tha na ca

2. ..... j'ahana yo i-

3. ḍhiyaṃti pacima ..... hasta-lekheṣu

这两件文书的语言文字和以前楼兰、尼雅两地出土的胡语文书完全一致，系佉卢文字母拼写的犍陀罗语写本。第一件文书（Q.70s.1）字迹比较清楚，读起来没有感到有什么障碍。这是一件法律文书，原为封牍和底牍两件木牍制成，现在剩下得只是底牍文书的中间部分，约占原文书底牍部分的三分之一。残存文字意为：

“关于那蒂提婆（naditiva）之事，现已作出判决。自即日起，这些女奴判归州长吉尼察（Khinica）和鸠摩罗（Kumara）二人支配。他们有权将其抵押、出售、赠与他人，为所欲为。你们要让女奴生育，以带来繁荣。”

楼兰尼雅出土的大批法律文书表明，鄯善王对国内发生的法律纠纷大都亲自处理，上至国家军机大事，下至黎民百姓婚丧嫁娶，鄯善王不厌其烦，一一过问。在鄯善国似乎只有国王才有终审权。这件文书不应例外，自然也是由国王最后定夺。其中大部分词语是楼兰佉卢文书中常见的套话，若对文书的语言感兴趣，可参见拙著《西域文明》对尼雅新出土的一件法律文书的讨论，不赘述。[26]需要讨论的是新出现的词以及该文书反映的问题。

第1行第1个词naditiva是个犍陀罗语佛徒法号，相当于梵语nandideva（欢喜天）。这位可怜的佛门弟子是这场官司的输家。此人不见于以前发现的楼兰尼雅文书，很可能是且末本地僧侣。这场官司的赢家是官拜cojhbo的且末权贵吉尼察和鸠摩罗。Cojhbo亦见贵霜犍陀罗语碑铭、喀什噶尔河下游发现的疏勒塞语文书以及粟特语文书；[27]疏勒语作cazbo、突厥碑铭作čub，意为“城主”。[28]楼兰出土魏晋汉文文书中有“楼兰主国钧那羡”，所谓“主国”当即cojhbo的旧译，因为魏晋时期所谓“楼兰国”实为鄯善国治下的一个州县，佉卢文书作raya（州），而cojhbo即raya的最高行政长官，故本文将该职官译作“州长”。汉唐文献中一般将这个胡语职官音译，也就是昭武九姓之“昭武”。州

长吉尼察其名不见以前楼兰尼雅出土佉卢文书，很可能是且末本地土著人名称。这件文书首次披露了公元3世纪左右在职的一位且末州长的名字。和州长吉尼察共同赢得这场官司的是鸠摩罗，其名屡见新疆出土佉卢文书。虽然彼文书的鸠摩罗和此文书的鸠摩罗同名，但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因为鸠摩罗是印度和中亚雅利安人极其常用的名字，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之名的前一成分即“鸠摩罗”。

第二件文书（Q.70s.2）第3行写有 hasta-lekha，该词相当于梵语 hasta-lekha，本意为“手书、写本”，但在新疆出土佉卢文书中多用来表示契约等法律文书。斯坦因收集品中422、581及598号法律文书均自称 hasta-lekha；我们近年解读的一件尼雅新出土的契约文书亦自称 hasta-lekha。[30]可惜且末新发现的这件法律文书字迹漫漶，不堪卒读。从文书形制判断，这块残木牍应是原来法律文书封牍的下半部分。我只能从模糊不清的残文中分辨出若干词汇。

第1行，仅存四个字母，一时看不出是什么词。第2行 j'ahana大概相当于梵语 jahana（离开、放弃）。[31]其后一词 yo 是犍陀罗语指示代词 ya-（这个）的体格单数形式。[32]这件文书第2和第3行间的 idhiyamti 是犍陀罗语动词，相当于梵语的 rdhyanti “他们完成”。第3行第2个词 pacima 又见斯坦因收集品中90、165、209、325、345、549及709号文书，系犍陀罗语副词，相当于梵语的 paścima（最后）。在犍陀罗语文书中，该词多用来表示“今后”。此行最后一词 hasta-lekhesu 的语法形式采用复数依格，说明这件法律文书原来应是一式两份。

原载《燕京学报》新三期，1997年。

注 释

① 阿合买提·热西特和多鲁坤·阿白尔：《且末扎洪鲁克古墓发掘简记》，《新疆

文物》（维文版）1986年第1期第1－10页。此文将扎洪鲁克墓地的年代定在3000－6000年前。后经^{14}C测定，其年代当在3000年左右，参见何德修：《且末县扎洪鲁克墓葬1989年清理报告》，《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第1－14页。

② 卷云纹毛织物系笔者1986年考察该墓地时在且末县文管所拍摄的。织有大角羊群的毛织物堪称西域古代毛织物的代表作，现藏新疆博物馆。或称"连方走状大角羊纹织物"，参见吴妍春：《新疆古代的动物纹样艺术》，《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第63页。这个材料不是发掘品，而是当地居民挖盐土时从古墓中发现，维吾尔族学者多鲁坤·阔白尔1985年在且末扎洪鲁克墓地采集。关于塔里木盆地古代毛织物的纺织技术研究，参见E.J.W. Barber, "A Weaver's Eye View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Tarim Basin Finds," *JIES*, 23. 3－4, 1995, 347—355。1996年4月笔者赴美国费城出席中亚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木乃伊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美国古代纺织学家E.J.W. Barber博士用幻灯演示了这件珍贵的文物。这件织物的纺织技术非常先进，与新疆和田山普拉塞人墓地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乌拉匈奴墓所出的同类文物比较，疑其年代在战国或西汉时期。

③ 《逸周书·王会解》、《穆天子传》和《史记·五帝本纪》。

④ 马雍：《新疆佉卢文书中之kosava即罽宾考——兼论"渠搜"古地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12－115页。

⑤ 炎摩多其名见敦煌写本P. 3016《天兴七年（404年）索子全状》。其文云："所以不惧种云、炎摩多将军持弓，偻罗之人，尽命血战。"

⑥ 1995年，笔者在大英图书馆调查了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期间从新疆发掘的考古资料。这批文物全被扣留在喀什，故斯坦因未发表这次考察的发掘报告。我从这批未发表的资料中意外发现尼雅出土汉简中有一封写给"汉精绝王"的书信。以前学界多认为精绝即在尼雅，这枚记有"精绝"的汉简首次以出土古文字资料证明精绝即在尼雅，说见林梅村：《汉代精绝国与尼雅遗址》，《文物》1996年第12期；收入本书第三编第3章。

⑦ 据考古调查，轮台县策大雅乡西南约3－20公里范围有多座汉代古城，新疆文物普查队调查的五里旁古城（黄文弼称其为"阿克沁城"）、阿孜甘古城、乌勒方城、阿克热克城堡等。这些汉代城堡基本上分布于汉代烽燧线上，其地理位置和《汉书·西域传》所说乌垒城位置相近，疑汉代乌垒城即其中某城。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集，中华地图学社，

1975年，第24－25页；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张平等：《轮台县文物调查》，《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第5－6页；新疆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第58－59页。

⑧ 斯坦因曾到此城作过调查，参见 M.A. Stein, *Serindia*, 5 vols, Oxford, 1921, Map No. 46。近年新疆文物考古所沙漠考古队确认此城年代当在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参见刘文琐：《且末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第21－26页。该文将这个遗址分成那勒克和玉姆拉克开特买两遗址，但这两个相邻的遗址所出古代遗物的年代和性质具有一致性，所以后来调查又将其归并为一个遗址。参见新疆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第36－37页。

⑨ F.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1, 131－132.

⑩ 林梅村：《新疆佉卢文书释地》，《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⑪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⑫ 林梅村：《1992年秋米兰荒漠访古记——兼论汉代伊循城遗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18页。

⑬ 参见池田温：《沙州圖經略考》，《榎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4年，第95－96页；羽田亨：《唐光啟元年書写沙州、伊州地誌残卷》、《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歷史篇》，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8，第592页。

⑭ 1989年夏新疆巴州博物馆馆长何德修邀我到若羌考察，我在该博物馆陈列室见到一吐蕃文纸文书。何先生告诉我，这是从且末附近一古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他们原以为这是一件佉卢文书，请我鉴定，我发现其上文字应是古藏文。

⑮ 陕西乾陵六十四蕃臣石像题记有“播仙镇城［主］何伏帝延”，故知唐高宗时期且末为昭武九姓胡人伏帝延统领。参见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II，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89－203页。

⑯ 参见新疆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第36－37页。

⑰ J.L. Dutreuil de Rhins,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

vol. 1, Paris, 1897－1898, 183 and idem., vol. 3, 146.

⑱ S.A. Hedin, *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s the Holy City of Lhasa*, vol. 1,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Ltd., 1903, p. 306; for the route of his exploration, see N.P. Ambolt and E. Norin, *Memoir on Maps*, vol. I, *Sven Hedin Central Asia Atlas*, Publication 48, Stockholm, 1967, NJ45 and NK45.

⑲ M. A. Stein, *Serindia*, Oxford, 1921, Map of Portions of Chinese Turkistan and Kansu, No. 46.

⑳ 橘瑞超：《中亜探険》，東京：中央公論社，1989年（此书汉译本见柳洪亮：《中亞探險》，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㉑ 刘文锁：《且末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第20－30页。

㉒ 新疆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

㉓ 参见《新疆分省地图》，乌鲁木齐，1960年。

㉔ 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资料综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7－68页。

㉕ 1996年5月王炳华先生来京商量新发现的尼雅佉卢文研究事宜，其间谈起他从朱先生那里得到的这座且末古城的情况。承蒙王先生告知他调查的上述情况，谨致谢忱。

㉖ 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64－188页。

㉗ S. Konow, "Ein neuer Saka-Dialekt," *SPAW*, Hist. Phil Kl. XX, Berlin, 1935, 772; "The Oldest Dialect of Khotanese Saka," *NTS*, XIV, Oslo, 1947, PP. 156－190. 关于文书语言性质的讨论见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34－251页。

㉘ 参见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 1937, 90－91；克利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吉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6－88页。

㉙ 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第165页。

㉚ 荻原雲來等：《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497頁。

㉛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37－38.

第　四　编

从洛阳到印度及罗马之路

一　中国与罗马的海上交通

一、入海求仙与中国远洋航海的起因

战国末年中国方士为寻找“不死之药”大事炼丹求仙。所谓“求仙”就是派方士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药。《史记·封禅书》说：“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仟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据此，中国的入海求仙运动发祥于燕（河北）、齐（山东）沿海地区。70年代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许多和神仙道术有关的摩崖石刻。[1]孔望山毗邻齐地，摩崖石刻年代虽在六朝前后，但文化性质似与战国以来中国方士入海求仙运动有关。

至秦，入海求仙运动愈演愈烈。秦始皇听信燕国方士卢生“亡秦者胡”之图谶，北击匈奴，南开五岭，“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2]南海郡治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象郡在今越南北方。入海求仙运动似在这个时期从北方发展到南方。秦始皇发配大批商贾到南海和象郡，为后来丝绸之路交趾道以及海上丝绸贸易提供了大批善于经商的人材。

汉武帝求仙之心更在秦始皇之上，于是入海求仙运动在西汉

达到高潮。武帝在位50余年，竟遣方士数千入海，虽然未见不死之药，但带回来印度犀角和非洲象牙。入海求仙劳民伤财，东汉末年人们对此道逐渐厌倦。《古诗十九首》有诗曰："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焉?"更有曹植等人撰文，揭露方士黑幕，求仙之风才逐渐冷落下来。

战国秦汉以来的入海求仙运动固然荒谬，但求仙必须造船入海，因而推动了中国古代造船业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为了开辟通往印度之路，汉武帝在长安挖昆明池造大船以操练水军。《三辅黄图》卷4载："图曰：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围四十里。《庙记》曰：池中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因欲游戏，养鱼以给诸陵祀，余付长安厨。"《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考古发现证明，汉代中国已有颇为发达的造船业。1974年广州发现了一处秦末汉初的造船工场遗址，^{14}C年代测定为距今2190年左右。这个造船工场规模巨大，船台结构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可同时建造数艘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可见秦汉南海造船业之发达。[3]起初有人怀疑此遗址亦可能是南越国宫室一类的建筑，未必和造船有联系。[4]最近查明这个遗址确实是造船厂，南越王后来在这里营造宫殿，所以这里有宫殿遗址。无论如何，汉画像石、汉墓壁画已有大量反映船舶题材的绘画，特别是广东汉墓内屡次发现船舶模型，证明两汉南海地区确实有发达的造船业。据研究，西汉木船模型表明当时海船已有较大的舱房，盖顶为四回式，前有四人划桨，后有一人以桨作航舵掌握方向。东汉的陶船模型表明当时船泊规模更大，分前中后三舱，舱上有蓬盖，尾部设望楼。船尾安有舵，船头设有锚，船舱部分横架梁檐八根，使船只骨干加强，加深吃水量，并能经受一定风浪。[5]正是这个时期中国的远洋航海已经南达印度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齐黄金杂缯而往。……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驿使自此还。"

徐闻是雷州半岛南端一海港城市，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立县，属于合浦郡。据考古调查，雷州半岛南端的汉代遗址和墓葬集中于今徐闻县华丰村一带，其西南3公里有一现代港口，称"七旺港"。汉代徐闻港大概就在此港口附近。[6]这里的交通不象番禺（广州）和合浦（广西北海）那样发达，有河流可通内陆。徐闻之所以成为古代著名海港显然与秦汉海上交通尚不发达，船舶需要沿海岸线而行有关。所以这条航线要经过印度支那半岛沿海城市日南和象林（今越南广治和会安）。

这条航程中的"黄支"是汉代极负盛名的地方，屡见于文献，如《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据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和法国学者费琅（G. Ferrand）考证，"黄支"当来自梵语 Kanci，也就是《大唐西域记》所谓"建志补罗"。后者来自梵语 Kancipura，意为"建志城"。今南印度现代港口城市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市仍然沿用这个古名。[7]如果黄支即印度东海岸建志城的比定不误，那么它说明汉代的海上交通已经远达印度东海岸。

凭借古代木帆船和罗盘导航是否能完成广州与印度洋间的远航？80年代初阿曼苏丹国的航海爱好者对此作过一次模拟实验。据报道，1980年11月23日至1981年7月1日，阿曼苏丹国制造的一艘双桅三帆船苏哈尔号成功地完成了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

东来中国广州的航行。[8]苏哈尔号是一艘全木质的帆船，其结构完全模仿阿拉伯中世纪的海船。此船完全不用现代动力设备，而利用季风这一原始航海方法鼓帆而行。其导航系统也不用科学仪器，仅借助罗盘、牵星术等中世纪方法来判断方位和航线。苏哈尔号劈风斩浪，驶过了中世纪阿拉伯文献所说的红海至南中国海之间的海域，历时7个多月，行程19800公里，最后成功到达目的地广州。[9]苏哈尔号远航的目的旨在模拟和验证8世纪以来阿拉伯人航海术的实际操作过程，但它同时也验证了中国航海家以木帆船和罗盘导航技术从广州到印度洋的远洋航行是完全可行的。

二、罗马人对开辟东方海上交通之贡献

古典世界的一大进步是将季风用于航海。阿拉伯人很可能最先发现季风的妙用。当夏日季风吹向东北时，其商船借机在海洋中鼓帆而行，这比沿海航线快得多。公元前1世纪中叶，地中海的罗马商人也领悟到季风的实用性。以前欧洲人把季风的发现归功于希腊航海家希帕罗斯（Hippalus），但希腊拉丁语“季风”（monsoon）一词来自阿拉伯语“季节”（mauzim），可证阿拉伯人早就了解季风，那么希帕罗斯已经没有什么发现可言了。[10]不过罗马人似乎比阿拉伯人更加热心于海上贸易。他们不仅频繁往来于罗马城至埃及亚历山大港之间的地中海航线，还溯尼罗河而上，开辟埃及贝勒尼斯港至印度西海岸的红海航线，以打破安息人对陆路丝绸贸易的垄断。《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即罗马）“与安息、印度交市于海中”，也说明当时罗马人积极从事海上贸易。

西方有关罗马与东方海上交通的记载始见希腊佚名作家所著《厄里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Erythraen Sea）。此书约完成

于公元1世纪中叶，作者大概是一位定居埃及贝勒尼斯的希腊商人。他专门从事埃及和印度的海上贸易，此书应是他经商过程中的航海日记或商业指南。该书说的“厄里特里亚海”包括今天的红海、阿曼海乃至印度洋。书中记印度地理时这样说：“在那些利穆利（Limurie）或北方人登陆的当地市场和港口中，最重要的是吉蔑（Kamara）、波杜克（Podouke）、索巴特马（Sopatma）等著名的市场，这几个地方互为邻居。其后可达恒河。恒河之滨也有一个同样称为“恒伽”的市场。香叶、恒河甘松茅、固着丝以及号称恒河麻布的优良麻织品等，都在那里转口。”又说：“经过这一地区之后，就已经到达了最北部地区，大海流到一个可能属于赛里斯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叫作Thinai。那里的棉线和被称为丝（Serikon）的纺织品被商队陆行，经大夏运至婆卢羯车（Barygaza）；或通过恒河而运至利穆利。要进入该国并非易事，从那里来的人也极其少见。”[11]所谓Thinae，本自印度人对中国的称谓Cina（秦）。这个表示中国的罗马词似乎受福建或广东方言的影响。福建人读“茶”为“特”，故英语里的汉语借词“茶”字被音译为tea。同理，古汉语的“秦”经福建或广东方言，被罗马人音译成Thinae。除恒河外，其余地名似不见于汉文史料。

既然罗马与印度之间有发达的古代海上交通，那么印度海岸上昔日那些繁华的港口城镇在什么地方呢？

本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帕塔比拉明（P.Z. Pattabiramin）在距离康契普拉姆不远的沿海城市附近发现了罗马时代的海港遗址，北距本地治里市约3公里，今称阿里卡梅杜（Arikamedu）遗址。这位法国考古学家多次到这里调查发掘。除发现罗马帝国时期的遗址和遗物外，这里还出土了南宋龙泉窑的青瓷碗。据帕塔比拉明推测，这个海港遗址大概就是《厄里特里亚航海行记》提到的印度东海岸著名商港Podouke（波杜克）。

1945年以后，英国考古学家惠勒（M. Wheeler）和印度考古学工作者先后来此进行大规模发掘，查明此地远在公元前第1千年后期已形成商阜。从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前27—前14年）时代起到公元2世纪末，成为印度与罗马海上贸易的重要中心。[12]

阿里卡梅杜遗址发现了一些可能是直接由罗马或叙利亚、埃及等地中海东岸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和染制木棉的染坑。遗址中既出土了希腊的安佛拉式罐、罗马的阿雷蒂内式陶器、罗马玻璃器、绿釉陶片和罗马钱币等，也发现了来自印度中部或南部各地的香料、宝石、珍珠以及薄棉轻纱。此外，还发现了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的20件带题铭的陶器，铭文系婆罗谜文拼写的泰米尔语。波杜克港在罗马人撤离后仍作为海港继续繁荣了几个世纪。阿里卡梅度遗址发现的宋代瓷器说明这个古海港的衰败约在12—13世纪之后。

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市附近古罗马庞培城遗址曾出土过两件印度象牙雕刻（参见插图22）。公元79年庞培城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毁灭。所以，这两个印度牙雕的年代正是罗马与印度频繁进行海上贸易的时代，从而为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罗马与东方的贸易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13]据《汉书·地理志》，黄支国“其州广大”。康契普腊姆南距阿里卡梅杜约100公里左右，或在古代黄支国范围之内。那么罗马史料之“波杜克”有可能就是中国史籍提到的黄支国某港口城市。

三、交趾道上的罗马人与越南古海港奥高遗址

交趾在今越南，是汉代中国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商阜。交趾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西部的敦煌。交趾后来易名“安南”，故有人把从长安或洛阳经交趾、扶南（柬埔寨）到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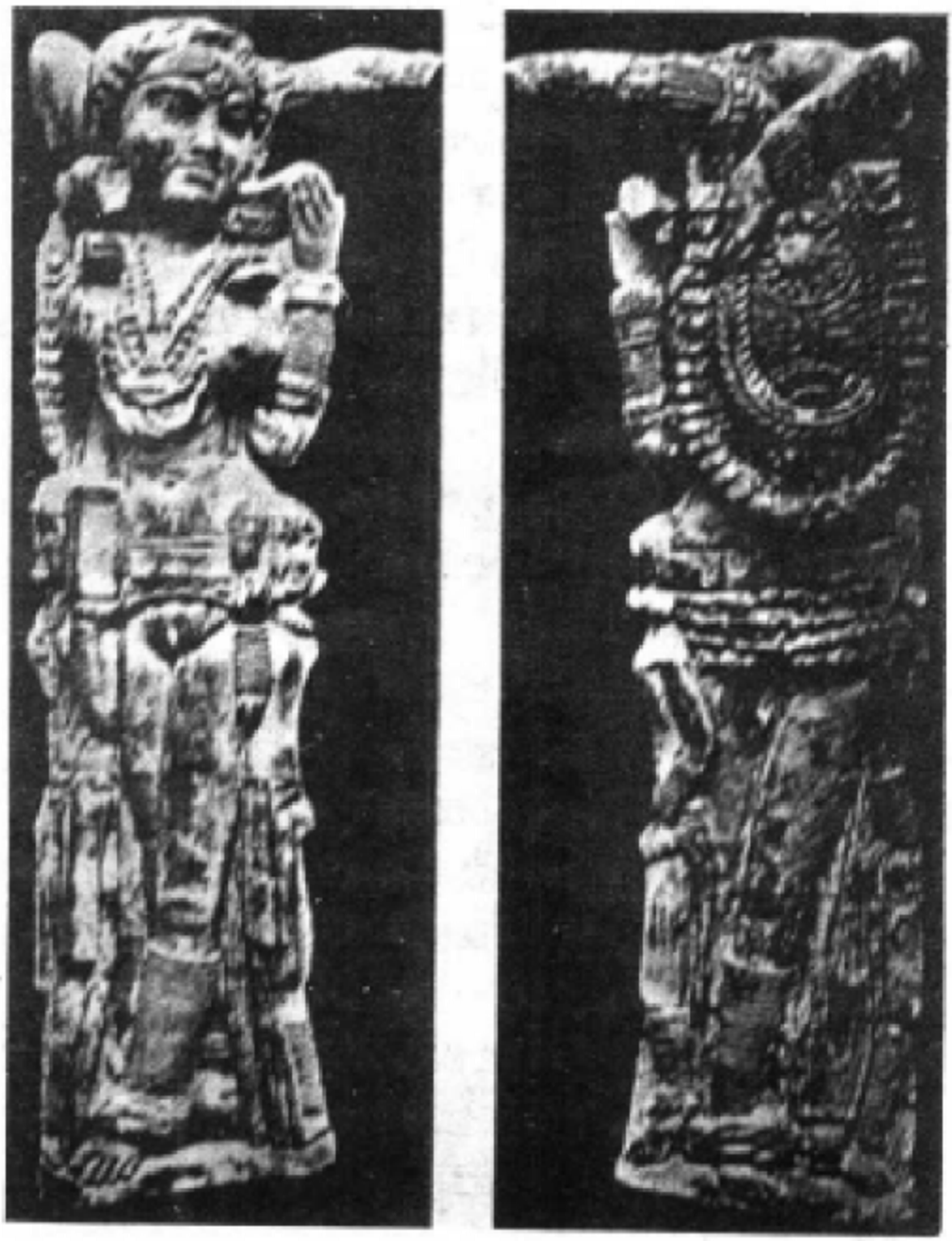


插图 22　庞培城出土公元 1 世纪印度象牙雕刻

的交通路线称为“安南道”。我们沿用古名，称其为“交趾道”。

希腊罗马人很早就知道交趾。罗马东方行省推罗城作家马林诺斯的《地理学导论》介绍公元1世纪的中印商道时提到这样一条路。他写道：“不只有一条路从那里途经石塔前往大夏，而且还有一条从该地取道华氏城而通往印度的路。这些人进一步补充说，从长安到卡蒂加拉（kattigara）港口的路是向西南方走的。”卡蒂加拉似指汉代东南沿海某港口城市。据李希霍芬和亨利·玉尔考证，其名大概是“交趾”的音译。[14]汉灵帝年间（175年）东汉官兵退出西域，此后中原又频频发生战乱，于是地处印度支那半岛的交趾成为沟通中国、印度乃至中亚的重要通道。《三国志·士燮传》记载：

> “（士）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谷焚香者常有数十。”

所谓“胡人”自然不是交趾的土著居民，因为汉文史籍中交趾人多称“南蛮”。按中国修史通例，胡人一般指中亚或波斯人。[15]《高僧传·康僧会传》明确记载了汉末侨居交趾的一户胡人。文中说“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康居系中亚粟特的古称，可见粟特商人在汉末已活跃在交趾道上。

史载早在中亚人到达交趾之前罗马人就已经出现在这条商道上。《后汉书·西域传》载：“天竺国……西与大秦近，有大秦珍物……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同书又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安敦即罗马帝国皇帝安东尼（M.A. Antoninus），约公元161—180年在位。

三国时期仍有罗马商人经交趾道来华。《梁书·诸夷传》载：

"中天竺国……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貌遣送旨权。"此后这条路一直受到重视。公元226年，孙权派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到达克拉地峡，考察了东南亚，其副使到了南印度的迦即调洲。[16]文献还提到，西晋"武帝太康中，（大秦）其王遣使贡献"，东晋法显也是由印度取道海路返国。[17]

交趾道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莫过于越南古海港奥高（Oc-èo）遗址的发现。该遗址位于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1942—1944年法国考古学家马勒尔（L. Malleret）在此发掘了一处公元2—6世纪的海港遗址。金欧角当时属于扶南国，所以扶南古海港的发现引起东西方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法国东方学家格鲁塞和考狄尔先后撰文介绍该遗址对研究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18]1946年日本学者梅原末治根据马勒尔的考古简报研究了奥高出土的汉式铜镜。[19]1959—1963年马勒尔陆续发表了他在奥高发掘的考古报告《湄公河三角洲考古记》。[20]70年代初日本考古学家冈崎敬在他的《东西交涉考古学》中介绍了奥高遗址的发现，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分析了奥高遗址的发现及其对研究东西方海上交通史的意义。[21]

奥高遗址距离现代海岸约25公里，当时应在海边。这里发现的建筑遗址多为栏杆式，古墓为砖室墓。这些古代遗存中发现了许多金锡制品。其中包括指环、耳环、钗等佩饰和小型铸像。铸像的相貌类似印度和中亚胡人。锡制品多于金制品。遗址中发现铸造锡耳杯的砂岩石范，可见这些锡制品是当地居民自造。奥高距离盛产锡矿石的缅甸和我国南方不远，所以当地有发达的锡铸造业不是偶然的。在一些锡制印章上和小锡片上刻有文字，采用印度流行的婆罗谜文，语言是印度俗语。其铭文内容多为"小心"、"注意"之类，大概是商品标签。

奥高海港遗址和天竺商人关系密切。这里出土的铜佛像多数

为南印度式，也有个别犍陀罗式佛像。饶有兴味的是奥高发现了我国魏晋南北朝流行的汉式菩萨像。因为菩萨在印度均为男性形象，到了中国才变为女性。所以奥高遗址发现的女菩萨显然来自中国。奥高出土的中国文物还有汉至三国时期的铜镜残片，如西汉流行的规矩镜、东汉三国时期流行的八凤镜。奥高发现的罗马文物相当引人注目。据研究，其中有公元152年发行的罗马金币和公元161—180年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正是汉文史料提到的罗马皇帝大秦王安敦在位时发行的。奥高遗址还出土了罗马玻璃器残片，类似的玻璃器在中国东南沿海汉晋古墓中屡有发现(详下)。此外，奥高遗址还发现了一种名曰“多面金珠”的装饰物。这是一种镂空的小金球，直径1.4厘米，十二棱形，每面正中有个圆形穿孔，每个角有突起的圆珠四粒。类似的金珠以前曾见于印度河流域的呾叉始罗遗址，近年在广州东汉前期墓（编号4013）中发现一例。[29]这些发现不断提醒我们注意，交趾道上的古海港奥高遗址是罗马与中国交往的一个重要中继站。

四、中国沿海地区汉代遗存所见罗马方物

据前文讨论，中国的入海求仙运动发祥于燕（河北）、齐（山东）沿海地区，汉代发展到东南沿海地区。近年中国沿海地区发现的汉代罗马方物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前所未知的新材料。

1978年秋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1号随葬坑内发现一个带有异国风情的列瓣纹银豆。器高11，口径11.4厘米。据研究，这个银豆是在一个颇具西方艺术特色的列瓣纹银盒上改造而成的。它的铜圈足和豆盖上的三个铜卧兽都是后来附加的（参见插图23—1）。据孙机调查，这种银盒是古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和安息王朝金银器中常见器物，西方考古学家称之为Phialae。[30]不过北

京大学齐东方认为，这种银盒可能是罗马人使用的容器，类似的器物屡见于巴尔干半岛古代遗址。[24]如果 Phialae 就是这种容器的器名，那么它的词源说明齐东方的建议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词系希腊语词汇，拉丁语的 Phiala 和英语的 vial 均来自这个希腊语词汇，指一种用来装液体的带盖容器。[25]据发掘者推测，临淄这座西汉墓系齐王刘襄墓，随葬坑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179 年左右。[26]那么至少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叶大秦与汉朝的海上交通已经远及山东半岛。

更多的汉代罗马方物是近年在广东汉墓中发现的。1983 年广州象岗发现南越王赵昧墓，约葬于西汉武帝元朔末至元狩初年（前 122 年左右）。[27]墓中不仅随葬了和西汉齐王墓随葬坑所出列瓣纹银盒几乎完全一样的罗马银盒（参见插图 23—2），还出土了非洲的象牙和产自红海沿岸的乳香。南越王墓出土的列瓣纹银盒高 10.3，口径 13 厘米，圈足和盖纽都是后来加配的，盖上还加刻了汉文铭文。出土时银盒内藏有药丸，不知是否为来自远方异国的“不死之药”。南越王墓西耳室的一个漆盒内发现许多乳香，呈树脂状，重 26 克。乳香主要产于红海沿岸，当时罗马商人又频繁活动于红海海域，所以这些乳香完全可能是经罗马商人之手传入广州的。[28]

如果说山东和广东两地汉墓出土的列瓣纹银盒和乳香是否为罗马方物尚存疑义，那么，近年广东和广西发现的罗马玻璃器则为罗马方物传入中国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广州横枝岗汉墓（M2061）曾发掘出一批罗马玻璃碗，出土时已破碎，经拼接和粘合后，其中两件为完整器，一件尚残三分之一。经化验均为钠钙玻璃，估计是地中海南岸的罗马玻璃中心公元前 1 世纪的产品。它们不仅比奥高遗址所见罗马玻璃器的年代早，而且保存得更加完好。[29]横枝岗汉墓的时代约在西汉中期，相当于公元前 1 世纪，这批玻璃器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30]

1990年广西合浦县风门岭还发现过一件东汉年间的天蓝色罗马玻璃碗。[31]据《汉书·地理志》，合浦是汉代著名海港之一。合浦风门岭发现的这个罗马玻璃器进一步证明汉朝与罗马之间确有海上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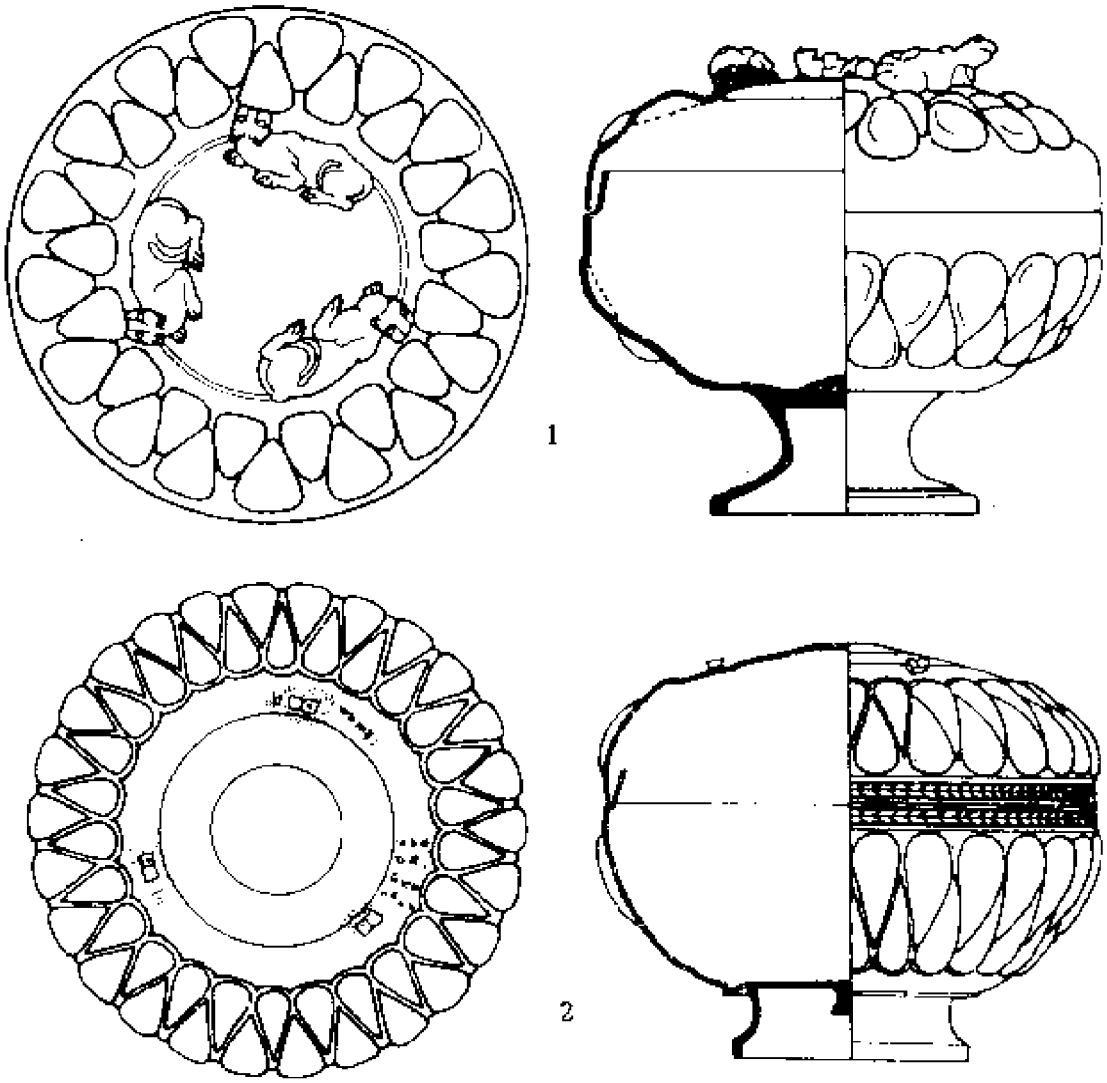


插图 23　山东临淄齐王墓和广州南越王墓
出土汉代罗马方物——列瓣纹银盒

据以上四节讨论，似可复原一条从罗马到中国的古代航线。它从罗马城启航，先到埃及亚力山大港，再溯尼罗河而上，然后

经过一段陆路到贝勒尼斯港入红海；其后经印度东海岸的波杜克港、印度支那的奥高古海港、雷州半岛的徐闻港，最后抵达广州。这条航线东段的开辟与战国秦汉以来中国方士入海求仙不无联系，并在汉武帝时代得以全线开通。印度、越南古代海港遗址和中国沿海地区出土的罗马金币、陶器、银器和玻璃器表明，罗马商人为打破安息对丝绸贸易的垄断，积极开辟这条航线的西段。在罗马商人的不懈努力下，罗马皇帝安敦尼在位时这条沟通中国与罗马的古代航线达到鼎盛时期。东汉末年中国对入海求仙逐渐厌倦，因而使这条航线逐渐衰落。中世纪阿拉伯人以商业为目的海上交通的兴起才使这条航线再度复兴。

注 释

① 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文物》1981年第7期。

② 参见《史记·封禅书》。

③ 广州市文管处和中山大学：《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高玮：《秦汉造船业的考古发现》，《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79－481页。

④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十年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23页。

⑤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332页。

⑥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考古》1977年第4期第268－267页。

⑦ 藤田丰八著、何建民译：《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费琅著、冯承均译：《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⑧ 马世琨、席林生：《现代辛巴达扬帆一万九千里》，《人民日报》1981年7月7日第7版。

⑨ 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秦》，《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17页。

⑩ 参见塔帕尔著、林太译：《印度古代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4页；章巽先生认为，中国在这个时期或早些时候也知道了季风，说见章巽：《我国古代海上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⑪ 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19页。

⑫ M. Wheeler, "Arikamedu; An Indo-Roman Trading-Station on the East Coast of India," *Ancient India*, No. 2, Delhi, 1946;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London, 1954.

⑬ J. Ph. Vogel: "Note on an Ivory Statuette from Pompei," *ABIA*, XIII, 1938.

⑭ 戈岱司，前揭书，第27页。

⑮ 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3－54页。

⑯ 参见《梁书·诸夷传》、《太平御览》卷771引《吴时外国传》及《水经注》卷1引康泰《扶南传》。

⑰ 参见《晋书·四夷传》和《法显传》。

⑱ G. Coedès, "Le Site de Oc-èo, Ancient Port du Royaume de Founam," *Artibus Asiae*, X－3, 1947.

⑲ 梅原末治：《オクオ出土の夔鳳鏡》，《史学》1946年37卷第3期第7頁。

⑳ L. Malleret, *L' archäologie du delta du Mäkong*, 4 vols, Paris, 1959, 1960, 1962 et 1963.

㉑ 宿白：《中西交通考古学讲义》，未刊稿。

㉒ 岑蕊：《试论东汉魏晋墓葬中的多面金珠用途及其源流》，《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

㉓ 孙机：《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中国圣火》，长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9－142页。

㉔ 此据齐东方在1997年春季汉唐考古研讨会的一次关于"中国出土的萨珊玻璃器"的学术报告。

㉕ 参见 *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Massachusetts: G. and C. Merriam Company, 1977, 860 and 1303。

㉖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第223页。

㉗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

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㉘ 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收入《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第271页。

㉙ 安家瑶：《中国早期玻璃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8页。

㉚ 同㉘。

㉛ 同㉙；《中国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70－271页。

二　麻沸散与汉代方术之外来因素

中国文明有其独立的起源，但中国文明从未脱离世界其他古代文明而孤立发展。1930年史家陈寅恪考证汉代名医华佗的姓名来自梵语，揭开了我国与西方古代医学交流史研究之序幕。[①]其说不仅引起我国医药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学术界对陈寅恪之说的褒贬产生出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支持其说，认为中印两国在华佗时代已经开始医学交流；[②]第二种反对其说，以为华佗其名与梵文无关，其医术本自中国固有医学传统。[③]此外还由陈说引发了第三种意见，即华佗的医术不是来自印度，而是受波斯影响。此说似由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首先倡导，并由日本伊朗学家伊藤义教从语言学角度加以论证。[④]美国汉学家梅维恒更是详证博引，探讨中国巫师与古波斯麻葛师（Magus）之联系。[⑤]另一方面，近年考古发现也为我们研究这个题目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本文拟在上述发现和研究基础上探讨汉代方术中的外来因素，以期将这个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麻沸散之谜

麻沸散是中国麻醉外科手术使用的一种麻醉剂。《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华佗治病，“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

刮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醉如死无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这段文字说明华佗不仅做了腹腔肿瘤切除手术，还做过肠胃部分的切除吻合手术。这两种手术即便在今天也仍是较大的外科手术。这种大手术的难点在于能否解决手术过程中因剧痛产生的休克问题，因此需要全身麻醉。华佗的麻沸散显然是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药剂。

《华佗传》言简意赅，没有提到麻沸散的配方，并说，“(华)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所以，有人以为，“由于华佗被曹操制造冤狱所杀，其医学著述为自己所焚毁。故不能从历史上对这一记载予以科学的准确论证。但其学术渊源，仍是中国传统发展之必然”。[6]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华佗虽死，但有吴普和樊阿两弟子传其医术，特别是“(吴)普依准佗治，多所全济”，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华佗的医术。其后，西晋有一位作唇裂修补外科手术的佚名医师。隋代巢元方、唐代方干、明代危亦林都曾用草药麻醉术成功地做了和华佗手术类似的断肠吻合术。清初王肯堂和陈实功还用草药麻醉术做了难度较大的断耳再植和断喉吻合手术。[7]上述事实表明中国麻醉术始自华佗，历代相承，传至明清，未曾中断。华佗的麻沸散配方无疑仍保存在我国古代药学宝典之中。因此，华佗的麻沸散究竟为何物是可以进行科学论证的。

近年我国药学界对具有麻醉性能的草药作了系统调查和研究，并由郭晓庄等人编辑出版《有毒中草药大辞典》一书。据该书介绍，中国药典中具有麻醉功能的草药主要有以下9种，即八角枫、土细辛、北豆根、两面针、银不换、闹羊花、川乌、草乌和洋金花。

八角枫、北豆根和银不换只用于复合麻醉或辅助麻醉，即和其他具有麻醉功能的草药或针灸麻醉配合使用，不单独使用。所

以，华佗的麻沸散显然不是这三种草药。土细辛和两面针用于手术前表面麻醉或局部麻醉，两者都是外用麻醉药，这和用来内服的麻沸散不同。

闹羊花是一种古老的草药，古称“羊躑躅”，见于汉代医书《神农本草经》。据实验和临床研究，闹洋花虽然可以用于手术麻醉，但有局限性，“对脊背、四肢、会阴等部手术效果较差。”此外，其麻醉方法不是用酒口服。[8]这和《后汉书·华佗传》所说“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亦相径庭。

川乌和草乌在明代以前统称乌头，自《本草纲目》始，才分为川乌头和草乌头两种。川乌头指四川人工栽培的乌头，各地野生者一般称草乌。乌头也是一种古老的中草药，古称“乌喙”，亦见于《神农本草经》。这种草药可以和其他几味草药配合制成麻醉药，总有效率高达 90%。然而，这种草药含有剧毒成分，“易溶于醇，且吸收较快，即使服用较小剂量亦易中毒。故生品及其药酒一般不作内服”。[9]因此乌喙也不能制成用酒口服的麻沸散。

从中医学界所做实验和临床研究看，洋金花是目前所知唯一和麻沸散性能相符的草药。洋金花又名山茄花（《扁鹊心书》）、曼陀罗花（《御药院方》）、押不芦（《癸辛杂识》）、风茄儿（《本草纲目》）等。据研究，“以洋金花为主（占 60%以上），配伍川穹、当归、生草乌、半夏、南星（各占 4—6%），或口服，或灌肠，或肌注，或静点，或穴位注射，均可达到麻醉效果……可适于各种年龄组和各科的大中型手术。据报道，一般认为以洋金花为主的中药麻醉其优点是：效果确实，适应症广泛，安全，方便。具有抗休克作用。洋金花生药用量一次可高达 20 克。术后一般恢复良好，手术效果满意者达 90% 左右”。[10]1805 年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用曼陀罗花（洋金花）为主的草药作为外科手术麻醉剂获得成功，洋金花可用作麻醉剂的临床用途亦被日本医学

界证实。[11]

宋末周密早就怀疑华佗的麻沸散就是押不芦（即洋金花）。他在《癸辛杂识》中写道："回回国之西数千里，地产一物，极毒，全类人形，若人参之状。其尤名之曰押不芦。生土中，深数丈。人或误触之，着其毒气必死……别用他药制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虽加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后，别以少药投之即活。盖古华佗能刮肠涤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药也。今闻御药院中亦储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7引周密之说也认为华佗的麻醉药必为押不芦。[12]

70年代末我国医药史学界的李经纬先生旧事重提，他根据宋代以来中药麻醉传统提出麻沸散当与宋代窦材、元代危亦林、明代李时珍所记睡圣散、草乌散或蒙汗药相似。南宋窦材的《扁鹊心书》（1146年成书）记有用睡圣散作为灸治前的麻醉剂，其主要成分是山茄花（即洋金花）。明代危亦林的正骨手术所用麻药草乌散亦以洋金花为主要配方。[13]

野生洋金花现在分布于我国南方江浙、福建、广东、广西、四川和湖北等地，上海和南京有人工栽培的洋金花。然而中国古代不产洋金花。这是一种外来植物。周密说这种植物产于"回回国之西数千里"。明代李时珍则说："漠北回回地方，有草名押不芦。"据美国汉学家劳费尔考证，中世纪阿拉伯波斯作家阿布·曼苏尔（Abu Mansur）最早将押不芦著录于他的药书《药物原理》（约成书于975年）。[14]宋代高僧法云（1088—1158年）所编《翻译名义集》卷8提到印度有此植物，梵名 mandāra（曼陀罗）。宋代曼陀罗花在我国南方广西已有栽培。曼陀罗花即印度人对洋金花的称谓。周去非《岭外代答》（1178年成书）卷8载："广西曼陀罗花（即洋金花）遍生原野，大叶白花，结实如茄子，而偏生小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人饮食，使之醉闷，则挈荚而移。"洋金花何时传入我国，史无明载。《岭外代

答》的有关记载或许说明我国栽培洋金花的历史大概始于宋代。

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开通，葡萄、苜蓿等西域植物相继传入我国。洋金花虽然没有象葡萄和苜蓿那样很快在我国栽培，但洋金花所制胡药完全可能被汉代来华的中亚或印度僧人带入我国。华佗对洋金花药性的了解显然从印度或中亚僧人那里知道。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依附于中国方术，西域高僧常与汉代方士谈经论道。[15]华佗所学方术受到印度医学的影响及所制麻沸散来自胡药是完全可能的。这个问题我们从下一节的讨论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我们还注意到，麻沸散之“麻沸”难以在汉语中得到圆满解释，应是外来语。若是外来语，当来自梵语。印度人称洋金花为“曼陀罗花”，全名 mandāra-puṣpa。这是一个复合名词，由 mandāra（曼陀罗）和 puṣpa（花）两字组成。麻沸散之“麻沸”大概分别译自这两字的头一音节 ma-和 pu-，尤如汉译佛经将梵语佛名 bodhi-sattva（菩提萨埵）缩译成“菩萨”。麻沸散的主要成分系曼陀罗花可由此得到进一步证明。如果此说不误，那么麻沸散来自波斯的可能性将被排除。因为波斯人称洋金花为“押不芦”。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古希腊人对曼陀罗的麻醉性能也非常了解，其名屡见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古希腊人早就知道曼陀罗汁可以催眠，可使人失去知觉，并致人于死地。希腊医师用其制为药酒，手术时用作麻醉剂。[16]但华佗时代中国与希腊及罗马人极少往来。我甚至怀疑古希腊的曼陀罗可能也是从印度传入的。亚里士多德之前，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已经和印度人频繁接触，被印度人称为“耶槃那人”（Yavana）；亚里士多德时代更有大批希腊人随亚力山大东征移居中亚和印度，法国考古团在阿富汗北境阿伊哈努姆发掘的古希腊移民城址中甚至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手稿残卷。可见希腊与中亚和印度人交流之深。

而希腊人称洋金花为 mandra，似源于梵语 mandāra。

二、华佗游学徐土的历史背景

陈寅恪撰《<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引发了学界对汉末名医华佗其名及其外科手术的医学传统问题的热烈讨论。陈文考华佗其名来自梵语 agada，或译“阿伽陀、阿羯陀”，本义为“药”。所以他认为，“当时中国民间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为‘华佗’，实以‘药神’目之”。[17]我们知道印度人或称药为 bhaisajya，一般指汤药；而 agada 在梵语中的实际含义是“解毒剂”，多指丸药。[18]既然麻沸散当为天竺胡药，那么华陀其名或来自五天梵音，其医术有印度因素，则事在情理之中。

华佗乃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介方士，他的名字为何会有天竺梵音并如何学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印度医术呢？这是执第二种意见的人不接受华佗医术有印度色彩的原因之一。但只要认真观察华佗行医的社会环境，就不难发现陈说并非臆测。

据《三国志·华佗传》，华佗与曹操同乡，系沛国谯人（今安徽亳县），后来“游学徐土”，即在今山东南部和安徽、江苏一带求师问道，终于成为“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的一代名医。

东汉初年，徐州已成为印度佛教流行中国的一个重要地区。据《后汉书·楚王英传》，楚王刘英广招天下方士，其中就有信奉印度佛教的沙门和居士。其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寺”。楚王英受封的楚国即后来华佗游学的徐州，其首府彭城（今徐州）因刘英及手下居士奉佛而开始流行佛教。

东汉晚期华佗游学徐州时，佛教在这里又有相当发展。《出三藏记集》卷 5《喻疑》记载：“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广陵和彭城两地的

相笮是否出家，于史无征。但是汉末徐州北部下邳（今江苏西北角）之相笮融确实笃信佛教，并滥用职权把三郡的钱粮用来大造佛寺。《三国志·刘繇传》记载，笮融在下邳建造的佛寺“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悉课读佛经”。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大设酒席招待前来参加法会的人。据说，其筵席绵延数十里，“民来观及就食者万人，费以巨亿计”。另一方面，东汉末年大批西域高僧为躲避战乱从洛阳、关中亡命徐州，于是华佗游学之地竟一度成为印度佛教在华传播的一个中心。

古代印度有颇为发达的外科医学，而且印度人或对曼陀罗属植物的药用功能早就有所认识。曼陀罗系达都拉（Datura）属植物，印度人或称其为 dhattūra，此乃曼陀罗一别名，屡见古印度医书。印度人把这种植物制成草药，用作麻醉剂或镇静剂。其叶专能镇痛，其花制药酒，治疗癫痫或水肿症颇有功效。[19]东汉安世高译《捺女耆域经》对印度外科手术略有描述。[20]耆域，梵名 jīva，或译“耆婆”，又名“阿提梨”，乃印度神医。《捺女耆域经》内容讲耆婆从地位卑微的妓女之子成长为印度神医，并为国王当御医。而国王荒淫无耻，杀人如麻。可怜耆婆伴君如伴虎。他用智慧和国王周旋，最后终于摆脱了国王的魔爪。该故事多处讲到耆婆会外科手术，如治疗拘赊弥长者病，取利刀破肠，披肠结处；治疗伽罗越家女病，以金刀披破其头，悉出诸虫；治疗治伽罗越家男儿肝病，以金刀破腹。耆婆其人及故事在印度流传甚广，公元 4 世纪佛陀耶舍译《四分律》卷 49 至 50 亦收有耆婆故事。正如中国许多古医书托名黄帝一样，印度古医书中有不少托名耆婆的著作。《宋史·艺文志》医书类有《耆婆脉经》3 卷、《耆婆六十四问》1 卷、《耆婆要用方》1 卷和《耆婆五藏论》1 卷。其中《耆婆五藏论》在新疆吐鲁番发现过唐代抄本。[21]至于印度外科手术产生的年代，陈先生据耆婆故事提到佛陀推测耆婆

大概和佛陀为同时代的人物。不过有迹象表明印度外科手术的年代似早于公元前6世纪佛陀生活时代。因为耆婆故事基本不见佛家之说教，它的素材可能取自更早时期的印度传说或民间故事，后来被佛教徒稍加改编写入佛经。佛教徒把印度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编入佛经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22]以此推之，印度开始外科手术的年代或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

不过，《撩女耆域经》仅是一个关于印度神医的故事，没有具体的医疗方法。能够影响汉代中国医学的应是来华西域高僧的言传身教和印度古医书。事实表明，华佗时代印度医术和医书已经传入中国。《出三藏记集·安清传》记载，东汉桓帝年间来洛阳传教的安息高僧安世高通晓“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安世高大概是最早将印度医术传入中国的西域高僧。安世高在洛阳传教时尚有一弟子，名曰严佛调。他与安世高等人合作译经受到世人高度评价，而严佛调的家乡就在华佗游学的徐州地区。此外，印度高僧竺律炎和大月氏和尚支谦所译《佛医经》则表明印度古医书亦在华佗时代传入中国。[23]

中印医学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下不可能没有任何交流，华佗医术不可能丝毫不受印度医学的影响。

三、华佗医术与中国传统医学之关系

中国与印度在医学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印度的瑜伽和中国的导引（今人称“气功”）、印度的针刺疗法和中国的针灸、印度的经络学和中国的脉法等。甚至中印远古医神的名字都十分相似。印度古代传说中的医神名叫“耆婆”，而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医神名曰“岐伯”。这些真真假假的相似给我们研究中印各自医学传统增加了难度。汤用彤先生曾撰文讨论这个问题。他发现针

灸大概是中国的发明，因为唐义清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始见印度医书中有“针刺”之文。此前汉译佛经虽然出现“针灸药石”，但相应的梵文原典却没有表示针刺的语句，当系误译。[24]另据范行准考证，印度医学的“四大不调”等理论曾对中国古代医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并为陶弘景和孙思邈所采纳。因为中国传统医学历来主张阴阳五行而无“四大”之说。他认为两汉是胡方传入中国的酝酿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全盛期，宋代是消化期。[25]所以，印度医学对中国古代方术产生过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印医学何时开始交流以及如何进行交流。

主张第二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先秦方士已经会做外科手术，所以，“陈寿《华佗传》的华佗姓名和医术，绝非来源于印度佛教神话故事，而不别真伪，实为渊源于中国传统医学的长期演进和发展”。[26]其主要根据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与虢国方士一段对话。其中提到中国古代有位名曰“俞跗”的神医能作外科手术。这个传说亦见《韩诗外传》卷10第9章，内容和《史记》大同小异，两者当有同一史料来源。据《史记》的记载，这位方士说：

> “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体洒，搥石挢引，案机毒熨，一拔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弱髓脑，揲荒爪幕，前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行。”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鹖冠子·世贤》也提到俞跗其人。该书还说，“若扁鹊者，铲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这段文字显然是把古代传说中的神医俞跗和扁鹊混淆了，因为《史记》和《韩诗外传》都明确提到，扁鹊不会外科手术，只有古代俞跗能做。《史记》和《韩诗外传》没说俞跗的外科手术如何进行麻醉。《鹖冠子》这段文字或可说明中国传统麻醉方法是烈性草药与针刺配合进行麻醉。此外，《说苑·变物》和《汉

书·艺文志》，称俞跗为“俞拊”，后一书还于经方类书目中列有《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

俞跗其人身世不明。《汉书·艺文志》方技类曰：“太古有岐伯、俞跗，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珍以知政。”《史记正义》注俞跗曰：“夷跗二音。应劭云‘黄帝时将也’。”东汉应劭说俞跗乃黄帝手下将军恐受汉代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如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黄老之学逐渐与社会上流行的神仙家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各种方术合流，堕落成一种宗教迷信。所以，《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大量神仙方术著作均托名黄帝之作。[27]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应劭把来源不明的古代仙人俞跗比附为黄帝手下的将军是十分自然的。

俞跗到底是什么时代的医师呢？我们注意到其名不见《左传》、《世本》等先秦早期文献。《世本·作篇》说“巫彭作医”，“巫咸初作医”，但没提到俞跗。以此推之，俞跗大概是年代稍早于扁鹊的一位先秦医师。那么《鹖冠子》所说“针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的医术或产生于春秋末至战国初年。

如果我们的理解不误，这个手术大概是用烈性草药配合针灸进行麻醉。针刺麻醉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麻醉方法。据报道，针刺麻醉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包括头颅、颈部、胸腔、腹腔和四肢等部位的各种大小手术。[28]不过，针刺麻醉往往还要辅以草药才能达到最佳麻醉效果。现代中医实践中常用八角枫、北豆根和银不换等烈性草药与针刺麻醉相配合进行麻醉。这个方法和先秦方士俞跗的麻醉术颇为相像。“针灸药石”相配合是我国古代医学的一个传统。既然如此，华佗的麻醉术就与先秦以来中国传统麻醉方法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华佗采用酒药麻醉，根本没用针刺麻醉。

尽管我们同意华佗其名及医术有印度色彩，华佗的麻醉术与先秦方士俞跗的麻醉术无太多联系，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华佗的麻

醉术和外科手术全都学自印度医术。我们的意见是：华佗的医术是在我国传统医学基础上吸取外来医学的合理成分发展而成的。华佗配制的麻沸散本身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三国志·华佗传》把麻沸散的功效说得神乎其神。如果单凭曼陀罗花一味草药根本不能达到这样的麻醉效果。华佗显然在印度曼陀罗花中加入了别的草药，才最终配制成麻沸散。现代中医用60%的曼陀罗花配以40%的其他中草药（有伍川穹、当归、生草乌、半夏、南星等，各占4—6%）制成麻醉剂。这个配方给我们探讨麻沸散的配方以启迪。曼陀罗花麻醉的不足之处还在于麻醉深度不够，肌松不全，内脏牵动反映明显。这些问题将给手术操作带来一定困难。所以现代中医又配合使用八角枫、锡生藤及汉防己等草药帮助腹肌松驰。[23]总之，现在中医使用的曼陀罗花为主的麻醉药方已被改造和创新，其中40%的内容是中国医师的创造发明。华佗应算作这个在中国流行两千年之久的麻药配方的主要发明人。任何创造发明都有其历史演进过程。东汉蔡伦被认为是造纸术的发明人。但考古发现证明，蔡伦之前中国许多地方都能生产纸了。据《三国志·华佗传》，麻沸散和华佗的外科手术已经相当成熟，显然经过长期实践。所以麻沸散可能在华佗之前已经出现，华佗只是传承这一麻醉术的突出代表人物。

最近我国考古界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新消息。新的发现表明华佗的外科手术并非此类外科手术的第一例。1992年新疆文物考古所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鄯善县的苏贝希村发掘古墓34座，出土木乃伊27具。其中保存完好的有4具。古墓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具男尸的胸部有锐利的刀口，并用粗毛发予以缝合（参见彩版21）。这个发现首次以考古实物资料证明远在华佗之前中国西部地区的古代医师已经开始实施外科手术。这具男尸的下葬年代尚不十分清楚，但至少是西汉以前。至于吐鲁番的古代医师用什么麻醉方式实施外科手术，考

古资料没有提供直接证据。[30]

我们知道，这个时期中国与印度已经开始进行民间交往。公元前 3 世纪印度古文献《政事论》中出现对 cina（秦）和 cinapaṭṭa（丝绸）的记载。[31]《政事论》成书年代有争议，或以为晚至公元 2 世纪。不过先秦文献确实有中印交往的记录。《战国策·楚策》记载，秦国派张仪游说楚怀王，怀王被说服，于是派人给秦国送礼品，“乃遣故车百辆，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鸡骇来自梵语 Karketana，即“猫眼石”。那么，“鸡骇之犀”似指镶嵌猫眼石的犀牛角。“夜光之璧”是什么呢？汉代文献称玻璃为“璧琉璃”，扬雄《羽猎赋》有“夜光之琉璃”的诗句，“夜光璧”当指玻璃。虽然战国时中国已经自产玻璃，但全是透明度不高的铅钡玻璃，恐怕难以产生夜光效果。夜光璧应是西方的钠钙玻璃所制，显然是和鸡骇一起传入中国的印度玻璃。那么，楚王送给秦王的这批礼物当来自印度。吐鲁番地当中印交通孔道，曼陀罗花在战国时期从印度传入吐鲁番是极其可能的。吐鲁番的古代医师或许就是采用印度曼陀罗花进行麻醉实施手术的。

战国至汉初的方士为寻找“不死之药”，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入海求仙运动。他们从印度找来象牙和犀角。《黄帝内经·素问》第 12 篇《异法方宜论》说：

>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者。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从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看，《黄帝内经》所谓“西方”显然指多风少雨，沙丘纵横的新疆地区。看来，新疆古代居民使用的烈性药物在先秦时期就传入了中原。曼陀罗花的毒性足够列入《黄帝内经》所谓的西方“毒药”。

考古新发现提醒我们注意，曼陀罗花和印度医术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西部地区了。经过漫长的实践和探索，这种外来草药的药性终于被秦汉方士所掌握，他们辅以中国本土草药制成麻醉剂，用来代替中国传统的“针灸药石”麻醉法。这个融合中国与印度古代人民智慧的草药麻醉剂经汉末名医华佗之手终于制成可用于外科大手术的麻沸散。这大概就是麻沸散的全部发明过程。

四、汉代方术中的外来因素

古代世界并无科学意义上的医学，中外医学的产生往往伴随着古代宗教和巫术而生存发展。仅凭说教难以吸引信徒，于是能使人产生特殊感觉的毒品成为巫师吸引信徒的一大法宝；而毒品往往又是医药，特别是麻醉剂和兴奋剂的先驱。《周礼·天官冢宰》曰：“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英语 drug 有两重含义，其一为药，其二即指毒品。这些例证生动地说明古往今来巫与医、毒与药的关系。

因自然环境不同，植物分布有异，五大洲的远古巫师因地制宜，开发了不同的毒品。古代墨西哥的印地安巫师曾将毛曼陀罗用于催眠、麻醉和宗教仪式。[32]公元 9 世纪印度回教徒最早把大麻用作麻醉剂。其后传入伊朗和阿拉伯等地。[33]曼陀罗花的麻醉性能自然是原产地印度人最先发现的。古代印度有较为发达的外科手术。而印度外科学产生的年代远在佛教产生（约前 6 世纪）之前。曼陀罗花用作麻醉剂无疑是印度人的发明。

中国方术有自身的传统，这从先秦以来中国方士所用毒品来自矿物而不是植物可以判明。古代中国最为风行的毒品莫过于“五石散”，因服散者不能吃热的东西，故名“寒食散”。《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提到“齐王侍医遂病，自练五石服之”，可知服

散之风已在战国方士中广为流行。五石散有剧毒，久服或用量过度往往致残，甚至亡命。据王奎克考证，五石散的有毒成分主要是輿石，即砒霜。然而，自魏晋名士何宴服散“首获神效”之后，人们竞相效法，其后五百年间中毒死亡或致残者不计其数，服散之风直到唐代中叶才逐渐冷落下来。[34]

麻沸散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们，汉代方术有外来因素。我们注意到，影响汉代方术的外来因素不单是麻沸散。北京大学李零最近对中国历代房中用药作了详细考证。他发现东汉初年房中术用药中突然添加了一味名曰“肉苁蓉”的配方，用以取代毒性较大的乌喙。这种草药后来居然成了历代房中术用药最重要的方剂。[35]肉苁蓉，俗称“大芸”，系多年生草本沙生植物，生长于盐碱、沙漠地区。据调查，品质优良的肉苁蓉产自西域，主要寄生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红柳根丛。除新疆外，波斯也出产肉苁蓉。敦煌文书中还记录了从波斯进口的“（肉）苁蓉”。[36]肉苁蓉于东汉初年进入中国房中术用药当以丝绸之路开通，西域巫术传入中原为背景。那么服用肉苁蓉当为汉代方术中又一域外因素。

汉代方士还大量使用一种称为“麻黄”的方剂。这种草药含有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兴奋的麻黄素，食服后给人以飘然欲仙的感觉。古代方士服食的最高目标是成仙，就是通过特殊的修炼，除病、延年，升入仙境。[37]所以麻黄备受急欲升仙的汉代方士的青睐。也正由于这个原因，现代体育比赛严禁运动员服用含有麻黄素的药物。麻黄的药物作用亦被汉末方士张仲景注意。他的《伤寒杂病论》多处使用以麻黄为主要成分的复方，如用桂枝和麻黄合剂的“麻黄汤”治疗外感风寒；用麻黄为主要成分的“麻杏甘石汤”壮热，治疗喘咳；并用麻黄配合白术和生姜用来消肿化瘀。[38]张仲景所谓“伤寒”并不是现代医学所说的伤寒，而是指发烧、感冒和咳嗽一类的常见病。先秦方士本来是用寒石散之类的矿物质药物来治疗伤寒，[39]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卷2明确记

载："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所以，服食麻黄当属汉代方剂不同前代的一个新特点。

麻黄是广布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野生草本植物。新疆文物考古所所长王炳华注意到4000年前的古楼兰人已经以麻黄为药物。他曾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古墓沟墓地主持发掘了47座楼兰古墓，墓主人无一例外，随身都有一包麻黄枝。这不禁使人想起马王堆汉墓女主人随葬大量的药物和药方。罗布泊是麻黄的重要产地，古楼兰人随葬麻黄枝显然和当地古代巫术有关。"麻黄这一可以缓解病痛的神奇力量，古墓沟人已有明显的感觉，所以他们赋予麻黄以特殊地位。"[40]

英国梵学家布腊夫最先注意到中国在纪元前使用的草药麻黄就是古代印度苏摩酒祭之苏摩（Soma）。[41]最近芬兰学者帕尔泊罗撰文支持其说，并认为苏摩祭祀当起源于新疆和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羡文化。他甚至认为古墓沟的古楼兰人可能是印度雅利安人之祖先。[42]麻黄还在雅利安系统的塞人当中广为使用。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前521—前486年）和薛西斯一世（前486—前465年）刻写的碑铭屡次提到中亚锡尔河北岸有崇拜麻黄（hauma = 梵语 soma）的塞人部落。[43]而汉代方士以麻黄替代五石治疗伤寒显然与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开通，西域巫术随之传入中国内地有联系。

古代印度人所谓"药"（bhaisajya）由四种成分组成，即酥、油、蜜和石蜜。[44]其中"石蜜"就是蔗糖。全世界许多语言表示"糖"的字都来自梵语 s'arkarā，如英文 sugar。所以糖的制做技术当是印度人的发明。据季羡林考证，大约公元2—3世纪东汉后期起，"西极石蜜"已经传入中国。此前中国只能生产蔗浆，即《楚辞》的"柘浆"。六朝时期，中国才学会利用蔗浆造沙糖。[45]那么，以蜜和蔗糖入药当属印度医学传统。如所周知，古代中草药方剂称"汤"或"散"，丸药在我国出现较晚。而蜜和

蔗糖是制作丸药的必不可少的原料。那么，中国制作丸药的技术无疑学自印度。张衡《七辩》有诗曰："沙饴石蜜，远国贡储。"看来，东汉的方士已经知道石蜜及其产地。那么，印度丸药制做技术最初影响到中国方术或始于东汉。

东汉方士见到的西方药物可能还包括来自罗马的一种解毒剂。东汉班固在给班超的书信中提到一种名曰"苏合香"的罗马方物，文中说"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鼻毗"。[46]美国汉学家劳费尔以为苏合香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安息香料 Storax。[47]他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即罗马）"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梁书·中天竺传》亦云："苏合是和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辗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那么，汉晋时期从罗马传入中国的苏合香应该是一种复合香料。

史载古罗马流行一种称为 Thēriaca 的解毒丸药。公元 667 年罗马教皇波多利（Pope Theodorus I）曾派人向唐高宗馈赠这种解毒药，事见《旧唐书·拂林传》。该传称此药为"底也伽"。《唐本草》及《本草纲目》卷 50 则作"底野伽"。[48]底也伽本是公元前 3 世纪初希腊科洛丰城的尼卡特使用的一种解毒药，主治各种动物咬伤而引起的中毒。后来彭多斯国王米士里达特（前 132—前 63 年）把它制成一种万能的解毒药。希腊名医盖伦、罗马的普林尼都使用过。普林尼所用配方多至 600 种，后来又增入蛇胆和鸦片。[49]

古代香料和药物并无严格的界限。前引《梁书》说苏合香"不大香"，疑此大秦方物不是香料，而是著名的罗马解毒药底也伽。底也伽含鸦片，后者在西亚又称"狮油"，其名始见于亚述文献。[50]有趣的是，西域胡人或称苏合香为"狮粪"。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 16 记载："旧说苏合香，狮子粪也。"陶宏景

(452—536年）时亦有胡商说苏合香又名“狮子粪”。公元8世纪陈藏器的《证类本草》卷12记载：“人云狮子屎是西国草本皮汁所为。胡人将来，欲人贵之，饰其名耳。”[61]由此可知，所谓狮子粪并不真是狮子的粪便，而是一种从草本植物制成的药物或香料。其名恐为西亚人对鸦片的称谓“狮油”之讹传。如果“狮油”即西域胡商所谓“狮子粪”，那么汉代苏合香或为含有鸦片成分的底也伽。需要指出的是，汉代苏合香与唐代苏合香不同。据美国汉学家谢弗考证，“到了唐代，那些以苏合香为名流行的香料，实际上只是一种用来制作香膏的马来的枞胶。”[62]同时，汉代的苏合香被易名为“狮子粪”或“底也伽”。鸦片，又名阿芙蓉，其名在中国医典中始见于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如果汉代苏合香就是底也伽，那么它将为研究鸦片入华史提供一条重要线索。

原载《学术集林》第十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收入本书时略有补充。

注　释

① 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陀与佛教故事》，《清华学报》1930年第6卷第1期；收入《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7－161页。

② 陆曼炎：《汉魏南北朝从外国传来的医药文化》，《新中医药》1955年第3期第6－7页；滨善夫丸和丸山昌朗著、承淡安译：《经络之研究》，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年；周南：《华佗应姓华名专》，《文史知识》1983年第12期第104页；边集文：《华扁名字的由来》，《中医药学报》1984年第2期第64页；何新：《盘古之谜的阐释》，《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

③ 何爱华：《驳经络学说起源于印度的说法》，《人民保健》1960年第6期；李钮贵、申明海和剧新民：《中华外科麻醉术的创始人——华佗族（国）籍的考辨》，《中华麻醉杂志》1982年第4期第245－252页；黄摆旺：《关于华佗首创刨腹产的异议质疑》，《中华医药杂志》1983年第4期第259页；马堪温：《华佗是中国医学史上的光荣》，《中医杂志》1986年第1期第54－56页；何爱华：《华佗姓名与医术来自印度吗?》，《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

第 154－158 页。

④ N. Egami, "Chinese Surgeon Hua T'o and Magi of the West," *Orient*, vol. VII, 1971；伊藤氏的考证见松木明知：《麻醉科学史研究最新見解之士》，《麻醉》1980 年第 1 期；松木明知：《駁郎氏論》，《麻醉》1982 年第 2 期。

⑤ Victor H. M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s, and English Magician," *Early China*, 15, 1990, 28－47.

⑥ 何爱华：《华佗姓名与医术来自印度吗?》，《世界历史》1988 年第 4 期第 156 页。

⑦ 李经纬：《中国古代的外科学成就》，《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年，第 462 页。

⑧ 郭晓庄等：《有毒中草药大辞典》，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2 年，第 342 页。

⑨ 郭晓庄等，前揭书，第 363 页。

⑩ 郭晓庄等，前揭书，第 363 页、第 403 页。

⑪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 8，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 720－721 页；李经纬：前揭文，第 461 页。

⑫ 有关押不芦的汉文史料最先为美国汉学家注意，见劳费尔著、冯承均译：《押不芦》，《西域南海史地译丛》，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84－109 页。

⑬ 李经纬，前揭文，第 460－461。

⑭ 劳费尔著、冯承均译：《押不芦》，《西域南海史地译丛》，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88 页。

⑮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 1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26 页。

⑯ 劳费尔，前揭文，第 86 页。

⑰ 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陀与佛教故事》，《清华学报》1930 年第 6 卷第 1 期；收入《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157—161 页。

⑱ 荻原雲來：《漢譯梵和大辭典》上，台北：新文豊出版公司，1979 年，第 7 頁。

⑲ 劳费尔，前揭文，第 101－102 页。

⑳ 吕澂认为，此经当为西晋竺法护译，说见《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济南：齐鲁书社，1981 年，第 72 页。

㉑ 此唐代抄本将此医书之名误作《瑞婆五脏论》，见熊田源次：《中央亚细亚出土医书四种》，译文见万斯年：《唐代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㉒ 参见季羡林：《五卷书》序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17页。

㉓ 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第53页。

㉔ 汤用彤：《针灸·印度古医书》，《新建设》1961年第7期；汤用彤《读一点佛书的音义》，《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0日。

㉕ 范行准：《胡方考》，《中华医学杂志》22，1930年。

㉖ 何爱华：《华佗姓名与医术来自印度吗?》，《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第158页。

㉗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书目有《黄帝四经》4篇、《黄帝铭》6篇、《黄帝君臣》10篇、《杂黄帝》58篇，小说类有《黄帝说》40篇，阴阳类有《黄帝》16篇，天文类有《黄帝杂子气》33篇，历谱类有《黄帝五家历》33卷，五行类有《黄帝阴阳》25卷、《黄帝诸子论阴阳》25卷，杂占类有《黄帝长柳梦占》11卷，医经类有《黄帝内经》18卷，经方类有《素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神农黄帝食禁》7卷，房中类有《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神仙类有《黄帝杂子步引》12卷、《黄帝岐伯按摩》10卷、《黄帝杂子芝菌》18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21卷、《黄帝杂子十五家方》22卷。

㉘ 马继兴：《中国医学独特的针灸疗法》，《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441页。

㉙ 郭晓庄等：《有毒中草药大辞典》，第403页。

㉚ 王炳华：《苏贝希古冢》，《人民画报》1993年第3期第15－17页。

㉛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76－78页；蒋忠新：《对于〈川滇缅印古道初考〉的一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

㉜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8，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720－721页。

㉝ 郭晓庄等：前揭书，第363页。此书说印度回教徒在公元前9世纪用大麻为麻醉剂显然有误，当为公元9世纪。

㉞ 王奎克：《“五石散”新考》，《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社，1978年，第80－87页。

㉟ 肉苁蓉作为房中用药，始见东汉初年《武威医简》中“白水侯方”，说见李零：《中国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30－432页。

㊱ 参见敦煌文书S. 1733号《吐蕃管辖时期破历》。这件文书将“（肉）苁蓉三升”列入波斯进口方物的名单，或表明其亦为波斯进口。关于这件文书的讨论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65页。

㊲ 李零：《中国方术考》，第308页。

㊳ 蔡景峰：《中药学的突出成就》，《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第448页。

㊴ 先秦方士用矿物质药物治疗伤寒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文中记载：“济北王病，召臣意诊脉，曰：‘风蹶胸满。’即为药酒，尽三石，病已。”又载：“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

㊵ 王炳华：《新疆古尸发掘及初步研究》，《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第86－87页。

㊶ J. Brough, “Soma and Amanita Muscaria,” *BSOAS*, 34－2, 331－362；友人徐文堪提醒我注意这篇论文及注㊷所引论文，谨致谢忱。

㊷ Asko Parpola, “The problem of the Aryans and the Soma: Textual-linguistic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e Indo-Aryans of Ancient South Asia: Language, Material Culture and Ethnicity*, ed. by G. Erdos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5.

㊸ 译文见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㊹ 荻原雲來：《漢譯梵和大辭典》下，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977頁。

㊺ 季羡林：《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654－655页。

㊻ 参见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33，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543页。

㊼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82页。

㊽ 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

97 页。

㊾ 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99页；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0－191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99页。

㊿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8，第753页。

51 此为劳费尔查出，参见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284页。

52 谢弗，前揭书，第360页。

三　法藏部在中国

法藏部是小乘佛教十八部派之一，最初活跃于印度西北乌仗那和苏喇斯特拉，后来在中亚，特别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据德国梵学家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小乘佛教四《阿含》中的《长阿含经》就是法藏部传承的佛经。[①]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曾提出，法藏部赋予佛教传统三藏两项新内容：陀罗尼和菩萨；它或许还是第一个利用陀罗尼咒术符号简化佛法的部派。[②]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重要的佛教部派一直缺乏了解。比利时佛教史权威拉摩特在他的《印度佛教史》这样写道，"法藏部的情况同样不太清楚，这是从化地部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别。没有任何碑铭提到这个部派。法藏总是作为一个专有名称，有时指人，有时指宗教。在玄奘和义净时代，有人提到乌仗那国、中亚和中国有一些小规模的法藏部组织。他们在后一个国家颇有影响，其《解脱戒》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那里的戒律。"[③]拉摩特这段文字写于 50 年代末。此后，考古新发现和中亚佛经原典的进一步解读为研究法藏部的历史积累了大批新资料。其中，不仅有记录法藏部行踪的贵霜时期的犍陀罗语碑铭，还有公元 2 至 3 世纪用犍陀罗语写的法藏部佛典残卷以及公元 6 至 7 世纪用佛教混合梵语写的法藏部佛典残卷，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个佛教部派的知识。通过对法藏部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教活动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小乘佛教如何对早期中国佛教产生影响，犍陀

罗语为什么会流行于塔里木盆地并且影响到早期汉译佛经的佛教用语等问题，从而大大深化我们对汉唐中国与中亚及印度之间进行宗教与文化艺术交流的了解。本文拟分三个题目讨论法藏部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就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犍陀罗语《法句经》题记校勘记

犍陀罗语《法句经》是1890年在我国新疆和田发现的，问世不久就流失海外，现在分别收藏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和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彼得堡分所。60年代初，剑桥大学梵文教授布腊夫将两地收藏的犍陀罗语《法句经》进行了汇校和全面研究，于1962年出版《犍陀罗语〈法句经〉》一书。[④]目前学术界对这部犍陀语佛经的研究大都基于布腊夫这本书。

1989年，我们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新疆和田发现的这部佛经应属小乘佛教法藏部经典。理由有二：其一，法藏部是古代印度西北地区流行的五个最重要的部派佛教之一，贵霜碑铭证明法藏部使用犍陀罗语作为他们的经堂用语；其二，部派佛教上座部系统的《法句经》都以《梵志品》为首；而犍陀罗语《法句经》以《梵志品》为终。这和《大方等大集经》卷2所说法藏部文献"书写读诵，颠倒解义，颠倒宣说，从倒解说覆隐法藏以覆法"的情况相同。由于当时见到的资料有限，我们仅在那篇文章中提出问题，未能就此问题展开深入讨论。[⑤]1993年，应美国国家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协会的邀请，我有机会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专门从事犍陀罗语研究。以前在国内读到的布腊夫的《犍陀罗语〈法句经〉》是弗莱堡大学冯·辛渔伯（O.v. Hinüber）教授寄赠的一本32开复印本，到美国后才知道这本书原来是16开本，书后附有巴黎和彼得堡两地所藏这部佛经残卷的全部照片。布腊夫是欧洲研究犍陀罗语的权威，他的校勘本将我们带入了犍陀罗语

研究的新时代。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布腊夫被这句中国成语不幸而言中。我们在读这部《法句经》残卷第一页照片时意外地发现这页破损的经卷的拼合有错，以致布腊夫未能正确解读这部《法句经》的题记。而这条题记恰恰涉及它的部派问题。

这部犍陀罗语佛经写在桦树皮上，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桦树皮多处破损或折断。它的题记部分第一行恰恰位于折断处，字迹被拦腰分成上下两部分。拍摄这部佛经照片的人大概不懂佉卢文，所以在拼对这行字的时候上半部和下半部拼错了位，以致布腊夫把这行字读作：budha-varmasa ṣamaṇasa budhaṇadi-sardhavayarisa ida dharma-padasa postaka dharmuyaṇe likhida arañi；英译为"This manuscript of the Dharmapada, belonging to the śramaṇa Budhavarman, pupil of Buddhanandin, has been written in the dharmodyna in the forest（这部《法句经》经卷写于阿兰若森林达摩园，属于沙门佛喜的学生佛铠）"。[6]

若把这行字按文书原貌复原（参见插图24），那么，这个题记应读作：budhavarmaṣa ṣamaṇaṣa budhaṇadi-sadha-vayariṣa ida dharmapadaṣa postaka dharmudeyemṇa likhita arañi；可英译为"This manuscript of the Dharmapada, belonging to the śramaṇa Budhavarman, pupil of Buddhanandin, has been written by Dharmaguptaka in the forest（这部《法句经》写卷由法藏在阿兰若森林写成，属于沙门佛喜的同住佛铠）"。

我们和布腊夫的主要分歧在倒数第三个字，即该字是 dharmuyaṇe（在达摩园），还是 dharmudeyemṇa（由法藏）？布腊夫曾考虑到第二种可能性，可惜他没注意到这行被拦腰折断的字拼错了位置。[7]从复原后的文书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母/mu/之后肯定还有个字母/de/，元音符号/e/实际写在/yaṃ/（布腊夫误作/ya/）上，不在/ṇa/上。我和华盛顿大学梵文教授邵瑞琪（R. Salomon）讨论过这个字，他也同意我对这个词的新读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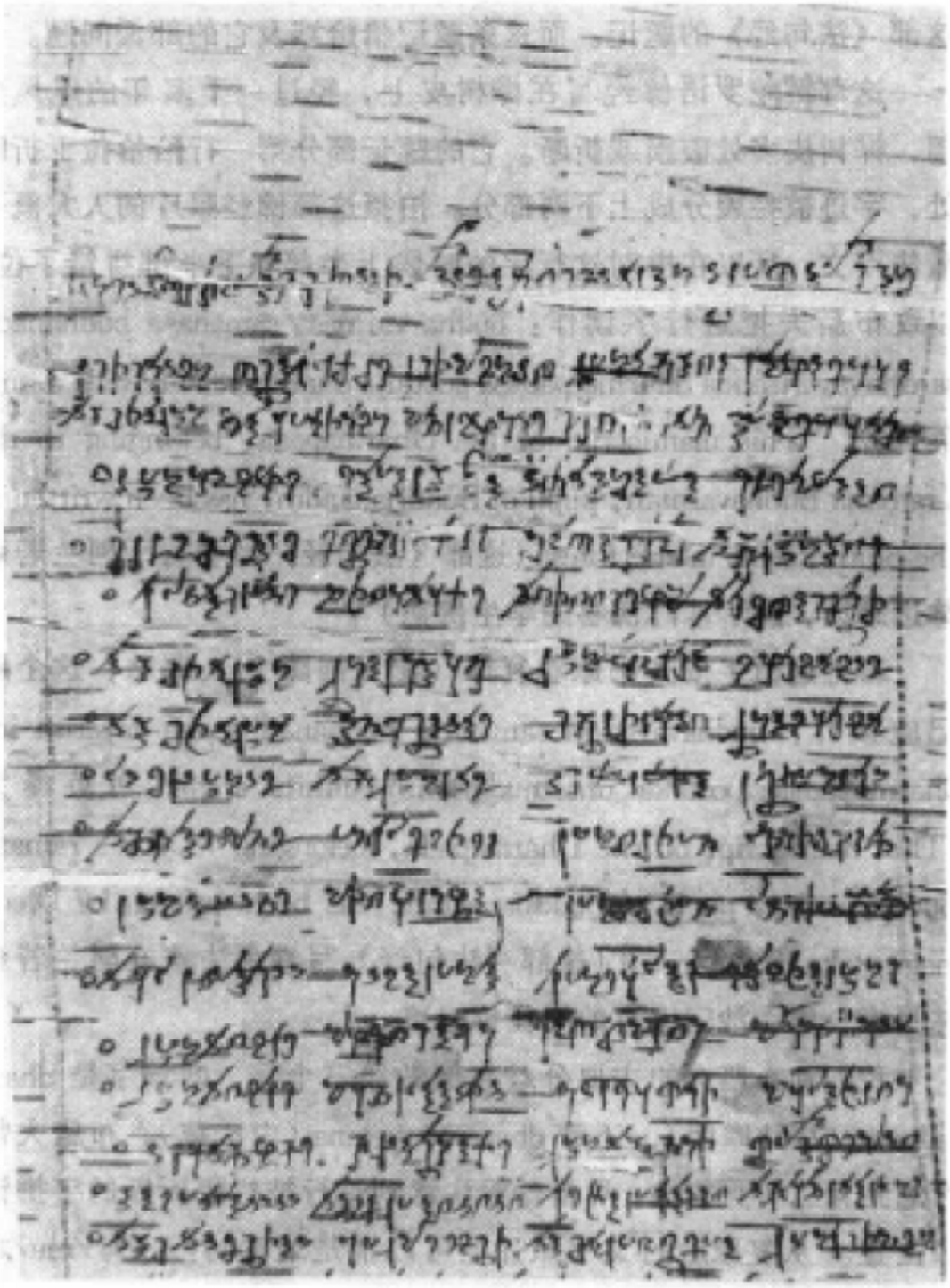


插图 24　新疆和田牛角山出土公元 2 世纪末犍陀罗语《法句经》首页

既然如此，这个字就不是达摩园了。正如布腊夫所说，“达摩园”一词在犍陀罗语中写作 dharmuyaṇa，相当于巴利语的 dharmuyyāna 和梵语的 dharmodyāna。那么，dharmudeyeṃna 是什么词呢？我们认为，该词是 dharmudeya 的单数具格形式。在犍陀罗语中名词后缀-ika 和-iya 相互通用，那么，dharmudeya 就等于 dharmudeka，相当于巴利语 dhammaguttika 或梵语的 dharmaguptaka，汉译“法藏”，或译“法密”、“昙无德”、“昙磨蒙多”和“达磨笈多”等。该词两见于贵霜碑铭：一处写作 dhaṃmagutaka-[8]；一处写作 dhama'ute（'a）[9]。我们文书中的 dharmudeya 显然是从后一形式演变而来。正如剑桥大学的贝利教授指出的，汉译佛经中“法藏”一词的音译“昙无德”即来自这个犍陀罗语词。[10]

这部《法句经》的所有者佛铠和他的老师佛喜均于史无征，但其编写者法藏则是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小乘佛教法藏部的创始人法藏。因为，《法句经》汇集的“法句”都是佛的语录，不是法藏的作品。那么，这条题记说“这部《法句经》由法藏写于阿兰若森林”显然要理解为“这部《法句经》由法藏编纂于阿兰若森林。”关于《法句经》的形成，侨居洛阳和东吴的贵霜僧人支谦在他的《法句经》经序中这样写到：

> “《法句经》别有数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是佛见事而作，非一时言，各有本末，布在众经……凡十二部经总括其要，别有四部《阿含》。至去逝后，阿难所传，卷无大小，皆称闻如是处，佛所究畅其说。是后，五部沙门各抄采经中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别为品，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11]

支谦所谓“五部沙门”指小乘佛教的五个主要的部派，它们都是从上座部分化出来的。其中包括说一切有部、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和犊子部。这五个部派都编纂了各自的三藏，如玄奘从印

度和中亚带回的佛经中有“三弥底部（即正量部，从犊子部分出）经律论一十五部，弥沙塞（即化地部）经律论二十一部，迦叶臂维部（即饮光部）经律论一十七部，法密部（即法藏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12]同时，它们还根据各自的三藏编纂了各派系独立的《法句经》。其中，说一切有部系统的《法句经》把“法句（dharmapada）”和“偈颂（udāna）”编在一起，称为“法集要颂经（udānavarga）”，并有经序说是“尊者法救集”。[13]其他四个部派的《法句经》均不知何人所编。如果我们对犍陀罗语《法句经》题记的重新释读是正确的，那么，它首次披露出法藏部《法句经》是其部主法藏亲自编辑的。

《法句经》属于法藏部十二部《杂藏》的第九部。[14]据日本学者中村元调查，其中，前七部杂藏属于法藏部十二部经中的后七部经，后五部杂藏分别抄自《义足经》（suttanipita）内的五品。[15]犍陀罗语《法句经》的背面有一些后来抄在上面的偈颂（见第343—344颂），据布腊夫研究，其中一部分属于《义足经》的第324颂。因此，这些诗颂有可能抄自法藏部《杂藏》中的后五部杂藏。

二、小乘佛教法藏部寻踪

佛教在其发源地是用当地语言摩揭陀语俗语传教，因此，佛经和戒律最初是用摩揭陀语传承的。据列维、吕德斯和季羡林研究，原始佛教语言很可能是半摩揭陀语方言。[16]随着佛教在印度各地的传播，仅用摩揭陀语或半摩揭陀语作为佛教经堂用语是行不通的，所以，佛弟子必然要改用他们所到之地的当地语言传教。印度各地和中亚发现的阿育王碑铭就是用不同文字刻写的。例如：印度内地使用婆罗谜文拼写印度各地方言，犍陀罗使用佉

卢文拼写犍陀罗语，迦毕试和大夏使用阿拉美文拼写印度俗语或希腊文拼写希腊语。[17]另一方面，在印度和中亚各地传教的佛弟子对佛典的理解不尽相同，从而导致佛教僧团的分裂。据说，阿育王时期，佛教已经分裂为大众部和上座部两个教派。随着佛教在印度各地和中亚的发展，上座部进一步分裂，分化出说一切有部、法藏部、饮光部、化地部和犊子部等。势力强大的部派都编纂了独立于其他派系的三藏。除了律藏各不相同外，它们的经藏也各有传统，据瓦尔特施密特研究，《中阿含经》和《杂阿含经》属于说一切有部、《长阿含经》属于法藏部、《增一阿含经》则属于大众部传统。[18]此外，在佛典梵文化之前，各教派的经堂用语也不一样。据西藏佛教史家布顿 1322 年写的《善逝教法史》介绍，大众部使用印度俗语传教，而说一切有部把梵语作为经堂用语。[19]布顿的说法可信，因为在西藏那果尔（Ngor）寺发现的大众部系统超世部（Lokottaravādin）的《法句经》正是用古僧伽罗文拼写的印度俗语，[20]而新疆库车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说一切有部佛经残卷都是婆罗谜文梵语或佛教混合梵语。布顿关于部派佛教经堂用语的介绍非常简略，没有进一步说明其他部派用什么语言传教。不过，中亚发现的佛教混合梵语和犍陀罗语佛经和戒律的研究表明，法藏部系统的三藏最初使用犍陀罗语，后来又改用基于犍陀罗语俗语的混合梵语。所以，犍陀罗显然是法藏部的一个重要传播中心。

法藏部流行于犍陀罗的第一个证据是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发现的一个按古塞克纪年的佉卢文碑铭。此碑发现于贾姆拉伽尔希（Jamalgarhi）村，故名贾姆拉迦尔希碑铭。1929 年，挪威语言学家柯诺将此碑铭著录于《阿育王碑之外的佉卢文碑铭集》一书，可惜他未能释出碑铭中提到的“法藏部”一词。[21]1940 年，柏林大学梵文教授吕德斯发现柯诺对此碑铭的佉卢文转写有误，按照吕德斯的读法，碑文如下：1. sam 1 1 1 100 20 20 10 4 4 1 a

s'pa'i ['u] sa padhammammi sava'ena poda['ena sa] ha'ehi pida [pu] [trehi *] / 2. [u] dili'akehi i [s']e rañe prethavide dhama'úte['ana] parigrahe sarvasa[pana *];[29]意为："兹于 359 年马轭月 1 日（275 年 8 月 24 日），弟子婆达耶和同伴、父亲、儿子以及 Udaliaka 等人在阿兰若森林共建此寺。法藏部受持，一切有情……"

法藏部在犍陀罗流行的第二个证据就是新疆和田所出犍陀罗语《法句经》。尽管这部抄在桦树皮上的佛经发现于新疆和田，但它并不是在于阗抄写的。这是因为：第一，于阗不产桦树，也没有在桦树皮上书写文书的传统；第二，犍陀罗语《法句经》使用的佉卢文字母和塔里木盆地流行的佉卢文不一样，如用字母/na/表示/na/等，这是犍陀罗地区流行的贵霜佉卢文的特点。因此，法国梵学家福斯曼近年提出，这部犍陀罗语佛经是在犍陀罗本土写成的。[30]从字体判断，犍陀罗语《法句经》带有晚期贵霜佉卢文字母特点，如普遍用/sa/表示/sa/，那么，这部佛经大约在公元 2 世纪晚期抄于犍陀罗某地。

公元 2 世纪，在贵霜王伽腻色迦的大力支持下，佛教在中亚广为传播。法藏部也从犍陀罗向北发展，传至大夏南境。1844 年，阿富汗贾拉拉巴德附近一个佛教寺院遗址出土过写在桦树皮上的犍陀罗语佛经残片，但发现时已残碎过甚，内容不得其详。[31]本世纪 70 年代初，阿富汗考古学家沙瓦尔那施尔汗在大夏南境（今阿富汗的昆都尔）一个寺院遗址发现了和法藏部相关的犍陀罗语碑铭。1974 年，法国梵学家福斯曼将此碑铭解读。据他研究，这个碑铭的最后一行读作：acariyanarna dhammagutakana parigrahe savasatvanarna h[i]tasukhaya;[32]意为："法藏部法师受持，一切有情安居乐业。"

以上材料表明，公元 2 至 3 世纪，法藏部盛行于犍陀罗和大夏南境。玄奘和义净曾在乌仗那国寻访到一些小乘教寺院，其中

包括法藏部寺，玄奘称之为“法密部”，义净称之为“法护部”。玄奘还从那里带回了法密部系统的三藏42部。[26]由此可知，法藏部在犍陀罗北方小国乌仗那一直维持到公元7世纪。

几乎在法藏部传入大夏的同时，这个佛教部派又向东发展，沿丝绸之路南道传入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尽管某些佛教传说认为阿育王时期佛教已传入于阗，但两汉中国使者和驻扎西域的中原屯边戍卒都没有见到当时于阗有佛教流行。佛教传入于阗大概在汉灵帝年间（175年）东汉官兵退出西域之后，相当于贵霜王胡毗色伽统治中亚时期。牟子《理惑论》提到于阗，所以汤用彤认为，于阗大概在汉末成为佛教重镇。[27]于阗最初流行小乘佛教和犍陀罗语的历史现在已被4种犍陀罗语收集品所证实。它们是：

1．于阗牛角山所出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

2．于阗邻邦楼兰国安迪尔古城所出按照于阗王统纪年的661号佉卢文书

3．于阗各地出土贵霜钱币和汉佉二体钱

4．和田策勒县北部沙漠卡达里克遗址所出佉卢文佛经残卷

1890年，当法国杜特雷依·德兰斯（J.L. Dutreul de Rhins）探险队从和田觅宝人手中征购到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时，他们被告知，这部佛经出自于阗著名的佛教圣地牛角山。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根据这个探险队的成员格瑞纳（M. Grenard）提供的线索到牛角山实地考察过，但他没有找到任何这部佛经出自牛角山的证据，甚至没有在这里发现任何佛教寺院遗址。[28]这是因为11世纪后，牛角山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佛教建筑被破坏无遗。所以，这部佛经抄本究竟出自于阗何地，可能要永远成为悬案。不过，这个问题的研究近年有一点转机。1990年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和田地区文物管理所组成的文物普查队在牛角山石洞西北的戈壁滩上发现一佛教寺院遗址。据调查，该遗址南北

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100米，地表遍布红陶片、炼渣以及颇具犍陀罗艺术风格的莲花瓣纹石膏饰件残片。[29]如果犍陀罗语《法句经》真的出自牛角山，那么，它有可能出自牛角山这个目前仅存的佛寺遗址。

除牛角山外，于阗另一个佛教遗址也发现了写在桦树皮上的佉卢文佛经残片。1924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斯克林在和田克里雅河考察时，当地一个叫阿巴斯汗的英国侨民送给他一批文物。其中包括佉卢文佛经残片、和米兰壁画类似的壁画残片以及佛教泥塑等。据说，它们出自策勒县北部沙漠遗址卡达里克（Khadaliq）北边的一个佛塔。这批文物现藏大英博物馆人类学部。[30]可惜这批重要的犍陀罗语佛经残片至今无人研究。无论如何，它们再次证明于阗佛教的最早的经堂用语是犍陀罗语。

公元3世纪以后，于阗成为中国大乘佛教的一个传播中心。但是，在此之前，小乘佛教曾在此地居统治地位。《出三藏记集》卷13记载，曹魏甘露五年（260年），朱士行到于阗寻得大乘佛典《般若经》，他让弟子把于阗所得佛经送回洛阳。但是，“未发之间，于阗小乘学众，遂以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所谓“婆罗门书”当指婆罗谜文书写的梵语《般若经》，那么，当时在于阗居统治地位的小乘佛教的“正典”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呢？显然是佉卢文犍陀罗语。《出三藏记集》中这段有关于阗早期佛教的记载失于简略，只提到当时于阗流行小乘佛教，未说明它属于什么教派。犍陀罗语《法句经》的发现与研究告诉我们，于阗当时流行小乘佛教法藏部。

公元3世纪以后，小乘佛教法藏部在于阗的统治地位被紧随其后传入塔里木盆地的大乘佛教所取代，而塔里木盆地西部的疏勒、北部的龟兹和焉耆则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天下。于是，塔里木盆地东部的鄯善王国成了法藏部的栖身之地。公元4世纪

末访问鄯善的法显只提到当地流行小乘佛教，没有具体说明鄯善的小乘佛教属于什么部派。尼雅遗址所出犍陀罗语佛教文献告诉我们，鄯善主要流行小乘佛教法藏部。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在鄯善国西境尼雅遗址发掘出数以百计的佉卢文书，其中一件文书抄有几句佛教诗颂，斯坦因将其编为510号佉卢文书。1927年，波叶尔等欧洲语言学家在《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书集》一书卷2中刊布了这件犍陀罗语佛教文献，但他们未能鉴定出这些诗颂抄自哪部佛教文献，仅在巴利语《法句经》中找到五句类似的诗文抄入510号文书的校勘记。[39]佛教诗文的鉴定难度较大，因为佛教经卷浩如烟海，确认一件佛经残片，如同大海捞针。英国梵学家巴罗翻译尼雅佉卢文书时也未发现510号文书的佛教诗颂究竟属于哪部佛经，所以，他的《中国突厥斯坦所出佉卢文书译文集》没有收录这件文书。60年代初，汉堡大学梵文教授伯恩哈德终于发现这些诗颂书抄自小乘佛教法藏部的《解脱戒本》，可惜他不幸因车祸死在尼泊尔穆斯唐，未及校订这件文书上的犍陀罗语戒本诗文。最近我重新校勘了这件文书，并和汉译本作了比较研究，将另拟专文讨论，兹不赘述。为便于下面的讨论，这里把我们的汉译抄录于下：

1.（毗婆尸）："忍是最高的苦行，最好的忍是涅槃；"诸佛说："出家人绝不伤害他人，沙门远离杀界。"／2. 尸弃："就象明眼人脱离危险到达智慧的彼岸一样，智者能避免人世上任何罪恶。"／3.（毗叶罗）："不诋毁别人，尊敬别人，不嫉妒别人，按照解脱戒守戒如下：饮食要知道节制，住房和座位要选隐蔽之处，专心致致达到脱凡超俗的心境。这是诸佛的教诲。"／4. 阿罗汉、苦行者和导师拘楼孙："就象蜜蜂采蜜，从花上飞过，不伤害花香花色。所以，圣贤路过乡村时，既不挑剔别人，也不管别人做什么不做什么，他只应注意自己的行为正确与否。"／5.

佛陀拘那含牟尼："对于圣贤来说，他不沉迷于超凡脱俗，而是遵循圣人的旨意。所以，救世主们总是幸福的，有德的人能入静，然后进入涅槃的境界。"／6.（迦叶）："别犯任何罪恶，要严格守戒，净化心灵。这是诸佛的教诲。"／7. ……佛陀、耆那、（释迦牟尼）；……／8. ……在人世上，他能避免罪恶……

据《长阿含经》卷1，释迦牟尼成佛前世上已有六佛，他们是毗婆尸、尸弃、毗舍婆（或译"毗叶罗"）、拘楼孙、拘那含（或译"羯那迦"）和迦叶，加上释迦牟尼，通称"过去七佛"。510号文书上的诗颂即过去七佛的语录，只是释迦牟尼说的那段话已漫漶不清。正如伯恩哈德指出的，"尼雅所出佉卢文书510号残卷系《解脱戒本》法藏部本的最后几颂"。[32]法藏部《解脱戒本》现存两种版本，混和梵语本和汉译本。前者仅存残片，没有我们文书的这部分内容，只有汉译本完好地保存了这部分内容，见《四分比丘戒本》和《四分比丘尼戒本》。[33]佛教三藏中律部文献是划分佛教部派的重要依据，所以，这些抄自法藏部《解脱戒本》原典的诗颂再次证明法藏部的经堂用语是犍陀罗语。

斯坦因在尼雅还发现了一件和法藏部《解脱戒本》有关的木牍残片，编号为512号。这是一件抄有佛教咒术符号的木牍文书。1929年，波叶尔等人发表这件文书时未能鉴定出该文书的内容。1950年，英国语言学家托马斯首次指出，这件文书写的是所谓佛教神秘字母Arapacana符号。后来，挪威语言学家柯诺根据于阗文《赞巴斯塔书》中的Arapacana符号使用塞语字母ysa，提出这套佛教神秘字母大概来自中亚塞人。1990年，美国梵学家邵瑞琪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发表了他对Arapacana字母的进一步研究，终于揭开了这套字母的来源之谜。他在犍陀罗地区出土的贵霜时期佛教石板浮雕上找到三处刻有Arapacana符号的铭文，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Arapacana符号。他还根据这套符号所用字母的发音系统，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套神秘字母

实际起源于犍陀罗语。[34]另据列维和托马斯调查，这套字母还见于小乘佛教的律部文献《昙无德戒本》和《根本说一切有部律》。[35]我们知道，说一切有部的经堂用语是梵语，那么，说一切有部律中的这套字母显然借自以犍陀罗语为经堂用语的法藏部律部文献。那么尼雅遗址发现的这件写有 Arapacana 字母的佉卢文木牍当抄自法藏部《解脱戒本》。

既然法藏部用犍陀罗语传教，那么，洛阳汉魏故城发现的犍陀罗语佛教碑铭，则提醒我们注意法藏部在东汉洛阳的行踪。这件佛教碑铭刻在一个井阑上，1924 年被北京大学马衡教授征购回北大。此碑发现时已断为三段，现在分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大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参见彩版 5）。起初，法国神甫步履仁将它误认为是希伯莱文碑铭。后来，英国语言学家亨宁发现碑上的文字应是佉卢文，并转告英国犍陀罗专家布腊夫。1961 年，布腊夫撰文解读了这块佛教碑铭。他根据碑上佉卢文字体类型，将其年代断为公元 2 世纪末至 3 世纪初。[36]我们在近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进一步讨论了这块犍陀罗语碑铭出现于东汉洛阳的历史背景，认为它可能和《出三藏记集·支谦传》所说数百贵霜大月支人于东汉灵帝年间流寓洛阳有关。[37]就在这个时期，一系列法藏部佛经传本在洛阳译成汉语。《高僧传初集》卷 1《支娄迦谶传》载：

> “有沙门支曜、康巨、康孟祥等并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洛……孟祥译《中本起》、《修行本起》。”

这两部东汉译经都是法藏部传本，因为，只有法藏部才把佛本生故事称为“本起经”，译自梵语 carita，或译“本行经”。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 60 载：“或问曰：当何名此经？答曰：摩诃僧祇师名为《大事》，萨婆多师名此经为《大庄严》，迦叶维师《佛生因缘》，昙无德师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尼沙寒（塞）师名为《毗尼藏根本》。”据我们初步调查，东汉译佛经中

的法藏部传本还有：安息僧人安世高译《人本欲生经》1卷、《十报经》2卷、《普法义经》1卷和《义决律》1卷；月支僧人支娄迦谶译《阿闍世王经》2卷，这些译经都出自法藏部传承的《长阿含经》。三国时期，月支僧人支谦译出《太子瑞应本起经》2卷和《大般泥涅经》2卷；安息僧人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1卷，进一步介绍了法藏部三藏。

公元5世纪初，法藏部的三藏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内地。中心人物是罽宾沙门佛陀耶舍，他于后秦弘始十四年至十五年（412—413年）在长安译出《长阿含经》22卷、《四分律》60卷和《四分僧戒本》1卷。汉魏史籍中"罽宾"的地理概念相当广泛，不单指玄奘的"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地区），还包括犍陀罗。瓦尔特施密特注意到，佛陀耶舍所译《长阿含经》的佛教词汇明显掺杂有印度西北俗语（即犍陀罗语）因素，所以，他推测，佛陀耶舍所译法藏部传本的佛经大概译自犍陀罗语。[38]

中亚贵霜王朝虽然用武力征服了印度，但其统治阶层却逐渐被印度雅利安文化所征服。这从贵霜王伽腻色迦以梵学大师马鸣、世友和法救为师，贵霜末代君主用印度名字波调（Vasudeva）取名，均可清楚地看到。受统治阶层文化的影响，贵霜境内流行的部派佛教也开始印度化，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使用婆罗谜文以及佛典的梵语化。在贵霜人的根据地大夏境内至少六个地方的寺院遗址发现了贵霜时期的婆罗谜文佛教碑铭；[39]勒柯克第三次来中亚考察期间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的所谓"写本洞"还发现了用公元2世纪贵霜婆罗谜文字母抄写的马鸣的梵语剧本。[40]

公元4世纪，在摩揭陀崛起的笈多王朝重新统一全印度，佛教的中心又回到它的故乡摩揭陀。这时佛教已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宗教，所以，佛教徒纷纷摒弃俗语，采用印度贵族语言梵语。同时，也由于当时全印度出现广泛使用梵语的浪潮，人们把梵语视为学术语言及通用语，以取代原来印度各地流行的各种俗语。在

这一形势下，佛教徒力图用梵语来改写原来的俗语佛典。

这股佛典梵语化的浪潮自然要波及以犍陀罗语为经堂用语的法藏部僧团。公元399年，法显在鄯善见到“其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法显所说的当时鄯善宗教界所用“天竺书、天竺语”为鄯善以西诸国出家人都在学习的一种印度语言文字。这种语言文字大概不是佉卢文犍陀罗语，而是婆罗谜文梵语。玄奘从乌仗那国带回的40多部法藏部经典大概都是婆罗谜文梵语三藏。而法藏部放弃犍陀罗语，改用梵语大概就是从法显时代开始的。我们注意到，尼雅佉卢文书中有用佉卢文字母拼写的梵语文学作品《摩诃婆罗多》残片（523号），[41]大约14件佉卢文书的行间或背面写有婆罗谜文字母。斯坦因在米兰两个寺院内发现了笈多体婆罗谜文字材料，其中包括梵语作品《工艺论》（śilpa-śastra）残片；黄文弼在鄯善都城扜泥城附近的一个寺院遗址也发掘出笈多体婆罗谜文贝叶经残片。据邵瑞琪和德国梵学家哈特曼等人研究，其中有赞佛乘派诗人《一百五十赞颂》的作者摩特尔吉陀（Mātṛceṭa）的作品以及小乘佛教论部著作《阿毗达磨》（Abhidarma）残卷。[42]此外，斯坦因在楼兰LM.II遗址发现过婆罗谜文书，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在且末和瓦什峡发现过写有婆罗谜文的陶片。[43]鄯善法藏部僧团使用梵语的趋势从4世纪末鄯善王室使用休密驮（梵语sumitra）、素延耆（suyamaka）这样一些典型的梵语名称也可以清楚地见到。若不是鄯善王国过早地于5世纪末消亡，鄯善的犍陀罗语佛典可能要象于阗和龟兹一样，最终被梵语佛典和婆罗谜文拼写的当地语言的译经取代。这个历史过程在鄯善本地发现的文物中表现得不十分清楚，但是，这个变化可以从鄯善亡国后，移居吐鲁番盆地的鄯善移民的遗存中得以验证。

三、法藏部在中国的最后居地

公元5世纪末，鄯善被北方突厥系游牧人彻底击败。当时，南齐使者江景玄正途经此地。他见到："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丁零僭称天子，劳接景玄使，反命。"[49]然而，法藏部并没有随鄯善国的灭亡而在中国绝迹。它随着逃亡到高昌等地的鄯善移民传入吐鲁番盆地。

早在5世纪中叶，鄯善已经开始向吐鲁番移民。《魏书·西域传》记载："真君三年（442年），鄯善王比龙避沮渠安周之难，率国人之半奔且末。"《魏书·鄯善传》和《宋书·索虏传》又说，鄯善王比龙流亡且末时，其世子没有随父西去，他率其余4000余家鄯善人归降了沮渠安周。公元443年，安周到高昌继承北凉王位，依附于他的部分鄯善人又随安周移居高昌和伊吾。《旧唐书·地理志》伊吾（今哈密）下云："后魏、后周鄯善戎居之，隋始于汉伊吾屯城之东筑城为伊吾郡，隋末为戎所居。"同书纳职县又云："贞观四年（640年）于鄯善胡所筑之城置纳职县。"伊吾即今哈密，纳职即今鄯善（维语称"拉布楚克"）。凡此表明，鄯善人自公元5世纪开始向其北方吐鲁番和哈密盆地大规模移民。正如伯希和、冯承均等人指出的，"纳职"一名来自鄯善河（即若羌县车尔臣河）流域弩支城之名。由于鄯善人不断向高昌地区移民，以致吐鲁番及附近地区出现许多原来鄯善国的城镇名称。[49]类似的例子还有唐北庭地区的蒲昌县。《元和郡县志》卷40载："蒲昌县，中下。西南至州（指高昌）一百八十里。贞观十四年置。本名金蒲城，车师后王庭也。"蒲昌本为鄯善境内一湖泊名称，用这个名字给原车师国王庭易名显然和鄯善人移居此地有关。鄯善人向上述地区移民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唐初。敦煌写本《沙州伊州地志》载：

"纳职县，下。东去州一百二十里……右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

鄯善人移居吐鲁番盆地的史实亦为考古方面的材料证实。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所出唐代汉文文书中就记录了许多鄯善人的名字。汉文史籍中西域人或以国为姓，如康国的粟特人姓"康"，车师国的高昌人姓"车"，鄯善国的楼兰人姓"鄯"或"善"。例如：《高昌谦佑等名籍》的"善护"、"善庆"，《高昌善舒等名籍》的"善舒"、"善好"，《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租酒帐》的"善愿"，《高昌西南坊作人名籍一》的"善熹"，[46]不胜枚举。

1931年，洛阳城东30里天皇岭出土了一方鄯善人的墓志。其铭曰："大魏正始二年（505年）岁次乙酉十一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前部王故车伯生息妻鄯月光墓铭。"[47]由于志文简略，这位和车师王室联姻的鄯善女子的身世不可详知，不过从5世纪以来鄯善人不断向吐鲁番移民这一历史背景看，她有可能是侨居车师的鄯善移民之女，后来才随车师王子车伯生移居洛阳。

日本大谷考察队曾在吐鲁番北部吐峪沟发现过一些佉卢文简牍。它们和楼兰及尼雅出土的佉卢文书几乎完全相同，内容是一些契约和经济文书。[48]如果它们真是吐峪沟发现的，那么，这些文书很可能是从塔里木盆地东部移居吐鲁番的鄯善人的遗物。

1965和1968年，德国梵学家瓦尔特施密特在勒柯克吐鲁番收集品中，意外发现了两件用婆罗谜文混合梵语写的法藏部文献残片。第一件是用早期突厥斯坦类型的婆罗谜文抄写的《昙无德戒本》残片，大约抄写于5至6世纪。其语言明显掺杂了大量俗语成分，据他分析，这些俗语因素来自古代印度西北俗语，亦即犍陀罗语。第二件是用北突厥斯坦类型的婆罗谜文抄写的法藏部《大般涅般经》残片，大约抄于7或8世纪。这件混合梵语佛经

的梵文化程度比第一件要高得多，但仍保留了犍陀罗语成分。[49]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法藏部文献的残片都是用所谓“突厥斯坦类型”的婆罗谜文抄写的，所以，它们不是印度传本，而是吐鲁番当地法藏部僧团的法师根据犍陀罗语传本译写的。联系都善人于5至7世纪大规模移居吐鲁番的历史，这个僧团大概就是原以都善为中心的法藏部僧团。勒柯克在吐峪沟还发现了抄在印度Pothī式写本上的法藏部律部文献的汉译本残片。据考证，其内容包括佛陀耶舍所译《四分僧戒本》。[50]这些法藏部梵语传本和汉译本表明，随着都善人大批入居吐鲁番盆地，这里成为中世纪中国法藏部传播的一个新的中心。

限于资料公布情况和学识，本文对法藏部在中国的调查仍然是十分初步的。据我所知，勒柯克和伯希和在塔里木盆地北部图木舒克佛寺遗址、克孜尔千佛洞、苏巴什和吐鲁番的吐峪沟发现了相当多的佉卢文书和题记，现藏巴黎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和柏林普鲁士文化图书馆。1993年，我在西雅图访问期间，邵瑞琪教授向我出示过一件伯希和收集品中的佉卢文梵语佛经残片的照片，它写在桦树皮上，文字类型和尼雅佉卢文书属于同一时期。柏林普鲁士文化图书馆给我和邵瑞琪寄来了库车和吐鲁番所出佉卢文书和题记的照片。这些佉卢文书和题记使用的文字和我们以前见到的佉卢文不一样。其年代大多在5至6世纪，有些甚至晚至7世纪。据我们初步研究，它们是用佉卢文拼写的吐火罗语文书。其中部分文书是佛经。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介绍说：“有部所分，一、法护（即法藏），二、化地，三、迦摄卑；此并不行五天，唯乌长那国及龟兹、于阗杂有行者。”也就是说，义净时代，法藏部等小乘佛教虽然在印度本土绝迹，但它们仍活跃在犍陀罗北方的乌长那国，塔里木盆地的于阗和龟兹。那么，龟兹和吐鲁番发现的这些佉卢文吐火罗语佛经是否和法藏部有关呢？这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将随着这批文书的解读而得到最后答

案。

原载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三），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

注 释

① E. Waldschmidt, "Central Asian Sūtra Fragm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Agāmes," *The Language of the Ealiest Buddhist Tradition*, ed. by H. Bech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1980, 136－137.

② P. Demiéville, *L'origine des sectes bouddhiques*, Paris, 1957, 60－61.

③ É.Lamotte, *Histore du Bouddhisme Indien*, Louvain: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1958; reprint, 1967, 582; for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É. Lamott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trans. by S. Webb-Boin, Louvain-la-Neuvez: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88, 527.

④ J.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⑤ 林梅村：《犍陀罗语<法句经>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53－262页；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⑥ Cf. note 4, 1, 119 and pl. I.

⑦ Cf. note 4, 44, note 3.

⑧ G. Fussman, "Documents Épigraphiques kouchans", *BÉFEO*, LXI, 1974, 58－61.

⑨ H. Lüders, "Zu und aus den Kharosṭhī Urkunden," *AO*, 18, 1940, 17.

⑩ H. W. Bailey, "Gāndhārī" *BSOAS*, XI, 1946, 790.

⑪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第210号，第566页。

⑫ 孙毓棠和谢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1页。

⑬ 参见宋天息灾译：《法集要颂经·经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第213号。

⑭ 参见《四分律》卷54，《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2/1428，第986页。

⑮ Kogen Mizuno, "Dharmapadas of Various Buddhist Schools," *Studies in Pali and Buddhism*, ed. by A.K. Narain et al,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9, 259－260.

⑯ 参见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⑰ F.R. Allchin and K.R. Norman, "Guide to the Aśokan Inscriptions,"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1, 1985, 43－50.

⑱ 参见注①。按照传统的说法，各部派都有四《阿含经》，但现存佛典的原本和译本中仅见到说一切有部的《杂阿含经》和《中阿含经》、法藏部的《中阿含经》以及大众部的《增一阿含经》，所以，瓦尔特施密特有此看法。

⑲ 参见 Akira Yuyama, "Bu-ston on the Languages used by Indian Buddhists at the Schismatic Period," *The Language of the Ealiest Buddhist Tradition*, ed. by H. Bech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1980, 173－181；布顿著、郭和卿译：《佛教史大宝藏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16页。

⑳ M. Cone: "Patna Dharmapada," *JPTS* XIII, 1989, 101－217.

㉑ S. Konow,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Aśoka Inscription*,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Central Publication Branch, 1929, 110－113.

㉒ H. Lüders, "Zu und aus den Kharoṣṭhī Urkunden," *Acta Orientalia*, 18, 1940, 17.

㉓ G. Fussman, "Gāndhārī écrite Gāndhārī, parlée," *Dialectes dans les Littératures Indo-Aryennes*, Publications de L' Institut de Civilisation Indienne, Serie in－8, Fascicule 55, Paris: College de France Institut de Civilisation Indienne, 1989.

㉔ H. H. Wilson, *Arian Antiqua*, London, 1845, 52－53, Pl. III, fig. 11.

㉕ G. Fussman, "Documents Épigraphques kouchans," BEFEO, LXI, 1974, 58－61.

㉖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0页；孙毓棠和谢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127页。

㉗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6页。

㉘ M.A. Stein, Ancient Khotan, vol. 1, Oxford, 1907, 185.

㉙ 李吟屏：《于阗牛角山新考》，《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61－64页。

㉚ C.P. Skrine, *Chinese Central Asia, An Account of Travels in Northern Kashmir and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Methuen, 1926, 115 and 170－171.

㉛ A.M. Boyer et al,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

nese Turkestan, Part I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7, 184－185.

㉜ F. Bernhard, "Gāndhārī and Buddhist Mission in Central Asia," *Añjali, Felicitation Volume presented to O.H. de Alwis Wijesekera*, ed. by J. Tilakasiri, Peradeniya, 1970, 55－62.

㉝ 《四分比丘戒本》亦称《四分僧戒本》或《昙无德戒本》，是鸠摩罗什的老师佛陀耶舍于后秦弘始十年至十五年间（408—413年）在长安译出的；《四分比丘尼戒本》又称《尼波罗提木叉戒本》，是佛陀耶舍与竺佛念于后秦弘始七年（405年）在长安合译的。

㉞ R. Salomon, "New Evidence for a Gāndhārī Origin of the Arapacana Syllabary," *JAOS*, 110. 2, 1990, 255－272.

㉟ S. Lévi, "Sur la récitation primitive des textes bouddhiques," *JAII*, 1915, p. 440; F. W. Thomas, "A Kharoṣṭhī Document and the Arapacana Alphabet," *Miscellanea Academica Berolinensia: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zur Feier des 250-jährigen Bestehens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II/2, Berlin: Akademie－Velag, 1950, 199.

㊱ J. Brough, "A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from China," *BSOAS*, XXIV－3, 1961, 518－530, Pl. I and fig. 1－3.

㊲ 林梅村：《洛阳所出东汉佉卢文井阑题记——兼论东汉洛阳的僧团与佛教》，《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第240－249页；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

㊳ E. Waldschmidt, "Bruchstäcke buddhistischer Sūtras aus dem zentral－asiatischen Sanskrit-Kanon," *Königlich Preußische Turfan-Expeditionen. Kleinere Sanskrit-Texte*, Heft IV, Leipzig, 1932.

㊴ G. Djelani Davary, "A List of the Inscription of the Pre-Islamic Preiod from Afghanistan," *EW*, 1978, 11－22.

㊵ H. Lüders, "Das Śāriputraprakaṇa, ein Drama des Aśvaghoṣa," *SBA*, 1911, 388.

㊶ A.M. Boyer et al.,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Pert II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9, 295.

㊷ R. Salomon and C. Cox, "Two New Fragments of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JIABS*, vol. II. 1, 1984, 141－153; J. －U. Hartmann, "Neue Aśvaghoṣa － und Matrce－ Fragmente aus Ostturkistan,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1988, 72.

㊸ F.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 Stockholm: Bokfü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1939, Pl. 36－37.

㊹ 参见《南齐书·芮芮虏传》。

㊺ 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3－35页。

㊻ 唐长儒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8、49、54和136页。

㊼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2页；李健超：《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西北历史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50－51页。

㊽ 井ノ口泰淳：《大谷探険隊搜集中央アジア出土佛典資料目録》，京都：龍谷大学，1988年，第39頁。

㊾ E. Waldschmidt, "Central Asian Sūtra Fragm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Agames," *The Language of the Ealiest Buddhist Tradition*, ed. by H. Bech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1980, 164－169.

㊿ F. Weller, "Über den aufbau des Pāṭikasuttanta," *AM*, V, 1928－1930, 180.

四　从突骑施钱看唐代汉文化的西传

突骑施原系突厥十姓部落之一，散居伊犁河流域。显庆三年(658年)，唐朝在中亚广设羁縻都督府州，于突骑施部落设置过堰鹿州和洁山两个都督府。乾陵六十四蕃臣石像群中有其首领“右威卫将军兼洁山都督突骑施傍勒”像[1]。

公元7世纪末，西突厥可汗不为诸部所服，呈现十姓无主的混乱局面。突骑施酋长乌质勒借机起兵，驱逐唐廷册立的阿史那斛瑟罗，控制了西突厥大部分领地。开元六年（718年），突骑施可汗苏禄又南下楚河流域，攻陷唐朝控制中亚七河流域的重镇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西北的阿克贝西姆古城），正式建立以碎叶为大牙，以弓月（今新疆霍城县阿力麻里古城）为小牙的突骑施汗国。当时，大食军队正不断向中亚发动进攻。唐朝为利用西突厥诸部抵御大食东侵，答应了苏禄的请求，承认其政权并册封他为新的十姓可汗，而突骑施也继续称臣于唐。

现代史家分析，突骑施的兴起客观上成为唐在西方的军事屏障，避免了唐军与大食军队的直接对抗，对扼止大食东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

然而，苏禄死后，突骑施内部因争夺汗位发生严重对立，莫贺达干和都摩支两大部落相互攻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太宗应莫贺达干的请求派兵平息了突骑施的内乱。自此，西突厥十姓部落纷纷要求内属唐廷，突骑施汗国遂亡。

自苏禄定都碎叶至唐军平息突骑施内乱，突骑施汗国二世而亡，仅存在22年。然而，突骑施人却在这短短的20余年内建立了自己的货币体系。突骑施钱模仿唐开元通宝，为方孔圆钱，铭文是粟特文，可谓唐代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一、发现与研究

突骑施钱颇为罕见，中国古代钱志曾有著录（参见插图25）。1953—1954年，苏联考古学家在突骑施王庭碎叶城仅发掘到57枚这种钱币[3]。在此前后，碎叶、怛罗斯、江布尔和喷赤干等地曾陆续收集到39枚，著录于苏联粟特语专家斯米尔诺娃（I.O. Simirnova）1981年出版的《粟特铜币总目》内[4]。突骑施钱在我国境内也有零星发现，均出自新疆[5]。发现与研究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土地点	数量	发现者	研究者
喀什	1	彼得洛夫斯基（俄）	拉德洛夫（俄）
和田	2	曼那海姆（芬）	易仲廷（荷）
库车	1	黄文弼	牛汝极、蒂里埃（法）
吐鲁番	2	勒柯克（德）	缪勒（德）、蒋其祥
木垒	1	木垒县文管所	蒋其祥
轮台	1	新疆博物馆	张平等

突骑施钱是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洛夫斯基（N.F. Petrovskii）和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A.v. Le Coq）首先在我国新疆发现的。其研究始于1911年。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W.W. Radloff）和德国语言学家缪勒（F.W.K. Müller）于是年同时发表了各自对突骑施钱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认识颇显一致，都以为突骑施钱铭系回鹘文拼写的突厥语，但对某些字的解

读不尽相同。拉德洛夫的读法是 türgäs xaγan bir käši，释为“突骑施可汗一钱”[6]。缪勒的读法是 türgis xaγan bai Bγi（或 Bγi türgis xaγan bai），释为“突骑施可汗巴依·莫贺”（或读：莫贺突骑施可汗钱）。缪勒相信，钱铭中的“莫贺”即突厥语碑铭中的 bäg[7]。

40 年代在塔拉斯河但罗斯，50 年代在楚河阿克贝西姆和喷赤河喷赤干陆续发现许多突骑施钱，斯米尔诺娃根据这些标本全面而细致地研究了突骑施人的货币体系，她于 1981 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粟特铜币总目》集此项研究之大成，将中亚古钱学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pnγ	x'γ'n	twrkys	βγγ
钱	可汗	突骑施	圣天

插图 25　《沐园泉拓》刊两枚突骑施钱及其铭文摹文

二、钱铭解读与分类

经过审慎的研究，斯米尔诺娃发现突骑施钱上的铭文不是回鹘文，而是粟特文，她称之为“突厥粟特文”。这是斯米尔诺娃对突骑施钱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回鹘文源于粟特文，两者字母十分接近，但拼写的语言不同，因此早期中亚碑铭研究史上常有人误把粟特文当作回鹘文。上世纪末，拉德洛夫曾把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粟特文误作回鹘文，50 年代又有蒙古学者把布古特突厥可汗碑的粟特文当成回鹘文，后来为缪勒和苏联粟特语专家李夫

什茨（V.A. Livšic）纠正。同样，突骑施钱铭也不是回鹘文。文献记载表明，突骑施时代（718—739年），回鹘人仍在蒙古草原游牧，尚未西迁中亚。

斯米尔诺娃按粟特语重新释读了突骑施钱铭，读法是：Bγy twrkys γ'γ'n pny，释为“圣天、突骑施可汗钱”[8]。其中第一字的正确含义是德国语言学家汉森（O. Hansen）考订的。他根据回鹘故都喀喇巴拉哈衮所出汉、粟特、回鹘三语碑铭中粟特语βγy' wyγ wy（回鹘）χ'γ'n（可汗）对译回鹘语 tängri（圣天）uyγur（回鹘）qaxan（可汗），确认粟特语βγy相当于回鹘语 tängri，故该粟特字意为“圣天”[9]。尽管李夫什茨和一些日本学者仍坚持该字系突厥语“莫贺”，但斯米尔诺娃确信汉森的证据是不可动摇的，突骑施钱铭中的βγy既不是拉德洛夫的“一”，也不是缪勒的“莫贺”，而是粟特语“圣天”。

第二和第三字即“突骑施可汗”的粟特文名称，只是斯氏对“可汗”一词的拉丁转写有误。粟特文γ和x字形相近，不易分辨。为此，英国语言学家西姆斯·威廉斯（N. Sims Williams）曾于1981年著专文讨论两者区别[10]。从斯米尔诺娃提供的图版照片看，该字无疑应读作x'γ'n。

最后一字斯米尔诺娃释为“钱”。从文义看，该字应是“钱”字，但它似乎不是粟特词。在敦煌汉长城遗址所出3世纪初粟特文书信和慕格山粟特古堡出土的8世纪初粟特文书中，粟特人称中国钱币为rwδk（铜币）。另一方面，该字也不像突厥语词。因为，突厥人称铜钱为yarmaq，见11世纪马哈木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及莎车喀喇汗朝突厥语契约文书[12]。所以，斯米尔诺娃疑该字系汉语“分”的音译。但是唐代货币不以“分”为单位。突骑施钱仿自唐代方孔圆钱，而唐钱以“文”为单位。所以，蒋其祥提出该字或音译自汉语“文”。如果该字真是汉语，当以蒋说为是[13]。

突骑施钱的另一面有一弓形族徽（tamgha），斯氏根据这面铭文的有无或不同又将突骑施钱分为三类，其铭文读法不易确定。

第一类铭文读作 prn 或 nkw。前一字亦见粟特钱铭[9]（斯氏标本 1551—1553 号），在摩尼教粟特语中拼作 frn。据英国语言学家贝利（H. W. Bailey）考证，该字源于阿维斯塔语 X^{U}arenah（吉祥），[10]故 prn 当释“吉祥”或“吉利”。7 世纪初高昌国曾发行过“高昌吉利”铭文的方孔圆钱；从吐鲁番出土的汉语文书可知，高昌国有许多粟特人侨居，那么粟特钱铭中的这个“吉利”很可能与其相关。后一字似非粟特词，故一直未得其解。在敦煌粟特佛经题记中唐代年号“开元”被译为'nkwyn[15]。据此，粟特钱铭中的 nkw 很可能是汉语“开元”的讹译。突骑施钱仿自唐开元钱，故以“开元”称之。

第二类铭文读作 mnγ 或 m′χ，似以后一种为是，但应转写为 m′x，即粟特语“月亮”。

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斯坦还根据突骑施钱上的族徽鉴定出一种铸有突厥鲁尼文的突骑施钱。鲁尼文铸在有族徽的一面，拉丁字转写为 at 或 ph，其确切含义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据考古调查，叶尼塞河流域的古代黠戛斯人曾发行过方孔圆形的鲁尼文钱。黠戛斯钱共有五种铭文[16]。其中两种铭文较长，其余仅两三字。第一种长铭为 balačor maqač，意为“裴罗啜摩恰赤（之钱货）”；第二种长铭为 baqïr biči bäkiča guruq，意为“比奇小伯克乌鲁克之钱货”。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种黠戛斯钱的铭文与突骑施钱上的鲁尼文完全一样，即 pb，这无疑反映了两者的相互影响。尽管两者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种带有鲁尼文钱铭的突骑施钱表明，突骑施人的文字当是突厥鲁尼文。在中亚慕格山发现的粟特档案中有一件写在皮革上的突厥鲁尼文书（编号 B-13），约写于 8 世纪初[17]，以年代而论，这件文书很可能是突骑施统治粟特

时留下的。

斯米尔诺娃根据各类突骑施钱的特点将其分成四个类型，如下表所示：

分类	标本编号	图号	族徽	正面铭文	背面粟特铭文
Ⅰ	1585	XLⅤ	有	鲁尼文 at、pb	（无铭文）
Ⅱ	1586－1587	XLⅤ	有	粟特文“吉祥”	圣天突骑施可汗钱
Ⅲ	1588	XLⅤ	有	粟特文“月亮”	圣天突骑施可汗钱
Ⅳ	1589－1624	XLⅥ	有	（无铭文）	圣天突骑施可汗钱

三、突骑施钱的年代

关于突骑施钱的年代，黄文弼早年推测说：“突骑施自苏禄始称可汗，疑此钱为唐开元时车鼻施啜苏禄所铸。”[18]黄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只是苏禄并非第一位突骑施可汗。《资治通鉴》卷209记景龙二年（708年）事云，乌质勒之子娑葛于是年攻陷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唐中宗被迫采纳郭元振的意见，册立娑葛为“十四姓可汗”。所以突骑施始称可汗者为娑葛（708—714年在位）。苏禄任突骑施可汗约在开元七至二十六年（719—738年），他应是突骑施第二任可汗。苏禄死后，苏禄之子吐火仙被突骑施的都摩支部立为可汗，翌年（739年）为突骑施莫贺达干部引唐军击败，生擒，突骑施汗国遂亡。不过，此后突骑施残部仍有酋帅自立为可汗。《新唐书·突厥传》下载：“天宝元年（742年），突骑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密施骨咄禄毗伽为可汗，数通使贡。十二载（753年），黑姓部立登里伊罗密施为可汗，亦赐诏册。”唐军平定突骑施内乱后，西突厥十姓部落纷纷内属，

不复听令于突骑施，此后的突骑施可汗已徒有其名，故突骑施钱的铸造必在739年之前。

突骑施钱是何时开始铸造的呢？其钱铭使用粟特文，说明它铸造于突骑施控制粟特地区之后。粟特有九个主要城邦，号称“昭武九姓”，主要分布于碎叶以南，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以此推论，突骑施控制粟特是在攻陷楚河流域立牙碎叶城之后。《新唐书·突骑施传》载：

> “乌质勒能抚下，有威信，诸胡顺附，帐落寖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以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

许多人根据这段记载推断乌质勒时代（690—706年在位）突骑施人已南下楚河定都碎叶。但翻检有关文献，发现其说甚误。《新唐书·西突厥传》载，咸亨三年（672年）碎叶有镇守使韩思忠。同书《王方翼传》及《西域传》又载，调露元年（679年），王方翼讨平突骑施之乱后，曾于碎叶筑城。《唐大诏令集》卷130《命吕休璟等北伐制》记载景龙四年（710年）五月，唐廷令碎叶镇守使吕休璟等率部参加与东突厥的会战，故知迟至景龙四年碎叶仍有大批唐军驻守。值得注意的还有突厥鲁尼文碑铭的有关记载。开元二年（714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向导，以讨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万人与其左右来讨娑葛，擒之而还”。《旧唐书·突厥传》将这次东突厥与突骑施之战系于景龙三年（709年）。《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记“开元二年二月，突厥默啜遣其子同俄设率众寇北庭都护府”，故《资治通鉴》卷211将此役系于开元二年，当以《通鉴》说为是。东突厥老臣暾欲谷亦参加了这场讨伐突骑施的战争，并在他生前所立突厥鲁尼文碑（约立于716年）提到了这场战争，其铭（43—48行）曰：

> “我让十箭的军队出兵，我们也出兵！追上他们（指突

骑施），渡过真珠河（今纳伦河），经过阿克塔格山（*äktagh*）、天子驻地（*tinäsi-ogli-yatgma*）……/直达铁门。从那里，我们回师。大食人、吐火罗人/以及这里的以 *asuq* 为首的粟特人全来臣服小可汗。以前，突厥人未曾到过铁门/和天子驻地那座山。由于我英明的暾欲谷使其到达那些地方。"[19]

其中，"天子"一词不是突厥语词，故一直不得其解。直至斯坦因在新疆米兰发现突厥鲁尼文《占卜书》后，才使该字得以解读。《占卜书》第一行曰："我是 tän:si，早晚坐在金交椅上，十分快乐。"据此，汤姆森断定，该字当系汉语"天子"的音译[20]。但是，暾欲谷碑中"天子驻地"位于何处仍令人茫然。苏联突厥学家克利亚什托尔内在其名著《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一书中写道：

"至于碑文中'天子驻地'、'阿克塔格'山指什么地方，依然是个谜。这个地方是指粟特统治者的一个府邸而言，而且可能是指那密水流域某个山堡而言。"[21]

其说未谛。据贾耽《皇华四达记》（《新唐书·地理志》引），真珠河以西的地理情况是：

"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

显然，突厥鲁尼文的"阿克塔格山"就是贾耽的"羯丹山"，突厥语中意为"白山"，而"天子驻地"当指碎叶城。突厥鲁尼文"天子"音译自汉语，指中国皇帝。碎叶驻有中国皇帝所遣唐军，故被称为"天子驻地"。

据以上讨论，开元二年（714 年）碎叶仍有唐军驻守。不过，这时碎叶又遭到吐蕃和大食军队联合进攻的威胁。《资治通鉴》卷 211 记开元三年十一月事曰：

"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

这场战役确保了碎叶唐守军的安全，但来自北方的突骑施人又卷土重来。《资治通鉴》卷212载：

"开元七年十月壬子，册封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

《新唐书·西域传》又载：

"开元七年，（焉耆王）龙懒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

联系上述两条记载，可知突骑施攻破碎叶在开元七年（719年），唐廷无力讨伐，不得不答应苏禄的请求，册立他为西突厥十姓可汗，并将碎叶唐军撤至焉耆立镇。

突骑施定都碎叶后，很快和粟特人建立了密切关系。这里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玄奘访问碎叶时（628年），碎叶已是"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杜环于怛罗斯之役（751年）被虏入大食前，也见到碎叶"川长约千余里。川中有异姓部落，有异姓突厥"。[22]所谓"诸国商胡"和"异姓部落"均指粟特昭武九姓胡。故《大唐西域记》卷1又云："自素叶（即碎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即粟特），人亦谓焉。"

突骑施与粟特的关系，文献语焉不详。但从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可知粟特人充当了突骑施与外族交往的代言人和商业代表。例如吐鲁番出土《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即粟特人何德力翻译代书。[23]所以，这种铸有粟特铭文的突骑施钱应是苏禄定都碎叶后，当地粟特人帮助突骑施人铸造的，流通范围即突骑施领地及其控制之下的粟特地区，突骑施钱的铸造和发行当始于公元719年。

四、汉文化西传中亚始末

突骑施钱采用唐朝货币的形式，这与汉文化西传中亚，尤其是西传碎叶有密切关系。

隋朝末年，楚河流域已有不少汉族人入居。玄奘曾在碎叶城西南450余里处寻访到一处汉族移民点，称“小孤城”。城内有“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国人，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大唐西域记》卷1）。但汉族人口大规模迁入中亚在7世纪中叶唐太宗于碎叶设镇之后。《新唐书·西域传》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讨平龟兹后，太宗“始徙安西都护于其部，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这是唐朝在碎叶设镇之始。于是，大批唐军及其家眷来碎叶戍边，当地汉族人口大增。

唐代诗人李白先世曾居碎叶。由于李家谱牒不甚详备，这位大诗人先世家居何处、出自何族竟成为隋唐史研究中一大疑案。李阳冰《草堂集序》曰：

>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嗣九世孙……中叶非罪，谪居条支……神龙之始（705年），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

条支本指地中海东岸安条克城（Antioch），但李阳冰所言“条支”是唐代文人对边疆地区的一种修辞称呼。所谓“谪居条支”即因罪发配到边远地区戍边。所以，李白有诗曰：“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赠张相镐二首》之二）关于李家在何处戍边，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载：

>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

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

由此又知，李家曾被窜于碎叶，即流放到碎叶。如果李阳冰之说正确，李家移居碎叶不可能在隋末，而是唐初太宗在碎叶设镇之际（648年）。如果范传正之说正确，那么，李家很可能是在隋末就被突厥人虏入碎叶，居于玄奘所说碎叶之西小孤城。此外，史学大师陈寅恪还提出一种可能性，即李家是汉化胡人，冒姓李氏。[23]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多处抨击陈说，试图证实李白为汉人。但有唐一代冒姓或赐姓李氏的胡人史不绝书，例如唐肃宗时（757—761年）帕提亚人李抱玉、李抱真及其曾孙李景裕，唐僖宗时（875—888年）波斯人李玹、李珣及李舜弦兄妹，西突厥沙陀人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唐宣宗时（847—859年）大食人李彦升和回鹘人李茂勳等，他们积极学习汉文化，不乏英才之辈。如大食人李彦升，“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文苑英华》卷986）又如：李玹曾“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茅亭客话》卷2）李珣和李舜弦均为唐代有名的诗人，凡61诗词收入《全唐诗》卷760、796和896。李白孙女距其祖父不过一代之隔，竟然“难求谱牒”。据郭沫若考证，“李阳冰的说法必然出自李白的口授”。但李白对其家世亦不能详述，恐有难言之隐。所以，陈寅恪提出的这种可能性目前还不能排除。

由于史料不足，关于李白家世的三种说法均不能视为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李家归唐之前居于碎叶。李白生于大足元年（701年），这时他家尚未归籍于蜀。其诞生地就应在碎叶。唐代诗人岑参有诗曰：“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解汉语。”（《全唐诗》卷199）叶河当指碎叶河。李白后来能成为一位大诗人，当与其童年在碎叶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

除文化事业外，西传碎叶的还有内地的城市建设。《新唐书·地理志》焉耆都督府条下注曰：

“碎叶城，调露元年（679年）都护王方翼筑，作四面

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

或以为王方翼所筑城在焉耆。但《新唐书·王方翼传》明载，王方翼是在伊丽河（今伊犁河）和热海（今伊塞克湖）击败突骑施诸部落后进驻碎叶的。所以，王方翼所筑城必在碎叶川（今楚河）之畔。1961 年，英国突厥学家克劳森（T. Clauson）发表《阿克贝西姆即碎叶》一文，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碎叶城即苏联考古学家 1953—1954 年发掘的位于楚河南岸的阿克贝西姆古城。[29] 据考古地层分析，该古城始建于 5—6 世纪，最初为粟特人建。在 8 世纪左右的地层中发现了 57 枚突骑施钱，这是克劳森推定阿克贝西姆为碎叶城的重要依据之一。他还根据该城城墙有马面这一特点进而指出此城即王方翼所筑碎叶城。其说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可为定论。

按时间推算，王方翼于 679 年筑碎叶城，李白生于 701 年并于 705 年归蜀，那么，李白当生于王方翼所筑碎叶城，即阿克贝西姆古城内，五岁时才离开。

另一方面，根据对汉唐城址所做的考古调查，王方翼所筑“四面十二门”的碎叶城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古代城镇建筑，因此，碎叶城又是唐代西传最远的中国建筑。

目前发现的突骑施钱不足百枚，但仅在碎叶城就出土了 57 枚，因此碎叶城可能就是这种钱的铸造地。斯米尔诺娃甚至认为这种汉式方孔圆钱很可能是当地汉族工匠帮助铸造的。

唐朝在碎叶设镇后，不仅为中亚七河流域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和汉式建筑，还给中亚传统货币体系以巨大冲击。古代中亚文化受希腊和波斯影响较大，诸国货币均采用打制法制造，圆形无孔。自 7 世纪中叶，粟特人开始模仿唐朝货币，铸造方孔圆钱。据斯米尔诺娃对钱铭上粟特王名的考证，最早发行这种铸币的是史国王沙瑟毕（约 642—656 年在位）和康国王拂呼曼（约 658 年在位）。

1984年，日本学者冈本孝撰文反驳斯氏之说。他认为粟特钱铭中的 šyšpyr 不是史国王沙瑟毕，而是隋大业（605—618年）中遣使来华的康国王“代失毕”。其名因避李世民讳，改“世”为“代”，原名应是“世失毕”，也即《北史·西域传》所记康国王“世夫（失）毕”[4]。此说十分诱人，但从当时中亚的政治形势和有关文献看，我们很难接受其说。

其一，如果康国王世失毕发行过这种汉式方孔圆钱，那么一定会引起628年访问粟特的玄奘的注意。然而《大唐西域记》不厌其详地介绍中亚诸国货币，如焉耆和龟兹“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吐火罗诸国“货用金、银等钱，模样异于诸国”；印度货用“金钱、银钱、贝珠、小珠”；波斯“用大银钱”；唯独不提粟特人发行的这种方孔圆钱。这当然不应是玄奘的疏忽，恐怕是粟特人此前尚未发行这种汉式钱币。

其二，粟特人传统上采用希腊和波斯货币体系。这种钱币和吐火罗及波斯钱相近，玄奘有可能见过，但未能与他国钱币相区分，故在《大唐西域记》中只字未提。更重要的是，如果粟特人进行货币体制改革，必然和一定的政治背景相联系。而6世纪末和7世纪初，粟特在西突厥统治之下。据《北史·西域传》，康国王世失毕之妻乃西突厥达度（或译达头）可汗之女。我们想象不出为什么这位西突厥的女婿会突然发行汉式钱币。

斯米尔诺娃的意见无疑是对的，这种方孔圆形粟特钱必然产生于7世纪中叶之后。准确地说，产生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在碎叶设镇，尤其是显庆三年（658年）唐军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于中亚广设羁縻都督府州之际。在费尔干那盆地库瓦等地发现过铸有 twtwγ 铭文的方孔圆形粟特钱，该字即汉语“都督”的粟特文拼法[2]。《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羁縻州条曰：

“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

世袭。”

由此可知，粟特王号“都督”是唐朝于其地设羁縻州后册封的，故用汉语名称。此亦表明粟特王发行方孔圆钱必在显庆三年之后。

唐初史国王沙瑟毕和隋末康国王世失毕的胡语原名显然是同样的。从粟特钱铭看，世失毕的译法较准确。两《唐书》之所以不采用这个译名，大概也是为避太宗李世民之讳。

中亚诸国中粟特人接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粟特文源于西亚阿拉美文，本为横书，因受汉文化影响才改为直书，所以《大唐西域记》卷1载，粟特“粗有书记，竖读其文”。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而中亚诸国中粟特人最先接触到中国的纸。公元3世纪初敦煌粟特书信大都抄写在纸上。8世纪初慕格山粟特文书中也有相当部分写在纸上，有的甚至写在汉语文书的背面。所以，7至8世纪的粟特文化和蒙古、朝鲜、越南和日本文化一样，属于汉文化系统，而碎叶又是粟特所居中亚七河流域汉文化传播的一个中心，丝绸之路上的西方商旅首先是通过碎叶这个窗口认识中国和汉文化的，故碎叶有“天子驻地”的美称。

通过讨论，可以理解突骑施人为什么以中国钱币的模式建立自己的货币。突骑施人可以用武力攻破碎叶城，但不能动摇根植于这块土块的汉文化体系，结果反而被当地先进文化所征服。突骑施钱的产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原载《文物》1993年第4期。

注　释

① 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② 姜伯勤：《吐鲁番敦煌文书所见突骑施》，《文物》1989年第11期。

③ 克利亚什托尔内、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哈尔滨：黑龙江教

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25 页。

④ O.I. Sinimova, *Svodnyi katalog sogdij-skix monet*(*Bronze*), Moscow, 1981, 397－405.

⑤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第 107－108 页及图版 103；牛汝极：《突骑施钱币考》，《中国钱币》1988 年第 2 期；易仲廷撰、陈乃雄和魏其祥译：《“丝绸之路”钱释》，《内蒙古金融》1989 年 5 月刊（总 62 号）；蒋其祥、周庆煌：《新疆钱币》，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94 页和图版 077－078；蒂里埃撰、胡锦洲译：《一枚突骑施苏禄汗（719－736 年）钱币》，《新疆文物》1990 年第 2 期。其余见注⑥、⑦；张平等：《轮台县文物调查》，《新疆文物》1991 年第 2 期第 11 页。

⑥ W.W. Radloff, “Einleitende Gedanke zur Untersuchung der alttürkischen Dialeke”, *Alttürkischen Studien*, IV, 1911, 305-326.

⑦ F.W.K. Müller, “Nachträge und Verbesserungen zu den Uigurica (I. Abh., 1908)”, in: *Uigurica* II, Berlin, 1911, 90－102.

⑧ 参见注④。本文所引斯米尔诺娃之说均据此书，恕不一一出注。

⑨ O. Hansen, Zur soghdischen Inschrift auf dem dreisprachigeu Denkmal von Karabalgasun”, *JSFOu*, XLIV, 1930, 25.

⑩ N. Sims-Williams, “Remarks on the Sogddian Letters y and x”, in: W. Sundermann, *Mitteliranische manichäische Texte kirchengeschichtljchen Inhalts*, Akademie Verlag, Berlin, 1981, 194－198.

⑪ F. Grent and N. Sims-William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Transition Period in Iranian History*, Leuven, 1987, 113－114.

⑫ R. Dankoff et al,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Office, 1982; M.Erdal, “The Turkish Yarkand documents”, *BSOAS*, XLIX-3, 1986, 455－507.

⑬ 陈源、蒋其祥等：《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卷 3《隋唐五代货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496 页。

⑭ I. Gershevitch, *A Grammar of Manichean Sogdi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1, 36, §224.

⑮ D.N. Mackenzie, “The Buddhist Sogdian Tex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Acta Iranica* 10, Tehran-Liegè, 1976.

⑯ *I.L. Kyzlasov; "Monety s tyurkoyazychnymi eniseĭskimi nadpisyami", Numizmatika Epigrafika*, Tom. XIV, Institut Arkheologii an SSSR, Moskva, 1984, 84－99.

⑰ A.N. Bernshtam, "Drevnetyurkskii Dokument iz Sogda", *ZV*, Tom. V, 1951, 65－75.

⑱ 黄文弼，前揭书，第108页。

⑲ 勒内·吉罗：《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耿昇译本，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84年，第248页。吉罗的译文个别有误。据克利亚什托尔内译文校正，见克氏前揭书，第156－160页。

⑳ V. Thamsen, "Dr. M.A. Stein's Manuscripts in Turkish' runic' Script from Miran and Tun-huang", *JRAS*, 1912, 181－227.

㉑ 克利亚什托尔内，前揭书，第166－167页。

㉒ 其书早佚，但为同时代诸书所引。本文据张纯一辑本《经行记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4－40页。

㉓ 唐长孺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㉔ 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1期。

㉕ T. Clauson, "Ak-Beshim Sūyāb", *JRAS*, 1961, 1－13.

㉖ 岡本孝：《粟特銭幣考》，《東洋学報》第65卷3－4号，1984年3月刊。

㉗ A. von. Gabain, *Alttürkishe Grammatik mit Bibliographie, Lesestürken und Wörterverzeichnis, auch Neutürkisch*, Leipzig, 1950, 321 und 345.

五　日月光金与回鹘摩尼教

日月光金是一种颇为罕见的胡汉双语钱币。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钱是1992年。这年10月，上海博物馆邀我参加杜维善先生藏丝绸之路古国钱币学术讨论会。会上陈源先生请我鉴定一枚类似于开元通宝的胡汉双语钱。其正面钱铭为“日月光金”四字，当系此钱名称；背面是一圈不识之胡书文字。不久他又将两张拓片寄到北京，希望我能释读日月光金上的胡书文字并详考其来龙去脉。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胡书文字竟然不见于目前发现的任何胡语碑铭写卷，况且只有极少几枚日月光金流传于世，所以我回信对此钱真伪表示怀疑。不久我竟然在新发表的考古报告中看到新疆某回鹘佛寺遗址发掘出一枚与日月光金完全相同的古钱，终于知道此钱绝非赝品。尽管如此，我仍不能明白这种胡汉双语钱产生的历史背景，直到最近才恍然大悟，此钱之发行必与漠北回鹘宗教文化有关。撰写此文，试解陈源先生之疑问，并求教于海内外博雅之士。

一、考古发现及传世收藏

日月光金系方孔圆钱。一面铸汉文“日月光金”四字，另一面系胡书文字。从字母体系看，这种文字类似粟特文、突厥文或回鹘文，属于阿拉美文字母体系。上海博物馆藏品（参见插图

26）外径 2.44 厘米，重 5.23 克。这个重量及数据与开元通宝十分接近，或说明它仿自开元通宝。[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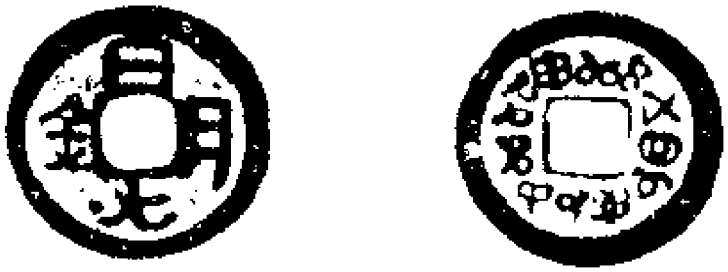


插图 26　上海博物馆藏唐代回鹘摩尼教钱币日月光金拓片

新疆的发掘品对研究日月光金至关重要。此钱著录于 1991 年发表的考古报告《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报告中这样写道："'日月光金'1 枚（E：04），出于东部下层洞龛外堆积中。形制、大小与开元通宝略同，但外廓较宽，正面镌汉文'日月光金'四字，背面镌少数民族文字（图七，3；图版九五，7）。"据报告所附图版及拓片，此钱和陈源先生所藏日月光金完全一样。严格地说，其制造方法和开元通宝一样，系范铸而成，钱铭自然不是镌刻的。报告中又介绍，这枚日月光金所出地层——"东部下层洞龛外堆积"中还发掘出 3 枚开元通宝。其一编号为 E：03，这和同一堆积所出日月光金的编号 E：04 恰恰相接。[2]由此可知日月光金和开元通宝有明确的考古共存关系，两者时代当相距不远。

就我所知，目前只有 7 枚日月光金流传于世。除新疆的发掘品外，上海博物馆收藏了 1 枚传世品。[3]其余 5 枚则为私人藏品。卫月望先生告诉我，私人藏品集中在上海，凡 3 枚；内蒙古呼和浩特尚有 2 枚保存在私人手中。[4]钱币史家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以及近年出版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对日月光金作过介

绍。[5]后一书说："唐时，吐蕃占有西藏、青海等地，兵力强盛，地产金银铜锡。贞观八年，吐蕃首领弄赞遣使贡金帛，欲与唐室通婚，后又遣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及宝玩数百件。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弄赞为公主筑城邑，立栋宇而居处。又自释旃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字之人，典其表疏。唐太宗伐辽东还，遣禄东赞来贺，奉表曰：'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按传世有一种日月光金钱，背文类古藏文，《中国货币史》曾刊于图版，注吐蕃钱。"又说："宋《泉志》引张台曰：'按言胡钱者，非绝，大抵西北诸国通曰胡，近有吐蕃使来，即将此钱，云是吐蕃钱，即非止侄驮与胡也。'张台为五代时人，记当时事应有所据，故知此钱流行于唐五代。"[6]这段文字先以此钱胡书为吐蕃文，后引张台说为其断代，其说自然不能成立。因为钱上胡书根本不是吐蕃文，故此钱背景仍是一个谜。

以上是对日月光金著录、流传及收藏情况的一个粗略调查。流传至今的日月光金尚不足10枚，可见此钱流行时间不长，流通范围有限。尽管上海是其主要收藏地点，但上海藏品大概都是从外辗转带入的。新疆的发掘品以及内蒙古的采集品无疑表明蒙古草原和新疆吐鲁番盆地才是这种古钱真正的流通区域。

二、"日月光金"的启示

尽管日月光金唯一一枚发掘品出自10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回鹘佛寺遗址，但它无论如何与佛教无关。钱铭"日月光金"四字提醒我们注意这种钱币与摩尼教，尤其是回鹘摩尼教的关系。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年?）在西亚创立的。这门宗教从诞生那天起就被视为异端邪说，

屡遭迫害。大批摩尼教徒从波斯流亡世界各地。此举反而使摩尼教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在欧洲德国和北非埃及的中世纪遗址都发现过摩尼教文物。中亚粟特诸城邦是摩尼教徒避难的一个中心，故粟特人很早就信仰摩尼教。

魏晋至隋唐，粟特人纷纷流寓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蒙古草原、乃至中国古都长安和洛阳。中国史籍给这些来自中亚不同城邦的粟特侨民冠以汉姓，如撒马尔干来的称“康”，布哈拉来的称“安”，塔什干来的称“石”，凡九国九姓，总称“昭武九姓”或“九姓胡”。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安禄山和史思明均为粟特人。摩尼教亦随粟特人不断来华而传入中国。唐人不明其教义，称其为“摩尼教”，宋人根据其教徒崇拜日月，改称“明教”。

日月崇拜是摩尼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一大特点。庄季裕《鸡肋编》卷上有一段介绍摩尼教在华传播的资料，对我们理解“日月光金”大有帮助。文中说：

> “事魔食菜，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以财产半给于告人，余皆没官。而近时事者益重。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两浙。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疑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

这段文字道出摩尼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在于摩尼教把日月奉为真神。《佛祖统纪》卷48引洪迈《夷坚志》又载，宋代摩尼教徒“复假称白乐天诗云：‘静览苏邻传，摩尼道可惊。《二宗》陈寂寞，五佛继光明。日月为资敬，乾坤认所生。若论斋洁志，释子好齐名。’以此八句，表于经首”。这里再次提到日月为摩尼教信徒所敬重。

宋代摩尼教译经中还有专门赞美日月的经典，如《日光偈》和《月光偈》。[7]据考证，《日光偈》实为敦煌唐写本摩尼教《下部赞》中一首偈颂。该偈颂题："此偈赞日光迄，末后结愿用之。"[8]这篇摩尼教偈颂尚有许多赞美日月的诗句。其诗云："又启日月光明宫，三世诸佛安置处，七及十二大船主，并余一切光明众。"此外敦煌唐代写本《摩尼教残经一》还这样写到："犹如朗月，诸明中最明；亦如满月，众星中最尊……又入日月，于众像中最尊无比。"[9]据林悟殊考证，此经当即摩尼教七大经典之第五部经《钵迦摩帝夜》，也即敦煌写本《仪略》所列摩尼教目录中的《证明过去经》。[10]

总之，崇拜日月是摩尼教的一大特征。那么我们讨论的这种以日月为钱铭的胡汉双语钱显然具有浓郁的摩尼教色彩。钱铭中的"金"当与"钱"同义，而"日月"则是摩尼教的拜物对象。

三、日月光金与回鹘之联系

日月光金流行于蒙古草原和新疆吐鲁番地区；钱形和重量则模仿唐代开元通宝。在这个时间和空间活动的民族正是漠北回鹘人。唐开元以降，回鹘人称雄蒙古草原，晚些时候又西迁中亚，一支迁到新疆吐鲁番盆地，即史家所谓"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回鹘人的草原文化很快被具有千年文明史的高昌本地吐火罗文化所同化。回鹘人亦逐渐放弃摩尼教而改宗吐火罗人信仰的佛教。最后高昌回鹘终于在10世纪初完全放弃摩尼教。回鹘人这段历史和我们讨论的日月光金的时空、宗教色彩以及文化内涵完全相符，详述于下。

回鹘人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史载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牟羽可汗[11]将四位摩尼法师从洛阳携还漠北鄂尔浑河流域。不久回鹘召开氏族大会，改立摩尼教为国教。胡汉三语《九姓回

鹘可汗碑》对回鹘人改奉摩尼教略有所述，但本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发现的《牟羽可汗入教记》残卷对此事记载更为详细。文中说：

> “当此神圣的四僧从桃花石（指唐）来的时候，他们抱着四愿……但为了人民，为了学理，却遭遇到大的危险，大的压迫。听众和胡商常常处在为人杀害的境遇……陛下：‘如你自己远离这些达干，则善法善行可以在你的国内施行；如仍任……达干担负国家重任，他们必作恶行，你的国家必将下沉……’天王（指牟羽可汗）与选民（指摩尼信徒）讨论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天王斋戒，受到极大的痛苦，他的心灵才有所动。这样的继续着作，他的心灵如有所失，忐忑不安。后来，牟羽可汗召集了一个大会，他跪在选民之前，乞求宽宥了他的罪恶……”[12]

牟羽可汗从洛阳携回漠北的摩尼师即粟特人。粟特是中世纪著名商业民族，丝绸之路贸易主要由粟特人操纵。在其影响下，回鹘人放弃萨满教，改宗摩尼教；而回鹘经济则从畜牧业向商业贸易转化。这就是具有摩尼教色彩的日月光金产生的历史背景。

有证据表明，漠北回鹘摩尼信徒亦尊崇日月。牟羽可汗时代回鹘人尚无自己的文字，使用周边民族的汉文、粟特文和突厥文，如漠北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即用上述三种文字刻写的。那么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发现的一件突厥文摩尼教写本当为回鹘摩尼教写本。其经文亦提到“日月神在二光明殿中升座”云云。[13]

公元779年顿莫贺起兵反对回鹘宗教改革，不仅谋杀了牟羽可汗，而且连带“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千人”，以致“九姓胡闻其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14]自顿莫贺发动宫廷政变后，摩尼教一度在漠北销声匿迹。不过它很快就于唐元和初年在漠北复兴，并迅速达到回鹘摩尼教的全盛时期。《新唐书·回鹘传》记

载：

“元和初（约808年左右）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宴晏食，饮水茹荤，屏锺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

此后摩尼法师几乎包揽了回鹘可汗大部分外交事务。《旧唐书·回纥传》记载：

“元和八年（813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鹘摩尼八人，令至中书见宰臣。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

同传又载：

“长庆元年（821年）五月，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于鸿胪寺安置。”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考古材料。新疆吐鲁番吐峪沟摩尼教石窟第7窟壁画中有一幅日月宫图壁画。据介绍：“图中心圆形为日，向外侧及下方有辐射线的是新月，再向外是八星环绕。类似的壁画在回鹘摩尼教寺院遗址随处可见。例如：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城回鹘摩尼教K遗址发现的礼拜摩尼的大幅壁画以及在同一古城发现的摩尼教经书插画。”[15]

回鹘摩尼教如此尊崇日月，胡汉三语《九姓回鹘可汗碑》表明当时漠北回鹘官方文字是突厥文、粟特文和汉文三种文字。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将日月光金与回鹘摩尼教联系起来。

四、年代问题

回鹘人信奉摩尼教的历史长达200年，从公元8世纪中叶牟羽可汗入教一直到公元10世纪初回鹘人改奉佛教。如此漫长的回鹘摩尼教史使我们一时不能看清日月光金的确切发行年代。不过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我们注意到唐代文献提到一种回鹘钱。

《册府元龟》卷999记载：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六月，贬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为宜州别驾。甚子贷回鹘钱一万一千四百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故贬甚。因下诏曰：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番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番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方务抚安，须除旧敝，免令受屈，要与更改。自今以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番客钱物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条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征理处分。"

该书所谓"回鹘钱"是指回鹘自制钱币，还是回鹘人拥有的唐钱，这段文字说得不够明确。若是前者，这种回鹘钱一定是模仿唐代方孔圆钱，因为它以贯为单位。这和本文所论日月光金的形制相当接近。那么日月光金大概流行于8世纪中叶。但《册府元龟》的"回鹘钱"发行量相当可观，李甚所贷居然有"一万一千四百贯"之多。如此庞大的数字又和我们讨论的这种罕见的胡汉双语钱的数量相差甚远。因此《册府元龟》所说"回鹘钱"更可能指回鹘商人拥有的唐代方孔圆钱。

彭信威曾介绍漠北回鹘人发行钱币的情况。他说："唐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唐代的货币文化也传播到外国去。如日本、朝鲜等国。此外，也影响了一些西域民族，如回纥和突骑施。在安史叛乱的时候，回纥曾以军队协助唐室平定叛乱，唐王朝赠其统治者磨延啜英武远毗伽阙可汗称号，并把宁国公主嫁给他。他的儿子牟羽可汗曾铸造一种方孔钱，两面都用回纥文，一面为'美誉贤明回纥牟羽可汗'的意思，另一面为'保国敕令'的意思。"[16]"回纥"即唐人对回鹘的早期称谓，见于《旧唐书》；《新唐书》则一律改为"回鹘"。天津唐石父收藏了一枚与此完全相同的回鹘钱，冯加昇曾详考其文字，可惜误作突骑施钱。[17]这种

回鹘文钱币实际上是高昌回鹘钱。此钱正面写有草体（或称斜体）回鹘文 ïduq yarliq yürisün，意为“亦都护（神）敕行”，但背面从未发现有文字。[18]即便其背面真有文字，亦非“美誉贤明回纥牟羽可汗”之意。敦煌研究院的杨富学先生告诉我，元代回鹘人才把国王称作“亦都护”，那么亦都护敕行钱发行时牟羽可汗早已不食人间烟火。近年新疆吉木萨尔文管所收集到一枚高昌回鹘早期钱币，亦为方孔圆钱。据其上回鹘文钱铭，此钱当为公元9世纪下半叶高昌回鹘王子 Burmiš 发行。[19]

从现有资料推测，日月光金大概产生于回鹘保义可汗在位时期（808—821年）。保义可汗在漠北复兴摩尼教，所以史载保义可汗在元和至长庆年间屡派摩尼师与唐廷交往。1890年在漠北哈喇巴喇哈逊遗址发现《九姓回鹘爱登里啰泊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碑铭》，或称《保义可汗纪功碑》。[20]值得注意的是，碑中保义可汗名前冠以“爱登里啰”之官号。所谓“爱”来自突厥语 ai（月）；而“登里啰”则来自突厥语 tängridä（日）。据日本学者田坂兴道研究，信奉摩尼教的回鹘可汗，其称呼必冠以摩尼教徒推崇的日月尊号。[21]那么日月光金或是这位以“日月”为官号的回鹘可汗发行的。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保义可汗死后回鹘内乱迭起。例如：唐太和六年（832年）回鹘昭礼可汗被其部下所杀，[22]其后唐开成初年（839年）在位的回鹘萨特勤可汗又险遭粟特国相安允合谋杀。[23]频繁的内乱使漠北回鹘的国力大大削弱，终于在840年被北方游牧人黠戛斯攻破位于鄂尔浑河流域的汗廷。于是回鹘人被迫从漠北西迁中亚。[24]保义可汗死后，回鹘人仍信仰摩尼教。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回鹘亡国之后。1909年芬兰学者兰木斯台特在蒙古苏吉达坂发现了黠戛斯统治时期留在漠北的回鹘人所立碑铭，学界称之为“苏吉碑”。此碑主人自称是“共黠戛斯之子”，官号裴罗·骨础禄·牙尔干。他有“牲畜无数”，并赠与他的摩尼法师“一百人和住

房”。[27]法国突厥学家哈密顿曾考证唐末五代回鹘可汗衔铭之胡汉对音。据他研究，其中忠贞毗伽可汗、昭礼可汗、彰信可汗和怀信可汗都冠以 ai（月）tängridä（日）这个颇具摩尼教色彩的官号。[28]那么日月光金的产生还有第二种可能性，即保义可汗死后，漠北某位信仰摩尼教的回鹘可汗发行了此种货币。

保义可汗之后，回鹘可汗忙于宫廷政变，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最后连漠北江山都丢失了。由此可见，保义可汗发行这种胡汉双语钱的可能性更大。

日月光金使用的胡书文字似以音素为单位（即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元音或辅音）。这一点和突厥鲁尼文颇相似；同时这种文字又采用草体形式，具有粟特文和后世回鹘文等音节文字的特点。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文字拼写的胡语是粟特语还是回鹘语。若是回鹘语，那么它就是后世回鹘文的先驱；若是粟特语，那么它应是粟特文的一种地方变体。由于缺乏双语材料可资比较，很难确定日月光金上胡书文字的音值。所谓“回鹘文”，就是用草体粟特字母拼写回鹘语形成的一种文字。就目前资料而言，中亚七河流域的突骑施人很早就使用草体粟特字母拼写突厥语。[29]所以曾有学者认为回鹘文来自中亚突骑施人使用的文字。50 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浩木西北 50 公里的哈鲁斯（Harus）发现了 8 行回鹘文碑铭，1961 年由苏联突厥学家谢尔巴克解读，年代约在公元 8 世纪左右。[30]这个例子说明回鹘西迁中亚（840 年）之前，已经在漠北使用回鹘文。如果日月光金上的胡书文字拼写的是回鹘语，那么这种胡书文字可能代表了回鹘书面语言从突厥鲁尼文向回鹘文过渡时期的一种文字。这将解决回鹘文的起源问题。笔者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不敢妄谈此事。这个问题还是留待突厥回鹘古文字学家来讨论。

既然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回鹘佛寺遗址发现过日月光金，那么西迁高昌之后的回鹘人仍一度使用这种胡汉双语钱。公元 9 世纪

下半叶高昌回鹘王子 Burmiš 在吐鲁番发行了一种新的回鹘钱币。或表明日月光金的流行年代至迟不迟于公元9世纪下半叶。

注 释

① 陈源藏品外径2.5厘米，重5.31克，数据据陈源先生1992年9月26日赠予笔者的拓片复印件。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162页。

③ 陈源、蒋其祥等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隋唐五代货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96页。

④ 每一位丝绸之路古钱币爱好者以及关心中国古民族文化的人都应感谢卫月望先生。我能在这里介绍一些这种胡汉双语钱的发现与收藏，有赖这位古钱学老前辈提供的资料。上海藏品现由吴景、陈源先生和马飞海先生收藏。呼和浩特藏品现为呼和浩特市煤田地质勘探队某人及呼和浩特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白莹先生所得。

⑤ 彭信威，前揭书，第377－378页。

⑥ 陈源等编，前揭书，第28页和图版2280。

⑦ 参见《宋会要辑稿》刑法宜和二年十一月的臣僚言。

⑧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7页。

⑨ 林悟殊，前揭书，第225－226页。

⑩ 林悟殊，前揭书，第191－207页。

⑪ 回鹘碑铭又称其为“卜古可汗”。《旧唐书·回纥传》和《新唐书·回鹘传》或称其为“登里可汗”，此系回鹘语，意为“天王”。

⑫ W. Bang und 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 *SPAW*, 1929, 7－9；译文见冯家昇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⑬ V. Arnold-Doeben, *Die Bildersprache des Manichaeismus*, Koeln, 1978, 166；译文见晁华山：《寻觅淹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中国文化》1993年第8期第10页。

⑭ 参见《资治通鉴》卷226。

⑮ 晁华山：《寻觅淹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中国文化》1993年第8期第9－10页。

⑯ 彭信威，前揭书，第308－310页。

⑰ 冯家昇：《一个突骑施的钱币》，《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03－504页。

⑱ 董庆煊、蒋其祥编：《新疆钱币》，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1年，第25、194页。

⑲ 杨富学：《吉木萨尔文管所收藏的一枚回鹘文钱币》，《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

⑳ 耿世民：《古代突厥碑铭述略》，《考古学参考资料》3－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60页。

㉑ 田坂興道：《回纥に於ける摩尼迫害運動》，《東方学報》第11册，東京，1940年，第224页；林悟殊，前揭书，第95－96页。

㉒ 参见《资治通鉴》卷244。

㉓ 参见《新唐书·回鹘传》。

㉔ 参见《新唐书·回鹘传》及《旧唐书·回纥传》。

㉕ 耿世民，前揭书，第165页。

㉖ 哈密顿著、耿昇译：《五代回鹘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8－209页。

㉗ 林梅村：《从突骑施钱看唐代汉文化的西传》，《文物》1993年第5期第45－52页，收入本书第四编第4章。

㉘ A.M. Xerbak, "Nadpis na drevne uygurskom Yazike iz Mongolii," *Epigrakafika Vostoka*, XLV, 1961, 23－25；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3－104页。

六　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

一、英山毕昇碑对中国摩尼教考古研究之意义

《湖北日报》1992 年 12 月 8 日发布了一则新闻。报道说，活字印刷发明人毕昇的墓碑于 1990 年在靠近安徽的湖北英山县发现。1993 年初，《中国旅游报》、《中国文物报》和《人民日报》相继转发了这条消息。据说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听到消息后也对这个发现表示极大关注。[1]

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文物局于 1995 年 12 月在英山县联合召开关于毕昇碑的学术讨论会。据报道，碑为青石所制，高 110 厘米，宽 70 厘米，厚 13 至 15 厘米。墓碑中间阳刻两行字："故先考毕昇神主（左行）；故先妣李氏妙香（右行）"。其下为碑铭。碑左阴刻："孝子毕惠（嘉）、毕文、毕成、毕荣、孝孙毕文显、毕文斌、毕文忠"；碑右阴刻："□□四年十二月初七日"；碑上方左右栏分别阴刻"日"和"月"两字。据墓碑拓片，碑额刻有华盖、缨络和莲花图案；边框刻有卷云纹（参见图 27）。令人不解的是，此碑年号被人用斧凿毁。与会专家认为，凿碑不是今人所为，而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反对皇权而凿。所以只毁年号，其余未动。研究者凭残留字迹以为年号是北宋仁宗年号"皇祐"，并推测此碑系毕昇客死杭州一年后其子孙为他在家乡所立招魂

碑，故墓碑面向毕昇客死之杭州。墓碑两侧刻有“日月”二字，表明墓主人信奉摩尼教。[2]

毕昇碑发现地点在今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毕家坳，今天当地已无人姓毕。据50年代航拍的国际分幅1:5万的地形图，英山还有“毕家铺”和“毕家”等以毕家取名的地名。70年代英山出土过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石质买地券，近年还发现写有“毕卅八”字样的宋代瓷片。看来毕家曾是英山大户，至晚宋代就有这些地名。[3]

英山在唐代淮南道蕲州境内，宋元则为淮南西路蕲州。其后一直隶属安徽，1932年才划归湖北。据《新唐书·地理志》，蕲州下辖四县：蕲春、黄梅、广济和蕲水（或作浠水）。蕲州人杰地灵，明代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的家乡就在蕲春，现代诗人闻一多的家乡浠水即今英山县。[4]然而英山毕昇是否就是沈括笔下的毕昇，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和研究历代碑刻的任昉先后撰文表示不同意见。[5]毕昇卒年史无明载。时下所说毕昇卒于北宋皇祐三年的说法是基于胡道静早年的一个推测。[6]所以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服人。我们相信，只要在毕氏墓地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和科学发掘，双方的争议迟早会澄清的。

目前已经澄清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毕昇碑两侧所刻日月二字及碑额所刻华盖和缨络图案表明墓主人毕昇是摩尼教信徒。[7]任昉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她认为，此碑与汉族的传统习惯不合，而带有明显外来文化和外来宗教的色彩，摩尼教崇拜日月光明，教徒以日月图形为信仰标志，唐代西域康国人曾以毕为姓，足见毕氏一家均为从中亚传来并经汉化的日月教徒。文中还引证北京牛街元代阿拉伯人碑和泉州元代阿拉伯人碑，推测英山毕昇碑立于元末。[8]据调查，英山草盘地一带发现的毕昇祖孙墓碑大都刻有日月二字。这就清楚地表明毕氏墓地乃摩尼教徒墓地，英山可能是中世纪摩尼教在华传播的一个中心。这是本世纪中国境内摩

尼教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可惜研究者纠缠于此碑是否为发明家毕昇墓碑，殊不知英山摩尼教墓地的发现，对研究这门古老的西方宗教在淮南的流布具有重要的意义。

插图 27　湖北英山摩尼教墓碑

摩尼教今天已经无人信奉，但历史上它曾广布欧亚大陆，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摩尼教系公元 3 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 年?）在波斯西部创立。[9]其教义主

张世界由善恶二神主宰，世间充满光明与黑暗之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还融合西亚和中亚流行的佛教、景教、祆教和诺思替教的某些因素，[10]传入中国后又汲取道教内容以吸引中国信徒。这是摩尼教屡遭迫害，却能广布世界的重要原因。唐人不明其教义，音译为“摩尼教”。宋人据其“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称其为“明教”。[11]

关于摩尼教初传中国的时间，研究者起初根据《佛祖统纪》卷39的记载定在唐初。其文云：

> “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本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12]

70年代澳洲大学的刘存仁先生在《魏书》记录的农民起义史料中查出若干摩尼教传入中国的蛛丝马迹，如《魏书·裴延儁传》记载：

> “时（普通五年·524年）有五城郡山胡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

这条史料无疑可说明摩尼教曾在北魏流行。[13]然而《魏书》所述仍不是摩尼教最早入华的史料。唐人常沂《灵鬼志》记载：

> “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国来，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自说其所受术即白衣非沙门也。”[14]

摩尼教尚白，“其徒白衣白冠”（参见彩版22）。[15]这位外国白衣道人无疑即摩尼法师。唐以前有三个朝代使用过太元年号。即东吴孙权（251年）、前凉张骏（324—345年）和东晋孝武帝（376—396年）。东吴仅用一年太元年号，应首先排除在外。唐人奉东晋为正朔，自然不会用前凉年号。那么《灵鬼志》的“太元十二年”当为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年），这大概是目前所知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16]

摩尼教真正在中国民间传播始于唐代，[17]五代十国时期被农民利用来反对以佛道两教为国教的统治者，如五代梁国陈州“末

尼”党魁毋乙领导的农民起义。[18]宋元两朝许多民间秘密社团都以摩尼教为旗号，多次发动反对封建压迫的起义。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运动最终成功，建立了明朝。史树青先生甚至认为“明朝的得名跟明教有关系”。[19]可见摩尼教考古对研究中国中古史意义之重大。

摩尼教在西方和中国均为历朝禁教，保存下来的古迹很少。19世纪以前人们对摩尼教所知甚少，主要通过基督教或佛教著作对异端外道的零星描述来了解摩尼教。本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和北非埃及不断发现摩尼教法堂遗址、墓地以及东西方各种文字抄写的摩尼经残卷，终于使人们窥见到摩尼教的真实面貌。

中国境内摩尼教考古有四个重大发现为世人瞩目。本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发掘出大批唐宋时期的摩尼教法堂遗址及文物，堪称中国境内摩尼教考古的第一次重大发现。[20]稍后，敦煌藏经洞又发现了唐写本摩尼教汉文译经和回鹘文译经，可谓中国境内摩尼教考古的第二次重大发现。[21]50年代吴文良在福建泉州南门外40华里晋江县华表山找到一处宋元时期的摩尼教草菴遗址。泉州摩尼草菴的发现当属中国境内摩尼教考古的第三次重大发现。[22]1989年浙江温州苍南县发现一元明时期的摩尼教石碑《选真寺记》。碑文云：“选真寺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23]明代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云：“苏门达剌国，汉之条支，唐之波斯大食，皆其地也。其西有苏邻国，摩尼佛生焉，号具智大明使，自唐时入中国。”由此可知选真寺必为摩尼教法堂。这个发现当属中国境内摩尼教考古的第四次重大发现。

90年代湖北英山摩尼教墓地的发现应算作中国境内摩尼教考古的第五次重大发现。新疆、甘肃、福建和浙江地处边垂海疆，外来宗教文化传入这些地方，事在情理之中。况且史籍对这四个地方流行摩尼教多少有些记载。英山摩尼教墓地则不同，它位于中国内陆长江中游。以前人们只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发

现过摩尼教墓地，中国境内发现摩尼教墓地，这还是第一次。[26]这个发现不仅将带来许多前人不知的史学新知，并有可能揭示江南水乡的农民为什么信奉远在波斯的宗教，并据以发动反对封建压迫的起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山摩尼教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中国境内前四次摩尼教考古重大发现。

二、淮南摩尼教之来龙去脉

淮南摩尼教史至少要从唐代写起。这门西方宗教之所以传入淮南要追溯到回鹘人在漠北施行的宗教改革。史载唐宝应二年（763年）牟羽可汗从洛阳将睿容等四位摩尼法师携回鄂尔浑河畔的回鹘都城。这些摩尼法师在漠北“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研七部，才高海岳，辨若悬河。故能开政教于回鹘”。[27]在摩尼法师的诱导下，牟羽可汗终于放弃草原民族古老的萨满教，改立摩尼教为回鹘国教。[28]

摩尼教传入蒙古草原不久，回鹘可汗即派摩尼师到中国内地传教。《册府元龟·外臣部·请求》载：元和二年（807年）“回纥使者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同书《和亲》又载：元和十二年回鹘“又遣摩尼僧寺等八人至，帝使有司计之礼费费约五万贯，时方内有诛讨，计时度费未遂其请。以摩尼常为回鹘信奉，使宰相言其不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目前所知最古老的回鹘摩尼教文书。其中一件为突厥鲁尼文书写的《占卜书》（编号 Or. 8212—160）。书末跋尾记曰：“虎年二月十五日，在大云堂摩尼寺（tay-gün-tan manistaqi）小僧听预言师，为吾人之兄长热将军和伊特查克抄录。”[29]所谓“大云堂”译自唐人对摩尼法堂的称谓“大云光明寺”。《佛祖统记》卷41记载：大历三年（768年）“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30]那么敦煌突厥鲁尼文《占卜书》的“虎年”大概指唐大历

九年（774年）甲寅岁。斯坦因敦煌收集品中还有一件用摩尼字母抄写的突厥语摩尼教忏悔文 Xᵘāstvānīft（编号 Or. 8112—178）。[29]论者或以为其年代在公元5世纪，但摩尼教于8世纪中叶才传入漠北，这份突厥语摩尼教文献的年代显然不能早于摩尼教初传漠北的年代。

回鹘可汗很快就不满足于仅在中原建寺传教，进而提出派摩尼师到江南传教。《佛祖统纪》卷54记唐大历六年（771年），“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回鹘可汗屡屡要求派摩尼师到中国建寺传教，其实另有所谋。应该注意到回鹘人向唐廷提出建寺的地方都在长江中下游或东南沿海。唐代荆州即今湖北沙市，扬州即今江苏扬州，洪州即今江西南昌，越州则在今浙江宁波。牟羽可汗要求在这些地方建寺只是借口，其真实目的显然是要在江南经商。因为安史之乱使中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免于战乱的江南地区仍保持经济繁荣。所以回鹘可汗欲在江南经商。

自牟羽可汗施行宗教改革后，摩尼师成了回鹘国师。来自唐东京的四位摩尼师都不是洛阳人，而是侨居中国的粟特胡人，唐人称之为“昭武九姓”。唐朝开国初年长安城已有粟特摩尼师的行迹。北宋姚宽《西溪丛语》记载：

> “唐贞观五年（631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旨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何禄乃昭武九姓何氏粟特人。其法号“穆护”译自粟特语 mwck，源于中古波斯语 mwj'k（教师、主教），[30]旧译“慕阇”。敦煌唐写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将摩尼教教长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等级即慕阇。那么何禄实际上是摩尼教粟特教区的大主教。他“将祆教旨阙”大概只是幌子，真实目的显然是来华传摩尼教。史载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支汗那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吐火罗即大夏，看

来摩尼教大夏教区的大主教随后也来到长安。[31]唐贞观至开元，民间一度风靡摩尼教显然和摩尼教粟特及大夏教区的主教亲自来华传教有关。摩尼教在民间的泛滥惊动了朝廷，唐玄宗下诏禁此邪教。《通典》卷40记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敕：

> "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32]

也就是说，唐廷视摩尼教为邪教，严令禁止其在民间传播，但尊重来华胡商信仰摩尼教的风俗习惯。所以穆护何禄、吐火罗大慕阇之流并未因开元禁教而被驱逐出境。据《九姓回鹘可汗碑》，牟羽可汗从洛阳携归漠北的摩尼师即以摩尼教大主教慕阇为首。漠北传教的摩尼师显然都是昭武九姓胡人，属于中亚摩尼教团。

摩尼教如何传入粟特，现在还不能说得十分清楚。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残片M2记述了摩尼大弟子阿莫到中亚传教的故事。故事说：阿莫要渡过阿姆河传教，但遭到守护阿姆河的女神巴格德的拒绝。后来由于阿莫的恳求、说服，并且朗读了摩尼的《净命宝藏经》，终于使女神同意他渡过阿姆河传教。这个故事颇具神话色彩，但多少反映了一些摩尼教传入粟特的史迹。[33]看来摩尼生前可能已经派摩尼师渡过阿姆河，进入粟特传教。10世纪阿拉伯作家奈丁的《群书类述》又载：波斯王瓦拉赫兰一世（Varahrām I，272—275年在位）一改过去宽容的宗教政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摩尼教，并将其创始人摩尼处死。大规模的追捕和屠杀，迫使波斯摩尼教徒亡命他乡。"他们被迫东逃，直到渡过大夏河（Balkh，指阿姆河），进入可汗国土。"[34]在流亡中亚的波斯摩尼师影响下，粟特人很早就接触并信仰摩尼教，德国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曾发现大批摩尼教粟特文残经。英国伊朗学家基舍维茨为其编写了《摩尼粟特语语法》。[35]这些材料有助于了解中亚粟特摩尼教团的形成史。公元6世纪中叶，粟特

摩尼教团派人在西突厥、波斯和东罗马之间频频进行穿梭外交活动。这个摩尼教外交使团的头目名叫 Maniah（摩尼亚赫）。据俄国学者皮古列夫斯基分析，ah 系叙利亚语“兄弟”，那么这位粟特外交使节的名字意为“摩尼兄弟”[36]。以上材料表明公元 3 至 6 世纪粟特盛行摩尼教，那么从洛阳到漠北传教的摩尼师无疑都是粟特人。

粟特人是中世纪著名的商业民族。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即在他们的操纵之下。回鹘本来以畜牧业为生。粟特摩尼师不仅帮助牟羽可汗进行宗教改革，同时还要求他进行经济改革，以使回鹘经济从传统的畜牧业向粟特人擅长的商业贸易转化。这就是牟羽可汗不断要求到中国内地建造摩尼法堂的内幕。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

> “回纥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城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转江岭。西市商胡稟其源，生于回纥有功也。”

牟羽可汗自持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唐廷不能不同意回鹘人以建寺为由而实欲在中国内地经商的要求。

回鹘所派摩尼师在江南传教确实远及越州。《太平广记》卷 107《报应记》载：

> “吴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819 年）居长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从之。”

吴可久是越州人，他与妻子王氏最初接触摩尼教也可能在越州的摩尼法堂，尔后才来到摩尼师云集的长安。自唐廷允许回鹘摩尼师在中原传教以来，摩尼教在唐民间再度风行。敦煌藏经洞出有唐写本摩尼经汉文译本可以说明这一点。

回鹘所派摩尼师的行迹也留在了湖北英山。《全唐文》卷 727 舒元舆《永兴县重岩寺碑》的记载值得注意。[37]其碑序曰：

> “国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杂夷而来者，有摩尼焉，

大秦焉，祆教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

《重岩寺碑》立于唐长庆四年（824年）。据《新唐书·地理志》，唐永兴县属江南西道鄂州，即今湖北阳新县。鄂州与蕲州相邻，英山所在蕲水县距永兴县约120公里。[38]从《重岩寺碑》的描述看，重岩寺附近的三夷教寺院规模都不太大。它们自然不会建在重岩寺这座颇具规模的释门佛寺旁，但一定距重岩寺不远。这样重岩寺的僧人才会知道附近有三夷教寺院。永兴县距离英山县仅120公里，而英山又有中世纪摩尼教墓地，那么《重岩寺碑》所说摩尼寺很可能就在英山。所以摩尼教最初传入英山大约在唐大历六年至长庆四年间（771—824年）。

据报道，英山毕氏墓地附近尚有不少古遗址，“当地流传甚广的‘毕宰相府’旧址达六处之多。这些地方地面还能见到瓦砾和大型建筑构件，诸如石柱础等”。[39]其中是否会有摩尼教法堂？这是今后考古发掘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三、英山毕氏与李氏族源考

前文分析，牟羽可汗欲经商江南其实受回鹘国内粟特摩尼师的指使。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曰：

“回纥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转江岭，西市商胡稟其源，生于回纥有功也。”

牟羽时代摩尼教传入回鹘的时间并不长，这时在回鹘传教的摩尼师大概都不是回鹘本族人。况且回鹘人本以游牧为生，不善经商之道。那么回鹘可汗派到江南的摩尼师显然都是为回鹘服务的粟特摩尼师及粟特商胡。粟特人操持回鹘对外贸易，史籍多有反映。《旧唐书·回纥传》载：“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

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资殖产甚厚。”唐代诗人杜甫的《解闷十二诗》曰：“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既然如此，毕家坳的摩尼教墓地则可能是唐代经商传教江南的粟特胡人后裔的墓地。

魏晋隋唐文献把中亚不同城邦来华的粟特人分别冠以不同的汉姓。如撒马尔干来的粟特人称康氏，塔什干来的称石氏，布哈拉来的称安氏等，统称“昭武九姓胡”。关于九姓胡，除康、石和安三姓外，唐代文献还提到米、史、曹、何、穆、竺和火寻七姓。然而穆国指波斯东境谋夫城，竺国为大夏城邦呾密，火寻国系粟特邻邦花拉子模，此三城并非粟特城邦。如此算来粟特只有七姓，不足九姓。有人认为九姓乃言其多，不一定真有九个粟特城邦。然而正如任昉指出的，昭武九姓尚有毕氏。[40]

《隋书·西域传》记载：

> “（安）国之西百余里有毕国，可千余家。其国无君长，安国统之。大业五年（609年），遣使贡献，后遂绝焉。”[41]

《大唐西域记》卷1称此国为“伐地”。据法国汉学家儒莲考证，伐地就是阿拉伯作家纳尔沙希的《布哈拉史》所说阿姆河畔Bitik村落。从安国到呼罗珊及波斯要在这里渡阿姆河。[42]这个村落位于安国布哈拉城西南约400里。目前学界大都根据儒莲之说认为毕国就是《大唐西域记》的“伐地”。毕国的粟特人自然以毕氏为姓。昭武九姓之毕氏亦见洛阳出土墓志。《康元敬墓志》曰：康元敬，“相州安阳人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康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祖乐，魏骠骑大将军……父仟相，齐九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康居系文献对粟特的早期称谓。康元敬卒于唐咸亨四年（673年）。其先乃粟特毕国“毕万之后”，本姓毕氏。[43]所以英山毕氏家族无疑即昭武九姓胡毕氏之后裔。毕昇碑称墓主人为“神主”。温州苍南摩尼寺《选真寺记》曰：

"今兹幸遂遐，□□祖考，寺之东无作祠宇，以奉神主。"[64]

"神主"一词似为摩尼教徒对祖师的专称，疑译自粟特语βγnpt（祠主、神主），洛阳出土隋翟突娑墓志译作"薄贺比多"。

英山毕昇之妻名曰"李妙香"。妙香译自梵语 sugandha，或作"善香"。[65]研究者早就发现摩尼教为推广其说，融合了佛教、景教和祆教的许多内容。这是它屡遭迫害，却能广布世界的重要原因。摩尼教传入中国后，迎合中国传统宗教，走上佛化及道化之路。福建晋江华表山的摩尼教草菴就是一处典型的佛化摩尼教寺院。菴中摩尼像题记称摩尼为"摩尼光佛"，以示摩尼与佛教有不解之缘。所以摩尼教徒李妙香取具有佛教色彩的法号不足为怪。其实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李妙香的姓氏。

胡人取汉姓始自魏晋时期。魏晋重门阀，人居中原的少数族多攀附中国古代名人，以求得汉人尊重。李氏为胡人喜用的汉姓之一。姚薇元《北朝胡姓考》曾对这个现象作如下分析。他说：

"又隋申国公李穆，传称自云陇西成纪人，汉李陵之后。陵没匈奴，子孙代居北狄，其后随魏南迁，复归并、陇。疑其本高车泣伏利氏，入魏改李氏。周司空李贤即其兄，是贤亦胡族。"

李氏为唐朝王室姓氏，故波斯来华侨居的胡人亦喜用李氏为姓。1980 年西安东郊发现波斯侨民李素墓。据墓志记载，这位波斯侨民"字文贞，西波斯人也……公本国王之甥也……天宝中衔自君命，来通国好，承我帝泽纳充质子……拜银清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特赐姓李，封陇西郡，因以得姓也"。[66]入唐为官的波斯人还有李元谅，本安息人（波斯古称），姓安氏。"帝念其勋劳，又赐李氏，改名元谅"。[67]陕西华县尚有建于唐德宗贞元五年（789 年）的李元谅碑。[68]唐代姓李的波斯人不都是王室册封的。唐宣宗时（847—859 年），大食的波斯人李彦升，"天子诏春司

考其才。二年以进士名显”。[49]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有“波斯大商贾李苏沙近况香亭子材，以钱一千贯文、绢一千匹赐之。”[50]唐代姓李的波斯人还有《海药本草》的作者李珰。唐肃宗时（757—761年），安息人李抱玉、李抱真及其孙女李景裕。唐僖宗时（875—888年）波斯人李珰，“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波斯人李绚和李舜弦兄妹均为唐代有名的诗人，凡61首诗词收入《全唐诗》卷760、796和896。唐朝大诗人李白生于中亚碎叶，不及一代竟然家谱难寻，故史家陈寅恪怀疑李白可能也是胡人。[51]

除波斯人外，漠北的突厥和回鹘人也常以李氏为姓。唐宣宗时（847—859年）回鹘人李茂勋，西突厥沙陀人李国昌、李克父子。李克因镇压黄巢起义而名显天下。《册府元龟》卷976载：

> “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八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纥之佛师也。先自本国来太原。少尹李彦图者，武帝时怀化郡王李思忠之孙也。思忠本回鹘王子温没斯也，归国赐姓名。”

这又是一户姓李的回鹘摩尼教世家。

关于唐代江淮摩尼教史，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5《赐回鹘可汗书》云：

> “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国禁断，自累朝缘回鹘敬信，始许兴行。江淮数镇，皆令阐教。”

既然波斯和回鹘侨民多以李氏为姓，回鹘摩尼师曾在江淮传摩尼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位嫁给粟特摩尼教徒的李妙香是否亦为胡人之后。

保义可汗死后回鹘内乱迭起。唐太和六年（832年）回鹘昭礼可汗被其部下所杀。[52]唐开成初年（839年）在位的回鹘萨特勤可汗又险遭粟特国相安允合谋杀。[53]频繁的内乱使漠北回鹘的国力大大削弱，终于在唐开成五年（840年）被北方游牧人黠戛斯

攻破位于鄂尔浑河流域的都城。回鹘被迫从漠北西迁中亚。[59]同时，唐朝借回鹘国破之机首先收回其在江淮的传教权。《会昌一品集》卷5《赐回鹘可汗书》又载：

> “近各得本道申奏，缘自闻回鹘国破亡，奉法者因兹懈怠。蕃僧在彼，稍似无依。吴楚水乡，人性嚣薄。信心既去，翕习至难……朕深念异国远僧，欲其安堵。且令于两都及太原信响处行教，其江淮诸寺权停。待回鹘本土安宁，即却令如旧。”

由于外来宗教在中国肆意泛滥，僧尼遍布天下而无人生产，造成唐朝经济严重衰退。于是唐武宗采纳道士赵归真建议，罢黜佛教，同时禁断摩尼、大秦、火祆三夷教，史称“会昌灭佛”。摩尼教于会昌三年（843年）首先被禁。《佛祖统纪》卷42载，会昌三年“敕天下摩尼寺并令罢废”；同卷又载：“会昌三年敕天下末尼寺并令废罢。京城女末尼七十人皆死。在回纥者流之。诸道死者大半”。[60]《僧史略》卷下亦载：“会昌三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宫。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等，配流诸道，死者大半。”此时黠戛斯已经攻破漠北回鹘都城，长安城回鹘摩尼教僧尼实际上已经无家可归，所以长安城70余女摩尼师殉教身亡。其余则被发配全国诸道。英山属唐淮南道，应有回鹘摩尼教徒发配此地。所以李妙香也有可能是京城发配到诸道的回鹘摩尼师之后。

四、五代宋元淮南摩尼教寻踪

五代至两宋，文献很少提及境外有摩尼师来华。史籍仅存以下三条材料。《旧五代史·回鹘传》记载：“周广顺元年（952年）二月，（高昌回鹘）遣使并摩尼贡玉团、白叠、貂皮等。”《宋史·外国传》载：“于阗国，建隆二年（961年）十二月，遣本国摩

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宋史·大食国传》载：“大食国，咸平六年（1003年）又遣使婆罗钦三摩尼等来贡方物。摩尼等对于崇政殿，持真珠以进。自云离国日诚愿得瞻威颜即献此，乞不给回。真宗不欲违其意，俟其还，犹加恩赉。”公元840年回鹘被黠戛斯击败，从漠北西迁中亚。于阗和高昌流行摩尼教显然是受回鹘人影响。大食这时已经入主波斯，故大食摩尼师即波斯摩尼师。从以上三条记载看，唐以后波斯和中亚的摩尼教团只和中国统治阶层打过交道，而和中国社会下层的摩尼教民间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系。所以这个时期中国民间流行的摩尼教当视为唐代传入中国的摩尼教的继续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摩尼教被农民利用来反对以佛道两教为国教的统治者。其中以五代梁国陈州“末尼”党魁毋乙领导的农民起义最为著名。[59]《佛祖统纪》卷42和卷54并载：“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毋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其上慢不法有若此。”毋乙发动起义过程中曾和淮南的摩尼教民间组织进行联系。《旧五代史》卷10记录此事。书中说：“梁贞明六年（920年）冬十月，陈州妖贼毋乙、董乙伏诛。陈州里俗之人，喜习佐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揉杂淫秽，宵聚昼散。州县因循，遂致滋蔓。时刺史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宠，动多不法，故奸慝之徒，望风影附。毋乙数辈，渐及千人，攻掠乡社，长吏不能诘。是岁秋，其众益盛，南通淮夷。朝廷累发州兵讨捕，反为贼所败。陈、颍、蔡三州大被其毒。”梁国陈州即今河南淮阳，蔡州即今安徽汝南，颍州即今安徽阜阳。毋乙起义的中心在今河南及安徽交界地区。不过毋乙起义曾“南通淮夷”，似乎和淮南的摩尼教组织发生过联系。

关于摩尼教在宋代民间传播的情况，陆游《渭南文集》卷5

《条对状》略有所述。文中说：

> “自古盗贼之兴，若止因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为害，未易可测。伏缘此色人处处有，淮南谓之二桧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赍之类。名号不一，明教犹甚。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像，至于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为校勘，福州知州黄裳为监雕。”

陆游《条对状》写于南宋孝宗（1163年即位）初年。英山在南宋属于淮南路蕲州。正如陈垣指出的，淮南路流行的“二桧子”即摩尼教经典《二宗三际经》之“二宗”，《九姓回鹘可汗碑》之“二祀”。[57]摩尼教发展到宋代竟然对统治者构成如此严重的威胁。印刷术对摩尼教的传播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陆游《条对状》下文建议，“其经文印板，令州县根寻，日下焚毁”。

宋元摩尼教盛行江南在考古遗存中亦有反映。这个认识受到英山毕家坳摩尼教墓碑的启迪。据考古调查，北宋以来长江中下游至福建古墓中盛行裱葬一对影青皈依瓶，内盛五谷，俗称“魂瓶”。江西南城县北宋嘉佑二年（908年）墓及福建顺昌县北宋墓所出皈依瓶是这种瓷瓶的早期标本。[58]江西、湖南和福建的南宋墓，特别是江西的南宋墓中，几乎每墓必出这对瓷瓶（参见彩版23）。[59]因为这对瓶一只有“龙”，另一只有“虎”，故称“龙虎瓶”。它的另一特点是一只有“日”，另一只有“月”，所以又叫“日月瓶”。它们一般由墓中殉葬的立俑抱在怀里。这个传统一直流行到元明时期，清代墓中再不见这种“魂瓶”的踪迹。日月瓶的分布范围大致是：东至浙江的江山，西至湖南的醴陵，北至湖北的黄石，南达江西的吉安、南城及福建的绍武。[60]日月瓶的制

作工艺无疑本自中国陶瓷手工业的传统，但某些创作思想似乎受外来宗教影响。由于日月瓶在南昌发现较多，所以有人怀疑它或许和道教正乙派有关。[61]湖北英山摩尼教墓地的发现提醒我们，崇拜日月是摩尼教的特征，而日月瓶的分布范围正是中世纪摩尼教在江南重点传播的荆、扬、洪、越地区。所以在影青皈依瓷瓶上装饰日月显然和摩尼教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的流布有关。

元代淮南摩尼教流行情况史无明载，50年代福建泉州出土的元代摩尼教墓志为研究这个时期淮南摩尼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954年吴文良先生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浦发现一方1940年拆卸城墙时挖出的汉文叙利亚文双语摩尼教墓志。庄为玑在《考古》1956年第3期将碑文发表。这方墓志很快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美国学者博路德（L.G. Goodrich）于翌年《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对此墓碑详加考释。[62]吴文良（1957年）、日本学者村山七郎（1964年）[63]、英国学者刘南强（1980年）[64]、夏鼐（1981年）[65]、韩儒林（1981年）[66]、林悟殊（1987年）[67]、吴幼雄（1988年）[68]和杨钦章（1992年）[69]先后撰文参加讨论。这方墓志提到也里可温教，[70]故学者们大都称其为“也里可温教墓碑”或“景教碑”。其实这块墓碑开明宗义首先提到的是摩尼教。汉文碑文曰：

> “管领江南诸道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1313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村山七郎检出《至顺镇江府志》卷9有“马里哈昔牙、麻儿失里、河必思忽八”。故研究者一度以为马里哈昔牙系墓主人的名字。后经英国学者刘南强指出，马里哈昔牙来自叙利亚文Mari Hasia，意为“主教”，马里·失里门才是墓主人的真正的名字。他将此碑第一行释为：“献给江南诸路的摩尼教和景教的的管领者，最尊敬的景教马里·失里门主教。”夏鼐认为，墓主人大概是

一位元代远宦泉州的蒙古汪古（Öngüt）部景教徒。蒙古汪古部即从高昌迁入陕西、甘肃和内蒙古等地的回鹘人。[71]据法国突厥学家哈密顿考证，“也里可温”一词源于希腊语 αρχιγου，拉丁语作 archaon，本意为“领袖、缔造者”，元代回鹘和蒙古人借用来表示基督教。[72]摩尼教本为回鹘国教，后来回鹘人才改奉景教。那么马里·失里门原来一定是位摩尼教徒，后来又信仰景教。所以元朝让他领管江南诸道摩尼教及景教。

据美国学者卡特介绍，“景教徒，尤其是属于回鹘族的那些景教徒，在促进波斯的蒙古人与基督教国家帝王之间的密切关系方面是特别活跃的。生于北京附近的勒本·马可斯（Rabban Marcos）即是这样的一个回鹘景教徒，他在 1281 年被任命为驻地在巴格达的景教教会的总主教。他的亲密朋友，从北京来的勒本·扫马（Rabban Cauma）是另一个回鹘族的景教徒，被波斯伊尔汗亚尔浑（Ilkhan Argon）任命为出使欧洲的重要使臣。作为蒙古人的使节，他出访了君士坦丁堡皇帝、罗马教皇、法兰西的国王以及英格兰的国王”。[73]无论如何，马里·失里门墓志不仅要作为元代也里可温教流行中国的证据，还应视为元代摩尼教流行中国的考古资料。

中外文献记载回鹘人信奉摩尼教最晚到宋初。阿拉伯史家马苏底《黄金牧地》记载：

> “九姓古斯占据着位于呼罗珊和中国之间名叫高昌（Kouchan）的城镇。至今，也就是在 332 年（即 943/944 年），他们是突厥种族中最勇敢、最强大，而比任何别的民族都安定的民族。其王拥有伊尔汗（王中之王）的称号，在所有这些民族之中，只有他们信奉摩尼教。”[74]

《宋史·外国传》载，太平兴国六年（981 年）王延德出使高昌，见到当地“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后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

法”。波斯教指景教，即元代之也里可温教。本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发现的吐鲁番摩尼教寺院回鹘文柱铭记录公元947年及公元947—948年在位的两位高昌回鹘可汗名前冠以ai（月）tängridä（日）官号。[75]据日本学者田坂兴道研究，信奉摩尼教的回鹘可汗，其称呼必冠以摩尼教徒推崇的日月尊号。[76]由此可知宋代高昌回鹘流行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元史·刑法志》云：

“诸以白衣善友为名，聚众结社者，禁之。”

白衣白冠乃摩尼教一大特征，故沙畹和伯希和根据这条记载推测“摩尼教似已绝迹于元时”。[77]泉州这方墓志首揭《元律》所禁者实为利用摩尼教秘密结社，对正当传教并不反对，还派专人管理。

回鹘人在元朝备受重用。蒙文即在回鹘人协助下从回鹘文创建的。元朝远宦江南的回鹘名人有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贯石云，能诗文，更善作曲；延祐五年进士契玉立，曾任泉州路达鲁花赤。[78]马里·失里门也是这样一位在元朝为官的回鹘人。此君身兼二职，既是江南诸道也里可温教主教，又是江南诸道摩尼教领管。那么马里·失里门统领的江南诸道摩尼教区自然包括英山所在的淮南路。据马里·失里门墓志，元代江南诸道尚有不少摩尼教寺院，可惜目前仅有福建泉州晋江华表山的摩尼草菴、福建莆田摩尼寺[79]和浙江温州苍南县选真寺被发现。英山摩尼教墓地的发现则为寻找下一个江南摩尼教法堂提供了重要线索。

宋元两朝农民运动往往利用摩尼教。那么英山一带出土的有关农民起义的考古资料值得注意。70年代英山曾发现元末太平二年（1357年）“卞梁行省管勾所印”和“长安仓印”。据考证，它们都属于南方红巾军的遗物。[80]公元1355年红巾军刘福通等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宋”，改元“龙凤”，都亳州（今安徽亳县）。小明王宫殿遗址在今亳县西门外小明王台。[81]“小明王”一名出自摩尼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82]红巾军起义显然

具有摩尼教色彩，所以英山发现的红巾军文物进一步提供了元末摩尼教在淮南民间流行的情况。

摩尼教在中国的最后消失大概在明代。《洪武实录》记载明朝开国元年（1368年）对摩尼教等民间邪教下禁令。《洪武诏》曰：

> “其僧道建齐设醮，不许奏章上表，投拜青祠，亦不许塑画天神地祇。及白莲教、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寿圣、书圣、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诏从之。”

所谓“明尊”即摩尼教之明使。明尊教即摩尼教。明洪武七年（1374年）发布的《大明律》列有禁止摩尼教等邪教的律文。[63]这是正史最后提到中国民间流行摩尼教。[64]英山摩尼教的最后消失大概就在《洪武诏》或《大明律》禁天下邪教令下达之后不久。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注　释

① 吴晓松：《李约瑟关心英山发现毕昇墓碑》，《出版科学》1994年第4期。

② 老鸣：《英山毕昇墓碑研讨会情况综述》，《出版科学》1996年第1期第39-40页；蔡学俭：《我国毕昇研究情况和观点综述》，《出版发行研究》1995年第4期。此文收入《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第208－210页。

③ 吴晓松等：《英山县发现毕昇及其后裔墓葬考证》，《出版科学》1994年第1期第39-40页；黄冈地区博物馆等：《英山县茅竹湾宋墓发掘》，《江汉考古》1988年第3期。

④ 参见《旧唐书·地理志》淮南道蕲州条。

⑤ 张秀民：《英山发现的是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墓碑吗?》，《中国印刷》1993年第2期；任昉：《对英山毕昇墓碑的再商榷》，《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

⑥ 胡道静：《活字版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试探》，《文史哲》1957年第59期。

⑦ 据福建泉州的考古材料，摩尼教墓碑和景教墓碑的区别是：摩尼教墓碑均刻有华盖、缨络和莲花，后者显然受佛教艺术影响，新疆柏孜克里克发现的摩尼教绘画也有华盖和缨络图案；而泉州的景教墓碑一般没有华盖、缨络和莲花。参见李玉昆：《福建晋江草庵摩尼教遗迹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2期第138页；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图版18。摩尼教华盖的宗教意义目前尚不清楚。

⑧ 任昉：《毕昇与湖北英山出土的"毕昇碑"》，《中国文物报》1994年9月25日第3版；《再谈"毕昇碑"的宗教色彩》，《出版科学》1995年第3期第37－38页。后文提到她尚有更详细的研究于《出土文献研究》第3集（此文待刊）。

⑨ 摩尼，《通典》卷40、《宋史》卷71和《夷坚志》又作"末摩尼"，当译自波斯语 Mār Mani，意为"摩尼主"，说见伯希和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重印版，第50页。

⑩ P. R. L. Brown, "The Diffusion of Manichaeism in the Roman Empire,"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t. Augustine*, London, 1972, 104－105.

⑪ 参见庄季裕《鸡肋编》卷上。

⑫ 沙畹和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⑬ 柳存仁著、林悟殊译：《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之遗痕》，《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集第36－61页。

⑭ 其书早佚。本文所引见《法苑珠林》卷7《咒术篇》。

⑮ 参见《佛祖统纪》卷40。

⑯ 英国著名伊朗学家亨宁曾提出，本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新疆喀什噶尔河下游发现的一件塞语文书为摩尼教文书，说见 W.B. Henning, "Neue Materialen zur Geschichte des Manichäismus," *ZDMG*, 90, Wiesbaden, 1－18, 1936。这件文书的年代约为4世纪左右，但新的研究表明该文书涉及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与摩尼教无关。参见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第234－251页。

⑰ 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唐写本《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和《下部

赞》三部摩尼教汉文译经，为摩尼教在中国民间传播提供了直接证据。其录文可参见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⑱ 毋乙利用摩尼教起义见《佛祖统纪》卷40、42和54；并见《新五代史》卷3、《旧五代史》卷10及《僧史略》卷下。

⑲ 史树青：《英山毕昇墓碑研讨会上的发言》，《出版科学》1996年第1期第36页。

⑳ A. v.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atantike in Mittelasien* II: Die manichaische Miniaturen, Berlin, 1923, reprinted in Graz, 1973; Hans-Joachin Klimkeit, *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 Leiden, 1962. 近年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和北大晁华山又在吐鲁番对摩尼教遗址作了新的调查，详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ニ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31－32，1991年（荣新江书评见《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第99－103页）；晁华山：《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中国文化》1993年第8期第1－20页。

㉑ 敦煌发现的摩尼教汉文译经录文见林悟殊：《本世纪来摩尼教资料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概况》，收入《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1页；敦煌所出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见扬富学和牛汝极合著：《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近年日本伊朗学者吉田丰还从斯坦因敦煌收集品中发现一个用汉字音译的阿拉美语和中古波斯语交替的摩尼教祈祷文残片。参见Y. Yoshida, "Manichaean Aramaic in the Chinese Hymnscroll," *BSOAS*, XLV. 2, 1983, 326－331.

㉒ 该遗址位于晋江县罗山乡谢店大队苏内村华表山麓，当地人称为"草菴"。明代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始见记载。清代抄本《西山杂志》记载：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有僧人在石刀山建摩尼寺。或以为宋石刀山即今华表山。华表山于清代曾重修，1949年后政府多次拨款重修。遗址内现存一座摩尼光佛的高浮雕像。其上摩崖原有"观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尊，摩尼光佛"石刻文字，但毁于文革年间。《晋江县文管会文件》晋文（81）006号文件记录："80年10月，重新整理四墙基，在清基时，于基层98公分深之前后30点，发现宋代黑瓷碗残片数十块，上有字样。其中有较完整的一块，上书'明教会'三字，字迹清楚……并有宝丰□等字样。"参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4-45页；林文明：《摩尼教和草菴遗址》，《海交史研究》1978年第1期；庄为玑：《泉州摩尼教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第72－82页。

㉓ 周梦江：《从苍南摩尼寺的发现谈温州摩尼教》，《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75－79页。

㉔ P. Alfaric, "Un manuscrit manichéen. Le document de Tebessa," *Revue d' Histoirre et de Literature Religieuses*, n.s. VI, 1920, 62－98; C. Schmidt und H. J. Polotsky, "Ein Mani-Fund in Ägypten. Originalschriften des Nani und seiner Schüler," *SPAW*, 1933, 4－90. 福建泉州发现过摩尼教墓碑，但都是1940年从城墙中拆出，墓地情况至今不明。

㉕ 此为清末在外蒙古发现的《九姓回鹘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之第8行，录文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60页。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发现的《牟羽可汗入教记》更为详细地介绍了回鹘从萨满教改奉摩尼教的过程。参见 W. Bang und 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 *SPAW*, 1929, 7－9; 译文见冯家昇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㉖ 回鹘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情况参见瑞典学者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2页。

㉗ V. Thomsen, "Dr. M.A. Stein' s Manuscripts in Türkish 'Runic' Script from Miran and Tunhuang," *JRAS*, 1912, 190－124. 译文参见杨富学和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67－68页及第245－246页。

㉘ "回纥"即唐人对回鹘人的早期称谓，后在回鹘可汗的要求下改称"回鹘"。

㉙ J.P. Asmussen, *Xāstānft Studies in Manichaeism*, Copenhagen, 1965, 167－234; 李经纬：《摩尼教徒忏悔词》，《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第57－78页。

㉚ I. Gershevitch, *A Grammer of Manichean Sogdian*, Oxford, 1961, §976 and 990.

㉛ 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经典中有一残片用大夏文书写，参见 M. Boyce, "The Manichaean Literature in Middle Iranian,"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4, Iranistik 2, Literature fg I, Leiden, 1968, 67－76.

㉜ 这条史料并见《僧史略》卷下、《佛祖统纪》卷40及卷50。

㉝ P. Asmussen, *Manichaean Literature*, New York: Delmar, 1975, 22－23; 林

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页。

㉞ B. Dodge, *The Fihrist of al-Nadim*, New York, 1970, 802；关于瓦拉赫兰在位年代，参见威廉·兰格著、刘绪贻等译：《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261页。

㉟ I. Gershevitch, *A Grammer of Manichean Sogdian*, Oxford, 1961.

㊱ N. Pigulewskaja, *Byzanz auf den Wegen nach Indien*, Berlin, 1963；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第9页。

㊲ 法国汉学家沙畹及伯希和最先注意到这条摩尼教史料，说见伯希和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重印版，第71页。

㊳ 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第五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57－58页。

㊴ 吴晓松等：《英山县发现毕昇及其后裔墓葬的考证》，《出版科学》1994年第1期第40页。

㊵ 任昉：《毕昇与湖北英山出土的"毕昇碑"》，《中国文物报》1994年9月25日第3版。

㊶ 毕国亦见《北史·西域传》。玄奘介绍中亚粟特国捕喝国说："从此国西四百余里，至伐地国。唐言西安国。"捕喝，即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玄奘的"伐地国"，《新唐书·西域传》作"戍地"，即《隋书》和《北史》之"毕国"。参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4－95页。

㊷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97页。

㊸ 李健超：《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西北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㊹ 周梦江：《从苍南摩尼寺的发现谈温州摩尼教》，《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75页。

㊺ 荻原雲來等：《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1476頁。

㊻ 陈国英：《西安东郊三座唐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㊼ 参见《新唐书·李元谅传》。

㊽ 李健超：《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西北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

1988年，第59页。

㊾ 参见《文苑英华》卷464。

㊿ 参见《册府元龟·台省部》。

(51) 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1期。

(52) 参见《资治通鉴》卷244。

(53) 参见《新唐书·回鹘传》。

(54) 参见《新唐书·回鹘传》及《旧唐书·回纥传》。

(55) 参见《佛祖统纪》卷42。

(56) 同(18)。

(57)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58) 薛尧：《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年第11期第571－576页；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顺昌宋墓》，《考古》1979年第6期第504－507页。

(59) 高至喜：《湖南古代墓葬概况》，《文物》1960年第3期第3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00页。

(60)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47页。

(61)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47页。

(62) L. G. Goodrich, "Recent Discoveries at Zaitun," *JOAS*, 77－3, 1957, 161－165.

(63) 村山七郎：《泉州出土的突厥语景教墓碑》，载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Band. 35, 1964, 395。此文转引自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第59－62页。

(64) S.N.C. Lieu, "Nestorians and Manichaean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Vigiliae Christianae* 34, 1980.

(65)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第59－62页。

(66) 韩儒林：《所谓"亦思替非文字"是什么文字》，《考古》1981年第1期第63页。

⑰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⑱ 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1期。

⑲ 杨钦章：《元代南中国沿海的景教会和景教徒》，《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⑳ 也里可温教即基督教的东方派系。唐代称"景教"或"大秦教"。

㉑ 佐伯好郎：《内蒙古白灵廟附近に于ける景教の遺迹に就いて》，《東方学報》第9冊，東京，1939年，第49－89頁；盖山林：《元代狂古部地区的景教遗迹与景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亚洲文明》第一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20-129页。

㉒ J. Hamilton, "Le Texte turc en caractères syriaques du grand sceau cruciforme de Mär Yahballähä III," *JA*, 1972, 163－164.

㉓ 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45页。

㉔ 译文见安部健夫著、宋肃瀛译：《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1页。安部将Kouchan译为"古城"，以为指位于吉木萨尔的北庭。疑不确。目前发现的高昌回鹘摩尼教遗址全在吐鲁番盆地，而北庭仅发现过回鹘佛寺遗址。

㉕ F.W.K. Müller, "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1. Die uigurische Inschrift auf dem Pfahle I B 4672, 2," *APAW*, 1915；关于这两个回鹘文柱铭的年代讨论，见哈密顿著、耿昇译：《五代回鹘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3页。

㉖ 田坂興道：《回纥に於ける摩尼迫害運動》，《東方学報》第11冊，東京，1940年，第224頁；林悟殊：前揭书，第95－96页。

㉗ 沙畹和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重印版，第96页。

㉘ 冯家昇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㉙ 陈长城：《莆田涵江发现摩尼教碑刻》，《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程德鲁：《涵江又发现摩尼教残碑》，《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52页。

㉚ 孙启康：《释元末红巾军的三颗铜印》，《光明日报》1975年7月5日。

㉛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38页。

㉜ 《大小明王出世经》见吴克己撰刊（1208－1224年）、良渚增补（1237－1240年）；《释门正统》。关于这段摩尼教史料的讨论，参见沙畹和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重印版，第95页。

㉝ 沙畹和伯希和曾讨论这两条明代摩尼教史料，说见《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重印版，第97－98页。

㉞ 据伯希和介绍，18世纪初开封府的犹太教徒曾将一篇摩尼教文献《明教序》赠给耶苏会士。参见伯希和：《福建摩尼教遗迹》，《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重印版，第134－135页。由此可知清代摩尼教仍在开封流行。另据乾隆《温州府志·寺观》，永嘉县临江乡（今瓯海县临江镇一带）有明教瑜伽寺；瑞安县来暮乡（今瑞安县曹村镇）有明教院。据周梦江调查，《平阳县志·神教志二》载，民国年间温州平阳县仍有摩尼教徒活动。文中说，摩尼教“元明时，江以南颇有之。今万全乡（今平阳县万全区）尚有其教，大较流为优婆塞矣”。参见周梦江：《从苍南摩尼寺的发现谈温州摩尼教》，《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77页。

七　《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

自1900年法国东方学家列维撰《王玄策使印度记》以来，这位唐朝外交家及其史迹受到中外学人的高度重视，[1]仅国内研究者就达9人之多，先后有柳诒徵（1925年）、冯承钧（1932年）、陈翰生（1961年）、岑仲勉（1962年）、黄盛璋（1962年）、范祥雍（1982年）、陆庆夫（1984年）、莫任南（1991年）、孙修身（1994年）等。[2]欧美藏学家，特别是日本学者对王玄策更加热衷，其论文当数倍于此。[3]可惜史料不足，有关王玄策的研究虽然卓有成就，但一直没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1994年4月《中国文物报》一则报道说，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靠近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山口发现摩崖碑刻《大唐天竺使出铭》（以下简称《使出铭》）。此碑系唐显庆三年（658年）所刻。"碑中记载了唐代使节王玄策率随从刘嘉宾、贺守一等人历尽艰难险阻，出使天竺，经小杨童（同）等，路过吉隆，于此勒石纪功的情形。"[4]消息发出三个月后，《考古》1994年第7期发表了《使出铭》的初步报告。[5]原来早在1990年6月《使出铭》就被发现，地点在西藏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崖壁上。吉隆在吐蕃时代称Mang-yul（茫域），清代文献作"济咙"。

《使出铭》的主要研究者霍巍在日本《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发表了更为详细的研究报告。[6]他最近在《中国藏学》

又发表了对这个碑刻的进一步研究。[7]霍巍的研究基于实地考古调查所得资料，这使他能超越前人，更正某些书斋中的想象。《王玄策行传》记载："吐蕃国西南有一涌泉，平地涌出，激水遂高五六尺，甚热，煮肉即熟。"他发现这个古泉就是西藏昂仁县桑桑"塔格架"间歇泉，因而为王玄策西行路线确定了第一个准确的地理坐标点。此前有人推测西藏南境聂木拉山口是吐蕃－泥婆罗古道所经唯一山口。霍巍根据考古新发现指出唐朝使节西行印度实际取道吉隆宗喀，然后从中尼边境拉苏瓦山口出境。他还首次论证了王玄策时代小羊同国的具体位置在吉隆与拉萨之间。这比日本吐蕃史地研究权威佐藤长对羊同位置的考证推进了一步。

《使出铭》为唐代碑铭习用骈体文，用典甚多，本不易读。加之碑铭下半部残缺，几乎找不到完整句子，字里行间多有夺落。凡此都为通读这个碑铭增加了难度。我们今天能把铭文大致读懂，首先要感谢霍巍的辛勤耕耘。他的研究已引起王玄策研究者的注意，[8]但尚未见到有人讨论其中存在的问题。为使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得以充分研究，撰写此文，求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王玄策到印度之路

《使出铭》碑额篆刻阳文一行七字"大唐天竺使出铭"。所谓铭本是商周王公贵族在青铜器上所刻生平功德的颂辞，故铭字从金。秦汉以来帝王作铭不限于钟鼎，又勒石于胜迹名山，所以"铭"又有"碑铭"之称。东汉窦宪于燕然山大败北匈奴，班固作《燕然山铭》以表功绩。其后铭演变成一种特殊文体，或用于帝王在胜迹名山封禅刻石，或用于封疆大吏在边陲勒石表绩。《使出铭》属于后者。史载显庆年间唐高宗派使臣王名远赴中亚册封西突厥降将，并于吐火罗国（今阿富汗）立碑。洛阳出土唐

代墓志披露龙朔至乾封年间，高宗派阿罗憾“差充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林国西界（今意大利罗马附近）立碑”。[9]这些碑铭迄今尚未发现。《使出铭》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唐人封疆立碑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

天竺即古代印度，或称“身毒”(其名见《使出铭》第7行)，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和印度。印度在梵语中写作 Sindu。该字之所以被读作“天竺”，可能和北印度操犍陀罗语的古代居民有关。犍陀罗人往往/s/和/dh/不分。例如：梵语的 madhu 被犍陀罗人读作 masu（葡萄酒）。[10]大概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把梵语 Sindu 读若 dhindu，结果被汉代僧人译作“天竺”。

王玄策出访印度之路史称“唐蕃古道”。据《新唐书·地理志》鄯州鄯城县下注，这条古道东起长安（今陕西西安），历秦州（今甘肃天水）、狄道（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进入今青海境内，经龙支（今青海民和）、鄯州（今青海乐都）、鄯城（今青海西宁）、赤岭（今日月山）等地，至悉诺罗驿，出今青海境，过阁川驿（今藏北那曲）、农歌驿（今藏北羊八井北），然后到逻些（今西藏拉萨）。关于逻些到印度之路，唐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曰：

> “自汉至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依道所经，且都遗迹，即所序之。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由西南至敢国。由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咀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

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罗国（本注：此国去吐蕃约为九千里）。”

道宣所谓“大唐往年使者”当指王玄策，那么“东道”就是王玄策取道吐蕃到印度之路。这段路不见前代文献，甚至不见《大唐西域记》、《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等唐代地理著作。虽然义净的《大唐求法高僧传》提到玄照等人取道吐蕃到印度，但义净没说这条路的具体行程。唯有道宣介绍了唐蕃古道西段的具体走向，其史料来源就是王玄策的西行记录。

文献对唐蕃古道的记载失于简略，而且夹杂许多陌生的汉藏古地名，单凭文献难以确定唐蕃古道各个驿站的地理坐标点。我们今天能知道唐蕃古道的具体走向，要归功于这条古道上的考古发现。

史载唐玄宗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吐蕃使臣名悉腊和唐使者皇甫惟明、崔琳等在长安和逻些进行外交活动，为开元二十二年赤岭划界树碑和设市贸易铺平了道路。1963 年北大教授阎文儒带研究生在甘肃永靖炳灵寺实习。他们在第 148 窟发现开元十九年和蕃副使魏季随出使吐蕃时刻写的《灵岩寺记》。碑文刻有和蕃大使崔琳为首的和蕃使团名单凡 71 人。灵岩寺是唐人对炳灵寺的称谓。吐蕃僧侣入居此寺之后更名“炳灵寺”。所谓“炳灵”即藏语Hbum rgyal-ba（亿万佛）的音译。[11]凡从长安去吐蕃都要在此地渡黄河，《太平寰宇记》称这个黄河渡口为“风林关”。《释迦方志》所说唐蕃古道第一站“河州”即指炳林寺所在州县。据调查，炳灵寺石窟附近黄河对岸桥滩原有筑桥遗址，现为刘家峡水库淹没，唐代风林关或在此处。[12]值得注意的是，王玄策曾在炳灵寺石窟第 54 龛捐资造像。该窟有题记曰：“大唐永隆二年（681 年）闰七月八日，陇右道巡察使行殿中侍御史王玄［策］敬造阿弥陀佛一躯并二菩萨。”[13]王玄策三使印度均往来于炳灵寺附近黄河渡口，故在此寺造像，以修功德。

唐蕃古道另一重要考古发现在青海境内。1983年青海文物普查队在青海湖东岸日月山大牙豁的草丛中发现一唐碑，碑文因久经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而剥落无存，但碑额、碑座均为唐代石碑形制。[14]日月山就是《释迦方志》所云唐蕃古道上的赤岭。《旧唐书·李蒿传》记载：开元二十一年“金城公主上言，请以九月一日树碑于赤岭，定蕃汉界。树碑之日，诏张守硅、李行炜与吐蕃莽布支同往观焉”。《新唐书·吐蕃传》又载：长庆二年入蕃会盟的唐使臣刘元鼎途经赤岭时见到“信安王玮、张守硅所定封石皆仆（扑），独虏所立犹存”。据此，唐开元中所立分界碑原有汉文和藏文两碑。日月山附近发现的唐碑仅其中之一。可惜日月山这块唐碑现已无字，无法知道它究竟是汉碑还是藏碑。无论如何，日月山唐碑的发现为我们确定王玄策在青海境内的行程路线提供了准确的地理坐标点。

80年代，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都兰县热水乡发现唐代吐谷浑大墓和祭祀遗址。[15]王玄策入藏所经吐谷浑衙帐当距都兰热水不远。据《释迦方志》，吐谷浑西南为白兰羌。而都兰西南的格尔木是古今从青海入藏的必经之路。据此，白兰羌应驻牧于格尔木。《新唐书·多弥传》提到多弥国“滨犁牛河”而居。80年代文物调查资料表明，《释迦方志》的多弥国约在今玉树县巴塘草原通天河畔。青海和西藏以唐古拉山为界，共有五个山口可以入藏。这五个山口自西而东为当拉、郭由、纽拉、查午拉和沙卖拉。当拉山口即今青藏公路所经唐古拉山口。据敦煌唐写本《吐蕃投递驿书》，从吐蕃经柴达木盆地去敦煌即走当拉山口。据调查，从玉树到逻些不走当拉山口，而走查午拉山口。[16]王玄策西使途经玉树县境内多弥国，所以唐使团很可能取道查午拉山口入藏。

据《释迦方志》记载，唐蕃古道从“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苏毗本是新疆昆仑山的古代游牧部落，公元7世纪初被吐

蕃赞普朗日论赞兼并，此后成为吐蕃的附庸国。敦煌唐代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S.367）记载："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山险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据黄文弼调查，石城镇约在今新疆若羌县城附近。[17]由此推之，萨毗城当在靠近青海的新疆阿尔金山高山湖泊阿牙克库木湖畔。从萨毗城的位置看，该城应是苏毗国城镇之一。萨毗泽西南行为喀拉米兰山口，可通拉萨。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新疆去西藏探险即走此路。不过据前文讨论，王玄策使团入藏取道查午拉山口，他们经过的苏毗国应是苏毗国的东南境。此外，苏毗与逻些之间尚有敢国，藏语作Kan，其地约在今拉萨北纳木错湖附近。

唐蕃古道的开辟加强了吐蕃与中原的联系，加速了中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北印度名僧莲华生入藏传教，都是取道唐蕃古道。可惜文献不足征，逻些与印度间的旅程以前一直不十分清楚。《使出铭》的发现为确定这条古道西段走向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坐标点。《使出铭》的重要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内容可与文献相互印证，还在于披露了许多前所未知的重要史料。总之，《大唐天竺使出铭》研究的深入必将把我们带入唐蕃关系史以及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时代。为便于讨论和今后的研究，我们将王玄策西使印度路线制图附于书末（参见卷末地图4）。

二、碑铭校释

《使出铭》正文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下半部因修建现代水渠而毁。铭文阴刻楷书24行，估计原来满行约30－40字左右。现残存约222字，其中又有相当部分字迹漫漶。行与字之间阴刻4×3.5厘米细线方格，每字约2厘米见方。拓片发表于

《考古》1994年第7期，但缩小了1/4。这使本来就不甚清楚的拓片不堪卒读。同期《考古》还刊载两幅碑铭照片（参见插图28），照片很清楚，可惜只有很少的局部碑铭（第18－24及第8－13行）。《东方学报》第66册刊布了碑铭开头两行的局部照片，《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扉页图版发表了碑铭第20－24行的局部照片。我们根据这些照片和霍巍的录文（以下简称“霍文”），逐行讨论于下：

1－2．记录人刘嘉宾撰，记录人［……撰］，［……］／□人□抉□粤书，贺守一书，［……］

据《东方学报》第66册图3所刊照片，碑铭第1行“撰”字后面似无字，当为空格。霍文推测这个碑铭系刘嘉宾撰写。但其文明载刘嘉宾系记录人，可见他只是王玄策手下一位幕僚，在其左右负责记录这位唐朝大使出访天竺的言行。若按满行30－40字估算，记录王玄策言行的随从为数不少，如第1行的两位记录人和第2行的两位抄碑或刻碑者。《使出铭》的作者无疑是王玄策（详下第21行），由他本人口授，刘嘉宾等记录人、书写人仅是笔录、书写和刻碑者。王玄策是位高产作家，曾编纂《中天竺行记》10卷。此书又名《王玄策行传》、《西国行传》或《西域行传》等。唐代官修巨著《西国志》即取材于王玄策的《中天竺行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该书有志、书和图三部分，凡56卷。可惜这些图书今已不传，仅见《法苑珠林》和《释迦方志》引用其中若干材料。据考证，敦煌莫高窟有些壁画就是根据王玄策从印度带回的佛画绘制的。《使出铭》开头这段文字又披露王玄策10卷本《中天竺行记》应在刘嘉宾等人所作王玄策出行记录基础上编纂的。《释迦方志》所述大唐使人开辟的中印通道“东道”无疑根据王玄策西使记录。

既然前文用“撰”表示笔录，第2行的“书”当与前文“撰”有别，大概指在摩崖上抄写碑文，然后让工匠依照所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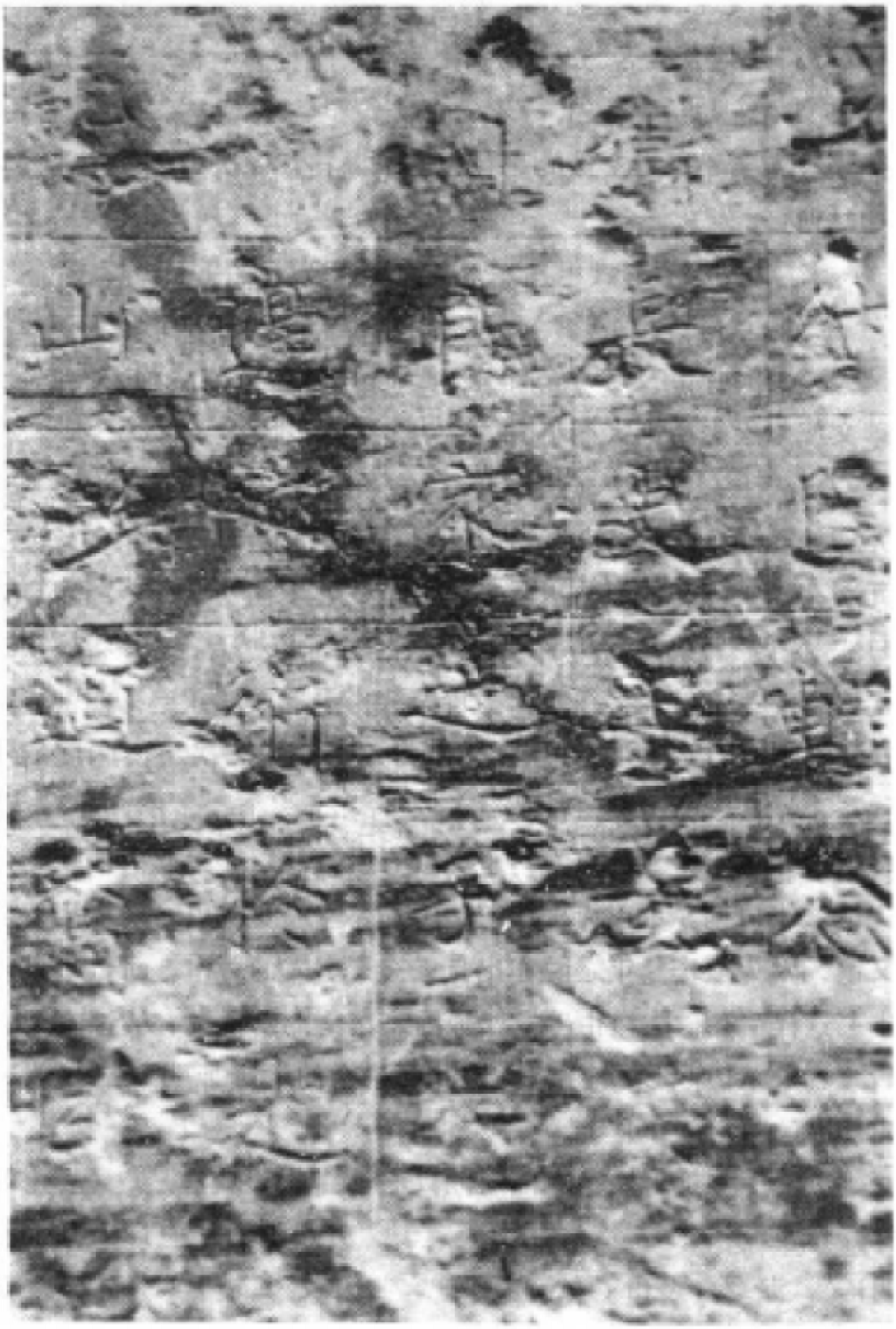


插图 28　西藏古隆阿瓦呼英山口的唐显庆二年摩崖石刻
《大唐天竺使出铭》局部照片

字刻铭。贞观十九年（645年）王玄策在印度摩伽陀国大觉寺（或称“摩诃菩提寺”）所立碑铭系高宗所作，故派“典司门令史魏才书”。[18]从此碑第21行看，王玄策是奉诏勒铭。那么贺守一等书写人若不是王玄策的幕僚，便为随行出访的典司门令一级的朝廷命官。

3. 维显庆三季（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

驭同“御”，指驾御。《大唐西域记·序论》曰：“我大唐御极则天，乘时握级，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临。”此处残缺之碑文或与玄奘所论大同小异。

史载王玄策曾于显庆二年（657年）第三次出使印度。《法苑珠林》卷24引王玄策《西国行传》曰：“唐显庆二年，敕使王元（玄）策等，往西国送佛袈裟，至尼婆罗国西南，至颇罗度来村。”《诸经要集》卷1引王玄策《西国行传》云：“大唐显庆二年，敕使王玄策等，往西国送佛袈裟，于尼婆罗西南，颇罗度来村东坎下，有水火池。”唐代文献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的年代系于显庆二年，而《使出铭》却记录了一个“显庆三年”。关于这个差池，霍文解释为传世文献有误，故王玄策此次西使年月应据《使出铭》更正为显庆三年六月。然而更改史籍之事当慎之又慎，因为显庆二年之说亦出自王玄策本人的著作，而且不只一本书这样引用。大概由于这个原因，霍文的新说没有被王玄策的研究者采纳。[19]所以我们必须找出更充分的证据证明王玄策此次出使天竺的启程年月。

关于王玄策出使印度的时间只有第一次比较清楚。《法苑珠林》卷39引《王玄策传》记太宗于“贞观十七年三月内，爰发明诏”，派李义表和王玄策送印度客归国。“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国。”也就是说，从长安，经吐蕃到印度需要9个月，而且要在3月内从长安出发。我们查到显庆二年秋七月王玄策尚在长安劝唐太宗挽留印度老方士那罗迩娑婆寐。[20]此外，碑铭第4行

“葉”字因避李世民讳写作“葉”字。据《旧唐书·高宗本纪》，(显庆二年)“十二月乙卯，还洛阳宫。庚午，改‘昏’、‘葉’字”。所以王玄策此次西使必在显庆二年十二月庚午之后。考虑到冬季无法翻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口并参照他第一次出使印度的启程时间，王玄策大概于显庆三年三月上旬从长安启程，并于显庆三年五月下旬到达吉隆。《使出铭》第12行曰：“……年夏五月届于小扬童之西。”此“五月”当为显庆三年五月底。此时正值冰雪消融之际，他们可能遇到山洪，所以滞留吉隆盆地。一方面等洪水退去，另一方面可能还要修缮栈道（详下第14行）。王玄策在阿瓦呷英山嘴刊石勒铭大概到六月初才完成。所以“显庆三年六月”必不是王玄策从长安启程的时间，而是他在小羊同西界勒铭的年月。

4—5. 圣□（轨）系葉（叶），重光玄化，法于无空。[……]／□□方道，格□穹□，三五以[……]

系葉（叶）即世代，汉代称“世家”，唐人避李世民讳，改称“系家”。《史记·孔子世家》唐司马贞索隐曰：“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世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系家焉。”比较《尚书·顾命》“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与本句“圣□（轨）系葉，重光玄化”。第5行“三五”指三皇五帝。《大唐西域记》卷1序论：“玄奘辄随游至，举其风土，随未考方辨俗，信以越五逾三。”这两行铭文大概是说大唐天子的基业将世代相传，教化所至，已达四海。其功绩则超越三皇五帝。

7—8. 逾山海而输赉，□（懂）身毒近隔[……大唐天竺使出]／[铭并]序：□皇上纳谏，（轨）念□[……]

碑文的山海之“山”指唐古拉山，“海”指纳木错湖，“身毒”即天竺，指印度。第7—8行间的“……序”似可根据《使出铭》碑额复原为“[大唐天竺使出铭并]序”。其后残文旧释“□皇上纳陞”，据上下文，疑为“□皇上纳谏”。

9. 大［唐使］、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策）、宣［慰使……］

王玄策不仅对印度和中亚诸国颇具影响，亦对日本佛学产生影响。奈良药师寺至今宝藏一唐代佛足迹石。其旁有太平胜宝五年（753年）铭文记载此佛迹据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带回的王玄策摹本而造。其铭曰“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鹿野苑中转法轮处因见迹，得转写，搭是第一本。日本使人黄文本向大唐国于普光寺得转写，搭是第二本；此本在吾京四条一坊禅院，向禅院坛披见神迹，敬转写，搭是第三本”云云。[21]据此可将此碑第9行开头三字“大□□”复原为“大唐使”。此行最后“宣……”疑指唐代职官“宣慰使”。所谓“宣慰”指大臣代表皇帝视察某一地区，宣传政令，安抚百姓。唐封演《封氏闻见记·饮茶》：“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宣慰使为临时性的差遣，或称“招慰使”，如高宗显庆年间派往东罗马的唐朝大使阿罗憾的职官即为“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22]

史籍中王玄策其名或作“王玄廓”[23]，或作“王元策”[24]。1983年考古工作者发现王玄策在洛阳龙门石窟宾阳南洞曾造佛像一龛。佛像虽然残毁，但是造像题记尚存，其名作“王玄策”[25]。本碑铭王玄策的“策”使用唐代表示“策”的俗字，进而证明这位唐朝使节的名字必不是王元策或王玄廓，而是王玄策。文献对王玄策身世记载较详。此人原籍洛阳，[26]早年任融州黄水县（今广西罗城西北）县令。[27]关于王玄策的职官晋阶，文献记载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他以“和糴副使左监门长史”之职随唐朝大使李仪表出使印度，[28]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以唐朝大使及“右卫率府长史”之职出使印度，[29]“大唐显庆年中，敕使卫长史王玄策因向印度……”[30]《法苑珠林》卷119又记“朝散大夫”王玄策撰写《中天竺行记》10卷。史籍对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的职官语焉不详，《使出铭》首次披露他这次以“左骁卫长史”之职出使印度。

10. 刘仁楷选关内良家之子六□（人）[……]

霍文释“良家之子”为“清白人家之子”，恐非是。汉唐人所谓“良家之子”指世家子弟。敦煌汉简载：“出粟五石二斗二升，以食使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八月癸卯。”[71]《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司马贞《索隐》注良家子曰：“非医、巫、商贾、百工也。”故知良家之子指王玄策使团中不信佛教的世俗子弟。除关内世家子弟外，随王玄策此次出访的人员亦有佛门子弟。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记载：“彼岸法师、智岸法师，并是高昌人也。少长京师，传灯在念。既而归心胜理，遂乃观化中天。与王玄廓（策）相随。泛舶海中，遇疾俱卒。”这两位高僧随王玄策到印度后没有随他一道从陆路返回，而取道海路回国，结果不幸遇难。

12. 声超雪岭，指鹫山以遥骞 [……]

霍文释“雪岭”为喜马拉雅山，疑不确。唐代文献称喜马拉雅山为“云山”。《大正新修大正藏》卷50《游方及抄》载：“从吐蕃国向云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国。”这条材料出自王玄策《西国行传》，可知王玄策亦称喜马拉雅山为“云山”。碑铭中“雪岭”为汉译佛经及汉唐僧人传记中习见地名，或称雪山、大雪山，均指阿富汗南境的兴都库什山。《玄奘法师行状》曰：“中间所经，葱山雪岭，热海铁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曰：“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这里的雪岭均指兴都库什山。我们之所以要澄清这个地名，因为它牵涉到王玄策史迹中的一个疑点。《续高僧传·玄奘传》曰：“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匹。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并就蔗造之，皆得成就。”大夏即今阿富汗。这个记录披露了王玄策曾到过兴都库什山以北大夏国。

那么王玄策何时去大夏的呢？《新唐书·摩伽陀传》又载：摩伽陀国，“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甚远。”这是一段关于制糖法从印度传入中国的重要史料。前揭《玄奘传》所说“石蜜”就是糖。那么《新唐书》这段文字和《玄奘传》所说王玄策到摩揭陀菩提寺召石蜜匠应为同一历史事件。由此推之，王玄策可能在贞观二十一年摩伽陀使者来长安不久即奉诏出使大夏。然而这毕竟是个推测。《使出铭》的“声超雪岭”将使这个疑点涣然冰释，可证王玄策在第三次出使印度前确实出访过大夏。骛字意为奔忙。《文选·班固〈达宾戏〉》：“战国横骛。”李善注：“东西交驰谓之骛。”那么这行铭文大意说王玄策的声望已遍及中亚和印度，不仅向西超越中亚兴都库什山，还向南传至印度著名佛山灵鹫山。英国考古学家孔宁汗认为此山即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南境之 Sailagiri 山。[32]不过学界对此山位置尚有不同意见，如意大利学者伯戴克认为此山在同属于印度比哈尔邦的拉特那吉利（Ratnagiri）山。[33]

12—13. ［显庆三］季（年）夏五月，届于小杨童之西。［……］

这处纪年年数残缺，疑为显庆三年，详见前文第 3 行的讨论。杨童，藏语作 Zhang-zhung，旧译“羊同”或“象雄”，小杨童即《释迦方志》所说吐蕃西南的小羊同国。[34]该书记唐蕃古道曰：“由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咀仓法关，吐蕃南界也。”《使出铭》的发现使我们可以确认王玄策时代小羊同立国于逻些与吉隆之间。那么是否可以据此更改史籍，将《通典》“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改为“大羊同东接吐蕃，南接小羊同”呢？我们以为证据尚不足。因为《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二》亦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这些史料或说明小羊同后来向西迁徙，散居西藏阿里及

克什米尔的拉达克；逻些与吉隆之间则为大羊同占据。总之，在未得到充分的史料依据之前，我们不得不尊重史籍的记载。

霍文引证当地藏民称“吉隆”为“宗喀”，旧称“答仓宗喀”，推论《使出铭》发现地北面的宗喀山口必为《释迦方志》的“咀仓法关”。[55]这个考证更正了足立喜六对咀仓法关地理位置的误释，可谓吐蕃-泥婆罗道研究的重大突破。咀仓法，一本作“咀仓去”[56]，后者在发音上与藏语“答仓宗喀”更为接近。《使出铭》的考古学意义不只于此。它还有助于解决另一个历史地理疑案。

吉隆古称“茫域”。除茫域道外，唐代从吐蕃到印度尚有另一条路，可称“洛域道”。这条路很少有人叙及。关于洛域道北段，《法苑珠林》卷80引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曰：“从吐蕃国南界至屈露多、悉利等国，云从此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宝山，山中土石并是黄金，有人取者，即获殃咎。”《大正新修大正藏》卷50《游方及抄》亦载：“从吐蕃国向云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国。云从此驿北行，可以九日，山中有一宝山，山中土石并是黄金，有人取者，即获殃咎（本注：出王玄策《西国行传》）。”据考证，屈露多国约在今印度北部西姆拉西北的苏丹普尔附近。[57]

关于洛域道南段，《大唐西域记》卷4记载：“屈露多，周三千余里，山周四境。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从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险，逾山越谷，至洛护罗国。”所谓“洛护罗”来自藏语 Lho-yul，即洛域，意为“南方地区”。[58]吐蕃人之南北是和逻些的位置相对而言的，那么此路应取道拉萨南边某山口。

据清代文献，从西藏进入尼泊尔有宗喀或聂木拉两山口可供选择。既然茫域道走宗喀山口，那么洛域道大概走聂木拉山口。聂木拉在吉隆之东，实际上比从茫域道去印度近一些。《西藏图考》卷3《西招图略》载：“由聂木拉南行，经噶宜卡等处至锡

巴寺，为达廓尔喀阳布城之小路，贸易人由此较济咙（即吉隆）路为近。”王玄策在《西国行传》中说，“云从此驿北行，可以九日”。他显然只是听说此路，没有走过。这条路似乎只有玄照走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记载，玄照“以九月而辞苦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于时麟德年（664—665年）中，驾幸东洛。”玄照能以5个月时间从印度苦部到洛阳，大概就是取洛域道这条捷径。

14. 时水［流］方壮，栈［于］斯乃权［……］

这段碑铭形容从吉隆到尼泊尔沿途道路的情况。大意是说当时正值冰雪消融，山洪爆发。他们只得修建栈道，临时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关于吐蕃至泥婆罗的道里，《释迦方志》说，从吐蕃“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咀仓法关，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云云。据此，《使出铭》发现地咀仓法关的下一站当为“末上加三鼻关”。

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对末上加三鼻关作过考证。他说：“末上加 Mashangchia 是 Marsyangdi 的音译。撒罢、三坝、三鼻在西藏语是桥的意思，故‘末上加三鼻’从语法构词上可理解为在 Marsyangdi 河上有桥，其处设关……此地形式逼居于 Marsyangdi 河上游，从北入大雪山溪谷的正门口。”[39]据霍巍调查，吉隆地区确有一河，今称吉隆藏布江。此河发源于吉隆北部马拉山脉。从宗喀山口进入吉隆盆地，南行可达县城，从县城再南行入吉隆藏布江溪谷，沿此溪谷东南行70公里可达中尼边境热索桥。这里的古今道路大致如此。然而霍文把末上加三鼻关置于《释迦方志》“十九栈道”之后，比附为中尼边境的热索桥。其说恐难成立。

三鼻为藏语 sambvaf 的音译，意为“桥梁”。[40]这座名为“末上加”的桥梁显然与《释迦方志》下文“十三飞梯”之“飞梯”、“十九栈道”之“栈道”以及《使出铭》第14行提到的“栈”具

有同样的含义。汉语“栈”指在悬崖绝壁上凿孔支架木桩，再用木板架桥铺出一条路。那么吐蕃人把“栈”称为 sambvaf 是完全可能的。道宣说，从吐蕃“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咀仓法关，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这段话显然要理解为咀仓法关的下一站即末上加三鼻关。如果霍文对末上加（Marsyangdi）河即吉隆藏布江的比定不误，那么末上加三鼻关大概是进入吉隆藏布江溪谷的第一栈。此河发源于马拉山。“马拉”之名似与吉隆藏布江的古称 Marsyangdi 之 Mar 有关。

玄奘的记载值得注意，他在《大唐西域记》卷 4 介绍说：“此（指屈露多国）北二千余里，经途难阻，寒风飞雪，至秣罗娑国，亦谓三波诃国。”[41]《大唐西域记》说从屈露多国北行“千八九百里”可达“洛护罗”（指吐蕃南方“洛域”），那么从屈露多北行“二千余里”所达“秣罗娑”或“三波诃”显然在洛域道之西茫域道上。值得玩味的是，若把“秣罗娑”和“三波诃”这两个陌生的地名连读就是“秣罗娑三波诃”。这个名字大概就是《释迦方志》所谓“末上加三鼻关”，也即藏语 Marsyangdi-sambvaf-kwan（末上加栈道关）的别译。据霍巍调查，“自宗喀（咀仓法关）以下至界桥热索桥一线，恰自东南进入吉隆藏布江溪谷。由于河流下切强烈，形成高原深峡，地势十分险峻。尤其是素以天险著称的察木卡一线，更是天然要隘。”那么末上加三鼻关很可能要在吉隆盆地南入吉隆藏布江溪谷入口处寻找，而“十三飞梯”和“十九栈道”或在吉隆藏布江溪谷绵延 70 公里的悬崖峭壁上。

18—19. 险也。但燕然既迩，犹刊石以［纪功］，［……铸］/铜而［立柱］。况功百往［险］路，□［……］.

霍文已正确指出前一句典出《后汉书·窦宪传》。该传记载窦宪大破匈奴北单于燕然山，班固“刻石勒功，记汉威德”之事。需要解释的是后一句。此句甚残，不堪卒读。不过其中“铜”字

提醒我们，这段文字可能典出《后汉书·马援传》。该传记载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发兵讨平交趾徵贰之乱后，“进击九真贼徵侧余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峤南悉平”。李贤注引《广州记》曰：“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旧唐书·地理志》又载：“后汉遣马援讨林邑蛮……至林邑。又南行二千余里，有西屠夷国。铸二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夷分境，以纪汉德之盛。”王玄策上次出使印度曾结集吐蕃和尼婆罗凡三千士兵讨伐中天竺摩揭陀。所以他自持劳苦功高，以为应象班固作《燕然山铭》以及伏波将军马援在交趾立铜柱一样，在吐蕃边境勒石纪功。那么第19行的残句似可复原为“［铸］铜而［立柱］”。

20—21. 之［大］猷，默皇华之武才（材），□［……］/小人为其铭曰：

猷，功绩、功业。其前残损之字，疑为“大”字。大猷意即大业。《三国志·陆逊传》：“圣化所绥，万里草偃，方荡平华夏，统一大猷。”皇华，典出《诗经·小雅》。其序曰：“《皇皇者华》，君使臣也。送之礼乐，言远而有光华。”唐人用以表示奉命出使或奉命出使者。例如：贞元宰相贾耽根据唐使者出访所获资料编成地理志，题为《皇华四达记》。

据《考古》图版捌图2照片，第二个“之”字后面尚有“武才”二字。武才，即武材，指军事才干。《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赞》曰：“伯珪（公孙瓒）疏犷，武才猛。”据《新唐书·西域传》，“（贞观）二十二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大乱。其臣那伏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谗数十，战不胜，皆殁。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尼婆罗以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茶博和罗城，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阿罗那顺委国走，合散兵复阵，师仁擒之，俘

斩千计。余众奉王妻阻乾陀卫江，师仁击之，大溃。获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降城邑五百八十所。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像。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有司告宗庙。”这是唐朝对印度唯一一次大规模用兵。王玄策是这次中印之战的中方主帅，故在《使出铭》中自诩有“皇华之武材”。

第21行的“小人”显然是王玄策自谦之辞。《文选》卷56梁陆左公《新刻漏铭》曰：“金字不传，银书未勒者哉，乃诏小臣为其铭。”唐李善注引“《集》曰：铭一字，至尊所改，敕书辞曰，故当云铭”。故小人即小臣。此亦证明《使出铭》作者系王玄策本人。《新唐书·西域传》摩伽陀条记载：“贞观二十一年……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国摩诃菩提寺立碑焉。后德宗自制钟铭，赐那烂陀寺。”推敲上述文字，王玄策奉诏在摩诃菩提寺所立之碑的碑文系高宗所作。[29]虽然他在吉隆勒石刻铭亦奉高宗之诏，但碑文当是王玄策自作。

22—24. 奉［诏］天则，骋辎［轩兮］，［……］/穷地域，勒贞石兮，灵山侧［……］/使人息王令敏使侄［……］

据第21行的讨论，“奉”字后面的残文似为“诏”字，而“辎”字后面的残文疑为“车”或“轩”字。按骈文体例，其后可再补一语气辞“兮”字。辎车，或称“辎轩”，一种轻便的古战车。唐杨炯《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乘使者之辎车。”唐李善注《风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辎轩使采异代方言。”那么这句残文大意是说王玄策奉诏出使，驾车远行。

灵山即第12行之鹫山，梵名Gṛdharkūta，或译“灵鹫山”，或音译“耆阇崛山”。故此行中间一句讲述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在耆阇崛山刊石立碑之事。《法苑珠林》卷39引王玄策所立《耆阇崛山碑》曰：“览华山之神迹，勒贞碑于崇冈”。此句与《使出铭》第22行的辞句雷同。

霍文释“息”为古国名并由此推测王令敏为河南息县人，恐有误。下文有“使侄”云云，所以这里的“息”当释“息子”，指儿女。唐张鹭《游仙窟》：“兄请清河崔公之第五息，嫂即太原公第三女。”唐李皋翔《叔氏墓志》：“年周四甲，岂无诸亲，生故或迫，亦有息子，旅宦京国。”这位大唐使人之子王令敏疑为王玄策之子。下文缺名的“使侄”或是王玄策的侄儿。《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提到王玄策有侄儿。文中说：“智弘律师者，洛阳人也，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侄也。”碑文的“使侄”不会是智弘，因为智弘从合浦（今广西合浦）乘船，经交趾到印度。因此碑文的“使侄”可能是智弘的某位兄弟。

三、全碑录文

此碑释读尚有许多不解及存疑之处，但由于没有拓片或照片可资考订，只得留待全碑照片表后再作研究。据全文的讨论，《大唐天竺使出铭》似可重新校录于下（/表示分行，[ ] 中的字表示后补，() 中的字表示前一字的释文）：

大唐天竺使出铭

记录人刘嘉宾撰，记录人［……撰］，/□人□抉□粤书，贺守一书［……书］/

维显庆三季（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圣□（轨）系素（叶），重光玄化，法于无空［……］/□□方道，格□穹□，三五以［……］/□及踵贯□（匈?）之国，觇风雨而来［……］/逾山海而输赉，□（慛）身毒近隔［……大唐天竺使出］/［铭并］序：□皇上纳谏，（轨）念□［……］/大［唐使］、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策），宣［慰使……］/刘仁楷选关内良家之子六□（人）［……］/乱之方，□□□（御?）边之术。于是出［使……］/声超雪岭，指鹫山以遒鸯［……显庆

三]／季（年）夏五月，届于小杨童之西。[……]／时水[流]方壮，栈[于]斯乃权[……]／山隅□则雪□拥□□□白云……／回拥墨雾而□□，西瞰连峰[而……]／箭水穗万壑之[间]，流是寔天[际……]，／险也。但燕然既迩，犹刊石以[纪功]，[……]／[铸]铜而[立柱]。况功百往[险]路，□[……]／之[大]猷，默皇华之武才（材），□[……]。／小人为其铭曰：／

懿皇华兮，奉[诏]天则，骋辎[轩兮]，[……]／穷地域，勒贞石兮，灵山侧[……]／

使人息王令敏　使侄[……]

注　释

① 列维著、冯承钧译：《王玄策使印度记》，《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7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② 柳诒徵：《王玄策事迹》，《学衡》1925年第39期；冯承钧：《王玄策事辑》，《清华学报》1932年第8卷第1期，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陈翰生：《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岑仲勉：《王玄策<中天竺行记>》，《中外史地考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黄盛璋：《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道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③ 冯蒸：《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西方学者的新研究可参看美国藏学家C. I. Beckwith的著作及所引书目，参见其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④ 参见《西藏吉隆县境内发现<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石碑》，《中国文物报》1994年4月10日。

⑤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境内发现<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第619－623页。

⑥ 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銘>及其相関問題研究》，《東方学報》第66冊，1994年，第253－270頁。

⑦ 霍巍：《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和西亚的古代交通》，《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第48－63页。

⑧ 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陆庆夫：《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第171－178页。

⑨ 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94－110页。

⑩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110－111.

⑪ 榊亮三郎：《梵藏漢和四訳對照翻譯名義大集》，京都帝国大学叢書第三，大正五年，第514－825頁。

⑫ 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1993年，第66页；亦见《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9年；陈小平：《唐蕃古道》，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50－51页。

⑬ 这条材料发现于1963年，录文见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1993年，第66页；亦见《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9年版。

⑭ 陈小平：《唐蕃古道》，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66－68页。

⑮ 参见许新国、格桑本：《都兰热水唐代吐蕃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71－172页；《都兰县吐蕃祭祀遗址》，《青海日报》1985年10月16日及《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35页。都兰发现的这批唐墓和祭祀遗址应是吐蕃时期吐谷浑的遗存。

⑯ 陈小平：《唐蕃古道》，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94－95页。

⑰ 黄文弼：《新疆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48－49页；又见《若羌考古调查》，《黄文弼历史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91－293页。

⑱ 参见《法苑珠林》卷38引《王玄策传》。

⑲ 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陆庆夫：《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第171－178页。

⑳ 《资治通鉴》卷200，北京：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6303页。《新唐书·西域传》称此印度方士为"那罗迩娑婆寐"。这个名字显然译自梵文nārāyaṇasyōmin，旧译"那罗延神主"，意为"人神之主"。故那罗迩娑婆寐之"迩"疑与"延"形近而讹。

㉑ 柳诒徵最先在国内引用此材料，见所著《王玄策事迹》，《学衡》1925年第39期。《全唐文·拾遗》卷72亦收入此碑铭录文，题为《佛迹石台刻字二首》，但录文多有错误。本文所用录文据孙修身先生新近从秦良抄回的录文，见所著《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㉒ 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第95页。

㉓ 参见《大唐求法高僧传·智海律师传》。

㉔ 《法苑珠林》卷24引王玄策《西国行传》

㉕ 温玉成：《龙门所见中外交通史料初探》，《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㉖ 义净：《大唐求法高僧传》卷下《智慧弘律师传》。

㉗ 参见《法苑珠林》卷39引《王玄策传》。

㉘ 参见《全唐续拾》卷10。

㉙ 参见《新唐书·西域传》、《新唐书·吐蕃传》及《旧唐书·太宗本纪》。

㉚ 《法苑珠林》卷38引王玄策《西域传》。

㉛ 录文见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6页。

㉜ A. Cunningham,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Delhi, reprinted, 1979, 393－94.

㉝ L. Petech, *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 Roma: Serie Orientale II, 1950, 45－46.

㉞ 关于羊同的地理位置，可参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20。

㉟ "答仓宗喀"之名见钦则旺布著、刘立千译注：《卫藏道场胜迹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3页。

㊱ 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页，注8。

㊲ 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55页。

㊳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373－374页。

㊴ 足立喜六：《唐代の苑婆羅道》，《支那佛教史学》第3卷第1號，1939年。

㊵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教研室编：《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北京，1982年油印本，第93页。

㊶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年，第374页。

㊷ 此碑铭尚未发现，但《法苑珠林》卷38有录文。

缩 略 语 表

AJ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OASH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Budapest
APAW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AM, n.s.	Asia Major, new series, London
AO	Acta Orientalia, Copenhagen
BÉFEO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l' Extrême-Orient, Paris
ABIA	Annual Bibliography of Indian Archaeology
BMFE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CAJ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The Hague and Wiesbaden
CII	S. Konow,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I, part 1,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 Calcutta, 1929
EW	East and West, Rome

IIJ	Indo-Iranian Journal, Dordren/Boston/London
JA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JASB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Calcutta
JIES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Washington
JOA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ew Haven/ Ann Arbor
JPTS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Oxford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 Society, London
JSFOu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Helsinki
KI. I-III	A. M. Boyer et al., Kharos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0—1929
NC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London
NTS	Norsk Tidsskrift for Sprovvidenskap, Oslo
SBAW	Sitzungberiche der Berlin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SPAW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TE. I-II	W. Krause a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I-II,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Verlarg, 1960—1964
TP	T'oung Pao, Leiden
UAJb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ZDMD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Wiesbaden
ZVORAO	Zapiski Vostochnogo Otdeleniia imperatorskogo Russkogo Archeologiche skogo Obshchestva, St. Petersburg

《梵和》　荻原雲來等：《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年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Han – Tang Dynasties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By Lin Meicun

Contents

Preface

Part I. The Earliest Contact among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China and the West

1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Royal Place during Dixin, Last Emperor of the Yin Dynasty Revealed by an Oracle-Bones Inscription ····· (3)

2 On the Source of Bronze Swords of the Yin-Zhou China ····· (39)

3 Qilian and Kunlun—the Earliest Tokharian Loan-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 (64)

4 Tokharian and the Dragon Tribe ····· (70)

5 On the Foreign Loan-Words for "Lion" in Ancient Chinese ····· (87)

6 Tianlu and Pixie: Two Foreign Animal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rts ···(96)

7 Som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on the First Prevalence of Zoroastrianism in China ····· (102)

Part II. New Studies on Ancient Languag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1 The Gāndhārī Buddhist Texts during the Era of Kushan King Kadphises and the related Problem ····· (115)

2 An Hephthalites Coin from the Ding County, Hebei ····· (131)
3 The Gāndhārī Pratimokha Text from Niya, Xinjiang ····· (142)
4 A Fragment of the Kharosṭhī Udānavarga Text from Niya, Xinjiang ··· (151)
5 Some Persian and Central Asian Silver Wares with Inscriptions from China ····· (157)
6 A New Kharosṭhī Document concerning the Shanshan King Tomgraka from Niya ····· (178)
7 A Middle Persian Seal from the Sogdian Tomb in Guyuan, Ningxia and the Related Problem ····· (198)

Part III. On the Ancient Cities buried in the Takhlamakan Desert

1 The Ancient Route along the Khotan River during the Han-Tang Dynasties ····· (211)
2 A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the Buddhist Sites of the Shule Kingdom··(227)
3 The Jingjue Kingdom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Niya Site ····· (244)
4 Some Important Records in the Han Wooden Tablet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ern Han and Kushān ····· (256)
5 On the Paḍakā City Recorded in the Staël-Hölstein Scroll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 (265)
6 On the First Capital of the Loulan Kingdom ····· (279)
7 On the Last Capital of the Loulan Kingdom ····· (290)

Part IV. The Roads from Luoyang to India and Rome

1 On the Ancient Marin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ome ····· (307)
2 Mandāra-puṣpa and the Foreign Elements of the Han Exorcism ····· (322)
3 On the Dharmaguptas in China ····· (343)
4 The Turgiš Coins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estern Region during the Tang Period ····· (365)
5 An Uigur Coin concerning the Manichaeism ····· (381)
6 The Sogdian Immigrant Bi Sheng's Stele in Yingshan, Hubei and the Manichaeism of the Yangzi River Basin ····· (393)
7 A Re-examination on the Chinese Stele Inscribed by the Tang Ambas-

sador Wang Xuance in Tibet ..... (420)

List of maps and illustrations

Abbreviations